帝国的背影 ⊕

哈布斯堡王朝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荷] 彼得 · 贾德森 _ 著
(Pieter M. Judson)

杨乐言 _ 译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帝国的背影⊕

哈布斯堡王朝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荷] 彼得·贾德森 _ 著
(Pieter M. Judson)

杨乐言 _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哈布斯堡王朝

作者:[荷]彼得·贾德森

译者:杨乐言

ISBN:978750867522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查理

引言

1911年6月13日星期二，以及6月19日星期一，全奥匈帝国的乡镇城市中有超过450万人参与投票，选举新一届国会。[注]各个单独功能组别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各党派的造势者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努力召集支持者。从福拉尔贝格到布科维纳，从布拉格到杜布罗夫尼克，在选举进行的那几周，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被集聚的政党、夸夸其谈的各类政纲、堆积如山的小册子，还有精妙的讽刺占据了。[注]

各种党报都在敦促自己的读者尽快行动，带着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当地政府。人们可以在那里得到投票人身份确认卡（德语称之为legitimation），投票结束后他们需要把身份确认卡留在身边备用，以防自己所在地区的选举时间延长。直到最后一刻，各个党派都还在警告自己的选民不要相信敌对党派的巧言诡辩。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报纸还恳求格拉茨和林兹的选员们在选举结束前，都持续不断地在所有选区的街道和街坊之间造势。在切尔诺夫策，资产阶级的各个民族主义党派，它们的成员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以及波兰人，这些党派将它们所代表的社群集中起来，试图推翻当前执政的社会党。佩尔图的斯洛文尼亚语报刊*Štajerc*向读者们呼吁：“农民们！工人们！还有手工艺人们！去投票吧！”同时要求他们团结一致，支持它在南施蒂利亚支持的候选人。[注]

选情预测人和候选人往往喜欢夸大选举中的政治风险。回顾过去，1911年选举所冒的风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地区报纸的报道所表现出的兴奋程度，以及选举日的高投票率反映出选民们参与投票活动的重要性。一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抓住了这个重要性的本质：“当你把属于自己的一票放进投票箱时，你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注]

就在奥匈帝国人蜂拥前往投票地点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时，这些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同时还决定了这个帝国的命运。投票结束后次日，全国的报纸读者们震惊地发现，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为了前往投票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就在投票当天，加利西亚的产油重镇德罗霍贝奇发生了大屠杀。[注]一批犹太人和说鲁塞尼亚语（或者乌克兰语）的人聚集在

城镇广场上，决心在激烈的议会竞选即将结束时行使他们的投票权。他们中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忧地方当局会试图操纵选举，偏袒目前在职的内森·洛文斯坦（Nathan　Löwenstein），并阻止他们投票给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葛森·齐珀（Gershon　Zipper）。洛文斯坦是这座城镇中犹太裔政治掮客和波兰人结社中的保守派精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些精英就是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州的实际统治者。

为了这一次选举，镇上的实权派大人物们只设立了一个投票站，供全镇将近8　000名潜在选民使用。投票日这一天，本地警察封锁了投票站，只允许洛文斯坦的支持者们入内投票。这一来，当地的店主们就遭了殃，他们原本期待着群聚欢庆的投票者们带来好生意，结果越来越愤怒的暴民砸碎了店铺的窗户，造成了连带破坏。于是在下午，当权者们招来普热梅希尔要塞附近的热舒夫驻防部队，鼓动他们向人群开火。总共有26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老弱妇孺。之后该事件的调查员们发现大多数死者都是背部中弹，他们推测这些人是在逃离军队追击的时候被枪击身亡。

这个令人不安的可怕故事不仅仅说明了在一个全民动员起来投票的年代，地方上的政治权威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有多么不遗余力。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一些其他的东西，在这样一座远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工业城镇，居民们在政治上和情感上都和他们的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这只不过是1907年奥匈帝国承认男性公民普选权以来的第二次选举，亦是自1897年开始授予无产的男性公民选举权之后的第三次选举。正因为上述的这些原因，人们将这艰难奋斗得来的投票权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在这个时期，加利西亚的选举因其腐败而臭名昭著。因此德罗霍贝奇的居民很清楚，掌控城镇的权贵们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操控选举的结果。[注]然而即便如此，镇上属于不同民族、拥有不同宗教信仰、说着不同语言的工人阶层依然决定投票给他们一致同意的候选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鲁塞尼亚农民看上去似乎不可能成为同盟，尤其在奥匈帝国内，这两个群体因为民族和宗教上的冲突常常争斗不休。然而这两群人都十分关心在遥远的维也纳举行的国会选举，哪怕维也纳的国会对他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还不如位于利沃夫的加利西亚政府，以及政府在德罗霍贝奇当地的代理人。那么为什么德罗霍贝奇的居民们愿意从象征性和实际的角度冒这么大的风险？关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它的机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这场悲剧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对很多奥匈帝国人来说，帝国是一个象征性权力与实权的替代性来源，它的权力或许不能超越地方贵族精英，但至少可以削弱、缓和他们的权势。举例来说，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鲁塞尼亚的政治领袖向维也纳的内政大臣投诉地方在选举活动的腐败行为时，即便维也纳方面不能完全整顿地方政治现状中本质性的不公，投诉者仍然得到了一些法律上的救济。而在6月19日，德罗霍贝奇的居民们正是使用了帝国赋予他们的投票权利，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去“撬动”、去对抗被认为是本地的压迫者的那些人。

国会选举对全帝国的人们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德罗霍贝奇年满23岁的男性居民，是唯一一群得到帝国官方授权的选民，但在屠杀中死伤的妇孺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帝国影响其国民的程度，受它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也不只是那些有权势者，而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不能获得投票权的限制无法阻止妇女、未达法定年龄的青年，甚至是儿童参与这场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公民性，而且往往具有公开仪式性的活动，奥匈帝国的选举将成千上万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将这些人所属的社群与帝国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

1911年6月间，整个奥匈帝国境内还有不少村镇发生了类似民情高涨的事件。一份相关调查表明，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上、宗教上以及往往在语言上也不同的人群结成意料之外的联盟，表达出建设他们帝国未来的声音。纵然在奥匈帝国属于匈牙利的那一半，选民受到严格的投票权限制，情况也往往如此。19世纪90年代，尽管匈牙利众多没有投票权的人们无法投票，但仍然在选举日动员起来，支持某个特定阶层或者候选人。投票日当天，整个帝国成为一张公众投射他们的信仰、价值观、愿望、失望，以及最重要的对未来愿景的银幕。这天也成为帝国所有社会阶层人士共享的一场仪式。人们对选举过程同样抱有共同的期待，他们期待官员们能够保证处事公平合法，但这些期待悲惨地被德罗霍贝奇的当权者们用极其恶劣的手段破坏了。

本书讲述了从18世纪至“一战”，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帝国的种种努力，以及欧洲中部数不胜数的群体与这些行为产生的联系。本书探讨了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最初10年，帝国机构、行政手段以及文化事业如何塑造哈布斯堡王朝各个不同区域内的地方社会。同时，本书还研究了帝国国民如何与政府的诸多措施和机构互动。他们经常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按照自身的利益来重新解读它们。总而言

之，建构这个帝国的复杂过程使得生活在他国境内各个角落的人们得到了超越语言、信仰和地域之别的集体性经历。

1911年德罗霍贝奇的暴力惨剧只是无数相似案例中的一个，它们从人们共同面对的社会体制、风俗习惯、文化挑战以及重写国家为基础的叙事角度等方面，展现出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是通过何种方式逐渐成为帝国的学生如今习以为常的面貌的。本书将整个帝国放在讨论研究的中心，而不是把各个用不同语系或民族群体界定的国家看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本书还把一种截然不同的中欧与东欧历史叙述方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社会中地域、语言、宗教或民族（在1900年前后，当时的人通常用“国族”这个词来指代它）的分歧并不能以可轻易预见的方式影响哈布斯堡的中欧政策。举例来说，士兵们朝德罗霍贝奇的人们开火时，他们瞄准的人群事实上是多种信仰与多种民族的混合体。当人们团结一致捍卫自己投票的权利（至少在当天是这样）时，这些人没有把他们的政治分歧从常见的民族纷争角度——譬如犹太人对抗波兰人——进行解读。6月19日的抗争只是一次平民主义的事件：人们集合起来，反抗当地权贵，那些人试图通过不公平手段剥夺人们作为帝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其他情况下，我们还能看到其他类型的联盟。

诚然，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政治家、官员、军事顾问以及科技专家在确保一个哈布斯堡王朝建立并兴旺发达的事业上居功甚伟。但这也同样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工程，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国民付出他们的才智、心力以及精力。本书着重分析一个哈布斯堡王朝在多个方向的互相建构，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从而引出国家和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我意识到，国家不止是一个政治上的定义，或是一系列把社会分隔开来的官方机构。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国家”，适用于形形色色的不同文化、宗教与社会方面的实践，而社会也为政治发挥功用提供了同等重要的场所。

18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们，试图将一整套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应用到他们统治的一些地区。在此之前，这些地区大多都依靠当地的法律、机制以及行政传统进行运作。新帝国的中央集权化与统一化是大国地位的具象化表达，并且能够有效地抵抗帝国敌人的军事打击。但与此同时，正如其他正在发展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个哈布斯堡王朝需要鼓励国民将他们的个人或群体利益与帝国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促使人民建立与帝国的情感纽带。

本书开篇讲述和分析了这个国家活跃于18世纪的几位统治者——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和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747—1792）——开展的多种行政与体制实验。它们包括取消农民以税收的形式向贵族提供劳役服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以上措施自然获得了各地农民对帝国的支持。在之后的章节中，介绍了帝国统治者们随后采取的国家建构措施，比如19世纪50年代的开明专制主义政策，1848年和19世纪60年代的宪政尝试，1867年奥匈帝国（二元帝国）的建立，1900年之后所谓的“国家殖民定居运动”，1907年奥地利的男性普选制，1918年10月帝国的联邦化，以及之后在1919年与1920年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在其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家如何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法律与风俗习惯。

上述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广为人知，而其中只有一处采用了传统的历史时代分期。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分析这些里程碑式时刻的方式。我寻找它们产生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它们如何与社会的各种活动和支持发生关系（而这也常常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在每一段读者所熟悉的历史时期，哈布斯堡的统治者都在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不断努力，那就是创造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他们在实践中采取了十分灵活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使得帝国的国家力量在理论上坚不可摧、不可动摇。帝国的建构是在地方发生剧烈变革，以及整个帝国和欧洲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进行的，而反过来它也是这些情况的必然反应。建构一个帝国，需要灵活的政策，还取决于社会上各色各样的盟友的支持。

帝国政权的视野、政策、策略性收缩或战略性妥协本身，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帝国在地方社会的意义。不过哈布斯堡的国家建构政策从一开始，就向社会群体和各种社会角色或含蓄或坦率地寻求广泛支持。举例来说，18世纪的农民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认为他们是哈布斯堡改革的间接受益者。对封建农业制度的终结与帝国新官僚制度的建立，他们经常主动且见缝插针地在帝国政策制造出的公共生活空间中响应发声，以此积极地谋求自身阶层的利益。同时，农民和中产阶层也通过他们的行动，对帝国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支持。

由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在法律、经济和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富

有创造性的改革发展，哈布斯堡政权发展出了一个含蓄地承诺全体臣民法律与义务平等的帝国普通公民权利模式（很快，“臣民”也会演变为“公民”）。公民权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源自哈布斯堡政权想要从被地方贵族统治奴役的农民之中创造一个独立的纳税人阶层。一个自由的、有能力缴纳税赋的农民阶级，将成为一个雄心勃勃但财政捉襟见肘的国家极其重要的资源。不过解放农民的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贵族势力的削弱，令很多贵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经营他们的土地。因此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地主，都意识到了哈布斯堡改革举动中的风险。

19世纪初，通过颁布各种法令，哈布斯堡政权最终经由1811年的《民法通则》，将法律上各个阶层的男女国民全民平等的保证应用到大部分的国土上。当然，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不等于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平等。人们的身份地位仍然建立在微妙复杂的等级教育之上，而公共生活中，阶层亦无处不在。这一点表现在公务员体系复杂的等级制度中，这一制度逐渐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开放，通过不同等级公务员制服的区别得到具体体现。18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还制定了一批社会政策，推动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社会秩序的尊敬，巩固了公民权利平等的意识。此外，使用本地语言的大众初等教育，主要从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中产生出来的新型帝国官僚体系，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以及促进帝国内自由贸易等种种改革措施，都削弱了地方贵族的权力，提升了奥地利的大国地位。而且，奥地利社会中受益于这些改革政策的人们，开始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帝国。到了拿破仑战争末期，从西方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 / Trst）到东部的布罗迪，从无地农民到参与跨区域贸易的商人，从本地神父到地区官僚，有充分证据证明许多社会群体都对他们的帝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帝国的爱国主义已然成为1804年建立的奥地利帝国一股不断增长的力量，即便是地方上的爱国主义者，也按照他们地区的利益来定义这个帝国。

到了19世纪中叶，包括不少民族主义者在内的人们以帝国共同框架下拥有的利益名义，来定义他们的经济愿景与政治计划。宪政改革促使当地人动员起来直接加入帝国体制，并把他们生气勃勃的行动主义引导到全帝国相似的政治、公民以及文化机构中去。19世纪中叶公民自主进行市议会选举的实现，以及地区议会和帝国国会的定期选举，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由帝国体制决定其特点的公共生活中去。

至于19世纪50—60年代，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

育制度改革，巩固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能够带给部分人群的潜在利益。对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钻研者和业余爱好者来说，一个正规化和统一的帝国空间形塑了他们的研究问题与方法论。正如近来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所证明的，从自然角度来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空间维度和人口多样化正名的尝试，在当时影响了从气象学、地震学到人类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的发展。注 1883年，在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的资助下，帝国政府发起了一个展现帝国幅员与多样性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收集关于帝国范围内高度多样化的地质状况、植物群、动物群和人口的研究，然后将它们收录在一套有插图的丛书中向公众出售。这套百科全书的俗称就是“皇储的项目”（Kronprinzenwerk）。该项成果不仅仅反映了帝国风貌，还有效地展示了哈布斯堡王朝一个明确的愿景：统合国内不同的文化，并促进它们各自自主发展。注

何谈民族

19世纪的最后三年间，哈布斯堡王朝越来越强调自身从文化各异的国民中创造出富有生产性的统一体的独特能力。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难道哈布斯堡王朝从根本上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国家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更具多样性吗？19世纪后半叶，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风潮在欧洲兴起，并席卷这片土地。民族主义者们越来越多地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习俗为象征，从文化方面解释其民族特殊性，他们的这些理论，大多来自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所著的普及版本。到了1900年，许多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民族共同体应当拥有自我培养的自主权，而政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老调重弹，回想起关于天赋人权的自由讨论。

在哈布斯堡王朝，民族主义者的论战通常会与一些特定的公共机构空间产生联系，譬如帝国创设的议会与学校。举例来说，19世纪晚期，很多民族主义的政治论战都集中在公共生活中的语言运用和语言权利方面。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立法机关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宪法之后，就在其中寄托了对语言运用的传统期望。这就为基于实现平等运用语言的承诺所发展出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场所。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中欧地区所产生的政治民族主义，在本书中被认为是帝国组织架构与地方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19世纪的社会活动家所宣称的跨历史族群的独特表达方式。历史学家们很早之前就否定了活动家们对政治民族主义的这种解释，但他们没能成功地发展出能够有效联系帝国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解释。民族主义的概念和帝国的理念具有相互依赖的一致性，作为紧密相连的两个议题，它们彼此对话交流，而不是针锋相对的二元对立关系。到了1900年，帝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怀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而民族主义者常常在帝国的法律框架内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问题之道。文化差异在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民族主义运动也正是围绕着这类观念被组织起来的。然而它们在高端政治上的出众表现，没能必然反映出它们在日常生活问题中的中心地位。只有在人们的根本文化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这威胁往往来自另一个民族），民族对他们来说才至关重要。但就在它们能够变得重要之前，民族主义者必须向人们解释这些权利，把它们和本地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在它们受到威胁时警示众人。

民族主义可以在群体情境下激发人们的热情，然而一旦一项事件结束，它的中心地位就马上黯然失色，被其他更平凡日常的问题取代。民族主义运动不能长久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所关心的问题和节奏，它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行为方式。[注]任何试图说服人们用民族主义路线来指导他们的经济行为和教育目标的尝试都因不能引起大众的关注而宣告失败。而帝国国民之间存在的语言、宗教和地域上的差异本身不能够决定帝国历史的轨迹，当然它们也不能产生出世界是在各个主张平等政治权力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观念。在20世纪的曙光到来之际，所有人都属于各自族群的坚定主张将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民族主义活动家所达成的政治工作产物。然而，它同样也是帝国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形形色色的国民，通过代理人对人们进行分类的结果。[注]

帝国经验的思考

过去30年来，孜孜不倦研究中欧与东欧历史的学者们修正了（往往有些是很彻底地修正）许多最受公众欢迎的关于哈布斯堡历史的推测。他们不再视帝国为一个在19世纪落后于诸国的产物，也不再从简单和一成不变的层面去审视民族主义冲突。这些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些对

地方和地区现象令人兴奋的解读，他们尤为关注的是奥匈帝国生气勃勃的政治文化。帝国多元语言的特性促使研究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历史学家们使用跨国界和跨学科的创新研究方法来审视这个帝国，这使得他们成为欧洲史领域的创新先锋。同时这些学者的研究也让那些研究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学者们开始更具创造性地思考潜藏在民族同一性表面下的文化差异。与此同时，却很少有作者使用这些修正性的作品来重塑我们对整个帝国的广义叙述角度。[注]

即便在欧洲的学者圈子中，哈布斯堡史已经被公认是一个历史研究创新的实验室，学术圈内外并非专精于这个领域的人士还是不能迅速接触到它的新发现。欧洲通识研究和现代史研究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所在的地区是欧洲一个特殊的角落，它的特殊性往往来自地区社会众多的民族与宗教群体，以及它问题多多，常常被定义为“迟缓”的经济发展。[注]即便是具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譬如最近的托尼·朱特（Tony Judt），也曾在1996年这样写道：

> 诚然，经济中心和文化重心转移得非常迅速……但它们很少会朝东边移动得太远，并且从来不会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昔日逝去的文明多么灿烂辉煌，它们再也不会像不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或维也纳那样，以某种可定义的方式成为欧洲的中心城市。[注]

就像彼得·伯格（Peter Bugge）指出的那样，朱特犯了一个历史学家常见的地理错误，在他的精神欧洲地图中将布拉格放在维也纳的东方，同时他还假定读者们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布拉格（或者同理维尔纽斯）事实上从它们的历史角度不能被定义为欧洲城市。[注]

欧洲历史学家表达他们对地区差异的看法时，会用更加客观的语言描述经济发展的状况，或者将差异部分归结为冷战造成的影响。此外，一些学者清楚地表示，中欧与东欧地区和西欧设想中的差异往往用来确认欧洲其他地区令人欣慰的常态。[注]这个倾向在之前10年内接二连三出版的“一战”题材书籍（其中一些是为了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几乎所有这些书都延续了一个与哈布斯堡王朝相关的传统，当这个帝国因为民族主义冲突徘徊在崩溃边缘时，这些书籍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它病态化。[注]

在此，我们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坚称中欧与东欧和欧洲其他地方有着全然的相似性。反之，我们需要在一个相对广阔的欧洲语境下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了解它的制度，以及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本书强调了当哈布斯堡王朝关于国族身份的新观念和全新的管理实践首开先河的时刻被凸显出来时，它与欧洲其他国家有多么相似。不过，就像所有的欧洲国家那样，哈布斯堡王朝也发展出了独特的制度与习俗，这使它的历史变得独一无二。

总而言之，本书探讨了一个覆盖中欧、东欧的帝国的特性、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意义深远的遗产。本书并未宣称向读者呈现哈布斯堡君主国全面彻底的历史，一些读者或许不能从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重要地区或者事件上找到大量材料，而另一些读者则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涉及对外政策和大国政治的内容——它们也确实是哈布斯堡历史重要的议题。鉴于本书受到学界修正性论据的影响，试图探讨为什么这样一个帝国和它的机制会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如此多的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在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冲动驱使下事无巨细、追古溯今地描述哈布斯堡王朝的整段历史，这种内容上的缺失就不可避免。即便如此，身为作者，我还是能敏锐地感受到文本中存在的众多时间断层、被省略的事件——它们有些很重要，有些或许可以修正书中的某些论据——以及撰写一份综合性作品时将其精简的趋势。本书受惠于其他历史学者撰写的杰出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写作的基础，来自将这个区域历史写作的重点从国族身份的问题上转移开的尝试，对本书来说它们的价值尤为重要。不过这种重点的转移仅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事件。

自从哈布斯堡王朝在1918年随着“一战”终结而崩溃，国族身份的叙事角度就在它的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注]学者们很少将帝国本身作为他们解读分析的重点。在此有一种经常被人提及的尝试，它促使学者们在研究这个地区时，选择一种民族性不那么明显、更加面向社会的方法。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亚克（István Deák）在1967年曾经宣称：“在奥匈帝国中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只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制度、利益群体和职业。”[注] 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区域的研究上，几位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也赞成这一观点。1980年，加里·科恩（Gary Cohen）和约翰·W.博耶（John Boyer）出版了与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政治与社会相关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研究抛弃了国族意识在当地占据首要地位的传统推测。[注]科恩分析，国家归属感是一种偶发的社会性因素，它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也不由血统决定。特别当他研究

19世纪布拉格的工人阶级时，发现这些人的国家认同感往往取决于提升这种意识的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博耶则分析基督教社会主义在维也纳是依照基层选区的政治活动与利益而兴起的，并且测试了从特定社区问题和环境促成的联盟中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的产生方式。

同时，奥地利学者格拉德·斯托茨（Gerald　Stourzh）以及他的几位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有埃米尔·布里克斯（Emil　Brix）、汉内洛蕾·布格尔（Hannelore　Burger）和玛利亚·库尔茨（Maria　Kurz）］仔细审查了学校或司法审判系统等哈布斯堡王朝的公共机构，以及奥地利的人口普查在多种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解决实践问题的方式。[注]这些学者在地方案例和帝国政策之间的研究推翻了语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发展的假设。他们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制度和行政实践如何形塑民主主义的尝试。到了冷战末期，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也开始用更具批判性和生产性的眼光进行审视，当时人们认为中欧、东欧经济落后，并存在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据说人们相信正是这些推测，使中欧和东欧有别于欧洲其他部分。[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处在欧洲历史学家的前列，开发出各种文化的、跨国界的或者比较的方法，挑战传统上构建了东西欧对抗这一最根深蒂固的二元概念，例如公民国族意识和民族国族意识、发达和落后、民主和专制、民族同一性和民族多元化。当使用从地方社会中得到的证据来验证这些假定的对立时，它们大多数是不成立的。[注]如今，哈布斯堡史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创造与革新之地。

研究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历史学家们事实上教给研究欧洲其他领域的同僚们很多，包括如何思考民族主义、多语言政策、对国家的漠视以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帝国和国家的分类方式。不过奇怪的是，仍然有一些历史学家或者编辑群体还在关注帝国本身，而不是在地区发展轨道中作为推动力量的各个民族，并且撰写这方面有着更广阔叙事角度的历史作品。在引人注目的《哈布斯堡王朝：1848—1918》皇皇巨著中，有几卷来自奥地利科学院的作品，通过民族分类组织并建构它们的议题。他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计划。直到最近，欧美的历史研究与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民族学派组织，使得要为一个大型集体项目设想一个有效率的替代模型变得十分困难。[注]

本书要求历史学家们通过将帝国的共同经历放在显著的位置，把哈布斯堡王朝看作历史调查的一个主题。它调查了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最初10年，帝国共享的制度、行政实践和文化计划协助塑造帝国各个区域内的地方社会的方式。它审视了这些集体性的因素是怎样跨越语言、信仰和地域的差别与时间界限，给全帝国的国民们带来共同的经历与体验。即便是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年11月不复存在之后，帝国习俗中的大众元素仍然塑造了人们对福利制度、征兵制或者政治生活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等诸多方面的想象。哈布斯堡王朝之后的国家中，杰出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也都曾作为帝国政策重要参与者，受到他们成长时期的经历的深远影响，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1881—1954）到南斯拉夫的安东·科罗舍茨（Anton Korošec，1872—1940），无一例外。他们往往将熟悉的法律、习惯和制度应用到他们新创立的国家中，而与此同时，这些政治家严正拒绝帝国的遗产，认为它与民主制度和民族自决格格不入。

当我们将观察的镜头从今日占据了中欧和东欧地图的众多民族国家转向远方作为本书主题的哈布斯堡王朝时，我们急需一种新的大众叙事角度，以其为中心来组织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不需要单一的叙述视角，而是需要大量可供选择的故事，作为我们整理集结过去几十年杰出研究作品时的辅助部分。假如我们回过头去寻求那些与新的作品相抵触的基本叙事，我们就不能继续要求读者阅读并从中获益。我希望通过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系列可以选择的叙事角度，可以围绕着它们来整理我们不断变化更新的研究领域。

---

1. 总投票率为80.02%。Dieter Nolen and Philip Stöver, ed., Elections in Europe. A Data Handbook（Baden Baden: Nomos, 2010）, 196.

2. See articles in the liberal Bregenzer Tagblatt, 11 June, 1911, 2; and the Czech Christian Social Čech, 11 June 1911, 1.

3. Arbeiter- Zeitung, 12 June 1911, Vienna, 1–2; Grazer Volksblatt, 11 June 1911, 1; Linzer Volksblatt, 11 June 1911, 1; Bukowiner Post, 11 June, 1911, 1–2; Stajerc, 11 June 1911, 1.

4. “ Ihr werdet entscheiden!” Arbeiter-Zeitung, 11 June 1911, Vienna, 1.

5. 关于这件事以及引发此事的地方冲突，参见Joshua Shanes, Diaspora Nationalism and Jewish Identity in Habsburg Galic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68–279。在Shanes笔下，目击者证明在士兵开枪射击时，聚集起来的暴民气势已经平复。我在此要特别感谢Shanes提供了一些从未出版发布的手稿，这些手稿分析了在德罗霍贝奇发生的这次事件以及城市政治活动的更详细细节。On Drohobych /

Drohobycz see Alison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6–77; 119–120; 132–134.

6. 关于加利西亚的选举，参见Harald Binder, Galizien in Wien: Parteien,Wahlen, Fraktionen und Abgeordnete im Übergang zur Massenpolitik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2005), 295–308。

7. 历史学家Deborah Coen反复试着将学者们的注意转移到专业或业余的科学家在塑造当时帝国相关理念的重要工作上。参见Coen,“ Climate and Circulation in Imperial Austr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2, no. 4 (December 2010): 839–875; Coen, The Earthquake Observers: Disaster Science from Lisbon to Rich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See also Peter Stachel,“ Ethnischer Pluralismus und wissenschaftliche Theoriebildung im zentraleuropäischen Raum. Fallbeispiele wissenschaftlicher und philosophischer Reflexion der ethnisch-kulturellen Vielheit der Donaumonarchie, ” (PhD diss. Karl-Franzens Universität Graz, 1999)。如果想要阅读重点研究同时发生的国有化科学进程，参见The National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Habsburg Empire 1848–1918, ed. Mitchell Ash and Jan Surma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8. 在1886—1902年，以德语和匈牙利语出版的24卷《奥匈帝国图文实录》中积累的文献越来越多，这部丛书还被称为“皇储的画作”，因为它的赞助者是帝国的皇储鲁道夫大公。参见Zoltán Szász,“ Das‘ Kronprinzenwerk’ und die hinter ihm stehende Konzeption,”in Nation und Nationalismus in wissenschaftlichen Standartwerken Österreich-Ungarns, ca. 1867–1918, Endre Kiss, Csaba Kiss, Justin Stagl, ed. (Vienna: Böhlau, 1997), 65–70; Justin Stagl,”Das‘ Kronprinzenwerk’— eine Darstellung des Vielvölkerreiches” in Das entfernte Dorf. Moderner Kunst und ethnischer Artefakt, ed. Ákos Moravánsky (Vienna: Böhlau, 2002),169–182; Regina Bendix“ Ethnology, Cultural Reifi c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Difference in the Kronprinzenwerk” in Creating the Other.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alism in Habsburg Central Europe, ed. Nancy M.Wingfi eld (New York: Berghahn, 2003), 149–166; Hans Petschar, Altösterreich. Menschen, Länder und Völker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enna: Brandstätter, 2011)。

9. 如果有兴趣阅读关于此论点更具争议性的理论，参见Tara Zahra，“Imagined Noncommunitie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s a Category of Analysis,” SR69, no. 1 (2010): 93–119。也可参见Pieter Judson, Guardians of the Nation:Activists on 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关于这一点，还可参阅Wolfgang Goederle.“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the Nation: The 1869 Population Census in Austria-Hungary,” AHY 47 (forthcoming)。

11. 在此，有两个由美国学者Gary B.Cohen做出的，重要且颇具影响力的例外：“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7–1914,” CEH 40, no. 2 (2007): 241–278, 以“Neither Absolutism nor Anarchy: New Narratives on Society and Government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AHY 29 (1998): 37–61。此外还可参阅John Deak的近期著作：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 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 我们可以从Daniel Chirot那里得到更多经济方面的论证，详见其主编的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然而希罗对那些东欧差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详见："Who is Western, who is not, and who care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3/2 (1999): 244–248。在这一点的论述上，我要特别感谢Peter Bugge提供的宝贵意见。

13. Tony Judt, A Grand Illusion? An Essay on Europ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50.

14. 2008年1月，Peter Bugge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呈交了一份从未发表过的手稿Eastern Europe: Myths of Uneven Development，在这篇文章中，Bugge举出了教科书中欧洲历史上一些令人不安的例子。此外还可以参考Bugge的另一些文章与著作："The Use of the Middle: Mitteleuropa vs. Střední Evropa"in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 6/1 (1999): 15–34;" 'Shatter Zones': The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of Europe's East" in Ideas of Europe Since 1914。另外，读者还可参阅The Legac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Menno Spiering and Michael Wintl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47–68。

15. 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ria Todorova,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eter Bugge" Eastern Europe: Myths of Uneven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lecture; Mark Mazower, The Balkans: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Modern Library, 2002).

16. 大多数这类作品，不是很少提及哈布斯堡君主国，就是重复那些老生常谈，不断提及帝国抱残守缺、摇摇欲坠和失败的本质。John Deak对这类作品有过优秀独到的分析，见："The Great War and the Forgotten Realm: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6 (June 2014): 336–380。不过这类作品中有一个优秀的例外，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其著作《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2)］中，就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巴尔干地区提出了一些认真长足的研究进展。

17. 最近John Deak的文章The Great War and the Forgotten Realm通过研究战时的民族主义宣传行为来更强有力地佐证了正文中的这一观点。而参与宣传的这些人，其中不少之后都成为当地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18. István Deák," Comments," AHY 3, no. 1 (1967): 303.

19. . Gary B.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 (Prince 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hn W.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0. Gerald Stourzh, 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Nationalitäten in der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Österreichs, 1848–1918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5); Emil Brix, Die Umgangssprachen in Altöstereich zwischen Agitation und Assimilation: die Sprachenstatistik in den zisleithanischen Volkszählungen, 1880 bis 1910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2); Hannelore Burger, Sprachenrecht und Sprachengerechtigkeit im Österreichischen Unterrichtswesen 1867–1918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1995); Maria Kurz, "Die Volksschulstreit in der Südsteiermark und in Känten in der Zeit der Dezemberverfassu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enna, 1986).

21. A few examples follow: on economics, David Goo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Richard Rudolph, Bank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ustria-Hungary: the Role of the Banks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zech Crownlan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in anthropology, Katherine Verdery, Transylvanian Villagers. Three Centuri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thnic Chan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o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ssays by Péter Hanák, collective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fter his death as The Garden and the Workshop. Essays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Vienna and Budapest (Prince 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tván 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traud 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Bürokratie und Beamte in Österreich, 1780–1848 (Vienna: Böhlau, 1991).

22. See, for example, Rogers Brubaker, Margit Feischmidt, Jon Fox, Liana Grancea,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Everyday Ethnicity in a Transylvanian Tow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Brubaker,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enno Gammerl, Untertanen, Staatsbürger und Andere. Der Umgang mit ethnicscher Heterogenität im britischen Weltreich und im Habsburgerreich 1867–1918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0); Jeremy King,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A Local History of Bohemian Politics, 1848–19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King,“ The Nationalization of East Central Europe: Ethnicism, Ethnicity, and Beyond”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 in Habsburg Central Europe, 1848 to the Present, ed. Nancy Wingfield and Maria Bucu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2–152.

23. On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master narratives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vel Kolář,“ Die nationalgeschichtlichen master narratives in der tschech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Entstehungskontexte,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in Geschichtsschreibung zu den böhmischen Ländern im 20. Jahrhundert. Wissenschaft straditionen, Institutionen, Diskurse, ed. Christiane Brenner and K. Erik Franzen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6), 209–241; Pavel Kolář and Michal Kopeček, “A Difficult Quest for New Paradigms: Czech Historiography after 1989,” in Narratives Unbou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ed. Sorin Antohi, Balázs Trencsényi and Péter Apo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3–248; Gernot Heiss, Árpád von Klimó, Pavel Kolař, Dušan Kovč, “Habsburg's Difficult Legacy. Comparing and Relating Austrian, Czech, Magyar, and Slovak National Historical Master Narratives,” in The Contested Nation: Ethnicity, Class, Religion and Gender in National Histories, ed. Stefan Berger and Chris Lorenz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67–403.

第一章｜诞生于偶然的帝国

一位希腊或罗马的父亲不仅将他这个家族的儿子培养成人，他还缔造了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年轻人会迅速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优势，觉察到它具有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完美性，自然而然地被它打动。

——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对祖国的爱》（*Über die Liebe des Vaterlands*），1771年

缔造一个国家

177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丽亚·特利莎治下的政府试图精确统计西部国土上的人口，并试图将一个新的门牌编号制度推广到“所有城镇、集市、乡村，甚至是最分散偏僻的居民点”注。准确了解人口状况，在军事层面上对征召士兵入伍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玛丽亚·特利莎达成其统治的主要目标——建立更有效率的统治机制来缔造一个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之前在18世纪60年代进行的几次人口普查的尝试（它们通常由教区神父和地方官员主持），都因数据极其分散无用而不得不放弃，以至皇后的一位私人顾问曾沮丧地大声抱怨，怀疑“靠这些表格数据，如何能缔造一个国家”注。然而即便如此，出于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了解到的紧迫原因，玛丽亚·特利莎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哈布斯堡政府决定使用军队来进行人口统计和推广门牌编号制度的工作，以此来补救自身在信息上的不足，但这么做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当军队进驻乡间，他们常常会直面当地人公开的敌对情绪，当地人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们的年轻男子免于可能长达20年的兵役。一些乡村家庭会将男丁藏匿起来，或者送进森林。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年轻男人则会以自残的方式——通常是弄断一条腿或胳膊——来逃避被强制征召入伍的命运。此外，还有一些以讹传讹的情况，一些地方的人们误认为已婚男子可以免除兵役，于是在当地掀起了一阵突如其来的结婚潮。预料到这种情况的政府在1770年下令，要求地方上的神父们尽其所能地平息人们的恐慌。虽然神父们一再向当地人保证这次人口普查与征兵并无关联，

但政府仍然对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心存疑虑。

不过令所有人大为惊讶的是，这一年各地方百姓的表现完全出人意料。当军队出现在城镇时，当地居民通常将之视为一件好事，往往热情欢迎到来的士兵们。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除去统计人口和给房屋编号，政府还委派给军队第三项重要任务：让他们调查地方上百姓的“情况”，即本地人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以及当地生活条件（例如房屋类型、卫生条件、教师们的教育成效和当地经济状况等）。而一旦人们了解到军队会把他们的状况和不平汇报给帝国的皇后玛丽亚·特利莎，他们便热情欢迎士兵到来，并且将军人们当作统治者的代表，想要向他们表达特定方面的不满。[注]就像一位来自卡尼奥拉的官员所报告的那样，当地人“表现得平和自愿，这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军旅生涯，而是希望可以减轻他们的强制劳役和实物捐税”[注]。

这些乡下农民和一个正在成长的奥地利国家之间令人惊奇的积极接触正好捕捉住了本书三个重要的主题。首先，这是个典型例子，展示了18世纪的帝国政体试图通过绘制当地地形地貌图像、统计人口、使用门牌编号制度等方式，巩固自己对多个迥然不同的地区的控制。借助这些手段，政府第一次能够更深入、更好地了解到那些地区人民的生活现状。这不仅仅是在进行统计，这些建构国家的举措最终谋求的是用一种将个人与中央国家联系起来的新的效忠模式来取代传统地方性的权力关系。不过这么做就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打破地方政治掮客，即本地贵族传统的政治支配地位。举例来说，在1770年的调查中，中央政府有意识地避免将人口普查和描述当地状况的任务指派给当地的贵族，甚至是本地神职人员，而是选择派遣忠诚于它的国家机器——军队，来查明真相。就这样，中央政府绕过了本地贵族，强化了地方百姓与帝国之间初步的密切联系。[注]

其次，玛丽亚·特利莎的统计计划反映出哈布斯堡王朝与它的顾问们关于一个政府与它的臣民间适当关系的全新思路：贵族与平民一视同仁。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新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彼此相当并且可互换的关系，而不像传统等级社会特权阶层和拥有较少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那样，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权利。[注]

最后，另一个我们将不断碰上的主题来源于农民们与前来统计人口并描述当地风土人情的人们交流的方式。在这个君主制国家的城镇，农

民们常常要求与来访的军队代表接触，向他们倾诉当地的情况。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农民们并非抱怨具体的事务——甚至有些军方代表在执行1770年的任务时，怀疑他们听到的内容是否完全真实——事实上，当地人更像是在表达一种个人可以向国家官员，而不是本地贵族倾诉不平来申冤的普遍观点。农民们并不天真地相信一位千里之外的统治者天生的德行，能够使她在注意到地方上发生的不公时拨乱反正。向军人们发牢骚的农民们似乎能够察觉到帝国的皇后与他们当地领主之间紧张的关系，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情况，选择满腔热情地与中央政府同进退，并且对中央政府为他们伸张正义的能力乐观地抱有信心。因而，在此我们就有了一个早期的例证，来展现地方上的百姓如何通过利用新兴的帝国结构来支持自己的目的。

从边缘到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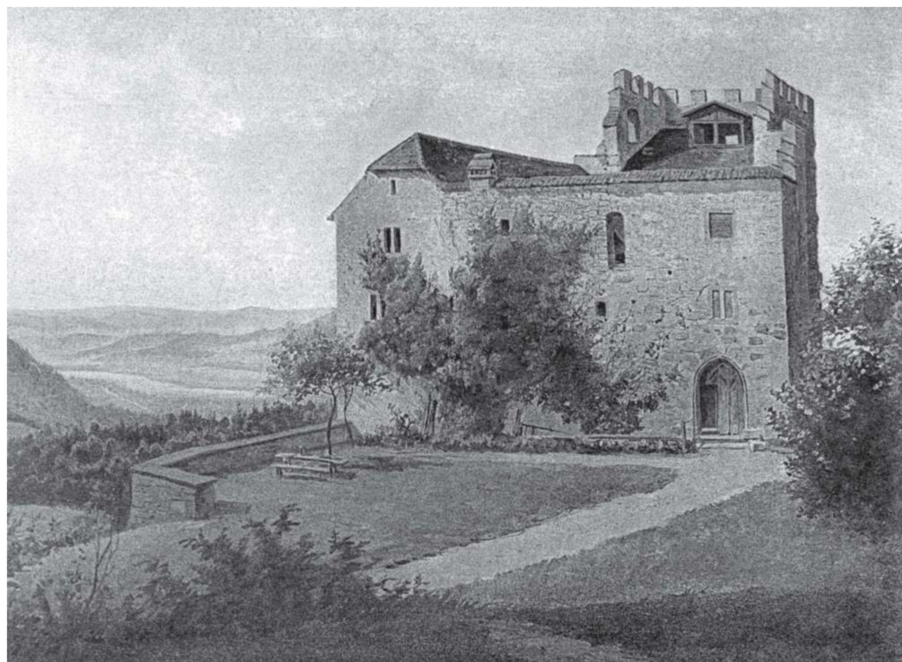
18世纪后半叶，一个中央集权的哈布斯堡王朝，正从13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获取的众多土地上产生。这个国家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在18世纪，这个国家又包含了多少种不同的族群？时值18世纪8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范围西至今日的因斯布鲁克，东达乌克兰的利沃夫；纵向可从意大利半岛的米兰与佛罗伦萨，延伸至北海的安特卫普与喀尔巴阡山脉的克卢日。同时，这个国家还覆盖了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到武科瓦尔，再南至贝尔格莱德的广袤区域。哈布斯堡的领地横跨了如今12个欧洲国家的疆域。在18世纪晚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有克罗地亚语、捷克语、弗莱芒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拉汀方言、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乌克兰语和意第绪语。[注]这个国家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宗教领域。尽管罗马天主教会在哈布斯堡治下的国度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的臣民还包括了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或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徒）、新教加尔文教派教徒、新教路德派教徒、犹太教徒、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唯一神教派教徒。

从西方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帝国，到东方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和正在形成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宗教和语言上的多样化是近代早期欧洲大国的典型特征。这些国家通过战争、王室联姻，或者谈判交易获得或失去土地，因此它们的各块领土之间不必有历史或文化上的联系，甚至这些领

土在地理上都不必接壤。欧洲的王朝国家，同样也不依赖于统一的管理机构或者大一统的文化习俗（例如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者是臣民们共有的身份认同。这些国家将自己的领土单位视为家族财产，或是可以任意交易的军事征服战利品。不过在大部分的土地上，有权势的贵族家族逐渐控制了税收、当地的行政司法以及征募军队的权力。同时，这些家族的代表会不定期地召开会议，或者在地方议会聚首，讨论事务，而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们则依靠在会议上谈判来取得税收收入或者征募士兵。

哈布斯堡家族兴起于一个在今日的瑞士阿尔高州拥有土地与城堡，相对不甚显赫的贵族家族。[注]从这片小小的领地上，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个取得政治名望的成员——鲁道夫一世伯爵[注]（Count Rudolf I，1218—1291）当选为德意志国王，并在1273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注]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806年最终崩溃，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联邦。它幅员辽阔，南至意大利半岛，北抵日德兰，西边与现今的法国接壤，东边则与波兰为邻。这个联邦名义上的首领、终身任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由帝国最有权势的几个王公贵族，或称选帝侯，选举产生。一旦当选，皇帝就可享有与他的头衔相符的国际声望、社会地位以及文化影响力。[注]不过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主要是礼仪性的，所以皇帝本人对帝国范围内300余个政体的统治力可以说相当微弱。事实上，选帝侯们在1273年放弃其他给人印象更深刻的竞争者，推选低调谦逊的鲁道夫一世为皇帝，就是为了避免有更强大的对象谋求皇位，从而对中欧的权力平衡产生威胁。

不过，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的执政末期，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成功成为欧洲中部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家族领地面积显著增加，还从巴本堡家族手中赢得包括维也纳在内的上、下奥地利公国，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的侯爵领地，成功将家族领地的地理中心向东转移。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将蒂罗尔公国收入囊中。但哈布斯堡家族在瑞士的领地却不在它的掌控之中了。由于这个家族在这些成为它新权力根基的土地上确立了长期继承的权利，于是这些疆域被统称为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的面积约等于今天的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两国，从此之后，人们取上、下奥地利公国的名称，用“奥地利”这个词来为它命名。



瑞士阿尔高州，哈布斯堡家族城堡的废墟。这是一幅1903年的彩色相片，作者为J. Lange（HIP / Art Resource, NY）

鲁道夫一世于1291年去世。在那之后，直到1452年，才有另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1415—1493）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注当其在世时，腓特烈三世成功令儿子当选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史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此举也首开先河，使得这个家族从此以后得以保持帝位的传承（除了18世纪时一段短暂时期），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国祚终结为止。腓特烈三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通过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手段高妙的王室联姻，大大增加了家族的财富。举例来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勃艮第的玛丽之间的婚姻，就为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全欧洲最富庶的领地之一。他的两个孩子——菲利普与玛格丽特的婚姻也同样根据类似的策略进行安排，从而使得哈布斯堡家族与新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的海外帝国联系在一起。等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菲利普之子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继承皇位时，他得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大帝国，它从西班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到勃艮第，还包括了奥地利与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在另一桩政治婚姻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将查理五世的两个兄弟姐妹，玛丽（1505—1558）和斐迪南（1503—1564）分别与匈牙利兼波希米亚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II）和他的姊妹安妮订婚。当1526年，年轻的拉约什二世在对抗奥斯曼帝国军队的

战斗中阵亡时，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贵族政治集团，或称贵族议会，选举他的妹夫——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为新一任国王。这样一顶匈牙利王冠，给了哈布斯堡家族充分的理据，宣称对历史上和匈牙利有关联的两个地区拥有主权，即西南方的克罗地亚王国和东方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不过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也仅限于对其宣称主权，因为此时匈牙利大部分地区和特兰西瓦尼亚仍然处在奥斯曼帝国或其盟友的统治之下，而它们的统治还将持续175年。

1556年，在其统治将终之际，查理五世将这个庞大笨重的帝国分割为东西两半。西边的，或者说是西班牙一系的哈布斯堡王朝，由他的儿子菲力二世（Philip Ⅱ，1527—1598）的家族进行统治；而东边的奥地利系哈布斯堡王朝则由他的兄弟——皇帝斐迪南一世统治。[注]在之后的150年内，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与奥地利分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频繁的家族内通婚来加强相互间的特殊关系。1700年，当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因缺乏男性后代而绝嗣之际，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声称有权继承西班牙王位，因此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便和盟友们陷入了与法国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战争到1714年才宣告结束，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分支与西班牙王冠失之交臂，由法国王室的一个小分支成员坐上了国王的宝座。[注]失去西班牙领地这件事，促进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一个区域性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在中欧地区的建设。

性别与帝国

一个位于中欧的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以王朝的核心领地名称非正式地命名为“奥地利”。它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8世纪早期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特定法律，它们被统称为“国本诏书”。从表面上看，这些法律处理并解决的是王朝统治者们最私密的家事：对家族缺乏男性继承人的担忧。欧洲很多大陆国家与英国的情况不同，举例来说，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女性可以继承王位。但在这些因袭了所谓萨利克法的欧洲大陆国家，就只限男性继承王位/皇位。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表示女性不能统治哈布斯堡家族直接持有的土地，但是女人不能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正式的官方角度来看，哈布斯堡家族持有的奥地利核心领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采邑。因此假如这块土地通过传承离开了

这个家族，是否会有另一个皇帝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挑战他们的统治权威呢？

鉴于两个儿子约瑟夫一世（Joseph I，1678—1711）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长期以来只有女儿或没有孩子的情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担忧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分支亦会步在1701年绝嗣的西班牙分支后尘。于是他在1703年发布了一份相互继承协议，禁止将王国分裂开来，同时又规定在缺乏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后裔可以统治家族的核心领地。1713年，查理六世修改了利奥波德一世的协议，将自己两个女儿的继承权放在了已逝兄长的女儿前面。通过一系列会议，这项修改后的协议很快得到批准通过。与会者担忧一旦哈布斯堡王朝终结，可能引发战争及地区动荡，因此这份《国本诏书》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否则它很可能因为侵犯了他们的特权而遭到否决。与会者一致同意，除非之后奇迹般地诞生男性继承人，否则当查理六世去世之后，他们会承认查理的大女儿玛丽亚·特利莎为统治者。此后查理六世动用了极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本来说服欧洲各国接受这一安排，但与之矛盾的是，他却没有为女儿玛丽亚·特利莎做任何准备，让她得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皇室责任。

这些法律不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繁衍存续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久之后它们还展现出另一个更为重要方面的内容。《国本诏书》是第一份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区域（包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构成的复合君主制国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即一个单独政治单位的法律文件。此时此刻，尽管哈布斯堡王朝在尼德兰和意大利半岛上仍然拥有一些飞地，但总的来说，它的领地在地理层面上已经比一个世纪前更加稳固统一。1700年之后，当时的地图绘制师开始更频繁地使用一个更广泛的“奥地利”概念（这就意味着奥地利不再仅指代上、下奥地利两个公国），同时将哈布斯堡家族视为“奥地利皇室”。而作为对查理六世和玛丽亚·特利莎国家建构行为的真实反映，当时的中欧地图开始越来越多地将它们的描述集中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而非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法兰克福，尽管后者在此时仍然是哈布斯堡家族拥有的最辉煌头衔的来源。

尽管当时的人开始逐渐视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地利，奥地利的国家地位却很难在当时制度的现实中扎根发展。

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地区的民族国家在制度和管理上宣称保持统一的情况，因此很容易将1700年前后地图上标绘出来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地设想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的猜想是错误的。哈布斯堡王朝对各块领地实行的统治，在程度和特点上迥然相异。

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一位身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大臣直接控制世袭领地（上、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和蒂罗尔）的财政、行政和司法机构。到了1700年，这个王朝又将其控制权扩展到波希米亚的王室领地，其中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注]不过哈布斯堡的统治者无意将这样一套系统化的控制手段运用到他们位于意大利半岛的领地。他们在匈牙利实施的控制也停留在最低的水平，自从匈牙利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匈牙利的贵族们就一直在抵制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将它并入，形成一个更大的联合王国的行为。

尽管从长远来看，《国本诏书》成为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的法律基础，但从短期看来，查理六世试图让机会主义的欧洲各国接受它的尝试遭遇了极大的失败。当他于1740年去世，23岁的玛丽亚·特利莎继位伊始，便发现自己身处贪婪邻国环伺的境地之中。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1712—1786，亦称腓特烈大帝）认为女王继位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出兵侵占了人口稠密且富庶的西里西亚。与此同时，在法国、萨克森以及部分国会中的波希米亚贵族支持下，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伯特（Elector Charles Albert of Bavaria，1697—1745）自封为波希米亚国王，并且在皇位竞争中战胜了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斯蒂芬（Francis Stephen of Lorraine，1708—1765）[注]，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七世（Charles VII）。

无计可施之下，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莎只得向匈牙利贵族们做出让步。她需要资金和军队，立刻就要。1741年，她成为匈牙利国王，然后在普莱斯堡（Pressburg / Poszony）召开的一次匈牙利国会会议上寻求经济和军事支援。[注]出席会议时，玛丽亚·特利莎身穿当时代表匈牙利的白、金二色衣裙。与后世的描述不同的是，她没有带上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约瑟夫赴会（9天之后她才让婴儿在会上露面）。玛丽亚·特利莎在会上的请求极具感染力，她同时还宣誓维护议会的权力[注]，她的演讲如下：

匈牙利王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王冠如今岌岌可危了。而如今我们被所有人抛弃，我们唯一的力量来源只有忠诚、武器和长久以来匈牙利人民所拥有的勇气。关于我们自己（作者注：原文如此），忠实的匈牙利臣民们将得到我们全心全意的合作。注



1776年，玛丽亚·特利莎与她的子女们。原画作者为海因里希·菲格尔（Gianni Dagli Orti /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玛丽亚·特利莎的恳求得到了与会贵族们“将生命与鲜血交付给玛丽亚·特利莎国王”的回应，尽管比起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结果，知道在此之前要让这些人付出忠诚，经过了何等艰难谈判的人要少得多。注因为有了匈牙利人的支持，玛丽亚·特利莎得以迅速扭转战局。她手下的军队在1741年年底攻克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从而反败为胜。随后奥地利军队又夺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小部分西里西亚。在巴伐利亚人和法国人吃了败仗的同时，这两股势力在当地严酷的占领政策也使得他们与可能成为其盟友的波希米亚渐行渐远。最后，1745年，查理七世去世，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弗兰茨一世，奥地利继承战争也随着1748年签署的《亚琛和约》而正式终

结。玛丽亚·特利莎成功抵挡住了所有威胁她权力的挑战，不过她治下最富庶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领土还是落入了普鲁士之手。



1748年，奥地利继承战争结束时的哈布斯堡领地范围

经过战争，暴露出奥地利先前在经济和军事上备战极不充分，这一教训令玛丽亚·特利莎意识到，如果奥地利想要在18世纪的欧洲继续保持住大国的地位，她必须迅速进行改革，重整国家。同时，她还需要一批新盟友来帮助她从普鲁士那儿夺回西里西亚。玛丽亚·特利莎需要建立一支常备军，用来和普鲁士改革后的新军有效竞争；同时她还需要将自己的国土整合成一个更有效、更统一的国家。终其一生，玛丽亚·特利莎没能夺回西里西亚，但她始终不乏尝试。18世纪50年代，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外交大臣文策尔·安东·考尼茨伯爵（Wenzel Anton Kaunitz，1711—1794，后来成为亲王），在中欧精心策划了一场外交革命。注 奥地利抛弃了英国，通过玛丽亚·特利莎最小的女儿玛利亚·安托尼亚（即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未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间的联姻，转而与它的老对头法国缔结了数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最终成立的盟友关系。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变，其目的就在于扼制普鲁士。只有收复西里西亚的执着愿望，才能克服玛丽亚·特利莎强烈的反法倾向。然而在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的尝试再次失败，而法国这个盟友形同虚设。不过此时奥地利在东方有更需要关注的事务：沙俄正在损害奥斯

曼帝国、瑞典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等邻国的基础上积极扩张版图。事实上，正是在东方边境，玛丽亚·特利莎得以弥补失去西里西亚带来的损失。1772年，她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虽然不甚情愿），以及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亦称凯瑟琳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第一次瓜分了波兰–立陶宛联邦。

波兰–立陶宛联邦周边的三个国家，以所谓的内部动乱为借口，各自分得了该联邦30%左右的土地。虽然玛丽亚·特利莎一开始严厉谴责沙俄与普鲁士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企图（她声称"'分割'这个词令我厌恶"），但考尼茨参与瓜分行动，确保玛丽亚·特利莎得到了属于她的那一份战利品。奥地利新获得的领土以拉丁语命名为"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这个名字来源于中世纪罗斯诸公国中，匈牙利王国曾在12世纪宣称拥有统治权的哈利奇与弗拉基米尔公国。玛丽亚·特利莎一门心思要建立国家，为此她深知为自己的家族塑造富有神话色彩的虚构历史，对打消因占有新领地而产生的非议具有多大的价值。

国家的建立与改革

1748年，奥地利继承战争甫一结束，玛丽亚·特利莎就实施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来强化奥地利的军事实力，并且建立一个更有效、更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筹建一支约有10.08万人的常规军时，她的国务总理弗雷德里希·威廉·冯·霍格维茨伯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Haugwitz）强迫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议会提高上缴用于军事预算的税收份额。除此之外，霍格维茨伯爵还强制这些地方的议会在拨款时，要一次性缴足10年的资金份额，而非一年一收。这样一来，当政府需要军备资金时，地方议会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

随着奥地利在制度方面，不断推动将过去治下的自治王国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各州，地方和州级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地直接向维也纳而非本地议会负责。1749年，霍格维茨伯爵将波希米亚大臣和管理世袭领地的大臣合并为一个职位。1751年，玛丽亚·特利莎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最高法庭，用来管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领地上的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政府通过集中国家行政权力的各类制度，不断尝试。在此期间，玛丽亚·特利莎不断遇到地方上强烈的反对，从而不得不修改或暂缓

推行她的计划。但是她的政府始终在顽强地继续工作，时不时提出一系列新的改良制度。

为了实现区域一体化和中央集权的目标，18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们智计百出，以多种多样的模式来建构国家。在这个世纪，针对如何有效地使领土团结统一的问题，三位了不起的统治者——玛丽亚·特利莎女王以及她的两个儿子——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理念。他们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长期目标：通过向贵族征税来稳定国家财政；通过放松或结束封建生产关系来解放农民的生产力；鼓励国内工业、商贸、旅游以及交通网络的增长和发展；消除地区加工制造业行会的诸多限制；在国民中推动道德教育和实用教育；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活动的方式，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

这三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与一些同时代的欧洲人一样，经常被后人称作“开明专制君主”。这个词的来源，或许有一部分来自他们在改革国家与改造社会时主张以绝对中央集权作为手段。他们的专制主义，或者说独裁政治倾向特别体现在这些君主拒绝与贵族们分享权力上。而造就“开明专制”这个词另一部分的“启蒙运动”则指的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遍及欧洲的一个松散知识分子网络以及相关的文化运动。这些人和运动歌颂知识的发展进步，同时鼓励将知识系统地、明确地应用到社会制度和政治架构中去，以此来改善人道状况。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土地上，18世纪是一个文学、科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出版作品激增的时代。18世纪的欧洲，人们的识字率同样迎来幅度极大的增长，而且在公共社交场合（并非仅仅在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地方），启蒙运动的理念被公开朗读、探讨和辩论。此外，启蒙运动对科学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兴趣使得在这样一个宗教制度和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人们探讨用更加世俗化的方式统治国家成为可能。然而同时，宗教和道德问题仍然萦绕在启蒙运动关注者的心里。当玛丽亚·特利莎与她的儿子们及诸位顾问讨论政策时，他们使用的措辞比过去任何一位君主采用的都更具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而在他们向一些博学的世俗专家求教的同时，仍然承认宗教基本价值对社会的作用。

识字率的上升以及科学与人文主义研究的区际网络，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评价与讨论君主们正在进行的范围更广的改革进程。尽管贵族主导的议会，以及贵族身份的评论者早已能将他们这一阶层的各种意见广为传播，但在18世纪，从事商业、行政管理和各种实业

的人们，也开始对国家政策直抒己见，为自己的利益发声。18世纪后半叶，在维也纳、布拉格、布尔诺（Brünn / Brno）、科希策（Kaschau / Kassa）和普莱斯堡（今布拉迪斯拉发）等城镇，当地社会产生出了新的公共讨论场所，它们从街头的咖啡馆到半公开的沙龙，再到博物馆，多种多样。城镇的中产阶层市民在这些地方聚集，偶尔还会与贵族并肩而坐，讨论当代的宗教、哲学和艺术问题。举例来说，当科希策市政府在1781年建立了一座市立剧院后不久，市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就在这座建筑的北侧进行特别改建，建造了一座新的咖啡馆。[注]到了18世纪90年代，像咖啡馆这样的社交场所，或是城里的科学学会与乡间的农业俱乐部，它们的成员已经能够讨论和阐发出新颖独到的政策理念。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这些社会场所成为19世纪早期城市内大规模涌现出的自治组织参照的模板。[注]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正当启蒙运动的思想转化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计划时，在哈布斯堡的领地上，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涌现出许多共济会的自治组织。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他是一名共济会成员，在这段时期，他不顾教皇国的强烈反对，收容了几千名共济会人士，让他们在国内站稳脚跟。[注]这些共济会会社并不是一些促进社会平等的机构，它们在实质上也并不是世俗的。在18世纪70年代，奥地利的共济会成员有很多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希望用名为“老式”和“不宽容”的态度来净化天主教会。[注]而当成员们想要讨论和测试各种改革理念时，共济会会社也会为他们提供环境。而在匈牙利，新教徒背景的思想家、作家和贵族们承担起了大部分将启蒙思想用于发展和推动改革项目的任务。因此，我们不能说仅有以城市为基础的共济会成员会为同侪提供社交和辩论场所。譬如波希米亚的当地要人，他们组织了一些农业学会，这些学会不仅向普通农民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而且也在学会较为富裕的会员之间起到了传递新技术和最新良种作物资讯的作用。[注]

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的精髓，就这样在印刷品小册子、沙龙、农业学会和共济会会社等处不断得到讨论，而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也借此得到了很多可供参考的改革模式。以这个国家的重农主义者为例，他们认为农业兴旺重点在于农业人口的繁荣兴旺。另外，重商主义者则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政策促进本地工业和在管控下的国际贸易的发展。财经金融专家和官员谋求重组政府，试图在其中特别为他们分割或者设立一席之地

（譬如内阁阁僚），好让他们更有效率、影响力更加强大。还有中欧的詹森主义者，鼓吹在国内传播经过改良、充满活力、詹森主义色彩较淡的天主教思想，来提升公共道德。这就是关键所在：新的社会活动者们参与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相关议题的激烈讨论中，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来服务于具有革新思想的君主们。

假如哈布斯堡的统治者计划的改革项目在规模上对管理这样一个大帝国是种挑战，至少他们会寻求那些自诩为科学家的人的帮助，将特定的项目实际运用到现实状况中，令其概念化并正当化。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见到的，18世纪不仅仅属于哲学和科学，它同样是一个信息搜集、地图测绘以及各种数据统计研究的时代。所有这些实用技术知识的终极功能，就像这些开明专制君主发挥的作用一样，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福祉。

18世纪不断扩大和持续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在地方议会渐渐将更多地区划入维也纳的行政范围时，不断将很多失去政治影响力的地方贵族吸纳进来。以波希米亚为例，玛丽亚·特利莎甚至保留了几位在1741年短暂抛弃她而投降巴伐利亚的贵族的职位，将他们安插到州级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机构中去。注各项雄心勃勃的改良项目导致了公务行政人员深入社会的情况激增，同时国家也需要更多的新公务人员，来分担迅速增加的工作负担。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期内，仅在匈牙利，国家议会的工作量就已经翻了4番，而单是处理函件的职员人数，就增加了50%—120%！显而易见，行政层面上的变化，需要更多和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国家公务人员。尽管贵族阶层往往占据着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梯队系统的最高处，中产阶层接受过教育的子弟们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政府的中低阶层职位。此外，玛丽亚·特利莎还向那些为政府做出了卓越服务的平民发放了更多的贵族资格特许。在她执政期间，获得贵族身份的人中，有40%来自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注

与此同时，出于维持一支扩容后的军队的需要，玛丽亚·特利莎不得不在1748年取消贵族阶级和她名下的波希米亚与奥地利领地教会的免税特权。尽管贵族和教会领地的征税税率要比农民的土地低，但这项重要措施破坏了长期以来贵族所享受的传统社会特权。玛丽亚·特利莎还运用经济政策，促进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她维持了亚得里亚海上的的里雅斯特（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渔村）和阜姆/里耶卡（Fiume / Rijeka）等城镇在课税上的特别优待，这一优待是在1719年由其父授予

的。这么一来，商人可以免缴经过这些小镇进出口的关税，从而促使他们将自己的生意转移到这里。1741年，随着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落入普鲁士手中，玛丽亚·特利莎的政府同样希望将更多的商路从经过哈布斯堡的北方路线尽可能地转移到通过上述小镇的南方路线。于是在18世纪，这两个镇子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城市，而且到了60年代，它们在地中海贸易上已经可以与威尼斯争锋。注在18世纪末，仅的里雅斯特一城，就承担了国家1/3的出口总量，它的人口也超过了3万人。的里雅斯特成为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以及欧洲最繁忙的商业港口之一。



18世纪的的里雅斯特，繁忙港口的一瞥。原画作者为路易斯·卡萨（Louis Cassas），之后由德迈松（Desmaisons）制作成雕版画（©Tallandier / Bridgeman Images）

此时在1779年，玛丽亚·特利莎授予位于她领地最东边的一个贸易中心——加利西亚的布罗迪镇相当于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的自由贸易特权。布罗迪作为新的加利西亚王国的一部分被吞并，这个城镇原本是从莱比锡到敖德萨和克里米亚这一重要的东西贸易网络上一个富裕的贸易点，但被吞并之初，它的这一地位受到了威胁。由于它成为奥地利的一部分，布罗迪的商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就要穿过许多新的边境线来维持贸易路线。而每过一重边境，都需要缴纳进出口税。哈布斯堡政府不希望看到布罗迪在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减弱，于是便授予布罗迪和它周边的城镇自由贸易区的地位，以便让当地商人不必支付关税。而在做此决定时，维也纳的官员们直白地就是否将布罗迪当作一个与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等奥地利现有的亚得里亚海自由港相似的“自由海港”一事进行了辩论。注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立足的基础是整个帝国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大命题，而非加利西亚狭小的一隅之地。维也纳方面担心，

如果没有税收优惠地位，布罗迪的商人们会将他们的生意越过边境，转移到附近仍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城镇。但新的加利西亚地方政府却激烈反对给予布罗迪税收优待，因为它们想自己对布罗迪课税，从它活跃的贸易活动中获利。

维也纳方面做出的经济政策，有很多是出于巩固奥地利政权的政治目的，将哈布斯堡王朝广大的疆土更有效率地整合成一个大的整体。举个例子，1775年，经过一年的计划、谈判和争辩，奥地利政府将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与波希米亚的土地整合在了同一个关税制度下，使得这一区域范围内完全实现了自由贸易。加利西亚是下一个享受这项普遍关税制度的地方，但是维也纳方面对它相对较弱的经济实力心怀忧虑。而加利西亚在并入奥地利之后，重整地区贸易网和商贸关系的需要，使得它在加入一个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时表现得相当脆弱。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直接依靠国家的经济繁荣，这是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频频鼓吹的信条。因此如果我们只将玛丽亚·特利莎建设国家的各项政策看作经济和行政层面上的改革，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充分理解她全盘的改革计划。同时，玛丽亚·特利莎还试图改善农业生产力，引入新型工业来打击传统的行会势力，增强奥地利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的份额。鉴于18世纪的欧洲大陆经济在根本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力及其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因为农民阶级承担着最沉重的税务负担，国家便开始逐渐加强关注，投入精力改善他们的状况。当时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观察家诟病哈布斯堡王朝政府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特别是在现有的乡村社会架构中经济的疲沓低效。

在玛丽亚·特利莎统治的大部分领土上，农民们从法理和实际上都被束缚在本地的大地主手中。地主们不但从租借土地的农民那里得到现金与农产，还可以每周要求农民为他服役数日，这项令人憎恨的制度以“劳役”这个名称为人所知。农民为地主服役的具体天数各地各有不同，这就造成了被时人记录下来的一种情况：“农无躬耕之暇，田无照拂之人”。[注]玛丽亚·特利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亦在1773年首次访问加利西亚时，进行了无人可比的重要观察。在他眼中，“人们忙于服役，以至田里的庄稼无人收割，它们被完全忽略，以致农民的一年收成尽付东流”[注]。在其他一些地区，法律还禁止农民迁移，甚至要求他们必须得到地主的同意后才能结婚。此外，如果一个农民想要挑战地主对待他的方式，他只能发现后者还兼任地方法官，于是无论怎样心怀不满，农民都求告无

门。综上所述，人们可以认为（玛丽亚·特利莎的很多顾问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农民缺乏对他们自身基本的掌控力。而这位具有一定宗教倾向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同样忧虑这个情况会扭曲农民的道德，以及限制人生的机遇。我们可以将在这片土地上对农民自由和生产力的限制，与当时背景下更广范围的非自由劳动力形式进行比较，比如沙俄的农奴制度，以及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殖民地上的种植园奴隶制度。

当然，促使维也纳当局在其统治的土地上采取改善农业生产力措施的动力，首先亦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需要而非道德义愤。经济考量或许还导致了玛丽亚·特利莎改革工作中最无意识的激进改革，这部分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她的儿子们——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所完全领悟。玛丽亚·特利莎所修正（哪怕不能称之为彻底废除）的，即是将大多数农民和有地贵族紧紧联系起来的制度。她相信，将农民解放为更具生产力且更独立的个体，会使贵族、农民和国家三方受益。于是她将农民需要交付给领主的劳力和作物转化为同时上缴给地主和国家的固定数额现金。独立的农民因此在法律和经济上实现自主掌控，在道义上也成为自由民。最终，他们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贵族如有动用农民劳力耕种自己地产的需要，也可以支付工资的方式雇用无地农民。贵族地主必须放弃很多特权，比如他们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享受农民无偿劳动的权利、管理地方司法的权力，以及免税待遇。

玛丽亚·特利莎不能就这样把如此激进的一套革新措施在奥地利全社会推行，她也无意如此极端，而更倾向于谈判和妥协并存、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但她仍然尽力执行此类改革，尤其是在她和她的家族直接拥有的土地上。尽管事实上她限制了贵族要求农民无偿劳动的量，逐步开始破坏传统社会等级结构背后的潜在逻辑，玛丽亚·特利莎却没能将全盘改革应用于所有的国土。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刷小册子和公共辩论越来越多地涉及未来一个获得自由的农民将有怎样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促成了想法成真。政府也开始编纂一套新的民法法典，全力解决将农民视为自由人的观念。[注]到了18世纪90年代，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改革的思想逻辑推行全国，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国内所有人不分阶层，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积极的公民资格。1799年，当三位锐意改革的君主——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两个儿子都已去世之时，加利西亚的一部法律草案如此写道：“所有公民，无论阶级、财富或性别，都有谨遵法律来推进大众福祉之义务。”[注]这一条规定体现出社会的两种不同理念。一种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以财产和特权阶层进行分隔；另一种则是将社会看作一

个公民世界，人们对国家负有义务，也会从国家那里得到同等的权利。

农民的诉求

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头读到的那样，过去一直以来，国家依赖地方上教区牧师提交的不定期报告，来了解当地人口生、老、病、死、婚的状况。由于奥地利继承战争爆发，玛丽亚·特利莎选择应战，健康新兵需求量随之增加，导致了新的人口普查技术的发展，新技术被用于测定当地人口的规模，以及他们的特性。18世纪中叶的军事领导阶层，成为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强大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支持力量。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和统治者一样，不止对增加新募士兵数量感兴趣。新募士兵的身体素质和他们的数量同等重要。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军事领袖和玛丽亚·特利莎一样，怀疑传统土地关系造成了经济低效和生产力低下，于是他们支持她从法理上解放农民，使他们在经济上也达到自由。

1770年，当人口普查开始测定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范围内人口的规模、健康和受教育情况，以及当哈布斯堡的领土开始进行地图测绘时（它们往往都是首开先河），正是军队开发出了最新的相关技术，也只有军队可以调集足够人手来执行这项任务。毕竟在这个时候，后世覆盖整个中欧大地的平民官僚与公务员大军还不存在。幸而有军队积极参与到地方募兵与数据搜集的工作中，军队领导层以及很多普通士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感同身受，对奥地利全国农民身处的困境深表同情。奥地利御前军事委员会在1770年宣布军队承担起人口普查任务的更广泛目标是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变得更理智、更冷静、更清洁，生活更加丰裕幸福”[注]。

同时，城镇的房屋门牌编号制度也作为一项革新在1770年付诸实施。国家可以借此长期掌握城镇居民更准确的资料。军队的顾问入城下乡，不仅仅是计算人口，并以性别和年龄来进行分类；他们也不仅是简单地经过一座城市，沿路不加思考地给最狭小的茅屋和最宽敞的城市豪宅依次编号。军队顾问此行更重要的任务是作为中央政府的耳目，从各地搜集14个与国家潜在利益相关的不同主题信息，例如当地卫生与健康状况、居民受教育水平、宗教虔诚程度、富裕程度和当地风气。

那些在1770—1771年执行人口普查任务的官兵们，事先被明令不

得鼓励农民直抒怨愤。但即便如此，正如前文中我们所读到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这类抱怨他们听到了太多太多。身在施蒂利亚的顾问官如此报告："人们普遍对农民的服役制度抱有怨言，这项制度令农民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得同时向政府和地主交税。"施蒂利亚南部城镇采列（Cilli / Celje）周边的情况十分糟糕，以至有报告称当地"田地多荒，十室九空"。这一地区的农民们被迫"放弃他们的住房和田地，举家逃亡到邻近的克罗地亚，靠做农场工人为生"注。而就在它西边的卡尼奥拉，随着人口普查慢慢推进，当地人逐渐主动进行合作，"他们希望以此来减轻劳役，以及以货代款的税务负担"注。至于波希米亚，帕尔姆伯爵名下的佃户对劳役制度的严苛抱怨尤其强烈。报告称："即使是在寒冬他们也需要每周工作三日，在夏季则要牵着牛每天劳作，此外还得有一两人负责一些体力劳动。"来自利托梅日采（Leitmeritz / Litoměřice）的消息则指出："农民们只在私下悄悄向我们抱怨。"派往此处的顾问官暗示，如果进行有目的的调查，就可以发现当地地主的许多不法之处。注

地方上的权贵自然不会在农民的抱怨下坐以待毙，他们很快为自己辩护，指责农民小题大做，而且这么做是有意为之。举例来说，在波希米亚南部的克拉托维镇（Klattau / Klatovy），一名士官报告当地突然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农民"不许向任何军队官员抱怨"。这位军官称，如果没有这道命令，显然当地农民会准备申诉更多不平之事。前往施蒂利亚某地的军官则反映当地的领主试图阻挠他们向农民们提问。事实上，在18世纪70年代，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当地议会的成员埋怨军队，认为正是他们的人口普查工作和房屋门牌号码的编录进程助长了农民危险的自由思想和从本地权贵那里获得解放的意愿。

在1770年，很多农民似乎将中央政府或者帝国的力量当作一种与本地贵族的权威相抗衡的便利力量。尽管从制度层面看，国家的力量还未在地方基层确立起来，但显然它在农民心目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因此，农民们积极地向军队代表畅所欲言。很多地区的农民，哪怕只是环境影响使然，都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中央机构寄予厚望，认为它们是保护和扩展自己社会利益的一个手段。因此，随着帝国的特派员来到地方，身处在当地贵族和农民之间，纵然哈布斯堡王朝的很多领地相距甚远、差距甚大，都对中央政府产生了一种新的奇异的归属感。

要让农民摆脱本地贵族的直接影响，还需要在地方上建立教育机

构。农民需要在两方面接受训练：其一是最新的农业技术；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令他们懂得道德约束，从而在变革之后的环境中可以遵守秩序，尊重权威，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1770—1771年的军队调查也反复强调，农民的文盲率正是贫困和社会不幸的原因之一。而高文盲率的产生则要归咎于地方当局对学校教育的忽视、师资的缺失，以及教师们肩负的不可想象的重担。1771年，施蒂利亚南部的调查者发现：

> 每一个教区都资助并聘请一名学校教师，但鉴于教区范围太过广大，区内的住宅彼此间又相距甚远，且受雇于教区和教会的教师本人也会被安排做一些其他工作，使得他教导孩子们学习必需课程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只有很少的农民有阅读能力，事实上不知道自己名字和年纪的农民也为数不少。

在波希米亚执行任务的调查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颇不赞同地写道：“当地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太少，他们并不优先雇用有资质的教师，由于父母们的漠不关心，孩子们往往以各种方式误入歧途。”[注]

1774年（匈牙利则是在1777年），玛丽亚·特利莎提出了不论性别发展儿童通识教育的要求。从此以后，所有国内6—12岁的适龄儿童都将在学校接受教育。哪怕这个强制公共教育系统只是停留在文件层面而未付诸实施，它也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这个国家一举飞跃至欧洲教育发展前列。不过这项法律更多地着眼于奥地利的基本启蒙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机构。玛丽亚·特利莎想要的并不是建立高等学府或是扩大现存的大学科系。在大市镇和各州中心城市，政府增加了教师培训项目。玛丽亚·特利莎还在乡间开办了一些新的拉丁语高级中学，以及训练采矿、冶金等科目的技术学校，这些学校和在维也纳教授学生语言技能和培养译员的东方学校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为不断扩张的国家官僚机构培养日后的官员和专业人才。[注]不过总的来说，玛丽亚·特利莎的教育政策针对的是国家最低下的阶级。她希望可以通过给予农民必不可少的道德与经济教育，使他们成为富有生产力和遵章有序的社会一分子。不过，她也不希望让农民受到太多教育，以至令他们对宗教信条和国家秩序产生怀疑。总而言之，这部教育法令主要的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若干以本地语言授课的一级或二级制初等学校，这些学校使用当地语言授课是非常合适且必要的，因为那些本地孩子中很少有人懂得其他语言。

在18世纪，当上述这些学校建立起来时，它雇用的教师通常是当地

的神职人员。这在欧洲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地神父，尤其在一些偏远的乡村，通常是些只受过粗浅教育的人。但即便如此，国家对神职人员从事儿童基础教育的依赖迫使我们去思考教会在确定教育内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哈布斯堡政府在18世纪与教会之间更广泛的制度关系。我们不禁要思考，国家已经让地方神职人员负责保管当地人口出生、死亡、婚姻和征兵官方记录，在已承担了如此繁重任务的情况下，这些神职人员会怎样理解这项额外增加的职责呢？

在一个世纪之前，保守天主教曾大行其道，其深奥难解且反对宗教改革，让本地神父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工具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政府的义务基础教育将受限于此。早在16世纪，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就已经引入高度情绪化、视觉化和仪式化的崇拜表现形式，来作为与国内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的新教相抗衡的工具。然而两个世纪之后，很多天主教徒开始排斥这种公然的宗教狂热。他们转而寻求一种形式更简单、更专注于个人内心虔诚和善举的宗教信仰模式，而不是徒具外表的仪式性崇拜模式。玛丽亚·特利莎个人的宗教信仰活动，与这种在18世纪遍及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简化天主教模式多有相似。这个模式着重每日生活中的简朴、谦卑和虔诚的美德，同时避免那些奢华繁复、极具仪式性的宗教活动带来公开且无节制的情绪外露。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时期，许多天主教思想家、官员和社团都支持政府在教会政策上加强干预。因此，教会对公共基础教育影响的实际性质，很大程度上仰赖当地神父们的态度。总体上说，他们在此时候已经涉猎过较粗浅的人文主义、自然科学、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发展成果，或者使用启蒙思想来指导教育。

玛丽亚·特利莎手下更加激进的顾问们，逐渐说服她采用国家监管所有教会事务的方式。从神父们在国立神学院受到的教育到主教的任命，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来拯救纯洁的灵魂。通过此举，政府打击了耶稣会在大学中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1752年从教会手中接过了审查的任务。因此，政府的禁书目录很快和教会的禁书目录内容大相径庭。(注)政府彻底削减了宗教节日数目，还解散了一些冥想性质的宗教团体，因为它们的成员并未投身于社区的慈善服务，或是使用他们的财产资助本地教育和福利机构。总的来说，政府削减了天主教会的很多（当然不是全部）特权，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将它看作受到国家管制的诸多合法私人组织之一。不过与此同时，玛丽亚·特利莎对经过改革的天主教产生的个人同情情绪，阻止了她与许多顾问和两个儿子提出的激进世俗道德产生共鸣。举例来说，在她执政期间，她强烈反对针对新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宽

容原则，更别提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不认为对其他宗教宽容会对臣民的道德品质起到改善作用。相对于其他宗教信徒，天主教会的成员仍然保留着许多特权，比如公开进行崇拜活动的权利、可以建造具有塔楼的教堂，以及可以敲响教堂的钟。

当特定的政治目标符合玛丽亚·特利莎的个人偏好时，她就不会让两者产生矛盾，比如鼓励的里雅斯特这一自由港市的商业贸易。她在那儿鼓励商业聚落移民，其中特别包括犹太人、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玛丽亚去世后，她的儿子约瑟夫将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新教徒。[注]自1746年的犹太人群体开始，这些宗教少数派人士被允许在这座城市中组建法人团体、组织宗教崇拜活动以及设立面向该群体成员的学校，同时他们还可以享受与本地天主教徒商人一样的民事与经济权利。[注]

无论玛丽亚·特利莎在18世纪40年代的改革意图多有限，到了70年代，她的改革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重塑了公共生活和政策上各个可能的方面，从宗教活动到教育以及行政司法，从农业技术到新型制造业的创举，从更有效的道路与河网建设到鼓励发展海洋和陆路的贸易。

匈牙利与哈布斯堡

200余年来，哈布斯堡王朝动用了大量资源，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匈牙利，以此来抵御后者的进攻。而在最终击败土耳其人后，哈布斯堡的统治者又试图对匈牙利、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进行更强的政治控制。[注]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匈牙利，最终给予自己一个重塑的机会，得以与强势的匈牙利贵族在宪法上重构权力平衡。1687年，匈牙利议会承认哈布斯堡家族拥有继承匈牙利王位的世袭权力，以此承认后者为解放匈牙利所做出的努力。哈布斯堡政府还在奥斯曼帝国与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交界的长条地带设立了一个直接行政控制区，称为“军事前线”。它在这个区域内安置了不少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逃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正教难民，他们接受了哈布斯堡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特权，承诺为它抵御来自南边土耳其人的威胁。[注]然而在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建立覆盖匈牙利全境的行政控制。这项弱点的一个明显迹象就是它们无法将众多加尔文教教徒、路德宗教

徒和东仪天主教徒占据区（以及支持他们的贵族）连根拔除，那些人正在特兰西瓦尼亚和上匈牙利地区蓬勃发展。这就使得匈牙利能够保持比哈布斯堡王朝其他领地更显著的宗教多样性。直到1715年，匈牙利境内还时不时发动叛乱，而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零星战争则一直持续到1739年，哈布斯堡王朝依靠匈牙利存留下来的贵族进行地方行政管理，这就意味着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众多领地中，匈牙利仍然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地位。

在匈牙利，并非只有议会不时坚持它们之于哈布斯堡政府的独立性，由贵族选出的郡级地方政府来运作的本地行政机构亦是如此。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匈牙利期间，由于匈牙利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以管制其大部分地区的中央政府，郡政府就承担起了地方行政管理、司法，甚至军事防御的重担。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匈牙利之后，对其进行了行政管理上的重组，在此期间，无论是奥地利的朝廷还是天主教会都缺乏必要的资源，将新的政治和宗教架构彻底施用于这个国家。只有它们在匈牙利中部进行的财产再分配和鼓励定居计划，以及南部建立的军事前线地区还算略有建树。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匈牙利的郡政府成为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重要堡垒，它们甚至还互相请教，琢磨出对抗国王的共同战略。[注]

那么这些匈牙利的管理机构，对于对抗国王推动中央集权尝试的行为，它们依据什么意识形态将之正当化呢？总体来看，18世纪的匈牙利议会和地方郡政府更倾向于一个“匈牙利人的国家”，即“natio Hungarica”（这是传统的公务语言——拉丁文的拼法）。它们坚持匈牙利历史上的“国家地位”使匈牙利有权享受一些特定的共有权利。在每一个匈牙利国王的加冕典礼上，国王必须宣誓尊重这个匈牙利“民族”的集体权利。但“国族”这个词对一个18世纪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匈牙利，这个词表示的是真正作为国王臣民的小部分人，即所谓的“国民”。而“匈牙利人的国家”由匈牙利议会上下两院的贵族们组成，这些人有权选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显然可以豁免一切税务。但是大多数匈牙利国王的臣民，即大多数居住在国境之内的人们，却并不被认为是“匈牙利人”的一员。

在这种对抗国王的理论支持下，贵族们坚持这样一种状态：匈牙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只是恰好统治着其他几个地区。他们坚称，匈牙利绝不是一个大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不像波

希米亚那样，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同时，这批人也不认为匈牙利需要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所统治的其他地区那样，成为这个王朝统治架构中的一部分。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造访匈牙利之后，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Spirits of the Laws*）中特别详细地记录了当地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多亏有他，我们可以知道匈牙利贵族开始强调，匈牙利传统上的“国家权利”组成了一部古老的不成文宪法，而议会正是援引这部可敬、古老的虚构宪法，反对哈布斯堡完全吞并匈牙利。注而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的匈牙利国王们却在试图调和匈牙利的管理机构与王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国王们援引匈牙利其他宪政传统来支持他们更广泛地行使行政司法权，以及为保卫国家而招募军队的无可置疑的权力。当国王与匈牙利的敌人作战时，他的军队是一支协调作战的混合部队，其中不分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匈牙利人。而匈牙利议会在传统上接受国王拥有他宣称的这种权利。

当涉及匈牙利教育改革方面的异议时，玛丽亚·特利莎考虑到了统治层面上几乎所有的差异。在她最孤立无援的绝望时刻，正是匈牙利议会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因此，玛丽亚·特利莎对匈牙利的感激之情显然成为她个人与这个国家关系之间的主基调。玛丽亚·特利莎毫不吝于表达她对自己拥有匈牙利国王这个头衔的骄傲之情。这是拥有其他的头衔（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后）所不能比拟的，她甚至都没有将其与自己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或者儿子约瑟夫分享。出于个人情感的考虑，玛丽亚·特利莎在匈牙利实行中央集权化的手段难免温和不少。她情愿看到匈牙利在某种程度上与王国的其他部分略显疏离，并且在这种个人的考虑下，玛丽亚·特利莎试图寻求一个协商解决的方案，而非强制在匈牙利推行她的目标。至少从结构上看，在哈布斯堡王朝长达50年彻底的改革过程中，就在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其他地方统一进行着的制度变革而言，匈牙利始终保持着略显边缘化的状态。

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在这半个世纪中，匈牙利内部也同样进行着重要的国家建构活动。玛丽亚·特利莎一视同仁地在匈牙利和她的其他国土上扩展国家服务，将行政管理机构中央化、专业化。不过在匈牙利，行政官员的职位仍然只对贵族开放。中央官僚体系扩大，并授权给平民官僚骨干队伍的手段也没有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而在维也纳，匈牙利贵族们也同样占据着政府中管理匈牙利事务的行政官员职位，除了军事方面——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匈牙利行政改革倾向于强化了这个社会与哈布斯堡帝国其他部分的分离。

玛丽亚·特利莎持续需要资金来支付她的改革和战争开销。然而在她为王的40年间，只召开了三次议会，由此回避了她可能与匈牙利精英贵族产生的潜在冲突。但在1767年，玛丽亚·特利莎采用了激进彻底的封地登记法来管控匈牙利地主对农民的待遇。她不寻常地选择首先在匈牙利，而不是其他地方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或许部分是因为18世纪60年代初，在匈牙利西部爆发了严重的农民起义；也有可能是玛丽亚·特利莎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在桀骜不驯的议会推行自己的意志。英勇的匈牙利人在1741年拯救了玛丽亚·特利莎，但她不会被这种情绪蒙蔽，令其左右她对这个国家农民待遇的判断。至于农民起义，玛丽亚·特利莎则指出："只有领主们残酷的迫害，才会令这些可怜人铤而走险。"注

玛丽亚·特利莎选择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挑起农民问题，其实还有基于其他策略方面的考虑。1764年，经过了七年战争，玛丽亚·特利莎的政府已经面临破产，因此她需要寻求匈牙利议会主动提供财政支持。同时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顾问们也尝试着减轻那些匈牙利真正纳税人的负担，当然，纳税人中没有一个是贵族！而这些人同样也是军队征募普通士兵的来源。但是出于对维也纳政府日渐专制主义化倾向的疑虑，匈牙利议会拒绝了财政支持，进而向女王提交了己方多达128项的投诉报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公然的冒犯，使得玛丽亚·特利莎决定将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议题强行纳入议会的议事日程。

1767年的封地登记法是个固定独立的纳税与义务体系，用于调节当地农民与地主情况。玛丽亚·特利莎在她位于匈牙利境内的王家领地上采取的措施甚至更进一步。她将所有农民的劳役和粮食实物税捐全部转为以现金支付的地租。但除了推行这些意义深远的改革措施之外，玛丽亚·特利莎的贵族阶级普遍征税政策在匈牙利失败了，这一政策曾经在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上实行。在军费支出方面，就其国土面积来看，匈牙利不定期支付的军费实在很少，因此为军队预算贡献出最大份额的波希米亚人颇有些怨言。不过，当碰到征兵、军需供应和部队指挥等方面的问题，匈牙利的分离倾向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早在《国本诏书》发布之前，一部颁发于1715年的法律就授权哈布斯堡政府可以在匈牙利境内征兵，并且将当地士兵纳入哈布斯堡政府的联合军队之中。

从此以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中就时常可以见到匈牙利兵团。到了18世纪中叶，匈牙利士兵活跃的身影不是只出现在匈牙利与特兰西瓦尼亚战区（就像在对奥斯曼帝国战争时那样），而是整个欧洲。注通

过将匈牙利军人融合到哈布斯堡军队中，玛丽亚·特利莎将军界变成了匈牙利平民突破阶级壁垒，进行有效社会流动的少数几个舞台之一。[注]不过哈布斯堡对匈牙利的军事改革在无意中助长了本地郡政府的权力，它们可以通过负责募兵和供应军队的任务来攫取权力。[注]在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不断扩张和增长的时候，匈牙利抵制哈布斯堡专制主义的支柱就来自此。

国家地位、国民身份和爱国主义

对匈牙利和她统治的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玛丽亚·特利莎的矛盾态度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个时期进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关于国家性质的更重要问题。匈牙利贵族精英之所以能够坚持他们的特殊身份，主要依靠的是宣称他们在匈牙利国族历史上的地位和虚构的宪法。贵族们通过坚持这种国族身份，将他们反对哈布斯堡统治者专制主义主张的行为合法化。尽管这关于匈牙利国家地位的宣言事实上将玛丽亚·特利莎接近95%的匈牙利臣民排除在外，它还是成为小部分贵族精英口头上的有力工具。他们声称这么做完全且只是为了所有匈牙利人的福祉。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正在形成的国家，是个人或大众身份认同的一个对象。当时其他地方的思想家，对这一点究竟认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而这个新出现的国家，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公共领域中变成真实存在之物的程度有多深呢？令国民产生认同感的新哈布斯堡王朝，是否与传统上能产生认同感的对象，比如村镇或地区，或者罗马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象等同呢？而地域意义上的哈布斯堡王朝，也和哈布斯堡家族在象征意义上宣称他们是广义的神圣罗马帝国继承者一事相矛盾。在早前的几个世纪中，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任何一块土地的控制权，不但意味着扩张了王朝拥有的资源，同时还为它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增光添彩。哈布斯堡王朝拥有的领地也强化了这个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主张的所有权。根据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不能够建基于一个地域意义上的哈布斯堡王朝之上。因为为了获得政治利益，土地可以被任意交易。因此，也没有必要让国内各个地区服从于一套统一的行政管理模式。

在18世纪，哈布斯堡家族仍然保护着家族成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的普遍象征性地位。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在1745年当选皇帝，称弗兰茨一世。他们的两个儿子，约瑟夫二世于1765年当选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当选于1790年。尽管如此，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哈布斯堡家族的注意力开始从一个象征性的大一统帝国，被迫更多地转向稳定并强化它们自己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名称也逐渐为人所知。1741年，哈布斯堡王朝生死存亡之际，需要的就是它。

鉴于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用“国家”或“祖国”等词语来描述新的哈布斯堡王朝，并且将它视为倾注爱国热情的对象。我们已经见到过，在匈牙利，“国族”这个词被定义为拥有政治权利的少数精英阶层，但到了18世纪晚期，这个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在一个国家中拥有同种平等国民身份的大部分人。

这个关于国民身份的较新概念来源于它本身的意义，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而国家的边界、对习惯法的服从、公共政府以及一个王朝的统治界定了他们的身份。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国民身份界定方式既不同于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以语言或民族进行划分的概念，亦不同于承袭于过去的精英国民思想。在这种思想下，对国家共同体的界定结合了国家边界，并打破了过去建基在世袭特权与权力之上，对政治共同体的陈旧认知的组织机构。这种对国民身份的新界定概念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正在成形的需要，即国民需要服从于全民平等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只适用于一部分人的那种。

虽然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顾问们没有特别明确提出全民平等的目标，但他们的很多政策已经明确无误地指示出这个倾向。尽管女王只是进行了一些暗示，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玛丽亚·特利莎的长子，都对此得出了激进的结论。假如农民们最终得以从受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从道德上和经济上都被视为有能力的个人，那么贵族们拥有的法律特权就很难继续正当化了。而如果为国服务需要教育和实际功绩，那么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就会失去大部分的社会意义。正如历史学家R.J.W.伊文斯（R. J. W. Evans）对这个时期的中央集权政策所下的结论，“所有这些在玛丽亚·特利莎与其子约瑟夫二世等‘开明专制君主’指示下，对特权、对各种社团组织，以及对区域地位的冲击，都强调了国家公民身份的存在”。反过来，他又发现“特别是各种各样关于行政法规的政府言论，充满了诸如公民与资产阶级这样的词语，或是提到人民大

众，将他们看作政策指向的对象”[注]。

1771年，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在他的著作《对祖国的爱》中呼吁社会所有阶层都要承担起公民责任，提升对“祖国”的爱国热情。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理念为哈布斯堡王朝推出的新国民身份概念提供了文化上的正当性。同时在哈布斯堡王朝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形成它的新国家的过程中，这项理念为其提供了一种界定社会上大部分人身份的有力方法。[注]人民大众会认为他们的利益来自推动改革的君主们推行的帝国改革计划，从而拒绝地方领主们提出的各地各自为政的思想。

但是这种针对一个幅员广大的“祖国”新产生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又是如何与人们当下对特定地区的忠诚，或者被奥地利贵族精英所支持的身份认同方式联系起来的呢？对玛丽亚·特利莎的后继者来说，从文化和情感方面来表达社会与新生国家之间关系的挑战，鼓励将个人身份认同通过爱国主义（当然这是一种王朝式的爱国主义）与国家联系起来而产生的问题，以及要让匈牙利或波兰这样的贵族主导的国家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所面临的困难……要解决以上种种，仍然需要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不断地进行探讨和试验。

在这一点上，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缔造的国家要更相似于它在欧洲的同伴。在18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被视为统一且联系紧密的中央集权共同体。大多数国家也都统治着语言多种多样的不同人群。如果类比现代的英国，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各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爱尔兰则有一个独立的议会。而比较普鲁士，则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将统治不同的区域。法国的例子则展示出国家人口的语言多样化。如果说奥地利在制度机构上的多样性和官方语言的数目上的情况要比前面的各个例子更加极端，那么它与这些国家的区别应当是在数目上而非本质上。[注]

玛丽亚·特利莎在1780年去世，她遗留给儿子约瑟夫二世一个在行政管理上比半个世纪前更加统一协调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国家的社会建立在许许多多的群体上，从1770年的农民们到新兴的官僚阶层，每一类群体都提出自己的愿景和期望。玛丽亚·特利莎取得的成就，源于她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改革，并且在可以妥协的地方妥协，推动改革的进程变为现实。[注]如果玛丽亚·特利莎的后继者们想要继续国家中央集权和改革的进程，使它们达到最合理的结果，那么还需要再做出多少妥协

呢？而那些口头上或者实际掌握着权力的帝国支持者们，又能容忍帝国的各项改革到什么程度呢？

---

1. 原文为鲁道夫四世，应为鲁道夫一世。——译者注

2. Michael Hochedlinger and Anton Tantner, eds., “. . . der grösste Teil der Untertanen lebte lend und mühselig.” Die Berichte des Hofk riegsrates zursozialen und wirtschaft lichen lag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770–1771,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 Sonderband 8 (Vienna:Studien Verlag, 2005). 1770年的兵役制度适用的帝国州包括西里西亚、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戈里齐亚和格拉迪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上下奥地利。（见本条注释前文中所引文献中的地图，lxxvii页。）加利西亚在1776年引入新的征兵制度，因河地区是1779年，蒂罗尔与匈牙利采用新征兵制是在1784年，远奥地利在1786年，布科维纳是在1787年。

3. Hochedlinger and Tantner, Berichte des Hofkriegsrates, xxxi.

4. Hochedlinger and Tantner, Berichte des Hofkriegsrates, lxv, lxvi, xlix.

5. Hochedlinger and Tantner, Berichte des Hofkriegsrates, 37.

6. 与普鲁士军队不同，18世纪的哈布斯堡军队并不只依靠贵族阶级作为军官的来源，并以征兵的方式组建步兵兵团。

7. Hochedlinger and Tantner, Berichte des Hofkriegsrates, liv–lv.

8. 关于语言问题的研究，包括它们的产生、分类和制度化，可参见：Tomasz Kamusella’s encyclopedic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9. 在若干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优秀历史著作中，读者可以参考最近Paula Sutter Fichtner的作品The Habsburgs: Dynasty,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4)。

10. 神圣罗马帝国使用罗马的称号，从而使它本身与之前的罗马帝国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无论是“罗马”还是“神圣”，同时还只暗指如今位于罗马的天主教会与帝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尽管从14世纪起，教皇与皇帝们就一直处在复杂的斗争中。

11. 为了更好地了解神圣罗马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在制度层面上的复杂关系，可参考Charles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18。

12. 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另一个不同支系的成员曾经在1438—1439年短暂称帝统治，称号为阿尔伯特二世（Emperor Albert II）。Fichtner, The Habsbangs, 43–44.

13. 很早之前，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和阿拉贡的斐迪南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哈布斯堡领地未来的准确分割方案已经确定下来，1525年之后，斐迪南却接管了奥地利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议会坚持，斐迪南占有王家领地是他结婚的前提条件。Paula S. Fichtner，The Habsburg Monarchy,1490–1848 (New York: Palgrave, 2003), 11.

14. 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任国王，是身心孱弱的卡洛斯二世（Charels II）。他去世后，将王位交给拥有法国王室第三顺位继承权的侄孙菲利普。之后因为西班牙的王室继承问题爆发的战争集中在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英国、荷兰共和国、葡萄牙和萨伏伊王室与法国之间的争斗。当战争于1714年结束时，西班牙新王菲利普五世被移出

法国王室继承序列，从而避免了法国与西班牙联合为一个王国的可能。Ingrao, Habsburg Monarchy, 105–119.

15. Fichtner, Habsburg Monarchy, 61; Ingrao, Habsburg Monarchy, 128–129.

16. Fichtner, Habsburg Monarchy, 63; Ingrao, Habsburg Monarchy, 150.

17. R. J. W.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Essays on Central Europe c. 1683–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 关于复合君主制的概念，详见J. H. Elliot,“ 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 Past and Present 137 (1992): 48–71。这类国家是一个在一位君主统治下，由各个地区组成的联盟，但各个地区还保留其独特的法律和习俗。

18. 哈布斯堡王朝在维也纳设置一位专门的波希米亚大臣管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其职责类似于管理世袭领地的奥地利大臣。因此即便波希米亚王国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重要的领地，其议会也无法像匈牙利议会那样大胆宣称完全独立。

19. 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 of Bavaria’s）宣称的帝位继承权来自他的妻子——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女儿玛利亚·阿玛莉亚（Maria Amalia）。她是玛丽亚·特利莎的堂姐妹，因利奥波德一世的保障女性王位继承权的法律受益。而卡尔·阿尔伯特本人是哈布斯堡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后代。

20. 玛丽亚·特利莎在匈牙利的头衔是国王，而非女王。

21. 事实上玛丽亚·特利莎来到匈牙利议会一周之后，她的儿子约瑟夫才和玛丽亚的丈夫弗兰茨·约瑟夫一同抵达匈牙利，并宣誓对匈牙利议会忠诚。许多历史记载将两件事混为一谈，有人还坚持玛丽亚·特利莎当时身穿丧服。C. A. Macartney, ed., The Habsburg and Hohenzollern Dynas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0), 132–136; Paul Lendvai, The Hungarians:A Thousand Years of Victory in Defea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8.

22. Lendvai, The Hungarians, 168.

23. C. A. Macartney, Hungary: A Short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2), 97.

24. 考尼茨是另一个在维也纳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波希米亚人。他的家族原籍波希米亚，定居于摩拉维亚。他在成为玛丽亚·特利莎的国务大臣和外交大臣之前，曾在1753—1792年担任驻法大使。See the excellent study by Franz Szabo, Kaunitz and Enlightened Absolutism, 1753–17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如果要了解普鲁士、七年战争和这段时间外交情况令人兴奋不已的有趣解读，可见Franz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1756–176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6. Larry Wolff，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 在引用文献中，鉴于波兰直到14世纪才吞并这一区域，Wolff指出玛丽亚·特利莎在良心上可以好过一些，因为作为匈牙利国王，她有资格宣称自己对这一地区有优先权。

27.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95.

28. Frank Henschel,“ ‘ Das Fluidum der Stadt . . .’ Lebenswelten in Kassa / Kaschau / Košice zwischen urbaner Vielfalt und Nationalismus 1867–1918”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eipzig, 2013), 139.

29. 早期的科学、爱国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团体成员包括了贵族与中产阶层的成员，详见：Rita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Statu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Habsburg Bohem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61.

31. Ibid., 69.“ Whereas English nobles, it is alleged, removed their swords on entering a lodge, Austrian bourgeois were lent one to strap on.”

32.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94.

33. “在这时期（1740—1790年）无论我们在奥地利政府的哪个角落，都能找到波希米亚人。”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95; see also generally, 75–98).

34. Ernst Bruckmüller,Sozialgeschichte Österreichs (Vienna: Böhlau, 2001), 253;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68.

35. Lois Dubin, 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 的里雅斯特在1700年不过是个人口3 000—5 000人的小城镇；到了18世纪中叶，它的人口整整翻了一番；到了1775年，这座经济蒸蒸日上的繁荣城市已经拥有1.5万名住户（包括市郊人口）。

36. 鲍里斯（BörriesKuzmany）对这些讨论有精妙独到的分析，详见其作品：Brody.Eine galizische Grenzstadt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Vienna: Böhlau, 2011),49–55, especially 52。

37. Hochedlinger and Tantner, Berichte des Hofkriegsrates, 29.

38. Quoted in Derek Beales, Joseph II, vol. 2, Against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7。

39. 主要由于各州精英的拖延政策，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时期开始修撰的新法典，直到约瑟夫二世于1786年上台后才完成。

40. See Hannelore Burger,“ Passwesen und Staatsbürgerschaft ,” in Grenze und Staat. Passwesen, Staatsbürgerschaft , Heimatrecht und Fremdengesetzgebung in der ö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1780–1867, eds. Waltraud Heindl and Edith Saur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annelore Burger und Harald Wendelin (Vienna: Bölau, 2000), 3–172, here 97.

41. Hochedlinger and Tantner, Berichte des Hofkriegsrates, lxvii.

42. Ibid., 29–30.

43. Ibid., 37.

44. Ibid., 61.

45. Ibid., 31–32, 48.

46. Michael O’ Sullivan,“ A Hungarian Josephenist, Orientalist, and Bibliophile: Count Karl Revicky, 1737–1793,” AHY 45 (2014): 68. On the academy, its curricula and students, see Paula S. Fichtner, Terror and Toleration: The Habsburg Empire Confronts Islam, 1526–1850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9), 117–163。

47.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51.

48. Dubin, Port Jews, 13–15.

49. Ibid., 14, 43. 的里雅斯特是奥地利世袭领地中少数几个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地方。

1771年，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在付出极高经济代价后，从玛丽亚·特利莎那里得到了特许状。

50. 1536年，哈布斯堡王朝将匈牙利的首府从布达向西迁移至普莱斯堡，这是它势力薄弱的一个表现。直到18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才重新恢复布达行政中心的职能。哈布斯堡占据的匈牙利领土，通常被称为“皇家领地”或者“西匈牙利”。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往往支持作为后备选择的“亲王”统治特兰西瓦尼亚。

51. 从西边的克罗地亚到东边的特兰西瓦尼亚，这个所谓“军事边境”区域的创设，有助于解释在原本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为何会出现大量东正教人口。以军事边境的西边为例，村镇中的居民们为了逃避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大批逃亡，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寻求庇护。

52. 如果想了解更多十七八世纪郡政府的状况，可见George Barany,“ Ungarns Verwaltung: 1848–1918” in Die Habsburger Monarchie 1848–1918, volume II, Verwaltung und Rechtswesen, ed. Adam Wandruschka and Peter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5), 306–468, especially 314–322。

53. 孟德斯鸠在1728年游历匈牙利，并拜访了当地议会。他随后指出，匈牙利的政治情况与法国在中世纪早期曾经历过的阶段很相似。Gabor Vermes, Hungaria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711–1848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U Press, 2014), 89–90. 此外，读者还可参阅一篇对匈牙利宪政发展做出精到分析的文章：László Peter, “Die Verfassungsentwicklung in Ungarn,”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VII, Verfassung und Parlamentarismus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00), 239–540; on Montesquieu, 255。

54. Quoted in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21.

55.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174.

56. Ibid., 30.

57. George Barany,“ Ungarns Verwaltung,” 316–317.

58.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61.

59. Ibid.

60. Beales, Joseph II, vol. 2, 66.

61. Ibid., 63.

第二章｜臣仆与公民，帝国和祖国（1780—1815）

个人可以从他在这个国家的国民身份中充分享受到一切权利。

——1811年，《民法通则》（*Allgemeine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玛丽亚·特利莎将一颗至关重要的改革种子亲手播种入土，然后它在她的儿子和孙子手上结出了累累硕果。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口，其身份从臣民到国民的概念重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它们扎根于人们和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直接产生的关系中。这是一场彻底的变革，个人从过去等级社会架构中的一分子变成了一个国家公民，他/她与国家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决定其法律地位的唯一因素。因此，这场变革对思考“何为人民”这个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它在理论上暗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从卑贱的农奴到权势熏天的贵族，都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按照玛丽亚·特利莎的儿子兼继任者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执政）的话来说，所有人“都应当凭借自己的财富、力量和有用的才干为大众福祉服务”。注

尽管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社会未曾像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那样经历一场令社会动荡的大革命，但在法律层面上，它仍然迎来了彻底的改变。然而讽刺的是，将一个新兴奥地利国家的愿景变为现实的并不是约瑟夫二世本人。出乎所有人意料，倡导这一改变的是约瑟夫二世无趣又保守的侄子弗兰茨，他先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尔后在1804年，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弗兰茨一世。奥地利与法国20年来不间断（其间奥地利多有败绩）的战争令这个国家走到了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但这也迫使奥地利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于1811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将约瑟夫二世关于国民身份的激进设想变为了现实。

约瑟夫二世曾反复尝试，将自由人追求有作为的生活的能力与随之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益处结合起来。1782年，皇帝出台一份法律，规定

下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犹太人享有的法律地位，这份法律文本强有力地说明了约瑟夫二世的观点。

> 对于我们所有的臣民，无论民族和宗教信仰，我们着重关心的一点是……他们必须为我们所渴望促进的公共繁荣做出贡献，他们可以享受法律保障的自由；当他们以任何一种可敬的方式谋生时，将不会受到任何阻碍，而他们也将通过自己的勤勉，为大众的福祉做出贡献。

为了国家利益解放个人能力的思想，在约瑟夫二世的执政方针中所起到的指导作用，要远远大过他的母亲玛丽亚·特利莎。约瑟夫执政的短短一段时间内，这种思路还导致了两个席卷全国的严重问题。

第一个是约瑟夫二世锐意进取的改革势头，为此他常常无视别人提出的建议。这样一来，皇帝的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有权有势者的利益产生冲突，这些人的特权来自他们从经济上剥削他人的传统权力。约瑟夫二世认为本地贵族对农民阶级拥有的特权违反了自然法的基本框架，因此他对贵族们的抗议置之不理：

> 如果有一个国家，在那儿的一小批人以国家的统治者自居，将剩下的大多数劳动者和生产者看作满足其经济需要和寻欢作乐的工具；如果这个地方的这一小批人制定所有的法律，或者出于保全他们自己不受损害和独立的目的来解读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继续存续或者弥补其问题的希望了。因为人性被压制，人们自然的情感亦遭到违背。

在约瑟夫看来，法律替代了传统等级社会中专制主义的各种习俗和规约。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仍然持续不断地形塑着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社会，而法律迅速地将它自己应用到了其他的方面。事实上，君主就是法律的制定者、保护者和执行者。

皇帝一门心思推行他认为的理性统治准则，但他的行为往往近乎冷酷无情。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改革者，约瑟夫二世以极高的标准要求手下的官僚，一旦他们达不到他设下的严格标准，他就严厉责备他们的无能，因此导致大多数官员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才继续留任。在他短暂的统治期内，约瑟夫二世得到了他的支持者们狂热的崇拜，特别是那

些正在扩张的官僚系统中的成员。当然，当这些崇拜者们与皇帝太过接近时，他们又会因为他充满控制欲的严厉秉性而疏远他。鉴于约瑟夫二世十分看重理性、中央集权和纪律，他尚武的脾气就完全不令人惊讶了。在思考内政政策的时候，约瑟夫二世时常会使用军事上的思路来解决问题。有目的性的劝诱和有技巧的妥协是玛丽亚·特利莎处事的特点，约瑟夫二世却和母亲的作风大相径庭，只要他决定采取行动，就会暴风骤雨般势不可当地推行计划，很少接受讨论和妥协。因此到了约瑟夫二世统治的后半段，他统治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在皇帝的反对者进行有效反击之前，皇帝能够将国内的改革进行到何种地步。

皇帝决心不计代价推行社会改革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正是改革所需要花费的代价。约瑟夫二世在交代给地方政府无数待执行指令的同时，他也无情地削减了各个部门的开支。此外，正如他监管着帝国和地方上官僚体系的扩张，他也将更多责任压在官员们头上。责任增长的速度，要远远快过官僚系统的预算和所需资源增长的速度。而假如皇帝的改革激起叛乱，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各级公务员又得紧缩银根，并且接到更多的工作。



1772年的哈布斯堡疆域

就在约瑟夫二世英年早逝的1790年，就像在这个国度的其他地方一

样，他的立法尝试在匈牙利和奥属尼德兰引发了叛乱。此时继承皇位的是约瑟夫二世的弟弟——年寿不永的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他不得不收拾兄长留下的烂摊子，并且要在重建叛乱地区贵族对帝国的信心的同时，继续推行哈布斯堡家族的改革计划。但是利奥波德二世即位两年后就撒手人寰，他未完成的改革就留给了其长子弗兰茨（Francis，1768—1835）。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弗兰茨一世无论在性格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一个改革者，但他仍然在1804年宣称哈布斯堡的众多领地已经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将这个国家称为奥地利帝国。1811年，也正是这位弗兰茨陛下宣布了《民法通则》，将他的臣民们转变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国民。而弗兰茨一世着手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国家正经历着最具毁灭性的20年。此时处在大革命风潮之中的法国，在迅速发迹的皇帝拿破仑领导下，与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反法同盟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社会公仆

178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一种新的紧迫感，促使它进行行政管理中央化的改革。约瑟夫二世亲自主持加速改革的行动，他是个与传统不同的“新型”统治者，因此他比当时其他地方的任何君主都更适用于这样一个严肃的绰号——“国家的第一公仆”。注 约瑟夫二世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世历史学家们眼中“开明专制君主”的典型。他得到这样的名声，是因为他勤政不辍的工作态度，因为他马不停蹄地巡视自己国土的每个角落，因为他热衷于事无巨细地搜集社会现象信息，不断改革传统体制，以及习惯于无孔不入地用大量详细命令管控他手下的官员们。通过这样一份约瑟夫二世的性格与行为模式列表，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为何在他短暂的执政期内，这位皇帝几乎被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疏远。

此外，在他过世很久之后，约瑟夫二世同时成为人们热烈崇拜或深度妖魔化的对象。举例来说，终约瑟夫二世一生，全国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到加利西亚的农民都将他视为人民英雄。约瑟夫二世甚至还亲自下田耕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769年在摩拉维亚的斯拉维科维斯（Slavikovice）。农民们相信自此之后，皇帝下令“解放”了全国的农奴。在这位君主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每当农民们反抗本地贵族地主的

命令、挑战贵族的权威，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到约瑟夫二世的名字。此后到了19世纪，主张改革的犹太人将约瑟夫二世捧上神坛，认为他在法律层面上解放了他们。此外，很多激进的教育者把约瑟夫看作自由思想原则的化身，同时民主主义者们则认为皇帝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平等主义者。与此相反的是，贵族和教会痛斥约瑟夫二世，哪怕他还在位时，他们都毫不掩饰地称其为冷血、顽固、短视的暴君，指责他践踏了他们的“传统”或者“传统自由”——当然，以国内其他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如说是贵族与教会的“惯有特权”。



一幅19世纪画作，描绘了1769年8月19日，约瑟夫二世在摩拉维亚的斯拉维科维斯的田间扶犁转弯的场景。原画作者为Emil Pirchan（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在之后的时代中，约瑟夫二世本人还成为其他方面的一个强有力象征。他去世之后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故意误读他将德语定为全国官方语言的行为，称这是约瑟夫二世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并且用无数的雕像来纪念他。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19世纪的捷克与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厌恶把整个国家德意志化的约瑟夫二世，声称他的语言政策掠夺了这个国家其他众多民族宝贵的语言文化遗产。

我们从以上所有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传说中看到的更多是后世的政治冲突，而非约瑟夫二世本人的意图与目标。尽管他有很多解放政策成为之后社会上一些自由主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约瑟夫二世只是一个19世纪的改革者。他在将国家德意志化的过程中摧毁地区或是地方本土语言文化的行为也绝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意图。事实上，约瑟夫二世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改革反而鼓励在当地的学校、出版机构和行政管理上

更广泛地使用地方语言，这在捷克体现得尤为明显。[注]总而言之，约瑟夫二世相信国民们生活得更好是增进国家整体幸福的最有效手段，因此他的改革目标就是给予臣民们更多改善生活的机会。不过同时，约瑟夫二世也坚持他是最能决定什么东西对国民有利的人。

约瑟夫二世在1780年掌权亲政。在此之前，他的母亲以及她的顾问们已经耗费了30多年的时间，尝试用各种改革挑战一系列社会与政治传统。在此期间，国家与社会福利达到的最佳效果逐渐成为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顾问们衡量政策执行结果的新标准。他们再也不以增进王朝的荣耀为主要目的来制定政策了。如今一个王朝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依靠它带领人民走向繁荣的能力。统治者们的最高目标，就是令国家和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兴旺发达。

1765年，24岁的约瑟夫二世在父亲弗兰茨·斯蒂芬去世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过他的母亲玛丽亚·特利莎仍然享有“共治者”的地位。此时的玛丽亚·特利莎依然在决策方面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她常常不让儿子接触到一些重要的情报，并且限制他参与重要决策。因此在与母亲共享权力的15年内，约瑟夫为他源源不断的精力找到了新的发泄渠道：他沉迷于游历自己的国土，接见不同阶层、地区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并且向这些人询问无数关于当地情况的问题，还接受了臣民们，尤其是农民数之不尽的请愿书。当玛丽亚·特利莎于1780年去世时，约瑟夫二世自动进入了“国家的第一公仆”的角色。虽然玛丽亚·特利莎实际上也属于“公仆”这一类型的统治者，但她选择用更传统的仪式化和具象化的方式来将自己的地位合理化。

玛丽亚·特利莎在世时，人们刻画她的形象，或是集中于她众多的王室、皇室，以及宗教头衔（仿佛这样可以强调她正统的地位），或者是将她安置在一个大家庭居家场景的中心地位，营造出她即是人民之母的意象。[注]而显然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更倾向于另一种统治者的形象。在他官方与非官方的肖像中，约瑟夫二世展现出来的都是一个手握陆军元帅杖的戎装形象。画像中的约瑟夫二世往往不戴皇冠，也不穿礼服，并且经常与身份低微的人们交谈。[注]此外，膝下无子的约瑟夫二世从没留下与他任何一位配偶在一起的正式肖像。[注]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弟弟与继任者——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二世继承了母亲关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家庭意象。在他的肖像中，利奥波德二世总是被妻子和孩子们围绕。他有很多子女，其中13个活到了成年。

约瑟夫二世排斥传统的仪式和象征意象，以至他的传记作家德雷克·比尔斯（Derek Beales）用“全欧洲最寒酸、最男性化，也最不吸引人”的定语来描述他的宫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专制统治制度的信赖会逊色于他较近的先祖们。注在他看来，只有统治者和他的心腹顾问们才能充分理解全社会的福祉。不过虽然约瑟夫二世秉承了与玛丽亚·特利莎的改革一脉相承的治国逻辑，他却以此来构建自己系统性的改革项目，剪除帝国统治在文化、宗教和象征上的困境，代之以充满理性和逻辑的、实用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当然，在他思考的过程中，约瑟夫二世不必比其他人更加理性或者富有逻辑，不过在他执政期间，理智的抽象概念以及不属于宗教或帝国传统的自然法，共同形塑了所有的政策讨论，并且将所有的决定正当化。



玛丽亚·特利莎之子，此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托斯卡纳大公在佛罗伦萨被家人簇拥的场景。观者视线穿过画面中的窗户，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圆顶清晰可见。这幅铜版画原作者为乔瓦尼·切基（Giovanni Battista Cecchi），作于1785年（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奥地利不断膨胀的官僚系统是为约瑟夫二世执着的改革意志服务的工具之一，早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时代，对其的建构就已经开始了。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顾问们零敲碎打地建立起官僚体系的新观念，这个体系必须忠于国家，而非忠于一个王朝或者贵族朝廷。达官显贵是皇后手下的最高公务员，像1745年成立的特利莎学校，或是培养未来外交人才的领事学院这类专门服务贵族子弟的学校，它们的毕业生都将为国家

的高级职位服务。而对于地位较低（但也没有低太多）的中产阶层与商人阶层子弟，加入这个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的人数亦越来越多。除了贵族身份仍然是进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必要条件的匈牙利之外，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对那些拥有公务员职位所需教育背景的平民来说，进入官僚体系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角逐政府决策职位的中产阶层人士都会在奥地利的某一所大学学习法律。[注]在这些学术机构深造花费并不高昂，对于那些本就居住在大学所在的城镇中的居民来说尤为如此。此外，大学还提供各类奖学金，尽管奖学金可能仅够支付生活费用[注]，但也给了那些相对家境窘迫的学生继续学业的可能。1780—1848年，政府官僚系统中担任高层职位的平民人数在比例上出现了绝对增长。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一名官员的成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他本人的政绩，官员职位不再被认为是可以凭身份地位取得的东西，也不能再用金钱收买。一名候选人只有积极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才有可能得到心仪的职位。在这一层面上，正如瓦尔特劳德·海因德尔（Waltraud　Heindl）所言，官僚体系的扩张，被用来执行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正是建基于启蒙主义的国民奉献精神之上的："官僚们的工作是以公民的道德表现为前提条件的，根据启蒙主义的观点，成为国民，就意味着……积极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一个官员既不依靠原本的身份地位，也不是依靠金钱收买得到他的职位，同样也不依靠君主反复无常的心意。"[注]而平民官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僚体系中飞速增加的人数，也使得职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风潮，到了19世纪，这种包括了新行为习惯、新社交礼仪以及新文化行为的精神风潮不单出现在职场，同时也深深植入这些人的家庭环境。[注]

中产阶层对官僚体系的征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是意义深远的。中产阶层的工作模式、家庭生活，甚至工作空间布置渐渐在整体上取代了贵族阶级的标准。举例来说，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时期，在维也纳和州的各个首府涌现出一批专门用来容纳新官员每日办公的建筑。[注]尽管此时仍然有一些贵族继续在家中办公［直至拿破仑一世时代晚期，梅特涅（Metterich）还常常在家中穿着睡袍接待同僚］，但如今的新趋势却将工作场所与家庭严格区分开来。1787年，一位维也纳评论员描述他在每天早晨9点半看到的景象："一支差不多有4　500人的官员大军在行进，在他们后面跟着300辆马车……他们都是政府各部门的长官，其

中有国务总理、战争大臣、奥地利–波希米亚大臣、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大臣、尼德兰大臣，以及市政厅诸位官员等。”[注]到了18世纪70年代之后，官员们只在政府需要削减照明和供暖费用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在家中办公，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

官僚政府的服务体制同样意味着固定的办公时间（在维也纳通常是上午9—12时，以及下午3—6时）和准时出勤的要求。尽管到了19世纪早期，守时才逐渐被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优点，但在当时无论是贵族还是中产阶层的官员都必须遵守这一要求。而贵族与中产平民居于同一个办公空间也使他们面临调整自己外在行为的挑战。而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看待其他阶层的人们时，自然也抱有很大的猜疑。举例来说，中产阶层的官员们心怀忌妒地目睹贵族同事享受的种种不公平特权，而贵族们则抱怨资产阶级贪婪的社会观念。[注]这个时期，贵族和平民在办公室之外的家庭安排仍然因为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在维也纳以及布拉格、利沃夫和格拉茨这样的州级首府尤其如此，位于社会“第一等级”的贵族，将他们自身与位于“第二等级”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严格区分开来。即便是往往出自经济考虑缔结的跨阶层婚姻，也很难将男女双方地位不同的两个家庭结合起来。

约瑟夫二世痴迷于用官僚体制来解释他对国家行政激情洋溢的理想。1783年，他在一封所谓的牧函中这样写道：

> 任何赞同我观点的人，以及任何抛弃所有顾虑，全心全意将自己培养成一名真正国家公仆的人，都能够理解之前所提出的那些条款（即支配着一名官员日常生活的种种准则）。而对这些人来说，履行这些严格规章的负担就和我将它们付诸实施时所感到的那样小。不过至于那些为官目的是沽名钓誉、聚敛财富，将报效国家放在次要考虑的人，现在他们最好明白时势，让出他们不配且不适合占据的职位。掌管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需要一种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强烈热情，并且官员本身要完全放弃个人私利与享乐。[注]

这种为国家热情献身、放弃私人考虑的禁欲主义思想是令人兴奋的，对那些力图留名青史的中产阶层青年来说尤为如此。

约瑟夫二世通过国家官僚机构的诸多规章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推行全国的统一平等的标准，并且创造出一种听上去像是“世俗传教

士”的概念。在他短暂的10年单独执政期，约瑟夫二世颁布了一系列管理一名官员职业生涯各方面的详尽规定，从他所受的教育开始，覆盖雇用、升职、薪酬标准、惩罚、休假，以及禁止收受礼物的各种条款。约瑟夫二世还率先建立了人事档案制度，举例来说，皇帝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要求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上报表现令他们不满的雇员。[注]此外，约瑟夫二世还坚持整个官僚体系上下必须秉持社会平等的原则。他为此设计了一套严格论资排辈的雇用与提拔规则。“无论候选人来自资产阶级、骑士阶层、乡绅贵族，甚至是高贵的王公贵族”，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这些人都必须服从这套规则。[注]这个讲求资历的原则以早前中产阶层进驻国家官僚体系为基础，成为打破之前贵族占国家公务机关主导地位的重要工具。这些中产阶层官员对提拔自己的国家非常忠诚，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对地方利益或阶级特权的感情。

约瑟夫二世的官僚制度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它对帝国的中心维也纳，以及整个奥地利不断增强的文化认同感。在理想的情况下，具有爱国热情的官员们（就像约瑟夫二世本人一样）会把他们的生命投入为国效力中去。但他们热爱的应该是哪一个国家呢？不会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或者克罗地亚这些曾经的独立国家。1771年，玛丽亚·特利莎的顾问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在他的专著《对祖国的爱》（这本书在本书第一章的末尾部分提到过）中，认为祖国就是“一个人永久居留的土地”。他还在这个直白的描述上增添了不少祖国应有的特质，包括这片土地上的自然法、政府的形式，以及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索南菲尔兹认为，一个经过改良的国家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需要有对传统父权制的忠诚，甚至是对一个王朝的忠诚。但是他强调这样一个革新后的国家需要爱国主义，它是将国民与国家联系起来的一种必要的情感纽带。索南菲尔兹对爱国主义的解释建立在当前现实的基础上，而且它强调国民与国家联系的纽带来自人们共同享有的法律，以及如今我们定义为宪法的事物。在他的解释中，爱国主义回避了国民共享过去的历史、共同文化或者语言的内容。索南菲尔兹式的爱国主义唤起了理性的选择，它能够解释引发爱国情感联系的感情特质，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系（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爱国主义）放在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体系当中。

> 我们得到的幸福感，来自在这片土地上得到这样一批法律的保护，经由这样一个形式的政府领导，以及与这样一群国民同胞身处同一个社会。上述种种产生出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它奠定了我们爱

祖国的基础……在此我们必须补充一个信念……即我们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身处任何法律约束或任何形式的政府管理下，或是与其他的国民相处，都无法得到更多的幸福感……正所谓祖国之损失即我辈之损失，祖国之得利即我辈之得利。注

“因为害怕失去这些利益，”索南菲尔兹写道，“我们将积极斗争，保卫祖国。”不过事实真将如此吗？索南菲尔兹相信，教育终究会将对奥地利祖国的爱深植入它的人民心中。为了达到培养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目的，无论是本地学校还是高等学府，都需要教授学生关于祖国的知识。举例来说，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一本初等学校的捷克语课本这样写道：

通过“祖国”（vlast）一词，我们了解到祖国不但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享受安全与保护。所有由一个皇帝、一个国王，或者是其他的最高统治者统治的土地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祖国。因此，不仅仅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一切属于我们君主的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国。注

根据教科书的简单阐释，以及前文中索南菲尔兹提到的爱国主义的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祖国应当是人们享受安全、保护，拥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的地方，而在人们的脑海中，它们正是一个王朝具象化的表达。

1788—1789年，约瑟夫二世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这个组织此后变成了国家审查委员会）主管戈特弗里德·范·史威坦（Gottfried van Swieten，1733—1803）在维也纳大学率先开设了一门被他称为“奥地利（Österreich / Austria）历史”的课程，而不是讲授神圣罗马帝国或者组成如今这个君主国家一部分的个别州的历史。虽然约瑟夫二世之后执意削减预算使得这门课程不得不草草结束，但是这些试图通过教育将奥地利国家合法化的尝试，或许引起了除公务员之外的其他某些国民少许情感上的差异。注不过，就像我们在之前关于农民们的例子中所读到的，在18世纪末，很多奥地利人仍然选择将他们自己看作更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看到，仅仅过了短暂的一代人的时间，随着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创伤，奥地利这个作为祖国和母国而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整体，在1815年，对来自众多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人们来说具有了情感上的意义。

改革

在约瑟夫二世执政时期，相比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最后10年，帝国的法令数目出现了指数级的迅猛增长。1780年，玛丽亚·特利莎签发了82份适用于国内非匈牙利地区的法令。但就在次年一年内，约瑟夫二世就针对同一地区发布了402份法令。这些法令中首当其冲的一份，内容是中止已经成为惯例的审查制度，并且为审查提供一份全新的指导准则。玛丽亚·特利莎在此之前已经解除了天主教会的审查职责，并且组建了一个政府委员会，用来裁定所有公开发行的作品是否合乎标准。约瑟夫二世虽然没有停止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大幅度改变了它的职能。在此之后，所有的严肃学术作品可以不经审查自由出版。此外，审查委员会不再需要审查批准每一部作品是否可以发行，而是裁定少数看上去不符合新审查标准的作品是否合宜。教会人员不再被允许以书面形式公开批评政令，但其他撰著者却被邀请批评约瑟夫二世的政策。

约瑟夫二世似乎相信禁止一切有害书籍，但在无意中也将一些好书排除在发行范围之外的审查政策“阻碍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方面”，并且对社会有害。但是他依旧采用严格的规定来约束那些批评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印刷品，反基督教的作品也仍然属于违法。此外，约瑟夫二世还控制在剧场上演的作品，其小心谨慎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控制书籍和社会上流通的小册子。这是因为他担心这些作品对广大未受教育的大众产生的强烈影响，要大过对受过教育的国民产生的。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

> 一个人必须反对那些有着放纵下流内容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学习或者教化人民的东西。而我们倒可以对那些具有知识和逻辑上连贯性的作品更宽容一些……因为前者往往被大多数民众以及那些孱弱的灵魂接触，而后者只能送到那些有着训练有素的头脑和极有原则的人手里。[注]

审查规定的变化立竿见影地将禁书数目从5 000种减少到了900种。新规定的实施还导致了一大批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作品涌现，仅在约瑟夫二世执政时期开始的最初18个月，就有超过1 000种小册子面世。这些小册子开篇往往伴随着对约瑟夫二世热情洋溢（哪怕有些并不准确）的歌功颂德，其中一份这样写道：“这位最明智、最出众的君主给予我们撰写所思所想的自由。”[注]但约瑟夫二世的新审查制度引起了罗马教廷

大使和其他天主教会显贵人士的不满，很多贵族观察员也对此冷嘲热讽。约瑟夫二世的友人埃勒诺勒·列支敦士登（Eleonore Liechtenstein）公主就曾经在给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如今确实处在一个新的世界了。莫非我们容忍这一切还不够，必须要将它们付梓发行吗？"和一些约瑟夫二世的批评者一样，埃勒诺勒公主认为他的政策是对传统等级社会和天主教信仰的不敬。"在这一个方面，从皇帝的灵魂中，从他对新奇事物的爱好中，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他煽动下属对抗他们上司的行为、他逐渐冷硬的心，以及最后对上帝的背弃中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可畏的。"

约瑟夫二世执政伊始，他就试图以母亲的政策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大众教育。此时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足够的学校来实现玛丽亚·特利莎的教育理念：让所有适龄的奥地利儿童不分性别，义务入学。当然，此时也没有迫使国内无数家庭将孩子们送去学校的有效手段。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君主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因此约瑟夫二世无孔不入的管理癖好督促他着手削减现有各个机构的预算，用来节省出他准备不断提供给初等学校的资金。皇帝强调要提高社会最低阶层的文化水平，因此次级和高等学府的资金就被挪用。为达到这个目的，约瑟夫二世几度尝试将一些大学降级，并且砍掉这些学校中一些他认为价值不大的科目。但约瑟夫二世的教育委员会反对皇帝的行为，开始与他抗争。

最终皇帝做出让步。他表示不会再削减大学的预算用以贴补初等义务教育体系，以便让初等教育发展起来。他转而在1785年颁布了一部法律，要求地方上每个教区都应当建立一所学校。学校教师们将被视为公务员，但鉴于他们的工作描述是当地教堂的司事，因此教师的薪酬由教会支付。当地的地主和教会还将分担建造校舍和教师住房的费用。对那些没有得到教会支付的薪水的倒霉教师来说，他们得保证所有的本地儿童都在学校接受6年教育，并交付最低限度的费用。假如有些家庭无力支付子女的学费，他们可以得到豁免。最后，大学需要缴纳一笔特别的税款，来资助初等学校的运作。

1812年，政府颁布了一批规章条例。它们的内容是自1785年以来累积的结果，涉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世袭领地上关于学校的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方面。它规定学校必须选址在特定的位置（它需要建在一块干燥的土地上，绝不能是沼泽地），设定了教室的最佳布局，以及教师的理想特质。每位教师都会得到一间采光良好（窗户的安装位置也有讲

究）的教室，并且冬天室内有炉子可以取暖。教室的每一边都会有两排长椅，这样学生就有足够就座与书写的位置（其距离都有精确的标准）。教师需要坐在教室前方小平台上的桌子边，紧邻着一块大黑板，“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见他”。学校的一切都必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教师妻子与孩子，还有仆人们的家务事就不会打扰到学生，而教室也只供教学使用”。此外，学校里将看不到一切与教学课程无关的事物，比如“纺车、线轴，或者是床铺的一部分”。学校内还会设置一个特别的橱柜，用来存放那些无力置办课本的穷学生需要的书籍，以及视察员和来访者到校时供他们使用的坐凳。根据1788年的法律，新式校舍还包含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供年长有病的教师或者是年轻的教学助理使用，这间房间内还会存放一些供学生在教学时间外学习纺线与编织的工具。

就在传统的审查模式寿终正寝的同一年，约瑟夫二世签署了对非天主教基督徒的《宽容法令》，稍后又对犹太人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在此之前，玛丽亚·特利莎的顾问们，举例来说，考尼茨就曾向她呼吁，请求她发布宗教宽容的法令。但是玛丽亚·特利莎身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担心对其他教派乃至宗教的宽容会损害一般大众的道德伦理。然而，约瑟夫二世对宗教的看法则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并不反对天主教会，但认为宗教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应影响国民政策。而且他认为受到宗教宽容令优待的新群体，会格外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约瑟夫二世在一份发布于1781年的命令中宣称：“除非考虑到公共宗教崇拜的问题，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会有任何区别。”在过去，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新教徒、东正教徒或希腊礼天主教徒受到许多法律限制的影响，他们在就业时受到歧视，拥有土地和令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亦受到损害，如今这一切都画上了句号。举例来说，清教徒家庭的孩子从此可以就读天主教学校。在清教徒儿童数目超过500人的乡镇，清教徒社区有权自行开设学校。这些学校和国内的天主教学校一样，都需要服从政府的规定，虽然非天主教信仰的基督徒在公开进行宗教崇拜活动上仍然有所限制：他们的教堂不能建造有钟的塔楼，也不能公开召唤信徒前往礼拜地点。但是《宽容法令》在扭转哈布斯堡王朝内部清教徒、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和唯一神派教徒的状况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教徒在法律保护下，可以加入行会、入读大学，或者在政府机关就业。与同时期处于新教区域的英格兰相比，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非天主教信徒获得的权利甚至更多，更别提与其他天主教国家内的同胞进行比较了。

约瑟夫二世对待国内犹太臣民的政策完全证明了他的改革政策要远比顾问们建议的更加激进。1772年之前，哈布斯堡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约15万人，而随着这一年加利西亚被吞并，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人口顿时翻了一番。到了1780年，犹太人的数量上升到约35万人。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禁止犹太人在上、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定居。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见，即便是有着强烈反犹主义倾向的玛丽亚·特利莎，也鼓励犹太商人在的里雅斯特港口安顿下来。事实上，玛丽亚·特利莎在位期间，政府甚至鼓励犹太人作为殖民者，前往人烟稀少的匈牙利地区，如巴纳特或者特兰西瓦尼亚定居。在维也纳，总计有600名犹太人获得居留权，其中包括重要的银行家家族——阿尔恩斯泰因家族、厄斯克斯家族和维德摩尔家族，他们通常担任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放款人。1780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总计达到6万之多。作为允许他们居留此处的代价，政府对这些犹太人课以惩罚性的重税，同时对他们的迁移、婚姻、就业和多种蓄产方式设置严格的限制条件。同时期匈牙利差不多有7.5万名犹太人，特兰西瓦尼亚则有约1 000人。[注]

随后在1781—1785年，拥有较多犹太人人口的哈布斯堡领地（波希米亚、加利西亚、匈牙利和摩拉维亚）都公布诏令，撤销犹太人生活中的所有限制，允许犹太人从事商贸行业、手工艺行业，以及成为政府公务人员，但诏令也要求犹太人接受以德语为媒介的世俗教育。[注]（在匈牙利，犹太人的教育可以使用德语、匈牙利语或者当地的斯拉夫语。）这些诏令还要求，自此之后犹太人的法律与商业文件必须使用德语作为书写语言（在匈牙利还可以使用匈牙利语和拉丁语）。[注]尽管诏令的内容没有提及犹太人是否可以从军，但很快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就爆发了一场以小册子印刷品为舞台的辩论，探讨犹太人服兵役的问题。很多“异教的有识之士”，如马斯基尔（Makilim）[注]，或者说“犹太启蒙主义者”纷纷参与到这场辩论中，他们认为服兵役的义务是犹太人可能获得国民身份的主要阻碍，争议走向两个极端。[注]

1787年，加利西亚总督在他管辖的州起草宽容诏令时，他同样建议将犹太人征召入运输部队。但战争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提议，委员们援引论据，称犹太人无法在安息日工作，更别提他们在饮食上的清规戒律可能对军队造成的麻烦。不过约瑟夫二世将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下令征召加利西亚犹太人进入运输和火炮部队。[注]4个月后，约瑟夫二世把

这道命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他的整个帝国。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小区强烈反对皇帝的诏令，他们向约瑟夫二世请愿，宁可出钱，也不入伍。犹太人如此争辩：入伍的犹太人向来在军队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和异教的战友不同，无论犹太人的表现有多么优异，都无法得到擢升。而一些现役军官则从其他的角度反对犹太人入伍，他们认为在平民生活中，犹太人尚且不能从事某些职业，如果他们在军队中担任指挥官，领导基督徒士兵，这是对军队的侮辱。

迈克·西尔伯（Michael Silber）对上述的论战进行了分析，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至少对约瑟夫二世来说，早前针对非天主教基督徒的《宽容法令》发挥了作用，解决了这一问题。法令强调军职的擢升只取决于个人能力。国家总理利奥波德（Leopold Count Kollowrat，1727—1809）强调这一点可以直接驳斥加利西亚犹太人请愿反对服役的理由："鉴于陛下已经慷慨地给予犹太人与基督徒同等的权利，令他们有资质担任各种国家公职，那么犹太人也可以参军，他们可努力获取其他信仰者也认为值得赞赏的提拔。"注

这些决定造就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1788—1815年，在欧洲战事连绵的这25年内，只有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国家，以及大革命和拿破仑称帝时期的法国招募了大量犹太人入伍。哈布斯堡王朝动员了数以千计的犹太士兵，先是在1788—1791年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此后又在1792—1815年和法国对抗。举个例子，拿破仑战争末期，在1814年征募的50万士兵中，有1.5万—1.9万名犹太人。在哈布斯堡与法国交战的25年中，总计约有3.5万名犹太人在军中效力。注

不过除去约瑟夫二世的法令中解放犹太人的那些部分，犹太人在公民与社会领域仍然受制于诸多限制。这个时期的犹太人不能像其他公民可以自由地在国内迁移和定居，特别是不能定居在下奥地利之外的大多数哈布斯堡皇室世袭领地。而全国的犹太人家庭中，只有长子被允许结婚，在结婚之前，他们还需要付出一大笔税金，这条规定引起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很多州的特定地区或城镇，例如摩拉维亚的布尔诺，都要求犹太人取得特别许可之后才能定居。注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读到的，在服兵役方面，犹太人对约瑟夫二世的法律产生了矛盾的抵触情绪，因为这些法令将犹太人的解放等同于一种同化行为（特别是法令中关于教育的语言要求，以及法律与商业文件书面语言的要求）。

与此同时，约瑟夫二世也从官方层面对其他宗教表示了宽容，并且试图将天主教置于更强的政府管控下，实际上将天主教会国有化。同时，他还继续母亲的政策，关闭不直接具有教育或医疗工作建立目的的修道院团体，用它们的财产来支付扩大基础教育的开销。皇帝的行为引起了天主教会主教们的抗议，作为响应，约瑟夫二世决定加强国家对神职人员教育的控制。1784年，约瑟夫二世在每一个州的首府都建立了国立神学院，并在现有的大学中增设神学专业。[注]有赖于这些工作，奥地利的天主教主教们不必与教皇或其他国际性的天主教机构产生太多接触。而由于他事必躬亲的管理冲动，约瑟夫二世要求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做出一些特定的变化，削减一些需要庆祝的宗教节日，废除宗教兄弟会，规管从宗教游行队列、朝圣到葬礼仪式的种种天主教礼仪。约瑟夫二世采取这些措施，既是出于实际或者经济的考虑（工人们不能在宗教节日工作，宗教游行和教堂装饰耗费大笔钱财，以及葬礼和公共卫生等），也是出于神学意义上的考虑（约瑟夫二世认为凡是出于迷信的宗教活动都要被禁止）。这些法令中最为激进的一项出现在1784年，约瑟夫二世规定婚姻等同于民事合约，并且他从天主教会手中夺走决定婚姻是否合宜（例如结婚双方是亲属或其中有人是离异人士）的权力，将其交给世俗法庭。虽然基督徒夫妇仍然由神父或牧师主持婚礼，进行宗教宣誓，但是如今国家开始介入国民的婚姻并通过机构进行控制，而这在过去只是教会的专利。[注]这项立法没有创造一个世俗婚礼的模式，但是至少正引导人们和社会向这个方向前进。

1781—1784年，约瑟夫还签发了一些限制贵族们对领地上农奴进行人身控制权力的法令。这项干预意义重大，以废除农奴制闻名后世。从此以后，农民可以不必经过领主同意自由结婚、自由迁移，还可以不必经领主允许任意选择职业。[注]法令同时还限制领主体罚农民或向农民罚款的权力。不过直到1848年革命之前，仍然有一些属于农奴制的经济要素存在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这个国家，其中尤为令人厌恶的劳役也在其中。

约瑟夫还希望让那些获得解放的农民拥有土地。随着他在波希米亚立法结束农奴制，他提到：“如果在废除农奴制度的同时，波希米亚的农民可以在奥地利的模式下得到自己的土地，那么国家的这场变革将带来更大的益处。”[注]不过这需要改革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关系，约瑟夫二世也遇到了很强大的阻力。匈牙利是反对浪潮最高涨的地方，约瑟夫二世改善农民地位和向贵族地主收税的尝试在那里受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猛

烈阻挠。

帝国、整合与定居者

统一的奥地利国家的建立过程，其中包括了这个帝国的对外扩张。尤其在它向东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作战时新开拓为殖民地的土地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相信，中央集权和行政上的改革有助于它们变成最纯粹优秀的形式。1772年，哈布斯堡王朝与沙俄和普鲁士瓜分波兰之后，将自己得到的一大块土地命名为加利西亚王国。不过在占有这一地区的同时，哈布斯堡的统治者发现要达成把这块地区与原有的帝国整合成一体的目标，还有重重行政与体制上的挑战阻挡在前方。特别是在加利西亚，在当地强制设立新的边境，需要彻底调整这一地区的通信、贸易和旅行服务网络，是使它们向奥地利靠拢，有别于波兰，以及被沙俄和普鲁士占据的波兰领地。

约瑟夫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往往视新诞生的加利西亚王国为一张白纸，认为他们可更轻松地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体制。先前为瓜分波兰的行为正名的波兰人叛乱纯属子虚乌有，它不承认原先波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甚至无视这一制度的存在。因此，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以及他们锐意改革的官僚们认为他们在加利西亚的使命是为这个据说原始野蛮、毫无法纪、统治者昏庸无道的社会提供秩序、法律、有利的社会机构以及教育。正如约瑟夫二世在1773年年初出访波兰时写给母亲的信中所说："我先前已经预见到这里的任务会非常艰巨。除了诸事混乱以外，这里还盛行可怕的派系斗争。"[注]

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人希望在此地集中展示各项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他们在王国的其他地方难以推行的。但问题在于，加利西亚绝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张可以任由发挥的白纸。加利西亚的贵族地主阶级长久以来都对本地与地区社会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他们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家——波兰与立陶宛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所谓的开明法律和机构可以扭转这一基本事实。由于当地传统权力关系根深蒂固的存在，使得如果奥地利人不在加利西亚倾注极多的资源，在当地创造一个新社会就会极其困难，而这正是哈布斯堡的统治者，特别是不断削减预算的约瑟夫二世所难以负担的。随后，虽然奥地利人试图把加利西亚奥地利化（或者照某些官员的说法"文明化"），但他们推

行的所谓开明政策被证明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被认为是加利西亚社会严重落后、混乱无序和骚乱不宁。而人们既然做出如此断言，就意味着需要在加利西亚推行新的、更强硬的集权统治；如果新的尝试也宣告失败，那么加利西亚王国的落后又会再一次成为圆场的借口。注

加利西亚不是哈布斯堡吞并的唯一一块被施以“开明新制”的领土。1774年，奥地利军队占据了奥斯曼帝国所属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北方的一小片土地，试图在特兰西瓦尼亚和新兼并的加利西亚王国之间架起一条地理上的连接通道。奥地利占据的这块土地是近来几次战争发生的战场，它根据覆盖着这一地区的繁茂山毛榉林，将其命名为布科维纳（Bukovina），意为“山毛榉之地”。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一样，成为奥地利的一个新地域单元。但与加利西亚不同的是，布科维纳没有那么多的人口，也没有阻挠哈布斯堡王朝推行其计划的本地贵族地主阶级。因此在布科维纳推行新的法律和统治机制就要轻松得多，不过这一地区稀少的人口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纳税人，布科维纳就很难支付维持新体制运作的费用。于是一得到这片土地，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就尝试招募移民到布科维纳居住，并且鼓励当地经济发展，而当地居民则负责提供奥地利人在当地维持治安的开销。不过尽管两位君主设下了开发布科维纳的种种目标，它们却不见得产生出了明确一致的政策。

当哈布斯堡的管理机构于18世纪70年代在布科维纳开始运作时，沙俄、奥斯曼帝国、波兰和奥地利已经在这一地区不断交战了一个多世纪。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很多农民群体逃往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当各个国家的军队你来我往，横扫这一地区时，这些农民常常需要迁移，这就影响了他们在布科维纳的农业选择。这一地区的农民倾向于养殖可供贸易的绵羊，然后种植一些短期即可收获的作物供自己果腹。因此，布科维纳的农民就很少有用于交易和缴税的富余农产品。注当然，以布科维纳地区的地理条件，从事农垦也并不容易，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山脚下，以及海拔更高一些的区域更是如此。

驻守地方的军队需要建立固定的农业聚落，来为他们供应食物，以及满足其他物质上的需要，因此奥地利人一在摩尔达维亚建立起统治秩序，就急迫地鼓励农民社群返回当地。不过约瑟夫二世和他在维也纳的官僚们，对布科维纳有着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希望王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迁移到布科维纳，在增加当地人口的同时加速推进它的经济发展。而这些移民或者说殖民者，可以从政府那

里得到一些土地、定期的税款减免以及家畜和种子，这些优惠与财产刺激着他们背井离乡，前往广阔未知的土地。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移民中的非天主教基督徒们还得到了宗教宽容的官方保证。由于布科维纳没有像加利西亚那样被贵族地主阶级，或者有势力的教会主宰，因此人们会更自然地设想殖民者涌入布科维纳后，这些自由、丰产、拥有土地、按时缴税、充满爱国热情的农民阶级能够创造出一个约瑟夫二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注]

生活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活动家，往往将以神圣罗马帝国（包括波希米亚）为源地向外迁移，或者把从特兰西瓦尼亚到布科维纳与加利西亚的移民活动视为从西到东的文化迁移的一部分。按照他们的理论，随着移民转移的不只是农业知识，或者更大众化的传统与习惯的迁移，更是德意志文明本身的由西向东的转移（这些活动家乐此不疲地将德意志文明的丰饶与相对贫瘠的东部文化进行对比）。持有这种倾向的一些作家宣称，移民们可能会令东部地区更加尊重那些能够缔造更先进文化的事物，例如秩序、教育和卫生。就这样，在19—20世纪，奥地利在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的人口政策被视作德意志或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尝试教化东欧与巴尔干地区的一项古老使命。在这样的解读指导下，民族主义者们自觉地被唤起了西方优越论的帝国主义立场，全球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很多后来的观察者们相信，包括约瑟夫二世在内的当时很多人，在东部地区的民族主义叙事上，使用“殖民者”这个词来塑造前往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的移民。此外，这个政权自有一套文化论调，用来为自己参与瓜分波兰的行为正名（换句话说，奥地利进入波兰，是为了给这个社会带来秩序、稳定与经济繁荣，原本这个社会常常被描述为被人忽视、混乱落后以及统治者昏庸无道），这一论调被认为与之后关于文明水平的论调是相一致的。不过在此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明确地把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使命感与之后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种族甚至人种的优越感区别开来。我们也必须质疑那些民族主义的撰史者，举个例子，他们宣称，为治理属下的加利西亚，哈布斯堡王朝采用一种撷取了帝国主义之精华的统治方式，堪比英国与法国对待它们美洲殖民地的方式。哈布斯堡政府内部关于向东部输送移民的政策探讨，事实上并不集中在关于西方文化或种族优越性的争论上；哈布斯堡政府向布科维纳输送来自西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行为，也并不是为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化。但很久之后，当民族主义者们把哈布斯堡的移民政策与约瑟夫二世的德语政

策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倾向于从上述角度来描述哈布斯堡政府的行为。

在18世纪，有关殖民者们的讨论主要囊括的是一些实际议题，它们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不同类型移民的相对效用。譬如说，人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波希米亚引进农民会对接受移民的地方更有帮助吗？还是说应当从特兰西瓦尼亚引进塞凯伊（Szekler）农民？或者让附近奥斯曼帝国属下的摩尔达维亚农民来到东部的布科维纳是更好的方式？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的官僚集团比较偏好前一种方案，但军队支持后一种。但是无论哪一种移民方式，它们都没有以文明相关的概念为中心。这些争论的中心落在是否能够满足在布科维纳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与经济需要，因此从相对效用的层面来看，布科维纳地区必须引进不同类型、拥有不同技术的移民。同时，哈布斯堡政权还需要从早先的错误中学会应对各种情况的方法。比如玛丽亚·特利莎出于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可能缺乏手工业的忧虑，曾经尝试在这两个地区引入手工业者。但很快事实证明单纯引进工匠不能促成这些地区经济的自我转型。于是之后约瑟夫二世通过他自己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实地情况的观察，制订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也更细致的移民方案。这个方案把预备迁入上述地区的农民准确迁移到特定的地区，甚至细化到某些特定的村镇。而按照他一贯的统治作风，我们也毫不奇怪地看到，他还对移民在迁入地应当建造的住屋模式大加置喙，从移民们该在什么时候建造房屋到具体的建筑材料，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为了满足军队的需求，约瑟夫二世设立了全新的村镇，这些小镇唯一的功能，就是服务当地驻军的各种需要。

臣民到公民？

1823年，伊丽莎白·豪斯纳（Elizabeth Hausner）从巴伐利亚来到维也纳，成为一名仆人。之后在维也纳的10年，她不但以仆人的身份工作，还成为一名成功的珠宝制作匠人。[注]豪斯纳终身未婚（这在她的故事中是很重要的），但因为她的珠宝生意十分成功，使得她积攒下一大笔用于开店的钱。不过由于豪斯纳是居留维也纳的外乡人，本地法律不允许她开设商店，因此豪斯纳在1833年1月申请获得帝国的公民权。政府受理了她的申请，并从警察处得到了关于豪斯纳品行的担保。4周之后，豪斯纳就已经站在维也纳市政大厅的台阶上接受公民权利和责任

的宣讲，然后跟着两名见证人宣誓，这一切手续完成后，伊丽莎白·豪斯纳得到了一份官方正式认定她为奥地利公民的证明书。

对于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奥地利移民来说，伊丽莎白·豪斯纳的故事是一个典型，它展示出哈布斯堡政权对欧洲各地迁入其领土的移民所持有的开放态度。哈布斯堡政府不但试图令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这些被战火蹂躏的地区人口再度充盈，同时还吸纳具有专业知识的农民以及掌握了新型产业技术的手工艺者，通过他们来提升生产力水平。

按照帝国获得合法公民权的要求，哈布斯堡政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授予外国男性和单身女性国家公民的身份。举例来说，在1784年，一份哈布斯堡政府的法令如此通告：“在本地居留满10年的外国人将获得本国人（Inländer）的待遇。”两年后，约瑟夫二世发布的《修订版民法通则》第一卷这样规定：“所有和睦生活在世袭领地，受到王权管辖的人，都将被视为本地居民和国家的公民。”而1811年最完善的《民法通则》版本则确认了外国人相对容易获取公民身份的规则。就像伊丽莎白·豪斯纳的故事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假如一位外国女工未婚，那么她在申请公民身份时和男性移民就没有区别。这种带有性别特点的准则并不是建立在妇女解放的基础上的，而是假定女人普遍都是男人的妻女，不是独立的未婚人士。豪斯纳能够顺利取得公民身份，正是因为她是个不符合这一假定标准的“异类”女性。

伴随着约瑟夫在位期间颁发的数千份法令，《民法通则》彻底地改变了帝国臣民之间，以及他们与新生的奥地利之间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民法通则》的第16段宣布，所有奥地利的公民都享受自然法所规定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 从理性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也因此被看作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些地方，奴隶制和农奴制，以及使用权力来达成这两种制度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民法通则》接着列举和解释了臣民们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其中每一个案例都在试图达成平等。同时，这部法典结束了贵族和教会机构享受的团体性特权。尽管当贵族与天主教会惯于享受的特权变成一种文化心态时，它们得以被保留下来，同时还有很多加利西亚人和匈牙利人进行申诉，宣称农奴制不能被废除，但是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这个

新词越来越为大众接受，暗示着在中央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

新版的《民法通则》提及国民身份时，同样非常强调如今个别的人归属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而不是过去人们归属于他们所在的区域，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如波希米亚或加利西亚）。这样一种界定了普遍公民身份的概念取代了由各个地区和它们的议会推行的各种关于“臣民身份”的不同规定。注它强调了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潜移默化地削弱了地方或区域内权贵行使的权利。譬如法典第11条规定：除非获得君主特别批准，所有州级和地区的法律，在《民法通则》公布后一律作废。于是至少从帝国法律的角度来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们已经逐渐变成了公民，并且为欧洲树立了一个国家公民的模板。

像伊丽莎白·豪斯纳一般具备条件的外国人或许可以轻松获得帝国的公民身份，但即便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地方法律仍然从其他方面继续影响着一个人在帝国内所享有的法律地位。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帝国的公民与外国居留者共同面对着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它间接挑战了关于帝国公民身份与权利的新概念。这个问题即是每一个国民，都要求有一个故乡/原籍。所谓的原籍就是一个人的家庭所在地，亦是他/她接受官方正式注册登记的所在地和有资格接受公共与教会援助的地方。一般说来，一个人在他的原籍的本地人身份，是通过教区的出生记录来确定的。但此时的问题就在于随着农奴制的衰亡和更多手工业及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频繁迁移流动，特别是从乡村到城市，出现了滚滚移民大潮。然而当这些人流动到不断扩张的城镇，他们在当地居留的身份不能使他们享受福利，甚至接受慈善救助。当工人们落入困境时，如果他们想要获得公共救助，就面临着返回符合救助条件的原籍的现实需要。至于那些不愿回乡，或者自出生起就再没见过原籍的救助申请者，就只能根据官方政策被强制驱逐。

在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内部迅速扩展的城镇掩藏在原籍要求下，以此来逃避向人口逐渐增加的城市工人阶级发放福利或进行慈善救助。当地官员也很快出台法律，把乞丐、罪行轻微的犯人以及那些依赖公共救助生存的人驱逐回他们的法定原籍。显然，这个问题和一个人的国籍关系不大，却与他/她的财产状况息息相关，因为只有申请救助，才会使驱逐的法律程序生效。因此在18世纪，对四处漂泊的工人阶级来说，地方的边界和法律相对来说更重要，毕竟穿越国家的边界更加容易，帝

国的法律也更加友善。与此同时，本地官员行动迅速地把贫民和他们的家庭赶回原籍，但正如哈拉尔德·文德林（Harald Wendelin）在19世纪前半叶对维也纳的驱逐贫民行动开展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地区性的和帝国的官员经常会要求在法律程序执行时踩一脚刹车，以便他们可以进行调查。[注]尽管这些官员最后往往还是站在本地官员一边，但是他们眼见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被迫回到遥远的家乡时仍然心怀同情，在家乡，这些移民或许已经举目无亲，也没有任何社会联系，也很可能无法在当地找到一展其才的合适工作。文德林的研究还提供了大量证据，展现19世纪的前50年中，众多奥地利最穷困的国民，为了找到一份可以支撑生计的工作而不断寻觅，他们为此跋涉的旅程长度，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注]

原籍制度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重要法律意义，以及地方当局维护驱逐贫民行动的意愿催生出一个问题：哈布斯堡政权在文化意识层面和法律层面明确表达出全民共享的公民权覆盖的范围，它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国内各阶层的人们，确实将他们自己视为一个国民整体的一部分吗？如果是这样，全民共享的公民权有什么特点？人们如何对他们自己与其他人，以及国民整体的关系产生概念？在回答上述的这些疑问之前，我们需要审视哈布斯堡的帝国范围内，全民共享公民权与忠诚心实行得最糟糕的地区——匈牙利。

从反对到公开叛乱

玛丽亚·特利莎去世后，约瑟夫二世回避了在任何一片领地上举办加冕或者就职典礼，以此避免与当地议会的合作承诺。[注]举例来说，一个匈牙利的加冕议会，会强迫约瑟夫二世听取补偿匈牙利人不满的要求。鉴于玛丽亚·特利莎自1764年起就没有再召集这个议会，到了1780年，匈牙利人压抑已久的潜在不满显然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不召开议会会议是最明智的。而由于约瑟夫二世从未召开议会会议，匈牙利的63个郡慢慢自行集结起来，以非正式的方式取代了原有的议会，它们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且组织反对国王。因此，约瑟夫二世在1785—1786年下令取消这些郡不经皇帝明确同意便可自行集会的权利，同时要求郡政府对他新任命的一批皇家特派员负责。

约瑟夫二世的后一项政策所引起的反对，是中央集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换句话说，皇帝正试图将一套全新的行政语言应用到匈牙利的土地上。1780年，哈布斯堡王朝共有4种通用的官方语言，在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使用的是德语，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使用拉丁语，伦巴第地区使用意大利语，奥属尼德兰地区则使用法语。而在地方层面的初等学校，教授课程的语言可能是其他语言，譬如波希米亚地区的学校使用捷克语，加利西亚使用波兰语，匈牙利使用匈牙利语或斯洛伐克语。但在1784年，约瑟夫二世出于政治目的，下令德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匈牙利行政机构通用的官方语言。不通德语的本地官员有三年时间学习，否则就会被撤职。

约瑟夫二世的行为实际上与民族国家意识无关，他甚至都未曾想要通过推行单一的政府公务语言来造就更大范围的社会统一。他考虑的只有效率问题。在皇帝看来，陈旧的拉丁语无法跟上18世纪科学技术与制度上的创新，因此它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沟通需要。然而替换拉丁文的官方语言选择范围非常有限，在18世纪，法语和意大利语是通行于贵族上流社会和宫廷的语言，即便是玛丽亚·特利莎本人，在写信时也会常常不自觉地在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之间转换。德语作为一种通用语，看上去是替代拉丁语成为匈牙利公务语言更实际的选择，因为它在全国的学校中都有开课教授，并且已经成为欧洲文学与科技领域的通用语言之一。

通常来说，大多数匈牙利贵族精英对匈牙利语所知甚少。匈牙利语主要是农民阶级使用的语言，不过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它却得到了贵族精英和乡绅阶层的支持。然而1784年匈牙利改换公务语言时，匈牙利语并没有成为取代拉丁语的现实选择。匈牙利的贵族们，即便是其中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都浸淫在一个被多种语言环绕的环境中，拥有日常使用多种语言的传统。一名贵族可能从他讲斯洛伐克语、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的仆人和保姆那里学会各种斯拉夫语系的语言；地位较高的贵族还会在宫廷内得到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教育，或者亲身体验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环境；同时，各地的议会和郡政府官员还会学习拉丁语，有时德语也在学习的课程之列。因此，以一位克罗地亚贵族为例，相较于匈牙利语，他就更有可能使用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拉丁语或德语。这个时期匈牙利城市中的大多数人都使用德语，尤其是来自普莱斯堡、布达和佩斯，在政治上弱势的商人和手工艺人。最后，作为一种跨区域的行政语言，德语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地方和军队中都已经被广泛使

用。故而约瑟夫二世改变匈牙利行政语言的行为将是帮助这个地区进一步与帝国其他部分融合的手段。

上述所有的考量对一位像约瑟夫二世这样理智、致力于改革的君主来说是说得通的。但是这项新语言政策在匈牙利贵族，尤其是地方层面的贵族那里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无论贫富，匈牙利的贵族们，以及那些从收入上看与普通农民差异不大的乡绅家族，具有两项将他们与其他匈牙利人区分开的特权。首先，他们可以独享成为本地和皇家行政官员的权利。与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不同，匈牙利只有贵族可以担任这类职务。其次，这些人不必缴税，尽管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期间，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的贵族失去了这项权利，但匈牙利的精英们仍然享受着它带来的好处。约瑟夫二世在语言上的改革威胁到了这些绅士贵族的第一项特权。如果身为官员的地方绅士不在三年内学习德语，他们就会失去行政职务，从而丢掉这份工作带来的收益，对于他们中很多人来说，这笔钱是生存的保障。

另一方面，约瑟夫二世决定选择德语成为帝国行政机构通用语并加以推行，这一行为的具体历史时间仍然存在疑问，而且他并不只在匈牙利这么做。约瑟夫二世偏爱德语，是出于它在18世纪成为一种文学和科学语言的新地位。但与此同时，在18世纪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范围内的爱国者的活动开始促进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复苏、现代化与推广。18世纪80年代，就在官员开始鼓励农业发展，并用当地语言印刷小册子进行宣传的时候，一些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新报刊也应运而生。那些赞同政府计划的人，比如匈牙利人拜塞涅伊·久尔吉（György Bessenyei）曾这样争辩：“民族语言是文化的一把钥匙……而培养语言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首要责任。”德语在文学和科学领域新崛起的力量，并没有令同一时期存在的其他语言走向衰退，就像R. J. W.埃文斯曾注意到的，德语成为其他本地语言的一个楷模，它的崛起令它们学会了如何跟上时代，以及提高人们的使用率。这种发展情况让约瑟夫语言改革计划中的一些中立派感到失望，他们要在德语化进程开始时面对本地语言的推广行动，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抵制。注

接着，约瑟夫二世采取的一项行动威胁到了匈牙利贵族们的第二项特权，即免税权。当约瑟夫在匈牙利推行人口普查，来协调匈牙利本地与国家其他地方的征兵状况时，他的行为引来了当地人的疑虑，他们认为国王此举的深层目的，是要效仿其母玛丽亚·特利莎30年前在波希米亚

和世袭领地上的改革，向匈牙利的贵族阶级征税。[注]甚至约瑟夫二世于1785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核查（土地清册）的计划，也遭到全国各地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皇帝征收新税的序幕。[注]事实上，这项新调查是为将来简化地税奠定基础，1789年2月，一份新出台的《税收与农业条例》把全国贵族们最害怕的事变成了现实。这部法律将几十年前玛丽亚·特利莎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私人领地上使用的体系对外推广了出去。从此以后，所有世世代代作为佃农的国民（即所谓的乡下农民），只需支付一笔单一税，税额为他们每年出产的30%。[注]这笔单一税金被分为两块，占据农民全年收入12.2%的一部分由中央政府收走，剩下占农民年收入17.8%的税金归本地地主所有。这部法律终结了农民所要负担的其他义务，其中就包括为人们所痛恨的，大多数佃农仍然要向领主支付的强制劳役。因为从理论上，劳役的价值被计入了单一税的征收金额内，故而农民不必再另行服役。

大多数贵族害怕这项改革会大幅度削减他们的收入，这项顾虑是有充分理由的。以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为例，过去领主们可以获得佃农年收入的25%—42%，远远高于新法所规定的比例。加利西亚地主们因为新法受到的潜在损失或许更甚。[注]对过去享受完全免税待遇的匈牙利贵族们来说，情况甚至更糟。农奴劳役制度的终结，将给那些拥有庞大地产，多年来依靠这种近似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经营产业的贵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适用新法的只是那些世世代代都是佃户身份的农民，但是贵族地主们害怕一旦其他农民（即那些直接为地主工作，而非租用土地的农民，俗称“主日农民”）了解到这些改革，他们也会提出相似的要求。[注]无论如何，考虑到约瑟夫二世在公民权上的态度和独立生产的重要性，他将新法的安排适用范围扩大到主日农民身上显然只是时间问题。那些拥有地产的贵族们害怕的就是这个，认为这会彻底摧毁他们经济生存的必要条件。[注]事实确实如此，假如这部法律生效，许多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贵族就不得不出售他们的庄园地产。如果没有农民阶级贡献强制劳役，贵族们就没有足够的人手来耕种他们的土地。这个结果将造就一个哈布斯堡的改革者们从18世纪40年代起就致力于创造的更高效的小地主社会，但同时它也给很多贵族带来了灾难。[注]

新法颁布造成的冲击，加上人们对约瑟夫二世其他多项改革产生的愤怒，把帝国带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上一次这个国家面对类似的局

面，还要回溯到1741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入侵西里西亚的时候。皇帝本人的几位顾问激烈抗议1789年颁布的新法，约瑟夫二世不得不推迟新法生效时间，直到1790年土地清查工作完成。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农民们拒绝像新法计划的那样一并缴齐所有税款。在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民众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当地的反对派领袖则开始组织一场武装叛乱。匈牙利的税制改革恰逢行政中央集权化和公务系统中德语的推行运动，几项因素结合起来，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反对风暴。雪上加霜的是，当1787年奥斯曼帝国对沙俄宣战时，由于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结成了同盟，约瑟夫二世不得不违心地投入战局。而就在20万奥地利军队在巴尔干泥足深陷之际，约瑟夫二世在另一方面遭遇了危机。[注]普鲁士新君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1744—1797）于1790年，和奥斯曼帝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同盟。普鲁士察觉到当下哈布斯堡政权的虚弱，于是向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派遣代理人，并表现出准备侵略波希米亚的迹象。[注]此时在匈牙利，许多郡内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贵族要求召开议会，取代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他们声称，由于约瑟夫二世从未加冕为匈牙利国王，那么他颁布的一切法令都是无效的，而鉴于议会拥有选举国王的传统权力，那么它自然可以为匈牙利选择另一个王朝的新国王。

本书到此，是时候提及约瑟夫二世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设立的一个机构：秘密警察。在曾任加利西亚首任总督的约翰·安东·冯·柏尔根伯爵（Count Johann Anton von Pergen，1725—1814）指导下，约瑟夫二世建立了一支国家秘密警察。这支部队具体的建立目的，我们至今不得而知。隶属秘密警察部队的特工由国家供养，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并不是奥地利人的专利。据说约瑟夫二世希望这支部队可以监察公共意见，留意可疑的国内外人员，同时监督官员们的言行举止。然而据约瑟夫二世的传记作者德雷克·比尔斯的说法，约瑟夫二世对间谍的评价很低，声称“他们（间谍）唯利是图，并不真正办事……而且往往弄得一团糟”。皇帝给予柏尔根伯爵那点可怜巴巴的财政预算同样反映出他对间谍之道缺乏兴趣，伯爵得到的金钱只够他雇用两名助手。[注]

这支规模极小的部队都做些什么呢？他们可以干预人们的信件往来，不过约瑟夫二世认为，这种行为不能“损害邮政事业的声誉和国民的自由”。此外他还不断强调，应当允许人民在无害于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批评政府。事实上，比尔斯反复提醒读者，这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其组建目的更像是满足约瑟夫二世尽知天下事的不懈渴望，而非维护社会治

安。尽管如此，在约瑟夫二世执政的最后一年，当匈牙利和尼德兰地区酝酿叛乱之时，这支部队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皇帝还重拾了过去的一些审查形式。基本上，他从柏尔根所领导的秘密警察那里得到的，都是关于1789年以来，精英贵族们政治上的不满已经开始显现燎原之势的消息。[注]

不只是柏尔根的间谍们，许多约瑟夫的心腹顾问都害怕农业改革在贵族阶级中引发的政治后果。不久前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奥属尼德兰激发起民众极大的热情，贵族中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叛乱。因此约瑟夫二世派驻当地的大臣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处境日益危险。"[注]面对整个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重病的约瑟夫二世不得不选择让步。此时已经来不及挽救奥属尼德兰的情况，但皇帝承诺将召开匈牙利的议会。当这一举动也无法平息反对浪潮时，约瑟夫二世不得不撤销他在10年执政期间推行于匈牙利的大多数政策，并且承诺会把存放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王冠送回布达的城堡。[注]"这是我的意愿，"约瑟夫这样写道，"为了平息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庄园中那些可以想象的，大致上说得通的怨言，所有从我即位以来普遍推行的适用法令，如今将一并撤销。一切都会回到先女王陛下去世时的状态。"[注]不过约瑟夫仍然保留了一些改革的成果。对非天主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实行《宽容法令》，以及废除农奴人身奴役的法令得到保全。约瑟夫在之前的同一份文件中继续写道："我衷心地希望，匈牙利可以通过这份法令，得到我时时刻刻渴望通过立法让它享受到的幸福快乐和良好秩序。"

不过当约瑟夫二世私下写信给他的兄弟兼继承者——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时，他用"诸事不幸"来描述他之前从事的工作。他还在信中颇具个人特色地补充道："无论是我精心的安排还是我本身，都遭到忘恩负义的可怕评价和对待。"这令约瑟夫二世困惑不已。"我甚至不敢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也没有力量推行我支持的事物。"[注]写就这封信还不到三周，约瑟夫二世就去世了，这时距离他49岁生日只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就轮到利奥波德收拾兄长遗留下的残局了。

反对派与民族主义

当利奥波德离开佛罗伦萨，来到维也纳即位后，他尝试与反叛的臣

民重建和平，并试图保护整个国家脆弱的统一状态，忙得不可开交。为了从兄长混乱的统治所造成的一系列冲突事件中挽救国家，利奥波德二世采取了一些战略性让步。他客气地聆听人们连篇累牍的抱怨，并勉强自己表现出对贵族们以及他们偏狭顾虑的同情。为了取信于人，利奥波德二世即位后当即同意加冕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在此之前，他的兄长约瑟夫二世始终拒绝这么做。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国王的加冕给了当地议会机会，当利奥波德二世宣誓捍卫地方传统时，议会成员们向他提出了主权要求。新皇帝不厌其烦地邀请地方议会（或者用他们称呼自己的名称“公民议会”）向他申诉不满。于是全国地方议会贵族们掌握的庄园抓住了新朝给予的机会，试着强调或重新夺回一些他们特权地位中失去的东西。

过去匈牙利的领导者们主张本地精英拥有影响最为深远的权利，以此和约瑟夫二世的侵入相抗衡。如今帝国其他地方已经几十年未召开的议会，也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修辞，让动摇不定的权力平衡倾向于有利自己的一方。而他们的利用方式，则使我们看到人们对“国家”（nation）这个词的理解产生了一些相对新鲜而细微的变化。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两种对它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在匈牙利和波兰的传统情况下，它指代的是那些拥有政治特权的人（noble nation）；而另一种被索南菲尔兹等人推崇的解释，则认为它仅指代所有国民的祖国。不过这个词还有第三种解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们有时会把各州看作个别的国家，比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或匈牙利。玛丽亚·特利莎在1750—1751年颁布的政治遗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份文件中，她特别批评了手下的行政官员过于频繁地为自己“国家”谋取利益的行事方式，这意味着官员们所属的各州（波希米亚或匈牙利）触犯了整个祖国的整体利益。但谈到行政改革时，玛丽亚·特利莎又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看作她继承的一部分领地，这与她把匈牙利看作个别“国家”的举动又是矛盾的。在玛丽亚·特利莎心中，匈牙利的地位始终是特殊的，毕竟这个国家在1741年是决定新即位的她生死存亡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却不这么看待匈牙利，也拒绝加冕为匈牙利国王。

现在，“国家”又有了第四种解读。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都曾经非正式地提及，众多的“国族”组成了他们庞大的国家。在这个例子中，“国族”的划分事实上依据的是人们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玛丽亚·特利莎在1747年的诏令中曾提到所谓的“波希米亚地区语言”，即现在我们所知的捷克语。1784年，当匈牙利人抗议在当地强制推行德语为行政语言

的政策时，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德语是我的帝国中使用的通用语言，为什么我非得在个别州使用一种民族语言来处理法律和公共事务？”[注]约瑟夫二世在这里，将匈牙利语界定为一种特定的“民族语言”，强调了它的地方性特征。这样一来，在约瑟夫二世心目中具有帝国通用语地位的德语就和匈牙利语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当这种解读涉及哈布斯堡王朝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约瑟夫二世究竟把德语看作神圣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通用语？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对我们来说也可能如此），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在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拥有的名义地位与他们作为正在形成的新奥地利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常为许多作者弄混淆。在某些场合，约瑟夫二世甚至称德语为真正的母语和全国的国语。

正如法国的革命者们用强调法兰西民族身份的方式团结他们的国家，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也试图用一种普遍的国家公民身份，让内部差异明显的国家团结一致。而他们的反对者采用“国族”这个词，致力于用一种保留了各地不同的权利与特权的联邦主义来对抗帝国的中央集权化。约瑟夫二世去世后，继位的利奥波德二世为恢复稳定局势，同意地方议会召开会议，于是上述的这个逻辑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些议会强调他们的“国族权利”，希望以此恢复议会的特权。但一旦其中一个地方议会强调属于它的“国族权利”，就很可能会遭到对此有不同定义的另一个议会的反对。1790年，当利奥波德二世同意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举行加冕仪式时，波希米亚议会宣称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应是波希米亚国王统治的领土的一部分，它们应共同归属于那顶著名的圣瓦茨拉夫王冠之下。[注]但是摩拉维亚议会的成员在布拉格的国王加冕典礼上拒绝认同波希米亚方面的结论。他们坚持摩拉维亚是波希米亚或捷克范围内独立的一个“国家”，并且请愿要求在摩拉维亚再举办一场地位相当的仪式，作为布拉格加冕仪式的补充。摩拉维亚人的请愿，体现出当时的许多人只是单纯从政治、历史（历史概念上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或地域（摩拉维亚在地域上是不同于波希米亚的另一个国家，尽管在这两个彼此相邻的行政区域，居民们所使用的语言彼此非常相似）的方面来理解国家的概念，而不是从民族或者人们所使用语言的角度进行理解。[注]

此时波希米亚议会试图与哈布斯堡政府重新谈判，讨论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而“国族”这个词的第五种理解，就来自议会向利奥波德二世提交的观点。议会试图游说新皇与波希米亚贵族拟订一份新协议，他们使用“nation”这个词来特指代表议会的精英政治集团，这群人通常包括

贵族、教会，偶尔还有一部分市民。在波希米亚议会指代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权政治团体中的一些成员视他们自己为所有波希米亚居民的代表，在与国王面对面时，这些人自诩为人民之声。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波希米亚议会在利奥波德二世和他的儿子弗兰茨的国王加冕典礼（利奥波德二世加冕于1791年，弗兰茨则在次年继位）仪式的部分环节上使用了捷克语。斯拉夫语言学者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ph Dobrovský，1753—1829）量身准备了波希米亚国王加冕演说上使用的捷克语，它采用的是极其正式和古雅的风格，与当时绝大多数波希米亚农民或城市居民所使用的捷克语大相径庭。[注]

这一语言包容性层面上的象征性行为，表示出波希米亚贵族并不真的希望在日常对话中使用捷克语。根据一位波希米亚贵族家庭教师弗朗蒂舍克·马丁·佩尔茨尔（František Martin Pelcl，1734—1801）的总结，波希米亚的神职人员一般使用拉丁语，贵族阶级说法语，商人、中产市民和公务员日常用德语交流，而只有“一部分市民阶层与农民群体”才使用捷克语。多布罗夫斯基同样在1791年声称捷克语是“庶民大众采用的语言，但也是这个国家最具道德教化意义和启发意义的部分”。事实上，对那些偏爱用法语交流的贵族来说，德语差不多和捷克语一样原始且粗鲁。此时距离教育家约瑟夫·荣格曼（Joseph Jungmann）说服波希米亚社会还有10年，荣格曼想要让波希米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捷克语与法语、意大利语或德语等级相仿，也能成为地区性语言，因此它的作用不能被限制在满足最低阶层人士交流需要上。因而在加冕典礼这样一个场合使用捷克语，包含了波希米亚与古老的中世纪波希米亚王国之间的自觉联系，并且暗示议会是代表全波希米亚人发声，而不仅仅代表传统政治集团的利益。

在18世纪晚期维也纳的中央集权政策中，无论有没有被使用，捷克语都渐渐被看作波希米亚自治的一个象征，并且代表了宣称代表当地人民的精英集团在政治上的建国意识。维也纳一方面以德语作为帝国官方行政用语，另一方面又鼓励在地方习惯和教育上使用本地语言，这项双重政策使人们越来越关注一个正在无意中形成的语言等级结构，和随之产生的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划分。[注]鉴于这种情况，哈布斯堡政权致力达成的国民平等和人民的民族观念两个目标，产生了政府平等对待帝国范围内所有语言的需要。

那么各地议会希望从利奥波德二世那里得到什么呢？总的说来，他

们想要恢复到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改革之前的社会状况。波希米亚议会甚至希望能够复活选帝侯制度，让国王和年度议会分享立法权，同时废除向贵族征税和免除农民对领主各项义务的措施。皇室的世袭领地提出了差不多的要求，希望恢复贵族的权力，并重开农奴制度。虽然利奥波德二世废除了约瑟夫二世最激进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替代了劳役和实物税的新现金税收制度），但是总的来说，利奥波德二世还是试图保存他母亲和兄长共同打造的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架构。

战争与新的奥地利国家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它越来越激进的进程很快就引起欧洲其他统治者的深深忧虑。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因此他的忧虑要更甚于他人。法国的革命党政权在1792年春天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同年9月，法军出人意料地在瓦尔密大败普奥军队。从此，身处革命狂飙浪潮中的法国将整个欧洲拖入了长达25年的战争中。1792年3月，就在即将成功化解兄长留下的危险局面之际，利奥波德二世猝然去世。利奥波德的长子弗兰茨（1768—1835）继位，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随后他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祚，成为新生的奥地利帝国首任皇帝弗兰茨一世。但与伯父和父亲不同，这位君主并没有继承他们开明革新的统治风格。弗兰茨的执政期很长，他在位的头20年，一直在避免与法军再次发生军事冲突，战端一旦再开，就会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在这样的前提下，哈布斯堡的国家建构就鲜有首创措施，再加上弗兰茨一世本人谨慎小心的性格，所有意料之外的需求都会导致他采取保守和防御性的措施，以维持现状。[注]不过，弗兰茨一世仍然把自己看作服务于国家和法律的忠实仆人，这一点和他的父亲与伯父如出一辙。此外，他也和前两位哈布斯堡的君主一样，继续国家中央集权化的重要进程。然而与其父不同，弗兰茨一世毫不赞同宪政改革。而在官僚体系上，弗兰茨一世也与其伯父的理念迥异，他的官僚机构并不致力改革社会，它们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和法制。

弗兰茨皇帝心目中完美官员的典范同样也和约瑟夫二世的版本不同。他的官员们要达到约瑟夫二世所制定的严格标准，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得到的报酬却因为可怕的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而缩水。此外，官员们的私生活也同样成为国家利益所关注的对象。在约瑟夫二世的时代，皇

帝并不关心手下的私生活，他在意的是一个人能否良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时移世易，由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社会动荡被普遍认为是个人道德堕落的产物，故而弗兰茨一世在位期间，一名奥地利人如果想要谋求官职，遴选者会更加看重他的私生活情况，而不是他个人的才智与成就。可以说，如今一位奥地利官员（以及他的家人）的道德和宗教虔诚度比官员本人的教育程度和经历更加重要。[注]这种倾向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死亡与性别，如果一位官员的遗孀想要得到补助，她就要保持自己的道德“完美无瑕”；同样，这位去世官员的女儿如果希望获得奖学金，前往女子学校深造，她的品行也必须完美无缺。

漫长的战争紧急状态终结时，弗兰茨一世对国家公务体系服务宗旨的态度随即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与哈布斯堡的前两位君主不同，他相信皇权和州贵族们的利益非常重要。因此，一位历史学家对弗兰茨一世治下的政府体制做出这样的评价：尽管弗兰茨一世在位期间，仍有不少支持约瑟夫二世施政方针的官员留任，但是整个体制“在机构设置上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员们的行动却表现出贵族化和极端的保守”[注]。

战争最开始的几年，由于农业收成意外地好，食物价格尚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在这之后，漫长的战争导致了奥地利各地，特别是城镇中的通货膨胀与食物短缺。1795年，政府开始印刷纸币来支付战争的额外开销。1797年，人们对拿破仑可能攻占维也纳的恐惧引发了一场金融大恐慌，导致白银完全退出了国家流通体系，公务员和国家债权人也不得不接受纸币作为新的支付手段。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战时急剧恶化。但与此同时，人们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注]开战的第一年，维也纳纺织业的熟练工们公开抗议雇主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没有技能的女工和童工。[注]此时抗议的工人们只倾向于指责他们的雇主，而不是本地被雇用的妇女。20年后，当人们开始袭击面包店，从放钱的抽屉里取出纸币，将它们撕碎公开取乐时，这些纺织工业的绅士们在全国范围内都赚得盆满钵满。多亏战争带来的大量制服和军需订货合约，以及此后拿破仑对全欧洲大陆进行的英国货封锁禁运政策，全奥地利的纺织工人都获利良多。[注]

战争同样令哈布斯堡政权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国家可能会被颠覆的

恐慌，而这种情绪随着战事的延长而与日俱增。从1800年开始，哈布斯堡的官员首次宣誓对国家忠诚，此后年年如此。哈布斯堡政权同时开始限制社会上那些可供颠覆行为乘虚而入的领域。政府首先关闭了共济会社团，并且严厉镇压了在维也纳、蒂罗尔、匈牙利、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秘密活动的所谓“雅各宾派阴谋分子”。这些所谓的“雅各宾派阴谋分子”因18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的激进政治团体得名，包括了曾经在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在位期间领有公职的公务员和受过教育的人士，他们希望能给弗兰茨一世的统治注入更多改革的方向。这些改革者普遍支持的方案，相较于1790年的改革标准来说并不算太激进，但这些方案中确实包含了一些最激进的同谋者制订的计划，譬如在全帝国范围内召开人民国会。虽然这些人暗示他们并不质疑帝国本身的存在，只是质疑帝国的统治模式注，但是他们被警察抓捕后，都受到了极其严酷的惩罚，甚至有一些人被处以死刑。虽然有上述的例子，在18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城镇内，咖啡馆和其他社交集会场合受人欢迎的程度仍然没有因为战争而削弱。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只能说城镇里的咖啡馆在人们的社交活动中有了新的位置，成为人们交流和辩论战争最新消息的地方。

另一方面，在20多年的战争中，弗兰茨皇帝一直拒绝调动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就在其他几位中欧国家的君主——尤其是普鲁士国王，正着手实施针对重建军事力量和培养大众对战争支持的改革计划之时，弗兰茨一世对此却百般不愿，做得极为勉强。任何促进社会改革或者调动民众热情（这可能更糟）的事物，一旦不受约束，就很难控制。因此，就轮到其他人来提振这个新兴的哈布斯堡王朝，乃至弗兰茨一世在1804年宣布成立的奥地利帝国的战时声望。早在1796年，当驻扎在北意大利的法军逼近奥地利边境时，下奥地利总督弗兰茨·约瑟夫·冯·沙劳伯爵（Count Francis Joseph von Saurau）委任诗人利奥波德·哈什卡（Leopold Haschka）撰写诗篇，激发人们为奥地利事业奋斗的爱国热情。之后沙劳伯爵又说服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为诗谱曲，后者把这部作品命名为“大众之歌”。随后在1797年2月12日弗兰茨一世寿辰当天，这首已经更名为“皇帝颂”或“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的著名歌曲首次在全帝国的剧院中表演（皇帝本人在宫廷剧院中聆听了这首歌）。注到了19世纪，这首歌被翻译成帝国的各种方言四处传唱，最终成为奥地利帝国的国歌。

最后，在与法军三战三败（分别在1793年、1799年和1805年），

又被外国势力占据了一些领地之后（巴伐利亚占据了蒂罗尔，法国则夺走了奥地利帝国亚得里亚海新领地的一部分），弗兰茨一世不得不批准一些谨慎改革奥地利的措施，来培养人们的战时爱国主义。这段短暂的改革和同时期普鲁士的改革截然不同，我们在审视这些改变时，必须十分清楚其中轻重缓急的区别。但无论如何，哈布斯堡政府采取的几项改革确实帮助皇帝的臣民们树立起了更强的使命感和认同感。皇帝的兄弟兼陆军元帅查理大公（1772—1847）负责进行了所有行政改革中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他撤销了25名将军职位，采用更人性化的军规，推行最新的预备部队理念，并且推动创造一支广受欢迎的国民自卫军的计划。弗兰茨一世则宣布他要让整个社会享受更自由、更具理性的生活（其中包括他对文学的支持），同时要建立更多的学校。不过如果人们期待弗兰茨一世会废除审查制度，那他们或许就要失望了。自然，人们也不能期待他改革秘密警察的职能范围，弗兰茨一世不但利用秘密警察监视普通奥地利人，还监控自己两个广受欢迎的兄弟。[注]

就在1809年奥地利准备第五次反拿破仑同盟作战之际，皇帝受人爱戴（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比弗兰茨一世更有才干）的兄弟约翰大公（1782—1859）将奥地利男性组织成一支民兵警卫队，关于他本人的事迹，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中了解更多。约翰大公组织的民兵警卫队驻扎于哈布斯堡王室世袭领地的各州和波希米亚，全国18—45岁尚未入伍的男性都必须义务加入。与此同时，政府在匈牙利也建立了与此相似的组织，称为“义军”。然而在加利西亚，由于政府怀疑波兰民族主义精英可能对拿破仑心怀同情，拿破仑也许诺会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于是没有在当地设置民兵，而是用预备部队取而代之。[注]

民兵警卫队作为全奥地利范围内的跨区域爱国机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由于它象征性地动员了全奥地利的人民，民兵们还承诺将跨区域执行防御任务，这支民兵组织事实上表现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遥不可及的统治者，而是不分阶级、不分老少世代，甚至有时不分性别地与每一个奥地利人有关，他们牺牲自我，保卫所有人的共同利益。1813年，就在警卫队成立4年后，第六次反拿破仑联合作战，亦被称作解放之战期间，画家约翰·彼得·克拉夫特（Johann Peter Krafft）描绘了一个下定决心的年轻人穿上民兵制服，握着步枪，在奔赴战场前与家人告别的景象。这幅广受欢迎的画作名叫“民兵出发”，它把民兵描绘成所有奥地利人的牺牲和为了共同的事业付出的热情的化身。[注]

《民兵出发》的绘画场景是在家庭内部。它描绘出一座朴实乡间小屋的内部景象，屋子里的家具和装饰陈设暗示了这一家人殷实的家境。画作描绘的场面也涉及一家几代人，其中展现了民兵的父母为儿子哭泣和祈祷，而民兵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正与他依依惜别的景象。在屋子里的画面上，还有另一位民兵处在从属性的地位。如果透过窗户往外看，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士兵在屋外的丘陵上整装待发。从民兵的神态看，他没有受到任何强迫。士兵坚定的表情充分表现了他保卫祖国的意愿。而尽管正在送别他的家人很清楚战争将带来怎样可怕的结果，他们仍主动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民兵的母亲掩住了哭泣的脸；他的妻子却紧握着丈夫的手，没有移开视线，也没有哭泣（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民兵的妻子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这或许是克拉夫特希望描绘出的一点：在大众共同的事业面前，妇女需要像男子一样做出牺牲。



《民兵出发》，约翰·彼得·克拉夫特绘于1813年（© Belvedere, Wien）

《民兵出发》这幅画没有赞助者，它的出现完全是作者克拉夫特个人灵感激荡所致。这幅画立即为克拉夫特带来了极高的赞誉，并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其他艺术家效法的模板。弗兰茨一世皇帝在1815年购买了这幅画，在把画收藏入皇家画廊之前，他将它公开展出。两位著名的版画作者把这幅画制作成蚀刻版画销往整个帝国，使得《民兵出发》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也令克拉夫特享誉四海，被称为“祖国的杰出画

家”。[注]这幅受到众人欢迎的画作主题还常常出现在当时其他的物质文化形式上，比如瓷器绘画、玻璃绘画和纪念章。[注]

民兵或许是帝国的一个大众形象，但是地区状况往往决定了他们作战的原因。与此同时，在帝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尤为重要，是因为在此时地区层面上的需要往往会以特别的方式与整个帝国的事业产生联系。蒂罗尔公国以及围绕着起义领袖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的流行传说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法军在1796年首次进犯时，当地国民自卫军不论阶级动员人民抵抗一支正规军的程度，可以从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起来，勇敢的蒂罗尔人！》中看出来，这首歌用本地方言勉励人们，并在结尾的时候宣告：“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对祖国的爱”，“我们只拥护一位主君，那就是弗兰茨一世皇帝”。不过当时对蒂罗尔和奥地利帝国之间关系最普遍的理解，仍然是传统的互尽义务关系，两者并非有机整体。弗兰茨一世保护蒂罗尔的传统权利与作为政治国家的自由，反过来，蒂罗尔人也为他们的皇帝忠心耿耿地战斗。

然而签订于1805年，终结了奥地利在第三次反法同盟中作用的《普莱斯堡和约》，让蒂罗尔成为邻近的巴伐利亚的附庸。巴伐利亚试图将自己的那一套中央集权的宪法和新的宗教法施用于蒂罗尔地区，引起了当地人强烈的反抗。1809年4月，奥地利再次对法国宣战。此后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其为查理大公谱写的军队声明中，特别将奥地利的事业解读为为全奥地利人的自由而奋斗，施莱格尔这样写道：“欧洲在你们的旗帜下寻求自由，你们的胜利将打碎她的枷锁。”这份宣言意在提醒处于巴伐利亚统治下的蒂罗尔人，奥地利即将前来解放他们。拿破仑自然以牙还牙，通过针锋相对的宣言来破坏帝国的统一团结，拿破仑宣言针对的目标是匈牙利，他邀请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奥地利，不过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拿破仑的邀请“几乎无人响应”[注]。

就在此时，安德烈亚斯·霍弗在与维也纳方面就军费与武器问题展开秘密谈判之后，已经成功领导蒂罗尔人起兵反抗巴伐利亚在当地的统治。霍弗能说德语和意大利语两种语言，他曾在波尔扎诺（Bozen / Bolzano）以北经营一家旅店，又曾当选蒂罗尔地区的议会代表。在霍弗的领导下，蒂罗尔民兵和狙击手们迅速驱逐了巴伐利亚人，重建了因斯布鲁克地区的奥地利统治（以及更加重要的蒂罗尔本地传统）。皇帝也在5月承诺，他将重建蒂罗尔本地议会，并且绝不会签署任何阻止蒂

罗尔和奥地利再度结合的和平协议。然而尽管6月在阿斯佩恩被查理大公击败，一个月后法军在距离维也纳不远的瓦格拉姆大胜奥地利人。于是当双方在10月签订《维也纳协议》时，奥地利不得不向法国人付出巨额补偿，并缩减了军队规模，把包括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卡尔尼奥拉的亚得里亚海领地尽数割让给法国，最后，奥地利也被迫同意将蒂罗尔交给巴伐利亚人。

在放弃蒂罗尔的时候，弗兰茨依照昔日的传统，仅仅把这块州当作马匹交易的场所（这点已在第一章中提到），但在蒂罗尔人心目中，皇帝却远不止是一位君主，而且他们如今十分明确地把奥地利看作自己的国家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蒂罗尔人对奥地利帝国剩余领土的忠诚与利害关系，超过了来自维也纳方面冷酷无情的国家建构考虑。因此在蒂罗尔被维也纳放弃之后，当地人还在继续进行反抗法军的零星游击战，直到1810年1月霍弗最终被逮捕，被押解往拿破仑所在的曼图亚要塞。尽管梅特涅试图从中调解，拿破仑还是审讯了霍弗，并在当年2月将其枪决。注霍弗顽强抵抗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战斗或许在1810年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但他的死很快在天主教氛围极其浓厚的蒂罗尔被塑造成崇高的烈士殉难，从而成为蒂罗尔人反抗暴政和为奥地利极尽忠诚的强大神话。在奥地利帝国处于低谷的黑暗日子里，这类神话对奥地利人的爱国热情和国家荣耀贡献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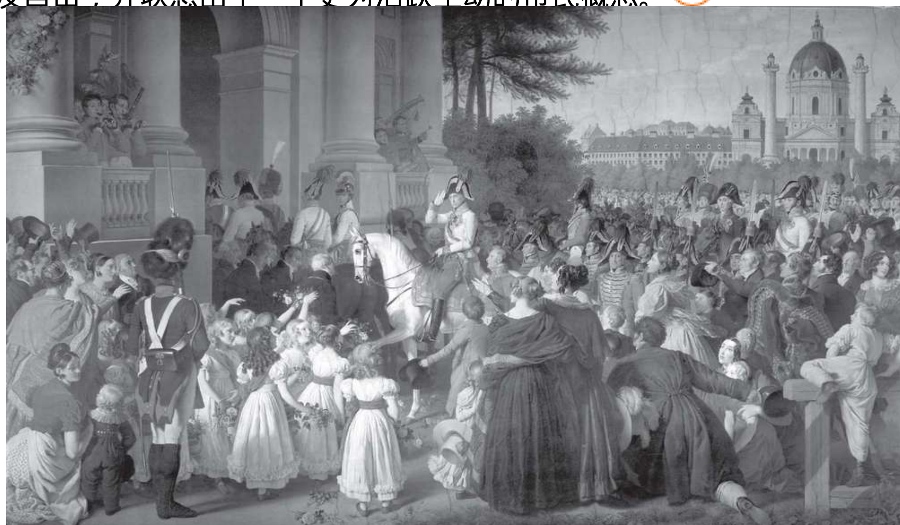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流逝，霍弗的传奇开始为两种互相关联却截然不同的主张服务。一个是它通过神化蒂罗尔民族独特的勇敢和独立精神，加强了蒂罗尔地区特殊主义的概念。而另一个相关的主张，则是从整个帝国的各个领地表现出的勇气、虔诚与爱国主义入手，把几种美德兼备的蒂罗尔放在众多地区的首位。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许多人认为蒂罗尔地区的特殊性主要落在它对待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秩序特别出众的忠诚。注蒂罗尔的情况同样表明了一点：尽管索南菲尔兹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应当由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决定，但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在一般大众的帝国神话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享受和平的大众帝国

1814年6月，随着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弗兰茨一世从巴黎班

师回到维也纳。在奥地利皇帝的归途中，中欧地区沿路欢庆，在各个城镇中，庆祝活动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城镇过去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度受到或至少象征性地受到皇帝的管辖。在这些地方的街道和房屋上，随处可见庆祝胜利的旗帜，人们还匆匆树立起许多凯旋门，轮番赞颂皇帝为和平的统治者、光荣的征服者、教皇的解放者、人民之父或德意志的皇帝。6月15日，皇帝抵达位于郊外的美泉宫，次日启程前往维也纳城。皇帝在卡林迪亚门受到了维也纳市长和547名男女儿童的欢迎，这些孩子们穿着象征维也纳的红白两色服饰，女孩们戴着花环，男孩们戴着月桂冠。随后皇帝从城门口沿着鲜花点缀的狭窄街道迂回穿过老城，抵达圣斯蒂芬大教堂聆听感恩颂。到了晚上，维也纳所有居民的住宅都灯火通明，民众使用来自经典传说的图画、各种比喻和标语，庆贺弗兰茨一世拥有胜利者与传递和平者的诸多美德。

当天夜里，戏迷们聚集在卡林西亚剧院，欣赏约瑟夫·冯·松莱特纳（Joseph von Sonnleithner）的寓言剧。在这部戏剧中，和平女神击败了战争恶魔，并决定永久停留在“最公正的皇帝”统治下的奥地利。随即有50对穿着各式各样民族服饰的夫妇代表全奥地利的人民（他们按照各个州的历史身份来界定是否属于奥地利人）在女神身边围成一个半圆，庆贺她的这一决定。女神教育人们要团结一心，于是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蒂罗尔人以及上、下奥地利的人民都宣誓以所有奥地利人的名义向她效忠。这个寓言取代了过去20多年在奥地利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性爱国主义训诫，转而展现大众承诺和平带来的统一新面貌。但同时正如布莱恩·维克（Brian Vick）教授所指出的，在寓言中，组织者们同样提及自由，并联想出了一个更为活跃主动的市民概念。



约翰·彼得·克拉夫特笔下的皇帝弗兰茨一世于1814年6月16日班师回维也纳的场景。这幅画原本是1828—1832年，霍夫堡宫的一组画作之一（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如今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庆祝活动的具体细节，还要归功于一位维也纳公务员约瑟夫·罗西（Joseph　Rossi）兢兢业业的工作。他将所有的庆祝活动整理归档，总结为两卷书籍。[注]在罗西的第一卷作品中，包括了维也纳以及城郊男女居民点起灯火照亮房屋的描写与绘画。从中我们了解到，维也纳的犹太人如何以“节俭但聪明有品位的方式”庆祝皇帝归来。[注]罗西的第二卷著作也以不亚于前一卷的详细程度记载了帝国其他地方类似的自发庆祝活动，以及“亮灯”庆祝方式在全国的流行，它不仅发生在城镇，还发生在规模最小的乡村。这些庆祝活动并没有经过中央政府创造、设计、推行，甚至提议，不管怎么说，在很早之前，政府中用来承办此类活动所需的金钱都已经消耗殆尽了。[注]这一次是由本地商人、公务员和地主主动发起，并且出钱资助了所有的庆典。此外，地方志愿委员会组织的爱国庆典，往往会被用于筹款建造医院，以治疗战争中的伤者。从以上种种看来，至少上述活动反映出千千万万分散各地的奥地利人共同拥有一个对帝国正统化的理解。它们还表现出人们有着以帝国的概念为中心的独特和可以共享的意象、标语和仪式文化。

罗西在撰写他的著作时，曾经向全国各地的官员求助，请求他们寄来当地庆祝活动的记录，这样读者们就可以阅读到全国上下庆祝战争最终结束与皇帝归来的庆典全貌。罗西搜集和了解到的信息使我们见识了地方对帝国的理解，以及超越了地理、历史和语言运用的分歧，全国各地共享的庆典文化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范式、习俗、标语和图像。暂且不论举办庆典的各个地方广布全国，也不论人们在交流时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在较大的城镇中举办的活动，事实上彼此之间颇为相似，而维也纳的庆祝活动无非更加盛大、隆重罢了。尽管在地方官员的报告中，他们强调了一些能给本地庆祝活动增添一些独特之处的细节，但是像树立凯旋门，在市政大厅举办演讲，老兵与民兵在市镇广场伴随乐队游行，演唱《皇帝颂》，在教堂举办感恩弥撒，接着在夜里点亮灯火……即便是在奥地利帝国最偏远的角落，官员们的记录中都表现出了帝国庆典文化在各地显著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带给我们的强烈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罗西的记录中，详细地收录了对各种各样的人群，例如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新教徒，特别是犹太教群体举办的庆祝活动的详细描述。此外，罗西的庆典记录还详细记录了那些小型的村庄对居民进行布道或者举办演讲时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德语、斯拉夫语（罗西用这个

词来指代那些在波希米亚、卡尼奥拉、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南施蒂利亚使用的语言）还是意大利语。

罗西试图通过他的书来描写全体奥地利人民和奥地利全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举办爱国庆典活动的景象。不过书中这种同时性的地域和时间维度则完全取决于1814年6月消息在帝国各地传播的速度。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较大城镇，活动举办的时间是7月16日或者17日，但在较小村落中，人们差不多要到月底才开始组织庆典。如果往更远的东方去，利沃夫的庆祝活动在7月29日举行，切尔诺夫策的庆祝则要到7月31日才开始。不过在罗西列出的记录目录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种同时性和统一性的印象。即便不同的城镇在不同的日子进行庆祝，人们都是在收到喜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欢庆。

罗西提到的文化差异元素同样巩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与文化统一共同框架。在罗西的描述中，皇帝在各个不同地区的臣民们或许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用彼此迥异的语言，以惊人相似的方式表达出忠于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一致情感。从哈布斯堡统治的中欧各地共享的大众庆典文化中，可以反映出人民这种团结一心的意识。

就在我们思考19世纪初正式形成的新奥地利国家在群众中受到的广泛欢迎时，我们同样应当意识到罗西的记录中关于社会统一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它的出现并非人们有意为之。由奥地利帝国不同地区的市民阶层占据主导地位的相似庆祝模式，暗示了在这之前社会上就存在着一种可以辨认的地区间社交文化。这种文化吸收利用了特殊的象征符号、文本和图像，在参与者中创造出共同的参照点。而这些参照点正是建立在中等学校教育的各个要素之上的，尤其是对经典历史、神话和文学的广泛引用。同时地区间社交文化的众多参照点还依靠欧洲的大众图像、演说以及爱国主义和公民道德的各种象征符号，譬如旗帜、帽徽、衣着范式以及国歌等。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些事物在人民大众中广受欢迎。此外，正是奥地利的市民阶层，取代了财政破产而捉襟见肘的国家，组织和举行从的里雅斯特到利沃夫的广大国土上的庆祝活动。纵观整个奥地利帝国，当房产业主、宗教社群以及志愿团体为这次盛事点亮他们的住宅、城镇广场和街道时，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标语、比喻、诗篇、图像和神话来源。总的说来，就像许多农民群体把帝国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看作他们对抗本地领主专横势力的保护者一样，这种歌颂帝国的

大众文化在帝国的正统化方面起到了与前者不尽相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奥地利帝国的版图

不过在此仍然有一个问题：一个在弗兰茨皇帝统治下处于守势的保守帝国政府，能够主动为农民、知识分子或手工业者阶层谋求潜在利益到何种程度呢？玛丽亚·特利莎、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联手缔造的大众帝国，能够在弗兰茨一世防御性的立场上兴旺发达吗？如果帝国中枢拒绝进行弗兰茨一世的前任们曾经从事的积极改革，那么支持帝国的民众是否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呢？人们以弗兰茨一世的重要顾问的名字，将之后的几十年命名为“梅特涅时代”，或“前三月时期”（指1848年3月革命之前的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大众意愿的崛起，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开始推动一个大众帝国的进步，这个帝国反映出人民大众的潜力，这令皇帝忌惮不已。

---

1. 马斯基尔，启蒙思想家，领导18—19世纪欧洲犹太人吸收启蒙运动精华，令犹太人群体更好地融入欧洲社会的哈斯卡拉启蒙运动。——译者注

2. Quoted in Derek Beales, Joseph II, vol. 2, Against the World, 1780–17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86.

3. Quoted in ibid., 204.

4. Quoted in ibid., 486.

5. 以1748年的牧函为例，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君主国本身动用公共资金时，需要对每一个臣民负责。”Quoted in Beales, Joseph II, vol. 2, 347, and in William Godsey,“Habsburg Government and Intermediary Authority under Joseph II (1780–1790): The Estates of Lower Austr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EH 46 (2014): 728.

6. 关于约瑟夫二世在语言、启蒙等方面的作为，以及提升捷克语、克罗地亚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地方语言在公务场合的运用等内容，参见R. J. W. Evans, “Joseph II and Nationality in the Habsburg Lands” in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Essays on Central Europe c. 1683–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4–146。

7. 关于玛丽亚·特利莎在世与去世后对她个人形象的描述发展，详见Werner Telesko, Maria Theresia: Eineuropäischer Mythos (Vienna: Böhlau, 2012)。

8. T. C. W. Blanning, Joseph II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26; Laurence Cole, Military Cultur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33, 62.

9. 约瑟夫二世在他的第一段婚姻中育有一个女儿，但她在7岁时夭折。

10. Beales, Joseph II, vol. 2, 56, quoted in Godsey,“ Habsburg Government and Intermediary Authority,” 700.

11. 约瑟夫二世还下令拥有大学学历的公务员在全国城镇，甚至是贵族的庄园中主持公道。同时维也纳、布拉格、鲁汶、布赖斯高的弗莱堡、利沃夫以及之后的克拉科夫与帕多瓦等大学，拥有了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力。至于格拉茨、因斯布鲁克、布尔诺等曾经拥有大学名号的学院则不能再颁发博士学位。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Bürokratie unf Beamte in Österreich 1780 bis 1848 (Vienna: Böhlau 1990), 69, 97.

12. 根据Johann Pezzl估计，1787年，一个勤俭的单身汉在维也纳一年的开销需要467弗罗林。许多学生依靠担任贵族儿童的家庭教师维持学业。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180.

13. Ibid., 23–24.

14.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1780—1815年），这个样本中亲王和大公的人数占总体人数的0.5%—1%，伯爵的人数占7.6%—8.5%，男爵的比例亦基本持平。至于具有军方背景或者被授予贵族头衔的公务员比例稍有降低，从45%降至41%。而与此同时，平民公务员在全体同僚中所占的比例从37%上升至41%。这场调查所涉及的职位数目，从1781年的495个上升到1811年的618个。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147.

15. See ibid., 226, on separation of workplace and home.

16. Pezzl, quoted in ibid., 227

17. Ibid., 185, and later, especially on Vormärz period.

18. Ibid., 22.

19. Beales, Joseph II, vol. 2, 46–47; 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26–28.

20. From a decree of March 1786, quoted in 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30.

21. Reproduced in the excellent series of volumes edited by Balázs Trencsényi and Michal Kopeček,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1770–1945). Texts and Commentaries. Volume I, Late Enlightenment—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Idea’ (Budapest &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1.

22. Quoted in Miroslav Hroch, Na prahu národní existence (Prague: Naučná literatura - Politologie 1999), 49.

23. 范·史威坦男爵（Van Swieten）还是一个二流作曲家，以及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资助人。他的父亲是玛丽亚·特利莎的宫廷医生杰拉德·范·史威坦（Gerard van Swieten），杰拉德在1755年受玛丽亚·特利莎派遣，调查所谓的摩拉维亚吸血鬼。See his Abhandlung des Daseyns der Gespenster nebst einem Anhange von Vampyrismus (Augsburg: Andreas Mayer, 1768). 关于历史课程方面的内容，可见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109–111。不过Heindl注意到，这门课程很快就在Martini手上宣告结束，Martini相信，学生们在较低一级的学校内，已经学到了足够的奥地利历史知识。Ibid., 110–111.

24. Quoted in Beales, Joseph II, vol. 2, 91.

25. Beales, Joseph II, vol. 2, 93–94.

26. Ibid., 95.

27. Ibid., 311. 该准则要求，无论在哪里新建学校，都要做到让90%的学龄儿童上学路程限定在步行半小时内。

28. 根据比尔斯所写的内容来看，约瑟夫二世没法控制他事无巨细、样样经手的毛病。他坚持要求学生们不能使用非正式的第二人称单数互相致信。此外，皇帝还要求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情况下对学生施以体罚，要授予教师们额外津贴，以及“他们（教师们）在村镇中的地位应当仅次于治安官之下”。Joseph II, vol. 2, 311–312.

29. Politische Verfassung der deutschen Schulen in den kaiserl. königl. deutschen Erbstaaten (Vienna: k. und k. Schulbücher Verschleisses bey St. Anna in der Johannes- Gasse, 1812), 150–154.

30. Beales, Joseph II, vol. 2, 168.

31. See Beales, Joseph II, vol. 2, 170. 如果把哈布斯堡王朝与英国进行比较，随着《宽容法令》的颁布，确认并保障异教徒权利的法律已经深深扎根于地方法典内，这就意味着哪怕改朝换代，对帝国新教徒、东正教徒以及一位论派教徒的宗教宽容也不那么容易被撤销。

32. 对少数犹太人口的研究，可见Beales Joseph II, vol. 2, 197–201, 其内容引自Horst Glassl, Das österreichische Einrichtungswerk in Galizien (1772–179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5), 189–192; P. G. M.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ia,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ere vol. I, 444; Gabor Vermes提出，1772年，在匈牙利有7.5万名犹太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则有1 000人，见Gabor Vermes, Hungaria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711–1848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U Press, 2014), 25。

33. 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帝国的意大利领土推行新法的时间是1781年，维也纳、下奥地利、摩拉维亚在1782年，匈牙利在1783年，加利西亚在1785年和1789年两度进行。原本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加利西亚的方案，但约瑟夫二世的死断送了这件事。Michael Silber,“ From Tolerated Aliensto Citizen Soldiers,” in Pieter Judson and Marsha Rozenblit, eds., Constructing Nationali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Berghahn, 2005), 19–36, here 21, 32 (note #8). See also Beales, Joseph II, vol. 2, 196–213.

34. Beales, Joseph II, vol. 2, 204–205.

35. 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本身或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都没有参与讨论，也没有发表意见。Silber,“ Tolerated Aliens,” 21.

36. 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皇帝下达了征兵命令，这引起了军事委员会的抗议。然而约瑟夫二世不为所动，在1788年6月命令所有哈布斯堡领地上的犹太人都要服从征兵安排。See analysis of the debate in Silber,“ Tolerated Aliens,” 21–25.

37. Quoted in ibid., 26. Silber注意到政府向一些犹太人关心的问题做出了让步，譬如为犹太人单独提供制服，这些制服内不含有犹太教规禁止使用的混合纤维。不过政府拒绝了关于犹太人组成独立建制的要求。

38. Ibid., 30. 直到与法国交战期间，普鲁士军队才开始招募犹太人，在时间上远远落后于奥地利。

39. Beales, Joseph II, vol. 2, 207–212; see also Michael L. Miller, Rabbis and Revolution: The Jews of Moravia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specially 40–52.

40. Paula S. Fichtne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490–1848 (New York: Palgrave, 2003), 82; Beales, Joseph II, vol. 2, 316–326.

41. 约瑟夫的法律预先考虑到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家批准的离婚，以及教会内再婚的可能性。Beales, Joseph II,vol. 2, 322–323.

42. 加利西亚流传的版本是要求给予愿意迁移的农民一小块土地，来交换他们原本拥有的。Robin Okey, The Habsburg Monarchy c.1765–1918: From Enlightenment to Eclip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 42.

43. Beales, Joseph II, vol. 2, 252.

44. Quoted in Larry Wolff, 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

45. Svjatoslav Pacholkiv, “Das Werden einer Grenze: Galizien 1772–1867” in Grenze und Staat. Passwesen, Staatsbürgerschaft , Heimatrecht und Fremdengesetzgebung in der ö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1780–1867, Waltraud Heindl and Edith Saurer, ed, unter Mitarbeit von Hannelore Burger und Harald Wendelin (Vienna: Bölau, 2000), 520–522; Wolff , The Idea of Galicia, 22–27.

46. In general on Bukovina in the 1780s and 1790s, Kurt Scharr,“ Erfolg oder Misserfolg? Die Durchsetzung des modernen Territorialstaates am beispiel des Ansiedlungswesens in der Bukowina von 1774–1826,” in Hans-Christian Maner, ed., Grenzregione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Ihre Bedeutung und Funktion aus der Perspektive Wiens (Mainz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Volume I),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On the exist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lack of large landowning nobility, 58.

47. Scharr,“ Erfolg oder Misserfolg,” 52.

48. 奇怪的是，虽然豪斯纳以珠宝制作商的才能闻名，她却希望开一家女帽店。For this story, see Hannelore Burger,“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in Heindl and Saurer, Grenze und Staat, 88–172, here 154–155.

49. 某种程度上，这项有意识的对外开放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8世纪40年代，当时为了补充西里西亚宝贵的人口与技术人员的缺失，玛丽亚·特利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50. Burger,“ Staatsbürgerschaft ,” 98.

51. 这是一个既没有婚姻状况描述，也没有道明家系的外国人申请国民待遇案例。读者若想了解更多对《民法通则》中性别期望的更多批评，以及法律中女性的家庭地位的核心概念，可见Gabriella Hauch, Frau Biedermeier auf den Barrikaden. Frauenleben in der Wiener Revolution 1848 (Vienna: Verlag für Gesellschaftskritik, 1990), 22–24; 60–63。

52. See the assessment by Helmut Rumpler, Eine Chance für Mitteleuropa. Bürgerliche Emanzipation und Staatsverfall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enna: überreuter, 2005), 108–111.

53. https://www.ris.bka.gv.at/ Dokument.wxe?Abfrage＝Bundesnormen&Dokumentnummer = NOR12017706 (accessed 23.10.2015). 关于奥地利帝国和奴隶制的内容，见Alison Frank,“ The Children of the Desert and the Laws of the Sea: Austria, Great Britain, the Ottoman Empire,and the Mediterran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no. 3 (June 2012)。

54. 一开始这个词更多是为了区分外国人和本国人，较少强调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国民之间的平等。这个词的演化过程可见Hannelore Burger,“ Passwesen und Staatsbürgerschaft,” in Heindl and Saurer,Grenzeund Staat, 95–105。

55. 威廉·戈德西（William Godsey）中肯地指出，就在约瑟夫二世的统治逐渐显露出对统一性的偏好，以及地方议会的重要性逐渐削弱的倾向时，议会在一些重要的，特别是一些财政方面的问题上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Habsburg Government and Intermediary Authority,” 699–740.

56. Harald Wendelin,“ Schub und Heimatrecht,” in Heindl and Saurer,Grenze und Staat, 173–343.

57. 见文德林在其文章中以精到的手法列出的表格（“Schub und Heimatrecht,” 295–323.）。在被维也纳方面逐回原籍的人中，女性只占了1/4—1/3，或许这是因为移民女性移居某地并在当地结婚之后，她的原籍就和其丈夫的保持一致。至于那些被驱逐的女性，平均来说，她们被驱往离维也纳更近的地方的比例要远高于男性。

58. 在1765年的典礼上，约瑟夫二世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59. R. J. W.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Essays on Central Europec. 1683–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6–137.

60. 在这个时期，新的征兵法同样在蒂罗尔地区强制推行，也同样招致了强烈的反对。Okey, Habsburg Monarchy, 46. 先前匈牙利进行的人口普查中，总是将贵族人口排除在调查之外，这次约瑟夫二世取消了这个惯例。（Beales, Joseph II, vol. 2, 478.）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匈牙利的总人口超过800万，而之前估计的数据只有500万。对贵族人口的统计也出现相似的情况，他们实际有近20万人，远超先前估计的3万人。因此匈牙利就占了帝国差不多一半的人口，而贵族人数要9倍于之前的猜测。

61. 从技术层面上，许多管理者也怀疑这样一个调查能否最终完成。举例来说，当了解到测算全国的土地需要200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耗费40年时，约瑟夫二世决定给农民们提供指导和工具，鼓励他们加入土地清查工作。到了1786年年末，这些农民清查员已经完成了奥地利75%的土地清查工作，其中包括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至于清查的数据是否准确，1930年，一份来自波兰的评价显示，加利西亚的原始清查结果数据大多数是可信的。Beales, Joseph II, vol. 2, 492, 566; Okey,Habsburg Monarchy, 51.

62. Charles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4–205; Beales, Joseph II, vol. 2, 592–597.

63. Okey估计，加利西亚的贵族在这次改革中失去了多达60%的年收入。Okey, Habsburg Monarchy, 51. Ingrao,Habsburg Monarchy, 205, 有报告称，一个典型的哈布斯堡王朝农民，一般会将其70%的出产收入用来交付各式各样的税。

64. 因格劳估计，这类乡村农民占波希米亚农民的20%。Ingrao, Habsburg Monarchy, 205.

65. 在此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拥有庄园地产，尤其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许多贫困的贵族实际上与农民并无区别。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648–184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4) 2:289.

66. 对贵族来说，他们除了在新体制下收入减少之外，还面临着另一个有关问题，国家依然希望他们能够在地方上履行保管档案记录和司法行政的职责。

67. 哈布斯堡军队获得了数次胜利，甚至从奥斯曼帝国军队手中夺下了贝尔格莱德。这令约瑟夫二世在国内的民望上涨了一些。Beales, JosephII, vol. 2, 580–581.

68. Ingrao, Habsburg Monarchy, 207–208.

69. Beales, Joseph II, vol. 2, 554.

70. Ibid.

71. Quoted in ibid., 611–612.

72. On the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of the crown, and on its return, Vermes, Hungarian Culture and Politics, 84, 97.

73. Quoted in Beales, vol. 2, 629.

74. Quoted in ibid., 628.

75. Quoted in Anna M. Drabek,“ Patriotismus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 in Bömen und Mären,” in Patriotismus und Nationsbildung am Ende des Heiligen Röischen Reiches, ed. Otto Dann, Miroslav Hroch, and Johannes Koll (Köln: SH Verlag, 2003), 156.

76. 这顶王冠与匈牙利的圣斯蒂芬王冠一样，长期以来被保存在维也纳。利奥波德二世准备通过把王冠归还布拉格的举动，象征性地安抚波希米亚议会。

77. Drabek,“ Patriotismus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 154.

78. Hugh LeCaine Agnew,“ Ambiguities of Ritual: Dynastic Loyalty, Territorial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Last Three Royal Coronations in Bohemia, 1791–1836,” Bohemia 41 (2000): 1–12.

79. 利奥波德二世在布拉格的大学中设立了一个捷克语教授的职位。

80. 弗兰茨身陷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这件事，并不能反映出他性格中尚武好战的一面。当然这也并不表示他有任何雄心壮志去重塑欧洲，甚至像他的顾问们要求的那样去强势干预法国局势。与他的伯父约瑟夫二世不同，弗兰茨是一个不情愿作战的战士，他亦常常表现出谨慎的天性。

81. Heindl,Gehorsame Rebellen, 45–47.

82.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152.

83. 1754年，维也纳拥有175 609名居民；到了178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06 120；到了1807年，更上升至242 523。Maren Seliger and Karl Ucakar, Wien Politische

Geschichte 1740–1934. Entwicklungund Bestimmungskräfte grossstädtischer Politik, 2 vols.(Vienna and Munich:Jugend und Volk, 1985), vol. 1, 165.

84. Wolfgang Häusler,“ Von der Manufaktur zum Maschinensturm. Industrielle Dynamik und soziale Wandel in Raum von Wien” in Wien im Vormärz (Vienna and Munich: Jugend und Volk, 1980), 32–56.

85. 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265. 这段文献叙述了战时因为通货膨胀，帝国中等阶级公务员陷入贫困的情况。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帕瓦在战争时期因为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政策”而获利，其地方经济获利的相关记载可见Faustin Enns, Das Oppaland oder der Troppauer Kreis, nach seinen geschichtlichen,naturgeschichtlichen, bürgerlichen und örtlichen Eigenthümlichkeiten. 4 vols.(Vienna:Carl Gerold, 1835),vol. 1, 152–154。

86.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248 fn. 8.

87. Hugo Schmidt,“ The Origin of the Austrian National Anthem and Austria’s Literary Effort” in Austria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ed. Kinley Brauer and William Wright (Minneapolis, MN: Center for Austrian Studies, 1990), 163–183; Laurence Cole, Military Cultur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6.

88. Macartney, Empire, 182–183. On the patriotic press during this period, Silvester Lechner, Gelehrte Kritik und Restauration. Metternichs Wissenschaftund Pressepolitik und die Wiener ‘Jahrbücher der Literatur (1818–1849) (Tübingen: Max Neimeyer Verlag, 1977), 56–60.

89. Macartney, Empire, 185.

90. In German, Der Abschied des Landwehrmannes. See Werner Telesko, Kulturraum Österreich. Die Identität der Regionen in der bildenden Kunst des 19. Jahrhunderts (Vienna: Böh lau 2008), 43.

91. Telesko, Kulturraum Österreich, 43–44. 这幅画由于太受欢迎，在1817年，皇帝下令克拉夫特再画一幅《民兵归来》作为呼应。

92. Brian E. Vick,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ower and Politics after Napole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p. 2; Kothgasser, in Walter Spiegl,“ Das Glas im Biedermeier,” in the excellent exhibition catalog Bürgersinn und Aufbegehren. Biedermeier und Vormärz in Wien 1815–1848. Katalog der 189. Sonderausstellung des Historischen Museums der Stadt Wien (Vienna: Museen der Stadt Wien, 1987), 214–217. On literary patriotic texts, see Karen Hagemann,“ ‘ Be Proud and Firm, Citizens of Austria!’ Patriotism and Masculinity in Texts of the‘ Political Romantics’ Written during Austria’s Anti- Napoleonic Wars,” German Studies Review 29 (2006):41–62.

93. Macartney, Empire, 188.

94. 霍弗的故事实际上要比在本书中的大略梗概更加复杂，还包含了许多背叛与理解失误的元素。1818年，霍弗的家族被弗兰茨一世皇帝授予贵族身份。

95. 历史学家劳伦斯·科尔（Laurence Cole）在他的多篇优秀作品中分析了霍弗的神话，以及后来它广泛的用途。See“Für Gott, Kaiser und Vaterland.”Nationale Identität der deutschprachigen Bevölkerung Tirols, 1860–1914 (Frankfurt a/M and New York: Campus, 2000), especially 225–322.

96. 《 民兵出发》和《民兵归来》的作者克拉夫特在 1830年接受弗兰茨皇帝委托，描绘皇帝凯旋的景象。这幅画后来成为霍夫堡皇宫接见室内历史组画的一部分。Telesko, Kulturraum Österreich, 50; also Telesko,“Der Hofburg-Zyklus Johann Peter Kraffts in Die Wiener Hofburg 1835–1918. Der Ausbau der Residenz vom Vormärz bis zum Ende des“ Kaiserforums,”ed. Werner Telesko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12), 32–36.

97. Brian Vick,“ The Vienna Congress as an Event in Austrian History: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Habsburg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Wars against Napoleon,” AHY 46(2015): 123. Vick在其作品中提供了一些1815年大众的帝国爱国主义表现案例，这些例子同样也表现出当时（1815年）人们对未来政府可能采取各种形式的政治改革的希望所组成的复杂图景。

98. Denkbuch für Fürst und Vaterland, Herausgegeben von Joseph Rossi, 2 vols. (Vienna: J. B. Wallishausser, 1814–1815). 我要感谢Vick提醒我这些了不起著作的存在。

99. Rossi, Denkbuch, I: 82–83.

100. For examples of comparable popular celebrations in urban England in the 1740s, Kathleen Wilson, The Sense of the People: Politic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 1715–17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ecially 140–164.

101. Rossi特别提及了的里雅斯特人民的热情，当地的庆典活动除了帝国其他地方同样的内容，还增加了庆祝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重归奥地利管辖的内容。（考虑到这些地区在经济上与威尼斯的竞争关系，他们的情绪不难理解。）Rossi写道：“人们从每一扇窗户中，都听到用本地居民的各种语言不约而同发出的欢呼：‘弗兰茨皇帝万岁！’，‘愿奥地利的统治千秋万代！’”此后Rossi又注意到，的里雅斯特的庆祝游行队伍停在总督府外，的里雅斯特各个民族的代表在这里和军队以及平民领袖聚集一堂。Rossi,Denkbuch,II: 349–350.

第三章｜矛盾的帝国（1815—1848）

因此，当国家眼下无力完成一些事时，就由私人为祖国服务，至少循序渐进，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莫里茨·冯·施图本劳赫（Moriz von Stubenrauch）于1857年统计奥地利帝国国内社团时说

在奥地利帝国击败拿破仑之后，群众在1814年自发举办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大众庆祝活动。如果说一个特定的奥地利帝国前不久才在拿破仑征服铁蹄的阴影下产生，它如今已经成功激发出众多国民的想象。当年玛丽亚·特利莎为这个正在形成的国家奠定了体制的基础，尽管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行为，但它很快为这个国家赢得了相关利益集团，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忠诚。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这个正在发展演变的奥地利国家同样成为正在兴起的中产阶层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定属性，他们从这个国家中，看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种种可能。约瑟夫二世试图一视同仁地将所有宗教群体置于国家控制下，这一举动得到了帝国内一些少数派宗教社群的忠诚。而随着1811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地将国内臣民们各不相同的法律地位转化为一种法定的公民身份，这种公民身份打破了过去传统的阶级或者文化模式，承诺所有国民一律平等。注

哈布斯堡王超在1815年缔结了长久的和平之后，开始继续它的中央集权化行动，但它如今没有走上18世纪那些改革君主们关于社会改革转型议题的老路。尽管当下帝国处于和平稳定时期，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和他最具分量的顾问们对体制合理化改革的兴趣亦与日俱增，但他们还是回避了所有会带来社会重大转变的尝试。此前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带给奥地利帝国君臣一个教训：要带着怀疑去看待所有的社会变革。弗兰茨一世不像其他君主，相信改革能够消弭潜在的革命，他的看法恰恰相反。对弗兰茨一世来说，改革很容易破坏社会的微妙平衡，产生类似导致法国革命爆发的大众社会运动。

奥地利帝国如今这个惊人保守的政权，正管理着一个活力十足、飞速发展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当下正需要革新。奥地利帝国刚从长达25年

的几乎不间断的战争中坚持下来，它的各个地区现今迎来了农业产出、人口规模、贸易与手工业的显著增长。技术革新与新的公司行为促成了本地商业性质上的改变。道路、桥梁、运河、高耸的工厂烟囱和铁路网连同新型农业实践一同改变了帝国的地貌。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曾经试着改造整个帝国的经济生活，经过几十年战争的干预之后，他们的期望终于开花结果，变为现实。[注]而尽管随着拿破仑对奥地利的英国产品封锁禁运结束，奥地利国内一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遭到重大打击，但帝国的工业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往往出现无规律的爆发增长，而全国各地的发展也并不一致。

众多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地方的管治架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和福利方面。尽管此时没有出现18世纪时的帝国内的社会煽动分子和经济变革，但在19世纪的前50年中，后拿破仑时代的奥地利政府还是得不断努力，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事实上，1815—1848年，农民、企业家、技术人士、学者……正是这些地方社会上独立的群体开始继续过去的开明专制君主们——譬如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所推行的帝国愿景，并成为它们强大的支持者，而这往往与当下政权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奥地利的中产阶层和贵族们为了解决瘫痪的政府不愿处理的地方社会问题，创造出了新的活动形式。他们组织公民社团来改善男女同胞们在这个迅速变化社会中的文化、教育、道德和经济状况。他们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用来代替国家停止资助的地方学校，同时建立科学与文学社团，建造地方上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外，这些社团与其组织人士还引进新技术，并在当地应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新发明。地方社会的支持者们通过这些行为来追求贯彻他们自己对帝国的想象，而塑造这个想象的许多方式，都来自18世纪晚期国家行动主义者做出的承诺。

当然，一方面，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哈布斯堡政权小心翼翼，而且经常心怀疑虑地对待这些积极主动的行为。而另一方面，财政困窘的奥地利统治者对公民独立解决耗资巨大的社会问题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甚至有时鼓励的态度。不过在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的政府中，仍有不少官员担忧，由公民独立建立、服务于大众公益的社团组织潜藏着颠覆公共秩序的威胁。据说梅特涅曾经把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上的公民组织斥为“德意志的瘟疫”，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法国大革命期间，弗兰茨一世就曾经宣布共济会为非法组织，并且残忍处置了在奥地利初

露头角的雅各宾派社团。

1848年的革命带给当时的奥地利帝国政权一个戏剧性的收场。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严厉批评当时帝国统治者短视且心胸狭窄的镇压行动，为了支持他们辉格党式的历史视野，这些学者倾向于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描述为一段错失良机的悲剧性时期。研究冷战的历史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追根溯源，认为在那一段时期，中欧东部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倒退。这些学者们强烈谴责暴虐的哈布斯堡政权压迫市场力量和民主发展，认为它们使东欧与当时的西欧产生差别。然而本书的这一章就要进行论证，向读者展示在开明君主止步不前的领域，奥地利社会如何应对创造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

强势的国家，弱势的国家

奥地利帝国政权对国民社会运动产生的忧虑，与半个世纪前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们干预社会的强大改革思潮并不一致。早前的哈布斯堡君主们设计了一个扩大的官僚体系，用来作为对抗地方贵族根深蒂固势力的强大变革工具。他们鼓励手下官员主动在社会各个层面发起新的社会经济实践。但如今哈布斯堡政权命令它的官员们维持（有时甚至是僵化）现状。尽管官僚体系内仍有一部分人继续积极支持奥地利经济社会进行生产力改造，但哈布斯堡政权对变革近乎偏执的厌恶，以及它审查甚至刺探国民的癖好，都已经“扬名”全欧洲。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一说法，那就是梅特涅当政的哈布斯堡政权作为独裁政权，成功镇压了所有进一步参与公民生活的要求。不过事实上，梅特涅所掌控的绝对权力国家从未像他和他的反对者乐于宣称的那样彻底绝对权力独裁化。注同时代对奥地利嘲笑不已的人们和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提到，奥地利有着一堵由审查制度、特务和全面镇压组成的高墙，但奥地利社会并不孤悬在这堵高墙之内。尽管政府时常镇压市民社会的种种举措，同时限制所谓“外国思想”在奥地利的影响，它却不能有效地聚拢财力与人力，有效应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可怕的经济危机，以及1815年后政府在社会控制技术上的诸多限制。此外，梅特涅希望在奥地利社会中杜绝传播的所谓“外国思想”，实际上这最初正是奥地利本国土生土长的产物。

不过在此还有另一股至今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重要力量削弱了哈布斯堡政权的镇压行为——法律。虽然人们反复指责奥地利专制的国家压迫，实际上奥地利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其运作一概遵守法律规则，而非统治者或地方权贵独断专行的一时心血来潮。这项事实提醒我们奥地利帝国存在的另一串矛盾。在帝国1815—1848年的历史中，它们往往未被人所知，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首先是专制统治的概念与形成弗兰茨一世统治基础的约瑟夫二世式体系中合理化和一体化的元素之间的矛盾。哈布斯堡政权坚持约瑟夫二世中央集权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传统，这致使它倾向于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各个统治区推行一个一致的、系统化的普遍行政体系。这套体系强调程序和制度上的同意，因而导致全帝国的行政管理官员对所谓的形式合法性极为敏感。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奥地利培养了“一个极尽严谨地维护法治的法律制度”[注]。当地方贵族不满中央政府的干涉时，地方行政官员就会引述帝国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来回应这些抱怨。帝国政府或许会启动一些秘密的监控程序，或许会审查报纸与杂志，或许会检举起诉政治犯，但它的行为必须合法，必须符合受到认可的正当程序。在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等地，政府还必须遵守《民法通则》的条款。所以说，在19世纪的前50年，在法律程序上奥地利人既是公民，也是皇帝的臣民。[注]维也纳方面致力于促进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以便让奥地利帝国达到它的目标，与它所统治的领地达成一种更集权化、更理性化的关系。

然而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哈布斯堡政权为了维持现状，对改革目标的再定位挫伤了一些在奥地利官僚系统中鞠躬尽瘁的官员的积极性。一些在维也纳或各州首府工作的高官对严重违反审查法的行为侧目，他们因为接到监视社会的新命令而感到困窘。一些帝国的高层官员还匿名在小册子上激烈批评政府，这些行为在19世纪40年代尤为盛行——当然，这些小册子都在国外出版流传。官员们严词谴责当下哈布斯堡政体的僵化，以及政府把他们当作毫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者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地利社会（包括很多官员本身）对官僚系统的认知出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转变，官僚系统成为社会潜在发展与繁荣的阻碍。之后到了19世纪，奥地利帝国中这种自我批判的倾向达到了高潮。照瓦尔特劳德·海德尔的说法，有人曾大胆想象，奥地利帝国的官僚系统可能正是1848年革命爆发的原因。[注]

不过令官僚们堕落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被严格限制的职能。官员们在社会流动中日渐下行的状态也引发了阶级内的强烈怨恨。在先前的20多年战争期间，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与停滞不动的薪资水平双重夹击，政府部门和奥地利社会中的其他很多社会部门一样，员工实际收益大幅缩减。战后的20年，除了位居官僚体系最高位的少数权贵，这些国家公仆再也没有回归昔日的财务安全水平。1815年之后，那些希望通过子弟进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在社会阶层上更进一步的家庭，亦对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锱铢必较的表现感到不满。

同样，由于财力上的限制，国家按照决策者的期望，彻底完成长期中央集权化目标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我们可以想象这段时间的奥地利帝国，它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把既定的目标转化为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此时的哈布斯堡政权考虑到从事产业创新或革新社会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危险，表现出犹豫和恐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能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而当面临资源短缺时，就如我们所见，这个时期的奥地利统治者往往全然不求新求变，而是选择采取不彻底的折中办法解决问题。弗兰茨一世政权在改革层面的冷漠程度，与它对公共教育或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创新举措的敌意成正比。帝国政府的各位大臣们有时会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促进经济发展，就需要满足奥地利商业与学术中产阶层亟待解决的需求。弗兰茨一世皇帝也常常以个人身份，对奥地利最穷苦阶层的困境表示同情。然而先前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奥地利背上了沉重的长期债务，因此它的重要政策往往受到其政府审慎的财政方针影响，这一时期帝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当时奥地利大学预科学校和大学的录取率，在1815—1848年出现了明显的降低。虽然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学公开显露敌意的表现（哈布斯堡政权认为大学是培养政治反对派的温床），或者是政权意图减缓社会阶层流动的尝试，降低高等教育机构入学率的政策很可能只是政府短视的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但不可否认，时不时弥漫在预科学校和大学内的压抑气氛更多是源于哈布斯堡政权在政治上的恐惧，而非政府对学校的预算削减。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在哈布斯堡政权努力限制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同时它统治的地区社会活力又与日俱增的矛盾下，如何准确估量这一矛盾带来的影响。就经济方面而言，我们不能像很多人一度断言的那样，认为哈布斯堡政权对工业社会冲突的恐惧使其反对采取新经济计划。毋庸置疑，奥地利的专制主义并未阻碍该时期经济的增长，正如

一些专研冷战领域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当时中欧与东欧的这部分地区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1815—1848年，政府在扩张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修建了诸多道路、运河、铁路和航线。此外，哈布斯堡政权部署调控了税收政策，改革专利法，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同时还鼓励创办新型工业。[注]

谈到社会与公民生活时，人们更难评估哈布斯堡政府无情的保守主义在这一方面造成的影响。奥地利的资本家和不断增加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国家官员）开始像他们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同伴一样谋求分享政治责任。此外，哈布斯堡政权定期依靠从一些大型银行家家族获取的贷款填补经常出现的赤字，这就意味着这些银行家家族最终也会寻求扮演能影响政府预算优先权的角色。面对上述要求，哈布斯堡政权除了更强势地确定自身的权威外，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就引起了商业与知识界精英的愤怒。这些人和地方贵族联合起来，共同表达对僵化的中央政权的不满，他们鉴于自身处境提出特定要求，却被哈布斯堡政权蛮横无理地拒绝。在此情况下，这些人继续使用18世纪强调地方或各州自治的传统法律形式（通常用“国族”这个词来表达），来对抗一个不断集权化的帝国的入侵。[注]

1835年，弗兰茨一世有精神障碍的儿子斐迪南一世（1835—1848年执政）即位。他在帝国体制的顶点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使得形势越发严重。政治上越发严重的停滞（哈布斯堡政府面对罢工或粮食暴动等政治经济挑战时表现得越来越无能，无法向社会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以及对政治和社会革新的积极反对，使得哈布斯堡政权引发了许多在其他方面热心爱国的臣民们的愤怒。

政治停滞以及全国正在兴起的商业与知识分子阶层对政权的反对虽然是最显著的，但并不是哈布斯堡政权唯一的弱点。在这数十年间，哈布斯堡王朝范围内一些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掩盖了其他地方封建经济与社会关系仍然存在的现实。后者的情况在农业所占经济比重更大的加利西亚，以及匈牙利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很多地方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往往将这些地区的问题归咎于当地地主精英占据的地产，以及地主们对经济选择的狭隘理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希米亚、下奥地利、摩拉维亚这些经济更加活跃的地区，当地富裕的贵族阶级常常会积极行动，投入大量资金来推动经济转型。拥有大庄园的贵族家庭经常带头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技术创新，并发展出食物加工和能源生产等新型

农村工业。然而在匈牙利很多地区与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庄园主只会从一个方面，即他们能从农民身上压榨出的劳动力附加值来计算他们自身的经济生存能力。而不断受到劳役压迫的农民最终以暴力回敬贵族，加利西亚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不时爆发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者们了解帝国集权化的动力，因此具有策略性地向位于维也纳的中央政权求助。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加利西亚在大规模农民暴力起义的威胁与严重的压迫之间维持着一个危险的平衡。听上去或许很讽刺，此时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以地方自治或者贵族民族主义为代价，推动农民阶级拥护帝国事业。

与加利西亚的庄园主不同，匈牙利的贵族精英在19世纪30年代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公开讨论如何振兴当地经济。[注]鉴于讨论者们大多将自己定位为匈牙利爱国者，他们便试图解释，依照几乎所有当前的生产力衡量标准，为何匈牙利的经济表现落后帝国的其他地区，以及匈牙利精英们乐于互相对比情况的其他欧洲地区。一些匈牙利爱国者怒斥奥地利，认为它的关税边界让匈牙利处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类殖民地情况之中。不过在1830年和1831年，匈牙利贵族伊斯特万·塞切尼伯爵（István Széchenyi）出版《信贷》（*Hitel*）与《光》（*Világ*）两本著作，改变了匈牙利经济大讨论的重点。塞切尼力争，匈牙利相对的经济落后和贸易上的劣势不应归咎于奥地利的关税体系。他声称匈牙利传统的封建生产体系才是罪魁祸首。[注]

在《信贷》一书中，塞切尼坚称匈牙利的农业之所以生产力低下，是因为它太过依赖农奴的无偿劳动。如果地主们想要提高生产，就要为他们的庄园雇用有薪工人。而为了支付大批劳工的工资，并且能够承担试验新技术的高额开销，匈牙利同样需要抛弃关于限嗣继承地产的法律传统。限嗣继承的制度防止了匈牙利达官显贵（即地位最高贵的贵族们）的地产遭到分割或者出售，它规定土地不得分割，按照严格的继承法则传承。限嗣继承的地产既不能被当作申请贷款的抵押品，也不能用来出售以便筹集资金。这些规定使得匈牙利贵族们不能把土地当作筹集资金的资源，自然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金钱去投资新技术或者制定一个向自由农村劳动力支付工资的体系。塞切尼指出，在匈牙利的贵族拥有全国超过2/3可耕种土地的同时，这些土地未经开垦耕种的比例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而此时在匈牙利，竟有92万个登记在册的“无地”农民家庭。如果贵族们可以出售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得到贷款，他们就可以投资新的生产技术，给农民支付工资；如果贵族们可以申请到贷款，他们也

同样可以资助新型制造业来吸纳无地农民。塞切尼还谴责了匈牙利封建体系的其他众多方面，特别是贵族仍然继续免缴税款的待遇，绝大多数农民无力拥有土地的现状，阻碍制造业自由发展的行会制度以及匈牙利大多数人在法律层面所缺乏的平等。[注]

塞切尼的理念引发了匈牙利国内强烈的兴趣和激烈的讨论，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催生出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的一场强势的改革运动。然而，这场改革运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即便部分匈牙利有地精英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但社会现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不变。匈牙利没有发生像加利西亚那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但农民们拒绝服劳役一类的事时有发生。

此时很大程度上再次因为财政紧缩政策，奥地利帝国的核心国家无法干涉加利西亚、匈牙利或者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小型沿海农业州，也不能在这些地区投资兴建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在19世纪的前50年，哈布斯堡政府终于勉强实现了当初雄心勃勃的承诺，正是这些承诺，令帝国成为农民、本地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阶层不断托付希望的对象。[注]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奥地利帝国国内大约有3 000万人口。之后的30年，帝国人口以每年至少1%的速度飞快增长，与此同时，以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为代表的地区农业生产力提升，使得供养帝国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成为可能。奥地利的城市规模同样迎来可观的扩张。举例来说，像维也纳和布拉格这样的行政中心迎来了人口爆炸，而19世纪的最后50年，大城市的人口还将迎来更惊人的增长。维也纳的人口从1817年的25万激增到1848年的35.7万，同一时期布拉格的人口从6.5万增长到11.5万。不过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或许不及奥地利一些得到经济发展的地方城镇出现的人口增长来得更有意义。[注]以佩斯为例，它的人口从约瑟夫二世时代的22 417人，稳步增长到1800年的35 349人；到了1830年，佩斯有了4.4万居民；等到19世纪40年代末，当地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轻松成为匈牙利第一大城市。19世纪40年代，佩斯的集市能够吸引约3万名参与者。罗伯特·内梅什（Robert Nemes）在其关于布达佩斯历史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本1821年的导游书内

容，令读者看到这座城镇的面貌经历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 这片土地曾经被沼泽、芦苇以及荒凉的流沙所覆盖……如今，它已经是年度集市所带来的巨大交通流量汇聚的中心……城市中的房屋布局极美，组成了新的城市广场，除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外，它比奥地利帝国中任何一座广场都壮丽辉煌，可以与欧洲那些最恢宏壮丽的同伴相媲美。[注]

位于亚得里亚海口的的里雅斯特港也经历了相似的动态增长，它从18世纪的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1820年拥有4.3万居民的世界级港口，而仅仅20年之后，这座港口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8万人。[注]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或许是铁路发展前整个帝国最工业化的城市，它的人口在1830年达到3万，10年之后激增到4.5万。像佩斯、的里雅斯特和布尔诺这样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它们的飞快发展归功于在当地建立和扩展业务的商人以及制造厂商（他们通常都是外国人），他们雇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在自己的商店、工厂和仓库工作。在的里雅斯特，还有不少人受雇于各个船坞码头。

布尔诺的发展是一个例外，它的腾飞依靠的主要是纺织厂的工业劳作。1840年，就已经有近1.5万人在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的城郊纺织厂工作，使得布尔诺得到了“奥地利的曼彻斯特”这样一个雅号。记者扬·奥赫罗（Jan　Ohéral）留下了关于布尔诺城市新貌和它迅速发展转型的有力描述。他在1838年这样写道：“几年之内，布尔诺的面貌就完全改变，焕然一新。”奥赫罗用静态的手法把布尔诺昔日的面貌描写为“一幅生动的静物写生”，它与如今这座城市新的景象和以工业化的郊区为代表的不断变化形成鲜明对比。他这样描写道：

> 一夜之间，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雇用模式在这幅写生画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这座城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新的力量将我们从宁静的、梦幻般的平静中移植到机器轰鸣的厂房。它把郊区变成自己的战场，建造起有着巨大烟囱的宏伟宫殿。那些烟囱好像是从地面直指天空的手指，它们吐出浓云一般的黑烟，覆盖了整座古老的、塔楼林立的城镇。

奥赫罗还补充了一些城内的见闻，甚至是古板的贵族宫室和政府办

公室内的敏锐观察者们也注意到“信步穿越城市的时候，人们能察觉到仓库内人们不停歇地忙碌着，以至没有加入大多数兴奋人群中的游手好闲者显得格格不入”。而这些兴奋的人们正紧张地经营着他们的生意。

> 当你见到城郊一排又一排的工厂与作坊时，听到活塞在蒸汽机中发出的轰鸣，以及每一个生产步骤中铁锤和织布机产生的单调噪声时；抑或是在夜里，看到一排排屋里亮着灯的窗户后面有上百人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或者在煤气灯惨白的灯光下目睹大批不同功能的机械连续作业，你就再也不会怀疑工厂通过眼前的制造业体系展现出来的腾飞前景……它出现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在此也不例外。[注]

在帝国的其他地方，要发展出大规模的工业并像布尔诺那样吸引大量劳动力前往城市，还需要50年的时间。布拉格就是一个与布尔诺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1840年，布拉格大约有10万人口，远远超过布尔诺，但是它的工人人数只有4 000—5 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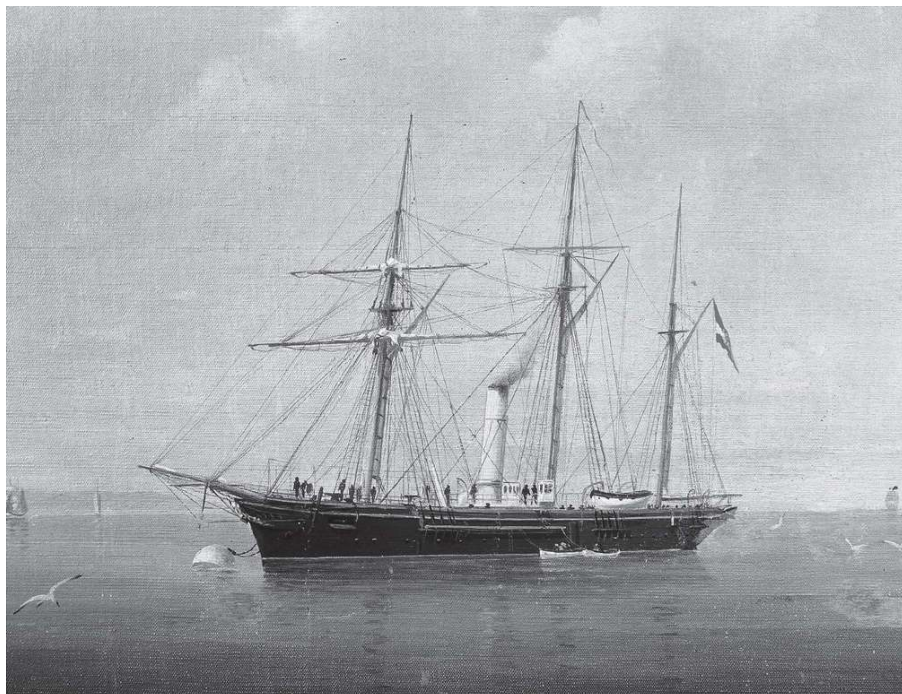
像布尔诺、佩斯和的里雅斯特这样的贸易或工业城市，同样受益于奥地利不断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造成的新型纽带，这种纽带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增长。新的公路工程、运河、河道整治和山间道路系统促进了陆上交通与贸易的迅速发展，改进后的交通条件还削减了往返于通过经济纽带彼此联系的目的地之间的时长，通常来说，现在能比过去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注] 1815—1848年，奥地利帝国建设了2 240公里（约1 400英里）的道路，地方城镇政府和贵族地主们则修筑了46 400公里（约28 832英里）的私资公路。[注]在匈牙利，多瑙河和蒂萨河经过一些项目上的整治，适航能力大大增强。19世纪30年代，多瑙河汽船社为往返维也纳和佩斯的旅客提供常规航运服务。到了1847年，这个社团拥有的41艘船已经输送了超过90万名旅客。[注]

19世纪30年代，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城市，以及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和萨洛尼卡等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港口之间首次出现了亚得里亚海船运的固定航线。1833年，保险企业集团奥地利劳埃德公司诞生于一家的里雅斯特的商人咖啡厅，很快就成为一家致力于加快亚得里亚海乃至最终全球货物与信息流动的船运公司。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主要服务于东地中海的港口，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最重要的运输公司，随后它将业务拓展到东亚和拉丁美洲。劳埃德公司成立不到10年，它就

令的里雅斯特跻身全球十大港口之列。

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里雅斯特的商人可以依靠定时的、可预测的时间表从事商业活动，本地货船满载货物和乘客纵横整个地中海地区，它们从马赛到萨洛尼卡、亚历山大港，再到君士坦丁堡。1851年一年，劳埃德公司就运送了22.2万名乘客、50多万封信件，以及超过25万件包裹。[注]至于达尔马提亚地区，它的众多港口都被难以穿越的多山地带环绕，如今劳埃德公司的船只为这些港口提供了旅行速度更快，也比陆路跋涉更舒适的海上交通。举例来说，1848年3月维也纳发生革命时，劳埃德公司的汽船比翻山越岭的邮政马车更快速地将第一条消息送到了达尔马提亚的首府——港口城市扎达尔/扎拉（Zadar/Zara）。[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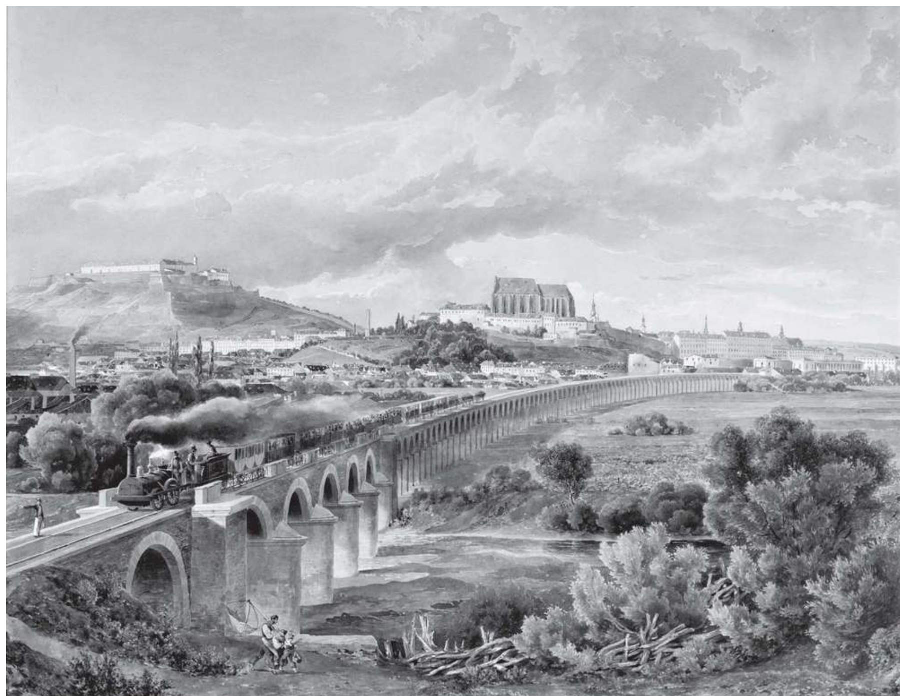
就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许多有影响力的政要、私人投资者和少部分奥地利陆军军官开始游说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奥地利引进铁路交通（当时的火车最早是由马匹拖曳，此后发展为蒸汽机车）。他们认为，火车可以在帝国范围内更快地运送货物、旅客与部队。1816年，颇具改革意识的约翰大公从英格兰归国，就开始极力劝说其兄弟弗兰茨一世发展铁路，赶上英国人推动铁路事业发展的步伐。1825年，大公出面支持了一条连接的里雅斯特与哈布斯堡领地的特别铁路线，这条铁路沿途穿过大公位于施蒂利亚的家乡，却绕过了首都维也纳。[注]到了19世纪30年代，约翰大公的意见得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银行财阀（如罗斯柴尔德和西纳家族）与实业家的支持。



19世纪中叶，一艘奥地利蒸汽船抵达的里雅斯特。原画作者为P. Kappley（Gianni Dagli Orti /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私人团体提出了最早的铁路线建设建议，它们希望让现存且交通繁忙的旅运路线成倍增加。奥地利第一条铁路线的动工，意味着之前专家希望通过挖掘多条复杂运河来解决的工程难题将迎刃而解。早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时代，奥地利政府和有影响力的商业利益团体就希望构建一个交通网，把波希米亚南部的伏尔塔瓦河（Moldau / Vltava River）与南北向的易北河（Elbe / Labe River）水网联系起来，同时还将沟通汉堡至多瑙河附近的东西交通。1807年，工程师弗兰茨·约瑟夫·盖斯特纳（Francis Joseph Gerstner，1756—1832）建议，一条铁路线可以比运河河网更简便且更经济地覆盖这些难以通行的地区。注盖斯特纳与他的儿子弗兰茨·安东（Francis Anton）运用了前沿技术，建造了穿越山地的梯级铁路线。1824年，弗兰茨·安东从政府那儿得到一份长达50年的特别许可，允许他建造一条长达139公里（约86英里）的马匹拖曳式铁路线，这条线路将连接波希米亚南部伏尔塔瓦河沿岸的布杰约维采（Budweis / Bu dě jovi ce），以及向南48英里外的上奥地利地区的多瑙河港口城市林兹。这份政府许可将给予申请者在特定时段内对这条铁路的专营权，并且通常国家会保证最原始投资者得到一定比例的回报。注

当林兹—布杰约维采线开工建设时，它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个铁道工程。(注)不过到了19世纪30年代，已经有多个欧洲国家投入铁路建设中。德意志联邦的各个中小型国家对此尤为热衷，它们火速投入铁路建设，以免重要的贸易线路穿过邻近的国家，将它们绕开。德意志诸国为了掌控正在形成的贸易线而产生的焦虑，使得建设铁路线成为当务之急，但对奥地利来说，它的紧迫感就不如德意志国家的那么强烈。即便如此，盖斯特纳在建设连接伏尔塔瓦河与多瑙河的铁路的同时，和工程师弗兰茨·克萨韦尔·雷普（Francis Xaver Riepl，1790—1857）联手银行家所罗门·冯·罗斯柴尔德（Salomon von Rothschild）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批准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蒸汽机车铁路项目。这条线路将连接维也纳与北摩拉维亚的钢铁煤矿产区，以及位于东方更远处的加利西亚盐田。(注)尽管锱铢必较的弗兰茨一世拒绝了，但5年后斐迪南一世授权罗斯柴尔德，允许他合股经营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公司（Kaiser Ferdinand Nordbahn Gesellschaft），使得维也纳最终通过铁路线，与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加利西亚以及之后的布科维纳连成一体。1838年，这条路线上第一列客车从维也纳市郊的弗洛里茨多夫出发，向北行驶约8英里，抵达摩拉维亚边境的城镇德意志瓦格拉姆（Deutsch Wagram）。1839年7月，这家新公司开始为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提供全面服务。(注)仅在开始营业的第一年，北方铁路公司就运载了超过22.8万名乘客前往布尔诺，一年之后的1840年，它运载了超过2 900万千克（相当于6 400万磅或29 000吨）的货物。(注)



通向布尔诺的铁路桥，远处是城市的景色。这段铁路是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公司的铁路网的一部分（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NY）

历史学家在研究奥地利铁路史时，倾向于从铁路所有权变更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即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对抗。奥地利铁路建设的第一阶段中，铁路往往属于私有，据说直到1848年政府发布一个自行建设完整铁路网的长期计划，这个阶段才宣告终结，不过此时仍可以动用私人资金建设个别工程项目。至于政府对铁路拥有直接所有权的阶段则结束于19世纪50年代，此时飞涨的铁路建设费用迫使国家转而设立一个私人特许经营体系。最终，国家在19世纪末的铁路建设和运营上再次扮演了直接负责的角色。认为奥地利铁路所有制的发展中，所有权的变更是决定性因素的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国家与私人资本在利益层面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就其本身而言，许多历史学家设想，一个自由市场在铁路路线上的选择或许会与国家做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声称，在奥地利铁路国有的第一阶段（1841—1854年），奥地利军队规定了铁路网的布局形态，损害了商业和工业的利益。军队的主张是，要将铁路线安排在经济价值较小但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述支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因此做出一个结论，奥地利的铁路与英法的不同，它并未有效地促进普遍的经济发展，或许这是由于它不得不服务于军队或国家的目的，而不是私人的目标。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设想，奥地利的铁路国有

化事实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且导致了“东方的”奥地利长期的“经济落后”，当把奥地利的情况与“西方的”法国、比利时以及德意志诸国的铁路建设所赋予的经济发展特征相比较时尤其如此。[注]

这个观点与之前我们遇到的一些传统看法不谋而合。那些传统观点认为欧洲东部普遍的落后源于国家的过度干涉。不可否认，这些观点的模板来源于冷战。一个近乎军事化独裁的东方式体系控制着孱弱的本地实业阶层，操纵他们完成自己的帝国设计，而不是反过来，就像在西方特色的自由市场法则下，由实业阶层那样操纵决定。这些所谓东方西方的特征性描述难免有失偏颇，但那些传统的固有印象——尤其是那些构成了大型争论的，则没那么容易销声匿迹。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决定性地推翻了铁路与奥地利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特性描述。

事实证明，以独立市场为基础的优先选择，与之后19世纪40年代国家做出的选择并无差别。事实上，奥地利由市场因素优先决定建造的铁路线要远远多过出于军队利益修建的。的确，斐迪南一世在1841年宣布，如果战争环境需要，所有的铁路线都将收归国有。但他的军队完全不能想象要怎样使用铁路。军事战略家担心在敌人的火炮面前不堪一击的铁路线在战争中起不到很大作用，而且直到1846年加利西亚危机，铁路证明它在运送部队和军需方面迅速且经济的功效前，战略家们一直不看好铁路。但即便有此乐观的经验在前，甚至还有拉德茨基陆军元帅（Field Marshal Radetzky，1766—1859）在1848年革命期间成功利用了铁路的例子，奥地利军方却从未发起铁路建设项目，也没有坚持建造特定的铁路线。军方甚至对那些明显以商业因素为优先的铁路项目表示支持。[注]如果非要说军方对铁路项目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和银行业的平民会宣扬所谓的军事需要，来为他们修建新铁路线的需要正名。以1839年的一件事为例，当加利西亚议会的代表向政府申请资助一个连接波希米亚与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的铁路项目时，他们坚称军方也会从这条铁路中收获未指明的“战略利益”。[注]

在奥地利铁路历史的问题中，或许决策者们更倾向于设立某些铁路连接或交通网而非其他的问题，要比铁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更重要。在私人资本的创举在帝国遍地开花的最初1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中央政府（但不是军方）在决定更广范围铁路网的组织形态上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随后私人投资者们可以跟随政府的步伐，为整个帝国开发它们。1838年，哈布斯堡政权甚至收回了州地方政府给予铁路特许经营

权的权力，以此来捍卫中央核心国家的特权。在19世纪之后的岁月中，这个国家决定的铁路交通网对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把一些地区划分为经济外围区域，同时又让另外一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成为繁荣的区域中心。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布尔诺，它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是蓬勃发展的纺织制造业中心，而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公司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当地产业的繁荣。通过铁路，大批纺织工从乡下涌入城市，到1850年，布尔诺的人口已经扩充到4.7万人。铁路路线和特定的交通连接在决定地方经济和人口发展上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哈布斯堡政府计划铺设一条充满挑战性的跨阿尔卑斯铁路线来连接维也纳和帝国主要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时，情况就很显而易见了。到了1849年，南方铁路公司（Südbahn）连接维也纳和卡尼奥拉首府卢比安纳（Laibach / Ljubljana）的铁路宣告落成，而在克服了更多工程层面的挑战后，整条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铁路在1857年全线完工。

一个强大的国家：加利西亚与达尔马提亚的大众愿景

正当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刺激奥地利一些地区出现工业和制造业腾飞之时，它们的新奇感掩盖了帝国其他农业区继续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关系、痛苦和极度贫穷。考虑到“工业革命”这个词背后的深刻变革图景，我们就必须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工业革命早期，由新兴产业带来的变革既没有直接地，也没有立竿见影地影响欧洲大陆大多数人的生活。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内，一个地区也许蒙受了新技术的恩惠，经历迅猛的社会转型，但它邻近的地区很可能依然维持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这些早期工业革命集中的区域，往往也会受到商业周期疯狂的钟摆式效应影响，这一年当地的工厂或许会产生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而6个月后工厂就很可能要求工人们卷铺盖，另谋生计。工业化还带来另一个不和谐且显而易见的影响：它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新财富层级，同时制造出新的贫困深渊，而这两者往往会出现在同一个城镇内。

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对布尔诺等地的工业腾飞做出直接回应，不过其

政权需要对一些极度贫困的农业区所经受的行政与社会改革失败负责。在19世纪的前50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领地中，没有一块像加利西亚——这片奥地利瓜分波兰而得到的土地——那样，传统封建社会根深蒂固，长期处于悲惨的境地。尽管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试图在当地建立一个开明社会的模板，当地农民却依然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屈从于领主繁重的劳役命令，并且上缴实物税。这个制度得以在加利西亚延续，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领主为了镇压农民而部署的常规军队所带来的威胁，此外，领主们和他们的代理人日复一日施加在农民身上，令他们服从的侮辱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加利西亚封建制度的存续，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尽管它可能并不情愿）。虽然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利西亚的落后而悲叹，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国家在19世纪前半叶仍然频繁地派遣军队前往加利西亚，镇压不断增多的农民起义。

自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起，哈布斯堡王朝就把加利西亚看作用来进行改革政策试验的白纸，针对它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正如很多学者对这个时期的观察，奥地利显然计划甚多而成果甚少。加利西亚贵族认为他们没有义务改善农民的困境，也没有多少积极的动机促使现有制度产生显著的变化。因此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正式废除庄园主对农民法定人身所有权（Leibeigenschaft）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帝国得到了农民们的忠诚。这一改革导致庄园主们理论上不能鞭打、体罚他们的农民，也不能阻止农民自行婚配。同时废除庄园主对农民的人身所有权也限制了农民为领主服劳役的时间，在此之前，一些庄园的农民每周需要服五六天的劳役，如今他们一周最多只需为领主们服务三天。此外，约瑟夫二世还采取措施限制了加利西亚贵族强大的司法势力，从而让农民们有可能提起诉讼反抗领主。[注]不过除了上述引入一些法律细节的改革之外，加利西亚的制度依然以昔日的方式运作着，充满了鞭笞、非法劳役要求，而且毫无补偿。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帝国中央对加利西亚制度的立法干预，再一次缺乏能够影响加利西亚庄园内当地关系的必要资源所致。而且帝国缺乏可以依靠它的改革成果的本地盟友的支持：在加利西亚，没有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官员们就无法向他们寻求帮助，也就无法招募这些人进入官僚系统。至于身份是小企业主、放贷人或地产经纪的加利西亚犹太人，纵然他们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地方商业中产阶层的作用，却受到贵族庄园主严密的控制，而后者作为地方上最具权势的人物，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或金钱贿赂，腐蚀了那些以推行帝国法律为职责的本地官员。

因此，我们并不意外地见到，维也纳方面沮丧受挫的改革者们和喜爱道德说教的评论者们极尽夸张地描述加利西亚的落后，以此来解释当前的局势，他们越来越多地把加利西亚的问题归因于本地的文化，或者加利西亚人的天性。[注]

哈布斯堡王朝力主维护农民权利、对抗贵族势力的一个重要阻碍，是加利西亚惊人的低识字率。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18世纪国家改善教育的努力，并没有在加利西亚的村镇落地生根。即使是那些以拥有一所教区学校为荣的地方，儿童们也很难连贯地在学校稳定就读。根据1842年奥地利的数据统计，至少官方层面显示，只有15%的加利西亚学龄儿童入学就读，相较之下，波希米亚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则高达94%。[注]同时，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史坦尼斯劳［Stanislau / Stanisławów，之后亦称斯坦尼斯拉沃夫（Stanyslaviv）］，73%的本地儿童从未上过学，而在27%上过学的儿童中，只有1/4有规律地在学校接受教育。至于教育师资力量，当地学校的教师往往是想要赚一份外快的教堂风琴手或教区神父（他们自己有时也只是粗通文墨）。因此当我们看到直至1865年，从加利西亚招募的士兵中还只有4.5%的人能读写时，也就不会诧异了。事实上，还有一些地主定期确保那些在村里接受过少许教育的农民子弟，有时甚至是教区学校的老师，成为军队最先招募入伍的一批本地人。

地产清册分类列举了农民的法定义务，但他们不识字，也就很难成功地提起诉讼指控领主。因此加利西亚的贵族阶级有意尽力阻止识字率的提升。1840年，当普热梅希尔的东仪天主教会主教向加利西亚议会提议在乡村设立更多的公立小学时，遭到了与会代表们的一致反对。[注]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自玛丽亚·特利莎的时代以来，中央政府就授权给地方当局，由它们负责资助地方学校。

显然，加利西亚的农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的贵族领主和维也纳的帝国政权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这个认知助长了他们的一个观点，即哈布斯堡统治者是一个近乎神话的有权势者，并且他会以父亲般的慈爱关注他们的福祉。照农民们的说法，如果皇帝知道加利西亚发生的所有事，他绝不会让情况继续下去。加利西亚农民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今人看来闭塞或者天真的表现，实际上它绝非如此。在农民将自己拒绝执行领主要求的行为正当化，以及决心向地方当局提出法律申诉对抗他们的领主时，他们对皇帝的这种认知格外有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8世纪

七八十年代被立法确认的一个好皇帝神话，在农民们反抗残酷领主的斗争中，起到了象征媒介的作用。19世纪初，加利西亚农民在反叛时，经常公开宣称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以此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许多农民相信，哈布斯堡统治者已经取消了所有农奴制中的农民义务，但是腐败的地方官员与和他们同流合污的领主向农民隐瞒了这则重要的消息。

在约翰–保罗·西姆卡（John-Paul Himka）对加利西亚乡村生活精彩绝伦的研究中，农民们经常呼唤帝国权力挑战他们的领主，或者用帝国的名义为自己的叛乱行为正名：

> 1784年1月，当普热梅希尔地区的特派员鲁特科夫斯基向农民们宣读1781年10月1日关于改革农奴制的帝国敕令时，农民声称敕令中一部分内容是由皇帝亲笔撰写的，但那些强迫他们服劳役修路的命令则是领主们写的。1819年，科马尔诺（Komarno）的农民拒绝向领主提供饲料、鸡和阉鸡，直到他们听到皇帝的命令为止。他们称："只有当皇帝陛下以书面方式回应我们的请愿，我们才愿意给你们所有想要的东西。"注

如今经常用来描述农民对哈布斯堡王朝忠诚的比喻，往往流于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怀旧的亲哈布斯堡形式。这就误读了在农民对哈布斯堡王朝情有独钟的态度背后，看待权力和权威观点的基本本质。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利西亚农民不信任任何一个官员，不管他们代表的是地方庄园主的利益，还是维也纳的皇帝。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读到，波兰被瓜分，奥地利人占领了波兰人的统治地位之后，许多农民已经充分认清了现实。于是农民开始在任何可能的时机，以机会主义的风格引奥地利人的权威为己所用，并通过这种方式抵消他们的领主们所主张的权威。此外，农民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知道奥地利地方上的官员或法庭很少帮助他们赢得对抗领主的法律挑战，所以这就给了他们机会，以维也纳方面更高一级权威的名义来替自己辩护。

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加利西亚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贵族收入因为战争通货膨胀危害而不断减少，于是他们煞费苦心地捏造出借口，试图增加农民为他们服务的工作天数，或者侵占乡村中传统上由农民共有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庄园。在后一种情况中，领主们抢夺了农民村落附近用于放牧或储存冬季木柴的土地。当农民们要求领主们对这一行为做出补偿的申诉被驳回后，他们拒绝为地主

们服劳役，或者上缴实物税。更有甚者，农民们用暴力作为对他们绝望处境的回应。在这些情况下，领主们就指望帝国军队可以镇压叛乱的农民，恢复当地秩序。

不过在本地贵族眼中，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军队是一把双刃剑。这一地区曾经属于独立的波兰的一部分，在最近的1772年才被哈布斯堡王朝吞并。数十年后，加利西亚地方贵族在对法战争期间目睹拿破仑于加利西亚北部建立了一个存在于1807—1815年，据称是独立的波兰人国家——华沙公国。虽然战后奥地利国会没有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而是承认沙俄占领的波兰领土，即所谓的波兰会议王国可以享受语言与文化自治的近似独立待遇。虽然这些承诺最终都化为泡影，但波兰民主主义者和昔日重要贵族家族成员的复国之梦仍然没有消亡。他们中很多人或者同情在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境内密谋的反抗活动，或者亲身参与其中，1831年与1863年波兰人两次起义反抗沙俄统治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一支驻扎在加利西亚境内的奥地利军队镇压起反叛的波兰贵族，就和他们镇压起义的农民一样容易。

哈布斯堡王朝雄心勃勃的中央集权化国家计划在达尔马提亚也反复遇到阻碍，不过这次的原因不是地方贵族的反对，而是当地财政资源的匮乏。达尔马提亚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一块长条形地区，它北起伊斯特里亚和卡尼奥拉，南至蒙特内格罗（Montenegro）。在维也纳会议上，这块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土地被划归奥地利。达尔马提亚的地理状况使它孤立于帝国的其他领地，群山将它与邻近的腹地（其内陆腹地包括了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管辖的波黑）隔离开来。在这一地区的沿海城镇中，人们依靠小规模的本地贸易和渔业为生，而在山麓地区闭塞的农村中，居民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种植粮食作物。除了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Dubrovnik / Ragusa），达尔马提亚地区在1797年之前都处于威尼斯统治之下，1809—1813年，拿破仑接管了整个地区，把它归入他自创的法国省份——伊利里亚省（Illyria）范围内。

1818年，达尔马提亚地区有296 800人，其中大多数人使用斯拉夫语（尔后被定义为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此外还有不多于地区人口5%的城市少数群体使用意大利语。在使用斯拉夫语的当地人中，有20%是东正教徒，其他的则是天主教徒。此外，当地还有约400名犹太人聚居在沿海的杜布罗夫尼克和斯普利特/斯帕拉托（Split /

Spalato）。直至1848年，以奥地利和欧洲普遍的标准来看，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城镇相对来说规模很小，杜布罗夫尼克有5　462名居民，当地首府扎达尔也只有7 280人。

达尔马提亚地区与加利西亚和匈牙利有两点不同之处。第一，达尔马提亚并没有强大且具有特权，传统上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贵族地主阶级。而且在拿破仑政权统治时期，所有达尔马提亚的贵族头衔都被废除，等到奥地利接管这一地区，奥地利人同样拒绝承认当地大多数的贵族头衔。过去威尼斯管治达尔马提亚时，本地贵族大多会担任威尼斯人管辖下的行政官员职务，如今轮到奥地利人统治，他们就不能继续占有这些获利颇丰的职位了。达尔马提亚贵族们对经济活动兴趣阑珊，除了能从地租中得到少许财富外，他们生活在一种相对的贫困状态中。至于达尔马提亚本地的精英阶层，则包括了沿海城镇的商业寡头、小部分国家官员与庄园主。第二，与匈牙利或加利西亚不同，达尔马提亚没有地方精英就职于为共同利益发声焦点的地方立法机构或议会，这同样导致了当地贵族无法拥有像其他州的贵族一样的社会影响力。注

从理论上说，帝国的改革者们改造达尔马提亚的难度要低于改变加利西亚等地。但是这个州始终贫穷，并难以融入奥地利帝国的其他部分，纵贯19世纪，它一直不断发生零星饥荒和叛乱。不久之后，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就宣称奥地利的殖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达尔马提亚的经济发展。不过近来的历史学研究所揭示出的内容却正相反，事实上，奥地利帝国在发展达尔马提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投资在比例上要远远超过对其他地区的投入。然而尽管国家齐心协力付诸行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文盲率依然居高不下，除了食物以外的基本消费需求也维持在最低的水准。如果没有本地需求，那么在当地发展本地贸易或进行农业革新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实际上，正是国家支付的薪水拉动了这点可怜的消费需求，这点在扎达尔为代表的行政中心和科托尔（Kotor　/　Cattaro）为代表的海军基地表现得尤为明显。达尔马提亚的乡村几乎没有经历多少社会变革，只有很少的地主愿意提供手工艺制品，当地在农业实践中没有技术新进展，教育情况也没有改善。而自从达尔马提亚在1815年并入奥地利帝国，当地就被免除了义务兵役（这是个受人欢迎的措施），但随着达尔马提亚人得以免除兵役，从军这一条在奥地利帝国其他地方获取教育和社会进步的通道就朝他们关上了大门。此外，语言上的隔阂也使得通晓文化，以意大利语和斯拉夫语为读写用语的沿海城镇居民与达尔马提亚内陆乡间只使用斯拉夫语的农民区

分开来。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特别是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帝国不得不向达尔马提亚运送食物，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奥地利帝国在试图保持达尔马提亚稳定发展的方面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这同时也助长了达尔马提亚人对帝国的期待，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是帝国难以完成的。无论如何，至少在19世纪前50年，很多受过教育的达尔马提亚人把自己对故土的希望投射于奥地利的帝国理念上。他们认为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将拯救他们自己，因此让达尔马提亚的特定需要引起位于维也纳的帝国政权注意就是他们的义务。1815年后，一些当时的观察家激情洋溢地坚称，达尔马提亚的奥地利新统治者能通过有目的性的干预来改变整个当地社会。

1821年，在一份《达尔马提亚统计数据备忘录》（*Memoria Statistica sulla Dalmazia*）中，斯普利特建筑师弗劳奈/弗朗西斯科·扎沃雷奥（Frane / Francesco Zavoreo）恳请达尔马提亚的新统治者们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通过扩充个别地块的规模改善农业状况，同时优化教育。扎沃雷奥还特别求助于他认为帝国具有的强大力量和资质："我们需要一种让我们摆脱当前死气沉沉局面的刺激因素，而这种因素只能来自集知识和力量于一身的政府。"[注]还有人指望着帝国政权能够在达尔马提亚当地推行一个有效的初级教育体系，法国人统治当地时曾试图这么做，可惜未能成功。斯普利特的预科学校教师彼得罗·博图拉（Pietro Bottura）在1830年上书称，一个民族（在这里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的达尔马提亚民族）的文明水平不是以它的文学作品多寡来衡量的，而是依靠教育让"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凭借可敬的技艺或职业完善自身"。这一点得到了当地奥地利籍官员的认同。1847年，杜布罗夫尼克地方长官写信声称，只有增加初等学校的数目，才能向达尔马提亚人灌输必要的道德情感。[注]事实确实如此，在加利西亚，有强势的地方利益集团出面反对国家改革社会的举动，但是相比之下，达尔马提亚展开双臂，为国立教育、农业和商业项目提供了一个更加热情的环境。

除了地方对帝国的期望之外，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案例还向我们展示出奥地利帝国特质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特点在加利西亚因为持续政治斗争的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这个重要特点可以这么表述：只要可以选择，奥地利帝国政权在新获得的州使用有限的资源时，更倾向于把它们用在达成自己行政上中央集权化的目标上，而不是集中资源提升当

地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更准确地说，当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或提振地方经济方面做出投资选择时，国家总是会首先建设帝国层面上中央集权化的机制，为了在当地建立新的制度，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达尔马提亚人产生了一个困惑，他们不能理解为何奥地利帝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创造丰功伟业的潜力，却在满足达尔马提亚的需求上迟缓得令人沮丧，甚至漫不经心。

哈布斯堡政权的教育政策挑明了它混乱的内在逻辑，这个政权力求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却削弱了它已经成功取得成果的政策目的。虽然弗兰茨一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持保守态度，他却急切地想要完成玛丽亚·特利莎在18世纪确定的改革目标，即让全帝国各个阶层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基础教育。但事实上，弗兰茨一世在位期间，这个目标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部分领土上都远远未成为现实。[注]此外，在维也纳没人怀疑本地初等教育可以有效提升达尔马提亚当地人的经济生产力，不过在扎达尔，信者寥寥。[注]等到实际推行政策，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却开始花费时间设计一个能够“一刀切”，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全境的架构，同时却使用了比设计架构少得多的时间，去思考达尔马提亚人的具体需要，或如何在达尔马提亚地区达成具体的教育目标。对维也纳而言，在达尔马提亚地区植入一个已经存在于帝国其他地区，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教育行政体系，要远远比在当地建造条件良好的学校或训练优秀教师更重要。

1815—1848年，达尔马提亚地区所有的教育、宗教以及经济改革政策，都在推行行政集权的目标面前退居次要地位。这个目标希望在达尔马提亚地区复制一个已经存在于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的、有组织的体系。1818年，关于在达尔马提亚建立教育系统的帝国法令，就已经在其题目上抓住了这一种倾向，法令的题目这样表述：“该州初等学校的组织，以及此后的逐步引进”（Organisierung der Volksschuleindiesem Lande und deren allmählige Einführung）。[注]引进一事，只可能在基本组织工作成功之后才能逐步跟进，而实际的措施也只有在更大范围的架构完成之后才能推进。而就在同时，学校和师生们正在苦苦期待进展。个别达尔马提亚人提出在新体系完成之前先设立一些私立小学，这些提议即便获得了当地行政官员的支持，最后往往也都被否决了。

等到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终于付诸实施，它也完全不顾及达尔马提亚地区有别于奥地利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的重要本地传统。举例来说，在

帝国其他地方，教师的薪水通常被设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大约每年200弗罗林），因为通常代行教职的本地神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性的收入。但是达尔马提亚的本地神父并没有兴趣像他们在下奥地利、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的同僚那样赚这份外快。于是对当地只拿国家薪水的教师来说，这份微薄的工资完全无法维持生计。1827年，扎达尔大主教向维也纳抱怨，在他大主教教区内的教师们缺乏最基本的住所以及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最后，在大主教的报告中，教区内的教师还面临着如下处境：

> 教师们发现他们要丢脸地依靠教区内粗鲁又贫穷的孩子不情愿地付给他们的钱生活，而就是这点钱也要教师们强迫学生上交。这使得他们从道德和生理上都无法再担当灵魂牧羊人的职责。注

政府也沮丧地发现，它在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严格设置的教师资质标准，使得政府无法在达尔马提亚招募到合适的教师，于是地方政府只好向维也纳申请降低标准。至于其他施行于奥地利的规定则将建造校舍的经济负担放在了村落内，这就拖慢了学校的建设进度，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只是在达尔马提亚地区才出现的问题。

虽然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失败，奥地利帝国本身不像英国那样采取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方针，它不断干涉社会以制造自身的存在感，并促使人们产生它能达成更多成就的希望。奥地利帝国的国家政策同时保证了达尔马提亚地区不会重蹈爱尔兰大饥荒的覆辙。不过，达尔马提亚地区最终仍然是一个耗费代价极其高昂的负担，其经济时常会出现高额赤字，奥地利帝国从这个州得到的收入从不能与它为当地付出的民政开销收支相抵。注

监控与审查

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奥地利帝国既具有对行政中央集权化无尽的渴望，又施行与其行政范围不符的财政手段，这一观点同样也可以应用在所谓的梅特涅式“集权国家”的特点和产生的效果上。正如之前我们所见，这个政权害怕类似于由法国大革命引起，并盛行于拿破仑战争前后的群众运动。然而在战争时期，人们更容易理解政府。一旦恢复正常的

和平稳定局面、严格的审查制度和间谍行为，就会遭到反对和批评。哈布斯堡政权监视其臣民的举动，以及阻止一切大众政治表现的决心都需要强化监管，而不是像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那样放松。哈布斯堡政权特别命令警察监控往来奥地利的外国旅客，在当时这种监控通过入境检查系统和地方旅馆登记系统实现，与今日进行国际旅行的旅客所遇到的检查和登记手续非常相似。此外，警察们还格外注意监视外国人在奥地利与他人的联系。这些监视措施伴随着政府的审查工作，试图阻止危险的外国思想在奥地利生根发芽。

不过与一些历史学家所宣称的不同，上述这些警察得到的资金并不能让他们在扮演其他所有哈布斯堡政权要求他们的角色时，发展出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军官们会为政府搜集引发大众情绪的本地事件信息，他们还会监视本地公职人员，例如教师与神父。但正如戴维·拉文（David Laven）在他对威尼西亚地区警察制度的研究中所说的，政府实际上更担忧公务人员的道德品质，而较少顾虑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可信。譬如拿破仑势力介入北意大利的插曲过后，哈布斯堡政权没有雇用它的政敌，利用这些人的才干并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而另一方面，”拉文写道，“一个酗酒的教授、一个沉溺女色的神父或者同性恋的警官会败坏帝国的名声。对帝国来说，丑闻比阴谋造成的危险更大。”注换句话说，由于警察经常受命监视官僚体系中其他部分成员的效率和声誉，他们很少认为自己会直面革命的威胁。

帝国警官作为信息搜集者的事实泄露出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我们反复遇到的一些意外现象。就是说，当警察报告地方社会状况时，他们的公报往往会倾向于本地民意。警察的报告时常批评政府政策，也不吝于提出他们认为可更有效帮助当地民众的改革措施。鉴于这些建议通常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很少顾及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可能对周边地区或更大范围的区域的影响。出于这样的考虑，警察们在报告中颇具讽刺性地为政府提供了后者或许愿意从地方政治代表机构那里听到的反馈。注

在监察和审查方面，哈布斯堡王朝很少能像它在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或教育政策时那样，将目标与合适的措施相匹配。哈布斯堡政府无法雇用合格的能有效执行其命令的警察或审查办公室职员，这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销。政府的财政紧张就意味着那些领取低薪受雇审查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的人，可能对他们奉命审查的文件缺乏了解。他们可能忽略许多针对帝国的文学评论文章中巧妙伪装的隐喻，一些审查者甚至会对作

者表现出的所谓颠覆政权性观点抱有同情。此外，还有一些城市因为对特定题材（如宗教、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作品出版发行更加宽容友好而为人所知。根据米哈尔·查沃卡（Michal Chvojka）的研究，帝国国内的作者们和出版商们对不同城镇和地区审查者的个人喜好了然于心，他们会根据相应信息，选择出版他们作品的地点。[注]

审查制度或许可以让一些书籍，特别是报纸失去公开发行的机会，但是它无法让这些读物从私人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内销声匿迹。事实上，部分政府高官以及属于维也纳法政阅读社团的官员，就要为这个社团的图书馆的偶发监管疏漏负责。当警察突击检查这家图书馆时，他们发现了超过60种禁书，其中不少显然是这个社团的成员或者它的高级外国客人通过走私携入奥地利境内的。警察在检查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的读书俱乐部时也在报告中提出了相似的情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非富即贵，相对来说受到的监管就比较宽松。警察们在报告中，提及了1846年，在格拉茨的约翰诺伊姆学校和因斯布鲁克的莱赛卡西诺发现了许多“不法之处”。[注]

与此同时，审查者本身也会做出自相矛盾的决定，或者根据一本书或期刊的情况推翻先前的决定。譬如在1843年，警察向读书协会提供了授权许可，允许其订购先前被禁的《莱比锡日报》（*Leipziger Zeitung*）和《边界报》（Grenzbote）这两份出版于萨克森的期刊。次年，协会又获准订阅《宪报》（*Le Constitutionel*）和《世纪报》（*LeSiècle*）这两份来自法国的温和派自由主义报纸，它们之前也属于被禁读物。[注]

奥地利帝国质量参差不齐的审查制度自然无法阻止奥地利人批评政府，或者为政府获得大众声誉。不过在当时的人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纷纷抨击奥地利政府的反动本质时，我们必须谨记，梅特涅政府对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与当时遍及欧洲的保守主义者观点并无太大区别。[注]1815年后，由于前不久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混乱先使法国社会动荡不安，尔后又因为拿破仑把这种混乱传播到整个欧洲，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恐慌成为欧洲各地的特色。保守主义者们害怕四处传播的革命思想所宣称的社会平等理念，将破坏一直以来的宝贵稳定局面，这一局面只能通过坚守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维持。类似的态度同样适用于对外政策方面。梅特涅试图坚守维也纳会议的结果，来对抗1815—1848年，从奥斯曼帝国叛乱到法国革命，迫使奥地利干涉（至少考虑干涉）欧洲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危机的诸多变化。梅特涅雄心勃勃的计划不是要把奥地利与欧洲

其他地方割裂开来，而是在欧洲的保守主义盟友帮助下，将监控的天罗地网落在奥地利与欧洲社会，防止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思想四处蔓延。不过梅特涅没能把他的意图转化为持续有效执行的政策。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指出，在国内监控层面，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可以在1848年召集3 000名市政武装警备队队员、84 000名国家警卫以及3万军人拱卫巴黎；同时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可以在伦敦聚集起3 00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5万军人以及超过15万巡警。与这两者相比，1848年的哈布斯堡政权只能依赖不到1 000名警察、14 000人的市政警备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军乐队的成员），以及14 000人的军队保卫维也纳。[注]因此在实施警察制度与维持治安方面，奥地利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实在没有特别之处。

公民参政、社会义务和资产阶级文化生活

让梅特涅与他的同僚们忌惮不已的公民社会，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传统上有关1815—1848年奥地利社会的记录（特别是涉及中产阶层的部分），往往会使用“静默”或“无关政治”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一个据说对反抗独裁统治毫无帮助或出力甚微的社会。在艺术领域，通常把这一时期的奥地利称作“比德迈/小市民时期”（Biedermeier）。这个词通常指代一个正派且诚实体面的资产阶级社会，它从根本上不关心外界，眼界狭窄，从事的社会活动不会超出家宅会客厅的范围。比德迈式的绘画与家居设计，往往具有第一眼就显示出理想资产阶级家居场景或乡间田园牧歌风格的特色。某种程度上，这种从根本上与政治绝缘的社会，是人们被警察、间谍和审查制度所引起的恐惧控制而诞生的产物，这一审查制度是此后在梅特涅执政时期依靠自由主义批判存在的，从而在1848年革命中公开支持自由主义价值观，颠覆了梅特涅政府的统治。后世的历史学家亦利用了这种政治冷漠社会的观点，来解释为何奥地利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看上去惊人地缺乏政治能动性。毕竟相比之下，法国的资产阶级点燃了革命的火花，也在遏制1830年革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英国，类似的群体正在公开争取选举改革。

那么与西欧同时期充满活力的发展相比，这种所谓的“政治缄默”是否也从本质上反映出奥地利社会的经济落后呢？事实上，法国的革命者们在1830年推翻了反动政权，1832年英国资产阶级也成功力争国会改

革，都反映出这些国家逐渐崛起的资产阶级拥有的新魄力。但反观奥地利，很多历史学家把自由主义行动在当地的明显缺失归咎于资产阶级所谓的软弱甚至缺席，后者本应满怀信心支持自由主义。许多分析人士宣称奥地利在经济上的落后，阻碍了具有自我意识和经济上自信的中产阶层在当地的发展。

从某种重要意义上，历史学家们认为哈布斯堡政权影响深远的警察势力使得奥地利缺乏一个应有的、能够反抗独裁统治的公民社会。据学者们所言，梅特涅成功地阻止了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在奥地利的兴起，从而使这两者无法挑战其政权的合法性。奥地利社会的表现也同样证明了这一主张的有效性，它没有产生出独立的异议声音，没有为当前的独裁政权提供一个替代性前景，而最终也没有反叛。然而比德迈风格与政治绝缘的整体理念，当下和这个艺术词汇共存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概念，以及中产阶层世界本身，同样表现出对政治的反对和社会的沉默。比德迈艺术风格同样表现出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社会正从自身角度越来越积极地定义自身和自己的价值，从而与当下政权表现出来的传统贵族式或封建式的社会等级制度区分开来。

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奥地利公民社会资料的历史学家们提醒我们，梅特涅政权是在遍布哈布斯堡领地的革命中完结的。他们指出，我们在本章前文中读到的经济活力改变了奥地利的自然景观，让乡村中数以千计的男女涌入奥地利新的工业与贸易中心城市，并创造了新的贸易与交通网络。在这些历史学家对公民社会的思考中，奥地利中产阶层组织独立公民社团的行为被他们看作在当地社会引起变化的同时也成为改进自身的方式。历史学家们还指出奥地利中产阶层不断自我提升的道德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不断增长的新目标，即如何把社会组织得更高效、更公平和更有利可图。奥地利的中产阶层与贵族常常宣称这些目标源自对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强制维持现状，以及国家不能在其他方面政策上为社会带来改变的失望。如果我们阅读地方上的文本资料，就可以发现众多关于实施替代性目标的主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文本展现出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倾向。

1835年，在帝国最北端的奥属西里西亚首府特罗保/奥帕瓦（Troppau / Opava）土生土长的福斯坦·恩斯（Faustin Enns）出版了4卷关于自己家乡历史、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注]18世纪，约瑟夫二世曾试图搜集帝国各个地区的信息，在其执行中央集权化改革措施

时，开展了一系列地图测绘、区域描述、分类、编目以及绘制插图等工作，恩斯的四卷本正是对这些工作的怀念。不过到了19世纪早期，这种信息搜集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

恩斯在其著作的引言中，表示他想要通过撰写奥帕瓦本地的历史，来帮助读者们了解这个城市的现状。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受益于哈布斯堡统治的产物，还是市民们所取得的成就缔造的结晶。在恩斯看来，帝国和地方的文化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描述了如今在哈布斯堡政权，尤其是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们的统治下，奥帕瓦的繁荣鼓舞了市民的积极性。恩斯说，正因为有他们，“理性的曙光破除了不少本地的迷信”[注]。因此，奥帕瓦的居民们得以自由地追求“在这个公国内逐渐在理智上、文化上以及国内领域的改变”，而这正是恩斯所认为的“我的故事的主题”。[注]在恩斯看来，特罗保/奥帕瓦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塑造应当归功于这座城市在帝国更大范围内的地位。来自帝国的关照赋予一般国民大众改善地方公民生活质量的权利。尽管他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帝王将相的，恩斯仍然对市民同胞们做出的成就保留了最为热情洋溢的赞美，无论这些人出身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有着德语或斯拉夫语的语言背景，他都一视同仁。恩斯最值得称许的一点，是他持续不断地接触奥帕瓦的公民、社会和道德方面的社群。正是因为这些社群成员致力于公民参与，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成就，或者他们在社会、家族、语言或民族层面的遗产，才使得他们真正成为奥帕瓦的本地人。[注]

恩斯在他的作品中特别赞扬了过去的半个世纪（1785—1835）中，市民们的勤奋与公民意识。和奥地利帝国范围内的很多城镇一样，奥帕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迎来了经济繁荣。由于拿破仑进行持续的经济封锁，在奥地利境内消除了英国对本地产业的竞争，奥帕瓦的布制品生意得到了扩张。在这段时间，随着物质的逐渐丰裕，城市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改变。有山墙的老式屋顶被改建成完全的二楼。房屋内部也有了更引人注目且更加舒适的家居布置，“而且在厨房的设计上出现了极大的进步”[注]。对恩斯来说，这些变化与发展自然对他们有利，而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段富裕时光中整个社区的重要发展。同时他还注意到，在这段时期，城中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美化工程，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组建了各类服务于市民的机构。奥帕瓦建造了一座新的剧院和警署，增加了道路照明，又在老城墙外开辟了一个新公园。此外，“虽然这段时间居民的就业率上升，生活质

量也得到提高，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处于困窘中的兄弟姐妹们”：市民们为穷人建立了一所医院，而这所医院很快就被公认为模范机构。恩斯还补充道，奥帕瓦的市民们及时地建设了这些机构，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帕瓦的布匹制造商与经销商就要重新应对英国货物卷土重来的竞争。注

不过恩斯还特别为三位市民献上了最高的赞誉：他们于1814年在奥帕瓦兴建了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一项提高社区大众知识水平的义举，这些工程无疑体现出这三位居民最高的公民道德。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些设施能够为就读城内预科学校的年轻人提供服务。从此学生们可以使用图书馆，也可以直接观摩博物馆的自然历史藏品，例如鸟类标本、宝石和矿物。恩斯认为，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博物收藏可以让学生体验到教室内得不到的实际知识。“他们现在可以身体力行，亲身体验学习的内容”，而这些通过亲身体验得到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免于错误思想的误导”。此外，通过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还可以激发出学生们和其他城市居民们进一步探索自然的欲望。它们为所有来访者展示了“基本自然法则中关于秩序、爱、节俭、和谐与和平的新一面”注。



奥帕瓦即景。绘于1820年，原作者为Georg Fritsch（Collection of Slezské zemské museum / Silesian Museum）

在此，我们有了一些可供标榜的美德。虽然它们乍看之下，通过促进所谓的沉默巩固了国家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这些美德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替代性目标。恩斯认为，帝国秩序带来的益处落在它能使国

民发展他们的个人才干。有人或许会说，秩序带来的和谐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社区中的每一个人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在众多其他的美德中，节俭使得人们有能力参与到那些有利于大众福利的事业中去。本地生性节俭的市民捐献的资金和各种收藏品［具有一定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捐赠物中有272册藏书来自奥帕瓦知名人士约瑟夫·冯·谢德尔尼茨基（Count Joseph von Sedlnitzky）伯爵，而他正是奥地利帝国任命的主审查官］，才保证奥帕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1817年开门迎客。预科学校的教师们可以借阅藏书，博物馆也能为学生们提供固定的参观时间。本地的《奥帕瓦日报》每日报道博物馆和馆内展览的最新消息。1818年，这座博物馆相当于拥有董事会的独立法人团体，到了3年后的1821年，西里西亚议会捐助了博物馆一笔资金，用这笔钱为它聘请了一位长期馆长。注

在这个帝国政府削减国民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的时期，帝国内许多类似的民间行动开始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自我培养与提升，以及对地区历史的自豪感。福斯坦·恩斯笔下的特罗保/奥帕瓦城内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就在它们落成的同时，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加利西亚、萨尔茨堡和施蒂利亚等地具有公民意识的贵族也纷纷为当地建立起类似的公共机构。当地一些把科学技术当作业余爱好的贵族，对本地同胞也怀抱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关怀，因此他们着手建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捐助为大众利益服务的科学图书馆，或者开放私人的艺术收藏供公众欣赏。注如今这些贵族收藏家也用之前看待自己的历史和自然收藏一样看待他们的艺术藏品，贵族们认为这些收藏更能表现出他们在教育事业上起到的作用，而不是王朝代表的身份性质。注这些贵族还出版了业余的学术期刊，重点介绍针对博物馆展出物品和各类收藏品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波希米亚，贵族们通常在期刊中使用捷克语，因此推动了学术和科技词汇的发展。

这些出现在各地的公共机构，它们的故事展现出更多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中，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价值观和形成于拿破仑战争之后，逐渐发展的城市社交模式。到了1815年，尽管帝国政府对公共活动存在极深的不信任感，同时对政治运动抱有病态的恐惧，但帝国已经处于破产的财政状况迫使其容忍一些独立的公民组织出现，承担起政府无钱应付的经济、慈善福利或教育职能。注在本书第二章末尾，全帝国人民在1814年6月自发组织起来的那些非凡的庆祝活动，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极好例证。这些活动的目的不单是庆祝

和平与胜利，还有为一贫如洗的老兵们筹钱。19世纪30年代，奥地利城镇内的市民领袖团体成立起越来越多的组织，用于促进制造业、商贸、农业发展、慈善、阅读、教育和地方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公众利益。这些举措的资产阶级或者贵族发起人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公共空间，以便公开、合法地讨论大众议题。

这些体面、可敬的活动家认为，他们的民间组织，其职能独立于政府监察之外。而这些组织的规则和行为模式则来自正在形成、发展的奥地利法治国家所有的公民权利模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家将道德的价值定位在理想化的平等环境下的思想交流中，他们同时相信知识在更广层面的传播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社区的目标有利，无论其范围是落在本地、较大的地区，还是整个国家。

举例来说，奥地利的产业协会脱胎于为了敦促政府更积极地支持商业利益而出现的地方举措。这些协会将艺术家、商人、制造业者和实业家的广泛联盟结合在一起，要求政府在限制颇多的银行业、信贷、关税和行会法规方面进行一场全面的改革。鉴于其形形色色的成员构成，在特定的政策上，产业协会并不能总是达成一致，但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它们团结一心，向政府表达共同的需求。换句话说，这些人在谋求一个体制化的，能够代表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利益的政治声音。[注]以1845年由下奥地利产业协会赞助，在维也纳举行的博览会为例，一位失意的经济学家表达了他希望这次盛会可以“最终让国家觉醒，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他还大力称赞此次博览会“从国家层面展示了私人企业的价值”。[注]

产业协会对地方和区域性实际情况的研究，也可以用作政策辩论时己方的论据“弹药”。这些协会举办产业博览会，其意图不仅仅是影响政府的决策者们，还要让外国买家熟悉奥地利的产品与技术。[注]格拉茨的产业协会甚至还以较低的利率向成员提供贷款和新型技术。

此外，地方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创立了新的地方与地区性报纸，这类报纸不但报道本地新闻，而且首次将国际新闻和法庭新闻也一同加以报道。而中产阶层也不仅仅在自己比德迈风格的客厅或者起居室内阅读、讨论报纸上的内容，他们比过去更频繁地出入不断增多的俱乐部、咖啡厅和餐厅等公共场合，社交与公民生活也随之在这些地方迅速发展。博物馆、图书馆、报纸、俱乐部、咖啡厅……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

的源头都扎根在17、18世纪，但只有在19世纪的前50年，它们才大批增加。同时，不仅在帝国的少数大城市，如维也纳、布拉格或米兰，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公共生活的特点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早在18世纪晚期，奥地利共济会成员约翰·佩泽（Johann Pezzl）就已经不再单纯将咖啡厅与城市生活联系起来，他还认为，“众所周知，它们将成为今天每一个大城镇中不可替代的必需品”[注]。

要理清帝国公共生活中正不断发展的社会参与和交流行为所拥有的特点与品质，有几个要点。首先，尽管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建立于乡镇地区，或者建立的目的是推动乡村事业的发展，它们仍是特殊的城市社交模式的产物。举例来说，波希米亚的爱国经济社团试图提升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普遍认知水平，但它本身是彻头彻尾的城市社团，成员们也在布拉格集会。[注]哪怕是在农村比例最高的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在1814—1848年也出现了至少16个通常被称为俱乐部的阅读社团，但它们只出现于沿海的城镇——伊斯特里亚的内陆城市帕津（Mitterburg / Pisinio / Pazin）是个例外，直到1844年，城内使用意大利语的上流阶层市民才建立起一个类似的俱乐部。[注]这些俱乐部通常是本地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的社交活动场所，它们也是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在当地找到书籍的地方。[注]当时的一位观察者评论，这些俱乐部中公开发行的报纸和维也纳藏书丰富的咖啡厅中的非常相似。[注]

其次，目前为止，我提及的各类组织，其成员都限定在地方城市精英中，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支付会费，以及进行慈善捐助。不过从它们的诉求来看，这些组织本身却不怎么民主。例如卡萨［即今天的科希策（Košice）］于1828年在市立剧院、演讲厅和咖啡厅附近成立的社会对话（Társalgásiegylet / Geselligkeitsverein）组织或者大俱乐部要求它的成员缴纳12盾的高额会费，这就使得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具有少数人社交排他性的地方。[注]甚至有些类似的俱乐部在向本地中产阶层公开吸纳会员之前，只不过是一小撮贵族友人之间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不过这些社团具有赋予社群新定义的价值。譬如在普莱斯堡的俱乐部，就会为成员们提供食物、雪茄、藏书，以及绝大多数适合非正式谈话的环境。[注]

再次，这些组织在诉求和成员资格方面并不民主化的同时，它们还在早前有贵族、神职人员和地方士绅的传统社会公共等级制度之外，提

出了一套新的模式。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社会中，贵族与平民并肩而行，在逐渐增强的社会平等环境下互相交流，即便中产阶层与他们的贵族同伴仍有不同，但这也不再是大问题。[注]这些社团或者参与讨论的小圈子成员以民主的参与模式为基础，培养出一种社交方式，他们选举管理社团的董事会，并且运行对全体成员一视同仁的规则。而社会上不成文的等级规则会影响到什么人将被选入董事会，以及谁将在一个本地俱乐部内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组织的正式规定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全新展望。罗伯特·内梅什在研究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佩斯与布达时，注意到社交俱乐部是如何第一次让匈牙利贵族们“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接触”的，他还引用了一位奥地利记者对佩斯的俱乐部饶有兴致的观察记录：“一个人被承认为俱乐部的一员，与他的社会地位、宗教或是民族背景无关。”[注]安娜·米罗（Anna Millo）指出，的里雅斯特的社交俱乐部会员资格，是根据参与者所达到的商业成就而非社会地位或所用语言决定的，而即便是当地所谓的德意志俱乐部，也在1831年使用意大利语撰写其修订后的章程。[注]在这些组织中，社会上层与中产阶层人士混居一堂的情况，有助于产生一个范围更广的精英阶层概念，这个阶层包括了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在匈牙利，这个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种各阶层混杂的状况还有助于产生一种在政治上普遍反对当前政权的共同使命感。

上述社会融合的现象也成为成立于1841年的维也纳著名社团——法政阅读协会的特点。1847年，这个阅读协会共有超过200名支付会费的会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身中产阶层的律师、公务员、教授和商人（其中还包括一些犹太人），另有一部分则是有名望的贵族。至于大学生（包括其中相对出身贫寒的那些人），就只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一个准会员资格。在格拉茨，内奥地利实业家协会拥有2 391名社会背景不一的会员，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克拉根福（Klagenfurt / Celovec）和卢比安纳/莱巴赫（Ljubljana / Laibach）分支机构的成员。1828年，布拉格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实业家协会。[注]此外，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保护协会，力求保障实业在匈牙利国内的独立发展。譬如它的成员们（他们并非全是贵族）就承诺，只购买国内（协会成员在此指出的国内是匈牙利边境内的范围）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这个组织在匈牙利总共成立了140个分支机构。[注]到了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境内已经有了200个俱乐部/讨论俱乐部，它们同样将国内不同社会背景、宗教信仰和语言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加入一个新的、更具自我意识的匈牙利民族

精英阶层中去。

最后，虽然这种新型的社交模式从性别层面上看，被认为是将上层和中等阶层妇女强硬地排挤到家庭中的典型模式，但偶尔女性也会参与或出现在这些组织的边缘，尤其是那些具有慈善目的的社会组织。举例来说，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妇女慈善协会建立于1842年，在当时，这是维也纳城内唯一一个只招收女性会员的组织。[注]不过早在1814年，一个名为贵族女性善行益事促进会的组织就已经宣称在上、下奥地利各个分支机构中拥有超过2 000名成员，并且还有许多地方分支机构“贡献出的来自各个阶层（此处指中产阶层人士）的成员”[注]。另外，在内梅什的人物生平记录中，克拉拉·勒韦伊（Klara Lövei）这样兼任教师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家在于1843年抵达普莱斯堡（匈牙利议会的集会地点）时表达了自己沮丧的情绪：“很少有女性关心祖国的事务，很多人都无法抓住当前的时事要点。”[注]

奥地利中产阶层与贵族女性设法使自己参与公共生活合理化的举动，导致她们逐步进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公民情境，同时她们的公共与公民角色也得到了缓慢的发展。暂且不论勒韦伊的失望，上述的这种情况在19世纪40年代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和1848—1849年席卷整个帝国的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注]在这里，维也纳斯蒂芬广场一家咖啡厅的行为可以反映出公众对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矛盾情绪，这家咖啡厅开全城先河，为女性顾客提供专区服务（而且女性专区禁止吸烟），不过这个专区设在咖啡厅二楼，这样人们就无法从大街上看见光顾店铺的女性，从而使女性未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假象得以维持下去。[注]

上述的这些情况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处在萌芽期的社会组织，它们的计划纲领与结构体现出了什么价值？它们在阶级要求上并不民主，不过人们认为它们产生了新的社群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诞生出了新的价值观，这种观念紧随于更明显地以出身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旧式价值观之后，甚至有时还与它分庭抗礼。不过这些新的价值观在赞美所有男性国民在理论上的平等之余，又建立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等级制度。加入这些组织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的行动看作个人对社会在经济、文化或社会方面做出的贡献的公共反映。依照这种逐步形成的世界观，如果人们可以感知到一个人为社区福祉做出有意义贡献的能力，那么他们就会赋予他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使其有权利公开发声。社会组

织赋予那些视自己为社会“生产力”阶级，也因此认为他们是社会中最优秀一分子的人们一个发展中的平台，他们的意见可以从中影响，或至少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尤其是在的里雅斯特或布罗迪这种城市经济完全仰赖商业成功的城镇，人们在商业领域具有的专业素质，使他们在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中获得一席之地，同时获得参与引导社会舆论的权利。[注]

国家的语言与民族语言

在这种价值观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一个新形成的国族概念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佩斯的活动家将知识、科技和教育方面的进步与国家的进步联系起来。一座在波希米亚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则试图将其从展览品上搜集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19世纪40年代，国家的概念主要指代（但不是完全指代）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或奥属西里西亚这样历史上定义的实体[注]（而哈布斯堡王朝通常被称为祖国）。然而我们观察到，公共社交联合了社会不同阶层，由此导致的改变通过原先从历史角度出发的国族定义表现出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所谓的民族，已经不再意味着参与议会的那些特权精英，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它包括了所有阶层的所有人。按照丽塔·克鲁格（Rita Krueger）的说法，像爱国经济社这样的农业组织，其建立的目的是“农村人口的社会化，以及从农村人口中创造出真正的公民（Bürger）”。“无论是人民还是土地，”克鲁格补充道，“都需要被改造。”在实际操作上，这意味着向农村分发年历，不仅是向农民们强调三种作物轮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培养了农民子女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将来能为社会所用。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教育道德品质，关乎整个国家的福祉。[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识字率的迅速上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报纸杂志增多，更多的人参与到政策讨论中来。虽然国家政权的审查制度极其严格，这些出版物还是引起了许多关于经济社会议题的跨区域讨论。匈牙利的第一份报纸（使用拉丁文）在1705年面世；第一份德语报纸在1764年出现；首份匈牙利语报纸面世于1780年；最后在1783年，第一份斯洛伐克语报纸也与匈牙利的读者见面了。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及之后的匈牙利首府，位于西方的城市普莱斯堡（今布拉迪斯拉法）出版。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报纸读者的增加，记者也首次成为一种收入丰厚的职业，报纸也就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大

众公共论坛，人们用它们进行宣传工作，或者用于精英们互相交换意见。而自从匈牙利的审查制度变得比帝国其他地方的更加宽松以来，许多奥地利其他地方的作者选择将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匈牙利的报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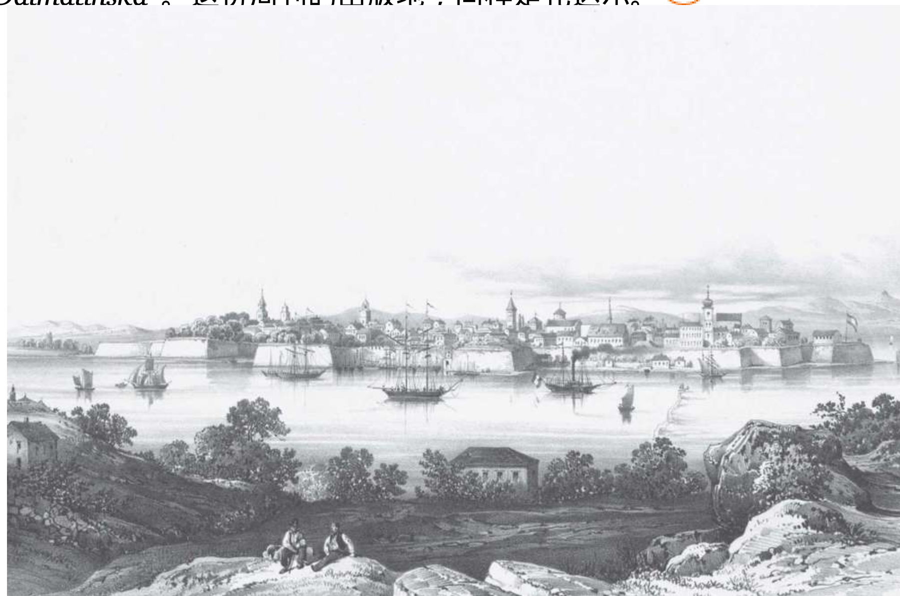
这些出版物包括科学和学术期刊、文学评论、从医学到农学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刊物、年历以及时尚杂志。其中一些报刊每月或每周面世，有一些出版的次数则多达每周4次，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现在飞速扩张的佩斯城内。1847年，全匈牙利出版的191种报纸、期刊和杂志，有103种只出现在佩斯，其余还有18种出现在多瑙河对岸的布达。这些出版物数据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城镇中与讨论和辩论有关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公共文化，而蓬勃的出版业反过来又推动了这种公共文化的发展。除去两个最主要的城市，其他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Banat）和克罗地亚的匈牙利城镇，也出版了不少各种语言（克罗地亚语、德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等）撰写的杂志。

1841年，当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1802—1894）作为创始主编开办《佩斯新闻》（*Pesti Hirlap*）时，这份报纸只有60个订阅者。但仅仅过了半年，它的发行量就增加至4 000份。到了1845年，《佩斯新闻》每份的固定印刷量多达5 200份，拥有约10万读者（他们来自匈牙利13.6万名有投票权的贵族，以及大约100万知识分子）。《佩斯新闻》的迅速成功还有一点值得瞩目：在当时大多数报刊都以德语面世的情况下，它是一份独特的匈牙利语报纸。[注]显然，公众不断发展的阅读与讨论文化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种语言范围内，而且在同一个公共阅读讨论的场所，会出现不同语言混杂的情况。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匈牙利城市居民使用德语，但同时不少人也出于爱国的原因学习使用匈牙利语。[注]就像罗伯特·内梅什指出的，佩斯的读者中可能有很多人既订阅德语报纸，也订阅匈牙利语报纸。

在帝国的其他中心城市情况也很相似，报纸获得越来越多的潜在读者，出版发行的报刊选择使用多种语言。在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德语报纸在逐步发展的城市中心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在波希米亚，人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捷克语和德语的双语期刊，或者由德语直接翻译为捷克语的出版物。第一份捷克语报纸面世于1719年，随后在18世纪80年代，更多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还有不少德语杂志被翻译成捷克语出版发行。1824年，布拉格一家名为戈特利布·哈泽之子（Gottlieb Haase’s Söhne）的公司得到政府授

权许可，同时发行德语和捷克语的报纸。它的《布拉格新闻》（*Pražské noviny*）在19世纪40年代招募了一批最具分量的捷克语文学大师，其中就包括诗人卡雷尔·哈夫利切克·波罗弗斯基（Karel Havlíček）。此外，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读到，一些重要的文化组织，比如波希米亚博物馆，越来越倾向于用捷克语来发表它们的科技和学术期刊文章。注

至于在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出版的少数几份出版物通常使用意大利语，并选择在威尼斯或者其他亚得里亚海沿海城镇出版。在这些地区，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主要使用意大利语，只有杜布罗夫尼克是个例外。奥属达尔马提亚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是1832年在扎达尔/扎拉出版的意大利语报纸《扎拉报》（*Gazetta di Zara*）。而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当历史学家伊万·卡塔利尼奇（Ivan Katalinic）想为他的三卷本《达尔马提亚历史》（*Storia della Dalmazia*）出版一卷以“斯拉夫语”撰写的总结时，因为征订人数太少，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但仅仅过了10年，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语出版物市场就已经成型，1844年，《扎拉报》增加了一份所谓的伊利里亚语周刊，名为“*Zora Dalmatinska*”。这份周刊的出版地，同样是扎达尔。注



1845年前后，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扎拉港（Zadar/Zara）。该幅石版画原作者为Johann Högelmüller和Matthias Trentsensky（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期刊使用地方语言，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同意所有的奥地利儿童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地方语言为媒介接受初等教育，同时还要感谢很多人试图整理地方语言，并且将它们的语法和

词汇系统化。这些杂志的成功，以及它们的读者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城市化程度、识字率或者将小型城镇联系起来的贸易或行政网络等因素。那么这些地方报刊想要招揽的读者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形象呢？举例来说，捷克语等语种的出版物，在波希米亚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这些知识分子社会背景不一，从贵族到学术界人士，还有商人、公务员、工匠和小店主。匈牙利语出版物得到布达佩斯以及普莱斯堡逐步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支持，这些人有着爱国者的自我定义，把订阅匈牙利报纸看作他们忠心的一种公开确认（哪怕在日常交流中，这些人仍然使用德语）。而至于那些以新兴的语言和方言为媒介，即所谓的伊利里亚语/阿尔卑斯斯拉夫语，或南部斯拉夫语出版物的吸引力却较为有限。或许是因为这些语言大多用于社团的农产品简介，使得以这些语言创立成功的报纸或期刊的目标更具挑战性，因为出版商无法获取现有的城市读者群体支持。但另一方面，随着使用本地语言的学校在当地开展的教育工作，以及受过训练的教师和神职人员使用这些语言读写的人数逐渐增加，使用这些语言的出版物在乡间村镇就有了潜在的读者群。所以这些刊物自然需要吸引农村的注意力，为农村的利益发声。㊟

关于地方语言面临的以上挑战，以及报纸读者群的现象是如何与社团生活联系起来这件事，在这里有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案例，这就是第一份阿尔卑斯斯拉夫语、卡尼奥拉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报纸《初学者》（*Novice*）的面世。这份报纸在卢比安纳出版，首次面世于1843年，只在差不多500名订阅者中低调发行。这500人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卡尼奥拉和下施蒂利亚。这份报纸能够面世，主要依靠的是卡尼奥拉农业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卡尼奥拉当地农民中传播新农业技术。而之前支持帝国铁路建设的约翰大公，即弗兰茨一世极富进取心的兄弟则是这个协会的赞助者。1838年的社团年会上，大公责备与会的协会成员，认为作为一个农业社团，他们需要更有效地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我们的成员中缺乏那些社团成立时将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我们的成员中缺乏农民。”协会的领袖将这种缺失归结于绝大多数卡尼奥拉农民不能理解作为社团公务用语的德语。鉴于财政原因，哈布斯堡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用当地的语言为农民提供教育，而不是支持一个更昂贵的双语教学系统（以及双语教学用书），因此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用所谓的卡尼奥拉语和农民沟通。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初学者》在一年内赢得了1 000份的发行量，到了1848年，发行量超过了1 500份。由于这份报纸具有的家长式作风融合了对帝国的忠诚和乡村生活日常实

际议题的务实取向，它在审查方面可谓一路绿灯。

不过这份报纸实际上真的对农民们有吸引力吗？根据《初学者》在1847年的分析报告，大多数订阅者实际上在农村环境中十分容易被辨认出来，他们常常与农民交流互动，但这些人本身不是农民。近一半的报纸订户（48.7%）是本地神父，剩下的订阅者中，9%是工匠或者商人，8.7%是庄园主，教师与学生占了8%，还有6%的读者是公务员，农民订阅者只占5%。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们被排除在《初学者》的读者群之外。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霍斯勒（Joachim Hösler）将这份报纸称为“一份为朗读者准备的报纸，它的任务就是向其他人报告报纸报道的事”。霍斯勒的说法在地方上的神职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和语言能力接近农民，而且还能获得农民们相对的敬重。1815—1848年，有很大一批卡尼奥拉的神职人员着手编辑了当地第一批阿尔卑斯斯拉夫语或卡尼奥拉语的语法书籍、字典、教材和歌谣集。神父们并不是在进行一个民族化的计划，他们甚至并不把自己看作斯洛文尼亚民族的一部分，但这确实是一个地区性的扫盲项目。这些神职人员同时还是乡村地区学校委员会的座上客，或者成为帝国在当地的审查员，他们不仅成为上帝的旨意与人类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还通过其他的职能建构并传达了一种规范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初学者》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地传达到了作为倾听者的农民们耳中，而这些农民并不属于这份报纸的订阅者所构建的社交网络或者想象中的社群的一员。

起初，《初学者》的出版方将其称为一份用卡尼奥拉语出版的报纸，卡尼奥拉语这种语言的名字来自其所在的州，不过很快出版人就将它称为斯洛文尼亚语。通过这样的行为，人们重新从跨区域的角度定义潜在的报纸阅读者。卡尼奥拉人这个名词，对施蒂利亚、伊斯特里亚、戈里齐亚（Görz／Gorica／Gorizia）和的里雅斯特等地说阿尔卑斯斯拉夫语中与卡尼奥拉语相似方言的人来说没有吸引力，但斯洛文尼亚人这个词指代的就是一个使用同样语言的跨地区群体，这个群体的定义不受行政、制度或是历史边界的限制。斯洛文尼亚语将所有相关的方言组成一种语言，就像捷克语的支持者们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方言统合到捷克语这一个大类中，而德语的支持者们所做的，也和他们别无二致。

国家与政治活动

19世纪40年代，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似乎已经侵入了哈布斯堡帝国城镇的各类社会与民间机构与情境，这要归功于各种社团活动的兴起与报纸的扩展，虽然国家的审查极为严格，但也无济于事。那个时期城市居民的日记与观察都提到政治讨论增加的情况。“虽然我们并未听说过太多关于自由的事，”当时布拉格城内富有学识的利奥波德·冯·哈斯纳（Leopold von Hasner）先生说，“但有一种自由的精神扎根在我们心中。”[注]1842年，爱德华·冯·鲍恩菲尔德（Eduard von Bauernfeld）通过众多出版于奥地利之外的作品之一让维也纳的同胞们注意到，“几乎所有重大的事态发展趋向，都能见到维也纳的中产阶层参与其中。最近几年，在维也纳可以读到更多的出版物。这些被首都居民消费的大批书籍和小册子，尤其是内容涉及政治和纯文学的作品，读来让人震惊不已”。相较于维也纳大众只醉心于美食和娱乐的普遍刻板印象，鲍恩菲尔德声称“一群创造了产业协会又建造铁路的人，是不会对烤鸡、歌舞表演和施特劳斯有多大兴趣的”[注]。

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的普莱斯堡和佩斯的城市大众中，各类政党初见雏形。当1848年初革命突然发生并迅速扩展之际，先前的这些政党制订出了更为清晰一致、富有效率的政治计划，成为奥地利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

在政治层面上，匈牙利在1815—1848年走上了一条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隶属于帝国的众多领地中，匈牙利是唯一发展出具有自我意识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反对党的地方，匈牙利的反对党扎根于匈牙利的各大城市，在自治的郡中也不乏势力。虽然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众多对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措施，或者专横跋扈的帝国官僚产生的政治不满，但只有在匈牙利，这些抱怨变得清晰明确，在公民社会中或是在议会中形成了组织缜密的反对计划。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匈牙利的贵族以及地位相对次要的绅士们害怕社会革命和法军入侵，大多选择与哈布斯堡政权合作。而战争期间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在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体系下没有英国商品的竞争，他们在经济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然而1815年之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集权化程度不断加强的统治引起了匈牙利在政治上的抵触。匈牙利境内相对自治的郡并没有上缴税款和负责军队募兵的必要，它们

的不妥协态度迫使维也纳的帝国政府召开议会，处理或者说打压反对的声音。从1825年起，国王不情愿地定期召开议会，直到1847年。这些所谓的改革议会逐渐成为匈牙利各种意图从维也纳方面得到更大自治权利的政治希望的目标，不同领域的匈牙利社会精英都在议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议会成为一个高效的即时演讲场地，政治人物可以在此演说，鼓动受过教育的大众。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议会的指望时常会落空，这部分是因为它成为派系争斗与维也纳方面有效操控的舞台。

这个时期的政治议题，要远比匈牙利爱国反对派与哈布斯堡集权化进程分庭抗礼复杂。举例来说，匈牙利的绅士与贵族们希望获得哈布斯堡政权的保护，使他们免于农民起义或外国入侵的危害。维也纳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便时常对匈牙利反对派釜底抽薪，仿效18世纪玛丽亚·特利莎与其子约瑟夫二世，提出各项改变农民当下饱受压迫现状的立法。匈牙利贵族声称他们组成了“国族”，但一旦有人用法国大革命或波希米亚议会在1792年公开表达的更广阔定义来指代这个概念，即议会需要代表其利益的一批人时，匈牙利贵族们就不得不从更民主的角度使他们的权势合法化。当改革议会宣称要维护历史上匈牙利民族的权利时，它们所指的权利并不包括农民或那些没有代表出席议会的城镇。于是匈牙利贵族每一次要求自治时，哈布斯堡政权就威胁要进行社会改革。

匈牙利贵族的对立状态，在他们试图在19世纪40年代重新定义国家概念时招致了新的危险。贵族们通过主张所谓的“爱国热情”，来抵抗哈布斯堡王朝所谓“外国的”入侵。在18世纪80年代，议会和行政机关使用的官方语言看上去还是个非常专门的议题（见第二章），但它如今引起了一系列潜藏的新问题。约瑟夫二世强制用德语替代过时的拉丁语这一行动引发了政治上强烈的反对浪潮，地方上的各个郡内尤其如此。此后行政语言的使用，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改革议会中，成为一个主张国族权利的议题。不过使用匈牙利语，就意味着要让农民阶级也成为匈牙利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在18世纪，农民阶级是主要的匈牙利语使用群体。因此，匈牙利在语言上的民族身份定义——即便是象征性的——又该怎样影响那些说其他语言的大多数匈牙利人呢？

在此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从贵族精英的角度来说，在拉丁语作为整个王国官方语言的时候，匈牙利政界的所有人都会面对同样的不便，在语言交流上也是如此。拉丁语不是他们中任何一种

人的“第一语言”。然而一旦越来越多的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让匈牙利语成为官方语言，克罗地亚贵族就会坚持在议会使用拉丁语的权利，同样不讲匈牙利语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会随即效仿。因此选择匈牙利语来定义整个国家，就会在匈牙利精英中制造严重的分裂。其次，如果选择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意味着在精英主张的民族权利背后统一起一个更广泛的民族社会，将语言作为定义国家的一种特质，就意味着国家不再仅仅是由精英组成的，还包括了剩下使用匈牙利语的匈牙利居民。这就再次引起了如何代表非精英团体利益的问题，这是匈牙利贵族不愿意讨论的，也是哈布斯堡政权只要有可能就加以利用的问题。就像在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哈布斯堡政权支持地方语言在匈牙利教育和公共生活方面的运用。当议会越来越坚持用匈牙利语代替拉丁语成为地方行政语言时，这种支持使得哈布斯堡政权越发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短期来看，通过语言实践来主张爱国的独立，似乎可以在匈牙利得到更大支持，用来反抗维也纳的帝国政权。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主张逐渐破坏了许多不说匈牙利语的匈牙利居民的自我认同，匈牙利因此将面临分裂的威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帝国的概念开始更充分地表现在社会方面，而与国家本身的联系越来越少。为了达成缔造一个统一繁荣国家的目标，经过半个世纪彻底的体制结构改革，哈布斯堡政权放弃了许多目标，以便撤销其中央集权实践中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内容。1815年之后，上述的国家建构往往演变成保留还可以拯救的部分，而不是去实现一个理想的目标。一个沮丧泄气的帝国官僚体系发现，它的目标已经失去了更深层的意义，它存在的目的只是维护现状，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社会。

不过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在社会的一些方面仍然具有活力。在农民，特别是加利西亚的农民中，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帮助他们从庄园主和行政官员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象征性希望。对逐渐建立起来的中产阶层社会而言，帝国往往成为某些可能性的象征。譬如社会阶层流动，以及他们的祖国从一个只有贵族获利的社会，向着为所有人的福祉服务的社会变化。对各州的贵族们，尤其是匈牙利的贵族而言，从帝国部分的

退让中得到了好处，于是他们重新开始主张自己的传统权利。他们经常使用一种新的民族权利理论，来为他们在人民大众中的事业正名。当然，在整个奥地利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任何试图开倒车的行为，其实现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

1. 《民法通则》适用于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但在一开始，帝国政府计划将它推行到帝国的其他区域。

2. Paula Sutter Fichtne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490–184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14.

3. 这个正在发展的警察国家中，有若干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约瑟夫二世的时代（见第二章），在约翰·安东·柏尔根伯爵的领导下，帝国在1789年设立了一个法警组织。

4. David Laven,“ Law and Order in Habsburg Venetia, 1814–1835,”Historica lJournal vol. 39, no. 2 (June 1996): 396, 403.“Laws were upheld, and it was an obsession with law which dominated the whole regime; this fact was reflected in the enormous stress placed on its study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a government career” (ibid., 396).

5. 许多观察者批评，所谓计划中的司法独立其实从未实行过，特别在地方层面，贵族世代把持的法庭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6. Waltraud 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Bürokratie und Beamte in Österreich 1780 bis 1848 (Vienna: Böhlau, 1991), 51.

7. Ibid., 51.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alaries and inflation, see 159–179.

8. 尽管在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识字率在这一时期稳定大幅上升，私人技术机构/ 院校的数目和招收人数也得到增加，但政府的教育政策陷入了僵局。Gary B. Cohen, Education and Middle-Class Society in Imperial Austria 1848–1918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23. On the University environment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see Deborah Coen, Vienna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Science, Liberalism,and Private Lif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35–38.

9. 奥地利在1811年设立的专利制度，给予机械发明的发明者们长达10年的专有权。之后这项制度在1820年进行修订，将农业和化学方面的新技术也纳入了专利范围之内。See David Goo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4.

10. For Silesian examples of this anti-state use of the term“ nation” in the 1830s and 1840s, see Dan Gawrecki, “Regionale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en in Österreich-Schlesien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in Die Grenzen der Nationen. Identitätenwandel in Oberschlesien in der Neuzeit, ed. Kai Struve and Philipp Ther (Marburg: Verlag Herder Institut, 2002), 111–134.

11. In general on the reform movements and activists on the 1830s, Gabor Vermes, Hungaria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711–1848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U Press, 2014), 247–288.

12. .Istvá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24–26.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titl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texts are taken from Deák. On Széchenyi's writings and the reactions they generated, Vermes, Hungarian Politics and Culture, 252–260. Vermes坚称，尽管塞尔切尼《信贷》的主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实际上信贷的含义也催生出从要的道义责任。

13.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26–27, 38–39.

14. For an excellent formulation of this idea of the promise of the strong state and the failures of the weak state, see Konrad Clewing, Staatlichkeit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sbildung. Dalmatien in Vormärz und Revolution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1), 69–102.

15. Statistics drawn from Good, Economic Rise, 45; Fichtner,Habsburg Monarchy, 119; and Don José Marugány Martín,Descripcion geográfica, fisica, politica, estadistica, literaria del reino de Portugaly de los Algarbes, comparado con los principales de Europa (Madrid: en la Imprenta Real1833), 2:301. 根据Marugán提供的数据，1830年米兰拥有15万居民，威尼斯有10万人，利沃夫5万人，德布勒森4.2万人，的里雅斯特4万人，格拉茨3.4万人，布达3.3万人，布尔诺2.8万人，普莱斯堡2.6万人，克卢日2.5万人，独立城市克拉科夫2.5万人，布罗迪2.4万人，扎格瑞布1.7万人，锡比乌1.66万人，弗尔沙茨1.6万人。整个欧洲只有伦敦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人，巴黎人数则接近100万。英国有8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另有其他一些资料，认为的里雅斯特人口超过4万的时间在10年前的1820年。

16. Quoted in Robert Nemes, The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

17. For statistics on Trieste, see M. Breschi, A. Kalc, and E. Navarra,“ La Nascita di una città. Storia minima della popolazione di Trieste, sec. XVIII– XIX,” in R. Finzi and G. Panjek, eds.,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i Trieste: Vol. 1: La città dei gruppi 1719–1918, ed. Finzi and G. Panjek (Trieste: Lint editorial 2001), 69–237.

18. J. Bromuss [Jan Ohéral],“ Bilder aus dem industriellen Leben Brünns (1838),” in Jung Österreich.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liberalen Österreichischen Opposition 1835–1848, ed. Madeleine Rietra (Amsterdam: Rodopi 1980), 255.

19. For bot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ilways, see especially Andreas Helmedach, Das Verkehrssytem als Modernisierungsfaktor. Strassen, Post, Fuhrwesen und Reisen nach Triest und Fiume vom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isenbahnzeitalter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2).

20. Good, Economic Rise, 65. Good estimates that in 1847 Austria's primary road system amounted to over 96,000 kilometers (almost 60,000 miles).

21. Nemes, The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116.

22. On the Austrian Lloyd, see Alison Frank,“ The Children of the Desert and the Laws of the Sea: Austria, Great Brita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Mediterran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HR 117/2 (2012): 410–444, especially 415. See also Frank, Invisible Empire: A New Global History of Austria (Prince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3. Clewing, Staatlichkeit, 68, 236.

24. Günter Dinhobl,“ ‘ …die Cultur wird gehoben und verbreitet.’ Eisenbahnbau und Geopolitik in Kakanien,” in Zentren, Peripherie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en in Österreich-Ungarn, ed. Endre Hárs, Wolfgang Müller- Funk, Ursula Reber, Clemens Ruthner (Tübingen and Basel:Francke, 2006), 79–96, here 82.

25. 盖斯特纳同时还是布拉格理工学院的教授和首任校长。他最初的计划获批，却被一直拖延到1809年与拿破仑开战时才得以动工。

26. 这个项目得到了三个维也纳银行家族总计90万盾的资助，这三个家族是西纳家族、戈耶穆勒和斯塔梅茨。但最终的花费远多于此。

27. 因为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和超支问题，这条线路直到1832年才宣告完成。它是欧洲大陆第二个铁路项目（欧洲第一的铁路项目完成于法国圣艾蒂安）。在19世纪60年代，这条铁路线被改造成蒸汽机车适用的铁路。

28. 里普是维也纳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他还是奥地利在摩拉维亚维特科维奇尝试第一次建造焦炉时的顾问。之后，他起草了全帝国铁路网的详细建设计划，具体内容可见 Burkhard Köster, Militär und Eisenbah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25–1859 (Munich:R.Oldenbourg Verlag, 1999), 54。

29. “ Bauperiode und Streckenklassifi zierung des Eisenbahnnetzes 1824–1914,”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ed. Helmut Rumpler and Martin Seger, Band IXSoziale Strukturen, 2. Teil Kartenband, 249. 博赫尼亚铁路线直到1856年才全线完工，不过在1847年，这条铁路线已经到达西里西亚。想要了解更多维也纳– 布尔诺线开创过程的细节以及大众对早期铁路的担忧，可见Chad Bryant,“ Into an Uncertain Future: Railroads and Vormärz Liberalism in Brno, Vienna, and Prague,” AHY 40 (2009): 183–201, especially 186–187。

30. Ibid., 187. 到了1845年，北部铁路每年运送乘客65万人次，以及1.09亿千克的货物。

31. See the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is argument in Good, Economic Rise, 65–67. 菲希特纳给予这种关系一个更传统的特点描述：“作为军队战略前哨站的地方往往不一定适合成为贸易和制造业中心。这种失调的局面至少使一部分学者认为，国营铁路线对哈布斯堡王朝早期工业化做出的贡献较为有限，这和欧洲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Habsburg Monarchy, 116). Köster则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铁路的建设并不总是追随着经济需要。Köster, Militär und Eisenbahn, 53–54.

32. Köster, Militär und Eisenbahn, 237.

33. Ibid., 77.

34. Dinhobl, Eisenbahnbau and Geopolitik, 83; Köster, Militär und Eisenbahn,158.

35. For the example of Ungarisch Hradec / Uherské Hradiště, see Jiri Coupek, “Ungarisch Hradisch—Bürgertum und Stadtpolitik,” in Kleinstadt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62–1914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monarchie IX), ed. Peter Urbanitsch and Hannes Stekl (Vienna: Böhlau, 2000), 355–381.

36. 这些技术挑战包括在塞默灵的高山联运，以及铁路需要穿过卢布尔雅那沼泽和危险的喀斯特地形区。

37. For an analysis of the limited forms of self-administration or redress created by the Josephene reforms, see Kai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in Galizien. Über Zugehörigkeit und soziale Emancipation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k & Ruprecht, 2005), 72.

38. Larry Wolff , 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 36, 134.

39. John- Paul Himka, 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15.

40.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75–77. The Stanislau example is taken from the year 1839.

41. Himka, Galician Villagers, 21.

42. For these statistics and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Clewing, Staatlichkeit, 53–64. Clewing effectively and decisively rejects accusations of a deliberate Austrian policy to isolate Dalmatia from Croatia (ibid., 68).

43. Memoria statistica sulla Dalmazia. Di Francesco Zavoreo, capitaníо ingegnere ex-veneto e direttore provvisorio dei lavori edili e idraulici in pensione (Venice: Molinari, 1821), quoted in ibid., 122 (emphasis added).

44. Examples cited in ibid., 123 (emphasis added).

45. 匈牙利和伦巴第地区没有遵从约束帝国其他区域教育事业的学校法律。Rumpler, Mitteleuropa, 111–113.

46. 到了1914年，与西欧和中欧其他国家相比，奥地利的识字率高得令人印象深刻。有了这些数据，再也没有人怀疑它所取得的成就。1914年，奥地利的文盲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6.52%，法国的文盲人口是总人口的15%，意大利则是45%。Clewing, Staatlichkeit, 114.

47. Ibid., 124, emphasis added.

48. Visitationsbericht zur Lage der Diözese Zadar, by Joseph Nowak, archbishop of Zadar, quoted in ibid., 113–114.

49. Ibid., 69–70.

50. Laven,“ Venetia,” 400.

51. Ibid., 401–402. 警察们同情他们关注的对象的情况让人联想到“一战”期间，本地警官抱怨当地人的报告，这些报告我们将在第八章内读到。

52. Michal Chvojka, “Buchhändler und Bücherschmuggel ausländische Drückschrift en als Politikum im österreichischen Vormärz,” Bohemia 50(2010): 351–355. 埃文斯注意到匈牙利社会在审查制度方面要比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宽松得多。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188.

53. Friedrich Engel-Janosi, “Der Wiener juridische-politische Leseverein: seine Geschichte bis zur Märzrevolution,” Mitteilungen des Vereines für Geschichteder Stadt Wien 4 (1923): 58–66, here 65. Gerhard Pfeisinger发现，这些在本地咖啡厅和剧院中进行的讨论要比那些在约翰诺伊姆学校中进行的更公开、更政治化。Pfeisinger,“ Der Revolution von 1848 in Graz”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alzburg, 1985), 16, 25–28.

54. Engel-Janosi,“ Wiener juridische-politische Leseverein,“ 58–66.

55. See generally chapter 5,“ Was Metternich’s Austria a Police State?” in Alan Sked, Metternich and Austria: An Evalu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23–177.

56. Cited in ibid., 126.

57. Faustin Enns, Das Oppaland oder der Troppauer Kreis, nach seinen geschichtlichen, naturgeschichtlichen, bürgerlichen und örtlichen Eigenthümlichkeiten, 4 vols. (Vienna: Carl Gerold, 1835).

58. Ibid., II:151–152

59. Ibid., I:vii.

60. “人们不能期待在这儿看到我们先祖美丽且激动人心的肖像画——甚至我们自己都不能确定他们是谁。” Ibid., I:vii.

61. Ibid., II:152.

62. Enns, Das Oppaland, 2:153–153.

63. Ibid., II:157.

64. Ibid.,“ Das Troppauer Museum,” 2:157–159.

65. See most recently Rita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Statu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Habsburg Bohem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On the“ Ossolineum” in Lemberg / Lwów / Lviv, see Wolff , The Idea of Galicia, 81–85; Thomas Weidenholzer,“ Bürgerliche Geselligkeit und Formen der Öffentlichkeit in Salzburg 1780–1820,” in Bürger zwischen Tradition und Modernität.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 ed. Robert Hoffmann, in cooperation with Gunda Berth-Scalmani and Thomas Hellmuth (Vienna: Böhlau, 1997); Anton Schlossar, Erzherzog Johann von Oesterreich und sein Einfluss auf das Culturleben der Steiermark. Originalbriefe des Erzherzogs aus den Jahren 1810–1825 (Vienna: Braumüller, 1878), 20; Werner Telesko, Kulturraum Österreich. Die Identität der Regionen in der bildenden Kunst des 19. Jahrhunderts (Vienna: Bählau 2008), 379–381.

66. Zdeněk Hojda, “Patriae et Musis. Počátky Obrazárni Společnosti Vlasteneckych Přátel Umění v Čechách” in Artis Pictoriae Amatores: Evropa v Zrcadle Pražského Barokního Sběratelství, ed. Lubomír Slavček (Prague: Národní galerie v Praze, 1993), 311–316, also cited in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144.

67. Helperstorfer,“ Vereinswesen,” 320.

68. Otto Hwaletz, “Zur ökonomischen, sozialen und ideologisch-politischen Formierung des industriell-gewerblichen Bürgertums. Das Beispiel der Industrieverein,” in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ol. I, ed. Bruckmüller et al. (Vienna: Böhlau, 1990), 177–204, here 192–194.

69. Anton von Kraus-Elisago, Bericht über die dritte allgemeine Gewerbenausstellung (Vienna, 1846), quoted in Wolfgang Häusler, Von der Massenarmut zur Arbeiterbewegung; Demokratie und soziale Frage in der Wienerrevolution von 1848 (Vienna and Munich: Jugend und Volk, 1979), 68.

70. Elke Wikidal, “Gewerbe und Industrieausstellungen im österreichischen Vormärz. Ihre Entstehung und Bedeutung im Kontext der industriellen Entwicklung der Zeit,” Diplomarbeit, Uni. Wien, 1994.

71. Quoted in Gabriella Hauch, Frau Biedermeier auf den Barrikaden. Frauenleben in der Wiener Revolution 1848 (Vienna: Verlag für Gesellschaft skritik, 1990), 45.

72.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100.

73. Laurence Cole, Military Cultur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1–262.

74. Clewing, Staatlichkeit, 242–244.

75. Franz Petter, Dalmatien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Beziehungen (Vienna: Sommer, 1857), 2:13.

76. Frank Henschel, "'Das Fluidum der Stadt…' Lebenswelten in Kassa / Kaschau/ Košice zwischen urbaner Vielfalt und Nationalismus 1867–1918"(PhD diss., University of Leipzig, 2013), 213, 171. Henschel引用了作家Sándor Márai热情记录下的科希策议事/ 讨论文化，Márai写道："在这里，报纸和期刊被大量付印，同时在匈牙利平原的乡镇中，人们聚集在一起杀猪，作为整个冬季'知识生活'的高潮，年年如此，少有例外。" Márai还认为，19世纪早期，在科希策销售的书籍要多于在佩斯售出的书籍（178）。

77. Robert Nemes, Another Hungar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ovinces in Eight Liv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manuscript version, 158.

78.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119.

79. Robert Nemes, The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63.

80. Anna Millo," Trieste, 1830–1870: From Cosmopolitanism to the Nation," in Different Paths to the Natio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Central Europe and Italy, 1830–1870, ed. Laurence Co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68.

81. 关于产业协会的内容，详见Hwaletz," Industrieverein," 177–204.

82. 这些机构中约有13个在国内的非匈牙利语区建立。Friedrich Gottas, "Grundzüge der Geschichte der Parteien und Verbände," in Geschicht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8,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Zivilgesellschaft , ed. Helmut Rumplerand Peter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06), 1133–1168, here1139.

83. Hauch, Frau Biedermeier, 54.

84. See Brian E. Vick,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ower and Politics after Napole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also Margarete Grandner and Edith Saurer," Emanzipation und Religion in der jüdischen Frauenbewegung. Die Faszination der Assoziation," in Geschlecht, Religion und Engagement. Die jüdischen Frauenbewegung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19. und frühes 20. Jahrhundert, ed. Grandner and Sauer (Vienna: Böhlau, 2005), 8–10, which according to Vick underestimates the number of branches.

85. Nemes, Another Hungary, 158.

86. See especially the rich analysis provided by Nemes, Budapest, 83–106.

87. For these examples, see Hauch, Frau Biedermeier, especially 45–47 and 53–55.

88. Millo," Trieste," 65–67. Börries Kuzmany, Brody. Eine galizische Grenzstadt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Vienna: Böhlau, 2011), 135–137.

89. On Silesia, see Gawrecki, "Regionale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en in Österreichisch-Schlesien," 111–134.

90.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96–97, 101.

91. 在当时发行的总计191份报刊中，只有33份以匈牙利语出版面世。

92. Géza Buzinkay,“ B. Die ungarische politische Presse” and Lothar Höbelt,“A. Die deutsche Presselandschaft ,” both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Geschichte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1895–1897 and 8: 1880–1883, respectively. See also Gottas“ Grundzüge,” 8:1137–1138. 不过内梅什注意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布达和佩斯，匈牙利语出版物的读者群要比德语读物的读者群增长得更快。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叶，布达和佩斯的匈牙利语出版物发行量已经达到1万份，而德语出版物相比之下只有5 000份。内梅什还指出在这两座城市中，有不少人可能同时阅读两种语言的读物。Onceand Future Budapest, 65.

93. Martin Sekera, “C. Das tschechische Pressewesen,”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Geschicht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1977–2036, here 1978–1980.

94. Clewing, Staatlichkeit, 57.

95. 著名民俗学研究者吴克·斯蒂凡诺维奇·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在创造南部斯拉夫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将黑塞哥维那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认为当地拥有这种语言最完美的形式。Edin Hajdarpasic, Whose Bosnia?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kans, 1840–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015), 20–37.

96. Joachim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Die Anfänge der nationalen Differenzierungs-prozesse in Krain und der Untersteiermark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r Revolution 1768 bis 1848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6), 246–247.

97. Table reproduced in ibid., 250. See also 1845 statistics, ibid., 249–249.

98. Leopold von Hasner, Denkwürdigkeiten. Autobiographisches und Aphorismen (Stuttgart: Cotta, 1892), 17.

99. [Eduard von Bauernfeld], Pia Desiderata eines österreichischen Schrift-stellers (Leipzig: Wigand, 1843), 15, 50.

第四章｜帝国谁属：1848—1849年革命

> 我们的兄弟们负伤躺在街道上，他们无畏痛苦，只想着自己的祖国。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人神圣的血将帝国的所有人彼此结合得更紧密，也把他们与皇座紧紧相连……
>
> 就让他们的血成为连接我们的纽带，在我们之中产生兄弟般的情谊。
>
> ——卡尔·希克尔（Karl Hickel），《1848年3月13日的受害者》（*Die Opfer des 13. März 1848 ein Erinnerungsblatt*）

1848年春，当欧洲大陆爆发一连串革命时，奥地利的活动家们亦冒着被迫害和流血的危险，努力实现他们复兴帝国的目标。在具有革命倾向的俱乐部、报纸、市镇议会以及国会中，人们讨论着正在施行的政治与社会政策，以及它们大胆的新试验，它们奠定了之后半个世纪帝国社会中政治斗争的基础。在过去，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各州议会和地方贵族与帝国的对抗上，社会中的其他人只是旁观者。但是1848年的革命中，农民阶级和中产阶层的活动家闯入政坛，推动他们的计划，并详细阐述他们自身的政治语言。与此同时，过去占据奥地利政坛的人急忙迎头赶上，试图让他们自己的理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1848年的革命震动了整个奥地利帝国（事实上整个欧洲都在这一年震荡不已），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读到，这个帝国建立在各种公共组织和公共交流之上，它们没有形成一股单一的力量，而是引发了许多次革命，其中一些较之其他尤为成功。举例来说，这其中的一次革命是贵族精英试图通过取得政治自治来扩张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从而与官僚化的帝国对抗，甚至从奥地利帝国中独立。而另一次发生在城市中的革命，则试图通过缔造一个用来监督国内官僚的宪政帝国，让帝国的官僚体系服从于社会意志。上述两次革命都为新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空间，从而让革命者们得以与国家谈判，更有效地影响它的政策。不过之后的第三次，也是以最激烈手段产生的革命，则扫除了帝国乡间的农业封建残余。如果未能掀起民众参与的热潮，这三次革命无一能获得成功。

1848年，关于帝国理想角色的问题，或者说是帝国本身的理念落在

了上述三项革命各自的核心之处。绝大多数革命者排斥奥地利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除了意大利半岛和匈牙利的某些地区）。与此相反，他们为了获得能够重塑现有帝国的目标与结构的权利而努力奋斗。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兼捷克民族主义活动家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1798—1876）曾言："如果奥地利帝国没有存在这么长时间，它将对整个欧洲的利益有益，也会有助于尽快营造人道。"他因此句成名，而他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注在1848年，这些人相信他们受益于帝国的存在，并且急于明确他们对这个国家将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渴望。

鉴于以上原因，许多革命者自诩为哈布斯堡王朝真正理念的守护者，他们使用一种强调自身希望的语言，而他们的希望是恢复王朝据称在不久前已经被抛弃的合法性。这些投身革命的男女认为法律和既定的规则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定义了哈布斯堡王朝，但王朝的官僚政权已经远远偏离了尊重它们的道路，因此革命者用这个名义来为他们的反叛正名。不过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革命者们明显的亲帝国态度，并没有削弱他们各种要求所具有的激进性、分裂性和不受欢迎性。恢复对法律和正当程序的尊重，对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它们可以从加强行政自律到对中央的完全彻底拒绝。反之，这还可能意味着利用中央的力量来达到政治上的激进目的，譬如彻底解放农民阶级，或者给予议会中非贵族身份的公民投票权。

加利西亚：令人不安的序幕

1846年2月22日，起义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跨过维斯瓦河，从奥地利来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Cracow），大胆宣告一个独立的波兰重获新生。为了煽动起义，这些人穿过河流，将民族主义的解放讯息传到了奥地利的加利西亚。不过在那儿，事情却并不按照计划发展。起义以惨败告终，但造就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奥地利政府。波兰民族主义者叛乱令人惊讶地迅速失败，是因为加利西亚西部各个村落中的农民们揭竿而起屠杀反叛者，造成了多达700—1 000人的可怕伤亡。注这些血腥的屠杀事件阴森可怖地提醒人们注意农民的怒火。更重要的是，这表现出革命动荡期间，帝国在农民心目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功能。

在起义之前，反叛者们决定不向加利西亚农民谋求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因为他们明白，只要给予农民任何结束封建生产关系的表示，他们就会自绝于自身所在的特权阶层，对反叛者中的绅士地主来说尤其如此。而加利西亚农民在攻击反叛的领主们时，往往宣称他们效忠于斐迪南皇帝。以这种行为，农民们向帝国政权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因为他们相信，后者要比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们更能支持他们的利益。农民们在1846年屠杀他们的领主，充分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波兰人”，他们对这个词，以及曾经创造的波兰国家的历史记忆，都赋予了负面的意义。当波兰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在一个村落说服农民，声称只要奥地利人被驱逐，他们的境遇会大大改善时，农民们回答：

> 不，尊敬的先生，事情不会是那样的。你们只是想要赶走这片土地上最仁慈的统治者（指哈布斯堡皇帝），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向毁灭。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在波兰联邦还存在的时候，领主们可以肆意殴打农民，而农民们求告无门……如果你们把皇帝赶出这片土地，那么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尝尝称孤道寡的滋味，你们也会像过去波兰联邦存在时那样随意殴打这里的农民们。

加利西亚的农民们不仅拒绝为反叛者提供支持，他们还主动袭击叛乱分子以及这些人的家眷与土地经纪人，之后将尸体和幸存者一并交给哈布斯堡当局。同时农民们还销毁一切他们能找到的封建文书，希望此举能摧毁构成他们肩上农奴制枷锁的基础。于是哈布斯堡当局的军队不得不插手阻止农民的暴力行为，从这些奥地利爱国农民的怒火中保护那些民族主义叛乱者，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

1846年在加利西亚发生的可怕事件尽管十分极端，但给了我们农民对奥地利帝国态度的一个估计标准（虽然这种情况多半是形势使然）。波兰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贵族们把自己的叛乱描绘成反抗奥地利政权压迫，为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加利西亚农民则更倾向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哈布斯堡的皇帝站在他们与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中地主残忍的皮鞭暴政之间，抵挡住了后者的威胁。因此这些农民并没有什么民族团结的博大情怀，来驱使他们跟随波兰贵族反抗哈布斯堡君主国。1864年革命的血腥结果既表现出19世纪中叶波兰民族主义在其要求上狭窄的社会基础，也表现出农民们如何回报对他们自身目的有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理念。

作为起义失败的结果，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梅特涅政权都开始持续不懈地开展宣传工作，博取欧洲其他地区的同情。注 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双方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即加利西亚农民主动保卫帝国的行为立即淡出了公众视线。波兰民族主义者宣称哈布斯堡政权用黑心钱收买了轻信的农民们，否则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支持自己的民族领袖。同时，作为欧洲政治社会现状的维持者，梅特涅不能在任何场合承认农民们暴力行为的正当性，哪怕他们这么做是为帝国服务。注

叛乱结束之后，无论是帝国还是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都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去改善当地农民令人绝望的处境。直到下一个10年，波兰民族主义者改变了策略，邀请农民在他们的民族主义事业中分一杯羹为止。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所有存在封建农业生产关系问题的州，除非帝国政权制订出一个适用于全部州的可行解决方案，否则帝国什么也做不了。这个解决方案迫使财政上别无选择的国家面临一个不可能应付的挑战：补偿所有地主因为失去强制农民劳动力而造成的损失。但即便如此，加利西亚的叛乱还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革：它给予奥地利一个把克拉科夫自由市并入加利西亚的借口。

1846年的起义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即将在之后的两年内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重要革命模式。首先，尽管社会上的不幸十分严重，但是它们并没有在1846年的加利西亚产生出革命。反而是当地的特权集团，它们希望能够在决策方面，尤其是在所在州的决策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因此一旦窥到机会，就会组织叛乱。1846年，波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此来恢复他们的权势。1848年，匈牙利贵族精英也在谋求同样的东西，试图将匈牙利从帝国中独立出来。但与此同时，地方城镇中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也希望能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占据一席之地。1848年的革命中，他们纷纷在一开始组织起来，支持贵族与中央对抗，但很快他们就在公民权利、政治代表制度和地方权力运用等议题上与贵族分道扬镳。就像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况，贵族希望借1848年的革命重建他们的权力，因此发动了革命，不料却把权力分给了其他社会群体。

如果说特权和不幸共同支撑起了1848年的叛乱与革命的话，它们在全帝国的范围内也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旦反叛的特权群体在1848年3月颠覆了旧政权，社会不幸带来的影响——以及一股强大的体制不

公愍——往往会让农民和工人加入乱局，使得原本的革命变得更加激进。1848年，正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骚动迫使帝国政权同意更具特权的反叛贵族群体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且让这些群体试着重建秩序。而农民与工人引发的骚乱，与一开始叛乱贵族们提出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多少关系。农民们的目的是获取土地，以及抵制劳役制度；至于城市大众的愤怒则来自严重的食物短缺与飞涨的物价，或是产业工人因为工厂引进机械或者女工而产生的敌意。农工结合产生的效果令帝国政权惊恐不已，帝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此刻正忙于在意大利半岛各地征战，因此帝国政府吓得只能授权给贵族与中产阶层的革命者，让他们撰写宪法，推行新的统治形式。

上述提到的革命动力表现出思考反叛者与帝国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点。社会中最低下的阶级积累了许多对贵族领主和雇用他们的实业家的不满，但这些人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却抱有一个相对积极的印象。因此，一些反叛的特权群体就采取权宜之计，把忠于皇帝的言论思想纳入自己的革命理论之中。反叛者们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让一个本质上良好，但如今陷入混乱的体制重新恢复平衡的举动。而他们描述的体制混乱通常受到一些倒霉的替罪羊影响——这个角色通常由梅特涅出演；或者，这个体制被围绕在神经错乱的皇帝周围的那些反动势力的阴谋所影响，这些反动势力通常被称为“朝廷中的奸党”。在此我们要引用一下匈牙利革命者对他们行动的描述，他们声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合法的革命”。注

其次，加利西亚的事件还凸显出近来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科技的进步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848年表现出的几个结果。譬如在1846年，波兰叛乱者和帝国政府都积极通过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来取得民意支持，这些宣传手段中，最突出的就是正不断发展的平面媒体。同样，奥地利将领们在同一年惊讶地发现，近代化的铁路在运输部队和武器上极其高效。注大众传媒和铁路虽然都还在各自的起步阶段，但1848—1849年，从匈牙利革命家路易斯·科苏特到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等著名人物，都成功地使用这些工具强大的潜力，改写了一些事件的结局。

最后，在所有产生于1846年，又在1848年革命中重现的种种因素中，伴随着加利西亚失败起义的那种民族主义理论怎么样了呢？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者用民族主义的理论来将他们与奥地利决裂的行为合法化。不过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其他地方，民族主义的要求却不像匈

牙利那么清晰、急迫，具有群众基础。虽然这两年间有不少政治理论致力于达成“民族身份”或“民族解放”，甚至是“统一一个德意志/意大利国家”的目标，不过在提起国族概念时，不同的人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所谓的“nation”，指代的只是传统意义上那些出席各州议会的特权阶级吗？或者这个概念像中产阶层主张的那样，包括在一个享有共同的语言与文化的大众社群中，不同阶级的所有人？绝大多数1848年的革命者们赞成更具社会包容性和影响力的后一种解释，而旧式精英观点的支持者们正加快推广应用他们的观点，将其加以修改，使其具有贵族为更平民化的大众发声的意义。

然而上述观点逐渐扩大化的趋势，并没能给民族身份这个概念背后长期以来的争端画下句号。我们至今还会遇见其中的一些争执。我们会遇见以下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国家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包含了一个特定历史地域，比如波希米亚、施蒂利亚或匈牙利王国等土地上所有居民的国家？还是说人们会跨越传统行政区域的边界，以一群人共享的语言遗产来界定国族身份？波希米亚的捷克语使用者，可以和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说捷克语的居民共同形成一个民族吗？一个民族的成员是不是天生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真像很多民族主义者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最初几周内所宣扬的那样，天生就具有兄弟般的情感吗？还是说民族之间的关系，像另一些民族主义者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所主张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因为获取国家资源或领土要求而彼此冲突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单个民族应当如何与奥地利、与哈布斯堡王朝这个祖国产生联系？

在1848年的民族主义者们提出众多计划的同时，农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它们抱有疑虑或者无视它们。这些计划通常只是谋求扩展那些具有一定权力的国民的政治影响力，农民们试图改变他们的经济处境，但这些有权势者却倾向于稳定和维持现状。此外，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很少有民族主义领袖将农民的需求看作他们计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计划中所有的，只是一些终结封建制度的含糊承诺。

城市的骚动

1848年1月，意大利半岛上爆发了一系列叛乱，叛乱最初的爆发地点在西西里，之后向北蔓延。梅特涅政府随即派遣军队保卫帝国在意大

利的伦巴第–威尼斯领地，以免它受到骚乱的影响。然而1848年2月，巴黎人民发动革命废黜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消息随即使得奥地利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宛如箭在弦上。

事实上，早在前一年梅特涅和匈牙利议会的公开较量逐渐升级的时候，革命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当然毫不令人意外，事件的直接起因是由来已久的财政问题。应当如何改革匈牙利的财政制度，并稳定它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系？事实上，从梅特涅到更谨慎的塞切尼，或是更激进的科苏特与实用主义的迪克（Deák），这些政客们一致同意，这些基本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他们在具体解决措施上的分歧，要比讨论谁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时产生的异议小得多。理论上说，为了改革整个封建制度，分别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弥合那些相对较小的政策分歧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譬如促进税制改革，以便让贵族最终负有缴税责任；改善通信和交通网络，加快匈牙利的经济现代化；修改匈牙利的法律，使其更贴近帝国其他地方的法律等。但是改革权限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谁最终拥有决定这些改革议题的权力？是匈牙利议会，还是位于维也纳的中央政府？

19世纪40年代，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匈牙利的咖啡厅、报纸与讨论圈子等初步形成的公共领域中反复出现。匈牙利活动家们越来越多地将冲突界定为国王与议会（或者国王的政府与拥有6 000名公职人员的自治州郡）之间，“维也纳局外人”与“爱国的匈牙利”两者的争斗。那些自诩爱国的媒体，经常极尽夸大地登载每一个政治人物援引匈牙利历史，使用匈牙利语言，甚至按照正时兴的“匈牙利民族风格”着装的决定。而每一次维也纳方面做出让步，比如1847年决定用匈牙利语取代惯用的拉丁语，成为议会用语的举动，都只会因民族象征与所谓民族受到藐视而产生新冲突。

19世纪40年代，梅特涅政府削弱匈牙利贵族与王权对立的策略，总有引发农民不满的危险。梅特涅往往用单方面解放匈牙利农民的威胁手段，来回应议会中的反对派。通常来说，这足够迫使议会中更保守温和的大多数在短时间内勉强妥协。但自从1846年加利西亚叛乱后，即便是解放农民这一招屡试不爽，梅特涅也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不再威胁解放农民，而是试图引入可以实现绝大多数改革需求的相关立法，作为战胜反对派的王牌。

不过要召开议会会议，就意味着需要举行选举。即便只有很少一部分匈牙利人有权投票，1847年举办的选举还是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兴趣，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狂欢。匈牙利城市社会生活已经完全被热烈的政治讨论所主宰，在佩斯，选举活动比以往更受欢迎，虽然在这座城市中，有资格投票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得微不足道：全城60万人中，只有1.4万人拥有投票权。[注]反对派的支持者们庆祝了好几次胜利，其中就包括激进的报纸主编科苏特以及较为温和的费伦茨·迪克和塞切尼成功当选。[注]不过选票的数据提醒我们，这场选举背后政治化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多么有限。举例来说，虽然佩斯对选举活动极尽宣传之能事，科苏特只以2 948：1 314票的结果战胜了对手，更多有资格的选民甚至从未现身投票。

当议会于1847年11月在普莱斯堡召开时，很难说究竟是政府的计划，还是反对派的提案在思想上更具革命性。[注]当然，在很多匈牙利人的想法中，反对派站在爱国且明确的匈牙利立场上，与“外国的”、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帝国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议会会议期间，学生们蜂拥至旁听席，他们对反对派的支持不断水涨船高，政府还是很快成功回避了反对派的方案。为此议会威胁要像过去的几次议会会议那样，完全终止会议讨论。

正在此时，法国革命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给普莱斯堡的反对派注入了一针新的强心剂。3月3日，在一场议会代表间的非正式会议上，科苏特发表了一番令事件更趋激化的演说。他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内阁，来对选举出的国会（指匈牙利议会）负责；科苏特还要求向贵族征税，结束农民的劳役压迫，补偿地主，并给予城市中产阶层和较富裕农民投票权。此外，他还呼吁重组哈布斯堡军队，使其反映匈牙利人的利益，并且出台一部全帝国适用的宪法。

科苏特的演讲立刻就引起了轰动。演讲内容被翻译成德语，迅速印刷成小册子风行于维也纳，人们在主要的大学公共会堂，之后又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阅读它。维也纳大众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在3月13日召开的下奥地利议会会议上。[注]本地的阅读和职业俱乐部成员们在采取一些政治行动和表达对社会底层潜在不稳定的恐惧之间犹豫不决。3月4日，属于社会精英的法政阅读协会要求彻底革新政府与行政系统，并且要武装市民维护城市治安。该协会还要求削减警察势力，终结审查制度，着手实施宗教、教育与司法方面的改革，以及在维也纳设立一个

中央国会，承担整个帝国的立法工作。而与此同时，一个地位举足轻重的俱乐部成员警告同侪，假如煽动聚集在维也纳市郊的失业纺织工人与机械工人发动公开骚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危险结果。

当3月13日星期一到来时，人潮聚集在围绕着兰德豪斯（Landhaus）会场的狭窄街道上，公众对会议的热情可见一斑。这天一大清早，在害怕的政府考虑关闭城市大门之前，庆祝传统“蓝色星期一”的工人们就已经进入了内城，准备加入一场计划妥当的学生游行示威中去。就在吵吵嚷嚷的学生队伍从附近的大学来到兰德豪斯时，人群已经将附近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高声喊叫着“他们来了”，欢迎学生们的到来，还有一些从高处敞开的窗户（这是个异常温暖的3月）朝下望的人则向人群投掷花束、彩带、花环，甚至还有少许珠宝。

正当人们等着代表们从兰德豪斯现身时，一个来自布达的年轻犹太医生阿道夫·菲斯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说。他的演说凝聚了在场所有人的愿望：要求结束审查制度，并且要求给予大学教学的自由。就在一些人大声宣读科苏特3月3日的演说后，要求梅特涅下台的呼声迅速扩散开来。一个由学生和医生匆匆组成的委员会将众人的要求传递给了议会。议会成员畏惧门外躁动不安的人群。于是派出一个代表团，带着改革的请愿前往霍夫堡皇宫，但就在同时，霍夫堡皇宫纠集了军队，终于关上了城市的大门。

在之后的骚乱中，军队试图清空兰德豪斯周边的街道，其间射杀了5人，射伤了更多人。当时的一些插画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众多资产阶级男女，以及体面可靠的市民突然发现他们处在军队的火力笼罩之下，惊恐万状。在这些人中最先倒下的是卡尔·海因里希·施皮策（Karl Heinrich Spitzer），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工艺学校犹太学生，他此后被赞誉为革命最初的烈士。在军队开火后造成的混乱中，一群工人攻击了士兵，维也纳市长也恳求政府让有财产的市民们武装起来（这些人不久前才被枪击），再代替不受欢迎的军队，代表政府安定城中局势。随着局面恶化，政府选择彻底投降，它撤出了军队，并允许市民持械。政府同样允许学生们在菲斯霍夫的领导下，组建一个学术界武装团体。到了3月15日，有3万名男性加入了市民卫队或者学界武装团，得到了武器。同时，一群绝望的大公们（他们是斐迪南皇帝的叔伯和堂兄弟们）朝梅特涅、不受欢迎的警察与审查主管谢德尔尼茨基伯爵，以

及匈牙利大臣哲勒格·阿蓬伊伯爵（Count György Aponyi）开火（梅特涅本人在事发时立刻化装逃离了维也纳），这在某种意义上已是一场宫廷政变。

随着整个维也纳陷入革命风潮，身在普莱斯堡的科苏特和他的同盟者轻松说服匈牙利议会认可他在3月3日演说中明确提出的宪政要求，并且会把这些要求上呈给皇帝。[注]于是一个身着盛装的代表团立即出发，搭乘多瑙河上的蒸汽船前往维也纳，准备在御座前提交请愿内容。与此同时，领导佩斯游行示威的一群年轻学生与激进派作家（即所谓的“青年匈牙利运动”）也赞成科苏特3月3日演说中的要求。3月15日，著名的激进革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Sándor Petöfi）公开朗诵了他在佩斯的比尔瓦克斯咖啡馆完成的《民族之歌》。这首颂歌的副歌部分反复强调，“我们在上帝面前为匈牙利人宣誓/我们宣誓不再为奴”[注]。这天下午，裴多菲在佩斯国家博物馆向数千名示威者发表了演说，演说结束后人群前往市政大厅。示威领导人在那里要求组建一个革命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是个取自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性名词，这样的情况在1848年革命中非常常见），由这个委员会管理布达和佩斯。到了这天晚些时候，大约有两万人跨过多瑙河，迫使布达的总督议会（即皇帝在本地的代理人）废除审查制度，命令军队停火，以及释放所有匈牙利政治犯（实际上只有一位）。[注]



1848年3月15日，皇帝斐迪南的顾问们在承诺颁布宪法后，接受一群狂热的维也纳居民的欢呼。原画作者是Johann Nepomuk Höfel（bpk, Berlin / Deutsches Historiches Museum / Arne Psille / Art Resource, NY）

让我们回到维也纳，3月15日在这座城市爆发了更多的示威游行，迫使斐迪南皇帝的顾问们承诺修订宪法，这一举动立刻引出不少向皇帝表达感激与忠诚的反应。同一天，一个由50名维也纳市民组成的团体聚集在一起，为本市选择并组建一个处理市政事务的临时城市议会，直到维也纳市民们可以投票选举出正式的。被选中的议会成员代表了坚定的保守派经济和社会利益，分别是小商人、工厂主、教授以及一位来自犹太人社区的代表。[注]

也正是在3月15日这一天，匈牙利代表团抵达了维也纳，获得大众广泛好评。当时的记录显示，数千人以欢迎革命英雄的方式迎接匈牙利代表团。热情的支持者们卸下了科苏特马车的笼头，亲自拉着马匹穿过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在前往皇宫的路上，马车走走停停，以便科苏特向人们发表演说。之后的两天，政府火急火燎地与匈牙利代表团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政府最终向匈牙利议会提出的所有要求让步，包括组建以拉约什·包贾尼伯爵（Count Lajos Batthyáni，1807—1849）为首的独立的匈牙利内阁。[注]对匈牙利人来说，革命意味着建立（或“重

建”）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统治的独立匈牙利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将独立于哈布斯堡王朝其他的领地。而在匈牙利之外的哈布斯堡王朝（包括维也纳）革命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当许多城镇得到这些突发事件的消息时，随之而来的是支持改革后政权的公众游行示威，以及少许地方行政上的人事变动。但在米兰和威尼斯两个大城市，这些消息激起了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注]当地绝大多数奥地利中上层市民大肆庆祝中央允许修订宪法一事，以此来宣示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让本地居民和国民自卫军镇压革命，并且阻止其他社会群体获得权力。事实上，我们震惊地发现，大半个帝国的奥地利人（还包括克罗地亚等隶属匈牙利的部分）回应维也纳发生的三月革命的方式，是公开将他们在地方机构获得话语权的诉求，和皇帝允许修宪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从而营造出更具参与性的帝国目标。本地市民创建地方自卫队的行为表现出他们希望对当地事务拥有话语权，而他们庆祝皇帝允许修宪的活动从帝国的层面上（从抽象意义上）将其表现了出来。

在上奥地利首府林兹这座拥有众多工人阶级人口的工业城市，市民领袖组织了游行，并在州立剧院举办了庆祝活动，当地的产业协会还资助了3月15日的火炬游行。林兹的中产阶层市民与学生们同样迫不及待地加入新建立的国民自卫军，维护城市治安。一位本地观察家满意地注意到林兹没有经历维也纳那样的工人阶级暴动，并强调革命并没有“扰乱本地工业的正常运作”[注]。

和维也纳同为大学城的施蒂利亚首府格拉茨，即将召开的议会会议使得人们注意力的焦点落在了和维也纳极其相似的请愿和游行上。3月14日，在一场席勒的《唐·卡洛》（*Don Carlos*）演出中，当剧情进行到波萨侯爵请求国王菲利普二世给予他的臣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在场的资产阶级观众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次日，一个代表团带着600名市民联署的请愿书出席施蒂利亚议会会议，要求“让来自商业和产业社群的市民们”选举市政府成员。请愿书中还要求让同一批市民拥有制定税收和教育政策、任免公职人员的权利，还要求推行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此外，人们还要求组建一支取代警察的市民民兵部队，终结审查制度，停止肉刑，以及消除教育方面“耶稣会士在本地的影响”，而早在半个世纪前，耶稣会士就已被禁止在当地活动。3月16日，格拉茨市政府向那些被认为“值得大众信赖”的市民分发了500支枪和300把佩剑。[注]

之后数日内，资产阶级的观察者们自豪地描述了贵族们与普通市民、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公务员在新民兵的队伍中并肩作战的情形。

3月16日，皇帝允许修宪和梅特涅出逃的消息通过新落成的南部铁路从格拉茨来到了下施蒂利亚城镇采列。“人们无限欢喜。”一份当地报纸如此评论。伴随着军乐声和炮响，“所有阶层的”人聚集在火车站，车站被人们用代表施蒂利亚的绿白两色装饰一新。接着人群从车站前往本地教堂，随即来到地区政府，在那儿为斐迪南一世欢呼，高唱皇帝的颂歌。城市的治安官在他的办公室上方悬挂了一条横幅，公开宣告“斐迪南一世，出版自由和人民议会万岁”。

在帝国的西边，卡林西亚首府克拉根福在3月16日收到通报革命消息的信件。据地方报纸报道，卡林西亚人以“一种普遍的喜悦情绪”接受了这些消息。人们聚集在中心广场周围的街道，其中大多数人佩戴白色帽徽，众人为皇帝欢呼，同时也给予维也纳市民不息的掌声。和林兹的情况一样，报纸自豪地表示，尽管人们因为革命消息激动不已，但当地没有发生不法事件，人们也没有破坏本地的平静。连续数夜，欢庆的克拉根福都灯火通明，一对对乐手被众人簇拥着，行经大街小巷，玛丽亚·特利莎的塑像也被人们用一面白色旗帜装点起来。3月19日，市民们组织了一支临时国民自卫军。当地男子合唱团体献上了一场庆祝演出，他们演唱了多首曲目，其中就有一首被认为受到大众欢迎的“日耳曼颂歌”。虽然在1848年之前，人们已经谱写了数首类似的“日耳曼颂歌”，但此番群众齐唱歌曲的行为折射出了奥地利人对席卷中欧的诸多动荡事件感同身受。本次革命的早期阶段产生了一个可预期的结果：无论是否能够付诸实施，至少在人们看来，它让创造一个“自由”的新德意志国家成为可能。

在距离采列西南方差不多50英里的卡尼奥拉首府卢比安纳，人们通过一位来自维也纳的旅行者了解到革命的消息（因为此时连接该地与维也纳的南部铁路尚未落成通车）。数小时内，许多人就佩戴上了白色丝带加入游行，表达支持斐迪南皇帝宪政改革承诺的心情。到了夜里，经济较为宽裕的市民在匆忙装饰一新的市立剧院举办了一场庆典活动，参加活动的人们数次齐声欢呼皇帝万岁。根据本地报纸的报道，在剧场外的大街上，此时有一些学生、学徒与工人令人遗憾地做出了“混乱过分的行为”，他们捣毁收费站、打碎沿街窗户，还把梅特涅的画像撕成碎片丢进河里。至于被同一份报纸描述为“不受市民欢迎”的卢比安纳市市长，

他逃到了距离城市西边差不多10英里的弗尔赫尼卡（Oberlaibach / Vrhnika）郊区，再也没有回来。注

3月20日晚，革命的消息搭乘船只，终于抵达达尔马提亚首府——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扎达尔。一位还不知道自己的上司已经被解雇的地方官员向维也纳的安全大臣谢德尔尼茨基如此汇报：

> 城市的街道彻夜人声鼎沸，直到清晨5点。大批群众带来装满酒的瓶瓶罐罐以及所有类似的东西，在街头公然饮酒，还邀请熟人与他们一起开怀畅饮。因此到了深夜，许多醉汉四处游荡，人们可以听到他们呼喊“宪法万岁……达尔马提亚国民自卫军万岁……自由万岁！你，我，所有人万岁！”……许多听到醉汉呼喊的人互相询问宪法是什么，但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注

之后，以扎达尔为源头，革命消息随着蒸汽船的航线向南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路传播，直到门的内哥罗（Montenegrin）边境的科托尔，此时已经是3月27日。注



一幅描绘1848年3月18日威尼斯人起义的19世纪雕版画。在画面前景，市民们撬起铺设在路面上的石块，投向前进的奥地利军队，这幅画的背景是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 A. Dagli Orti / Bridgeman Images）

达尔马提亚城镇的地方官员同样鼓励人们建立国民自卫部队，毫无疑问，他们把这些部队看作维持秩序的工具。他们推动新市议会的选举，之后还有奥地利国会以及达尔马提亚新议会的选举。在所有这些地方，市民领袖和地方官员以忠于革新后的哈布斯堡王朝之名义定义整场革命。

不过此后不久，达尔马提亚人就知悉了，威尼斯在3月23日爆发了当地居民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事实上，达尔马提亚籍的尼科洛·托马西奥（Niccolò Tommaseo，1802—1874）在叛乱中，领导脱离威尼斯共和国的行为，为达尔马提亚的城市大众以及使用意大利语的居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注一些年轻的达尔马提亚人和伊斯特里亚人出于对威尼斯人的同情，志愿加入威尼斯军队，不过与此同时，就像托马西奥一样，绝大多数说意大利语的达尔马提亚人和伊斯特里亚人却认为他们的家园应当继续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在的里雅斯特发生的事证明了当地人有着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居民相似的情感。维也纳革命的消息在3月17日到达，一周之后，附近的威尼斯发生叛乱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促使的里雅斯特的一些群体也试图效仿。不过他们的行动立即就被镇压了。造成这个结果，多半是缘于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语裔居民在城内组建了一支国民自卫军。注而正如多米尼克·赖尔（Dominique Reill）让我们看到的，的里雅斯特有影响力的市民相信他们城市赖以生存的繁荣是依赖于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重要的商业联系。的里雅斯特的许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同时坚持认为，他们的城市在本质上是多民族、多元化的（即便意大利人居主导地位），而它的利益坚定地落在哈布斯堡的阵营内。一位意大利民族主义记者坚称“商业化的的里雅斯特”所有的地理位置，“将所有民族的人聚集于此”，他警告如果的里雅斯特加入威尼斯式的叛乱，“我们的繁荣将消逝，我们会倒退回和其他伊斯特里亚小型城市无异的状态，新建的建筑（palazzi）也将荒废”。注

位于的里雅斯特北部，有着大量意大利语人口的南蒂罗尔地区，以邮件的方式在3月17日和18日收到革命消息。此时在特伦蒂诺，恰逢附近农民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地区集市，革命的消息便引起了农民和一些贫穷阶层的城镇居民短暂的反消费税抗议。至于公务员、店主、大多数工匠与本地中等学校学生，他们则聚集起来，庆祝帝国宪法的诞生以及保护“合法自由的事业”。当地人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民众自卫队，用来保

护他们新建立的自由不受“来自无产阶级的”潜在骚乱侵扰。注

现在我们的眼光往更北的地方去，像维也纳、格拉茨和普莱斯堡一样，布拉格在3月初经历了数次本地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波希米亚议会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召开会议的计划。很多地位最高的波希米亚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能在帝国范围内，为波希米亚传统领地（包括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争取到一个更独立的政治空间，这个政治空间可以与匈牙利的相对自治相提并论。这些贵族试图设立一个单独的大臣职位，用来管理维也纳方面的纯波希米亚事务，其性质类似于匈牙利大臣。此外，他们还希望中央可以任命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来到布拉格担任总督。幸运的是，布拉格在议会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活动，没有像匈牙利一样，酝酿出群众基础广泛的反对运动。波希米亚在工业、商业、金融方面，拥有比匈牙利多得多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波希米亚政治化的人民大众很少担忧所谓“波希米亚议会的传统权力”死灰复燃，他们更担心的是政府无力控制失业纺织工人引发的骚乱，以及飞涨的食物价格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注 3月8日，当一群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市民们起草了一份呈给皇帝的请愿书时，他们的行为迅速让议会贵族所谓的“幕后活动”黯然失色。在请愿书中，人们要求建立一支市民民兵部队，保护社会不会遭遇“无产阶级骚乱”的危险。此外，人们还要求增加学校中捷克语的使用率，加强市政自治，废除审查制度和强迫劳役。注 3月15日，皇帝修宪的承诺与终止审查制度的消息传到布拉格，当地的市民与学生们迅速组成了国民自卫队与学界武装团体。

3月8日，波希米亚人民签署了这份请愿书，他们同时使用德语和捷克语两种语言书写，从而将自己定义为捷克和德意志民族身份兼具的波希米亚人。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为了更多波希米亚人的权利而提出的主张，或者对“波希米亚民族”的保护，并没有必要单独应用在一个语言群体或者另一个上，虽然从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层面上，很多活动家是这么认为的。1848年，布拉格最热衷政治的波希米亚市民往往来自正在增长的捷克语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在布拉格，中产阶层公民权利需求的形成，往往伴随着积极创造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捷克民族主义社群的过程。而1848年，在布拉格和其他波希米亚城镇中，捷克和德意志两种自我认同的活动家产生初步冲突之际，大部分波希米亚人却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跨地域的、依靠语言定义的捷克或德意志民族的一分子。而对那些从上述层面确定自己忠诚的人来说，这种效忠并不总会阻止他们偶尔对波希米亚的其他民族产生认同感。事实上，不少政治活动家在1848

年前期都鼓吹所谓的“波希米亚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指代的是一种地区性的认同感，因此地区边界就将单纯以语言来定义的民族忠诚心问题化了。

布拉格的学生与波希米亚其他地区的学生们一样，为那些在3月的维也纳暴动中丧生的人们举办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公开纪念活动。尽管布拉格在这类事件中没有伤亡者［而且直到6月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亲王（Alfred Windischgrätz）围攻城市之前，布拉格一直维持着不流血的情况］，它却将维也纳的丧生者赞誉为“为自由献身的烈士”，并于3月21日在老城广场的泰恩教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弥撒。在奥古斯丁·斯梅塔纳（Augustin Smetana）的演讲中，他强调死者们是“为了祖国与对自由的热爱而献身的兄弟们”[注]。一份署名为布拉格大学学生，以捷克语撰写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团结友爱，并主张“你们的血将使奥地利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注]。

当维也纳革命的消息在3月18日传到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它一方面释放出波兰民族主义者们层出不穷的类似行动，另一方面也令哈布斯堡王朝在当地的总督弗兰茨·施塔迪翁伯爵（Count Francis Stadion，1806—1853）绞尽脑汁，应付当前的状况。因为加利西亚有1846年的前车之鉴，上述双方都试图通过动员饱受苦难的农民阶级，争取他们的支持来战胜对方。同时，无论是波兰民族主义者还是哈布斯堡的官员，都害怕前一年降临在加利西亚的饥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一群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民主人士立即起草了一份呈给皇帝的请愿书，要求获得宪法规定的自由，并且废除农民们的强制劳役。不到一日，这群活动家就在城中为请愿书收集到超过1.2万份签名。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签名，主要是因为这个消息被公布在当地报纸上，因而广为人知。不过就在同时，施塔迪翁伯爵说服维也纳方面，让他成为第一个宣布废除当前封建生产关系的人，将这份皇帝新赠予农民的礼物带给加利西亚。

废除当前残存的封建制度，对政府和波兰民族主义者们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举例来说，作为废除强制劳役的交换，波兰民族主义者们坚持废除所谓的共有地，传统上，农民用这些土地和森林蓄养牲畜、搜集木柴或者搜寻食物。贵族们为了阻止农民们继续使用这些土地，着重强调自己对这些共有地的合法所有权。很多贵族甚至担忧一旦废除强制劳役，农民们就没有动力向贵族领主们出卖劳力，哪怕付给他们薪水也无济于事。假如农民再也无权使用共有地，他们或许会更依赖领主所支付

的劳动报酬来养家糊口，当然领主们也就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注]而从哈布斯堡官员的角度看，他们忧虑的是如何补偿贵族领主们因失去农民劳役特权所造成的损失。官员们倾向于在加利西亚宣布废除农民劳役之前，先制订一个适用于整个国家的全面计划。

经过一个月激烈的谈判，新组建的国家中央议会（Central National Council / Radowa Narodowa Centralna）中，来自波兰民族主义者一方的代表们在4月13日同意，全加利西亚的贵族地主们将在4月23日复活节同时公开宣布废除强制劳役。不过加利西亚总督施塔迪翁伯爵出人意料地在4月22日就宣布废除农民们所有的封建义务，让民族主义者们在这场公共关系的博弈游戏中损失惨重。尽管直到5月15日，政府方面才正式签署终止封建生产关系的法令，但从伯爵的角度，得到在加利西亚提前宣布这一消息的特许，在公共关系层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民们把废除强制劳役看作来自哈布斯堡皇帝的馈赠，而不是波兰民族做出的贡献，这让波兰民族主义者们沮丧不已。[注]

终止封建生产关系这一议题，因为先前在1846年发生过血腥的暴力事件，故而在加利西亚一地格外突出。但1848年3月之后，帝国许多村落已开始自行认为农民们的各种义务已经宣告结束。这些村落中有许多农民不再向地主缴纳任何实物或者金钱租税；亦有许多人不再服劳役，甚至有很多人的表现，似乎已经认为他们完全拥有了自己当下居住的这片土地。[注] 1848年夏，帝国西部的农民终止了他们在当地的农业封建主义中扮演的角色。一位名叫约瑟普·沃什尼亚克（Josip Vošnjak）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起那年夏天他从格拉茨的寄宿学校回到卡尼奥拉乡间，惊讶地发现在之前的3月，农民们袭击了当地城堡中的管理官员，宣布自己从此从所有的封建税务中解放出来。[注]而这令人大为惊讶的事件不是孤例。就在3月21月—22日的夜里，300—500名农民突袭了位于卢比安纳南部数英里外的松内格（Burg Sonnegg / Sonnig）城堡。人们冲进城堡，焚烧了文件资料，那些簿册中，记载了他们对奥埃尔斯佩格伯爵约瑟夫（Joseph Count Auersperg）所负有的义务。

对许多农民来说，革命意味着他们对地主的义务彻底结束，并且给了他们中很多人一解宿怨的机会。在卡尼奥拉和下施蒂利亚，农民的暴力行为如烈火燎原，以至本地行政官员和地主乞求帝国军队前来支援。[注]在匈牙利不少地方，农民们也效仿这些行为。1848年4月，一些关于农民即将获得解放的流言使得一些匈牙利农民相信，国王将把他们从无

数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但是贵族、官员、神父，很多时候还有犹太人，这些人隐瞒了解放的消息，于是农民纷纷掀起叛乱。到了6月，匈牙利新内阁发现他们不得不宣布国家处于戒严状态，政府逮捕农民起义的领袖们，甚至组织治安队，镇压各地农民的叛乱。注

从1848年春天绝大部分奥地利帝国国民的行动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奥地利人收到革命的消息时，既把它看作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也认为它可能有助于实现他们长久以来的地方目标。奥地利人将他们的特定利益和更大、更抽象的帝国权力形态联系起来，以此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革命事件。地方活动家循序渐进，逐步控制地方上的政治发展。他们先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自卫军，接着向未来的宪法提出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借此影响他们在帝国内的地位，进而决定整个帝国的塑造。就像当初欢庆1814年帝国的胜利那样，1848年春天的革命庆祝活动在地方上所产生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对帝国的参与度，这保障了帝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而先前那个官僚主义的政权正逐渐变为一个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即他们的帝国。

革命大众文化、仪式与国际政治

随着帝国审查制度迅速结束，无数的新报纸以惊人的速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或者关闭）。看上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民急不可耐地想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是通过报纸、俱乐部会议、街头游行还是戏剧表演。在公共咖啡馆和酒吧内进行的讨论越发光明正大，这些场所也往往提供最新的报纸供大众阅读。不少城市的男女市民通过接受新的衣着风格、致辞方式，甚至有时候是新姓名，引人注目地表达他们对革命的认可。许多社群迅速创造出一系列仪式来纪念，进而解读和掌控近期革命事件的意义与重要性。



1848年，第一份不经审查便发行的报纸在维也纳街头销售。该幅水彩画原作者为Johann Nepomuk Höfel（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NY）

首要表现是，我们可以见到城市居民加入新组建的国民自卫队在大街小巷巡逻，保护街坊不受骚乱和不安定局面的侵扰，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强调了他们自己在本地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在此之前，国民自卫队只是礼仪性的小型组织，其成员资格更像是一种局限在城内最富裕人士圈子内的团体特权。但在1848年，情况截然相反，自卫队很快就成为一种活跃的、阳刚的、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或者自律的）象征。它适用于那些自食其力，并组成更广大社群的人们。不过这个社群在实际上的范围有多广，依然还是当地人热烈讨论并悬而未决的问题。自卫队是地方中产阶层骄傲的具体表现，这个群体见证了他们是怎样从缺乏社会权力，逐渐得以承担管理城市责任的过程。事实上，自卫队这种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同样反映在没有受到社会动乱侵扰，却着手组织自卫队的社群中。一份3月17日发表于奥帕瓦的小册子宣称，武装“市民们”将给予“人民”保护自身权利的力量。

国民自卫队队员的荣誉建立在全体公民的荣誉之上。从现在起，他变得非常重要（er ist kein Null mehr）。他就像几个世纪以来的先祖们那么勇敢无畏，并且（眼下）他感到自己已经赢回了荣誉与力量。为了最纯洁高尚的事业，人们拿起武器，保卫正义与法

律。[注]

正如《民法通则》一样，这些宣言使用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语言，让人们相信“人民”和“公民”是同一个群体，即便实际上政治活动家们认为，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社会独立地位的人才有资格申请自卫队成员和具有积极公民资格。当时的人乐于把自卫队的组建描述成为保护大众利益、“将人民武装起来”。过去的旧政权认为人民既不够成熟，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而新组建的国民自卫队则主张人民有能力自治。帝国各处的自卫队成员声称他们的目的是“积极保护新得到的自由”，同时“力促和平、安全和秩序”。尽管除了可能存在的反革命复辟势力之外，他们还并不清楚究竟要对抗何种敌人。[注]

事实上，正如1848年欧洲其他地方所表现的情况那样，奥地利帝国社会中所谓的“人民”指代的是全体国人中特定的一部分，即那些出于自身利益，已经准备好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尽管各种小册子和演讲都大力赞颂自卫队在普世的层面上“武装人民”的意义，但事实上，无论是国民自卫队或是学界武装团体，它们组织起来的武装人员只是宣称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罢了。在前文中来自奥帕瓦的那份小册子里，规定了一个人只有“聪明、受过教育、拥有荣誉、受人尊敬”，才有资格加入自卫队——这些美德都是为城市中有产者和受过较高等教育的人量身定做的。[注]绝大多数革命者相信，由于他们与城市有产者在社区中属于利益共同体，因此有产者们是唯一代表集体利益的共同意志执行者。这也就能解释，在匆忙组建国民自卫队时，为何地方上的新当局会极力避免无产者拥有武器。他们认为，在追求更大的社群福祉的事业上，城市工人或学徒不值得信赖。如果听任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工人自决，他们将把自己短视、自私、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强加于整个社区，而不是为了实现大众福祉而无私奋斗。

在一些城镇中，新的革命社群在自卫队成员资格上产生了其他问题。举例来说，犹太人，尤其是犹太有产者，可以被认为是“人民”的一部分吗？他们的利益与整个社群的利益是否对立呢？位于帝国东部加利西亚的布罗迪，被认为是整个奥地利“最犹太化的城市”，它的国民自卫队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的自卫队。[注]在维也纳，许多犹太人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学界武装团体的领袖也是一个犹太人（Adolf Fischhof）。当然，在3月主持纪念革命第一位烈士，摩拉维亚犹太学生卡尔·海因里希·

施皮策的仪式也是由一位神父和一位犹太教拉比共同主持的。然而在布拉格，情况却有所不同，1845年，当地曾爆发过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因此犹太人认为他们有必要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这或许也能够解释1848年3月23日，在布拉格举行纪念施皮策的活动时，当地犹太人积极热心的捐款表现。人们在布拉格的老犹太教堂举办纪念烈士的宗教活动，亦有不少学生和来自本地社团的基督徒参与其中。教堂的中央摆放着一座被蜡烛环绕的巨大灵柩，它的前端描绘着一头波希米亚狮子，并有铭文“上帝给予他永恒之福”。犹太学生们持剑守卫在灵柩两侧，使得这个场景拥有了阳刚的军事化特征。布拉格的犹太社群显然希望通过革命获得解放，索尔·伊萨克·坎普夫拉比（Saul Isaak Kämpf）在演说中反复提醒听众，假如没有全社会的平等，自由就无从提起。他说：

> 难道我们不是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同一个国家的孩子，以及同一个国王的臣民吗？难道对祖国的热爱，没有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吗？……无论我们是德意志人或是斯拉夫人，无论我们是闪米特人还是雅弗人（欧洲人）的后代，我们都是波希米亚人。我等波希米亚人，为这个国家（奥地利）的居民们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榜样。尽管他们或许也来自不同的人种和语言背景，但仍可以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这个整体对我们祖国的福祉来说无可替代，但只有自由的太阳升起，将光与带来生机的热散布给所有人，它才能真正变为现实。

1848年3月，当佩斯的犹太人志愿加入地方自卫队时，这座城市的基督徒同胞却将他们排除在外。在之后佩斯和普莱斯堡发生的反犹骚动中，政府甚至下令收缴犹太人的武器，惩罚骚乱中的受害者，时人对此大为诟病。激进的诗人裴多菲·山多尔因此在佩斯组织了一支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民族自卫队，以此响应政府的举动。不过遗憾的是，他的行为在匈牙利只是一个例外，当匈牙利新宪法，即“四月法令”颁布时，犹太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完全的解放。与匈牙利不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一起加入国民自卫队，有时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一位名叫博斯科维采（Boskowitz /Boskovice）的中士这样写道：“我们犹太人在这里与基督徒同胞们和平和谐地共同生活，他们甚至以最友善的态度接纳我们成为地方国民自卫队光荣的一员。”不过在近来以犹太人与基督徒紧张关系为题材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发现在摩拉维亚的城市中，犹太人往往只能独立组建自卫队。以1848年7月，一个来自乌赫尔布罗德

（Ungarisch Brod / Uherský Brod）犹太卫队的代表向维也纳政府请愿求助的事为例，这位代表曾经这样报告：

> 由于基督徒不能容忍我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在征得司令官同意后不得不组建一个独立的连队，并且自掏腰包装备武器、置办制服。但一段时间以来，针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令人愤慨。我们小区内的一些成员，只因为佩戴国民自卫队的徽章，就遭到他们的侮辱。我们向官员求助也无济于事，他们无法保护我们。[注]

在加入国民自卫队的同时，地方的活动家们还创立了一系列详尽的礼仪形式，强调他们在这个已经变革的世界中举足轻重的象征作用。通过这么做，各个社会团体以更积极的公民身份表达形式来展现自己的骄傲，而参与其中的人们并不仅限于国民自卫队成员。举例来说，中产阶层妇女组成了一些社团，靠着为地方连队制作旗帜、组建辅助联合会筹集款项满足自卫队需要（比如制服和武器的开销），以及在捐献或者联队旗帜祝圣的场合帮忙组织盛大典礼，在自卫队角度的公民身份诠释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庆典活动让女性参与其中，使她们第一次拥有正式的公共角色。而人们通过将一个社区中的爱国女性放在国民自卫队的象征角色，即所谓“旗帜之母”上，来强调两性之间的功能性差别。国民自卫队的成员宣誓守护自由、保护祖国，而对自己的民族而言，他们还承诺会保护社群内妇女们的荣誉，最后一项宣誓帮助创造了一种新的公民男子气概，这种气概通过男性对女性的保护来进行界定。因此，妇女们为自卫队制作的旗帜就成为特别的象征，它们代表着人们对男性公民保护城市内中产阶层女性（显然如此）尊严的认可。与此同时，妇女们亦借助她们的手工作品——为连队制作的旗帜，在公民仪式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正如一位“维也纳爱国妇女”在致报纸《大众之友》（*Volksfreund*）的信中所主张的，“未来我们亲手制作的旗帜，将引领队伍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保卫我们的自由”。[注]

1848年，由自卫队成员和学界团体成员创作的各种热情洋溢且感人肺腑的歌曲、诗作与颂歌同样证明了所谓的“旗帜之母”是集各种美德以及需要男性保护的事物于一身的象征。[注]不过这些歌曲和绘画作品偶尔会给予革命中的女性更加积极的角色。[注]在此有一支捷克语的流行歌曲《英雄的爱：1848年3月18日为柏林自由奋斗的战场一幕》不但描写了奥地利之外的事件，还讲述了一名英勇女子在爱人牺牲于巷战之后

投身战场的故事。这支歌结束在女主人公英勇捐躯之时，同时它号召波希米亚（捷克）妇女加入她们爱国的男性同胞中，一起参与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投身于为了自由、正义和祖国的战斗中去。尽管长期以来，性别的刻板印象要求女性服务于安全的家庭环境，但这首流行歌曲表达的意象令我们想起在1848年一年中，有20名妇女在3月的革命中献身，另外在10月维也纳血腥的起义中，也有40名妇女献出了生命。[注]

在革命发生的最初几个月，男人和女人们通过穿着特定服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革命热情。当匈牙利新政府正式选择红、白、绿三色作为国旗颜色时，佩斯和普莱斯堡的许多居民立即将这三种颜色运用到日常服饰中，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承诺。[注]在佩斯有一个名叫“激进匈牙利女性”的社团，它的成员们强调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她们的姐妹同胞应当时常“说匈牙利语、买国货、穿着民族服装、跳（像恰尔达什舞一类的）民族舞蹈”。这些号召点出一个事实：在当时，绝大多数匈牙利城市居民通常说德语，而不是匈牙利语。但在1848年，这个事实一点也没有减损人们对匈牙利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它甚至令一些原本说德语的匈牙利人开始学习匈牙利语。许多爱国犹太人改变了他们的姓名。举例来说，佩斯的一位犹太民间自卫队的组织者，就给他招募到的所有成员起了听起来像匈牙利名称的名字。[注]

在帝国的其他地区，颜色和服饰风格同样是革命认同的强有力标志。先前人们用佩戴白色帽徽和缎带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支持，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1848年3月导致维也纳革命的那几周内，舞会上的女性（毕竟此时恰逢狂欢季）热情高涨地表达出她们支持宪政君主国的情绪，她们“撕碎自己的面纱，用白色的领巾、肩带、蝴蝶结与帽徽装饰她们的男伴”[注]。维也纳的中产阶层与贵族妇女和佩斯的女性同胞一样，改造自己的服饰，更清晰鲜明地展示出她们在政治上对革命的同情倾向。在一份面向维也纳妇女的街头小册子中，作者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挚爱的祖国，为了全体国民，特别是那些失业者的福祉，让我们保证不购买任何外国货。”[注]这其中法国帽子特别遭到抵制，因为它不单是舶来品，还带有太多贵族阶级肤浅的色彩。一份刊登在《宪报》（*Consititution*）上的妇女来信建议，爱国妇女可以拿实用的草帽取代法国女帽，并且在草帽上装饰代表德意志民族的黑、红、金三色缎带。[注]事实上，到了3月底，白缎带已经基本从人们的服饰上消失，民族或

者地区代表色取代了它的位置。那些因一个统一新德国的前景而兴奋不已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或许会穿戴红、黑、金三色的服饰，而捷克或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则会使用红、白、蓝三色。红、黑、金三色组合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德意志诸国抵抗拿破仑军事行动的事件，如今它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中欧，作为一个自由与支持统一德意志的跨地域象征重新出现。维也纳革命报纸《黑红金》（*Schwarz-Roth-Gold*）向读者解释了这些颜色当下的现实意义：革命将奥地利从有害的分裂孤立的长夜（黑色）中解救出来，它引领国家穿过民族统一的欢乐意识带来的黎明（红色），触摸到中欧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在精神上团结一致的曙光（金色）。[注]

上述所有对个人革命认同公开性的强调（具体对外表现在衣着、姓名和称呼方式上），其脚本大多来自中产阶层革命者对革命事件的浪漫化理解以及60年前第一次法国革命，特别是其所谓“恐怖统治时期”的特点。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不少风俗习惯，引自古典时期和古罗马时期。但讽刺的是，半个世纪前，爱国的奥地利人动员起来抵抗法国人以及他们的革命，1848年的哈布斯堡国民却将他们自己和同时代的同胞当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丹东现代化的代表。[注]维也纳和佩斯的激进分子还沿用法国的先例，重新组建地方政府，称其为“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些组织其实和法国的同名组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1848年春，各个城市新涌现的政治俱乐部中制定的习俗中，上述的“剧本”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俱乐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与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制定并推广了关于颜色、服饰、称呼、歌曲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当时的一些政治议题中的公共理念。以国民自卫队为例，政治俱乐部为那些志同道合的本地人提供了聚会的场所，让他们可以制定、讨论以及尝试推行政治目标。维也纳的例子尤其突出，3—10月，城市内的民主俱乐部将革命带向了更加激进的方向，而相对较保守的俱乐部则试图抑制革命的热潮。

奥地利帝国的政治俱乐部，以演讲、请愿和制作政治小册子等方式宣传推动他们感兴趣的议题。俱乐部内部会议则提供给成员一个训练适应议会流程的场所，并让他们从中学到一种组织合理、基于规则的互动方式，以此和人们认为恣意妄为、专横独断的旧政权形成鲜明对比。和佩斯的“激进匈牙利女性”组织类似，在卡罗琳·冯·佩林男爵夫人（Baroness Caroline von Perin）的领导下，维也纳民主妇女第一协会

针对女工报酬被削减的问题，在8月组织了起义。一份匿名小册子邀请忧国忧民的“德意志贵族妇女”在左胸佩戴德意志的徽章，并参与维也纳人民公园正在筹备中的会议。这本小册子宣称：“我们并不想要成为亚马逊女战士那样的悍妇，而是响应号召，医治各处的创伤，我们不是裁判者，我们只是协调者。”不过无论妇女们的意图是什么，维也纳的讽刺漫画家还是很快把她们讥讽为现代的亚马逊女战士，一群男性捣乱分子也兴高采烈地前去扰乱女士们的第一次集会。尽管如此，这个妇女组织很快就成为一个供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面对面讨论的场所，妇女在一起探讨如何帮助维也纳最穷苦的女性脱离她们的悲惨境地。当然，我们也毫不惊讶地看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还时常就其他社会议题展开争论。1848年9月，这个俱乐部的妇女们辩论的话题是：假如遭遇经济危机，是否应当强迫地主们延迟向遭受重创的工匠征收租金。而当佩林男爵夫人像很多走温和政治路线的男性一样，主张这样的延迟措施等同于损害地主的财产时，一位年轻的女工驳斥道：“每当穷人在挨饿，你们所有人就把被子拉过头顶装睡。”注

在帝国的其他城市中，活动家们也在1848年组织了众多政治俱乐部，其中还有些人特别组织了民族主义者的俱乐部。政府同样提倡那些可能支持它们地方事务进程的组织。在此我们举一个加利西亚的例子，在当地总督弗兰茨·施塔迪翁的暗中支持下，早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主义者在普热梅希尔的希腊天主教主教领导下，在利沃夫组织了一个鲁塞尼亚人议会（Holovna Rus’ka Rada）。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不会在1848年挑明他们的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回应波兰民族主义者对加利西亚的主张方面。更确切地说，这强调了维也纳方面竭尽所能破坏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贵族与知识分子本地影响力，试图控制加利西亚事务。

这个鲁塞尼亚议会还在加利西亚发布了“鲁塞尼亚民族”的宣告，要求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让鲁塞尼亚语和波兰语获得同等的地位。5月10日，这个议会号召鲁塞尼亚人建立地区议会，议会成员需要包括乡村长者、城镇居民、受过教育的农民以及神父。通常来说，希腊礼天主教神父会主动组织和主持这些地区议会，而这些议会的成员资格则根据它们各自的规模与地方社会组成而有所不同。注对大多数农民组织来说，他们的计划首先强调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同时这些组织还表现出对波兰民族主义者“革命目标”的反对。此外，农民们逐渐将本地议会看作仲裁者，可以裁决他们与贵族地主就共

有地和封建义务的纠纷，农民的求助书如雪片般飞来，把这些组织淹没了。这反过来迫使这些议会在1848年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代表农民的利益，它们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事业，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农民的社会利益服务。

在左右民意方面，报纸在1848年起到的作用比俱乐部更大。革命期间，借审查法律与实践产生变化的东风，有数百份报纸井喷式出现。报刊的爆炸式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地方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但由于同业竞争变得格外激烈，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存在了短短几期。[注]有些报纸实际上无异于便宜的小册子、宣传册或者街头传单。当时有人估计，仅1848年一年，在维也纳就出现了差不多200份新出版物，而其中有34份只出版发行了一次。[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报业文化也产生了转变。随着审查制度的骤然终结，许多报纸开始更多地依赖街头销售，而不是之前的私人订阅。报纸的印次和版本数目也大大超出订户的需求，显然，出版商希望能够在咖啡厅、酒吧或者街头销售更多的报纸。

当时报纸的名字，往往包含投身革命的元素，以此来增加销量。许多报纸在现有的名称中添加了诸如宪法、改革、自由和发展等流行词汇。它们要比过去的报纸刊载更多的政治新闻，这些报纸往往登载消息，复述国会或市议会的关于当前紧迫问题的辩论，偶尔也登载漫画。此外，它们还宣传流言八卦，以及无耻的诽谤，来针对本地的公众人物。因此，不久之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革命政府就起草了出版法，来规管新出现的报刊刊登的内容。正如多年前约瑟夫二世震惊不已的追随者那样，自由主义者们对审查制度的终结怀抱着矛盾的态度。他们需要区分开对公共议题的恰当报告与不恰当的人身攻击，并做出一定的限制。一份来自西里西亚的小册子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 这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明智地使用这项馈赠。一份自由报纸只能致力于公共生活，即国家与地方管理，它不能超越界限，涉及他人的私生活和个人品质。说谎者和做出可耻指控的报纸仍然需要面对法律的惩罚。[注]

至于报刊所用的语言和大众读者群，据1848年在波希米亚政府正式登记的100种报刊中，有41种使用捷克语，剩下的则使用德语。摩拉维

亚政府登记在案的28种出版物中，有9种捷克语报刊。[注]的里雅斯特是整个帝国报刊增长潮流中的一个异数。这座城市在1848年没有出现新的报纸，这或许是因为的里雅斯特的居民已经可以获取许多已经存在且广受敬重的独立报纸，其中有很多来自国外。至于在识字率"地狱"——维也纳、波希米亚或的里雅斯特的加利西亚，在革命爆发之前当地有3份值得注意的重要报纸。1848年3月之后，当地有出现了37种波兰语报纸，以及至少一种乌克兰语出版物。这其中有20种出现在克拉科夫，12种出现在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注]

来自克拉科夫的西加利西亚绅士创办了一份特别针对农民的波兰语报纸。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由于1846年的流血事件殷鉴不远，这类报纸纷纷努力鼓吹民族团结。当城市中的波兰语报纸把一句法语格言"自由、平等、博爱"放在报头位置时，面向农民的报纸则鼓吹更加稳健温和的格言，例如警觉（抵抗官僚们类似于1846年事件的干涉）、团结与和谐。面向农民的报纸选用古代传说、故事以及诗歌，以高度说教式的基调来宣传民族主义的爱国教育。它们向皇帝宣誓效忠（但宣称皇帝被一群邪恶的顾问围绕着），并且推崇宗教为最重要的统一社会制度。[注]

1848年，在各主要城市，报纸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不但体现在传播新闻方面，报纸还参与营造了针对当时一些重要议题的民意。3月的时候，早期革命的团结局面被革命者之间关于如何组织帝国，使其更系统化的冲突所取代，于是报纸和俱乐部成为供人们详细阐述不同政治目标的主要场所。在奥地利，上述的不同主张可以被分为在立场上互相交织的三种：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的以及自诩民主或激进主义的。以维也纳为例，民主倾向的报纸和民主俱乐部一样，积极寻求让革命路线更左倾，在1848年夏秋两季，它们要求所有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实行全民普选，通过公共工程给城市提供社会福利，以及控制食品价格，建立租金调控机制。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们的要求，很多在这一年夏天得到实现（普选、福利公共工程以及控制租金除外）。在过去，自由主义的报纸同情工人和民主主义者，但作为对目前情况的响应，它开始逐渐站到政府这一边，担忧革命将威胁人们的财产权利和公共秩序。例如维也纳的一份日报《宪报》，就认为它的主要功能应当是"从文化角度引导缺乏教育的大众关注自身的利益"[注]。

在佩斯和普莱斯堡这样的匈牙利城市，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克卢日，新出现的报纸同样代表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工人阶级差异巨大

的政治立场。[注]其中一份特别针对工人阶级读者的《工人报》（*Munkások Ujsága*）可谓是立场最激进的报纸之一，它的订阅用户差不多在600人，但这份报纸通常会印刷3 000份左右，除分配给订户之外，其他的报纸都会在集市上分发给进城的乡下人。[注]一些用斯拉夫语印刷的匈牙利报纸，则被克罗地亚（通常是天主教徒）、塞尔维亚（通常是东正教徒）或罗马尼亚（东正教徒或一位论派教徒）的爱国人士用来动员新生的公众，反对不断抬头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而它很有可能强制所有匈牙利人使用匈牙利语。

1848年，报道新闻的记者往往和制造新闻的人们同属一个狭小的圈子。尤其像加利西亚，它受过教育的人群非常有限，因此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往往就是同一群人。至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帝国西部，则逐渐可以夸耀当地拥有更多的文艺界或者学术界人士，譬如19世纪40年代在匈牙利颇为活跃的科苏特，来从事记者的工作。我们在第三章中读到的波希米亚年轻作家卡雷尔·哈夫利切克·波罗弗斯基的事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846年，哈夫利切克得到历史学家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的推荐，成为官方报纸《布拉格新闻》（*Pražské noviny*）的主编，随后他迅速改善了这份报纸的质量、形象，并使它的征订用户得到增加。革命期间，哈夫利切克在1848年4月接管了新的自由派报纸《全国新闻》（*Národní Noviny*）。以这份报纸为媒介，哈夫利切克和他的同事们有机会将自由主义的革命理念公开翻译为他们试图说服的受教育人士们所使用的语言。[注]

“我们是一个宪政国家中的自由公民”

关于1848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说明它们革命本质最生动的证据就是立法机关的表现。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机构的民选代表汇聚一堂，来决定帝国未来的形态。[注]早在3月，处在会议期间的各个议会为了能够更公平地为全帝国各州的人民发声，匆忙招募了一些城市平民和农民加入。以上奥地利为例，林兹市议会“受到地方人民加入的迫切愿望……他们提醒它，要求得到他们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保持和平所应得的报酬”。于是议会要求林兹的资产阶级从他们这个身份的人群中选出10位可靠的代表加入议会。[注]同时施蒂利亚议会决定，从今以后，城镇和乡村公社中1/3的代表可以通过选举产生。[注]在上述所有例子中，地方

议会意识到除了贵族地主或教会官员等传统的社会分类之外，新的社会分类已经出现（例如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它们对选举议会的传统方式进行了补充，并谨慎地对待新的社会分类。

正当哈布斯堡皇帝的政府忙于解决在维也纳发生的革命，以至无力影响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时，经过3月和4月初的激烈斗争，匈牙利议会已经制定出一部宪法。最终出台的“四月法令”中，匈牙利被定义为由哈布斯堡皇帝和对匈牙利国会（就是昔日的匈牙利议会，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负责的内阁共同统治的独立宪政王国。“四月法令”留下了一些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例如匈牙利与奥地利帝国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涉及帝国军队和国债等方面的问题。而至于匈牙利未来对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关系，哈布斯堡王朝在1848年夏天仍然维持着暧昧态度。由于这两个地区都存在着自治于匈牙利其他地区的历史关系，因此哈布斯堡方面利用这一点来获得对匈牙利的政治压力。

匈牙利的“四月法令”第一次扩大了人们的投票权力，令他们可以选举议会或国会。拥有投票权的人群范围，从贵族阶级扩大到所有出生在匈牙利，年满20周岁的男性公民，不过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拥有一大笔财产。没有财产的贵族（此时这类人还为数不少）可以凭借其头衔继续有权投票，而另一些拥有特定教育程度的人们（比如教授、教士和神职人员）也没有因为他们的贫穷而失去投票资格。同时，投票者必须是某一种受到承认的宗教信徒，像匈牙利就禁止犹太人投票。总的来说，匈牙利的新宪法给予占总人口6%，或者全体男性的1/4人口投票权。[注] 它的各项条款，让匈牙利得以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宪政实践接轨。因为匈牙利的“四月法令”赋予投票权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要高过英国在1832年《国会改革法案》、1830年法国选举法、1831年比利时的法律的规定，只有在1848年处于革命中的法国和奥地利，获得投票权的公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才比它更高。



这幅绘于19世纪晚期的画作名为“我们的提议得到了通过”，描绘了1848年7月2日，匈牙利国会投票决定，建立一支对抗克罗地亚首领约瑟夫·耶拉切斯克（Joseph Jelačić）军事入侵的武装。画面左侧站在讲坛上的，就是激情洋溢的路易斯·科苏特。这幅彩色石版画的原作者是Antal Gorosy（Private Collection / Archives Charmet / Bridgeman Images）

同时在维也纳，皇帝在复活节后一日签署了施行于帝国其他地区的临时宪法。首相皮勒斯多夫（Pillersdorf）在参考了比利时和南德意志的案例后，撰写了宪法草案，并交给几位高级官僚和大公们传阅。这份宪法强调了奥地利领土的不可分割（“所有属于奥地利帝国的领土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宪政君主国的一部分”），但很快它就承认了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西亚地区的分离状态。它预见到一个皇帝拥有否决权的中央国会，还有处理地方利益问题的地区议会，和包括“民族与语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尽管如此，临时宪法还是没能解决很多议题，解放奥地利犹太人就是之一。假设一旦新国会选举完毕，它就很可能修订宪法——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之后会导致许多地区群体采取报复行动。注

到了初春，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式属于松散的德意志联盟一部分的上奥地利、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卡尼奥拉、卡林西亚、蒂罗尔、滨海地区、的里雅斯特、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等地的奥地利人，选举出他们在另一个立法机构内的代表，这个机构即是所谓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这个议会以约翰大公为名义上的领袖，负责决定一个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态。在之后的一年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努力决定一个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将采取何种国家模式，以及这样一个德意志国家

是否应当包括奥地利帝国及其过去并不属于德意志联邦的领地（例如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加利西亚）。[注]

到了7月，在一个广泛的成年男性普选基础上，奥地利人选举出了国会，这个国会将决定奥地利帝国未来的政治架构，以及奥地利公民权的本质。针对奥地利帝国国会的普选条款赋予所有年满24岁及以上的奥地利公民中“独立的男性”投票权，同时要求投票人在一个地方定居至少6个月。这个决定让全帝国超过一半的24岁及以上的男性奥地利公民获得了投票权，占总人口的10%—15%。为了把选民缺乏政治教育的影响降到最低，政府创立了一个两级的，或者说间接选举制度。投票人首先选举他们所在选区的代表，这些代表随后再选举出国会代表。[注]

在上述关于投票人资格的要求中，独立身份和6个月定居期的要求意味着从结果上消除了流动性高的临时工造成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居留超过6个月。这些要求加上两级选举体系，与新产生的国民自卫队对成员在当地的财产要求并行不悖。事实上，这些多种多样的情况首次在奥地利公民权利的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中产生了功能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帝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从未解决何为“独立”的问题。显然，这一要求的设立剥夺了那些依靠公共慈善救济生活的人进行投票的权利，但那些依靠雇主提供食宿住处的家庭用人究竟能不能投票呢？对独立的认知度以及投票权之间的关系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都始终存在着争议，我们将在下文关于公共投票和各行政州投票的内容中看到这一点。

上述国会普选条款并没有吸引大批奥地利人在1848年6月蜂拥前往投票站，选举他们的第一届国会。奥地利国会的选举在城镇和乡村的参与率都低于50%。[注]在大城镇中，选举委员会和本地俱乐部提名那些他们相信可以代表自己普遍意识形态立场的人选，并且为这些人的选举造势。在城市中，民主主义者向工人阶级和工匠中的选民呼吁，这些人关心的当务之急是控制租金与食物价格，而这些议题在城市之外却没有多大意义。政治上的温和派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应对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选举行动。以格拉茨为例，一个当地的自由主义俱乐部力劝选民不要选择工人候选人，理由是工人缺乏必要的处世经验、长远眼光，以及对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的信念。自由主义报纸则建议人们投票给那些遵循着“稳定和清醒的发展”道路的候选人。[注]在布罗迪，一个77名犹太人占大多数、7名基督徒占少数的选举代表团一致推举维也纳的伊萨克·诺亚·曼海

默拉比（Isaak Noah Mannheimer）为该市代表，这个结果显现出布罗迪的犹太人选民对帝国（相较加利西亚的反抗）和德意志民族（对比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态度）的忠诚。但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安抚当地说波兰语的基督徒选民，代表团发布了一项声明，解释并将他们最后选择一个维也纳犹太人的结果合理化。这个选举委员会试图“主张一个饱受压迫，被人遗忘的宗教少数派群体（犹太人）的神圣权利，就像承认我们所同情的，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波兰民族所拥有的权利一样”注。

在这里，城市民主主义者、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甚至不少政府大臣和官员都一致认为，农民缺乏对政治的理解，而且只关心废除封建制度中残余的部分。一份施蒂利亚的报纸辛辣地总结农民选民的世界观：“（他们）只要一个上帝，一位皇帝，一种宗教，没有劳役，没有什一税，没有鸡，没有蛋（指代封建实物税），没有负担——除此之外，其他诸事都可维持原状。”注通常，由城市显贵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会提名附近乡村地区的候选人。而农民们则希望能够选举城市中受过教育的候选者，因为这类人提出的议题最受他们关注，即终止封建捐税，并向皇帝保持忠诚。事实上，奥地利新选出的国会代表（这个群体比之后由他们选举出来的任何一届国会在社会背景上差异都大）中，有1/4来自非贵族身份的乡村资产阶级（其中许多是家境富裕的农民），而另有1/4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专业人才，其中5.75%是宗教官员的代表，60%是商人和工厂主，他们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只有12%的代表拥有贵族头衔，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并非显赫的大贵族。注

到目前为止，加利西亚选出了最多的农民代表，差不多占到总数的40%。加利西亚农民似乎不愿投票给社会上层阶级，无论他们是贵族还是地主、地产经纪还是公务员。帝国西部的农民们，早在数代之前就已经摆脱了绝大多数农奴制直接形式，因此他们可以被说服，为城市显贵投票，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加利西亚农民表现出对城市精英的憎恨，并向其施以毁灭性的力量。当加利西亚农民终于同意参与投票时（过去他们认为选举是贵族阴谋的一部分，往往选择拒绝），他们也只投票给其他农民。在加利西亚100个国会选区中，差不多有35—40个区（统计数据有一定差异）派出了农民代表前往维也纳。而剩下的代表中，有50位出身波兰乡绅或贵族。由于其他行政州中当选的贵族如此之少，加利西亚在这点上成为帝国的又一个异数。注

事实上，1848年，就在一些加利西亚选区选举了他们的农民代表

时，另一些地区的农民投票者则有意放弃参与选举的机会，以此来表达农民们实现自我政治愿望的强烈决心，这在1846年遭到农民暴力重创的地区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波兰民族主义者们很快宣称帝国官员操纵了农民的选举行为，从而防止产生更多的波兰民族主义候选人。当然，这种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帝国的官员们同样害怕选出目不识丁的农民所带来的后果。[注]实际上，差不多有一半来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农民国会代表是文盲。此外，这些人中只有那些有过参军经验的人，才有足够的能力理解在维也纳用德语进行的辩论。波兰民族主义者尽其所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排除农民代表在立法方面的影响。当一位在维也纳的加利西亚农民代表要求翻译时（用来谴责波兰贵族利用他的无知进行的剥削和压迫），一位波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当即否决了他的提案。直到1848年10月，国会才对每日的会议记录进行官方转译。显然，加利西亚的农民代表们没有像奴隶一般遵从贵族保守分子的指示，许多其他左翼代表（以及波兰民主主义者）也是如此。[注]

1848年，奥地利国会花费了几近整个夏天的时间来争论废除封建结构的措施以及补偿地主的问题。在当时，汉斯·库德利希（Hans Kudlich）代表，一位来自西里西亚的年轻农民之子建议，废除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封建生产关系时，不需要再对地主进行补偿。尽管国会最终以177：144票的结果最终决定补偿地主失去免费农民劳动力的损失，但国会也在9月9日投票宣布终止劳役制度。这无疑是国会最重要的一项成就，这也是之后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势力未能抹杀掉的一项功绩。[注]

除此之外，国会还选举出一个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两个重要的下属委员会，用于起草一份国民权利法案，以及勾勒帝国未来的宪政架构。[注]那么第一个下属委员会的代表会怎样理解未来帝国公民的权利呢？当年8月，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代表弗朗蒂舍克·里格尔（František Rieger，1818—1903）呈上了一份强有力的民主派草案，它主要建立在1789年和1791年法国革命宪法的基础上，这份草案得到了委员会中德意志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强力支持。[注]这份得到委员会成员欢呼通过的草案，在1849年1月4日交由国会审阅。草案强调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新颖观点，这个主张立即招致了帝国政府的反对，强迫委员会将其删除。[注]不过这也是帝国政府唯一一次对声明草案加以干涉，而国会完全没有抗争就全盘接受了修订意见。剩下的草案内容概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奥地利公民个人权利，其中许多都与约瑟夫二

世时代的国家传统相一致。

这份权利法案保障了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明确废除了所有传统的社会特权。从此之后，帝国不再授予和承认贵族头衔，所有的政府职位也将唯才德是举。[注]草案还保障了个人的各种自由，其中包括个人隐私、宗教信仰、言论、结社与集会以及迁移的自由。举例来说，在这份提案规定下，所有的教会都不能享受任何非国家授予的特权，而受法律约束的民事婚姻将优先于任何宗教结婚仪式。[注]这份草案同样承诺创建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并废除死刑。它规定除了战争期间，军队亦要服从民法和司法程序。这份法案同时承诺推行国家资助的公共教育体系。此外，这份法案的第19条提到了奥地利社会语言多样化的现状，并保证：

> 帝国的所有人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所有人的居住权和培养自身民族性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权利。国家保障在每个州中，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在学校、政府机关和公共生活中得到平等运用。

奥地利国会中政治上的温和派人士和民主人士（更不必提斯拉夫和日耳曼民族主义者）都抱着同一个目标，即1811年，哈布斯堡王朝特别在《民法通则》中明确提出的，公民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理念能够得到确认。草案的这一部分确认了约瑟夫二世使国家结构合理化，从而能够统治彼此权利平等的国民的目标。而尽管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们未能把他们在理论上保证的全民教育付诸实践，但教育一直都是这几位君主非常关注的议题，地方教育需要更多地使用本地语言而非单一国语的提议亦是如此。不过，草案中保证教会得以自治，不受国家控制的条款，远远背离了约瑟夫主义者试图让国家完全控制教会的目标。[注]此外，草案保证学术机构教学和科学探索的自由，在程度上也已经超过了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在之前的夏天与秋天，政治温和派与国家的约瑟夫主义者们与难以驾驭的维也纳激进分子打了交道，受此经历的刺激，他们所担忧的问题就悄然蔓延了，延伸到阻碍权利法案草案推行结社权利和审查自由。在承诺审查不会限制言论自由的抽象权利的同时，草案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规定滥用此项权利会招致法律的惩罚，此外，政府将来还会出台一部出版法，来处理精确定义权力滥用的问题。尽管这部草案给了奥地

利人“和平非武装集会的权利”，但它还是额外补充了一点：这样的公共集会必须事先经过政府公务人员批准，而一旦此类集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原先的许可就可能被撤销，至于界定标准则掌握在国家手中。公民们也可以组织社团，当然，警察也要进行评判，以确定这些社团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

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革命的最初几个月，许多奥地利人要求在管理市镇或地区议会，以及决定地区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福利政策机构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当重新组建的议会和市议会召开会议，人们又开始就地方公民权利的诸多参考因素进行辩论，不过相较于奥地利国会所讨论的内容，他们在地方的辩论问题要更加实际。在这个治理层面上，参与度的问题通常被解读为日常面对面的关系。较为温和的革命者使用这些平台，通过重新定义投票资格，阻止他们在地方上更加激进的反对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而虽然革命者们一开始激情澎湃地对法律上的全体国民鼓吹解放，但在涉及地方普选资格的问题上，他们又设立起很高的壁垒。举例来说，维也纳市议会一开始规定所有在1848年缴税的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然而经过9月的骚乱和10月的武装暴动之后，议会改变了主意，设立了获得投票资格的最低年缴税标准，即5弗罗林。这个标准剥夺了数百名小资产者的投票权利。[注]

市议会和各级议会同时还利用投票系统，将投票者分为2—3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可以投票选举同样数目的代表。人数较少的富裕选民在第一等级进行选举，而其他缴税较少，凭借受教育程度获得投票资格的众多选民（他们往往是教师或公务员）则聚集在第二或第三等级投票。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效仿了传统议会选举时依靠财产身份或社会地位投票的旧制度（分为贵族、乡绅、神职人员三级）。不过实际上新的选民分级方式是基于经济（税收要求）和文化（受教育程度要求）的角度，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害怕最低下阶层存在的潜在危险。1850年春，地方上关于投票权的讨论反复争辩一件事，那就是个人的“独立”程度究竟要达到什么层面才有资格投票。温和派人士仍然宣称个人独立是能够实现大众福祉的关键前提条件。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相信由贫穷、依赖救济，甚至因犯罪造成的非独立状态，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上支持短视的派系目标。像上奥地利的代表所强调的，“我们必须阻止那些依靠计日工资，或者享受慈善机构提供的捐助为生的人投票……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拒绝那些不独立的人”[注]。

然而城市民主主义者或激进分子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反对这类主张，亦不让它们毫不被质疑地得到通过，一份出版于蒂罗尔的民主派报纸就嘲笑温和派对独立原则的偏执，变成这个原则只不过是限制了人们在选举中参与度的愤世嫉俗。归根结底，高级公务员也受雇于政府，为什么他们就被视为独立的人群？《因斯布鲁克报》（*Innsbrucker Zeitung*）亦发文质问，当“即便不论他们对上峰，乃至内阁大臣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官僚们在选举代议机构时也不能被认为有足够的独立性”时，为何不许那些所谓“不独立”的无产工人，甚至妇女获得投票权或者行使表决权？确实，为什么呢？这份报纸不是唯一提到女性或者投票权的出版物。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1811年发布的《民法通则》除了规定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同角色之外，并没有明确区分两性在公民权利上的差别。而宪法草案也没有类似的内容，尽管在国会选举中投票被定义为一种男性特权。如今，对投票权的讨论已经下达至更基层的村镇或者地方层面，性别的问题也越来越公开地出现在地方上关于参政权的讨论中。假如说投票权只是建立在财产、收入或教育背景上，那么为什么满足了这些资格要求的女性不能在她所在的选区得到投票权？1848年，当时的施蒂利亚议会给予公共纳税人相当广泛的权力，一位代表就此发问：

> 既然我们决定所谓的个人是拥有地产或者一座房屋、一份事业，以及同等事物的人，那么为什么拥有这些资格的女性，哪怕是通过男性代理人，都无权投票呢？既然拥有可征税的财产是成为社区内一位完全（投票）资格成员的要求，我相信按照这条法律，我们也可以赋予女性投票权。

1848—1849年，女性在地方选举中是否应当得到投票权的问题，在帝国的若干州中始终暧昧不清。而当19世纪60年代代议机构复兴，一些女性通过男性代理人进行投票，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永久解决。

民族之春？

1848年，革命者口中所谓的“民族”变戏法似的得到了许多觉醒的、复兴的或是神化的政治修辞。当时的人以及之后的活动家（其中还有不少历史学者），以他们的观点来看，都对革命的这一年所产生的大量民

族主义运动欣喜不已。对这些人来说，1848年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时候，许多在帝国统治下蛰伏了数个世纪的民族纷纷觉醒，主张它们在欧洲舞台上正当的一席之地。此时奥地利的许多政治运动，通过宣扬所谓的民族权力，将它们的计划正当化。但是这些人所谓的“民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真的存在这样的民族吗？

将民族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在匈牙利和加利西亚尤其如此。数十年来，反对帝国的贵族们宣称要代表一个蒙冤受屈、饱受压迫的匈牙利民族或波兰民族发声，对抗奥地利的中央集权化举措。不过在1848年，公众讨论中所谓的“民族”，它的意义和本质正逐渐被彻底改变，最初是一个促进统治精英权利的社会政治单位，之后转变为一个拥有广泛大众基础，由广泛的文化层面、赫尔德式的术语来定义的现象。“民族”不再是出席议会的贵族，而是由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甚至有时据说可以根据共同的血统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注

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们长期以来与不断进逼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抗，拥有主张民族权利的悠久传统，正因为如此，在上述民族意义的转变中，匈牙利为我们提供了特别有趣的案例。“四月法令”坚持根据匈牙利民族国家意识来定义一个统一的国民身份，它还坚持要求增加匈牙利语在公务场合的使用，这令使用其他语言的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精英（更不用说当地的其他人）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匈牙利新宪法。在1848年，匈牙利使用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德语和斯洛伐克语的人群正承受着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难以习惯的匈牙利民族同化压力，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要面对更多在政治上遭到边缘化的危险。1848年之前，人们尚有可能想象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国家，这个国家拥有说不同语言的政治宗教精英，他们在政治层面上都将自己视为匈牙利人。但是民族主义者们强调语言因素，这就令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很难认为自己是忠诚的匈牙利人。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匈牙利语是独有排他性的法律语言，只有满足法律条款规定的人才具有当选的资格”，因此非匈牙利语使用者就不可能成为议会代表。注

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的城市出现了反对“外来的维也纳”的爱国潮流，其中人们提出了一些象征性的文化需求，譬如在议会中用匈牙利语代替拉丁语。民族主义活动家们认定使用

匈牙利语才是爱国，就在无心中为匈牙利的国民身份创造出了一个具有排他性的语言或文化定义。在拉丁语作为议会和郡政府的行政语言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都会面临相似的语言不便，因为他们中没有人以此为母语。

而如今，不仅仅是具有行政自治传统的地区，如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精英会感到不便，匈牙利本地使用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语和德语的社区成员也处在了不利的地位。当然，这些语言和特兰西瓦尼亚或克罗地亚的统治精英无关，出于他们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在传统上享受一些历史性权利。但是议会选择将匈牙利公民身份与匈牙利语在正式场合的运用联系起来，这就骤然引发了过去未曾被人深究的“匈牙利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匈牙利大部分实际上并不说匈牙利语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正如我们所见，佩斯或普莱斯堡不以匈牙利语为母语的市民们，会用订阅匈牙利语报纸或使用匈牙利语姓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革命热情，但身处这些爱国主义情结酝酿发酵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匈牙利人又该如何呢？

讽刺的是，那些使用其他语言（克罗地亚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的匈牙利知识分子，很快就有了类似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与文化需求。1848年，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巴奇卡地区的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要求让匈牙利境内使用本族语言的人得到语言和行政上的自治。这些独立权利是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不久前刚从维也纳方面得到的，但如今他们却不情愿向其他的民族主义者退让。很快，匈牙利原本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局面就被打破，它们彼此成为新的敌人，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也很快起兵反抗位于佩斯的政府。

但是民族身份的问题，并不能被简单定义为一种语言对抗另一种语言。这只是潜在的忠诚和认可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中的一环。基本上在1848年，城市民族主义者们对即便是解读民族身份的文化–语言模型，各自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一个民族，它可能意味着从某个人的故乡或所在地域，到分散在世界各地，使用一种相似语言的人们。当中欧的人们开始在1848年系统整理民族主义者们做出的承诺时，发现它们并不是可以互相比较的统一的事物。与此同时，无论“nation”这个词在具体情况下表达何种意思，人们在1848年通常对它拥有的合法力量抱有普遍信心。受到削弱的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顾问们期待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

一个观念：每个民族都将成为一个效忠的主体和重组国家结构的重要角色。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帝国中央集权措施的推动，致使建立在共同语言运用基础上的民族身份概念出现。因为帝国的核心国家不断扩展的行政范围，决策、语言运动和语言公平等地区性议题在1848年的绝大多数政治计划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活动家们越来越多地表达出他们在地方利益上的诉求，比如官员和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像斯洛文尼亚语和斯洛伐克语这类，随着大众识字率的提高，逐步编纂系统化的地方语言。难道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就无权以自己的母语向国家反映需求，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行使合法权利吗？在此，不仅仅是地方神职人员、教育工作者、商人或记者要求官方政策更好地考虑地方语言实践问题，公务人员同样满腹怨言，为了向帝国体系的效率妥协，他们往往不能用地方语言和他们管理的人们交流。这些人坚称，出于功能性的理由，国家必须用当地居民的语言和他们沟通。正如一名驻达尔马提亚的公务员沮丧地建议："我们最终放弃了在没人懂得意大利语的村镇或地区强制推行意大利语学校的念头。"注

在卡尼奥拉、卡林西亚、伊斯特里亚或施蒂利亚，活动家以及他们运营的报纸曾一度主张一个统一于同一种语言之下的斯洛文尼亚民族的存在。1848年，克拉根福教堂的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偶尔为斯洛文尼亚语报刊《初学者》撰文的马蒂亚·马亚尔–齐尔贾斯基（Matija MajarZiljski），他在被其称为"斯洛文尼亚爱国者"的同僚中传递一份典型的请愿书草稿。这份文件中，明确地把一个正在发展的斯洛文尼亚民族身份概念与语言运用结合起来。马亚尔在请愿书中提出了8项要求，其中整整5项特别涉及斯洛文尼亚语地区内行政语言的使用问题。其中一个要求提到"只有真正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语言的人才能够被任命"，同时另一条建议认为斯洛文尼亚语需要在其使用区得到德语在德语区所享有的同等权利。注

至于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他们把语言运用的议题与波希米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远早于1848年，波希米亚爱国者就试图让他们这片土地从奥地利手中获得自治，他们将如今的波希米亚和中世纪的波希米亚国家，用一个由语言定义的捷克民族联系起来。他们宣称，捷克语文化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已经被人渐渐遗忘，而这正是1620年之后，奥地利实行的反改革政策，以及它试图让德语成为波希米亚唯

一行政语言的行动所致。而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以及偶尔在卡尼奥拉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为所谓的“伊利里亚”民族做出的模糊主张则更加复杂。至于这个伊利里亚民族，它在领土、语言或文字拼写上的定义都和在札格雷布（Agram / Zagreb）和扎达尔的民族主义活动家群体所声称的截然不同。因此，官方对一种语言更明确正式的承认事关重大，因为它可以使活动家们在教育、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方面谋求更多地方或地区权力的要求合理化。

1848年，一个文化层面或语言层面上被定义的民族需要一个自治政治存在的理念导致了本地与地区层面上始料未及的困境。在这一年，地方上特定的情况对民族主义者们尤为重要。一些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并不想成为以城市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宣称的一部分，而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者们亦可能回避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诉求，因为他们相信行政上的自治可能会对地区经济或传统文化产生不利影响。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的活动家曾试图让克罗地亚与奥属达尔马提亚一同成为一个更大的克罗地亚（或伊利里亚）国家，并且宣称根据这两地人民共同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他们事实上属于同一个民族。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们甚至进一步希望这个扩张后的克罗地亚国家可以得到自治，甚至完全从匈牙利独立出去，就像历史上的克罗地亚一样。然而根据一份来自扎达尔的警察报告，本地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并不愿意采取这一步行动。报告称：“在这最后的几日中，达尔马提亚是否应当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合并的问题被人们广泛讨论，许多人对此大声抱怨，认为如果这件事成真，会使本地（达尔马提亚），特别是扎达尔蒙受巨大损失。”不只是达尔马提亚各城市中使用意大利语的人士反对克罗地亚的主张，扎达尔本地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也害怕一旦达尔马提亚并入克罗地亚，会使他们的城市失去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一来，扎达尔再也不会被看作一个州的首府。“这座城市的公务员（公务员也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资源）将因此有大大缩减的可能性……令整个扎拉（扎达尔）的人们情绪消沉。”[注]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帝国北方那些活跃在卡尼奥拉、卡林西亚、伊斯特里亚和施蒂利亚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这些地区的求学于维也纳的人身上。在革命过后的最初几周内，这些学生目睹了各地代表团向皇帝请愿，要求得到更多语言上的权力和行政自治的场面。于是学生们感到困惑不已，他们那些说斯洛文尼亚语的同胞现在在哪儿呢？[注]在《初学者》报刊登的一封信件中，学生们呼吁自己的兄弟同胞向皇帝呈送一份大众请愿书，因为“卡尼奥拉人、施蒂利亚人、卡林西

亚人和伊斯特里亚人，他们的血管中都流着同样的血”。学生们这样写道：

> 我们是兄弟，我们要请求温和的皇帝、我们的君父斐迪南将长期以来在行政上彼此分离的我们结合成一体，置于同一个统治者管理之下。此时所有人都是一个希望统一，也终将统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将那些在血统上、心灵上和语言上都归属一体的人们强行分开，是多么可怕。

这些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们希望皇帝设立一个全新的行政州，将所有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划归到它的范围之内。当然，这意味着将现有的行政区拆得七零八落，并将其他语言群体吸纳到他们想象中的新整体中。因此另一些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激烈地反对这个提议，认为这会破坏与他们有着强烈情感纽带的传统行政区块。

第一批从布拉格送呈皇帝的请愿书中，有一份要求让一个新的行政产物得到政治自治权，这个新创的区域将根据历史上波希米亚王国的领地，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合为一体。这三个地区也正好是奥地利帝国国内的捷克语区。这个提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由捷克语使用者和德语使用者组成的政治民族，当然，这其中使用捷克语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份请愿书把历史依据（历史上波希米亚王国的边界）和语言依据（捷克语占据的主导地位）结合起来，加强了此后捷克民族主义者对捷克语用户的语言权利和历史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联合体的地区性自治要求。然而在邻近的摩拉维亚，那儿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却对波希米亚邻居的行为心怀疑虑与抵触，他们认为波希米亚人的行为是在尝试废除摩拉维亚作为一个独立行政州的历史地位。于是当1848年摩拉维亚议会派出觐见皇帝的代表时，它使用了一种传统的、以议会为本的理论来反对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合并的尝试。“摩拉维亚是独立于波希米亚之外的一片土地，它只属于奥地利君主国的一体联盟。”摩拉维亚代表坚称，尽管与波希米亚联系十分紧密，但摩拉维亚仍然是一个具有历史权利的独立国家。（代表称：“这两片土地因为共同的民族和拥有同一位君主而始终紧密结合。”）最后，摩拉维亚代表以“在这部（皇帝已承诺修订）的宪法保护下，摩拉维亚全体人民得以保全其民族特性与个人特性”的希望作为总结。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848年，即便是在一个计划中，都可能存在并运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身

份概念，以这个案例来说明的话，一种是历史上的摩拉维亚国家，而另一种是指捷克语使用者组成的社群或民族。[注]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同的民族主义者们要如何想象帝国必须经历的重构，以此来更有效地保障他们民族在未来的发展？旧政权在革命风潮下退却后的最初几周，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活动家欢欣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一个民族大团结的共同体出现在中欧的土地上，并且将要塑造出一个新的欧洲。当布拉格的活动家们纪念3月在维也纳爆发的革命时，他们强调了不同民族所共同采取的行动。“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为了更高的共同事业，倒在维也纳的土地上，”一份捷克语的小册子这样宣称，“让我们跟随着先烈的步伐，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等手足情的纽带。”[注]三月革命过后的最初几周，来自帝国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们纷纷向皇帝表达他们对政治自治与越来越高涨的语言权利的要求，在这股潮流开始的时候，各民族提出的要求还没有和其他民族的产生冲突。[注]许多身在维也纳的人（他们往往是学生），或者作为代表团一员来到维也纳的民族主义者把革命最初的几周看作一个团结全民族的全新黄金时代。一份维也纳刊物这样建议读者：“告诉你的孩子们，他们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一个奥地利宪政国家的公民。”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又暗示一个普遍的奥地利民族将用统一的形式取代各民族的差异。文章称：“到了那一天（3月31日），我们将属于同一个民族……因此，让我们只拥有同一个民族身份，忘掉各民族所有的区别！”[注]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团结的黄金时代很快分崩离析。

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有一系列的民族计划与国家建构计划互相竞争冲突，它们之间的纠葛往往令人们宣布民族统一的欢庆活动也黯然失色。甚至其中极少数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一旦实现，就会让整个民族脱离帝国。以部分伦巴第地区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为例，位于附近皮埃蒙特的卡洛·阿尔贝托国王（King Charles Albert of Piedmont）成为他们心目中统一意大利半岛上如同一盘散沙的土地，让它们形成一个意大利联盟的不二人选。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四月法令”确立了一个从奥地利帝国中彻底分离出来的独立匈牙利国家，如今的匈牙利和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只剩下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共主。至于其他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他们中的斯拉夫人，制定了许多“零和博弈政策”，他们谋求的是偏向己方的国家资源再分配，而不是脱离帝国。同时，那些支持创立一个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奥地利人则更不容易分类，因为他们谋求建立

的统一德意志还包括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哈布斯堡领地。如果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建国计划成功（无论是建立在分裂或者是重构的基础上），就会轻易摧毁绝大多数在1848年革命时期奥地利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家所坚持的帝国统一理念。

向帝国效忠的同时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这显而易见的矛盾部分建立在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拥有民望的事实基础上。许多活动家并不认为在帝国的政治范畴内建构自己民族的行为是矛盾的。那些民族因为文化、历史和语言运用等因素而联合起来的主张，具体表现为一种建立独立国家的集体意志，在当下这一意志还不多见。1848年，除匈牙利之外，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支持一个雄心勃勃的跨地域民族联合计划，他们普遍期望未来众多的民族国家可以组成一个各成员地区拥有相当自治权（行政和语言方面）的松散联盟。回想起这个事实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这是理解早期奥地利范围内支持想象中统一的德意志或意大利国家行为的唯一途径。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围绕着制订一个统一德意志目标的计划公开之后，得到了民族主义者们的消极回应，他们希望为哈布斯堡王朝谋求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未来。在请愿书和报纸文章中，许多原神圣罗马帝国领域的斯拉夫民族主主义者断然反对成为德意志联盟的成员，并且号召同胞抵制将于1848年4月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既然波希米亚人、卡尼奥拉人或伊斯特里亚人已经是奥地利皇帝的忠实臣民，为什么他们还要服从于一个什么新的德意志呢？舆论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关注，促使一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走得更远，并发展出一个关于奥地利在欧洲地位的新观念：奥地利–斯拉夫主义。1848年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筹划委员会邀请波希米亚著名史学家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加入（波希米亚过去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遭到后者拒绝。巴拉茨基强调，他的主张属于一个捷克斯拉夫民族，而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和德意志民族分开的。巴拉茨基声称：

> 捷克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交往是平等的，千余年来，它们二者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而现在捷克民族要保卫自己的民族性。无论它在精神上吸纳和经历了多少德意志的产物，它是个斯拉夫民族的事实也不会改变。[注]

巴拉茨基表现出的立场，正是许多波希米亚人很难决定加入一个德

意志民族国家的原因。他坚称一个人们公认的“波希米亚民族”，实际上是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其中捷克民族占大多数，德意志民族占少数。巴拉茨基宣称，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差异，要比任何双语的统一波希米亚国家的主张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巴拉茨基不仅强调捷克和德意志民族在中欧的共存，还主张奥地利应当承认斯拉夫人的民族身份，并且采取更多以斯拉夫人为本的政策。在他的预想中，奥地利对所有较小规模民族的存亡至关重要，“它们中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能成功反抗东边强大的邻居”，或是西边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巴拉茨基认为：“只有在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仿佛一个整体后，才能达成目标。”[注]



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波希米亚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领袖，在19世纪中叶领导了捷克民族主义运动。1848年，在他著名的《告法兰克福书》中，他坚持奥地利帝国内部的斯拉夫民族特性（Private Collection / © Look and Learn / Elgar Collection/ Bridgeman Images）

巴拉茨基将爱国主义与捷克种族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在传统上以议会为本，要求波希米亚从封建的奥地利中获得自治，而后者在波

希米亚的行政机构中寻求语种平等或支配权。如果奥地利众多的斯拉夫“民族”提出类似的诉求，那么帝国将会使它自己适应这些民族的共同计划。为了发展和传播这种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目标，巴拉茨基和其他一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在1848年6月的布拉格组织了一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注]在某种意义上，这次短命的大会（因为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对布拉格发动了围城战，这场会议过早地结束了）提出了一个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应的颇具影响力的象征性议题。尽管许多与会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分享一个特定的奥地利—斯拉夫目标（尤其是参加会议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巴拉茨基和他的同盟者还是提出了一个用来重构整个帝国的逻辑，这一逻辑极具说服力地挑战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奥地利天然具有成为一个统一德意志领导的地位。

不过许多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解读为他们通过一种零和挑战，在以波希米亚为代表的双语地区，谋求自身民族权利的行为。如此一来，这两方中的一方得到了更多的承认与权利，而另一方则必须放弃力量。不仅如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把斯拉夫人对德意志支配地位的反对理解为拒绝革命目标的政治反动行为——的确，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见。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看来，他们的民族代表着人道、进步、教育和经济发展等诸多自由主义的美德，那些拒绝这些美德的人就是拒绝革命带来的馈赠。[注]不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不加鉴别地认为，斯拉夫人大多缺乏教育，并缺乏接触高雅文化的潜力，被斯拉夫民族拒绝德意志文化的熏陶所困。为什么有教养的斯拉夫人不愿意学习德语（很多已经这么做的人群，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小进步），并成为德意志人呢？为什么斯拉夫人不愿意加入一个拥有世界一流级别的高校，拥有位居世界前列的文学和科学造诣的高素养民族群体呢？有一些斯拉夫人，比如巴拉茨基这样的学者，都曾使用德语撰写其波希米亚史的最初几卷，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一个谜团。

在此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对我们所谓的民族转变的态度相对来说较为开放。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要以文化上的优越性来定义自己的民族，并且他们为那些意图向上流动，加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人群大开方便之门。当一群维也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组织起一个奥地利德意志人政治协会时，他们规定协会的会员资格面向“所有同情德意志的奥地利人”，而不仅限于德意志人。[注]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概念，虽然它和其他的民族观念一样，在民族凝聚性方面倚重语

言的运用。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路线更为激进的维也纳民主派在奥地利国会中强烈抨击捷克民族主义代表，斥其为不切实际的反动派。捷克人反对德意志主导权的行为亦被认为背叛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不过实际上，德意志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们在政治上拥有远比任何一方愿意承认的更多共同点。彼得·博格认为，在19世纪中叶，波希米亚的这两派民族主义者们基本上都通晓德语和捷克语，拥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也支持相似的改革目标。就像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等到撰写奥地利宪法时，这些未被公开承认的共同点就会变得格外重要。不过我们仍需要思考，这些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不断发展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究竟能如何平衡对一个自由主义的统一德意志的热情和对一个自由主义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

出于他们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文化理解，绝大多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奥地利代表并不从纯粹的种族角度来理解未来的德意志公民权。德意志公民指的是那些居住在那个新国度中的居民。在法兰克福制宪委员会讨论宪法第一次草案时，代表们通过投票，用“所有公民（jeder Staatsangehörige）都享有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公民权”代替了原稿中“所有德意志人都享有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公民权”。代表们相信，这么做可以朝非德语人士发出一个信号，即他们可以在未来的德意志国家中和其他国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注]绝大多数代表们拥有共同的自由主义立场，这就意味着他们认可在未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内，使用德语之外的语言的公民个人的文化权利。而另一方面，代表们并不习惯把这些非德语人士看作特定的群体，他们更乐意将这些人看作恰好使用其他语言的孤立个体。即便是热烈支持普鲁士领导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那群人，也都认为未来的德意志应该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注]但问题在于，联邦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包容当前存在的文化和语言差异呢？

随着1848年慢慢过去，许多奥地利人并不希望以放弃奥地利独特文化认同，或者说以在德意志联盟之外奥地利领地之间的历史纽带为代价，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国民，在他们眼中，统一的德意志正逐渐失去它的诱惑力。如果这个国家只包括属于德意志联盟的土地（尤其是除了匈牙利、加利西亚和达尔马提亚以外的地区），那么它们和奥地利其他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又该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许多身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回避了把整个奥地利帝国纳入新统一的

德意志国家中的方案（即所谓的七千万方案）。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帝国中众多非德语人群会降低新德意志的日耳曼文化特质。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还降低了原本对统一德意志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热情。奥地利制造商们担忧一旦进入一个开放市场，它们将难以与德意志产品展开竞争。因此，布拉格手工工人协会在一份请愿书中这样宣称：

> 英格兰和法国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工商自由、无限制的机械化，以及大宗资本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只会击垮中小企业，并催生出可怕的无产阶级。[注]

最重要的是，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对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热情，只会损害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归根结底，在未来的奥地利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架构，比起参与一个质疑声日渐高涨的统一德意志建立计划，前者要更紧迫。1848年秋，随着帝国官方镇压了维也纳的10月暴动，帝国保守力量的复苏使得这个紧迫计划越发势在必行。等到皇帝和国会移驾至摩拉维亚［先是到奥洛穆克（Olmütz / Olomouc），之后是克罗梅日什（Kremsier / Kroměříž）］，德意志民族主义一方的国会议员们意识到，他们必须更加紧密地与其他人合作，来尽可能地挽救他们的自由主义革命。

奥地利国会的制宪委员会如今正倾尽全力应付为奥地利制定一个连贯的行政政治结构的挑战，而且这个结构必须让国会和哈布斯堡皇室都愿意接受。委员会的成员要怎么做，才能协调族裔民族主义者、地方爱国主义者、民权自由主义者和官僚主义的集权主义者所提出的不同要求（有时候单个人会拥有上述的多种立场）？委员会中的波希米亚代表巴拉茨基与他的律师女婿里格尔为帝国提出了一个高度联邦制的解决草案。它可以给予个别行政州高度自治权，赋予它们几近小型国家的待遇。他们坚称宪法将首先规定奥地利中央政府未来（有限）的权力，接着将其他权力交给议会。照这种情况，权力的天平倾向于个别议会时，以捷克民族主义者为例，他们就能解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波兰民族主义者也同意这一立场，因为这可以让他们对加利西亚的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不过绝大多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更倾向于一个更加集权化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先列举出地方议会可以享有的职权，然后将剩下的权力归于中央政府。[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更偏向给予中央更多权力，部分是因为德语使用者在许多行政州内都属

于少数语言群体。不过他们同样害怕在联邦体制下给予地方议会权力，会阻碍全帝国的渐进式改革，因为一些州可能会接受自由主义的改革，但另一些地方改革就可能遭到失败。注

之后，巴拉茨基在1月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草案。这次它纯粹按照语言标准，将帝国分为8个自治体：德意志区、捷克区（包括斯洛伐克）、波兰区、斯洛文尼亚区、意大利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区、匈牙利区以及罗马尼亚区。就这样，以德意志区为例，巴拉茨基将波希米亚的德语区和捷克语区分离开来。这份秉承着更接近于20世纪民族身份概念的草案，自然难以被1848年的人们所接受。不但是中央集权主义者，以议会为基础的保守联邦主义者也否决了这一提案，巴拉茨基遂选择从委员会辞职。注大多数委员会成员接受了西里西亚人卡耶坦·迈尔（Cajetan Mayer）更中央集权化的方案，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迈尔的草案除了具有中央集权的趋向，还对联邦制的支持者们做出了若干妥协。至于匈牙利在重组的新帝国中扮演的角色，迈尔的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暧昧不清。而在这些进展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奥地利国会各方都继续信守为帝国制定一部宪法的承诺。

大众民族主义？

当阅读当时的演讲或改革计划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整个中欧大众情绪都弥漫着民族主义的论调。从记者、政客、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公众评论家的言论来看，似乎民族身份是奥地利公民表达忠诚与认同的基本形式。事实上，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心和思维方式，只能在范围相对狭窄的，通常是有文化的城市大众中才会出现。1848—1849年，这批群众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每一个角落讨论着国民身份的议题，并且使用民族主义者的术语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和成就。不过在此我们需要牢记来自卡尼奥拉的预科学校学生约瑟普·沃什尼亚克发人深省的话。在他的回忆中，沃什尼亚克谈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奥地利，“从民族主义的意义上，1848年对大多数人民，即农民群体来说完全没有意义”注。

与他们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民族主义者们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建立民族共同体。他们充满感染力地谈论自己的民族，但若是要说在1848年，广大群众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种族或语言来确定自己属于

某个民族共同体，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这类民族主义理念的政治承诺，在1848年始终是一种城市现象，它主要局限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活动家和传统精英的圈子中。如果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观点正确，那么基于种族或语言因素的民族不是“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而且平心而论，在1848年，抱有同样看法的人相当稀少，而且这个看法只在有限的情况下出现。[注]对民族主义者们来说，一个他们宣称可以代表其利益的民族还有待他们着手创造。当然，民族主义者们不用在这些方面表现他们的能动性，而是宣称自己是已经存在的民族的代表。他们的任务是让这些民族的数百万成员觉醒，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不过，民族主义者为如今存在着的民族代言的主张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充满希望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帝国的数百万居民中，并未引起什么反响。

民族主义者们的理念并不能打动拥有土地的人们，也几乎不能触动小城镇，甚至城市的居民。农民们的认同取决于结束那些封建义务，或者确保他们能够直接拥有土地。1848年，社会活动家们试图通过在大会上向农民们反复灌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方式，来唤醒（他们这样自诩的）农民真正的民族主义认同感。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记者兼诗人卢多维特·什图尔（L’udovit Štúr，1815–1856）这样写道：“今时今日，在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斯拉夫民族在一位大天使的号角召唤声中觉醒，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精神生活。斯洛伐克人也同样觉醒，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注]这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但我们必须记得这一点，通常来说，民族主义者们扮演的觉醒者角色都明显地失败了。实际上，他们常常遭到农民听众们公开的敌意。在此我们举一个来自卡尼奥拉的例子，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在波特夏赫（Pöltschach / Poljčane）出资举办了一场公开集会，吸引了500—700名农民参加。当出身中产阶层的演讲者们开始讨论所谓斯洛文尼亚民族受到的压迫，而不是未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时，听众们变得越来越焦躁和不耐烦。当其中一位演讲者告诉农民们，他们需要和平地等待土地分配的立法结果时，农民们大声叫嚷，压过了他的气势，并且指责演讲者是农民的敌人。

1848年5月，在卢比安纳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协会举办的一次演讲中，协会的理事海因里希·马丁亚克（Heinrich Martinak）重复了他从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的同志那儿听到的抱怨，那里的民族主义者称农民一点不关注自己的民族，而且经常受物质利益驱动。约阿希姆·霍斯勒

这样总结："知识分子和神父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民族政治方案并不能为农民的社会关注焦点和问题提供真正的答案。"我们同样要否定许多城市民族主义者做出的结论，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只是源于农民们无可救药的无知。就像我们在前文的加利西亚的案例中所见到的那样，许多农民拒绝民族身份的概念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那些由民族主义者们向他们描述的民族共同体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不过与此同时，在真心信奉这类民族理论的人当中，它可以激起他们的热情，令他们产生奉献牺牲的动力。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大多数人对民族的抽象概念不甚了解并少一点关注，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就不会被贬低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政治语言。以独立的匈牙利国家为例，它很快就在城市中建立起一种热烈的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的独立战争中，给予新政权有力的支持。此后，从1848年秋至1849年，奥地利军队攻击匈牙利的行为更进一步引发了匈牙利城市居民的爱国情绪以及相关的民族主义热情，不少人表达了他们愿意为民族和国家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意愿。

卷土重来

1848年夏，自由主义革命者和王朝之间的权力平衡开始产生变化，这些变化在当时看来细不可察，但事后人们回顾，它们都至关重要。到了这年年底，王朝夺回了地位，并且将革命者们取得的一些成就打回原形。早在6月，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亲王举兵攻打布拉格，成功镇压了一场激进学生的起义。8月初，陆军元帅约翰·约瑟夫·拉德茨基伯爵在库斯托扎（Custozza）击败了皮埃蒙特的卡洛·阿尔贝托国王，从反叛者手中重新夺回米兰。上述胜利得到了维也纳革命者，尤其是其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狂热的支持，他们将其视为对抗外国人的爱国主义大捷。事实上，约翰·施特劳斯正是为了庆祝库斯托扎胜利，向欢呼的维也纳人举办了他的《拉德茨基进行曲》的首场公演。1848年9月，克罗地亚的约西普·耶拉契奇（Josip Jelačić）率领一支帝国军队攻打与克罗地亚有兄弟般情谊的匈牙利。10月，6月成功征服布拉格的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再次披挂上阵，对维也纳发动攻击，维也纳当时已被宫廷、国会和绝大多数政治温和派抛弃良久，掌握在革命者手中。作为哈

布斯堡王朝巩固自身的最后一个表现，12月2日，哈布斯堡朝廷换下了软弱无能的皇帝斐迪南（人们暗指他本人对革命做出了太多妥协），让其精力充沛的18岁侄子弗兰茨取而代之，后者即是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 I）。弗兰茨·约瑟夫既获得了皇帝头衔给予他的令人难以抗拒的领导力，也不必肩负履行叔叔斐迪南承诺的义务。于是他果断决定对付即位时继承于斐迪南皇帝的革命秩序之中的某些方面。1849年3月，随着对意大利战争的最后胜利近在眼前，新皇帝相信他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于是命令他的首相菲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Felix Schwarzenberg，1800—1852）解散位于克罗梅日什的民选国会，并且强制推行一部皇帝自己制定的奥地利宪法。如果将时间倒回1847年，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或许热情欢迎这部宪法，但如今是1849年，许多人对其满怀疑虑。

1849年4月，哈布斯堡王朝分裂征服匈牙利的政策，尤其是任命克罗地亚人班·耶拉契奇为当地帝国军指挥官一事，激起了匈牙利宣布全面独立于奥地利的革命。随着哈布斯堡军队与起义者作战，它有目的地利用了起义军与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地方精英的疏远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地方精英或许同情匈牙利的新宪政政权，但是匈牙利的民族同化政策彻底地离间了他们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数月后，匈牙利独立军屡屡败于帝国军的计策，加之帝国方面又得到了一支沙俄大军的帮助，奥地利终于在1849年成功击败了匈牙利起义者。当1848—1849年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终于落下帷幕时，这期间无数次围城战、起义，以及尤为血腥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战争差不多夺去了10余万奥地利人的生命。注

接下来，这个帝国和它年轻的新皇帝将走向何方，当时的人们还茫然未知。奥地利人是否要接受毁灭一些革命成果也悬而未决。不过在1849年，绝大多数人事实上并不相信帝国军队的胜利意味着奥地利将抛弃立宪制度。他们反而认为新皇帝更有可能在帝国推行他自己制定的、较为保守的宪法，用来替代先前奥地利和匈牙利民选议会代表们撰写的版本。而许多迹象都表明事态将朝这个方向发展：当帝国政权秋风扫落叶般无情镇压了匈牙利的起义者，关押并处决了不少人时，当匈牙利和奥地利其他区域宣布颁布戒严法时，当严格的审查制度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力时，以及帝国政权在1850年秋天没有举办选举新一届市政议会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且不论许多在牢狱和流放途中度过余生的革命者们所感受到的绝望，1848年3月颠覆梅特涅政府的起义，试图建立一个宪政帝国的种种尝试，以及之后匈牙利起兵反叛等种种事件，都永久地改变了奥地利社会。革命永远终结了所谓的庄园制度，同时它确定了一次政治价值观角度的革新。这次革新的成果，已经深深扎根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增加，且受过教育的跨区域大众中。虽然许多奥地利军队的高层人士或贵族还在迫切要求实施反革命的社会计划，作为对革命的必要回应，但在1848年之后，社会已经感知到它参与管理自身的权利，要否认这一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帝国的存续需要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大众合法性。从1848年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帝国政权支持了不少连温和的革命者都严厉谴责的事，但是它有策略地从当年革命人士主张的价值观角度接受了这场革命。就像当时的法国和普鲁士一样，经历了革命的奥地利仍然面临问题：这个国家的自治机构，要在怎样有限的条件、狭义的环境下才能被允许建立起来？它又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哈布斯堡王朝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的参与和互动，它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帝国。

---

1. František Palacký,“ Letter to Frankfurt, 11 April 1848,” in Balázs Trencsény and Michal Kopeček, eds.,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1770–1945)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27.

2. 克拉科夫的起义爆发后只持续了9天，就被奥地利军队镇压。在加利西亚，有人声称事件造成超过2 000人死伤。Larry Wolff，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2.

3. Kai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in Galizien. Über Zugehörigkeit und soziale Emancipation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k & Ruprecht, 2005), 81. 根据书中内容，这场叛乱的领导层的行动被政治上要激进的波兰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挫败了。后者担心这些行动会分化绅士阶层，于是煽动农民于1845年参与其中。

4. Ibid., 83. 这个例子来自加利西亚东部的一个村子。

5. Alan Sked,“ Austria and the‘ Galician Massacres’ of 1846: Schwarzenberg and the Propaganda War—An Unknown but Key Episode in the Career of the Austrian Statesman,” in A Living Anachronism? European Diplomacy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ed. Lothar H belt and Thomas G. Otte (Vienna: Böhlau, 2010), 49–118.

6.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80; Wolff , Galicia, 183.

7. Istvá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8. 军事专家估计，使用铁路可以将部队的运输速度从16天减少到11天，更不用提军队可以以逸待劳，不必徒步行军。当然，火车的条件谈不上舒适，士兵们得挤挤挨挨地背靠背坐在长椅上8—9个小时，而且还得忍受糟糕的天气。Burkhard Köster, Militär und

Eisenbah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25–1859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1999), 105.

9. See especially, R. J. W. Evans, “The Habsburgs and the Hungarian Problem,1790–1848,” in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Essays on Central Europe c. 1683–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3–192, especially 182–184.

10. 对于拿加利西亚的血腥事件震慑其他州可能掀起叛乱的贵族群体，哈布斯堡政权丝毫没有犹豫，关于伦巴第—威尼斯地区的内容，见Alan Sked, Radetzky. Imperial Victorand Military Geniu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us, 2011), 184–185。

11. 在佩斯，一些非贵族的社会群体也第一次被允许投票，这给投票过程带来了一种新的兴奋感。

12. 1847年，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但事实上他们的政见很快就引发彼此间的抵触。塞切尼对维也纳方面的同情倾向最重，迪克是个温和派，而科苏特却是激进爱国主义的象征。

13. 政府提议取消匈牙利和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之间令人讨厌的关税壁垒，此举胜过反对派一筹。许多反对派把关税壁垒看作一种对匈牙利民族骄傲的公然冒犯，宣称这让匈牙利和奥地利其他地区维持着一种“殖民地式依赖”关系。而更多像塞切尼这样的观察家则忧虑取消贸易壁垒将伤害匈牙利初步兴起的工业。

14. 关于在革命爆发前几周，笼罩在维也纳的气氛，可见Wolfgang Häusler, Von der Massenarmut zur Arbeiterbewegung: Demokratie und soziale Frage in der Wiener Revolution von 1848 (Vienna and Munich:Jugend und Volk, 1979)，也可参照Heinrich Reschauer, Das Jahr 1848.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vol. 1 (Vienna: v. Waldheim, 1872)。

15. 关于协会计划的内容，见Heinrich Reschauer and Moritz Smets, Das Jahr 1848. Geschichte der Wiener Revolution (Vienna: v. Waldheim,1872), 1:126; Ernst K. Sieber, Ludwig von Löhner: ein Vorkämpfer des Deutschtums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im Jahre 1848/1849 (Munich:Lerche 1965), 20–22。在市郊，工人们已经在3月10日和11日发动了骚乱。

16. “蓝色星期一”通常指的是工人们远离工作，从周末的酗酒状态中恢复的一天。

17. Häusler, Massenarmut, 139–140.

18. Reschauer, Das Jahr 1848, 1:175; Gabriella Hauch, Frau Biedermeier auf den Barrikaden. Frauenleben in der Wienerrevolution 1848 (Vienna: Verlag für Gesellschaftskritik, 1990), 85–86.

19.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252.

20. 关于施皮策以及1848年，许多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把他的死看作烈士殉难的象征主义，见Michael L. Miller, Rabbis and Revolution: The Jews of Moravia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9–223; Randák,“Politische-religiösesTotengedanken.” See also the discussion below onJews in 1848。

21. 在这里有一个例子：在混乱时刻，军队确实向着小规模的国民自卫队开火了。

22. Häusler, Massenarmut, 173–178; R. John Rath, The Viennese Revolution of 184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8), 68–73.

23. 斯蒂芬大公，匈牙利所谓的“王权伯爵”，或者皇家总督一力促成了这件事。3月13日时他身在维也纳，并且急于阻止匈牙利也爆发相似的社会骚乱。

24. For the text, see Trencsényi and Kopeček,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2:443–444. See also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71.

25.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70–73.

26. Rudolf Till,“ Die Mitgleider der ersten Wiener Gemeinde-Vertretung im Jahre 1848,” Wiener Geschichtsblätter 4 (1950): 61–72. 这些保守主义者还要求市长下台，因为他与梅特涅政府长期以来都保持着联系。

27.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73–76. 这个内阁还任命科苏特为财政大臣，迪克为司法大臣，塞切尼是公共事务与交通大臣。

28.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伦巴第的乡间仍然平静。Sked, Radetzky,134.

29. “ Brief aus Linz,”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Kunst, Literatur, Theater, und Mode 59 (1848): 236.

30. For events in revolutionary Graz, see Gerhard Pfeisinger’s excellent“ Die Revolution von 1848 in Graz”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alzburg, 1985), 55–56.

31. Ibid., 66.

32. Descriptions from the Cillier Wochenblatt cited in Joachim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Die Anfänge der nationalen Differenzierungsprozesse in Krain und der Untersteiermark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sur Revolution 1768 bis 1848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6), 271–272.

33. Klagenfurter Zeitung, 19 March 1848, 1. On songs and music performed during the March days in Klagenfurt, see Walburga Litschauer, “ ‘Im nächtlichen Dunkel sang der Chor am Platz,’ Klagenfurter Musikleben 1848,” in the remarkable volume Musik und Revolution. Die Produktion von Identität und Raum durch Musik in Zentraleuropa 1848/49, ed. Barbara Boisits (Vienna: Hollitzer, 2013), 121–133.

34.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272.

35. Konrad Clewing, Staatlichkeit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sbildung. Dalmatien in Vormärz und Revolution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1), 237.

36. Ibid., 212.

37. See Dominique Kirchner Reill’s superb analy sis in Nationalists who Feared the Nation. Adriatic Multi-Nationalism in Habsburg Dalmatia, Trieste, and Venic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8. Gualtiero Boaglio, “Das italienische Pressewesen,”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ed. Helmut Rumpler and Peter Urbanitsch, vol. 8,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Zivilgesellschaft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 2279–2340, here 2291.

39. Reill, Nationalists, 177, 202–203.

40. Thomas Götz, Bürgertum und Liberalismus in Tirol 1840–1873. Zwischen Stadt und“ Region,” Staat und Nation (Köln: SH Verlag, 2001), 123–125. 特伦蒂诺说意大利语的市民们同时还向皇帝请愿，要求让他们脱离蒂罗尔首府因斯布鲁克的管辖，把他们所在的地区交给伦巴第管理。

41. Pieter M.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Liberal Politics, Soci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ustrian Empire, 1848–191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26–27; Rita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Statu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Habsburg Bohem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4–205.

42. Stanley Z. Pech,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47–62. 请愿书中提出的更为传统的议会模式要求，是希望在一个位于布拉格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下，取得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行政统一。

43. Randák,“ Politische-religiöses Totengedanken,” 313–314. 这位作者还描述了3月23日纪念维也纳革命死难者的犹太典礼。

44. “ Na studenstvo vídenské” quoted in ibid., 316.

45.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86.

46. Ibid, 86–87. 此外，相较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计划，政府下令共有地的惯用用途应当暂时保持不变。

47. In ibid., 87. Struve指出，有一位历史学家估计，已经有600座村落的地主同意或被迫同意结束封建义务。

48.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272.

49. Ibid., 324–325.

50.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116–117.

51. “Bürger von Troppau! Unser Kaiser hat gesprochen!” 17 March 1848,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pamphlet collection, http:// anno.onb.ac.at/ cgi-content / anno-plus?aid = flu&datum=0031&page=2&size=45.

52. Oberösterreichisches Landesarchiv, Flugschriftenversammlung B, vol. 10, “An die National-Garde Gmundens.” See also Bruno König, “Von der Nationalgarde (1848–1851),”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und Kulturgeschichte öterreichisch-Schlesiens (Troppau, 1906), 141–145.

53. “ Bürger von Troppau!”

54. Börries Kuzmany, Brody. Eine galizische Grenzstadt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Vienna: Böhlau, 2011), 139.

55. Miller, Rabbis and Revolution, 222.

56. Saul Isaak Kämpf, Rede gehalten bei der am 23. März 1848 im israelitischen Tempel zu Prag stattgefundenen Todtenfeier für die am 13. D. M. in Wien als Freiheitsopfer gefallenen Studierenden (Prague: Buchdruckerei des M. I. Landau, 1848), 11.

57.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102; Nemes, The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4.

58. Miller, Rabbis and Revolution, 254.

59. Ibid., 220.

60. Quoted, along with other examples, in ibid., 255.

61. Hauch, Frau Biedermeier, 105.

62.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Flugblönter- und Plakate Sammlung, 1848, “Aufruf eines Mädchens an ihre konstitutionellen Schwestern er königlichen Stadt Olmütz.” Hauch, Frau Biedermeier, 102–105; Nemes,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141. On Viennese revolutionary songs in general, see Erich Wolfgang Partsch,“ Revolutionsmusik? Zum Wiener Repertoire im Jahre 1848,” in Boisits, Musik und Revolution, 417–432.

63. 在对1848年3月和10月的维也纳巷战，以及1848年7月布拉格巷战的描述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参与其中，尽管她们往往被描述为处在“辅助地位”。Pieter M. Judson, Wien Brennt. Die Revolution 1848 und ihr liberales Erbe (Vienna: Böhlau, 1998), 93, 105–106.

64. “ Hrdinova milenka. Vyjev z boje pro svobodu v Berlíně dne 18 března!” in Letáky z roku 1848, ed. Miloslav Novotny (Prague: Národní klenotice, 1948), 75, quoted in Randák,“ Politische- religiöses Totengedanken,” 317.

65. Nemes,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138. 政府下令新国旗必须飘扬在政府建筑、公共机构和所有的匈牙利船只上。

66. Quoted in ibid., 139–141.

67. Reschauer, Das Jahr 1848, 1:16, quoted in Hauch, Frau Biedermeier, 95. 帽徽是一小片制作成玫瑰型饰物的布料，它通常装饰在男性的帽子上。

68. Hauch, Frau Biedermeier, 98.

69. Ibid.

70. Schwarz-Roth-Gold, 11 July 1848.

71. John Deak在他的Lawful Revolution中举出不少例子，其中引用了塞切尼的观点，他将激进历史学家Pál Vasvári比作圣茹斯特，见该书84页。

72. Hauch, Frau Biedermeier, 145–164;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39–41. See also the pamphlets in the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1848 collection:“ Edle deutsche Frauen,”“ Wai! Gschrirn jetzt fangen die Jüdinen a schon an,”“ Der Frauenaufruhr im Volksgarten, oder die Waschenanstalt der Wiener Damen”; Neue politische Strassenzeitung 2 (31 August 1848). Women’s activism was certainly not limited to Pest and Vienna.

73.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88–90. 从资料上看，加利西亚只有一个议会是由农民而非神父主持的。

74.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43–44.

75. Quoted in Lothar Höbelt,“ Die deutsche Presselandschaft ,”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1821.

76. “ Bürger von Troppau!”

77. Martin Sekera,“ Das tschechische Pressewesen,”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 1980, 1992–1993; Höbelt,“ Die deutsche Presselandschaft ,” 1826.

78. Harald Binder,“ Das polnische Pressewesen,”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 2037. See also Binder,“ Das ruthenische Pressewesen,”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 2093.

79. Binder,“ Das polnische Pressewesen,” 2045–2046.

80. Constitution, 20 March 1848.

81. Géza Buzinkay, “Die ungarische politische Presse,”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8: 1900–1907.

82. Ibid., 1901–1902.

83. Sekera,“ Das tschechische Pressewesen,” 1987–1989.

84. Quotation in a heading from a special supplement to the Laibacher Zeitung, 20 May 1848, quoted in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292.

85. “ Oberösterreichisches Landesarchiv, Flugschriftenversammlung B, vol. 5, Die Verhandlungen der am 23. März auf dem Landtage versammeltgewesenen Stände des Erzherzogthums Österreich ob der Enns,”上述内容来自1848年4月4日和7月24日的会议。在这些来自林兹和其他城镇的新代表中，有数位商人、一位律师、几位医生、一名药剂师、一个酿啤酒者、一个长柄镰刀制造商和一个制帽匠。

86. “ Verhandlungen des provisorischen Landtages des Herzogthumes Steiermark” (Graz 1848), 13 June, 1–3.

87. 如果要知道这些获得投票权的都是哪几类人，以及需要符合什么条件，见Deák, Lawful Revolution, 97–98。

88. 尽管皮勒斯多夫的宪法给予犹太人在国会选举中独立有产者的投票权，但这部宪法仍然为之后的宪法委员会留下了关于犹太人全面解放的一个问题，即各州必要的法律改变，比如废除摩拉维亚的犹太人税。See Miller, Rabbis and Revolution, 196–206.

89. 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围绕着统一问题而产生，引起奥地利代表比过去更多关注的考虑，见Brian E. Vick, Defining Germany: The 1848 Frankfurt Parliamentaria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0. See Karl Oberman,“ Die österreichischen Reichstagswahlen 1848. Eine Studie zur Fragen des sozialen Struktur und der Wahlbeteiligung auf der Grundlagen der Wahlakten, ” Mitth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 26 (Vienna 1973): 342–374; also the excellent survey by Andreas Gottsmann, “Der Reichstag 1848/49 und der Reichsrat 1861–1865,”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7:569–665, especially 578–582.

91. Gottsmann,“ Der Reichstag 1848/49,” 584. 根据Oberman及其他人估计，在1848年，绝大多数国会代表是由选区内大约5%的人选出的。在所有有投票权的摩拉维亚投票者中，只有20%参与投票。在临近的西里西亚，这个比例略高一些，达到了40% ；上奥地利的投票参与率则接近50% ；在的里雅斯特，这个数字接近选民人口的25% ；而在下奥地利，由于维也纳的有投票权的工人人数超过平均数值，在某些选区投票参与率高达70%，但总的算起来，这座城市及其郊区的投票参与率就要低一些。在选举中，左翼的民主主义者得到了维也纳15个代表名额中的5个。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数字，因为维也纳素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名声。

92. Pfeisinger,“ Graz,” 146–147.

93. 加利西亚总共选出三位出席奥地利国会的犹太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布罗迪、斯坦尼斯劳和捷尔诺波尔。一份本地的意第绪语报纸攻击布罗迪的选择，质问：“你们怎么可以选举一个不清楚我们地区情况的人为代表？我们这些加利西亚人需要一个从我们之中产生的代表，他知道什么地方正经历着苦难，也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获得补偿。” Kuzmany, Brody, 140.

94. Der Herold (Graz), 3 July 1848; Hans Pirchegger, Geschichte der Steiermark 1740–1919 (Graz and Vienna: Leuschner und Lubensky, 1934), 389.

95. 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些数据，因为上述列举的职业分类并不清晰，而且多有重叠现象，还有一些代表已经辞职，又通过递补选举补齐人数。Wenzel Dunder, Denkschriftüber die Wiener Oktober-Revolution. Ausführliche Darstellung aller Ereignisseaus ämtlichen Quellen geschöpft , mit zahlreichen Urkunden begleitet (Vienna: self published, 1849), 37–46; also Gottsmann, "Der Reichstag1848/49," 587–588, and fn. 57.

96. 贵族地主在加利西亚有如此高的当选人数，是因为农民弃权或贵族施以诡计欺诈。一些农民代表在意识到贵族代表可能混入他们队伍时，就在第二轮投票选举中宣布弃权。农民们还坚持，让贵族加入就是对皇帝的背叛。当农民们发现本地庄园中的官员着手主持选举，他们同样产生了怀疑，而当官员们要求这些人签署选举协议时，许多文盲农民就怀疑他们正在签署一份之后会被本地地主拿来对付他们的文件。See Roman Rosdolsky, Die Bauern Abgeordneten im konstituierenden österreichischen Reichstag 1848–1849 (Vienna: Europa- Verlag,1976);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95–98.

97.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98.

98. 最终国会制定出一个在每次投票举行前打断会议的惯例，这样就可以向农民代表们解释各种议题、发言和不同职位。Ibid.,99–100.

99. On Kudlich, most recently, Pavel Kladiwa and Andrea Pokludová, Hans Kudlich (1823–1917). Cesta života a mytu (Česk Těšín: Finidr, 2012). For the debate around compensation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Galician peasant deputies,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101.

100. For the full text of both draft s discussed and quoted below, see http://www.verfassungen . de/at/at-18/kremsier49. htm.

101. Peter Bugge," Czech Nation Building, National Self Perception, and Politics 1780–191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arhus, 1994), 84.

102.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417; Bugge," Czech Nation Building," 84, on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is question.

103. 国家依然会授勋，不过这只能建立在个人成就的基础上，授予的头衔也不能沿袭。此外，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可以回顾帝国刚正式废除的"奴隶制"，这些通过奥地利船只运送或者已经踏上奥地利土地的"奴隶"被视作自由人。这是在1811年《民法通则》中新提出的规定。Alison Frank," The Children of the Desert and the Laws of the Sea: Austria, Great Britain, the Ottoman Empire,and the Mediterran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no. 3 (June 2012)。

104. 这部草案没有明确提及犹太人，不过犹太和非犹太的活动家们都认为第16条的内容是不论宗教信仰，对所有人拥有公民权利的保证，即"犹太人解放法条"。虽然在国会的辩论中没有提到这点，但在幕后私下的游说中，人们还是为这条法律争取到了大多数通过。比如巴拉茨基据说就不愿意见到犹太人解放的问题摆在和捷克语使用者的平等权利相当的地位，除非这对捷克民族主义者有利。关于更多对这条法律政治操作上的分析，见Miller, Rabbis and Revolution, 214–216。

105. http://www.verfassungen.de/at/at-18/kremsier49.htm,paragraphs 13–15.

106. Ämtliche Verhandlungs-Protokolle des Gemeindeausschusses der Stadt Wien vom

25. Mai bis 5. Oktober, 1848 (Vienna: no publisher listed, 1848), 43–47; John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1848–189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5–16;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53–55.

107. Oberösterreichisches Landesarchiv, Flugschriftenversammlung B, vol. 5,“ Protokoll nr. 1 über die am 24. Juli 1848 von den gesammten Herrn Ständen des Landes ob der Ems mit Zuziehung aller Herren Mitglieder des provisorischen Landes Ausschusses zu Linz gepfl ogene Verhandlung.

108. Quoted in Götz, Bürgertum und Liberalismus, 249.

109. Verhandlungen des provisorischen Landtages des Herzogthumes Steiermark (Graz: Leykam, 1848), 17 June, 30.

110. 在1848年，只有少数活动家提出和当时美国人拥有的最为相似的观点，即一个“奥地利民族”包括了奥地利的所有公民，无论他们说什么语言，或者来自什么地区。

111. Quoted in R. J. W. Evans,“ Language and State Building: The Case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AHY 35 (2004): 13.

112. Anton Orosz, Worte eines eifrigen und uneigennützigen Staatsdieners, die bei der regulierung der neuen Verhältnisse des Constitutionellen Dalmatien beachtet werden mögen (Zara: Buchdrücker des Lloyd in Treiste 1848), 55,quoted in Clewing, Staatlichkeit, 202–203. Orosz还补充道，这些市镇内的学校当然还会继续向希望获得公务员职位的学生教授意大利语。

113.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274.

114. Clewing, Staatlichkeit, 249. 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同样建立在一个源自亚得里亚海地区，在地理上通过山脉与克罗地亚分离的强大地区性传统之上。关于如何联系达尔马提亚与克罗地亚，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举例来说，一些计划希望在一个新的克罗地亚内部保留达尔马提亚的自治权，甚至产生了一个轮流在札格雷布和达尔马提亚之间召开的议会。Ibid., 219–225.

115.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277.

116. Ibid., 278.

117. 规模很小的奥属西里西亚虽然在1848年被维也纳方面赋予独立的地位，它在行政上往往还是和摩拉维亚合为一体。

118. Trencsény and Kopeček,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2:256–261. 在名义上隶属于摩拉维亚的奥属西里西亚，情况同样复杂。在1848年之前，中央政府中的西里西亚反对派就不断提及不考虑语言或种族的“西里西亚民族”。不过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西里西亚自治开始被人们从德意志、波兰或捷克民族主义的角度或者德意志和沙俄空间接近性的角度加以解读。See Dan Gawrecki,“ Regionale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en in Österreich-Schlesien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in Die Grenzen der Nationen. Identitätenwandel in Oberschlesien in der Neuzeit, ed. Kai Struve and Philipp Ther (Marburg:Verlag des Herder Instituts, 2002), 111–134, especially 112–119.

119. Hickel, “Die Opfer des 13. März 1848 (ein Erinnerungsblatt) (Prague: 1848),”quoted in Randák,“ Politische-religiöses Totengedanken,” 317.

120. 许多维也纳人在1848年春目睹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团从理想化的各民族团结角度，向皇帝请求许可的情景。Hauch, Frau Biedermeier, 95–97.

121.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Kunst, Literatur, Theater, und Mode 60–61 (1848):239.

122. Quoted in Trencsény and Kopeček,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2:327.事实上从语言层面，“波希米亚”（指代国家）这个词和“捷克”（指代语言、种族或民族）这个词在捷克语中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巴拉茨基主张的具体含义对我们来说就更加复杂。

123. Trencsény and Kopeček,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2:326–7.

124. 尽管巴拉茨基和他的盟友们控制了斯拉夫代表大会的议事进程，这个议会还是包括了一些非奥地利籍的参与者，对他们来说，一个模糊的泛斯拉夫（包括沙俄在内）计划要胜过奥地利– 斯拉夫计划。

125. 这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格拉茨发生的所谓“颜色事件”的回应。在格拉茨，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展示出了代表斯拉夫的红白蓝三色。Pfeisinger,“ 1848 in Graz,” 103–106. 这同样可以解释维也纳和北意大利对拉德茨基元帅（他事实上追求的是反革命的目标）表现出的热情。

126.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58–60.

127. Vick, Defining Germany, 113. On the particular debates, 110–117 and chapter 4 in general.

128. Abigail Green, Fatherlands: State-Building and Nation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22.

129.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62.

130. 上奥地利的约瑟夫·冯·拉瑟男爵（Baron Joseph von Lasser）坚持认为：“我在一些基本制度的同质性中看到真正的自由，它们保障个人的自由，市民的自由，以及整个帝国的和谐统一。”（引自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64）。拉瑟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

131. 作为回应，中央集权主义者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将把波希米亚这样的多语言大州按照语言划分为几个大区。这些大区可以分配到联邦主义者们设想在各个州中获得的权力。这个建议在语言运用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但是否决了以地方议会为基础的州联邦制。

132. Bugge,“ Czech Nation Building,” 84–85. 需要注意，在这个版本中，并没有提到一个鲁塞尼亚或乌克兰民族。

133.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323.

134. Rogers Brubaker,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135. Trencsény and Kopeček,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2:153.

136. Hösler, Von Krain zu Slowenien, 327–329.

137. 维也纳公众不认为与米兰交战取得的胜利是对奥地利革命胜利的潜在威胁。反之，人们充满爱国热情地认为它是一场击败叛乱者和威胁奥地利完整性的外国势力的胜利。

138. Deák, Lawful Revolution, 329.

第五章｜世纪中的现代化：一个自由帝国的出现

就在1851年的新年前夕，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 I）向他的人民宣布：

> 经过各方面审慎的考虑，在此宣布，我们将一同承担起统治者的责任，并且宣告……1849年3月4日的宪法文件宣告无效。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至于有偿废除所有农民农奴身份的法律，仍然强制生效。(注)

通过以上宣言，皇帝撤销了他在1849年3月批准生效的宪法，同时，他也有意识地承诺自己将保留这部宪法最得人心的进展，即解放农民。这条法令同样试图提醒奥地利人，哈布斯堡王朝保证他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早在1849年之前就已经承诺，以此来让人民放心。而在另外两份附加法律中，皇帝取消了他曾在1849年宪法中保证过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同时承诺会保证受到奥地利承认的宗教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并且宣布了帝国新的司法与行政结构。最重要的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口头上强调了他治下的帝国有机统一体，要比过去任何哈布斯堡君主的都更加强大，他宣称"所有在旧的、历史上的，还是全新头衔下的土地，都将与奥地利联合起来，成为奥地利世袭君主国（帝国）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

奥地利的新统治者通过发表这些法令，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以多种方法展开的前瞻性的经济、社会、文化革新计划。这个计划意图通过在国内加强帝国的力量，同时提高帝国在中欧的国际地位，来克服革命带来的不稳定性。1850年的计划以先前革命取得的一些经济、社会和法律成果为基础，却是以一种专制主义的方式得到执行，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约瑟夫二世最为激进的集权目标。通过这种赤裸裸的官僚专制主义，哈布斯堡王朝抛弃了它最后一点旧式政治功能的残余——调停不同地区贵族之间的需求。此后皇帝将使用他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从维也纳把自己的计划推及全帝国。而皇帝强行把帝国变成一个绝对权力国家，

就是实行这种改革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这些年中，缔造了自由主义帝国的人们在充满活力的改革和独裁控制之间保持着平衡。后世的史学家主要从控制方面来解读这个时期——这段时间，帝国严厉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在匈牙利尤其如此；审查制度亦卷土重来——一些学者甚至将这段时间看作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梅特涅体系再度回归。因此，把这个绝对权力国家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是违反常理的。然而事实上，就像法国、普鲁士等欧洲国家曾做过的那样，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现代化计划实现了很多自由主义改革者在1848年设定的目标。新的帝国政权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在乡村地区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建立。它调控本地贸易，终止了行会的额外特权；并且确认产权、迁移和择业方面的自由，强调在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下所有公民的平等待遇。此外帝国政权还推行改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全面改革；它还努力使贸易政策与奥地利的商业需要相接轨，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资。至于奥地利帝国背离自由主义标准的地方，应该是它与罗马教廷谈判后签署的新协议。通过协议，奥地利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力得到提升，而同时，帝国国内少数派群体，特别是奥地利犹太人在1848年得到的权利被相对削弱。

这个由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政权打造的官僚主义乌托邦仅仅存在了差不多10年。1859年，这个政权的一次豪赌导致了短期内的灾难。战败与经济崩溃的双重打击，断送了帝国通过彻底集权化手段进行改革的尝试。此外帝国政权的独裁措施，在匈牙利人的反抗面前（尤其是缴税问题上）没有起到作用。而它的法律、经济和教育改革也没有得到多少预想中的受益者，即受过教育的以商业为本的中产阶层的赞扬。由此看来，至少农民们（除加利西亚外）的反对因为废除封建制度而得到了抵消。不过维也纳方面原本想要让经济上得到加强的奥地利在欧洲扮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现在这个希望却成为泡影。最开始，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而且这场战争不但没有为奥地利赢得盟友，反而使它与昔日的盟友沙俄疏远。此后，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与法国在1859年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导致帝国失去了最富庶的伦巴第领地。有史以来第一次，连哈布斯堡王朝的正面形象都受到了损害，年轻的皇帝决定亲自指挥北意大利的军队，也就在此时，他输掉了发生在苏法利诺（Solferino）的决定性战役。当逊位隐退在布拉格的前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神经错乱的叔父斐迪南听闻意大利惨败的消

息，他评论道：“即便是我也能做得比这更好。”[注]

1860年，帝国已经濒临财政崩溃的边缘，为了承担其冒险的对外政策，帝国推行了毁灭性货币政策实践，结果抹杀了它在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在没有对帝国预算进行某种负责任的监管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拒绝再发放更多贷款。据说联合信贷银行的创办人安塞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Anselm Salomon Rothschild）这样告诉皇帝：“没有宪法，就没有金钱。”[注]

1867年，帝国再次遭遇军事上的失败，并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这迫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匈牙利进行独立谈判，来安定整个国家。奥匈帝国就此产生。同年，皇帝批准了在帝国除匈牙利之外的土地上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法。此后就是一段经过微调的自由主义帝国时期。19世纪50年代的独裁主义，为60年代的宪政制度奠定了一部分重要的基础。而19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则推动了一些经济、教育和科学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直到1867年之后，它们仍然是通行于新的二元君主国内任意一方的主导政策。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政策持续不断地为经济飞速扩张（即1867—1873年所谓的“首创期”）提供动力，同时它们还创设了新的公立学校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除此之外，时政地方自治也在全国推广开来，帝国实现了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人们还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港口、乡镇与村落发展计划，奥地利的匈牙利官员们则继续扮演着协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重要角色，虽然他们的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即便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遭遇重挫，导致了之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不景气，并损害了奥匈帝国在奥地利一方执政的自由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信用，也没能阻止帝国发展的步伐。此外，就像法国、英国或者新生的德国那样，出于对社会动乱挥之不去的恐惧，奥匈帝国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开始制定非常狭隘的社会与治安政策，并且把一些50年代的高压官僚作风保留了下来。

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们发展出了一种必胜主义的历史叙事角度。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胜利者，在一场史诗般的、具有摩尼教善恶二元对立风格的斗争中，击败了以贵族和50年代毫无约束的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无知反动势力。由于自由主义者相信属于他们的时代最终到来了，这个人群亦有着近乎自大的自信，他们便把“自己的”诸多成就（普遍大众教育、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看作让奥匈帝国走向未来辉煌的钥匙。

此后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将给这一长串成就加上一个奥匈帝国面向东南欧的自由主义帝国新文化使命。议会和国会代表通过主流自由主义媒体向人们传达对帝国的主导性理解，而在地方市镇议会和学校，则依赖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解来解读世界。无论是1848—1849年失败的立宪尝试，还是19世纪50年代发展的官僚主义政体都共同塑造了这种对世界的理解。这是一种让人们热情拥抱经济发展、赋权给有产者、缔造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即便它限制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依然可以使所有的公民都投身其中。

奠定自由主义帝国的基础

围绕在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周围的朝廷，其主要目标就是重新确立哈布斯堡王朝在帝国内部的权威，以及帝国在中欧的超然地位。皇帝和他最亲密的盟友们意识到经济与科技进步对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性，于是试图让一个政治威权主义的框架采纳自由主义最有用处的部分。帝国19世纪50年代的专制主义政体有别于19世纪40年代梅特涅体制的最显著的一点，是它得以免于服务贵族阶层。新任首相菲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他本人就是一名贵族）曾宣称他不认为自己所属的阶层中有足够一打的人“具有可以托付重要权力所需的政治视野和才学，而不必担心他将很快沦为平庸”。作为回应，波希米亚的理查德·贝尔克雷迪伯爵（Count Richard Belcredi）激烈地抗议如今所有事都被“毫无保障地交到官员们手里”，另外他还认为在新的秩序中“自下而上的革命让保守机构完好无损，自上而下的革命却在不断摧毁它”。注

约瑟夫二世激进官僚主义的时代建立了新秩序，另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精英从中获得了灵感。许多新人在1848—1849年革命的早期阶段投身其中，尽管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并不相信街头社会革命的影响。如今这些人相信一个经过改良的官僚体系可以达成大众政治未能达成的目标，彻底完成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他们决定，公民有组织的参与行为，必须被限制在他们认为最低程度的政治平台——地方市政议会中。负责起草了1849年3月所推行宪法的内政大臣弗兰茨·施塔迪翁伯爵，亦负责制定了地方自治市议会的理念，以及政府与它们之间的咨询关系。

1849年，施塔迪翁的职位被一个人，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1813—1893）取代，日后人们将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段所谓的新

专制主义时期。巴赫是一位律师，他曾经在1848年服务于维也纳的公共安全革命委员会，之后成为司法大臣。[注]19世纪50年代，巴赫在成为内政大臣之后，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意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理性、高效，而同时又相对人道的行政体系。在1848年之前，许多观察者将官僚体系当作攻击的目标，认为它是奥地利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国家问题之道。特别是当它无法将自己服务社会的职业责任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时，这个士气低落的机构就失去了所有的目标意识。巴赫希望一个面对飞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的官僚体系，可以有效地处理各种因社会而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18世纪的官僚体系面对世袭社会时所遇到的远远不同。巴赫希望国家可以积极且尽可能高效快速地干涉帝国的各个角落。他精简了帝国官僚体系的指令结构，他从地方（社区）开始，进而向上到达区的范围，接着是州，乃至中央个别内阁部门的层面。[注]至于各州的长官则成为皇帝的直属臣僚，而不是半独立代理人，不再向帝国中央提出由地方议会定义的本地利益。[注]

巴赫格外关注匈牙利在帝国体系内完全的行政管理一体化。他常将匈牙利称为“前匈牙利王国”，而且他非常自信，只要行政改革试验有25年的时间来扎牢根基，“我们一定会成为赢家”。[注]为了促进这个急进的整合过程，帝国政府废除了匈牙利所有的传统行政单位和自治的郡级行政机构，代之以奥地利式的行政区划分，各区的边界也重新划分。这既让匈牙利的各个行政区在规模和人口上可以与奥地利其他地方的行政单位相比，还让政府有机会用维也纳指派的官员代替长期以来管辖地方的当地贵族精英。这些说德语的政府官员，往往是具有捷克语、德语或斯洛文尼亚语背景的奥地利人。他们被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轻蔑地称为“巴赫的骠骑兵”，这个词一方面意味着许多匈牙利人将当局与惩罚性的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批官员的古怪制服，它们意图在服装上体现想象中的“匈牙利元素”。[注]在此顺带一提，衣着不是巴赫要求官员们做到内外一致的唯一领域，相关规定还要求帝国各地的公务员都要剃须，因为大胡子往往与革命性的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注]



司法与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冯·巴赫。1851年，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手下，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一个集权主义政权的总设计师（Private Collection / Bridgeman Images）

这些所谓的“巴赫的骠骑兵”最明确的一项任务，是从结构上令匈牙利和帝国余下的区域协调一致。他们使用德语作为语言工具，因此，约瑟夫二世早先关于帝国行政系统的单一语言模式再次得到运用。[注]官员们使用德语的方式和场合，显示出这项语言政策只是帝国系统化集权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意图德意志化当地人的计划。德语是帝国“内部行政体系”的官方用语，这就意味着它是地方官员用来和其他州的同僚以及维也纳方面沟通的语言。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行政体系”仍然使用众多地方语言，公务员使用当地通行的各种语言，和请愿者、原告以及社会大众沟通。在匈牙利，外部行政系统使用的语言除了匈牙利语之外，还有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以及德

语。考虑到许多参与1848年革命的人把官方用语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政治议题，如今德语在行政系统和军队中的地位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哪怕是想象中的），而不只是一群使用同种语言、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的特权。不止在匈牙利一地，行政语言背后的帝国逻辑往往引起对所谓“德意志化”的不满。事实上，许多被派往加利西亚的哈布斯堡官员都被认为是“德意志人”，即便从个人身份上，他们往往拥有捷克语背景，这表明1848年之后，民族主义者们会将个人的语言能力看作政府层面所谓民族化政策的一部分。[注]这反映出在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的政策，来达到他们的政治一致性。

就在同时，继1851年将一个日渐专制主义集权化的政体付诸实行之后，巴赫又试图让他的官员们变得更受欢迎。他希望，通过有效回应地方社会的需要，官员们可以获得大众的信赖。新获得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的洛伦茨·冯·施泰恩（Lorenz von Stein）结合历史，将行政实践上升至理论高度，他相信，巴赫的行政体系是帝国行政实践的最高峰。他宣称，最初的两种行政模式，分别应用于过去的两个历史阶段：社团主义/封建阶段，以及治安/社会公共安全阶段。不过近来奥地利正处在一个官僚体系促进“人民独立活动发展”的阶段，施泰恩认为这些发展意味着人们在经济上更谨慎，工业产能以及他们的可征税收入也有大幅增长。[注]按照某州长官的指示，地方当局应当“注意居民们的需求”，并关注“各阶层人民的福利”。[注]人们相信，一个强大高效，有着勤勉、睿智以及年富力强、忠于国家且敏于体察民情的官员的官僚体系，会把奥地利这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社会结合成一体。政府还采取其他一些手段来提升公众的信任，比如在每个区设立新的地方法庭。这项行动同时还意味着，在人们心目中，地方法庭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再为地方权贵所把持，于是这些法庭就成为大众平反冤屈的场所，而非贵族的工具。

至少在匈牙利之外，帝国政权并不准备对国内文化与社会多元化的现状装聋作哑。这在波希米亚贵族利奥·图恩伯爵（Count Leo Thun，1811—1888）的思想与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负责重组奥地利教育体系和大学课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严厉抨击约瑟夫主义者所喜爱的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同时也与政治自由主义无缘。图恩相信，提高奥地利的学术水平需要更大的学术研究自由度。他坚称，奥地利的大学应当成为促进知识发展的研究机构，而不仅仅是专业人才训练学校。图恩还与19世纪70年代担任内阁大臣的法律教授约瑟夫·昂格尔

（Joseph Unger，1828—1913），以及类似的自由主义者们过从甚密，商讨改进官员训练的内容，他认为，官员们需要获得一些实用科目的教育，譬如历史和罗马法。[注]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读到的，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这样的18世纪思想家们支持对奥地利抱有一种抽象的、功利性的爱国主义。在其发表于1771年的著作《对祖国的爱》中，索南菲尔兹回避了建立在文化共同点上的爱国主义，因为奥地利各个州中，人民的构成、文化、语言与传统都非常多元化。而在自然法传统方面，索南菲尔兹认为，当前的国家与它的法律必须激起理智的国民对它们的敬爱，让他们了解到它们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利。但图恩认为用自然法传统回应奥地利的需求未免有失抽象狭隘，在教育方面尤为如此。

许多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也同意他的观点。图恩是一名贵族，他本人从根本上偏向于一个更关注地方各州传统的联邦制体系。他观点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针对自然法训练优越性的部分），可以顺利地被民族主义者们转变为政府需要对地区性传统、语言使用甚至民族性的区别产生更强行政工作意识的观点。[注]至于其他内阁大臣，则对语言多元化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十分敏感。他们认为，这些议题的政治化，毫无必要地激化了1848—1849年的矛盾。帝国内阁希望在不与唯一公务用语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通过维持“内部语言平等”的总方针，来淡化民族情感的政治色彩。因此，帝国政府保留了在初等学校使用地方语言教学的传统，同时要求全国高一级的中等学校学习德语。从理论上说，所有语言的使用者都可以在非政治的环境下追求自身的文化发展，但实际上这很难办到。即便是双语的中等学校，不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待遇，在学习阶段最后的几年，德语往往成为唯一的教学用语。[注]

当图恩努力让奥地利的教育水平在欧洲更具竞争力（尤其是在与普鲁士竞争）时，他还试图进一步改善公共道德，培养人们对天主教更高的崇敬之情，以此来维护社会稳定。在现代读者的眼中，图恩的行动似乎颇为矛盾，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自由以及逐渐增强的制度性力量，很难与天主教紧密相连。确实，正如加里·科恩所言，图恩的行为无异于走钢丝，“他试图找到一个在自由学术研究和尊重保守政治、宗教教义之间可行的折中方案”[注]。对他来说，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一种由真正的宗教信仰驱动，尽可能全面的学者风度”[注]。图恩的教育改革最终导致了中等学校和大学架构与课程的全面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学术自由。当然，这项政策也在无意中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在教育机构内

的迅速传播。与此同时，这项改革也与先前约瑟夫主义者在国家控制上的传统背道而驰，它重新给予天主教会控制神职人员任免、婚姻以及教育的权力。

当下的帝国政权与19世纪40年代的不同，它主动采取了一些改善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贸易的政策。农民们终于可以拥有先前在封建约定安排下持有的土地，各种苛捐杂税也一应取消。政府同时着手补偿失去劳动力的地主，它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估算地主20年内因失去劳动力蒙受的经济损失，以此进行补偿。在匈牙利之外，国家将地主流失的农民劳动力价值折算为原本免费劳动力价值的1/3，捐税的价值也参考了当时货物在本地税单上的价值。然后，政府把这笔补偿的价值下压了1/3，宣布地方领主将不再负责司法和行政职能的开销，这些方面的花费改由国家承担。于是，在匈牙利之外，补偿金额总计达到2.9亿盾。而在匈牙利，政府按照农民占有土地的1/3地价进行补偿，其金额差不多是3.04亿盾。在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政府支付了所有的赔偿金，而在奥地利其他地区，农民和政府需要共同承担这笔钱。这就意味着信贷将在乡村中得到惊人的发展。仅在波希米亚一地，农民就需要支付补偿总额中的5 600万弗罗林；在构成如今奥地利领土的区域内，这一数额是4 150万弗罗林。为了偿还他们支付补偿金额借下的贷款，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现金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至于政府方面，它以发放40年期附息债券的方式向地主支付补偿金。(注)

在加利西亚，封建生产关系严密地控制了当地人口，而所谓的解放行动也并未使农民和领主之间尖锐的关系有所缓和。解放农民的行动还催生了传统上农民们使用的公共地的冲突，在1848年之前，它已经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地方叛乱，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地主们越来越坚持自己拥有那些传统上农民视为公共地的土地全部产权，而这些土地是农民用来蓄养牲畜、搜集木柴，以及在冬季搜寻生活资源的土地。在失去农民的劳役之后，不少地主主张自己拥有这些土地，就可借口给村子一小部分原公共地的使用权，以迫使农民为他们有偿工作这样一来，农民们就陷入了新型的劳役关系之中。

1853年，一部法律允许地主从村子或农民个人手中收买公共地。这些交易可以通过金钱实现，地主也可以分配给农民村社一小块过去的公共地或森林，作为取走剩下部分的补偿，后者是更为普遍的交易方式。1855年，政府成立了一个裁定类似个案的委员会，而直到1895年，它

才完成在加利西亚的全部工作。这个委员会通常会分配给农民至少一小部分存在争议的土地（一般是8%），作为农民放弃对这块土地传统使用权的补偿。[注]但是绝大多数加利西亚农民拒绝放弃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牧场和森林，许多人仍然非法地使用这些土地。于是，军队和警察就不可避免地站在地主们这一边插手事态发展，不过这看起来至少没有损害哈布斯堡王朝在加利西亚农民心目中的声望。[注]农民们往往派代表前往维也纳觐见皇帝，以此来争取他们所期望的政策。上述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显示出一点，农民解放和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能消除农民对地主的疑虑，他们怀疑地主可能正在谋划恢复其封建特权，[注]在1867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疑虑塑造了加利西亚农民的政治能动性，并导致了早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出现。

与加利西亚相比，波希米亚的改革促进了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惠及更多小康农民。废除劳役后，农民有更多时间扩大作物种植面积，此外，谷物价格在1850—1870年这段时间内显著上涨，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可以在10年之内还清补偿给地主的款项。虽然1849年的公共投票法倾向于拥有大量财产的公民，这些农民还是得到了管理一些村社财产，例如公共地的权力。他们通常利用这些权力将管理的财产私人化，比如把土地倒卖到自己手里。较为贫穷的波希米亚农民渐渐脱离土地而投身工厂，他们既无力支付必要的花销，也不能和较为富裕的农民竞争。世袭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被废除，同样意味着传统的非正式福利救济政策——这些政策从向农民提供种子到荒年的社会支持，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也成为过去式。同时波希米亚的贵族大地主或许失去了他们独有的集体身份，以及对地方社区的统治权，但波希米亚的情况和加利西亚不同，在新体系下，经济成功的基础已经奠定完毕。[注]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在革命之后，波希米亚的贵族找到了很多途径，可以把自己的行为与资产阶级产权原则和利益最大化概念结合起来（它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重建他们早期的政治影响力。”[注]

帝国充满才干（虽然有些狡诈善变）的财政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Karl Ludwig von Bruck，1798—1860）还设计了一些经济政策，用来更高效地整合帝国内的各个市场。布鲁克创设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并且减少了关税，来促进奥地利与邻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过去，关税壁垒曾经长期将匈牙利和帝国的其他区域分离开来，虽然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曾希望把整个帝国改造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域，但这两

位君主和他们的后继者还是留下了关税这个障碍，作为匈牙利贵族免于直接征税的补偿。由于关税政策并不在贵族主导的匈牙利议会控制范围之内，它就能帮助维也纳方面从匈牙利得到必要的收入。不过在1849年帝国镇压了匈牙利人的起义之后，奥地利政府取消了匈牙利贵族的免税待遇，强制推行了收入税。1851年，帝国政府正式废除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税壁垒，这也使得政府可颁布若干降低或取消关税的政策，对外贸易更自由化。1853年，经过谈判，奥地利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员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这些举动表现出布鲁克让奥地利的工业投入欧洲竞争的意愿，这是他那些不太激进的前辈，以及许多奥地利实业家所害怕的。[注]然而这些政策，和施瓦岑贝格首相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不谋而合，后者试图让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范围内挑战普鲁士的经济影响力，成为领导德意志的大国。

至于19世纪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应该还是关于飞速扩张的奥地利铁路，以及创造出用来资助这些大规模事业的制度手段的那一些。截至1845年，奥地利政府拥有和管理着全国70%的铁路。[注]帝国已经充分意识到，铁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从不支持新铁路建设的陆军元帅拉德茨基，在1848—1849年的北意大利战争中体验到了铁路的高效性，而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40年代，军事上的考虑在铁路政策中所起到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在新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帝国的商务部充满雄心地筹划出一张未来的铁路网，并提议投入惊人的巨额资金。不过鉴于年度预算和考虑，以及一些更紧迫的优先事项，例如更新现有的车站和铁轨等，使政府不得不一再推迟新建设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选择中立的奥地利政府忙于耗资巨大的动员行动，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因此抱怨现有的铁路系统无法满足军队的期望。于是经济危机加上人们认为现有的铁路已经不足以使用的认知，促使帝国政府不情愿地决定将铁路系统私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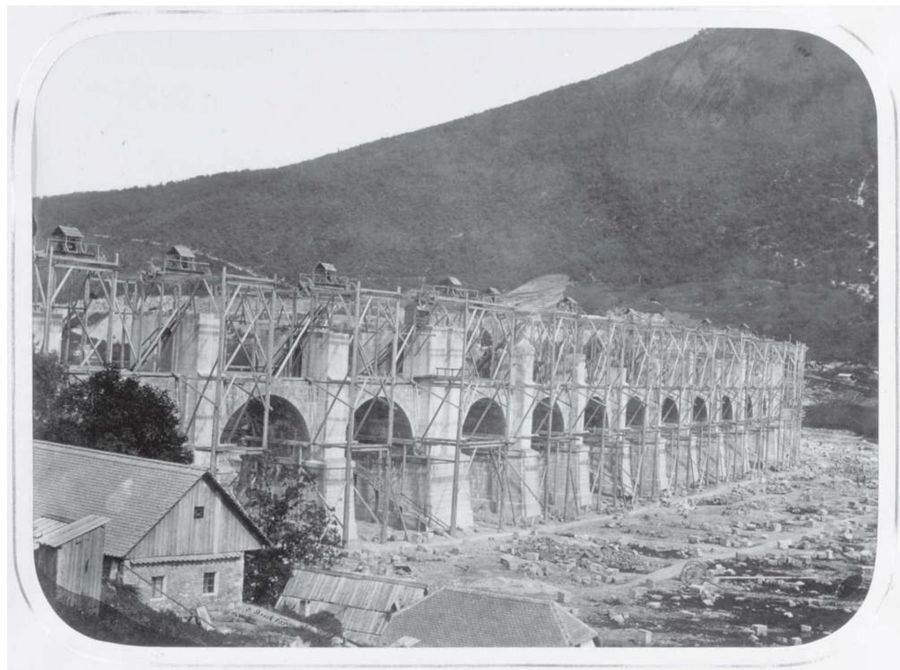
随着新的铁路特许法于1854年公布，奥地利开始把铁路线卖给私人公司，并给予这些公司的股东们诱人的保证回报率。以新的奥地利皇家帝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股东为例，他们每年最少可以从投资中获得5.2%的利息回报，而且在投资建设奥地利到匈牙利东部的铁路线时，投资人还能获得大量的税收补贴。[注]鉴于这些优惠措施，到了1859年，帝国差不多卖掉了所有的铁路股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购买了现有铁路线的公司从优惠措施中得利，从而取得了建设新铁路的特许权。

19世纪60年代，连接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的南方铁路向北扩展至蒂罗尔，又向东进入匈牙利地界。1854年，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利用德意志和奥地利的资本，建造了从维也纳到林兹、萨尔茨堡、帕绍和慕尼黑的伊丽莎白皇后西部铁路。仅在19世纪50年代这10年间，帝国的铁路里程就增加了近2 000英里。

如果没有同时期奥地利银行系统的全面改革，帝国铁路的扩张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信贷动员。自1816年奥地利国家银行成立以来，帝国就垄断银行资源为自身的借贷需要服务，因此银行除了服务极少数富裕私人客户的需要以外，很难满足其他国民的信贷需求。在这段时期，一些国际银行家家族（比如罗斯柴尔德、西纳，以及安尔斯坦–埃斯克勒斯）为奥地利大众提供信贷服务。不过到了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财政大臣提议用创立新银行的方式解决帝国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更多银行，就可以向私人借贷者提供更多贷款。人们相信，这些新的金融机构可以在资助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起到主导作用（法国的动产信贷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注] 1855年，政府同意建立独立的工商联合信贷银行，这家银行由一个财团法人进行运作，其成员包括了若干富有的贵族，以及安塞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由于联合信贷银行是合资股份公司，它的1亿盾资本轻松超过国家银行控股的1/3，而它的规模也使得联合信贷银行可以发起大规模的发展计划。联合信贷银行的成立，或许对一般奥地利大众来说意义有限，但仅在20年内，它就已经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奥地利的铁路基建方面，铁路将过去闭塞孤立的各州地方经济体联系起来，而联合信贷银行在铁路的飞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铁路，人们可以把易腐坏的商品送到更远的地方，铁路创造的新商机是之前无法想象的。与此同时，银行发起的大规模项目的兴起，催生出更多由越来越多的小投资者参与的合资公司，在1867—1873年，即奥地利所谓的经济扩张时期，这个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

1850年3月，商务大臣布鲁克建立了地区商会，旨在促进大众对地区经济利益问题的讨论。[注]这56个商会（其中包括一个面向各州首府城市的商会）定期向商务大臣提交报告，汇报本地经济状况，谈论地区交通，进行政策评估，以及对未来政策提出建议。商会同时还担任公司之间，或者劳资双方争议的调停人。商会的成员经选举而生，他们是具备至少5年拥有或经营一项生意的经验，并且年纪在30岁及以上的奥地利公民，而且还是商会所服务地区的合法居民。当选之后，这些人将拥

有一个长达3年（之后变为4年）的无薪任期。商会所在地区任意一位独立的企业主或经理人都有权在商会选举中投票。注自从1850年仅举办了一次的市议会公投选举之后，这些商会成为19世纪50年代唯一一批定期举办选举的国家机构。此外，在1861年立宪主义再度复苏之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商会得到了向州议会、帝国国会和一些市议会选送代表的权利。因此在同年，当一个更自由主义的国会体系取代了官僚专制政体时，商会作为咨询机构，组成了官方的利益集团。由于具有重要的合法地位，商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团体投票的权利。



纪念1857年从卢比安纳到的里雅斯特南方铁路落成的照片，它来自一本相簿，摄制者为Johann Bosch。照片中展示出距离卢比安纳西南12英里处博罗夫尼察（Franzdorf / Borovnica）地区一座高架桥的建设情况，这座高架桥在1856年落成，耗资200万盾（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笼络民心的王朝

就在政府内的专家建立新制度时，哈布斯堡王朝也在寻求新的方法，提升在近来越发难以管制的民众中的声望。1849年，只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的反叛者在实际上完全断绝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许多奥地利人，特别是农民，仍然忠于皇室，或者尝试让哈布斯堡王朝为他们的帝国愿景服务。早在1850年，新即位的皇帝就命令采取一系列改革

与人事变动，令宫廷和它的各种公开仪式重新焕发生机。之后在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朝廷进行了有意识的复兴、重组，并创建出一系列公共仪式，意在更积极地调动大众拥护帝国的情绪。作为新公关活动的一部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御驾出巡游历全国，其范围要比自约瑟夫二世以来的任何一位君主踏足过的国土都大。19世纪50年代，皇帝对加利西亚、布科维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伦巴第、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和蒂罗尔进行了所谓的考察旅行，并且两度造访匈牙利。[注]

尽管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执政初期，不久前举起叛旗的匈牙利、加利西亚与伦巴第精英对他十分冷淡，1851年，地方官员却报告了加利西亚农民对皇帝来访表现出的热情。当时通往加利西亚的铁路线还未竣工，皇帝和他的随从们只能乘坐马车由西向东缓慢穿越这一地区。这就给了沿途各地的农民近距离一睹皇帝风采的机会。在每一个村镇，欢迎皇帝车驾的居民摩肩接踵，他们蜂拥而上，递交呈给皇帝的请愿书。据巴赫的密探报告，皇帝来访“引发了当地人极大的满足”，加利西亚地方官员也注意到，皇帝“受到农夫们兴高采烈的欢迎”。[注]

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乌诺斯基（Daniel Unowsky）所告诉我们的，皇帝的加利西亚之行表现出帝国朝廷在处理地方贵族、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宗教和民族主义主张等方面产生的冲突时，是如何小心谨慎地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加利西亚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涉及视察军事设施。不过他偶尔也访问一些对波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神话意义的旅游名胜，例如位于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中历代波兰国王的陵墓。但与此同时，在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皇帝为一座鲁塞尼亚（乌克兰）的民族学校奠基，这一行动明确挑战了当地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主导地位，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狂喜不已。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通常是东仪天主教徒或希腊礼天主教徒）有一个绰号——东边的蒂罗尔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们在1848年毋庸置疑地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和他们在加利西亚掀起叛乱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同胞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些人被允许向皇帝呈献请愿书，要求他把加利西亚按照波兰和鲁塞尼亚两个民族一分为二。[注]

皇帝的加利西亚访问之旅，还表明了另一些因为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有意重塑君主政体的象征意义所导致的潜在矛盾。其中有一项就是帝国和罗马教廷之间达成的协议，延续了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罗马天主教会守护者的传统象征性角色。就在与罗马方面就协议进行谈判时，弗兰茨·约

瑟夫一世还复兴或创造了一些特定的天主教公开仪式，譬如在每年一度的基督圣体节游行中，用皇帝公开为10个乞丐洗脚的表现，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这些仪式，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塑造成一个帝国天主教徒们可以效仿的虔诚榜样。不过与此同时，帝国要求它的子民们把皇帝看作“所有人的皇帝”，因此这个国家统治者也将成为所有合法宗教信仰的保护人。从1851年加利西亚的视察开始，皇帝的足迹逐渐遍及整个帝国，旅行途中，他在拜访一些常规的罗马天主教礼拜场所的同时，也到访了犹太教、希腊礼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场所。等到时间进入20世纪，这位皇帝甚至还成为波黑穆斯林信仰的保护者，从他家族的历史来看，这实在颇具讽刺意义。这些天主教之外的宗教信徒们逐渐把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称为他们的保护者，并且向他游说，谋求皇帝以个人身份提供的赞助。在此举一个加利西亚的例子，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社区为皇帝的造访建造了一座表达敬意的凯旋门，上面写着“心怀感激的以色列人向皇帝致意”。当皇帝经过时，人群中的拉比们高举教典，全加利西亚城镇村落中的犹太人高声喧哗着欢迎他。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这位皇帝的统治可以给他们带来完全的解放。尽管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把犹太人在法律层面上的完全解放推迟了近20年（事实上完全改变了1848年革命的成果），他在犹太人社区内得到的声望最终还是发展成一个神话。随着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甚至奥地利的新教徒都将这位让天主教势力在奥地利复兴的皇帝看作自己宗教的特别保护者，哈布斯堡王朝保护少数宗教群体的承诺，在这里自下而上地得到了巩固。[注]

1853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还通过自己的婚姻改善了哈布斯堡王朝业已败坏的声望。皇帝的年轻妻子是他的表亲——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1837—1898），这桩婚姻创造了无数歌颂哈布斯堡王朝的机会。围绕着这位新皇室成员——之后以“茜茜”的名字为人所知的16岁皇后，人们创造出许多广受欢迎的传说故事。暂且将伊丽莎白与维也纳宫廷之间困扰她一生的矛盾放在一边，这位皇后偶尔也有力地帮助哈布斯堡朝廷，让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与大众更贴近。对很多匈牙利爱国者来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手上沾满了民族烈士的鲜血，但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不同，她很快就在匈牙利多地获得了广泛的欢迎。这或许部分是因为她学习匈牙利语，并且坚持聘用匈牙利贵族作为随从的表率行为，以及1867年，她站在匈牙利民族事业的立场上，以个人身份向丈夫求情的缘故。在她之后的人生中，伊丽莎白在匈牙利一直颇具魅力，同时也是匈牙利民族主义情感的投射。到了1894年，甚至有传言宣称她曾秘密在不久前下葬的路易斯·科苏特坟墓上敬献了一个月桂花环。[注]

1857年5月，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带着伊丽莎白首次访问匈牙利。当皇帝夫妇一走下停泊在布达的蒸汽轮船，伊丽莎白就立刻引起了轰动。当时的观察者们注意到，皇后将匈牙利的民族色彩（红、白、绿）作为其服饰的重点。在皇帝夫妇访问期间，这些观察家反复提及年轻皇后在其时尚选择上的亲匈牙利象征意义。[注]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旅行途中，皇帝与皇后年幼的女儿索菲公主死于麻疹。作为19世纪50年代复兴的天主教仪式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公主的葬礼后，皇帝夫妇公开前往施蒂利亚，到圣母圣殿所在的玛利亚采尔（Mariazell）朝圣。3万匈牙利人表达了他们对这对夫妇的同情，或者他们对伊丽莎白的欣赏，于是他们同样启程前往玛利亚采尔。显然，这次皇室访问及其后续至少成功地缓和了匈牙利大众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反感。[注]



马背上的奥地利帝国皇后伊丽莎白，骑马是她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原画作者为John Charlton，随后这幅画在1882年被Thomas Lewis Atkinson制成雕版画（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哈布斯堡朝廷通过在遍布全帝国的报纸网络上报告皇室情况的手段，影响皇帝及其家族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些报纸反过来也热衷于披露

皇室生活的所有细节供大众消费。在19世纪60年代，严厉的政府审查制度走向终结之际，这种现象却不一定有所改变。哈布斯堡宫廷仍继续严密控制着皇室家族的形象，甚至偶尔还修改官方照片，塑造出一种田园诗一般欢乐幸福的家庭氛围，皇室家庭亦始终是大众感兴趣的对象。出于这个原因，各种天主教、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报纸，都开始报道皇室家族的情况，因此他们至少间接地参与了促进皇室声望和大众性的事业之中。注



1860年的皇室家庭。宫廷摄影师路德维希·安格雷尔（Ludwig Angerer）认为这可能是唯一一张伊丽莎白皇后（前排左）与她的丈夫、孩子共同拍摄的照片。一般情况下，皇帝夫妇会单独分别前往摄影师的摄影棚。这张照片中还有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父母和兄弟（Adoc-photos / Art Resource, NY）

将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可见化

1857年，曾经参与1848年革命的报纸总编恩斯特·冯·施瓦泽（Ernst von Schwarzer，1808—1860）发表了一篇致当时奥地利专制政体的颂歌，题为“新奥地利的财产与财富”（*Geldund Gut in Neuösterreich*）。在这篇作品中，施瓦泽不但颂扬了皇室家庭的诸多美德，还歌颂了在新专制体系下帝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显著发展。注他通过对土地、人口和生产力水平的数据研究，赞颂了帝国在地理、文化以及经济方面的诸多建树，并将这些帝国新取得的进展置于19世纪中叶欧洲普遍的发展背景下。施瓦泽的报告大力鼓吹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奥地利的帝国主义目标所带来的益处。他坚称，正因为奥地利人“在其特性、习俗和需

求上的多重性”，令他们不同于其他的欧洲人。此外，施瓦泽还大力强调奥地利帝国这样一个强势的集权国家，在7年之内给予奥地利人民的正面效应。不过虽然奥地利人民在法律上一概平等，他们在文化层面上却并非如此。施瓦泽主张，只有一个像奥地利这样统一的政权，才可以帮助“奥地利东部的民众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跨越漫长的发展期。至于匈牙利的发展案例，还要归功于铁路的引进”。施瓦泽还称：“如今人们可以在帝国的每个角落找到商人、船运代理、制造商以及商贸巨子。而哪怕是在最偏远的角落，都有投机生意见缝插针，占据隐匿的矿藏财富，然后将它们转向全球市场。”

这位曾经的革命者被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他坚称帝国渐进式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福泽奥地利，并且从中总结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教训。在政治方面，由于统一的国家改革计划，所有的奥地利人都在这个时期享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福利。1848年的革命没能为奥地利人带来进步和幸福，因此在策略上遭到了失败。而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其他手段，也可以创造出同样的进步，以及带来同样的幸福结局。“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和乌托邦幻想家一度尝试用政治和社会革命达成的真正目标，如今在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法律和经济改革变成了现实。”施瓦泽认为，与任意数量的政治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国家能动性可以实现更多1848年革命设下的改革目标。

施瓦泽的论点不但与帝国文明教化的使命有关，也与帝国的经济利益相关。革命的惨痛教训让许多帝国的理论家了解到一点，就是帝国子民在意料之中的多元化和多样性，部分是由于1848年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是源于在彼此迥异的各个地区终结封建制度的复杂性。像施瓦泽这样的作者不仅简单地从奥地利人的语言多元化角度来理解国民的多样性，而且还相信各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塑造了奥地利截然不同的民族。施瓦泽主要将这些差异解读为现代化的相对水平，转而又将它们塑造为文明的不同水平。这是一种广义上对塑造了帝国各民族特点的不同文明水平的发现，也是一种长期成为帝国政策思想基础的发现。以加利西亚为例，在19世纪中叶，当地仍继续约瑟夫二世风格的激进官僚主义集权制，一个重要的正当理由就是这一发现。此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播，施瓦泽告诉我们：“东方的特殊情况正在匈牙利走向终结。”

关于上述观点，施瓦泽以及同类的作者们走过了一条颇具挑战性的

道路。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帝国内的合法地位，逐渐依赖于他们用来描绘帝国各民族特性的各种相异性描述。确实，在许多欧洲观察家眼中，正是民族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奥地利成为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再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国民像他们一样，分别属于文明的各个层面，属于欧洲主要的四大种族：罗马人、日耳曼人、芬兰人、斯拉夫人”[注]。当然，当时的旅行者如果来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英国的乡村，观察当地的文明水平，以及他们遇到的偏离正轨和惯例的所谓野蛮人拥有的语言实践活动时，也会做出类似的结论。仅在法国一地，根据尤金·韦伯（Eugen Weber）的经典研究，在1863年，至少有1/4的人不说法语，更多人只是粗通皮毛。[注]不过尽管如此，19世纪的观察家们仍然越来越倾向于将国民之间存在高度语言差异的奥地利看作欧洲的一个异数。

但另一方面，当以施瓦泽为代表的作者们转而讨论奥地利的地理、贸易路线和气候等特点时，这些人之前强调的种族与文明差异就使他们更难维护这个帝国的有机凝聚力。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把消除差异当作它要达成的一项结构性目标，这就使得达成这一目标的新方式产生了更多问题。在约瑟夫二世的时代，国家建构的挑战是统一一度彼此独立或独立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区中“不同的法律条款与制度实践”。现如今，哈布斯堡王朝逐渐被看作一个“不同种族的人民”的集合，而这些人据说也处在不同的“文明水平”上（例如种族层面上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如今存在的帝国，再也不是一个由不同国家以及它们的不同制度（如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组成的集合体。事实上，就像我们将在之后的第六章中所读到的，在这个时期，很多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主张各民族来源于种族或语言差异的独特制度差异。

在19世纪中叶，施瓦泽提到的不同文明水平同样也和奥地利与欧洲其他帝国产生的比较联系在一起。1853年，在奥地利科学院成立五周年举办的一场演讲中，奥斯曼帝国学者兼东方学家约瑟夫·哈默–普尔格施塔尔（Joseph Hammer-Purgstall）赞扬了奥地利的法律制度，他积极地将它与英国以及沙俄的体制进行对比，称后两者为“压迫性”的制度。哈默–普尔格施塔尔认为，英国与沙俄这两个帝国是通过暴力征服建立起它们的基业的。而作为对比，奥地利则是通过一系列和平友好的协议和皇室联姻获得的帝国。协议和联姻或许可以将不同的地区纳入由一个王朝统治的帝国范围之内，不过哈默–普尔格施塔尔的观点更多地关注因国家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法律制度。在奥地利一律将国人看作平等公民

的同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对它考虑其人民语言多样性的方式特别感兴趣。他宣称，以北亚和南亚为例，沙俄和英国的殖民者们强迫当地人放弃他们的语言，转而使用新统治者使用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多语言主义却是这个国家促进统一的一种独特方式，它在所有国民中不存在从属性质，或是等级区别。由于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坚定地相信全球化，或者说欧洲化将很快要求所有欧洲人面对增强的多语主义，因而奥地利的这一政策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奥地利将远远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注]

在进行奥地利、沙俄和英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对比，以及赞颂奥地利的多语主义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从未质疑过德语在奥地利跨地域的公务系统和军队中地位超然的情况。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理性效用，而不是一种刻意要让一个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政策。而且，即便奥地利的公务员要求通晓德语，哈默–普尔格施塔尔仍然相信他们需要学习所供职地区的语言。同理，在德语成为军队指挥语言时，所有的军官也必须学习他的新兵们所使用的地区性语言，以便于更有效地服役，并得到擢升。在把多语种实践的理念和一种新兴的身份认同模式结合起来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声称："一个人学习越多这个君主国内通行的语言，他就越像一个真正的奥地利人。"

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关于奥地利多语主义的论证同样还构成了一种帝国式的爱国主义论点。尽管他们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奥地利人却共同拥有对"祖国"的爱，这种热情不禁让人联想到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提出的那种（非文化层面的）理性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之情扎根于帝国公民身份的统一模式。哈默–普尔格施塔尔说："在奥地利，公民权的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在他对大英帝国进行最后一次攻击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补充道："在奥地利的法律面前，人们没有婆罗门与贱民之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奥地利各民族使用不同语言，这些语言之间有拥有平等关系这一点更能抓住奥地利的独特本质了。语言使用的平等性象征着一种人民的团结，它扎根在公民基本可互换性之中。[注]

这段时期，帝国另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是卡尔·冯·佐尼格（Karl von Czörnig，1804—1889），他是一位公务员、统计学家、早期的人种学学者，并且曾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佐尼格积极促进多瑙河船运以及奥地利铁路的扩张发展。1848—1849年，他作

为一名代表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就德意志政治共同体的问题进行谈判。19世纪50年代，佐尼格在各种职位上，为商务部管理着行政统计办公室。在任上，佐尼格承担起了两项艰巨的研究任务，它们有力地影响了大众对一个新的、统一的奥地利帝国的理解。其中一项是在1855—1857年面世的三卷本《奥地利君主国民族志》（*Ethnographie der ö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它事无巨细地从语言和宗教角度描述了生活在帝国各州的居民情况。另一项研究是1858年面世的《奥地利的新体制》（*Österreichs Neugestaltung*），这是一份关于奥地利自1848年以来改革转型的数据调查，其内容类似于施瓦泽的成果。这两种著作旨在维护帝国的新目标及其存在的理由，并且都强调了帝国国民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

《奥地利的新体制》以一个悖论开篇：作为欧洲最古老的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正在统治一个理论上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之一。数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聚敛土地，开疆拓土，而这些领地各自有着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民族。通过18世纪早期的《国本诏书》，查理六世规定了这些领土的不可分割性，但佐尼格认为这部法律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奥地利国家，直到1804年奥地利帝国出现才正式宣告成立，而直到19世纪50年代，一个真正统一的奥地利才完全成型，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克罗梅日什的宪法草案和1849年强行推行的宪法，都不适用于匈牙利。

佐尼格的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比施瓦泽更为复杂的论点，来阐述奥地利各民族的相对特质，以及他们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得到的文化效益。佐尼格没有像施瓦泽那样，设想出一个天生落后的、需要西方进行文明开化的东方。他指明纯粹的地区政治关系使得一个群体（如波兰人）会设法阻止另一群体（如鲁塞尼亚人）得到充分发展，而这种情况需要帝国体制的介入，并保证这些群体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佐尼格将帝国的特点落在它拥有的众多自然、文化以及社会的多样性表现上，这并不令人惊讶。从气候到农业，从工业到语言运用，奥地利因为它显著的多元性而独树一帜。佐尼格对设想整个帝国最大的贡献（无论是否有意），就是他伴随艰辛的奥地利人种学研究制作出来，通过在地理上表现各个语言与种族群体的彩色地图。这些地图并不着重于奥地利各州（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匈牙利、加利西亚等）历史上的边界，而是根据某地使用的特定语言或者信仰的宗教进行绘制。佐尼格

的研究覆盖了帝国的所有州，在事实上表现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情况和过去移民迁徙和人口再安置的历史进程有很大的关系。根据他的观点，没有一个孤立的语言群体可以在某个州提出排他性主张。而且他的语言地图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事实，任何通过语言边界在地理上分开奥地利不同民族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通过他的研究成果，佐尼格帮助形成了一种体现在早期奥地利人种学上的反民族主义方法，这和西欧，特别是德意志更民族主义化的相应对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于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关系，佐尼格认为总的说来，帝国国内主要的民族群体彼此“从数量和内在力量，以及不同的文明水平上”达成了一种平衡。更重要的是，关于帝国本身，佐尼格和哈默–普尔格施塔尔注意到相似的内容，他发现“在它们（奥地利许多民族）的团结，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它们构成了国家的基础”。然而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读到的，到了19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者们将开始使用这样的语言地图，来支持一个与佐尼格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在帝国内部出现以民族为基础，彼此分离的领地的可能性。

19世纪50年代的帝国与人民

大众对奥地利新政体的反应，事实上要比佐尼格、施瓦泽或哈默–普尔格施塔尔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上设想的更加复杂和实际。以加利西亚的农民为例，与地方士绅关于劳役制度的传统斗争很快就被公共地使用权方面已经白热化的冲突取代。在这些冲突中，加利西亚农民一直将帝国官员看作仲裁者，但他们没有全盘接受这些人。农民们并不单纯地相信皇帝的权威，而是用请愿，甚至有时诉诸暴力行动的方式主动谋求对他们有利的结果。从事大型或小规模制造业与贸易的奥地利人，纷纷欢迎1849年之后逐渐恢复稳定的形势，以及革命时期通货膨胀的结束。军队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起义之后不到一年，许多企业主就公开赞同布拉格纺织品商人海因里希·富格纳［Heinrich Fügner，之后改名为金德里奇（Jindřich）·富格纳］对新政体的评论：“从事任何实业的人都感到满意。”巴赫与布鲁克都希望用惠及全奥地利人民的经济发展的承诺，消除他们集权化计划中，由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上的激进主义引起的双重危险。1851年12月，巴赫满怀自信地向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汇报“人民大众”对政治事务普遍缺乏兴趣，因为“他们更倾向于为改

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而忙碌”。[注] 1850年，维也纳的一份报纸这样报道：

> 物质利益被证明是一种可以将不同州的民族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强大力量……国族特性是值得注意的，但它不是大众民生福祉的主导因素……在最糟的情况下，民众会代替政府来控制民族主义者，在加利西亚发生的那些事，也可能在波希米亚发生。人们需要改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需要和平。[注]

同样，1846年叛乱期间曾担任利沃夫警察总长，如今驻扎在布拉格的利奥波德·冯·萨赫·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在1852年观察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渴望和平。”[注]就在一年前，一位皮尔森（Pilsen / Plzeň）当地官员向波希米亚总督汇报许多官员都希望知道的情况：

> 至少根据我所听到的，目前为止人们看上去并不为失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而苦恼。特别是有产阶层，他们认为帝国权力的成功复兴会在思想上改善这个国家的状况，同时增加他们的个人财富。[注]

许多未经历流放或牢狱之灾（或是曾经经历过如今已经恢复自由）的前革命者，在19世纪50年代都致力于赚取金钱，他们加入不断发展的经济部门（比如铁路）时，暂时搁置了他们的政治信仰。[注]比如布拉格法学教授利奥波德·冯·汉泽尔（Leopold von Hasner），他在19世纪50年代这样写道：“我已经完全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像他一样，许多前革命者宣称放弃了他们的公共活动。[注]中产阶层的活动家们则清楚地意识到，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将给他们所在的群体带来极大的潜在增长。他们通常用“进步”和“现代化”这些被佐尼格和施瓦泽这类帝国的理论家鼓吹的自由主义术语，来描述通信、交通或贸易方面的发展特点。其中一些人游说政府在他们所在地区增加新的铁路线时，就模仿了政府关于帝国统一和中欧领导权的论调。比如因斯布鲁克的副市长就力争连接蒂罗尔首府和慕尼黑的铁路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他宣称“（如果）奥地利希望确立国家的统一和君主国的力量，一条位于蒂罗尔境内的铁路将是强化国家统一最重要的物质手段”[注]。地方上的自由主义报纸也明确地赋予这条铁路“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统一大德

意志之手段”的特性。[注]

当然，不是所有的前革命者（哪怕是他们之中的温和派）都能如此轻易地接受政治上的变化。身为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布拉格商人理查德·多曹尔（Richard Dotzauer）日后回想这段时间时这样说：“废除宪法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大病一场，不能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冷漠地对待这项重要事件。”[注]至于其他因为在1848年自己所参与的活动，而被迫流亡或者被禁止从事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人，回想起自己的遭遇，满心苦涩，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因此失去建立一个立宪奥地利的热情。摩拉维亚法学生卡尔·格斯科拉（Carl Giskra）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在奥地利维也纳求学，还旁观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依靠前同事给他的零星文书工作勉强度日。[注]而许多像汉泽尔这样的人，在1848年之后没有承受什么革命带来的后果，并且爽快地放弃政治活动来取得职业生涯的提升，而当形势在1861年变得安全之后，他们又迅速见风使舵，再度加入自由立宪主义。

19世纪50年代末，一小部分中产阶层的自由主义者共享了施瓦泽或佐尼格对奥地利当下政体表达出来的无限热情。他们或许会欣赏这个政体自圆其说的一些要点，这些人在物质上受益于经济发展，而重新焕发生机的官僚体系也主要从他们这个阶层招募雇员。不过随着这10年渐渐过去，政府废除他们政治权利的行为，以及往往十分严苛的媒体审查制度开始令这些人心怀不满。事实上，他们在经济方面取得越多成功，他们就越相信经济上的成功可以使他们在制定公共政策上拥有话语权的权利正当化。许多人或许会开始赞同之前革命时期阿道夫·菲施霍夫的观点，即这个国家建立在一支常备军的士兵、一群卑躬屈膝的崇拜者和一群伺机而动的告密者的支持上。[注]

前自由主义者们同样欢迎商会的出现、行会的终结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到了1860年，他们并不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抱以信任。同时不同派系的保守者各有抵制帝国专制政权的理由，只有少数保守的社会政策，譬如与罗马教廷的协议除外。地方贵族和绅士憎恨帝国坚定的中央集权主义，它使他们不能在地方政策甚至地方社会关系上施加惯有的影响力。而在匈牙利，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持续广泛扩散，匈牙利人的反对情绪主要建立在帝国否认匈牙利的国家地位，以及它对所谓的匈牙利叛乱分子实施的报复上。帝国政府对匈牙利的彻底重构，以及它严厉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政策导致了意外的后果，即便是匈牙利的保守

贵族，也和地方绅士、城市自由主义者一道，在表现为1848年4月法律的自由民族主义计划之下联合起来。

地方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在1850年第一次市镇议会选举中显露端倪，这比政府撤销1849年3月推行于全国的宪法还要早得多。这部所谓的“强加宪法”（Oktroyierte Verfassung）和克罗梅日什的宪法草案类似，认为人们在地方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是所有负责任的政治参与行为，以及有成果的公民行动的重要基础。[注]不过在许多地方社区，首次选举的情况对奥地利政府和官员来说并不如意。比如在1848年革命期间，许多区选举当地的公务员，作为出席市议会、州级议会和奥地利国会的代表。可到了1850年的选举，有产阶层的选民们断然拒绝让政府官员代表公众意愿的提议。以相对保守的因斯布鲁克为例，一份当地的自由主义报纸高兴地表示，如果不是选举规定给予官员们巨大的优势，城市中拥有投票权的三级选民，不会在1850年选举中选出任何国家公务员，而这场选举的选民参与度非常高，它吸引到了差不多75%—100%的选民！[注]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选举结果预示着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的重大转变将变得更加清晰明确。工匠、制造业者以及在经济上属于中产阶层的其他成员再也不把他们的政治命运寄托在受过法律教育的国家官员身上，而是选择另一类具有法律教育素养的白领专业人士——律师。托马斯·戈茨（Thomas Götz）声称：“律师与他人不同，是典型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国家赋予新建立的公民基层政权新的法律职能，而律师的法律素养与辩才，令这种专业人员在这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用途。”[注]虽然官员和律师之间有不少共同点，特别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教育背景，他们各自的职业与公众产生的联系却不相同。1850年，因斯布鲁克的选举对律师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取代了同样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政府官员，成为中产阶层承认的政治发言人。等到19世纪60年代宪政生活得到恢复，律师成为从城镇议会到帝国国会各个层面的民选机构的中坚力量。

帝国政权此时不但受到大众的反对，它本身也常常推翻自己的政治计划。它保留了市议会的选举，却在19世纪50年代无限期拖延新选举的举办。而同时，通过建立为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服务的地方商会，政府将选举和大众政治参与的议题持续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中。就这样，奥地利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途径来

表达对政治上专制主义的不满。在50年代的这10年间，不依附于宗教团体或慈善活动的志愿者社团不断涌现。奥地利人聚集在各类非正式的产业协会、步枪俱乐部、歌咏团体以及体育协会，讨论和谴责公共政策。

1859年，许多奥地利人还通过参与地方组织的诗人兼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向专制政体表达公众的不满。在布拉格，这类纪念活动让过去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政治的倡导者聚集在一起，他们纪念的这位诗人，其作品对欧洲知识分子来说象征着自由和解放，胜过其他任何文章与诗篇。作家弗利兹·毛特纳（Fritz Mauthner）回忆布拉格的纪念活动时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并不知道……这活动来自一种渴求自由的政治情绪，他或许会猜测它是一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参与的活动。”10月，在布达佩斯，纪念一位坚持使用和改革匈牙利语的作家费伦茨·卡钦斯基（Ferenc Kacinzcy，1759—1831）的百年诞辰活动，最终演变为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公共示威游行。[注]这些纪念活动结束之后，曾经效力于活动组委会的男男女女仍保持活跃，纷纷建立起以体育社团和学生俱乐部为代表的各种新社团。席勒诞辰年同时还加强了奥地利不同地区活动家之间的联系，通信和铁路网络又给予人们更多机会，参与日渐高涨的跨区域节庆文化。[注]

帝国的欧陆雄心

虽然公众活动日益高涨，但最终是帝国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措施导致了专制政权的垮台。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最初贯彻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的决定，来源于他挑战普鲁士在德意志诸国中逐渐凸显的经济霸权的希望。但奥地利国内引人注目的发展没能对它的国际地位做出同等的改善。拙劣的外交政策抵消了奥地利从经济发展政策中得到的政治之本，而这个事实最终赋予宪政支持者们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手段。

奥地利外交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主要源于1848年动荡期间国家对资金的渴求。当时奥地利发行纸币的决定打破了它的货币在国际上的稳定价值。1850—1867年，每一任奥地利财政大臣都致力于财政稳定，但因为基础设施项目和军队建设，帝国的预算支出始终居高不下。[注]与此同时，财政大臣们还试图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增加收入。举个可以解释这种双重经济目标的例子，政府在决定铁路私有化时，同时又决定

用过分有利的特许条件来促进铁路的扩张。此外，官员们创造财政稳定的长期努力因为1853年、1859年、1862年和1866年的数次军事动员而不断受挫。

从玛丽亚·特利莎对抗腓特烈大帝的时代起，以及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可耻的崩溃之后，普鲁士为了获得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越来越频繁地向奥地利发起挑战。19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鲁士通过组建德意志关税同盟逐步提升自己在中欧的影响力，这个联盟并不包括奥地利，而是渐渐吸纳了几乎所有的中等规模的德意志国家。1848年，许多奥地利制造商回避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这个想法，因为这需要他们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把自己的商品置于危险的竞争之下。然而近来的历史教训显示，如果奥地利希望在将来成功赢得与普鲁士的竞争，它就必须表现出可以与之匹敌的经济实力。

就在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竞争支撑起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时，其他更为紧迫的外交政策也在耗费帝国的财政预算。从东部到南部，曾在1849年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叛乱的沙俄，如今通过支持，或者说煽动巴尔干人叛乱，从正在削弱的奥斯曼帝国身上获利，有时它甚至亲自上阵掠夺领土。1853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中立的奥地利于战争期间发起了一场耗资巨大的动员，向沙俄清楚地表示它将置身事外，不参与巴尔干事务。但奥地利的行动激怒了沙皇，后者认为这是不知感恩甚至背叛的表示。同时在西方，撒丁王国（皮埃蒙特）正筹谋秘密向法国求援，以便像它曾经在1848年做过的那样，控制意大利半岛上更广阔的范围。1859年，奥地利与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军进行了一场阻止事态如此发展的必败之战。接着在1862年，为了帮助德意志联盟从丹麦的主张下保住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并且不让普鲁士在独自战胜丹麦之后获取公共关系上的利益，奥地利选择和普鲁士联手，动员它的部队与丹麦对抗。最终，在1866年，普鲁士通过一场闪电战向奥地利发起了直接挑战，断绝了奥地利在自己的保护下统一德意志的梦想。上述每一次战争动员，都将奥地利拉进削弱其货币并增加其债务的经济危机之中，到了1859年，奥地利政府在国内取得的成就已经完全被极大范围的货币与财政危机所抹杀。

“没有宪法，就没有金钱”

1859年的维拉弗兰卡（Villafranca）和议要求奥地利割让富庶的北意大利伦巴第省份给法国和皮埃蒙特，在这之后，受挫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认识到，如果要重新确认他的合法地位并重塑国家信用，他就需要向一些分权的安排妥协。如今他依然认为，表面上的改革足够延续帝国在人民中的声望，1860年，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小小的议会政府，不过权力仍然掌握在我的手里。"注然而事实证明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顾问们是多么不了解这个帝国。最开始，一切都只是在政府控制下"粉饰门面"的行为，但随后事态就如同滚雪球一般，无论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贵族乡绅还是资本主义企业家都插手其中，企图从官僚集权主义失败的制度余烬中抓住实现他们自己政治愿景的机会。

专制体制的总设计师——不受人欢迎的亚历山大·巴赫引咎辞职，皇帝也公开宣布撤销自己的专制计划。不过事到如今，谁会与皇帝分享权力？皇帝渴望从地方贵族和逐渐具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中产阶层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那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但这两个群体在19世纪50年代都因为自身缺乏政治影响力而愤怒不已。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小议会政府"在塑造替代50年代专制主义体系的新体制时，释放出这些社会群体（之后还有其他群体的加入）之间激烈的竞争。关于权力分享的竞争延续了8年，直到帝国在1866年再次输掉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为止，问题都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即便如此，我们也将看到，在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前，奥地利都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着割裂的状态，直到各方至少都默许了新的宪政体系为止。

1860年，地方上的贵族要求终止官僚中央集权体系，建立一个联邦制度，并且把控制地方事务和区域政治的权力交回他们手上。在种种要求中，贵族们特别提出要把立法权交给（用他们的话说是"返还"）地方上州一级的议会，这是他们期望能够主宰的权力。事实上地方贵族并没有反对一个奥地利中央国会概念的必要，他们只是想让它的职权限制在某些特定方面（比如帝国预算）。与此同时，资本家与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则呼吁要建立一个民选且强势的帝国中央国会。与贵族们不同，许多中产阶层自由主义者们并不乐见一个强势的集权化国家，而是希望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使其系统化。因此，中产阶层支持约瑟夫二世中央集权主义的遗产，并且认为如果要在奥地利社会任何现存的封建模式和宗教特权面前推行法治，国家力量是最强大有效的手段。不过与此同时，这些人又要求出台一部具有人权法案的宪法，提出奥地利与罗马所签协议

的评价，将司法体系和行政体系分离，以及要求官僚系统服从于一个民选国会的管理和监督。

等到投票选举新的奥地利国家机构，无论是地方议会还是中央国会时，贵族联邦主义者和自由集权主义者都不希望1848年大众热情失去控制的情况重演。于是他们同意选民必须限定在负责人的有产阶层之中（当然，也就是他们自己）。这两方在选举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主要是如何权衡贵族地主和与其立场相反的城市资本家在选举中所施加的影响。

1860年，皇帝的态度第一次倾向于联邦主义的贵族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任命加利西亚贵族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伯爵（Count Agenor Gołuchowski）领导内阁，同时批准了“不可撤销”的《十月文告》（October Diploma）。这份文件承诺恢复各州议会，接着这些议会可以选举奥地利国会代表，这些代表的唯一职责就是审核年度预算。[注]这个解决方案把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中很大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了地方议会，地方贵族因此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过且不论这些联邦制倾向的承诺，《十月文告》本身无法令绝大多数匈牙利政治家满意，因为该文告把匈牙利看作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拒绝承认匈牙利1848年“四月法令”的地位。《十月文告》同样令许多匈牙利之外的自由主义者们失望，他们认为这部宪法的内容倒退回了1848—1849年他们曾短暂建立的国会制度。同时在匈牙利之外，以捷克民族主义者为唯一真正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们发现，《十月文告》带给他们的是一个本质上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它的联邦制条款对他们实现波希米亚更大程度自治的目标大有帮助；另一方面，这部文件在民权和司法实践上对社会产生的自由化影响几近于无。

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媒体都已经酝酿了许多针对这个计划的批评，而此时仍然在艰难寻求信贷支持的皇帝很快不得不修改这份“不可撤销”的文件。在当年12月抛弃了贵族中联邦制的拥护者后，皇帝指派了一位曾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集权主义官员安东·里特尔·冯·施默林（Anton Ritter von Schmerling）领导内阁。借助小圈子中同僚的帮助，施默林在1861年设计了所谓的“二月特许状”（February Patent），创造出一个中央国会，不只是预算，还有其他一些门类的立法都需要得到其同意。虽然这个国会的代表由各个议会以及选民间接选出，它却可以在国内事务上行使比地方议会更大的权力。[注]

新的选举体系把有权投票的国民划分为4个不平等的等级：大地产主、商会、城市选区选民和乡村选民。针对最后两类选民，政府还规定了相对高昂的最低缴税额度。[注]施默林把国会划分为两个潜在机构，作为对匈牙利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其一是针对匈牙利以外的州发挥立法职能的所谓“小国会”，另一个则是包括了匈牙利代表，处理适用于全帝国范围议题的国会。[注]

1848年，奥地利国会只有一批自定规则，并且立法实施众多议题的众议院代表们。他们享有司法豁免权，而且当内阁失去国会中大多数人支持时，它就会倒台。但是“二月特许状”增加了一个“上议院”，用来协调众议院的行动。上议院的成员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亲王们，就是皇帝任命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项立法如果要成功，就要得到上众两院和皇帝的支持。这个国会以及复兴的地方议会代表们不再享有法律上的检控豁免权，他们也不再对组阁拥有正式的影响力。此外，宪法也并不保证官员们有执行立法的责任。于是在这些令人生畏的前提下，代表们能否坚持自己的主张，与帝国政权的力量对抗就很值得怀疑了。

1861年春，在10年前第一次选举之后，重组的议会再度召开会议，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议会的当选代表带着人们的期待前往维也纳的中央国会。4月，当新当选的国会代表们聚集在靠近维也纳斯卓腾托尔（Schottentor）匆忙完工的国会大厦时，他们和政府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宣告终结。代表和他们在报纸媒体上的盟友故意无视皇帝和施默林在新议会机构上设下的限制。他们用知性和法律上的论据支撑他们的主张，坚持从1848年革命的意义上把新的机制称为“宪政式的”，而不是皇帝期望中的“咨询式”。内阁持续不断地忍受着代表们在重要质询和不受欢迎的立法方面提出的令人窘迫的要求。内阁反过来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进行回应，努力减少因国会更激进要求而造成的影响。[注]而皇帝早先“所有权力都在我手中”的自信，最终在这个全新且难以预测的大众政治世界中被证明是一种可悲的天真。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在1861年，这两类人的立场通常被定义为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决心开创一个真正的宪政时代（如果不能称之为民主时代）。他们分别从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的角度，攻击他们眼中的宪政体系缺陷。他们还试着通过立法得到如今国会相较于其1848年的前身所缺乏的权力，这一点在阁员责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这两方主要的默契在于，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已经在行使它们希望得到的

权力。因此在日报劲头十足的报道中，数位代表在议会早期的会议上把自己描述为“人民的代表”，尽管事实上无论是《十月文告》还是“二月特许状”，都没有提到“人民”，甚至“代表”这个词。

律师主导了早期的回忆辩论，他们运用法律论据和专业术语，使他们谋求权力的深远主张正当化。在第二场会议上，来自下奥地利的律师爱德华·慕尔菲德（Eduard Mühlfeld）提议众议院应从政府设定的规则中解脱出来，制定它自己的会议议事程序。[注]同一场会上，摩拉维亚律师卡尔·格斯科拉（Carl Giskra）宣称国会应当起草一份对皇帝宣布会议开始的致辞的正式回复。[注]在这份回复中，就如何塑造关于如今最重要议题的公众认知，代表们可提出日程表。许多代表都利用这场关于回复皇帝致辞的讨论，来宣传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异。[注]举例来说，联邦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就国会相对于个别地方议会的职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从而帮助建立了早期政党跨地域联盟的基础。

代表们通过对皇帝的回复提出自己的事件日程表，对新体制发动了一次正面攻击。[注] 1861年5月15日，格斯科拉引入了一项令内阁在执行立法方面对国会直接负责的法律。当一项法律通过上众两院，获得皇帝批准时，负责的大臣都需要对它进行联署保证。如果大臣不执行这项新法，国会就有权采取行动。这项措施削减了帝国官僚体系在历史上作为皇权工具独立运作的地位。如今这些自由主义者们试图让官僚系统对立法机构负责，以此重塑整个帝国。[注]

为了让自己的提案合理化，格斯科拉把奥地利人民放在议会合法性的基础地位，声称是人民，而不是与会代表要求这次宪政程序的改革。他说：“公众舆论……显然已经意识到宪法的缺陷的错误，这迫切需要他们进行修正。”[注]格斯科拉还试图调和立宪帝国在哈布斯堡皇室的专职本质与宪政治国秩序之间产生的矛盾。他宣称，不仅仅是奥地利，19世纪欧洲的宪政理论家都面临着这个矛盾，“理论和实践长期以来都认可这样一条公理：国王不可能犯错”。格斯科拉认为，在一个宪政体制的君主国内，“这是一项能够让君主宝座的拥有者不受任何攻击的必要法律虚拟”。此外他还补充：“在这些国家中，种种理论和实践，加上一个第二机构，都补充了这项法律虚拟。”他所说的第二机构，就是大臣负责制，即要求服务于王权的大臣维护议会立法。[注]它可以调和君主的专制特权与民众立法的权利。

尽管沮丧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否决了格斯科拉激进的假设，社会上大多数报纸读者们却接受了格斯科拉的主张，当然，这部分是因为不受审查的纸媒不断津津有味地报道这些主张。经过12年的专制主义统治，奥地利的报纸读者们开始追随议会的发言，同时以高度兴趣讨论相关话题。不少议会代表中的头面人物，与记者和报纸编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试图塑造公众的认知。据《早间邮报》（*Morgenpost*）的记者海因里希·波拉克（Heinrich Pollak）回忆，议会代表和记者们混迹于国会大楼的冷餐区，他们常常把即将发表的演说样本透露给记者。身为摩拉维亚人的格斯科拉和波希米亚法律教授爱德华·赫布斯特（Eduard Herbst）与波拉克的关系尤为亲密，而波希米亚人伊格纳茨·冯·普莱纳（Ignaz von Plener）则与维也纳《新闻》（*Die Presse*）的编辑奥古斯特·赞格（August Zang）保持着密切联系。施默林在其回忆录中猛烈抨击这类议员和媒体人之间的关系，指责他们暗中破坏自己的计划，离间他与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施默林把议会代表与记者建立联系的行为归结为他们对有利报道的迷恋。他认为，这种常见的性格缺陷促使代表们把机密信息透露给媒体，这样一来，“晚上在委员会讨论的机密决定还未公布，所有人就可以从次日早报上读到它的内容”。施默林观察到，“当委员会的会议结束时，那些潜伏在大门附近的记者们就会从不同的委员会成员那里得到便条和笔记，他们以此撰写新闻报道”。当然，施默林不属于上述那些利用宣传人员在媒体上公布政府立场的人，但他抨击对手与媒体的关系，这样的行为不但有失体面，也失之轻率。随着时间流逝，帝国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公开，皇帝对事件的直接影响逐渐削弱，议会代表与他们的记者盟友在媒体上发布的观点也逐渐走向规范化。

随着施默林日渐失去他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弗兰肯斯坦式产物的控制，他和皇帝的关系也走向崩溃。不过他们关系的恶化并非因为自由宪政主义的威胁，而是缘于施默林无法劝服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参与维也纳国会。这两个地方的代表坚持，在他们参与任何帝国机构前，必须恢复1848年的“四月法令”，因此皇帝关闭了匈牙利地方议会，又在匈牙利重新推行戒严令。与此同时，联邦制拥护者对新制度的抵制亦与日俱增，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以及蒂罗尔的天主教保守派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从奥地利的角度看，施默林的宪政制度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出乎其创造者意料之外的反效果。

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主义

随着1861年宪政生活的复兴，一场主要围绕联邦形式的民族主义展开的、充满活力的（尽管从社会的角度看范围仍然有限）政治活动出现在帝国的若干州，进而发展到维也纳国会。1860—1880年，这个时期大多数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哪怕不是完全如此）政治现象，是从公共层面对政治生活的检验，本书第七章中将确认这一点。我们并不意外地看到，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具体计划上回归到了1848年的理念和经验上。来自1848年的民族主义元素，有奥地利–斯拉夫理念的复兴、恢复独立波兰国家的目标以及逐渐高涨的各州地方民族主义，它们支撑起了60年代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诉求。这时民族主义的计划（如果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仍然大多是特定几个州政治现状的产物，而非基于帝国范围的政治状况。换句话说，当19世纪70年代的德语使用者们以一个民族一分子的身份谈论他们自己时，这些人更倾向于将这个民族以及民族的利益限定在他们所在的个别州，而不是全帝国范围的民族共同体或者民族利益。举例来说，人们很少会提到整个奥地利帝国范围的捷克、德意志、意大利或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会发现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和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主义大不相同，而卡尼奥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又不同于施蒂利亚的同伴，当然，蒂罗尔、伊斯特里亚、的里雅斯特或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亦各有不同。

这段时期的民族主义政治计划倾向于以历史上的各行政单位，例如匈牙利、加利西亚和波希米亚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式联邦制帝国模式。然而加利西亚波兰人的国族身份目标本身由保守士绅所主导，因此它反对农民或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并且坚持要求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直到昔日的波兰–鲁塞尼亚联邦重新成立，波兰民族主义者们都还在谋求奥地利帝国范围内的自治联邦州待遇。而当1861年农民们选出数位代表参加首届加利西亚议会之后，他们直到1889年，都未能再重新选出任何农民代表。在这段时间内，保守派的波兰民族主义者用尽各种手段，阻止农民代表进入议会。注

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同样为了本地的自治游说维也纳方面。1861年，在宪政复兴之始，捷克民族主义领袖巴拉茨基与里格尔和海因里希·克拉姆–马丁尼茨亲王（Prince Heinrich Clam-Martinic）领导下的

波希米亚联邦制贵族谈判建立了一个政治联盟。他们的共同计划是“恢复”波希米亚历史上的国家权利。要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就要承认地方议会的首要地位，然后将维也纳国会看作一个各州在一起讨论对它们有共同重要意义事务的集体议会。与联邦主义贵族结盟，令巴拉茨基和里格尔不得不缓和他们自己和追随者们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曾在1848年为捷克民族自决的天然权利辩护，现在也只能与建立在本地历史传统上的民族主义依据进行交换。随着时间流逝，联盟内部资产阶级活动家和联邦主义贵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内讧，这是因为捷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持有的立场往往更倾向他们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不是贵族盟友。1863年，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效仿匈牙利，决定抵制维也纳国会。次年，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不过由于这些人主张摩拉维亚应当和波希米亚属于一个联合王国，因此疏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派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感情。

解决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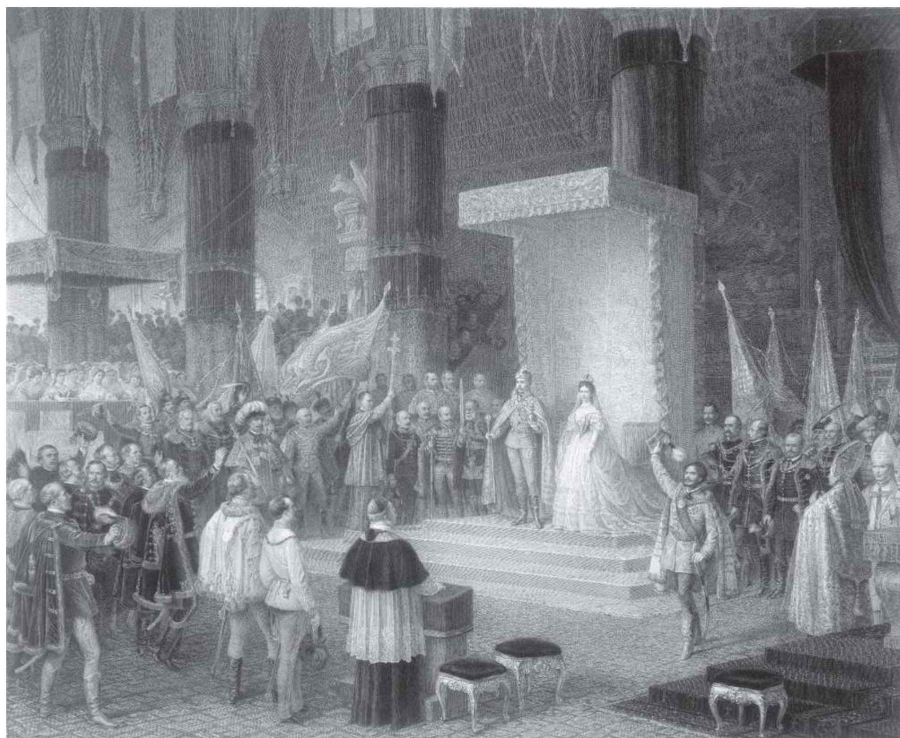
到了1865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意识到他需要跳出当前制度，才能和匈牙利达成合理的一致，于是他改变策略，将中央集权主义的施默林替换为保守派的联邦主义贵族——摩拉维亚的理查德·贝尔克雷迪伯爵。贝尔克雷迪旋即中止维也纳国会，进行新的选举，他希望此举可以让联邦主义者占据国会的大多数，从而通过联邦主义式的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这个宪政框架之外，开始与匈牙利领袖进行谈判。

然而此时，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中再一次败在普鲁士手下，这迫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他原本预想的基础上，向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奥地利自由集权主义者做出更大的让步。这场失败彻底断绝了一些联邦主义者让德意志在奥地利的保护下统一的梦想。奥地利自此被正式排除出德意志联邦，同时被迫把威尼斯割让给法国，而法国又将其转交给意大利。皇帝唯一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战争期间，匈牙利社会仍然对他忠诚，匈牙利也没有趁此机会激化事态，选择完全独立。1867年春，皇帝与费伦茨·迪克（Ferenc Deák，1803—1876）领导的温和自由派匈牙利活动家达成了协议，它几乎将全面恢复1848年匈牙利的“四月法令”。



中年的费伦茨·迪克。他和尤里乌斯·安德雷西代表匈牙利民族主义势力，促成了1867年和平协议的谈判。他的这幅肖像画是19世纪法国的一幅雕版画（Private Collection / Bridgeman Images）

在这份解决方案下，匈牙利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彻底从奥地利帝国中独立出来。来自匈牙利和奥地利国会的代表团将定期进行谈判，商讨国债分割、关税及其他共同面对的问题。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同意在6月8日举行他和伊丽莎白的加冕典礼。于是当天，在作为加冕地的布达马加什教堂，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接受了象征着“古匈牙利国家”的圣斯蒂芬王冠。之后，他像玛丽亚·特利莎（她在普莱斯堡这么做），以及伯父斐迪南之前做过的那样横刀跃马，朝着指南针的四个方面宣誓。



1867年6月8日，在匈牙利的马加什教堂，尤里乌斯·安德雷西伯爵（1823—1890）领导匈牙利显贵们，向匈牙利国王与王后加冕礼之后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伊丽莎白致敬。原画完成于1871年，作者为Eduard Engerth，随后Jenö (Eugen) Doby在1877年将其转制为铜版画（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同时在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5月15日再次召集了国会，这一次的代表以自由集权主义者占大多数。皇帝不情愿地任命爱自吹自擂但广受欢迎的摩拉维亚律师兼前1848年革命者卡尔·格斯科拉主持议会，作为与自由主义者和解的表示。此外，作为与匈牙利达成的解决方案最终获得通过的回报，皇帝允许主导这次会议的自由主义代表们起草一系列可以用作宪法内容的基本法，这些法律的内容，包括了主要建立于1849年在克罗梅日什投票表决草案之上的人权法案。许多集权主义者不情愿地向匈牙利人提出的，亦是之前他们大力反对的让步。很多集权主义者并不喜欢这种将统一的帝国分裂开的解决之道，有一些人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即便没有他们的参与，奥地利对匈牙利的妥协也已经不可避免。

1867年12月21日，当皇帝宣布新宪法时，1804年形成的奥地利帝国已经被三个在官方意义上（哪怕实际并非如此）的实体所取代：存在于某些情况，譬如外交、军事和财政下的奥匈帝国，但在其他方面，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事务互相分开；一个匈牙利王国；直到1916年都作

为"由国会代表的王国与领地"为人所知的帝制国家，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此称它为"奥地利"。从此开始，匈牙利和奥地利拥有同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他是匈牙利的国王，也是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同时它们还拥有共同的军事、外交政策，以及有限的财政安排。匈牙利和奥地利都将成为立宪君主国，虽然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宪法、不同的行政和司法体系，甚至不同的公民权资格。来自双方国会的代表团将每年会面，设定共同事务的预算，每过10年，双方还会重新探讨构成奥匈帝国的财政协议条款。任意一方如果不经对方同意，无权修改协议内容。

同意新制度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得以保留他自行决定军事和外交政策的特权，但即便是在这两个方面，这位皇帝／国王也不能随心所欲。1867年之后，国家的预算限制不断令他束手缚脚，要求他在绝大多数的军事和政治议题上形成范围更广的政治共识。由于他本人的个性类似于一个讲求完美（有些人说这是学究式的迂腐）的官僚，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最终熟习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双方宪政制度中所有复杂的规则，他甚至做得远比绝大多数的内阁大臣们还要好。从长期来看，通过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以及要求其他人遵照它们行事，皇帝的行为加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宪政实践，而不是将它们削弱。一个以关闭克罗梅日什议会、废除"四月法令"、严酷处决匈牙利反叛者作为其执政期开端的君主，如今成为匈牙利人宪政遗产最可靠的执行人，这不能不说有些讽刺。

在奥地利，这项解决方案逐渐被广泛认为是德意志/匈牙利为导向的国家集权主义暂时胜过地方联邦主义的表现。许多联邦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指责1867年的方案将匈牙利和德意志民族推上神坛，让它们主宰帝国国内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们。之后成为第一位用斯洛文尼亚语在卡尼奥拉议会发表演说的卢卡·斯韦泰兹（Luka Svetec）在辩论中警告他的同僚们，这个方案不但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还会起到反效果。卢卡宣称，该方案在事实上把奥地利分成了两个阵营，即“无功之民族进行统治，无过之民族沦为臣仆”(注)。确实，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这个方案成功通过，促使其他地方上势力要求本地的联邦主义者做出让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波希米亚与加利西亚联邦主义者强烈反对在牺牲布拉格、利沃夫、札格雷布、卢比安纳，甚至因斯布鲁克的情况下，通过一个二元君主国的方案，给予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方面至高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把1867年方案看作一个可以被效仿的案例。这个方案助长了这些人的希望（虽然最后证明它们并不合理），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他们也可以和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类似的协议。尽管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从未得到二元君主国中独立的匈牙利所享有的正式地位，他们还是在地方公务员系统的语言运用问题，以及对教育和福利政策的控制等问题上获得了相当高的地区自治程度。

独立的匈牙利

全新的匈牙利内阁所要面临的最初挑战之一，就是与克罗地亚（如今的克罗地亚包括了许多先前的“军事前线”地区）制订一个类似的和解方案。1868年，在首相安德拉什（Andrássy）领导下的新匈牙利政府和由大多数亲匈牙利党派组成的克罗地亚议会（那些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的克罗地亚党派纷纷抵制它的选举）进行谈判，商讨协议内容。这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承认了克罗地亚历史上附属于匈牙利的独立王国地位，给予克罗地亚在文化和行政上有限的自治权，此外，协议还保留了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并且在匈牙利国会处理双方共同议题时，允许克罗地亚派遣独立代表出席国会。从此克罗地亚在布达佩斯国会的442名代表中占据了40个席位，在议会讨论时，这40名代表有权使用克罗地亚语发言。同时在匈牙利内阁，亦有一位担任不管部大臣的克罗地亚大臣，代表克罗地亚的利益。匈牙利首相可以向国王推荐克罗地亚总督人选，这位总

督在理论上对克罗地亚议会负责，而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他服从于匈牙利的利益。此外在税收方面，克罗地亚有权保留45%的税收收入，用来支付单纯运用在克罗地亚的开支。注

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协议的各项细节，总体上代表了1867年协议中匈牙利政治阶级的处事方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协议承认了匈牙利政治阶级主张的本国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它往往和被哈布斯堡君主统治的其他领地分离开。而匈牙利与克罗地亚的协议只是将克罗地亚与匈牙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宪法关系成文化。不过在这两个案例中，关于现代民族身份的政治要求很快就压制了关于国家主权的传统观点，并对其进行重组。宪法问题也逐渐和民族文化关怀产生密切联系，选择从民族角度进行表达的宪法问题越来越多，亦使得它们更具有说服力。

1867年的协议创造出的两个国家中，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占据绝对多数，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宣称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民族。我们可预见到，很快这两个国家就会因为如何处理多语主义和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分道扬镳。在之后的30年中，宪法的管制（哪怕并没有经过立法）不断强调奥地利多民族的根本性国家状态。然而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逐渐兴起的种族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创造一个特别的匈牙利民族，逐渐将其中非匈牙利的种族同化，使他们产生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具体阐述这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发展路线，不过目前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知道1867年协议中有哪些特别的细节，给予这两种截然不同又互相对照的发展轨迹在结构上的参照。

1867年的协议在匈牙利创造出一个持久的政治局势。其中的宪法问题更多的是关于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而非社会、经济或政治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匈牙利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国王的关系。直到“一战”结束，鼓动匈牙利政治活动的核心问题正是1867年协议的立场所在。匈牙利政党或是支持协议方案的纲要（因此它们认为国王有能力组建一个议会内阁），或是因为“四月法令”的回归激动不已，这样一来，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联系就会限制在单纯的共主邦联关系，并且通过它们共同的哈布斯堡统治者表现出来。根据后一类党派遵循的所谓1848年方案（当然他们也因此和国王关系疏远），匈牙利应当拥有自己的军队（更不必提将匈牙利语作为指挥用语），以及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匈牙利不再有和奥地利的国会代表开会的需要，也不会再有10年一度续订协议经济条款的安排。支持

1848年方案的人们更多出身地方各郡的政治家，而国家公务员和官员们更倾向于支持政府一方。

在这里，关于匈牙利政党对宪法的痴迷，有几点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在1867年之后，匈牙利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剧变，导致了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匈牙利党派在意识形态或政策上分裂的原因。党派之间的正式划分，往往是基于它们解决民族主义问题途径上的差异，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因此，所有的匈牙利政党都自诩继承了1848年革命路线，或者1867年路线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次，匈牙利政党中并没有正式意义上的保守党，因为保守主义通常会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注]再次，宪法问题不间断的重要性，使得国族身份和它的含义始终成为匈牙利政治活动的中心。这反过来缩小了政府对待匈牙利国民（通常是那些爱国主义者）可以选择的行动范围，而这些人使用的往往是其他语言，例如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鲁塞尼亚语、德语和意第绪语。这导致之后的几届政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语言上的匈牙利语化政策。关于1867年方案持续不断的争执，迫使内阁通过偏向某种日渐种族化的匈牙利民族定义来占取先机，避免批评者的指责。这使得匈牙利的众多社会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不过且不论19世纪60年代匈牙利民族沙文主义的明显抬头，考虑到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匈牙利语言和民族身份相关的法律在1868年通过立法，这类政策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可以完全预测的。

匈牙利关于民族身份的法律主要出自宗教和教育大臣约瑟夫·厄特沃什男爵（Baron Joseph Eötvös，1813—1871）之手，他在1848年担任相似职务时，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改革进步分子。他制定的法律为匈牙利境内非匈牙利语裔的国民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由化（哪怕广义）的框架，用来保护他们的语言权利。不过它并未预见到与民族或类似的群体挂钩的集体权利。[注]至于这部法律的细节则非常含糊，在之后的几十年内，它们在法律和行政的不同领域得到执行。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之后出现的法律以及更加精确的法律应用，从政府和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抛弃了厄特沃什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自由主义设计。因此，举例来说，这部法律的第20条就赋予了各基层社区政府选择自己行政语言的权利，而第22条则保证基层行政单位与郡一级行政单位沟通时，可以选择使用匈牙利语或者他们自己的语言。但事实上，监管着基层行政单位预算的郡政府强迫它们的下属单位只能用匈牙利语交流，并且所有文件只

能提供匈牙利语的版本。许多基层社区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只能向这些要求让步。[注]结果，即便是非匈牙利语使用者聚居的社区，都倾向于雇用说匈牙利语的文员和官员。于是国家越发期待低级的文员可以发挥“匈牙利国家理念在地方的代表”作用。至于在许多加利西亚村镇，或者说法语村镇的本地议会就常常发现它们要签署一些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文件。早在1872年，征兆早露端倪：不久之前还接受罗马尼亚语诉状的特兰西瓦尼亚郡法庭，在当时就已经拒绝接收类似的文件。[注]

最后，这些宪法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最终陷入日渐发展但不完全的匈牙利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的状况意味着一点：匈牙利政府与奥地利政府不同，它尽了最大努力来避免改革用于基层社区及郡一级的机构，或适用于匈牙利国会的投票参政权利。1907年，奥地利国会引入男性全民公投的选举制度，从比例上意味着由少数语种群体选出的代表数量上升，以及匈牙利绅士阶层影响力令人难以容忍地被削弱。在1861年，匈牙利贵族地主占国会代表的比例是64%，这个比例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十分典型的；到了1914年，这一社会群体仍占有41%的代表比例，这使得匈牙利国会成为欧洲的边缘人，并且和它的奥地利同伴产生了天壤之别。[注]接任的几届匈牙利政府，在公投改革这个问题上毫不妥协（事实上匈牙利政府还在19世纪80年代增加了更多公投限制），因此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化了匈牙利城乡居民的抗议，并且加剧了大众的反犹主义情绪。[注]这也给了匈牙利国王一个可能分化其臣民们的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在关于宪法问题的冲突中威胁顽固的匈牙利内阁，这和他在1906年关于军事指挥用语的辩论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

本章以1851年，一个帝国专制政权自信洋溢的宣告开篇，终结于近20年后，对全新二元君主国的奥匈两方中执政党生气勃勃的政治活动的考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们成功维护了他们自由主义帝国的目标，抵挡住了哈布斯堡皇帝激进的专制主义政治纲领，原本皇帝一度在他们的计划中吸纳了部分自由主义信条。在这段时间内，决策的中心发生了转变，但是绝大多数政治决议的内容很少改变。那些主张以道德之上的价值观对抗19世纪50年代政府体系的各类自由主义者们，他们激进的言论并没有产生出与之前他们猛烈抨击的

制度的相异的政策。他们依赖于主张他们创立的制度价值观上的优越性，并且期待新的政治主张和论述可以主导匈牙利与奥地利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的政治活动。而作为一个经历过日渐提升的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人民识字率提高、官僚专业化、内部人口迁移，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等种种现象的社会，奥匈帝国在19世纪的欧洲可谓典型。不过它的政治家们所发表的特定论点，以及他们主张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却显得十分独特，即便他们面对着欧洲普遍面临的挑战——处理日渐高涨的社会运动以及逐渐激化的社会冲突时——也是如此。

---

1. Allgemeines Reichs-Gesetz-und Regierungsblatt für das Kaiserthum Österreich, II, Stuck, 10, 25, http://alex.onb.ac.at/cgi-content/alex?aid＝rgb&datum＝1852&page＝111&size＝45.

2. http:// alex.onb.ac.at/cgi-content/alex?aid＝rgb&datum＝1852&page＝111&size＝45.

3. Harm Hinrich Brandt, Der österreichische Neoabsolutismus. Staatsfinanzen und Politik 1848–1860, 2 vol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 257.“ Naked bureaucratic absolutism” is also in Brandt, 256. See also the excellent recent collection Harm Hinrich Brandt, ed., Der österreichische Neoabsolutismus als Verfassungs- und Verwaltungsproblem: Diskussionen über einen strittigen Epochenbegriff (Vienna: Böhlau, 2014).

4. 在加利西亚，所谓的共有地处置问题，还在持续引发本地地主和农民村落之间的冲突。详见Kai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in Galizien. Über Zugehörigkeit und soziale Emancipation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 hoek&Ruprecht,2005),108-112。

5. 苏法利诺战役是欧洲最后一次由统治者们御驾亲征的战役。它的参与者有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二世，以及皮埃蒙特/ 撒丁王国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King Victor Emanuel II of Piedmont / Sardinia）。

6. Cited in Robin Okey, The Habsburg Monarchy c. 1765–1918: From Enlightenment to Eclip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89.

7. Friedrich Schütz, Werden und Wirken des Bürgerministeriums (Leipzig: Weigand, 1909), 152.

8. Quoted in R. J. W.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Essays on Central Europe c. 1683–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2.

9. 作为这个委员会的一员（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体现出它的资产阶级成员们所共享的一种更高程度的社会激进主义），巴赫反对让工人们获得投票权，他还反对工人对福利项目的要求。See, for example, Christoph Stölzl, Die ÄraBach in Böhmen.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m Neoabsolutismus1849–1859 (Munich and Vienna:R. Oldenbourg Verlag, 1971), 250. Friedrich Walter指出，在1848年夏，巴黎六月革命爆发对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产生的直接关系。之后在1848年10月的骚乱中，巴赫只身逃出维也纳，险些被私刑处死 (ibid., 250)。

10. 然而在新的专制主义体系下，内阁大臣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分享权力的同僚群体，而

是分别向一个直接对皇帝谏言的议会报告（Reichsrat）。

11. For this entire section, see the insightful analysis of Waltraud Heindl, Bürokratische Eliten in Österreich 1848–1914 (Vienna: Böhlau, 2013), 42.

12.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281, 282.

13. 直到1918年，帝国的官员们都穿着设计于维也纳的特殊制服（它们往往也相当昂贵）。Karl Megner, Beamte.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Aspekte des k.k. Beamtentums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6).

14. Ibid., 335–336.

15. Heindl, Bürokratische Eliten, 45.

16. 有趣的是，官员们认定近来叛乱的威尼斯人绝大多数来自帝国其他说意大利语的地区（并不仅仅包括威尼斯）。See Andreas Gottsmann, Venetien 1859–1866. Österreichische Verwaltungund nationale Opposition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2005), 31. 关于指控这些官员是德意志人的内容，见Markian Prokopovych, Habsburg Lemberg. Architecture, Public Space, and Politics in the Galician Capital, 1772–1914 (West Lafayette,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 Heindl, Bürokratische Eliten, 38–39.

18. Quoted in ibid., 44–45.

19. Unger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从犹太教教徒变为天主教教徒。他之后就任于上议院，19世纪70年代加入奥尔斯佩格内阁，又成为最高法院院长。 (Reichsgericht).

20. Waltraud Heindl, ed., Die Protokolle des österreichischen Ministerrates 1848–1867 Das Ministerium Buol-Schauenstein, Vol.1 14. April 1852–13. März 1853 (Vienna: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5), xix– xxi. 文献记载了因为1852年Thun在维也纳大学法学院的一场演讲而引发的内阁骚动，因为在演讲中，他公开批评1811年《民法通则》的所谓“自然法基础”。

21.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441–442. 许多决策者支持在基础教育中使用本地语言，他们不能想象一种斯拉夫语言应用于中等教育或者大学教育。

22. Gary B. Cohen, Education and Middle- Class Society in Imperial Austria, 1848–1918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On Thun's refor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liberalism, see also Deborah Coen, Vienna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Science Liberalism, and Private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66; Heindl, Bürokratische Eliten, 59–61.

23. Quoted in Cohen, Education and Middle-Class Society, 25.

24. David Goo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78–79; Stölzl, Die ÄraBach, 28;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 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Vienna: Ueberreuter,2005), 234–235. 这些债券可以进行交易，也可用于贷款担保。多亏1850—1870年这20年间的粮价上涨，帝国西部的许多农民得以在1860年就提早付清他们要承担的那笔款项。

25.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especially 109–111. 最后，农民群体从原本作为共用

地的总面积360万轭（以一头牛工作一天耕作的土地面积为计量单位），与等于512万英亩的森林和草场中，得到了总计价值为120万盾的金钱和约等于40万英亩的28.8万轭土地。

26. Ibid., 110; John- Paul Himka, 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40–48.

27. 事实上，许多农民从原先的领主那里借款，结束了与领主的依附关系，不过是加深了这种感觉。

28. 在此处，Stözl注意到施瓦岑贝格家族的极端情况，这个家族统治的范围从波希米亚拥有23万居民、约150万英亩的土地，减少到44万英亩。Stölzl, Die Ära Bachin Böhmen, 35.

29. Ibid., 36. 从社会层面，贵族们还反对将他们纳入基层社区的范围之内，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支付学校和公共税，而当选公共税务官的往往是农民。之后一部颁布于1851年的法律规定，贵族地主有权将他们的财产移出基层公共社区，并且设立他们自己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30. 布鲁克相信关税制度无意中减慢了帝国的发展，他同时认为（这个观点最后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奥地利的制造业者可以赢得竞争，尤其是在巴尔干和奥斯曼土耳其市场上。

31. 唯一一条非国有的铁路线是连接维也纳与加利西亚的“皇帝斐迪南”线。Burkhard Köster, Militär und Eisenbah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25–1859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1999), 238–240; Good, Economic Rise, 81.

32. Good, Economic Rise, 81.

33. Good, Economic Rise, 83. Good指出，这种对这类银行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大陆式（法式）预期，与英国对这些银行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限制较大的预期设想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欧洲大陆相对落后的认知导致了前者的出现。

34. Carl von Czörnig, Österreichs Neugestaltung 1848–1858 (Stuttgart and Augsburg: Cotta, 1858), 206–208; Macartney, Empire, 460.

35. Czörnig, Österreich, 208–209. 19世纪50年代，商会在各州和地区的分布情况如下：上下奥地利、萨尔茨堡、卡林西亚、卡尼奥拉、西里西亚、布科维纳与伏伊伏丁那/ 巴纳特地区各有1个商会。施蒂利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各有2个商会。加利西亚、克罗地亚– 斯拉夫尼亚和沿海区（包括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和伊斯特里亚）各有3个商会。蒂罗尔拥有4个，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各有5个，威尼斯拥有8个，而伦巴第地区拥有9个商会。在所谓的军事边境区（之后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则不设商会。

36. Macartney, Empire, 488; see also the important work by Daniel Unowsky, The Pomp and Politics of Patriotism: Imperial Celebrations in Habsburg Austria, 1848–1916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

37. Unowsky, Pomp and Politics, 44.

38. Ibid., 41–42. 分割加利西亚的请愿收集到了超过20万个签名，并且在东仪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中传播。

39.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东正教社群——都渴求在法律上得到完全解放（虽然在他们中皇帝仍然具有很高威望）。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解放了犹太人（正如克罗梅日什宪法），但匈牙利政府没有这么做。

40. 关于这个谣言和匈牙利对伊丽莎白的普遍崇拜情结，见Andras Gerö, Modern Hungarian 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Unfinished Experience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223–237。

41. Alice Freifeld,“ Empress Elisabeth as Hungarian Queen: The Uses of Celebrity Monarchism,” in The Limits of Loyalty: Imperial Symbolism, Popular Allegiance, and State Patriotism in the Late Habsburg Monarchy, ed. Laurence Cole and Daniel Unowsky (New York: Berghahn, 2007), 143–144.

42. Ibid., 145–146. On Mariazell and the Habsburgs in general, see Alison Frank, “The Pleasant and the Useful: Pilgrimage and Tourism in Habsburg Mariazell,” AHY 40 (2009): 157–182.

43. 在某些场合，伊丽莎白的形象会被加入报纸登载的皇室家族照片中，尽管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在维也纳。关于伊丽莎白在媒体上各个方面的描述，见Olivia Gruber Florek,“ The Modern Monarch:Empress Elisabeth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Femininity, 1850–1900”(PhD diss., Rutgers University, 2012), especially chap. 2。

44. Ernst von Schwarzer, Geld und Gut in Neuösterreich (Vienna: Wallihauser, 1857).

45. Ibid., 12.

46. Ibid., 19.

47. Heindl, Bürokratische Eliten, 64.

48. Schwarzer, Geld und Gut, 8

49. Ibid., 12.

50. See Eugen Weber’s classic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7. Also 3–22 and 67–94.

51. Joseph Baron Hammer-Purgstall,“ Vortrag über die Vielsprachigkeit” in Die feierliche Sitzung des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m 29. Mai 1852 (Vienna, 1852), 87–100, here 96.

52. Hammer-Purgstall, Vortrag,” 98.

53. Peter Stachel,“ Die Harmonisierung national-politischer Gegensätze und de Anfänge der Ethnographie in Österreich,” in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Humanwissenschaften, ed. Karl Acham (Vienna: Passagen Verlag, 2002), 323–367. See also Karl Pusman,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auf Wiener Boden (1870–1959). Die Anthropologische Gesellschaft in Wien und die anthropologischen Disziplinen im Fokus von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Wissenschafts- und Verdrängungspolitik (Vienna and Berlin: Lit Verlag, 2008); Brigitte Fuchs,“ Rasse,”“ Volk,”“ Geschlecht.” Anthropologische Diskurse in Österreich 1850–1960 (Frankfurt a / M: Campus, 2003).

54. Karl, Freiherr von Czoernig, Ethnographie der ö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mit einer ethnographischen Karte in vier Blättern, 3 vols. (Vienna: Kaiserlichköniglich Hof- und Staatsdrückerei, 1857), 1:v.

55. Quoted in Stölzl, Die Ära Bach, 56. Fügner后来成为一名捷克民族主义者，他也是

捷克民族主义体操团体Sokol的创办人之一。

56. Quoted in ibid., 58 fn. 9. 另一方面，巴赫显然相信，废除了1849年宪法的新年法令会导致公众示威以及暴力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情况并未发生。

57. Augsburger Zeitung, quoted in ibid., 58–59.

58. Quoted in ibid., 61.

59. Quoted in ibid., 57–58.

60. 仅在波希米亚一地，先前的自由主义代表Gustav Gross、Eduard Strache、Franz Stradal以及Franz Klier就将余生投入了铁路建设事业，而其他一些人则成为商会中受人尊敬的成员。Stölzl, Die Ära Bach, 59–61.

61. Leopold von Hasner, Denkwürdigkeiten. Autobiographisches und Aphorismen (Stuttgart: Cotta, 1892), 51.

62. Quoted in Thomas Götz, Bürgertum und Liberalismus in Tirol 1840–1873. Zwischen Stadt und 'Region,' Staat und Nation (Köln: SH Verlag, 2001), 269. See also Christian Dirninger,"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als Beispiel binnenstaatlicher Integration im 19. Jahrhundert," in Wirtschaftliche Integration und Wandel von Raumstruktur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ed. Josef Wysocki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4), 65–100.

63. Innsbrucker Zeitung quoted in Görz, Bürgertum und Liberalismus, 269.

64. Stölzl, Die Ära Bach, 58 fn. 8.

65. 格斯科拉在自由主义者Eduard von Mühlfeld位于维也纳的法律事务所内担任文员工作。19世纪50年代末，政府允许他成为执业律师，但格斯科拉只能在布尔诺工作，不能活跃于维也纳。在摩拉维亚，格拉斯科通过他的演讲术迅速得到了一批富有的制造业者和商人客户，1861年，他当选为摩拉维亚议会代表，由此进入维也纳的新国会。

66. For this Fischh of quotation: http://www.britannica .com/place/Austria/History#toc33363.

67. 上述二者都在削弱地区议会的情况下，给予地方基层公共社区巨大的权力。相关内容详见Jiří Klabouch," Die Lokalverwaltung in Cisleithanien,"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 1848–1918, vol. 2 Verwaltung und Rechtswesen, ed. Adam Wandruszka and Peter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5), 270–305。关于这方面的精彩记载，见John Deak，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 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3–94。

68. Götz, Bürgertum und Liberalismus, 253–254.

69. Ibid., 255.

70. Fritz Mauthner, Prager Jugendjahre: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 / M: S. Fischer, 1969), 121; Gerhard Kurz," Von Schiller zum deutschen Schiller. Die Schillerfeiern in Prag von 1859 und 1905," in Die Chance der Verständigung. Ansichten und Absätze zu übernationaler Zusammenarbeit in den bänmischen Ländern 1848–1918, ed. Ferdinand Seibt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1987), 41; Robert Nemes, The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9.

71. Robert Hoffmann," Burgerliche Kommunikationsstrategien zu Beginn der liberalen Ära: Das Beispiel Salzburg" in" Durch Arbeit, Besitz, Wissen und

Gerechtigkeit,"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II, ed. Hannes Stekl, Peter Urbanitsch, Ernst Bruckmüller, Hans Heiss (Vienna: Böhlau, 1992), 317–336; see also Alfred Hanke, Die nationale Bewegung in Aussig von 1848–1914 (Prague: Volk und Reich, 1943), 35–36.

72. 奥地利财政大臣们试图重建盾（纸币）对银币的可兑换性，他们希望通过削减帝国预算，特别是高额的军费支出来做到这一点。

73. F. Schnürer, Briefe Kaiser Franz Josefs an seine Mutter (Salzburg: Kösel &Pustet, 1930), 302.

74. 这个将成为奥地利国会的机构称为"帝国议会"，它的权限超出了皇帝早前预计的限制。

75. 这一情况在1872年发生了改变，投票者有权直接选举国会代表，这可以说是减少不服从中央的具有联邦主义倾向的地方议会抵制国会的一种手段。此外，在乡村投票层面，人们通过一种让人联想到1848年的两步程序来选举代表。

76. On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division of districts (Wahlgeometrie), see Bernd Rottenbacher, Das Februarpatent in der Praxis. Wahlpolitik, Wahlkämpfe und Wahlentscheidungen in den bömischen Länder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61–1871 (Frankfurt a / M: Peter Lang, 2001).

77. 关于如何应对匈牙利方面的计划，详见下文。将国会一分为二的话，如果匈牙利拒绝派遣代表前往维也纳，国会也可以在奥地利召开会议，进行立法工作。而在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把特兰西瓦尼亚重新划归匈牙利一方。

78. See, for example, the excellent analysis by Stefan Malfèr, Einleitung zu: die Protokolle des österreichischen Ministerrates 1848–1867, V. Abteilung: Die Ministerien Erzherzog Rainer und Mensdorff , Vol. 2:1 1. Mai 1861–2. November 1861 bearbeitet von Stefan Malfèr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1), ix– xxxii.

79. Stenographische Protokolle über die Sitzungen des Hauses der Abgeordnet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Reichsrates, (hereafter SPSHA) I, Wahlperiode, I. Session, 2. Session, 2 May 1861, 7.

80. Ibid.

81. On the address debates, see Jonathan Kwan," ' Öffentlichkeit,' Adressdebatten und die Anfänge des Parlamentarismus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61–1867," in Hohes Haus! 150 Jahre moderner Parlamentarismus in österreich, Böhmen, der Tschechoslowakei und der Republik Tschechien im mitteleuropäischen Kontext, ed. Franz Adlgasser, Jana Malínská, Helmut Rumpler, and Luboš Velek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5), 135–144.

82. Pieter M. Judson," Forc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Parliamentary Practice in 1861," in Adlgasser, Hohes Haus!, 119–134.

83. SPSHA, I. Wahlperiode, I. Session, 7. Sitzung am 15. Mai 1861, 116.

84. SPSHA, I. Wahlperiode, I. Session, 13. Sitzung am 11. Juni 1861, 263.

85. Ibid., 267.

86. Heinrich Pollak, Dreissig Jahre aus dem Leben eines Journalisten, 3 vols. (Vienna: Alfred Hölder, 1898), 1:68; Franz von Krones, Moritz von Kaiserfeld. Sein

Leben und Wirken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8), 203ff.; Kurt Wimmer, Liberalismus in Oberösterreich am Beispiel des liberal- politischen Vereins für Oberösterreich in Linz 1869–1909 (Linz: Oberösterreichischer Landesverlag, 1979), 194.

87. Lothar Höbelt, ed., Der Vater der Verfassung. Aus den Denkwürdigkeiten Anton Ritters von Schmerling (Vienna: Freiheitliches Bildungswerk, 1993), 157, 52, 136–139; Gottsmann, Reichstag, 653ff .

88. 关于1861—1865年，将国会从内阁分离出去的特定问题的调查与分析，见Pieter M. Judson,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Liberal Politics, Soci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Identity in the Austrian Empire, 1848–191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93–105。

89. 不过，他却创造出一个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并在短时间内派遣代表出席维也纳的国会。

90. Keely Stauter-Halsted, The Nation in the Village: The Genesis of Peasant National Identity in Austrian Poland, 1848–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Unowsky, Pomp and Politics, 46. 1861年的议会在1863年波兰民族主义者在沙俄掀起叛乱期间休会。虽然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们在19世纪70年代成功将农民们排斥在议会之外，他们却不能在同时期阻止一批农民以及13位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当选为维也纳的国会代表（这些人渐渐走到了拥护中央集权主义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一边）。

91. On Czech nationalist long- term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under Schmerling, Jiří Štaif,“ Czech Politics and Schmerling’s Electoral Geometry,” in Adlgasser, Hohes Haus!, 145–156. On emerging divisions within the Czech national party, Bruce Garver, The Young Czech Party 1874–1901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Party System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60–75.

92. 据说是为了维持《国本诏书》中的国家整体性，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许多前中央集权主义者都很厌恶用“奥地利”来称呼这个二元君主国中非匈牙利的那一半。对他们来说，“奥地利”仍然意味着传统的那个大一统帝国，而不是它的一部分。直到“一战”期间，“奥地利”才成为二元君主国非匈牙利一半的官方正式名称。

93. 在此并没有一部奥地利– 匈牙利宪法，这使得奥匈帝国在得到一个属于双方国家的保护国殖民地（波黑）时，结构性的问题就浮出水面。而当奥匈帝国在1908年彻底吞并这个地区时，问题就变得愈加突出。For an illuminating discussion, Gerald Stourzh,“ Die dualistische Reichsstruktur, Österreichbegriff und Österreichbewusstsein 1867–1918,” in Der Umfa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chichte. Ausgewählte Studien 1990–2010(Vienna: Böhlau, 2011), 105–124.

94. Quoted in Andrej Rahten,“ Vom Primus zum Volkstribun. Die slowenischen Parlamentarier in den Parlamenten der Habsburgermonarchi,” in Adlgasser, Hohes Haus!, 192.

95. 关于1868年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之间的妥协方案的相关谈判，见Macartney, Habsburg Empire, 557–558。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同意此时仍然属于奥地利一部分的达尔马提亚，如果它的议会投票通过，那么它就可以与属于匈牙利的克罗地亚谈判，商讨合并事宜。由于当地议会的成员大多数为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而之后当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占多数时，这个问题又重新被拿出讨论。Macartney, Habsburg Empire, 645–646.

96. Okey, Habsburg Monarchy, 317.

97. Joachim von Puttkamer, Rumänen und Siebenbürger Sachsen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ungarischen Staatsidee 1867–1914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3), 36.

98. Ágoston Berecz, The Politics of Early Language Teaching: Hungarian in the Primary Schools of the Late Dual Monarch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60.

99. Ibid., 60–61.

100. Percentages cited in Okey, Habsburg Monarchy, 315.

101. On the rise of anti- Semitism in local politics in Hungary, see Robert Nemes, “The Uncivil Origins of Civil Marriage: Hungary,” in Culture Wars: Secular 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Christopher Clark and Wolfram Kais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6–365.

第六章｜文化之战与为文化而战

凭借它的人种学描述，以及它的政治特点，它将成为一座把君主国内的人民彼此联系起来，令他们产生统一情感的丰碑，而它的抑制性和模糊性也终究再一次取得胜利。

——《认识你自己》（*Erkennet euch selbst*），摘自《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Tagblatt*），1884年3月27日

本章追溯了奥匈帝国社会中各个派别的活动家越来越多地调动他们称为“文化”的权力，维护他们的帝国目标，掀起政治和社会运动，强化他们和反对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败坏竞争对手计划的种种方式。从1867年到帝国覆灭，奥匈帝国各种政治立场的拥护者们逐渐用针对所有人的广泛文化诉求，来使他们的要求、提议与计划合理化。从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到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神父，从宗派概念极强的民族主义者到帝国主义的宣传者，他们都用一种摩尼教式的二元论来塑造自己的愿景。经受他们活动的是所谓的“文化”，据说它们之间因为不可弥合的差异而互相分离。

政治家和活动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文化方面的参照、阐释、术语以及论证的行为，在奥匈帝国政治民族主义新模式兴起时最为显著。民族主义者们把他们日渐民粹化的国族身份定义，建立在他们认为是人们使用不同语言的明显事实基础上。而帝国国民使用多种语言彼此交流，以及和国家沟通的事实，有助于产生这样的一个论点：若干特定的文化或民族，构成了奥匈帝国的社会。注这个主张反过来产生文化和民族差异是其本质所在，这些差异无法弥合的观点。民族差异的主张扎根于一些群体的政治主张，它们认为帝国的职能就是纠正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凌。

建立在民族差异上的政治权利合法化，已经不仅限于民族主义者的范畴。1867年之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宗教活动家也开始利用类似文化受害者的索偿要求。奥匈帝国的国家政府与哈布斯堡王朝也开始借由向它统治的不同民众、文化或民族鼓吹自己提供的有益统一，来使自己的存在合理化。在本章中出现了一个观点，19世纪末国族身份的理论家，

以及帝国理论家的工作，建立在相似的推测与见解之上，并产生出相似的结果。帝国在促进它各个组成民族发展的能力方面日渐证明其存在，以此来促进政治方面的文化转向。而那些自诩为不同民族社群代表的人们则在帝国框架内，努力为自己博得更好的一席之地。

奥匈帝国文化战争中的民族

许多在1867年之后的奥匈帝国历史记录，其关注的重点都落在所谓的“民族冲突”上。这种冲突表现在从议会上的阻挠行为到街头骚乱，从经济抵制到政治暗杀的方方面面。以当时一些观察者，比如曾在1929年出版颇具影响力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终结》（*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一书的匈牙利社会学家奥斯卡·贾西（Oscar Jászi，1875—1957），以及作品建立在贾西见解之上的历史学家们看来，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表现出这个二元君主国已经日渐无力管辖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他们主张，在一个大众政治活动不断高涨的时代，共存于一个帝国内的不同语言群体或民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冲突，并产生奥斯卡·贾西所称的一种强大的政治离心影响。许多在贾西之后的历史学家直接或隐晦地假定出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的双方一边是存在于社会上的深刻文化差异，另一边是据说由这些差异产生的政治冲突。

关于奥匈帝国发生的这些争斗，我主要是从政治的本质来认识它们，而不是把它们看作这个社会多语种特质的自然产物。我使用强调这些冲突独有的政治特征与内涵的“民族主义冲突”这个词，来代替所谓的“民族冲突”。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19世纪后50年，在奥匈帝国社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之处。换句话说，就是民族主义在许多公共场合表现出格外的重要性，但在另一些公共场合中，它却无关紧要。毫无疑问，民族主义主宰了大众媒体上的公共舆论，控制了绝大多数非宗教公民生活的组织架构，并且在选举时主导了政治活动。但从个人角度，种种来自其他日常生活场合的迹象，以及一些受挫的民族主义者的证词，都显示人们往往无视民族主义者对忠诚度的呼吁。

我们同样想到，在许多19世纪的欧洲国家社会中，社会冲突和语言多样性都是很典型的问题。在这方面，奥匈帝国绝非孤例。零星且极端的政治冲突并不是奥匈帝国正在承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结构性问题的表

现。在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都正被投射到文化方面的政治与社会斗争撕裂，而政治活动家们试图鼓动更多人走进政治生活以从中得利。从严格意义上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时，同样可以显示出奥匈帝国的文化组成更近似于一个相对的问题，而不是绝对的差异。毕竟从威尔士、爱尔兰到加泰罗尼亚、东普鲁士和西西里，其他欧洲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同质化又如何呢？难道法国、英国、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在19世纪后半叶努力试图把语言和文化都多种多样的各民族整合到国内的民族社会中去吗？[注] 1861年，皮埃蒙特的马西莫·达泽格里奥（Massimo D’Azeglio，1798—1866）发表了他日后时常被人引用的评论，“我们创造了意大利。我们还要继续创造意大利人”，他的言下之意，即是当下严峻的文化挑战阻碍了新近自封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它所要做的就是克服这些阻碍。奥匈帝国的国家建设者们面临的这些挑战在性质上和欧洲其他的国家建设者们面临的颇为相似，即便他们处理这些挑战时，使用的方式较为特殊。

让奥匈帝国，尤其是这个二元君主国中属于奥地利的一半格外独特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它的制定出来解决语言和宗教差异的行政法律结构，而非它的民族构成。正因为帝国法律、行政实践和传统上各州自治的主张所具有的特点，奥匈帝国的人们在履行公民义务时，就更有可能在体制上对官方语言采取平等的态度。19世纪末，人们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已经不可能在公共生活中回避这些问题。民族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全民（其中往往包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动员参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活动的主要手段。民族主义冲突不是奥匈帝国社会多语化特质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帝国制度造就的结果。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历史同样让我们想起，政治方案可以产生或者塑造出以割裂社会作为表现的种族冲突。[注]

出于这种考虑，我对奥匈帝国历史的叙述角度就要偏离传统的轨道。我不再把政治冲突看作社会潜藏的种族差异不可避免导致的结果，而是探究政治冲突如何在民众中产生更强的民族差异感。通过这种方式，我分析人们动员起来，参加地方和区域政治运动的经验，把它作为从彼此分离的民族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产物）。在我看来，就其本身而言，在本地社会中宣称文化差异并不是必然，只有当它们形成政治目标的基础时，它们才具有意义。因此，生活在同一个村镇的人们不一定会因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就认为彼此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但是一个要求为某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争取法律、社会或制度性权

利的政治计划，就会鼓励生活在同一地的人们从语言角度把自己和他人归属于不同族类。我的研究方法没有轻视人们在共享语言运用和宗教实践方面的社会体验。它并不质疑人们可能在特定场合体验到民族主义或宗教情绪而产生的情感力量。但是它会质疑我们把所谓的客观共有特质，与那些特定形式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太过轻率的联想。

要理解奥匈帝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此处有三个密切相关的出发点。首先，1867年之后，奥匈帝国国内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主要是一种披着文化语言的政治现象。而在政治体制范围内，种族文化议题的极端冲突往往会在特定的政治问题发挥作用。在几乎所有这些冲突中，明确扮演主角的是那些民选官员、整治活动家以及声称代表大众的政治记者。当奥匈帝国的民族主义者们阻碍议会工作、破坏地方校舍，或者因为市镇广场的命名问题掀起骚乱时，他们都针对某些特定问题做出了有组织的政治回应。

文化观点的转变得以发展，主要是因为1867年之后，政治活动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大众化和民主化。1867年后，在奥匈二元君主国属于奥地利的这一半，每过10年，人们的选举权就会得到一定的扩展，直到1907年，全部男性公民都获得议会投票权，达到了制度上的最高峰为止。投票权改革往往不断对现有的政治运动发起挑战，后者要是无法吸纳或动员新投票阶层，就可能被淘汰。在早期阶段，民族主义活动家们逐渐转向更广范围的文化民族主义争论，部分原因是想要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获取支持他们计划的选票。他们相信投票者们更容易对语言运用等较广泛的文化属性，而非范围较狭窄的特定职业或阶层的计划产生认同感。这些活动家使用更具包容性的民族意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要求，让大众接受他们特定的政治目标。这种语言把文化共同性看作群体认同感的基础，同时呼吁帝国公平地补偿过去和现在人们承受的牺牲。

其次，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开始假设奥匈帝国社会是由文化各不相同、彼此敌视的民族所组成，我们就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一种存在于不同民族中的信念，会变成一个广受欢迎的信条，而且在一定的时候能够动员不同的社会人群。这里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审视民族主义活动家每日从事的活动，他们试图在地方民众当中普及一种已知的民族归属感。有什么工具可以使他们的论点变得更有说服力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观点游说人们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呢？在什么情况下，奥匈帝国社会中的人们可以生出民族归属感？注

民族建构就像建立政党一样，并不会自然形成。这是一份很艰难的工作，而且经常会导致不成功的开端或者结局。一位公民可能在一场特别艰难的选战后投票给一位本地的民族主义候选人，但一旦选举的激情退去，他并不会必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忠诚的一员。本地民族主义者们推动抵制村镇中某家店铺时，另一位公民或许会参与，但她或许同时会雇用一位说其他语言的仆人，或者把她的孩子与另一个家庭进行“非正式交换”，好让双方的子女都能掌握更多这一地区语言的知识——但上述这些行动都是民族主义者反对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对民族主义诉求的承认是不可信且难以预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被事件驱动”或“形势造就”的角度来考虑民族主义。

最后，我们同样要严肃对待帝国在建构民族身份意识时所发挥的作用。帝国的制度、法律以及行政实践，都在塑造一个更成功模式的民族主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特殊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对奥匈帝国特别的制度、法律和宪法结构的回应，并且在这些结构中进行运作。这些结构的特点，使得若干种建立在其他观点之上的民族身份论点得到了详尽阐述。民族身份的准确概念，发展成型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帝国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如果我们研究现存的法律、帝国组织架构，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塑造民族或者文化信仰，我们或许就会对导致民族主义冲突反复产生的动力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注]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那些创立帝国的理论家（民族志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科研勘探者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宣传人士）放在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活动家积极沟通的位置，而不是把他们看作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一部分。那些希望通过给予帝国一个更清晰的使命，使它在19世纪末的存在合理化的男男女女们，密切关注着民族主义者们提出的文化理论。他们同时促进对帝国各种形式的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强调帝国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他们还试图更有效地维护帝国统一体改善其各个组成文化中经济与社会可行性的多种途径，特别是那些在帝国较为贫穷和农业主导地区发挥效果的方法。

当这种关于帝国的观点向外发散时，它产生出了一种对奥匈帝国从1878—1908年唯一的殖民地巴尔干地区，尤其是波黑，更连贯一致的帝国使命感。如果帝国善于在国内培育各类文化并促进其进步，那么它就很适合为巴尔干社会中的多元文化带来稳定、进步以及最终的繁荣。民族和帝国是20世纪初想象中的两极，它们彼此相辅相成。

早期文化战争与自由主义玩家

1867年之后，占据奥地利和匈牙利公众注意力的第一次文化战争与民族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新宪法关系密切。推行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对奥地利和匈牙利传统的统治阶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自由主义者将如何实施他们新到手的权力呢？1868年1月，奥地利新内阁执政刚过一周（它在大众德语报纸上被称为公民内阁），一份名为“雄鸡喔喔啼”（Kikiriki）的讽刺杂志刊载了一则生动的政治漫画。漫画采用了1848年革命期间男性胡须是革命阳刚气概象征的说法，以及19世纪50年代巴赫与皇帝禁止官僚蓄须的逸事，它将两者结合起来，描绘了新任内政大臣——有着一把美髯的卡尔·格斯科拉走进一间官员（他们全都没有胡子）齐聚的房间。那群官员惊恐慌乱地高呼：“就是他！先生们！一个蓄须的内阁大臣！奥地利完了！”[注]这幅漫画暗示了成为新统治阶级的奥地利自由派不但面对着来自贵族与教会领袖等奥地利传统社会精英强势的反对，与他们站在对立面的还有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僚机构。这种立场的划分不是政治性的。最高级的官员们害怕一种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践的文化的威胁，担心它会替代当前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官僚统治，而这种恐惧从文化上就表现为革命者的胡子，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新的宪法。

1868年1月9日，讽刺杂志《雄鸡喔喔啼》上的漫画。画面中有络腮胡子的卡尔·格斯科拉正在和没有胡子的官员们见面（ANNO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奥地利第一批宪政体制下的大臣以及他们在报纸传媒中的盟友，他们的行为，尤其是他们的理论，都极尽所能地确认了这种恐惧情绪。因此，他们反复向那些可能正在密谋把奥地利拖进一个傲慢无知和专制主义横行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宣战。但是这种基于理智的现代性与专横的传

统对抗的摩尼教式善恶二元对立，却因为国家官员们设想中的矛盾角色而变得复杂，这就是讽刺杂志《雄鸡喔喔啼》的漫画所捕捉到的矛盾。这些官员，即便是那些身处最高位的长官，他们都越来越多地来自同一批受过同样教育，并且从中产生出自由主义活动家的人。帝国的官员们，长久以来被许多自由主义者视为约瑟夫二世时期精英主义战胜贵族特权的历史性胜利之象征。绝大多数自由主义领袖都曾一度受雇于政府，成为公务员，或者从政府行政官员成为大学教授。但也正是这批官员们，在19世纪50年代服务于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究竟能否把它对皇帝的忠诚转向国会，从忠于哈布斯堡王朝转为忠于宪法，就像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呼吁的那样？它会在制定法律时宣布站到人民一边，加入一种光明的文化吗？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这部分是因为许多高官的响应依赖于皇帝给予的表示，而在1867年之后的第一年，这个表示非常含糊。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把1867年的改革看作他对自由主义的最后妥协，而不是一个光明的改革新纪元即将到来的曙光，因此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新法都会遭遇皇帝先入为主的反对。而且皇帝本身就具有文化上的偏见：匈牙利的贵族和自由主义内阁意气相投，在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而在皇帝眼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奥地利大臣就太独断，太拘泥于律法，太好争辩，而且在文化上太过倾向资产阶级。他们不穿军队制服，仍然穿着过去做律师时的黑色套装。不止一人留着革命式的胡子，而不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偏好的留着鬓角但刮净下巴的式样。[注]

不过关于新宪政时期官员们的角色，有一点很重要。自由主义者们假装得到了极强的大众政治支持，以至可以拒绝和政治上的对手建立共识，哪怕对手中有一些人其实可以成为盟友。这种短视的态度令奥地利的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执行自由主义法律一些有争议的部分，譬如调整公共教育或者教会在奥地利社会的地位时，某些州长官因此犹豫不决，害怕执行法律会激起公众的反弹。于是他们最终只将一部分新法付诸实施，或者延缓一些法律的执行进度。新宪法制度的新颖性，使官员们有一定的空间去调和甚至降低这种影响。

自由主义内阁中的大臣们下定决心，要不计一切代价取得开明进步的胜利，于是他们威胁要使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执行新法时犹豫不决的下属。以格斯科拉为例，他就指示所有的公务员，应付1868年和1869年宗教告解改革时神职人员的反对，需要“从严处理”，他还警告公务员

们：哪怕是对宪法最低程度的不忠，也需要他们与其斗争。司法大臣兼前法律教授爱德华·赫布斯特撰写了一部法律，这样一来，他在处理部门中可能削弱新法影响的公务员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一份高度直言不讳的跨地域自由主义报纸尽其所能煽动大臣们，在其周边建立起一股崇拜他们的风气。通过不断以“公民内阁”这个词来指代新内阁，这份自由主义报纸让公众视线始终落在自由主义者们新取得的胜利之上，让他们持续关注这些胜利所具有的，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社会与文化维度。穿着黑色套装而非传统军队制服的民选众议院议员，突然就占据了从前只属于贵族、将军和高级官僚的位置，这意味着奥地利人正在目睹的事态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政治变革。注有报纸反复从文化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为市民身份的大臣们辉煌的崛起定性。因此，人们就从正直的平民这个角度来赞美当选的官员们，这些人跻身国家最高权力阶层的能力也就象征着市民阶层的政治实力。这份报纸称，这个阶层的成员可以更多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精英的利益服务。这份报纸还特别赞美了参与1848年革命的革命者卡尔·格斯科拉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一事（他竟然还负责管理警察）。卡尔·格斯科拉“在任何时候都是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象征”。因此很少有人再质疑，上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落在何处。报纸表示即便担任高官，格斯科拉的简朴作风与诚实的观念始终不变。报纸说“他拥有人民的信任注，他就是人民本身”。

经历过20年的在野生涯，自由主义的内阁大臣以及他们的同盟急于掌握权力，并维护他们对奥地利的愿景。于是他们在处理大量复杂的问题时，采取了一种好战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些自由主义者们相信，至少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奥地利将克服愚昧无知，而且自由主义者们对他们的历史使命拥有绝对的自信，他们把政治冲突看作文化之间的碰撞，他们的政策富有远见，正在和躲在阴影中的保守势力对抗，防止它们把奥地利带回黑暗的中世纪。

至于自由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反对派，他们正与自由主义的改革艰苦奋战。这些人通常是联邦主义者，为了对抗自由主义者，他们从各州地方议会，以及反对削减教会社会影响力的保守神职人员势力那里寻求支援。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个宪政时代出现了一些新元素，地方政治组织扮演了煽风点火的角色，激化了这些政治冲突。新法允许这些政治组织小规模参与到风行全帝国的“国民部门”的剧本之中。于是地方市

长、城镇顾问、改良派，慈善家、关心社会的市民以及机会主义者在全奥地利的大小城镇，甚至在乡村成立了政治、慈善和社会方面的俱乐部。他们将自己看作以宏大的自由主义目标改造地方社会的革命工具。他们避免采用政党式的口吻来提出自己的计划，转而将他们的目的用人们广泛认同的文化词汇表达出来，譬如“促进物质和精神上的发展进步”。对他们来说，文化首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产（特别是在教育层面），中产阶层市民依靠它，使他们对本地权力的主张更合理化。

这些俱乐部尤其提倡教育，以便使所有的奥地利公民可以抛弃短视的宗派利益，履行有益于全体福祉的职责。《圣波尔滕周报》（*St. Pölten Wochenblatt*）的主编这样写道：“任何一个宪政国家最稳固可靠的基础，以及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民获得健全和实用的教育。”通常来说，实现这些目标意味着建立一个村镇阅览室，附带一个具有教育职能，面向成人和儿童的可借阅图书馆。摩拉维亚的一位自由主义政客甚至指出，当地冬日漫长，人们无所事事，这为农民创造了一个通过阅读进行自我教育的极好机会。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意味着在地方报纸、印刷出版的小册子，以及农民的年历等媒介上为国民大众提供有关新的宪法之下，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的教育。

传播知识可改善帝国国内人民生活的积极一面，在反对者看来反而问题多多，他们的反对通常可以归结为拒绝文明开化带来的益处。这些不幸的人受到保守反动势力的压迫，举例来说，他们误解了新的学校制度，认为它会继续导致奥地利人民的无知。在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尤其是北方和西方地区，自由主义者特别把敌对文化的概念投射在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上，并投身于他们所谓的文化战争中。文化战争（Kulturkampf）这个词，借用自同时期德意志的俾斯麦对抗天主教会的行动。而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们只是简单地将他们的对手污蔑为贵族在官僚体系和军队中误入歧途的同盟者。

这场自由主义战争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支柱——教会、贵族阶级、专制官僚系统以及军队，它的手段不仅限于创办学校、培训教师、组织俱乐部或出版发行报纸。差不多从1860—1890年，奥地利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创造性地利用了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文化象征，在公共区域为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这样的哈布斯堡君主建立纪念碑，用广受敬重的历史人物命名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甚至我们将在第七章所读到的，在新建造的公共建筑上使用特定的建筑风格，来表达自由主义价值观。其

他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也做了同样的事[注]，通过诸如在公共地区树立雕像，城市扩张区域中新道路和广场的命名选择等行为，民族主义者们让人回想起或大或小的现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英雄，从而提出空间上的主张和要求。[注]

其他一些城市景观的改变，同样成为向大众普及自由主义历史叙述角度的象征。1861年，蒂罗尔地区波尔扎诺的自由主义市议会为当地神枪手组织了一场“光明射击大赛”，这不但是庆祝对新教宽容的新法，而且是庆祝城市引入了煤气灯照明系统。蒂罗尔的自由主义者们把一个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近期当地人反抗意大利的军事动员中产生的强大地区认同象征——英勇抗击外国侵略的蒂罗尔神枪手，与全新的街道照明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激起大众对他们计划的支持。为这次庆典准备的文章不断把光明的象征意义和自由主义文明开化理念联系在一起。而在穿越整个城市的游行中，游行队伍展示了围绕在一个巨大的枝状烛台周围，代表科学和知识的人物形象。波尔扎诺自由主义派的市长在讲话中，保证了在场听众都能理解这场活动的象征意义，“从此我们街道上的灯火将把黑夜变成白昼……这让人想起，我们的道德从各种无价值的限制中获得了解放”[注]。

奥地利和匈牙利两边的自由主义政权，采用了语言、仪式、服装、公共艺术、建筑风格以及重新设计市民空间等方式，把它们的现代化愿景植入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中。这是对那些必须接受训练的男男女女进行政治再教育（或者说解放）的重要部分，不过矛盾的是，这些人需要学习的是接受他们新的自由，以及最终为他们未来的投票权做准备。

改革运动

从劳伦斯·科尔那里，我们得知1870年秋天，政府派出一位督学前往南蒂罗尔的村落，去确保当地执行了新出台的自由主义教育法，并评估校舍状况。但当他抵达时，督学发现愤怒的群众堵在学校大门口，人们喊叫着，禁止“路德教的恶魔”入内。导致当地人自发起来保卫本地学校，反抗自由主义文明开化馈赠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位具有天主教信仰的督学，会被辱骂为“路德教的恶魔”？[注]

在这件事发生的数周之前，附近布列瑟农（Brixen / Bressanone）采邑主教禁止本地神职人员与新教育制度下的督学合作，并鼓励地方神父在布道时公开宣布反对新法。这样一来，这个农业区的学生家长们就有了充分的实际理由反对大部分新学校法，新法的8年学制要求剥夺了农忙收获时宝贵的儿童劳动力，而越来越好斗的天主教会给予当地人特许，让这些人使用教会提供的语言和象征物发泄他们的反对情绪。至于为何会提及新教中的路德派，部分是因为蒂罗尔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领导人一直拒绝承认帝国政府在法律上对新教群体的认可，以及他们策略性地在布道时将自由主义与新教结合起来相提并论。

“公民内阁”曾采取一些活动，试图改变有组织的宗教与家庭生活和基础教育之间的关系。1868年，三部所谓的“五月法律”决定性地改变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公共角色，这些法律把婚姻、葬礼仪式和档案记录的管辖权从地方教区转到民政部门，并且在民事婚礼方面赋予不同宗教信仰的奥地利人不同的选择。这三部法律同样确认了所有合法信仰的平等性（其中包括犹太教），又把天主教会对学校系统和学校课程的监督权转移到各州政府手里。[注]自然，这些法律引发了地方教会官员和同情教会的政客的激烈反对，而聚集在圣彼得的人们同样对这些法律感到不满。但许多自由主义者坚称“五月法律”做得还远远不够，他们坚持引入强制民事婚姻手续，当然，这个主张最后没有成功。

一年之后，一部新学校法创造了一个新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这令各州政府和市议会联合起来，负责在必要的地方建造校舍，为教师工资提供资金。这部法律要求所有的奥地利儿童都至少接受8年的学校学习，还设定了课程要求；而关于新建公立学校的地方管理，这部学校法的解决方式是用一个选举产生的校董会主持学校运作；此外，它还在各州建立了教师培训机构，规定了教师的资格认证程序。如果学生不愿就读于新的公立学校，他们还可以选择在宗教学校学习，但即便是宗教学校，也要和世俗学校一样遵守包括8年学制和最低学时在内的诸多规定。

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满怀喜悦地把上述这些法律描述为一个文明社会取得的最终胜利，此前保守反动势力一直以来让人们“深陷迷信、愚昧、怠惰……以及穷困”。[注]为了庆祝这些法律通过，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维也纳人在夜里点亮了他们的住所和事务所，此时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正在前往布达佩斯的路上，因此未能目睹这一景象。[注]正如某一

份报纸所解释的，这些法律主张的是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因为历史上的社会总是“在拜托神职人员的监管指导时，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注]。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这些法律招致内阁中的联邦主义者、神职人员和议会中的政治保守反对派的反对，在许多地区议会和官僚体系的上层，也不乏异见者。联邦主义者和保守人士坚持，各州议会有权为收获时期的地方农业劳动力需要考虑，推行一个较短的学制。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艰苦斗争保留了自治权的加利西亚，波兰保守主义者在1873年成功地将法律规定的8年学制减少到6年。[注]但在那些西部州（蒂罗尔、上奥地利、萨尔茨堡），推行新法最为坚定的阻碍者则是教会官员和地方教区神父。在蒂罗尔，由神职人员主宰的议会一直将8年新学制的全面推行延迟到1892年。[注]

教育控制权的战争（或者实际上是价值观之间的战争）恰好与国际上天主教会的两次重大改革同时发生，这两次大变革促使大众文化战争出现，使得后者超出了原本被认为仅限于政治政策辩论的范畴。这两次变革之一，是19世纪40年代发端以来持续至今，天主教仪式和宗教虔诚的普遍复兴。在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很多地区，男人和女人们纷纷参与本地天主教社团、朝圣活动（这些活动因为铁路的发展和火车票票价的下降变得更容易实行），此外对圣母玛利亚和特定圣徒的大众崇拜新形式——在蒂罗尔，人们则崇拜耶稣圣心——也在大幅度增加。[注]

在这股风潮下，很多群体运用公共空间中越来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援引诸多象征，利用射击比赛等大众习俗等手段，强化自身在文化上的合法性，自由主义者只是其中之一。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见，如果波尔扎诺的自由主义者们可以利用一场“光明射击大赛”，把自己的计划和蒂罗尔民众抗击拿破仑的传统结合起来，那么地方天主教的活动家们也可以如法炮制。1870年，来自位于波尔扎诺附近布列瑟农的采邑主教，就在波尔扎诺组织了一场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社团的庆典。在活动中，主教有指向性地延续了蒂罗尔和耶稣圣心之间象征性的联系（耶稣圣心同样也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强大象征），以此获取人们对天主教的支持，对抗不信神的自由主义。[注]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主教教会官员开始为他们自己建造一系列公共建筑，并有意通过这些建筑向大众强化天主教的价值观。教会人士筹集资金，建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哥特式教堂，它们很多都位于奥地利不断发展扩张的城市中新生的工人阶级居住区。1855年，林兹的一

位激进主教，弗兰茨·约瑟夫·鲁迪杰尔（Francis Joseph Rudigier，1811—1884，关于他的更多情况，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了解）为了庆祝圣灵感孕说的新教义传播，计划在林兹建造一座要花费70年才能完工的大教堂。上述这些新建的以及修葺一新的教堂越来越多地分布于城市与农村市镇中，试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强调教会的重要性。它们成为我们所谓的天主教复兴中一个可见的部分，而天主教复兴在建筑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所知的新哥特风格。很快，天主教复兴的潮流就在奥地利的一些州产生了高度大众化的天主教政党。

天主教会在这个时期的第二项重要改变，是一种好斗的、被称为“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急剧兴起。它是一类具有侵略性的保守宗教教义，强调在天主教会和世俗机构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教皇的绝对领导地位。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在其颁布的《谬说要录》（*Syllabus of Errors*）中，抓住了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实质，这份文件严厉谴责关于宗教自由，以及将教会和国家分开的观点。[注]在奥地利，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出身低微的一代激进神职人员，以及最早一批被派往重要主教区任职的非贵族主教中尤其根深蒂固。[注]

就在全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们重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意图减少天主教的影响之际，信奉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神父和主教们也对这股潮流做出了最有力的反击。他们在牧函、地方组织以及特别是天主教的报纸上使用的语言越来越激进。与维也纳枢机主教约瑟夫·劳舍尔（Joseph Rauscher，1797—1875）这样较为传统的，更倾向于在变革背后独立工作的教会领袖不同，这些教会中的激进活动家们公开煽动大众舆论，针对自由主义政府。他们把宗教法律看作对信仰的公然宣战，而且这些人与他们自由主义派的对手有一点很相似，就是要将对手彻底击败才算满意。“我们要当前的统治阶级受到羞辱，全方位的羞辱。”天主教信仰和联邦主义倾向兼备的报纸《祖国报》（*Vaterland*）在1868年对自由主义的宣战书上这样严词宣告。[注]这些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激进分子清楚地了解当代生活中报纸、插画小册子、消费者市场与铁路等种种关键因素，可以如何服务于他们的目的。事实上，这些人比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对手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手段。

1868年9月，设计了林兹大教堂的弗兰茨·约瑟夫·鲁迪杰尔主教在一封牧函中，令人震惊地指责“五月法律”都是“谎言”。上奥地利政府迅速

收缴了这封信，控诉主教的所作所为，将他送上法庭。法庭随即宣判主教有罪，并处以14天监禁。财政大臣伊格纳茨·冯·普莱纳在给儿子恩斯特的信中提到，这场诉讼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内阁必须划出底线，来表达教会官员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意愿”。不过在1869年7月，皇帝赦免了犯罪的神职人员，用普莱纳的话说，这表示“皇帝有多么不赞同新法……以及他对如今政府有多么不体谅”[注]。

教皇庇护九世也谴责奥地利的新法，称它们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憎恶的、该受诅咒的，而且全然无效”。他同时认为，这些法律是对1855年奥地利与罗马所签订的协议的背叛。[注]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从1869年12月到1870年7月，在梵蒂冈举办的基督教会议的决定进一步在日渐兴起的文化战争中火上浇油。虽然国际上并非没有异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一份宣布教皇言论在天主教教义问题上绝无错误的文件。[注]这项宣言改变了先前签订条约的奥地利与教会双方的法律关系，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奥地利宗教与教育大臣以新教义为借口，撤销了协议。[注]

教皇绝对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并不能像文化战争双方战士大声宣称的内容那样明确。绝大多数奥地利主教（包括他们名义上的领袖——维也纳枢机主教劳舍尔），都在最初的投票中反对这个主张，而奥匈帝国的主教们是全欧洲最后一批接受这条教义的。事实上，克罗地亚主教（Joseph Strossmayer，1815—1905）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后一位正式服从于它的主教。当支持“教皇绝对主义”教义的决定下达，许多奥地利主教仍坚持它必须谨慎运用，以免引起公众争议。不过教皇绝对权力主义一派的主教，比如鲁迪杰尔，他们在公共辩论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尽可能频繁地提及这个话题，用来煽动大众对抗自由主义的宗教情绪。

在一份关于“教皇绝对主义”的小册子中，鲁迪杰尔主教富有攻击性地强调所有与上帝的律法冲突的国家法律，在奥地利天主教徒中都不具有约束力：“你们不遵守这些法律没有罪，若是你们遵纪守法，那才是对至高之法的违背。”[注]这些语句同样给予自由主义者口实，让他们强调所谓“支持教权势力的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如果天主教徒可以无视特定法律，那么他们怎么能取信于国民？自由主义者们更进一步发问，对绝大多数忠实履行信仰的天主教徒，或者说什么样的国民——甚至说什么样的人——能全盘照收一个身在罗马的外国教皇的教义，以此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观点？毋庸置疑，任何一个能够独立思考、

有理性判断的人，都不会交出自行做出决定的权利。就像他们所称，支持教权势力的天主教为意志薄弱、智力有缺陷又容易轻信的女人们提供了庇护所，但它在现代的独立男性公民身上却不起作用。这种天主教文化威胁着国家的基础，削弱国民的能力，让他们依赖于罗马，奥地利如果要存续下去，就必须将这种文化扑灭。

然而虽然言辞激烈，奥地利公民内阁的宗教政策却远不能和惩罚性文化战争政策相提并论，后者是俾斯麦以及他在普鲁士和新统一的德意志的自由主义盟友所推行的。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们通常具有建立在积极进取的新教思想上的德意志民族认同感，而奥地利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国家的文化认同在传统上是与天主教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方，大多数自由主义政客、活动家以及民众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注

像鲁迪杰尔主教这样的圣职人员，很容易被自由主义理论家指责为破坏他们文明改革进程的“愚昧势力”或“黑暗势力”，但事实上，仍然有众多更加复杂的因素在破坏自由主义政策在奥地利社会取得的成功。在地方社会层面，越来越多有组织的民众反对行为在地方上出现，阻碍自由主义的法律在当地成功确立，深入人心。在1867年之后的10年间，类似前文中蒂罗尔山间小镇的居民阻碍自由主义派的学监履行职责，指责他是“路德教的恶魔”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就在帝国内部若干州的议会正在选举期间，施蒂利亚施泰因茨镇（Stainz，当时人口约1 500人）一个精神错乱的年轻人在1871年12月射杀了自由主义派系的新教徒镇长。据说，当本地神父说“这是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时，这个教区的居民都深以为然。注维也纳的自由主义喉舌《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严厉抨击这起事件，在它发表的一篇长篇社论中，这份报纸表示，只要帝国的精英还在为这样一个以向政府宣战作为回报的机构提供经济支持，并抱以政治同情，这种可怕的案件就会成为常态。

在这些事件被自由主义宣传工具尽其所能地利用时，它们也从文化层面上显出基层的新自由主义教会与学校法的反对者对法律的理解程度。对他们来说，新法往往代表了入侵的外来者抹杀本地传统习俗的行为，他们也着重从这些方面来表达自身的本地诉求。地方教会不断使用学校法或者教会在社会中的合理角色等议题，在选举时期激起本地人对自由主义的反对。当然他们的行为不见得能提高选民的参与度，在19世纪70年代，很多地区的选民参与度仍然保持在50%以下，不过双方的地

方政治活动家们所售出的言辞激烈的小册子数量却从5 000本上升到了1万本。

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政治活动家们纷纷选择创立报纸和社团。举例来说，从1865年起，上奥地利人就可以在自由主义倾向的《日报》（*Tagespost*）上阅读新闻，以及追踪议会活动的最新进展。不过到了1869年1月，上奥地利的天主教活动家们创立了他们自己的日报——《林兹大众报》（*Linzer Volksblatt*），其主编是本地圣弗洛瑞安修道院（St. Florian Stift）的唱诗班指挥。《林兹大众报》主要是在天主教的政治架构下报道地方政治事务。只要《日报》将政府政策描述为受到人们欢迎的、为上奥地利创造繁荣和进步的手段，《林兹大众报》就立刻针锋相对，将其描述为离间“人民”的阴谋，是必须在下一次选举中和自由主义一起被扫除干净的不公平负担。[注]就在大部分欧洲还处在大众阅读报纸的初级阶段，上奥地利报纸的发展情况已经让我们看到报纸的订阅群体已经产生了鲜明的社会价值观。上奥地利的天主教活动家们还组建了一个名为“天主教爱国俱乐部”（Catholic Patriotic Casino）的大众政治结社，以此和林兹的“自由主义政治协会”竞争。这个俱乐部在乡间有产者之中创立了不少分支机构，并且迅速得到了比他们的自由主义对手更多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的出现很快终结了自宪政生活复兴以来，林兹自由主义精英垄断的上奥地利选举活动。[注]天主教与自由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体系组成了“两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它们有着越来越同一化的意识形态架构，彼此分离的学校体系、结社生活和纸质传媒，它们是两个并立但彼此分离的‘准民族’”[注]。

自由主义的局限

在这段时期，另一场正在发生的文化战争让新的自由主义统治精英与逐渐形成的工人阶级组织产生了冲突。他们的冲突表现出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世界观中，一些与自由主义者慷慨语言不同的、显著的狭隘局限。属于工人阶级的奥地利人应当怎样为塑造这个帝国做出贡献？他们会怎样参与构建和阐述新的宪法秩序？当早期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提出上述这些问题时，公民内阁强硬地将这些问题搁置在一边，并且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把劳工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不确定的非法状态。自由主义者内部对工人阶级的活动本身就缺乏一定共识。19世纪60年代，一

些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对初生的劳工运动产生了强烈兴趣，帮助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些自助和教育类的组织。然而当工人阶级的这些运动超过了他们恩主所设想的限定范围时，这些自由主义的导师就开始撤回他们的支持。

1868年，工人阶级在维也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得到男性公民的全员公投资格以及工会的合法地位。内阁随机出手干预示威活动，而这一次它得到了皇帝的鼎力支持。总之，警察严密监控和频繁关闭合法劳工结社的会议。内阁还采取了严厉的紧急措施来处理他们认为一个逐渐变强的工人阶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威胁，禁止示威游行，审查工人的报纸，还解散了一些工人组织。

一些自由主义者曾警告政府不要动用国家力量来解除工人的武装。一份维也纳报纸提醒读者，政府今天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迫害“明天就会变成对整个民主制度，乃至之后就是对自由主义的迫害”[注]。即便如此，自由主义政府还是对工人采取了迅速严酷的措施。或许是为了弥补皇帝对他政治可靠性持续的怀疑，内政大臣格斯科拉在镇压工人的活动中打了头阵。1868年5月，这位制革工人之子、曾经的1848年革命者前往访问一个争取男性全民普选的工人代表团时，这样警告他工人阶级的兄弟同胞：“不要认为我们应当在奥地利引入暴民统治……这只是因为，生而为人不意味着就有权利投票。只有在我们发现这种权利对你们有实际利益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得它，而这项权利是通过你们支付的收入税表现出来的。”[注]

政府对待工人的态度，意味着工人需要用参政议政来换取权利。但是国家除了对公共教育的资助以外，却没有相应的积极政策来促进工人的社会阶层流动，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忧惧。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需要在面对数方强大且充满敌意的保守势力攻击时巩固新的秩序，在那之后，他们才能考虑把新秩序扩大，使其覆盖到工人阶级。就像《新自由报》在工人与格斯科拉会面之后所主张的，许多人认为，男性公民公投权利同样也会有利于贵族领导的反动政党，它们可以轻松地诱骗缺乏教育的大众支持他们。[注]

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拿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挡箭牌：他们的基础教育法已经给予工人们迈向政治成熟的最可靠路线，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奥地利经济》（*Der österreichische*

Ökonomist）在1869年表示：“在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很少有人能够阅读，而能够书写的人更少的国家，所谓的‘工人问题’在奥地利就要比在那些第四等级的国家更危险，那些国家还自夸更具智慧。”自由主义者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部分挫伤了工人们要求直接参政权利的积极性。此外，《奥地利经济》还提问，当工人阶级“首要学习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他们怎么能在政治上活跃呢？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却不等于一种可以轻松掌握的技巧，这同样需要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充分适应自由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像下面这些训勉之词所言：

> 在教会的教义问答书中，它关于虔诚和弃绝尘世的戒律不能为所有人提供幸福和福利。而资产阶级的“教理问答”充满了工作和劳动报酬的规则，它们可成为社会的基本原理。在解放人性的角度，这新教义所具有的文明力量，无论人们称它为经济科学或社会科学，都落在其应有之意上。

工人们需要接受经济、节约和重视事前规划的教育。而自由主义的教育计划将最终产生出一批颇清醒的一家之主，了解工作价值以及金钱价值的民众。

此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自由主义政客对女性投票权的负面态度，使得自由主义惊人狭小的社会形态与极少意识到自身政治脆弱性的情况暴露得更加明显。无论如何，受过教育并拥有财产的女性可以成为男性有力的政治盟友，而且在这段时期，这类女性的数量在整个君主国范围内迅速增加。然而尽管如此，有计划地让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妇女获得选举权，要到这个世纪末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显然，这并不是发生于自由主义时期（1860—1890），从下奥地利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地区性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这些组织，包括成立于1893年，由女教师奥古斯特·菲克特（Auguste Fickert）领导的维也纳“全奥地利妇女团体”（Allgemeiner österreichischer Frauenverein），成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女性就业、教育、职业化、养老金覆盖福利以及婚姻法改革等问题上。直到1900年之后，一些较新的大众政党才开始较为正式地讨论女性投票权问题，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捷克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些基督教社会运动活动家都开始考虑将女性作为扩大自身票仓的可能手段。

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议会甚至有意取消了一些自1848年以来无意间允许一些有特权的女性（作为商业经营者，或是在地方基层或者议会选举中投票的地主）通过男性代理人进行投票的制度漏洞。议会还在1889年声称，有身份的体面女性应当受到保护，远离选举地点，因为她们“会因为我们越来越艰难的选举遭到‘恐怖的影响’”。一位在其他议题上堪称最进步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之一的下奥地利议会代表，约瑟夫·克普（Joseph Kopp）对女性投票的理念下了“完全不正常”的定义。1884年，卡尼奥拉和卡林西亚议会废除了女性的投票权，施蒂利亚在1904年，伊斯特里亚在1908年紧随其后。

而就在这10年间，克普这样的代表一方面有意撤销享有特权的女性所保留的投票机会，一方面又兴致勃勃地鼓励自己的妻子和姊妹们为民族主义事业奋斗。自从民族主义组织在奥地利帝国成为法律分类上的非政治结社，19世纪80年代的女性终于被允许加入这个不断扩大的组织网络，成为其中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事实上，这些女性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点可以从她们为这些民族主义社团所做的演讲文本中充分展示出来。此外，女性还通过组织庆典、为民族主义社团义卖等活动，在筹集资金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女性还在以各种原因动员小区街坊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女性为民族主义事业所做出的各种动员，都被认为是她们为了自身性别利益所做的文化工作。

从联邦主义到文化主义

麻烦缠身的公民内阁崩溃于1870年夏天，它倒台的原因是其成员疲于迎战，又和他们的对手彻底决裂，而后者最终联合起来抵制国会。公民内阁短暂且具有骤发性的统治给奥地利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另一些政治角色，特别是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理论家使用了这些遗产，使其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战争没有削弱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最根本的合法性。当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活动家在完全不匹配的价值观框架下展开辩论时（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战争），他们也争相把帝国纳入自己的叙事角度中。天主教活动家指出哈布斯堡王朝和教会之间传统的关系，主张一个传统的、天主

教式的帝国愿景。而自由主义者举出宪法和新议会政权的成功，作为帝国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促进他们更世俗的文明开化目标实现的表现。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投向所有政治活动家中，最有效地把政治计划转变为文化战争的一群人——民族主义者。究竟是什么组成了一个民族；什么人属于一个民族，以及谁可以代表一个民族，这些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对某些人，尤其是贵族来说，民族仍然是指帝国的悠久本质，享受特权的精英定义它的存在，同时定期和国王讨价还价，要求分割和行使地方权力。但是在1848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有着共同文化特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一群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民族。对帝国来说，语言运用同样也是一个令它担忧的传统问题。推行一种普遍使用、服务于中央集权目的的行政语言的需要，与地方居民用当地语言沟通和进行教育事业的需要，帝国必须时不时地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节。一部出现于1867年的基本法这样保证：

> 国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一律平等，每个民族维护和培养发展自身民族特质和语言的权利神圣不容侵犯……在那些有多个民族聚居的州，必须设立不必强迫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公共教育机构，这样可以让那些少数民族有足够的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注)

这些符合哈布斯堡传统惯例的面向大众的承诺，无意间为围绕在语言差异周围的政治活动开辟了广阔的潜在空间。语言平等这个口号要变成现实，以及成为指导之后立法的宪法通用准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当下还有很多东西都模糊不清。举例来说，一种相对于方言的合法语言，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在特定州中，如果一个少数语言群体要获得相关的语言权利，这个群体的规模应当有多大？根据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公共教育机构”的意义可以从初等学校到职业学校、高级中学，甚至大学。

国家试图达到语言运用平等这一点，意味着语言实践越来越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治活动家也希望能为自己的民族群体辨识出潜在的投票者。如果民族主义者们让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相信，他们属于一个更大的、跨地域的民族，他们就同样要说服国家，这个民族是帝国内部的一个合理成员。宪法的文本已经提到，“国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一律平等，每个民族维护和培养发展自身民族特质和语言的权利神圣不容侵犯”，但是这既不能给这些群体下定义，也没有做好赋予任何人民族

性的准备。帝国的法律不允许民族共同体在法律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个人和群体一直在抱怨在官僚们手中遭到语言方面的不公对待，但民族本身不能提出类似的怨言。法律的自由主义意图赋予个人说不同语言的权利，这种意图和法庭对它的解读，以及民族主义活动家试图让民族共同体成为受法律承认的合法参与者而改变它意义的行为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重要且持续的紧张关系。多年来，就像格拉德·斯托茨的著作，以及其他人建立在他的成果上产生出的创造性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宪法中语言平等的承诺，奥地利的法庭和官僚机构支持的是一种更广义的解读方式。[注]正是帝国的制度有效促进了民族主义事业的发展，它向民族主义政党双手奉上胜利，最终令这些民族成为合法的法律参与者。

民族主义者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假定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意味着他们隶属特定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推测让制度和法律的实践偏离了原来的重心——个人对语言的使用权利——转向定义整个群体（民族）所享有的权利。按照这个逻辑来举例，一个人学习特定语言的权利就将被理解为一个民族学习其民族语言的权利。但民族共同体和所谓隶属于它们的个人，他们之间对彼此的需求并不总是能达成共识。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民族主义者关注群体的权利，而个人的选择则更加难以预测和善变。民族主义者尤其不愿意信任那些居住在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地区的人们，他们不认为这些人会为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做出正确的语言运用和学习选择。在民族主义者希望孩子们就读于单一语言学校，并且不接触当地第二种或第三种语言时，父母们对孩子的期望则正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有助于社会地位提升的多语种教育。于是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求法律的力量，迫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注]。

民族主义者强制控制人们选择的行为，是1867年之后政治实践演变的结果，也是政治家们面对日渐发展的大众政治活动所带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挑战衍生出的产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年代和世纪之交之间，奥地利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867年之后，奥地利经历了4次议会选举改革（分别在1873年、1882年、1888年和1897年）。[注]1907年，奥地利采取了男性全民公投的投票形式，并终结了议会选举的分层投票机制。奥地利政治活动不再像过去那样扮演上达天听，受到皇帝重视的传统角色，它开始越来越多地吸引投票者参与其中。这点特别重要，因为1867年协议的条款，各州要想使用旧策略得到较有力的联邦制度，或让自治获得更大的政治前途这些事，都变得不

再可能。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看出这一点。

1871年，一个短暂的联邦主义内阁代替了“公民内阁”，它的领导人是卡尔·霍亨瓦尔特伯爵（Count Karl Hohenwart，1824—1899）。这个内阁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它和捷克民族主义者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而它在波希米亚大地主中的联邦主义同盟也停止了对议会和国会的抵制，使波希米亚的政治局势恢复正常。根据这场谈判达成的共识，即我们所知的“基本条例”，波希米亚议会承认1867年协议以及奥地利国会在有限政策范围（防卫、商贸和外交）内的基本主权。条例同样给予波希米亚在内部事务上广泛的自治权，捷克语和德语成为平等的行政语言；并且从行政目的出发，把波希米亚划分为捷克语区和德语区。一旦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议会同意“基本条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就会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奥匈二元君主国也会变成一个更大的联邦。

但这项议案失败了。摩拉维亚议会只同意有条件地接受其中部分条款，西里西亚议会则将其全盘否决。而更重要的是，帝国新的二元体系无法令“基本条例”的实施成为可能。按照1867年协议，匈牙利政府有权否决帝国任何进一步的结构改革。在获得他们认为的独立之后，匈牙利领导人就不愿与帝国范围内其他有可能出现的国家分享他们目前的地位。这个世界上不能有所谓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加利西亚–匈牙利帝国。

就在捷克民族主义者在1871年争取波希米亚自治的行动失败时，已经牢固确立自己地位的波兰保守主义者——至今为止，他们在加利西亚的统治仍然没有遭受其他社会阶层或者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有力反对——已经通过谈判让政府非正式地妥协，获得了对他们有利的局面。波兰保守主义者试图为加利西亚谋求匈牙利在接受1867年协议之后获得的自治地位——这可以看作对独立波兰国家的一次复兴。当然，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些和维也纳方面谈判的波兰显贵对民族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流行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理解，而是过去那种保持传统统治阶级权力的理解。因此，加利西亚议会中失望的波兰政治家在1867年抱怨，认为新的二元制“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与过去的历史政治、民族特质和文化价值的水平与传播相符的法律与行政自治权”[注]。

在正式的加利西亚宪政解决方案还无法变成现实的情况下，维也纳政府允许议会将当地的行政体系全盘波兰语化，也把德语为主导的高等

教育体系重新变回波兰语主导。[注]维也纳还设立了一个正式的内阁职务给“加利西亚大臣”，在之后的内阁中这个职位也沿袭了下来。总而言之，从19世纪70年代起，无论在维也纳掌权的是什么政府，波兰的保守主义者大都对其表示支持；作为回报，政府给了波兰保守主义者放手处理加利西亚事务的权利。在世纪之交，双方在压力下达成了这个共识，农民阶级的民粹主义者，以及一次重大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都对在加利西亚勉强站稳脚跟的政治家们所掌握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向帝国体制寻求帮助，利用帝国的组织架构占据了民族主义的优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要求中央政府落实执行宪法中对教育和行政方面语言使用的保证，由于民族自治，30年来，波兰民族主义者一直无视这些保证的内容。

“基本条例”是为波希米亚打造的，却昙花一现，自由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展现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形势是如何催生出更多在种族和文化层面对国族身份的理解的。中央集权主义者（通常是说德语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提高任何一个州的自治程度都会严重损害奥地利宪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他们同样反对让捷克语和德语在波希米亚行政体系中获得同等地位，他们强调捷克语只是一种地方语言，而德语则具有跨地域的，甚至是国际化的地位。这些信奉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1871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希望自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把他们放到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相等同的对立位置）各种明言暗示，宣称他们的民族文化比捷克民族主义者拥有的文化具有更深的内在价值。但他们尚未提出捷克人（事实上是捷克语使用者）能够成为德意志人，也没有提出捷克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德意志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这些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充满疑问（甚至感到窘迫难堪）的是，尽管捷克民族主义领袖们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不少人还接受过德语的高等教育，甚至还有人用德语发表重要著作，但到了这时，他们都认为捷克语和德语有着同等的文化价值！

在人们为“基本条例”短暂的争吵期间，以及争执过后，一种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波希米亚应运而生，它受到组织更优、经验更丰富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影响，反过来又向他们学习。这种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涉及一种“成为德意志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就在1871年，在奥匈帝国的西部和北部边境，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奥匈帝国国内的德语圈中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反应。许多人称赞普鲁士和它的德意志盟友们战胜了法国，认为德意志帝国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德

语使用者们一个强大的榜样。这些人并不想要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将它看作一个天然的盟友，它的诞生帮助他们克服了1866年军事失利带来的惨痛体验。

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以德语为母语的男女在从种族层面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时，他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或者自由主义者，而并不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那时起，他们宣称自己是德意志人，但不会走捷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老路，成为类似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宣称，德意志人所谋求的东西超越了其他民族主义者追求的自私、派系化的利益。德意志人据说是奥地利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他们缴纳最多的税款，以及就像我们在之前所见，相信他们自己拥有全帝国最发达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德意志认同感与其组成享有特权的奥地利“国家主要民族”（Staatsvolk）的感觉是分不开的。不过享受成为“国家主要民族”的权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使得他们要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帝国内任何地区和民族的特定利益斗争。而且有不少这样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无法理解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不愿通过学习和使用德语，以“成为”德意志人的方式加入“国家主要民族”的行列中来。他们认为，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学习德语得到一个看待帝国政策的更广阔视野，从而抛弃所属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追求。

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的波希米亚，捷克民族主义者与语言相关的政治活动动员了数千名波希米亚人，通过游行示威对抗政府。这些捷克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将波希米亚说德语的政客推到了一个艰难的立场上，迫使他们从心态上为了从种族层面定义的民族主义而放弃具有特权的“国家主要民族”身份。正如波希米亚议会代表卡尔·皮克特（Karl Pickert）的解释，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心怀苦涩：

> 我们（德意志人）一直都是国家的拯救者……我们总是站在奥地利人的立场看问题，把本民族自身的利益放在背后。我们总是在不利情况下与那些将民族主义作为观点基础的人对抗……我们从未为本民族的利益发声，而是一直为整个国家的利益奋斗。注

这说明了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一种想象奥地利国内德意志民族的激进新方式仍然是充满争议的。要用自己的这个民族的特权换取一种公开的民族主义宗派政治，而且后者还会将他们与毫无价值的对手放在同

一位置，这使得许多具有德意志认同感的自由主义活动家犹豫不决。1871年，公民内阁前财政大臣兼波希米亚出身的议会代表伊格纳茨·冯·普莱纳在一封给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全面否决了皮克特的民族主义态度。普莱纳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转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特质……除了霍亨瓦尔特内阁之外，完全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威胁”），他担忧的是对种族民族主义的追求“将（在宫廷中）促成对我们的反感，以及许多针对自由主义政党的诽谤材料（这些材料由它宫中的政敌产生）”。注

自由主义者普莱纳担忧，如果他的党派继续向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手所倡导的派系化的民族主义屈服，可能会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皮克特在警告自由主义者不要认为他们的选民来的理所当然之际，敦促人们对权力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对他和他的盟友来说，人民（以及他们的数量）才是组成未来政治权力的关键，而不是皇帝对政党的态度。但在这里就有几个问题：谁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民众？他们真正的困境是什么？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问题可能的答案正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和民族身份

19世纪70年代，鉴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家都开始把意识形态斗争放置在文化斗争的框架中，到了80年代，许多政客发现他们正承受着把民族主义层面的文化凭证提升到他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天主教或世俗的、联邦主义或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信仰之上的巨大压力。他们更多地从文化价值观的方面发言，而更少提到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的。

以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占压倒性多数的卡尼奥拉举例，议会代表、作家兼卡尼奥拉州立博物馆馆长德勒戈廷·德日曼（Dragotin Dežman）长期以来一直为促进卡尼奥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和语言事业奔走奋斗。然而他却在19世纪60年代，和德意志自由主义党派结成了政治同盟。他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深信不疑，并且认为德意志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团结情谊”。1873年，德日曼的思想和行为在他的圈子中并不是孤例。一位来自卢比安纳的当选代表就认为，“卡尼奥

拉人当中的绝对多数，对宪法是非常忠诚的”。“忠于宪法”（Verfassungstreu）这个术语，德意志自由主义政党和媒体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就在同一年，一位代表下施蒂利亚城镇采列的德意志自由主义代表理查德·伏瑞格（Richard Forreger）以这样的话作为演讲的开场白：“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片包含有斯洛文尼亚人的土地上获选成为代表。”[注]不过，伏瑞格却要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奋斗，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者们对他投身德意志民族主义事业的质疑。当19世纪70年代，一些自封的“年轻斯洛文尼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当选议会代表时，他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却使他们无法加入霍亨瓦尔特的保守主义团体，而这个小集团在传统上是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代表的大本营。到了80年代，这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被政治孤立的状态，在文化民族主义之外，已经剩不下任何供自由主义群体自我定义的政治空间，当然，也没有进行政治妥协的余地。围绕着民族主义的政治活动已经变得越来越激进，于是在具有德意志或斯洛文尼亚身份认同的议会代表之间，已经不可能为所谓的“敌对民族”留出宽容的余地。

至于在80年代加入政局的新来者，凭借他们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声望对目前当政的政治家发动了猛烈的挑战，在1891年的波希米亚，一个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捷克青年党派一夜之间取代了老捷克人在议会和国会选举中的地位，而不过10年之后，这个党派又受到来自重农派和激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挑战。90年代，在加利西亚，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神父兼报纸出版人斯坦尼斯劳·斯托亚洛夫斯基（Stanisław Stojałowski）的农民追随者们开始在议会和国会选举中，向波兰保守主义集团的传统霸权发起猛烈挑战。[注]同样在这个10年内，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激进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挑战当地保守犹太政治领袖的权威，这些领袖过去一直都受到强大的波兰集团的支持。[注]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新选民阶层在国会选举中新增的选票给了民粹主义者机会，以自私自利、涉嫌贪腐以及对人们追求民族利益的事业显然不够坚定的罪名攻击传统的在任政客。

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取得的胜利，往往缘于他们愿意公开对政敌使用反犹主义的指控。奥地利许多新选民把解放犹太人和将犹太人接纳为社会一分子看作一种社会和文化威胁，想对付这种威胁，需要通过立法限制移民或参与经济。对一小部分人［类似激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格奥尔格·冯·舍内勒（Georg von Schönerer）和他的追随者们］来说，犹

太人对德意志民族造成了极大威胁。对其他自下奥地利到加利西亚的大部分人来说，犹太人把持某些贸易的指控加剧了反犹主义的民粹思想。至于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区逐渐发展壮大的天主教社会运动中，要想找到证据表明，自由主义世俗化思想带来的广泛危险，以及不受控制，威胁地方传统手工业与文化价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象征，犹太人是最为方便的。

在自由主义的根基在政治上比奥地利更加稳固，选票数量也更为有限的匈牙利，反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语言；地方上未得到投票权的国民动员起来反对已经地位稳固的民族主义精英。1895年，匈牙利国会上众两院中占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议会立法通过宗教平等的决议，让犹太教成为合法宗教信仰，并且引入了义务民事婚姻制度。[注]作为回应，匈牙利天主教徒动员了许多没有获得投票权的天主教徒组成地方组织，致力于反对或推翻类似的自由主义立法。而1893年，在一座有着1.5万名居民的多瑙河城镇科马罗姆（Komárom），本地神父亚诺什·莫尔纳（János　Molnár）搜集了超过1　000份签名，要求国会否决民事婚姻制度。科马罗姆天主教徒集会上的发言者同样大肆攻击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用高利贷代替封建制度的非宗教现代性的化身。[注]

自由主义媒体谴责这些签名者，给他们安上无知大众的污名，然而这类请愿拥有的巨大群众基础，表现出帝国范围内没有投票权的民众也在政治方面逐渐活跃起来。自由主义媒体同样谴责天主教政治活动家们在国家面临来自少数民族的挑战时破坏匈牙利民族统一的行为。自由主义政客坚持宗教平等会鼓励“新血”经过同化融入匈牙利民族之中。但正如罗伯特·内梅什指出的，如果19世纪90年代的文化战争消灭了匈牙利–犹太共存互利关系面前的最后阻碍，它也同样让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注]

与此同时，反犹主义的政治运动发起者把一大批社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和近来的犹太人社会解放，这同样反映出人们在据说威胁到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的犹太问题实质上缺乏共识。此外，对反犹主义活动发起者和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经济与宗教敌意的选民们来说，舍内勒的新种族主义理念毫无意义。[注]

校舍中的活动家们

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民族主义是怎样如此彻底地扎根于地方社会的呢？民族主义是如何令这么多人走向政治化，又给予他们唯一的参政道路呢？它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做到这一点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选择学校作为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学校似乎可以无限供给民族主义者们向新一代灌输某种民族认同感，让他们对其产生长久承诺和认同的机会。学校同样给本地人发展社区、促进个人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不过这两种推动力并不总是互相契合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赢得这个民族的下一代的机会，我们需要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当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他们的活动形式扩大，走出选举活动的范围时，他们的目标转向了围绕教育和学校而特别组织的活动。1880—1890年，奥地利的捷克、德意志、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就建立了学校协会，并在全国拥有数千个分支机构。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筹集资金，为社区提供建校和维持学校运作的支持，这些社区因为使用第二语言或少数语言的学童不足，而无法获批建立该种语言的公立学校。注但随着人们阻止所谓的“本民族儿童流失”的工作，这些协会也开始试着通过学校问题，组织尽可能多的当地人加入民族共同体。随着这些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其他的民族主义组织也加入进来，意在加强少数民族群体在多语言地区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人们提供职业培训和福利。不过所有这些活动主要的重心还是落在学校。

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学校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其职能运作上与奥地利大不相同。这部分是因为匈牙利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另有一部分是双方学校体系结构和目标之间的差异。匈牙利在1868年出台的学校法要求学生在全日制学校接受6年时间的学习，而奥地利学校法最初的要求则是8年。注相较奥地利方面，匈牙利的1868年学校法没有重新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制度，而是在已有的宗教学校和宗教教师培训机构（尽管基层要为学校支付一定费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同时，匈牙利的学校制度预见到公立学校只在宗教学校不存在的地方建立的可能性。奥地利的宪法保证，在地方上使用本地人惯用的语言进行学校教学，而不会强迫学生学习第二种地方语言。但匈牙利的政策截然不同，它的语言政策服务于国家的匈牙利化，于是学校就迅速成为推行这些政策的主要场所。同时，匈牙利的学校还成为匈牙利和少数族裔（德意志、罗马尼亚、鲁塞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政治活动家们民族主义焦虑的投

射对象。因此，与学校制度相关的民族主义政策（实际上是国族身份的概念）在匈牙利的发展就和奥地利不同。

当奥地利民族主义者设计出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共同体真实性的国族身份文化定义之际，匈牙利民族主义则在寻求让各民族更轻松且更有可能接受匈牙利民族同化的方式。对那些在匈牙利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学习匈牙利语知识是认可匈牙利民族的一个标志，国家归属感定义了这个民族，而语言能力则从实际上反映出它的存在。匈牙利学校政策试图通过向少数民族教授匈牙利民族语言，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不过，这不一定会改变学生的文化背景。因此，正如约阿希姆·冯·普特卡默（Joachim von Puttkamer）所指出的，基于匈牙利对国族身份特殊的概念构建，它是欧洲第一个引入全面公民教育课程的国家。当然，这种做法偶尔会引起人们对国族身份的混乱或理解不清。1894年，一本罗马尼亚语版本的匈牙利公民教育教科书这样解释匈牙利国族身份的特点："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叫作匈牙利，但是我们属于其中一分子的民族，则称作罗马尼亚民族。"不过5年之后，同一本课本的修订版就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它回避了任何国家/民族的特殊性，将课文修改如下："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叫作匈牙利。因此匈牙利是我们全心热爱的祖国。"[注]

匈牙利的这项政策使政府对使用其他语言的教育机构抱有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有时政府会对这类学校的存在设置严格的限制。比如它在1874年，就关闭了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斯洛伐克语中学，削弱了斯洛伐克语教育。次年，政府又关闭了位于马丁（Turčiansky Svätý Martin），建立于1863年的斯洛伐克国家文化与科学中心（Matica Slovenská）。1879年，一部新出台的法律规定匈牙利所有的初等学校都必须将匈牙利语列为必修课。同年，教育和宗教大臣这样说："小学生学习语言读写的速度，要比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更快。"这之后过了23年，另一位大臣更明确详细地阐述了政府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

> 在匈牙利初等学校教授匈牙利语唯一且最高的目的，是让那些不使用匈牙利语为母语的儿童可以达到使用匈牙利语清晰地表达自己思想的程度，从而让他们适应自己生活的环境。[注]

匈牙利语的学习取代了原本学校学时中用于学习"母语"和"读写"的时间，这样一来，母语并非匈牙利语的学生就几乎没有时间学习自己的

母语。数学课上的计算也同样使用匈牙利语。而到了1902年，历史、地理和公民权利等课程都采用匈牙利语作为教学语言。早在1882年，政府就已经规定教师如果要取得职业资格，必须具有匈牙利语的知识；至于那些已经取得教师资格但不懂匈牙利语的老师，则有4年的时间去学习这门语言。1907年，当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反对党掌权时，他们顺应选民的要求，通过了所谓的Apponyi法案，规定学校最初的4年教学阶段只能采用匈牙利语授课。[注]这部法律对那些仍然采用少数语种教学的匈牙利学校同样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不过即便是这部法律，它对民族主义政客要求的让步也要多过对教育政策进行的主动干预。一位社会主义教育专家注意到：

>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活跃的势力和那些在学校中活跃的势力产生冲突，对学校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只要各个家庭以及社会、宗教和基层小区机构还在说罗马尼亚语，那么在初等学校教授匈牙利语就不会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结果。[注]

奥斯卡·贾西同样认为这部法律不能对农民社会产生效果，他坚持：

> 哪怕在每个村镇中，初等学校成为一个文化机构的模范（与之前那些由一两个薪水微薄，超负荷工作且教学准备不足的教师管理的拥挤教室不同），在其中强迫使用匈牙利语教学，也只能让学生学会几个匈牙利语句子，在之后的人生中，他们很快就会把它们忘到九霄云外。[注]

政府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设立一个经由学校实施的有效匈牙利同化计划，而就像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4年初等学校的教学，对哪怕是具有匈牙利语语言背景知识的小学生来说，都不足以充分学习这门语言，更不用说那些非匈牙利语言背景的学生了。

19世纪末，来自匈牙利北部、东部和南部多语种地区的教师团体经常向政府施压，要求将更严格的法律应用于教育系统。1883年，上匈牙利马扎尔教育协会成立，这个团体旨在促进上匈牙利的教育匈牙利化，两年后，在特兰西瓦尼亚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注]

总而言之，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学校问题，操纵双方相关民族主

义活动的是两股相反的力量。在奥地利，大众运动和更加民主化的政治体系，促使政客和组织者选择更激进的立场，去挫败与他们同在一个民族群体中的反对者。有越多人获得投票权，就有越多的政客使用民族主义，在社会的多元性之中营造统一和团结。奥地利政治活动的重心落在活动家们建立和维持少数民族学校，挽救那些可能从他们本民族流失的儿童，当然也是未来的投票者的能力上。政府在这期间始终采取中立的态度，只有在这些少数民族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达到规定标准，才会给予资金援助。然而匈牙利政府通过实施相关政策，表达出它们更进一步实现匈牙利化的承诺，来回应受到高度限制的投票选区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奥地利的民族主义组织需要动员数千民众，筹集数百万克朗的资金来保障他们的事业——建立少数民族学校所需的高昂花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不断扩展的政策，来动员新的成员，募集更多资金。奥地利民族主义者们推销日常消费品，组织非正式的抵制活动；他们出版导游书籍，为同族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渠道；他们还出版杂志，进行委托研究，而且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们利用了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工具，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在匈牙利，许多民族主义社团致力于促进国家的匈牙利化，但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游说政府，同时达成一些政府职能范围之外的目标。

民族主义的社会与文化社团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增加，同样也发生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以及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等穷困的农业区。不过在这些区域，民族主义活动家们的目标则要和他们在较西边的同伴所致力的有所不同。加利西亚与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强调教育进步对民族的重要性（当然，这也与个人的阶层流动与提升息息相关），而不是把政策建立在害怕失去或者努力获取民族成员的基础上。一些旨在提高民众识字率的组织/俱乐部试图说服农民，让他们知道教育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带来真正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更高水平的繁荣。早在1861年，匈牙利就有一群说罗马尼亚语的神父（他们分别属于希腊礼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师、公证员和律师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语文学与罗马尼亚民族文化协会（Asociaţiunea Transilvană pentru Literatura Românăşi Cultura Poporului Român，简称ASTRA）。ASTRA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小型可借阅图书馆，或者组织地方教育讲座，支持罗马尼亚语教师等手段，提高以罗马尼亚语为母语的农民识字率。鉴于使用罗马尼亚语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有限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财政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他们的活动还特别受到主流匈牙利语媒体和社会的限制，由于后者往往视他们为叛徒，ASTRA直到19世纪90年

代才得到了长足发展。[注]

在罗伯特·内梅什对匈牙利边境地区地方生活史细致入微的研究中，他关于ASTRA的活动记录非常稀少，这表现出在大城市传播的民族主义一般性理论极少符合地方实际现状。当ASTRA的中央委员会于1898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比霍尔郡（Bihor）召开年会时，当地的匈牙利语报纸赞扬了它的组织工作。一份匈牙利语报纸不止称赞ASTRA的成员为“头脑清醒，以罗马尼亚语为母语的匈牙利公民”，它还继续解释ASTRA的活动是如何促进“我们匈牙利祖国的发展进步的”。而在布达佩斯，情况则相反，一份匈牙利语报纸攻击这次会议，称其为“一次罗马尼亚人的示威”，并且宣称与会者“往往将匈牙利的旗帜踩进污泥之中”。[注]事实上，在匈牙利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不少反对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下意识反对少数民族活动家组织的文化活动反应的声音。比如1907年，激进的诗人埃德雷·奥迪（Endre Ady，1877—1919）就以一部最先由罗马尼亚作者创作，并翻译为匈牙利语剧本的戏剧为契机，坚持要给予罗马尼亚人的文化理想更大的尊重。[注]

1880年，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每2 089人有一所学校，相对于奥地利其他地方的人口与学校比例，在同等数目的居民中，加利西亚拥有的学校是其他地区的1/2：波希米亚，每1 136人有一所学校；而在蒂罗尔，相对的人数是565人。此外，只有49.1%的加利西亚学龄儿童真正入学，而奥地利其他地方的比例已经高达95%。上述这些指标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甚至更糟糕，那里的常住居民主要是说乌克兰语、信仰希腊礼天主教的鲁塞尼亚农民。由波兰保守主义者把持的加利西亚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提升这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而且当它确实采取一些促进教育进步的措施时，这些措施也是为达到他们的波兰化目标服务的。尽管这些说乌克兰语的加利西亚农民和奥地利其他地方，乃至欧洲很多地区的农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学年的关键时候成为田地里的劳动力，但东加利西亚的父母们却并不一定排斥教育。毕竟农民们和当地领主长达一个世纪关于共有地使用权的斗争教会了一些农民教育和阅读文件能力的价值。

此外，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使当地农民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完成法律要求的6年学习之后，他们往往很快就把学到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建造更多鲁塞尼亚语或者乌克兰语学校，还要在毕业离校的男女学生中

巩固他们所学到的读写知识。1867年，鲁塞尼亚活动家设立了一个鲁塞尼亚民族主义阅读社团Prosvita，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在学校的正式学习阶段结束之后，继续读写练习。在19世纪70年代，这个社团的成员增长非常缓慢，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社团人数迎来了飞跃性的增长。到了1914年，当地类似的俱乐部或社团已经超过3 000个。注

在Prosvita的出版物内，乡间活动家们反复讲述他们和怀疑他们行为的当地人之间的遭遇，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农民，他们拒绝活动家的种种作为，声称“我们的父辈不阅读也不听人读报纸，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或者“我又不能从中得到面包吃”，以及“如果我是领主老爷，是不是就该读报纸”。阅读社团的支持者们为了回应这些言论，在他们的出版物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逐步发展的美好图景。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人宣布“现在在我们的土地上，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读书读报。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被那些不看书的人嘲笑”。许多活动家还把他们的工作与一种飞速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新生活自觉联系起来，有人这样说：

> 无知的先生们呀，多丢脸！你们举出父亲和祖父们的例子，说他们不读报纸也能生活。但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学校，也没有电报和铁路……而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个世界不再原地踏步，而是迅速向前迈进，那些不愿前进的人，将被时代抛弃。

这些加利西亚活动家将他们对农民状况的了解，以及关于帝国其他地区农民的活动的信息作为他们诉求的一个明确部分，他们问“为什么捷克和德意志的农民要比我们的农民更加富裕”，因为“他们都具有文化素养，而且更开明进步。每一个德意志和捷克农民，或者靠自己，或者和别人一起阅读报纸，而且我们也很少在当地找到一户没有报刊架或者书架的人家”。注

帝国、民族和人口普查

19世纪80年代，匈牙利和奥地利不同的国家机构对语言运用的关注给予民族主义者们思考民族身份的新方式。注从1880年开始，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在它们的10年期人口普查中加入了询问国民语言习惯的重要问题。

在匈牙利，人口普查成为估量和评价匈牙利化政策进程的重要手段。鉴于匈牙利语的使用者仅占全国不到50%的人口（在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匈牙利语使用者占全国人口的46.6%），因此要从语言运用角度定义匈牙利民族身份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远大目标。事实上在1867年协议之后匈牙利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政府“出于政治审慎的角度”，完全回避了语言相关的问题。[注]在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调查表格要求受访者列出他们的母语。但在这里“母语”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受访人母亲所说的语言，甚至像阿戈斯东·拜赖茨（Ágoston Berecz）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母语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使用的第一语言。在1900年和1910年，统计局对关于母语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它把母语定义为“受访者认为自己运用得最为自如、表达最为流畅的语言”。1910年人口普查之后，决策者宣布匈牙利化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因为差不多有55%的匈牙利人将匈牙利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是，人们不可能知道这种转变受到不同人群生育率或人口迁移进出等因素的影响有多深。而且决策者和政客们看重教育，把教育看作人口关键因素的程度，可以从人口普查反映出来，与奥地利不同，匈牙利的普查还询问受访者对其他语言的掌握程度。这成为记录匈牙利化相对进程的又一种方式。[注]

在奥地利，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越来越要求国家对地方语言运用的情况有更精确的了解。通过让民族主义者们测算和在地理上规划他们想象中民族群体的增长与削弱，人口普查数据塑造了民族主义者将民族身份及其地域划分概念化的方式。奥地利的人口普查同时还给予民族主义者无可争议的统计证据，来支持他们建立少数民族语言学校的要求。奥地利最高行政法院在1884年判决，如果在从居住地到校舍的两小时步行距离之内，有40个或更多的学龄儿童使用一种语言，那么这些儿童所在的社区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所以这种语言教授课程的学校。[注]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奥地利政府估算民众语言运用情况的一种手段。纵然民族主义者有所要求，匈牙利也对此有不同的措施，奥地利政府却没有在人口普查表格中询问受访者的“母语”和“民族”。此外，奥地利政府为人口普查发明出一个可以代替母语的词汇：“日常使用语言”。这个词淡化了语言运动决定民族认同感的概念，转而强调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作用。这就削弱了许多作为国家基本构成单元的民族中，民族主义者们提出的主张。国家同样把上报哪种语言的决定权留给了个人，或者说是男性的一家之主。事实上，按照上述这条准则，做丈夫的可能会在普查表格中上报与他们的妻子所用的截然不同的语言，而这种

情况绝不鲜见，人们在这一次和另一次人口普查中，也可能因为日常使用语言的变化而修改他们的填报内容。[注]

民族主义者要规劝人们在普查时，在关于语言运用的问题上填写民族主义者认为正确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这往往是因为民族主义者们关于社会生活的推测与地方实际是矛盾的。对地方上的一些家庭来说，从单一语言的层面对他们进行定义并没有实际意义。不少人每天在不同的场合（家庭与商务场合）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掌握多种语言促进他们子女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还有一些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学习新的语言，以便在新居住地生存。在文策尔·霍莱克（Wenzel Holek）著名的回忆录中，这位可以说捷克语和德语的奥地利流动工厂工人描述了他在1904年到达一座玻璃工厂时的情况："我下了自行车，因为跨越边境的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这时我听到周边的人说着波兰语、俄语、捷克语，还有德语。"[注]文策尔·霍莱克的经历，在全欧洲的工厂工人中都不是稀罕事。霍莱克使用"民族"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记录下这种多语种的常态塑造这些工人，哪怕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生活安排的多种方式。他注意到，"工厂的国家化特色意味着在一间工人宿舍内，三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工人同居一室是很平常的事"。而霍莱克的姐妹操持的家庭，也使用捷克语和德语两种不同的语言。[注]

不过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却尽其所能描述另一种世界，它基于互相排斥的各民族，并属于这些民族的成员与他人不同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文化差异，这都可以从语言运用中反映出。政治活动家为了把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变成民主主义忠诚性的公开展示而积极奋斗。在全帝国的城镇中，每过10年，民族主义的煽动者们就故伎重施，在当地每个角落搜罗那些有可能上报正确的民族语言日常用途的人。他们召开公众大会，分发普查问卷填写样本，还印刷宣传小册子，这都是为了获得地方公众最大程度的支持。他们的活动甚至还扩展到了地方市政府，希望普查程序能越来越倾向于他们本民族的利益。[注]一旦普查结果公布，民族主义组织就会专心致志地审查它们：在过去10年中，他们的成员在哪里增长了？在哪里减少了？他们投入资源增加成员数目，效果最显著的地方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塑造了民主主义者，尤其是在那些语言混杂的边境地区民族主义者们的政治政策。[注]

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产生出更多社会学性质的问题。譬如要如何解释

一种语言的运用在某个特定地区的增长与缩减？这有可能是因为当地劳动力的迁移，当文策尔·霍莱克这样的劳动移民迁移到一个不使用他们原本语言的新地区时，他们会最终放弃使用原有的语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防止这种放弃民族语言的行为发生，应当采取哪些政治和社会性措施呢？相反，在语言混杂区的人们，使用不止一种语言沟通时，这种沟通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呢？他们可能被另一个民族吸纳吗？为了防止这样的人们转换立场，即改变语言和民族，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呢？

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我们必须注意如何选择接受他们对人们行为的理解。在研究这段时期的民族主义时，这种额外的注意会帮助我们避免像当时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把人们一贯如一地归入这个或者那个已定义的民族。反之，我们可以从驱使人们认同这个或另一个民族群体的多种情况与事件中，得到更有益的思考。即便这些认同感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在艰难的选战中，或者当人口普查开始时，人们或许会受到刺激，支持一个特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但在其他时候，民族主义问题对他们的生活却影响甚小。除了上述同样的原因，这种认知也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从表达忠诚情绪或认同的举动，而不是人们固定的身份来思考，从而探讨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

“奥地利的动荡时刻”

对历史学家来说，民族主义者们偶尔能够为了某些特定议题组织起大量民众的事实会导致一个问题，因为这会让他们轻易做出这些民族主义者确实代表某些当时存在的民族发声的结论。[注]这使得我们更关注人数，而不是影响民主主义者认同感的情境和背景因素。1897年4月5日，帝国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Count Casimir Badeni，1846—1909）颁布了适用于波希米亚的语言条例，要求捷克语和德语成为内部公务系统所使用的两种平等语言。但帝国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者则坚持这个决定影响到了国内各地德语使用者的生活机会，而不仅仅在波希米亚一地产生影响。于是在包括布拉格、格拉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在内的一些城市，群众接连举行游行示威，发动骚乱，抗议这部法律的实行，从而导致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危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阿尔卑斯山区使用德语的各地市政府也强烈抵制这部条例。代表各个德语

区，被报纸煽动的政党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向他们的投票者做出不可动摇的民族主义承诺。政府顿时无法控制局面，巴德尼在6月2日关闭国会，但仍然无法阻止汹涌的反对浪潮。



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前加利西亚总督及奥地利首相。巴德尼的语言条例引起了国会内外一致抗议。由于他无力控制政局，在1897年辞去了首相职务。1895年，这张肖像照片由J. Henner制成英文雕版画（Private Collection / © Look and Learn / Illustrated Papers Collection / Bridgeman Images）

报纸争相报道这场大争论。其中的一个高潮（或低谷）来自登载在《德意志》（*Deutsche Volkszeitung für den Neutitscheiner Kreis*）上的一篇报道。5月12日，这份报纸头版头条登载了一篇题为“语言条例的第一个牺牲者”的报道，叙述了23岁的卡尔·布克曼在他父母的公寓内用猎枪自杀的惨剧。根据报道，这个年轻人只懂得德语而不通晓捷克语，他在

自杀前正试图谋求一个公务员职位，但因为担心新法推行后无法被录取而寻短见。在高层政治层面，事态的发展也同样糟糕。当新一个国会会议期于9月开幕时，激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卡尔·赫尔曼·沃尔夫（Karl Hermann Wolff，1862—1941）当场侮辱巴德尼，两人甚至付诸决斗。

此时政府还面临着来自皇帝的压力，皇帝要求他们在年底前完成与匈牙利之前约定的10年期协议。但是那些反对巴德尼的语言条例的人们用尽各种手段阻碍一切立法进程。于是政府采取了具有很大争议性的手段，通过了一部被称为“Lex Falkenhayn”的法律，改变了国会的议事程序。这部法律允许政府以强制手段迫使绝大多数有效的干扰措施无效化，政府确实这么做了。然而这部法律在奥地利城镇中引起了更激烈的街头抗议。1897年的国会会议期内，奥地利政府未能成功与匈牙利续订协议。巴德尼引咎辞职，按照宪法第14条规定，他的继任者则由皇帝敕令决定。

巴德尼危机在奥地利国会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但它并不意味着奥地利的制度遭遇了失败。反之，它表现出有更多人动员起来加入奥地利政治进程。人们进行抗议甚至发起骚乱，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的事件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在城镇中示威，尽管新语言法并不会动摇这些城镇的制度。这些人和1848年试图推翻国家政权的革命者不同，他们是议会程序的参与者。他们相信，巴德尼的所作所为或他的反对者的反应将威胁整个国家制度，因此才采取行动。因此，如今政治家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号召民众的支持。就在格拉茨或萨尔茨堡的示威者抗议将用于波希米亚的法律时，在波希米亚内部，事态的发展也令维也纳对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来说具有了相对的重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波希米亚变得全国瞩目。

因为语言或语言条例而不断上演的国会危机，以及所有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阻挠行为、议事障碍以及喧哗吵闹……是不是奥地利议会制政府根本失败的表现？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这样一场危机过后，人们在公共视线之外进行了许多幕后的谈判工作。洛塔尔·赫贝尔特（Lothar Höbelt）坚称，尽管民族主义者急于维护一个给予他们权利和影响力的体系，他们也最好不要公之于众。在波希米亚公共生活的良好运作方面，或许巴德尼的语言条例是必要的，但它们可能不会就这样通过立法，而是会受到基于一个民族权利的不公平攻击干扰。因此，这些条例

只可能经过政党之间的谈判才能通过，而不是越过它们直接立法。

在1897—1898年的一系列动乱之后，人们产生了一个共识。皇帝和他的高级官僚顾问们都亲身体验到在公众生活中产生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会带来怎样可怕的社会不稳定。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如何分散政治民族主义强大的动员力。之后10年，他们支持和鼓励地方政治人物做出结构性妥协的尝试，希望此举能够将民族主义议题从政治舞台中移去。1905年，最先一批三项妥协决定在摩拉维亚出现。摩拉维亚的妥协方案将摩拉维亚议会分割为捷克、德意志和大地主三个投票群，这就意味着这三类人将各自独立投票（大地主群体看上去不存在民族身份的问题）。而摩拉维亚的学校体系分割为捷克和德意志两块，其他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立法也同样如此。[注]之后在1910年和1914年，尽管地方的实际情况和人们实际考虑的问题塑造了彼此之间独特的形式，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也相继实行了类似的妥协方案。[注]

巴德尼危机同时还使皇帝对某些提议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包括声称全男性公民投票权可以分散民族主义，将权力授予基督教社会党甚至社会民主党等跨区域政党。而这些政党所关注的是更广范围内、适用于全奥地利的社会和经济议题。最后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巴德尼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由事件驱动或情势所迫产生的民族主义经典案例。在短短几个月中，这场危机就刺激了数千民众主动支持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并且在街头示威表达他们的态度。但这次民众动员主要依赖的是特殊的时间节点，在很短的几年中，与民族主义问题相关的利益（比如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数目）被显著削弱。民族主义者们持续面对但始终无法完全解决的挑战就是，如何让民众保持在对民族身份问题不断感到兴奋的状态。

就在前文所述的妥协方案有将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关联性移出日常生活的可能时，它们也给予政治活动家们强迫人们变得民族主义化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比如摩拉维亚的公民就需要登记为捷克或德意志民族。他们没有将自己定义为奥地利人、天主教教徒或者哈布斯堡效忠者这类身份的选择（这其中有一些人试图这么做过），而当他们选择了一个民族群体之后，也不能再进行改变。在摩拉维亚，妥协方案不但将人们分成两种民族群体，同时也把政府职能和服务（包括投票）分成了德意志和捷克两大类，相关的工作也自然倍增。摩拉维亚的民族主义者还增加了一部试图阻止人们把孩子送到教授与他们民族语言不符的“错误”学校，

但这项法律并不总是能成功执行。[注]而当人们发现自己受到强迫，他们就往往将争端诉诸法律。不过在进行民族主义和解谈判的几个州，法庭也越来越支持民族主义群体的主张而非个人的诉求。自由主义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语言权利在此逐渐被转换为民族主义共同体对它们的成员们的权利。这种逐步进行的法制转变是长久以来存在的文化争端达到高潮的表现：首先，个人会拥有一个基本且真实的民族主义认同感；其次，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文化鸿沟是不可跨越的。[注]

帝国的多元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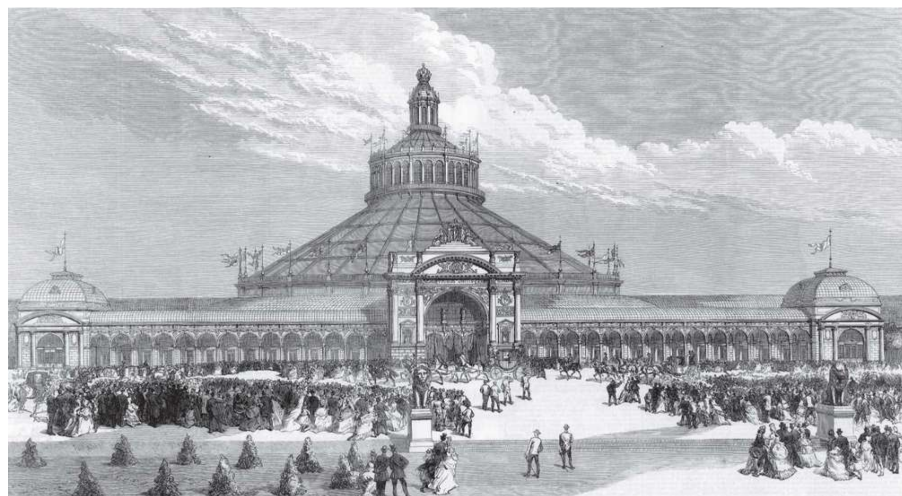
在公众对文化多样性的讨论和它们的民族主义政治寓意日渐增加之时，哈布斯堡王朝还在试图通过鼓吹帝国统一给各民族带来的好处，继续其统治的合法性。政府以我们之前读到的卡尔·佐尼格的三卷本《奥地利君主国民族志》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从政府自身的层面赞颂民族多样性，并把它看作有益于全体公民的一股力量。无论是从大众地理和科学出版物、人类学展览、民间艺术，还是公共建筑等方面，政府都描绘出一个帝国的愿景，用来在其文化各异的国民中强化大众的统一意识。

1866年，当奥地利失去它在德意志的传统霸权时，这个自由主义的帝国就开始在欧洲寻求一种新的使命感。因此19世纪70年代对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就为哈布斯堡王朝对欧洲，特别是直接面向东欧、南欧以及巴尔干的一种新的文化使命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使命感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重点落在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等地区推动文明开化的力量。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和1875年切尔诺夫策大学的建立是这期间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它们对奥匈帝国对东欧的新文化使命，以及多元合一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详细明确的阐述。

1873年5月1日，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主持了19世纪最盛大的世界博览会的开幕。规模宏大的博览馆坐落于维也纳普拉特公园，而为了此次盛事，公园特别进行了扩建和重修。维也纳世博会场馆占地面积约600英亩，是1867年巴黎世博会场馆面积的5倍，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那幢高262英尺、直径354英尺的高耸钢结构罗马式圆顶大厅。这座建筑就其本身大小来说就已经是现代技术达到的一个奇迹，不过它也

成为心怀疑虑的维也纳人怀疑的对象：有人曾预言，这座建筑沉重的结构将使它倒塌，或至少沉陷到地里。在这座建筑内部，25个国家向观众展示它们的科技和文化奇观，而在外面的194座大帐篷（它们中很多都由私人公司搭建）中，还有更多的展览供人观赏。

在出席博览会的皇室成员和地方显贵面前，皇帝的兄弟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在盛大的开幕式上强调，这次博览会将“确保人们对我们的祖国通过实际工作和指导，参与促进全人类福祉的认可”注。他的演讲把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观——人类的繁荣是通过工作与教育达到的——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自由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将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与贵族以及他们在宗教和民族主义方面的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展览宫罗纳托达圆顶大厅的宏伟入口。该图原载于1873年5月31日的《伦敦新闻》，随后被做成雕版画（Private Collection / © Look and Learn / Illustrated Papers Collection /Bridgeman Images）

不过奥地利在这一次世博会上扮演的独特角色，要比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对文化和技术成就的证言所表现出来的更多。世博会上的展品体现的技术奇迹，往往被理解为个别参展国的文化造诣。通过展示这些彼此相邻的文化成果，博览会的组织者邀请观众对参与博览会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当奥匈帝国走向技术进步时，它和当时的其他国家相比又如何呢？此外，世博会的组织者还积极地把奥匈帝国表现为一个联系东西方的文化桥梁，这从展会的空间布置和个别展示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独立的展区处在展馆中心的圆顶正下方，与德意志的各个展位在一起，沙俄、奥斯曼帝国、波斯、中国和日本的展位位于展馆东翼，而西边的位置则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巴西的展区。这种安排在来访记者和政治阶级之中强化了一种不断增长的意

识，即奥匈帝国在“后1866”时代的新角色，就是协调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当在自己的监护下统一德意志的努力失败后，帝国转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正统地位。当然，在观展的西方人眼中，中国、日本和波斯的纺织品无疑代表着东方文明的极高水准，而市场对这些纺织品和其他东方收藏品的需求更强化了这一点。不过，当时的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在指南针所指示的四个方向，有着不同的文明开化程度，世博会展位的安排秩序暗示了一种更文明的西方和北方可以把有用的知识与文化传播到较为落后的东方与南方的思想。报纸解读西方的展品时，认为它们在技术上更加先进，因此它们在文化上也更具有文化先进性，更有价值。注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展出的加利西亚农产品（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对参观世博会的奥匈帝国国民来说（尤其是那些城市居民），他们很难把这个广义的文明模式从全球的角度转换到帝国的地理层面。就在20年前，以佐尼格为代表的奥地利民族学家就已经强调，帝国范围内各地的教育与文化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主要源自不同的社会实际状况，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种族或民族差异。但是在1873年，就像马修·兰普利（Matthew Rampley）所提出的，博览会展示了中欧与东欧不同种类的农舍，就是考虑到文化差异的意义可能存在的其他效果。而另一方面，导览手册的解释又延续了佐尼格的传统，将农民文化的差异归结于地方

经济情况以及农民对其的顺应。然而许多参观者还是给出了其他关于文化差异的可能解释，这在文明水平较高的西方德意志农民房屋与东边的摩拉维亚以及加利西亚农舍进行对比时尤为明显，在场记者往往用落后、不卫生以及全然中世纪化的评语描述后者。而一些加利西亚与罗马尼亚报纸的记者看到这些对他们的农民文化的描述深感受到冒犯，他们争辩道，这把加利西亚和它的人民从一个相对于西方而言文化上较为落后的惨淡角度展示在人们面前。

由世博会展品激发的复杂可能性同时破坏和加强了社会中一系列层次差异的信条。如果西方国家可以向东方国家提供它们希望学习的文明有益之处，那么东方国家（按照佐尼格的推测）就会从本质上消除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信奉自由主义的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把他们自己视作一个国家中的优等民族，声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他们的语言，分享他们高度发达的文化（即接受文明的教化）成为民族中的一员。因此，关于文明差异的论述同样在博览会上强化了一种相反的印象，即东方需要文明教化，东方的各民族从根本上与西方的民族不同，因此他们终究不可能成为和西方民族类似的群体。

就像最后所证明的那样，维也纳世博会并不是奥匈帝国在国际上的一次胜利，不过这更多是因为商业上的因素，而不是因为帝国和其人民展示在国际视野中的面貌。差不多就在博览会开幕式之后一周，一场19世纪最可怕的股灾就将奥匈帝国以及绝大部分的欧洲拖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到了7月，在维也纳爆发的霍乱夺走了3 000条性命，也令更多游客避而远之。原本帝国预计世博会将带来2 000万游客，但等到博览会结束，实际参观人次不过只有700万。[注]尽管如此，维也纳世博会还是向人们表达了帝国将西方式文明输送到落后东方的深层愿望，不管这些人来自加利西亚、布科维纳，还是在国境之外更远的巴尔干地区，以及特别是5年之后奥匈帝国将占据的奥斯曼帝国的波黑，一概如此。

“半亚洲”的文明与自由主义的危机

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和匈牙利自由主义者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坚信不同民族的可完善性能够通过教育以及文化科技进步的应用得到发展。尽管它们的法律、制度和行政实践彼此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奥地利的政策致力于促进不同语言和民族之间平等的时候，匈牙利的政策

正在推行让其他民族同化为匈牙利民族的进程——但是无论是奥地利还是匈牙利，都没有在它们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中提到民族之间的差异。

在奥地利，由于自由主义者对教育促进人类完善的认可，以及对德意志文化具有无可争议的工具性优越地位（哪怕是过于傲慢而产生的优越感）深信不疑，帝国50年来第一所新大学在1875年建立。那么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政府决定将这座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命名的新大学安置在哪里呢？他们最后选择了布科维纳的首府切尔诺夫策，一座差不多拥有25 000人的城市。布科维纳是全帝国经济上最贫困、识字率最低的省份，而切尔诺夫策则是全帝国各州首府中最东边的一个。这个时期，捷克民族主义者不断游说政府在布拉格或奥洛穆克设置一所以捷克语授课的大学，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为的里雅斯特的大学开设一个新的意大利语法律专业，此外，这两拨人都不断强调本“民族”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拥有的文明水平，以合理化自己的要求。尽管如此，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政府和皇帝还是一致同意先在奥地利最东边的州建立一所德语授课的大学，这个州拥有庞大的文盲人口，而且语言成分非常复杂，鲁塞尼亚语、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德语和波兰语都是当地人会使用的语言。[注]

这所新大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位来自布科维纳的自由主义派国会代表——贵族地主康斯坦丁·托马斯丘克（Constantin Tomaszcuk / Tomasciuc）孜孜不倦的游说。他坚称，在东边设立一所新大学将对帝国起到强大的整合作用：

> 奥地利的统一建立在面向大众的教育之上，通过接受教育，人们可以出人头地。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大众教育以及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就可以产生出奥地利的政治民族性。

托马斯丘克还为新大学使用德语作为教学语言的选择辩护，强调在帝国范围内，只有“设立可以广泛申请的德语奖学金，才能对布科维纳的非德语族裔学生产生普遍的意义，促使他们申请德语大学”。针对那些抗拒这一选择的民族主义者，托马斯丘克还补充道：“愿那些害怕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遭殃吧！它们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注]而同时，这所新大学还设立了全奥地利第一个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的语言与文学教授职位。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大学于1875年10月正式开学招生，这时恰逢布科维纳并入奥地利的百年庆典，以及皇帝在1873年的登基25周年纪念。在一篇题为“一场文化节日”（Ein Culturfest）的文章中，自由主义记者兼随笔作家卡尔·埃米尔·弗兰佐斯（Karl Emil Franzos，1848—1904）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新大学的开幕仪式，将其比拟为一个团结的节日：“所有在布科维纳互相争斗的因素，只有在一个特别要素不断起到作用时才能彼此和平相处，而这个要素就是德意志化。”弗兰佐斯还补充说，“德意志化”并不是“压迫其他民族主义者，而是给予他们一个统一的协调点”注。



绘有切尔诺夫策大学主建筑的明信片（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弗兰佐斯在当时撰写了一系列展现了东欧犹太人生活而广受好评的故事与评论，由此声名鹊起。作为一个曾在德意志求学的犹太医生之子，弗兰佐斯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长大，并且在1867年毕业于切尔诺夫策的一所由德语授课的预科学校。在维也纳和格拉茨接受了法律学习之后，他加入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联谊会Teutonia，并且为《新自由报》和《*Pester Lloyd*报》供稿。1876年，弗兰佐斯在帝国东部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故事集，这部作品有个生动的题目：“来自半亚洲”（Aus Halbasien）。弗兰佐斯给予了“半亚洲”这个词文化上的定义，他把它在地理上描述为位于“西里西亚边境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一片荒原，在那里“欧洲式的教育遭遇了亚洲式的野蛮，欧洲迈向进步的努力遭遇了亚洲式的懒散，欧洲的人道在民族性和宗教上都与残酷的亚洲产生了冲

突”。(注)弗兰佐斯对德意志文化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他认为它是一种文明和统一的原动力，这一点在他的故事《席勒在巴尔诺》（*Schiller in Barnow*）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故事讲述了在一座加利西亚小镇上，通过阅读席勒的诗歌《欢乐颂》（*Ode to Joy*），让镇上的一个波兰人、一个鲁塞尼亚人以及一个犹太人产生了友谊，并认识到他们共同的人性。

在他的另一篇随笔《从维也纳到切尔诺夫策》（*From Vienna to Czernowitz*）中，弗兰佐斯描述了他前往布科维纳参加新大学开幕式的旅程，以及他穿越加利西亚茫茫无尽、凄凉孤寂荒原的那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火车之旅。但当他乘坐的火车进入布科维纳境内，到达切尔诺夫策时，弗兰佐斯的情绪瞬间为之一变。弗兰佐斯对这次探访的记录包括了自然描写和道德上的观察。在作家的慧眼下，文明对当地景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荒原已经逐渐被我们抛在脑后，而前方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带则逐渐从地平线升起，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越过白浪翻滚的普鲁特河，进入布科维纳这片受到祝福的土地。我们可以看到，比起加利西亚，当地的土地得到更好的耕耘培育，农舍看上去也更加舒适清洁。一个小时后，火车抵达切尔诺夫策火车站。这是一座高海拔的美丽城镇。

在弗兰佐斯的记录中，来到帝国最东边的州首府城市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体验。作家感官体验到的证据与帝国的自然地理产生了矛盾，他这样写道：“任何来到切尔诺夫策的人，都会奇怪地乐观起来：他仿佛突然回到了西部，他可以在这里发现教育、文化以及雪白的台布。”要怎么解释这个“难解之谜”呢？弗兰佐斯继续说：

> 如果这个人想知道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契机，他就必须注意到当地居民所说的语言，他们说的是德语……德意志精神，就是日光下最强大也是最佳的魔术师，正是这个魔术师——也只有这个魔术师——在这个半亚洲的文化沙漠中心种下了这朵盛开的欧洲文明之花！(注)

弗兰佐斯得以乘坐火车完成这次布科维纳之旅，很大程度上要感谢

利沃夫–切尔诺夫策–雅西铁路公司的努力。这家公司在1864年从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政府处得到了一份有利可图的特许，用来建造连接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首府的铁路。一旦这条铁路在1866年通车，人们就可以一路从维也纳乘坐火车到达切尔诺夫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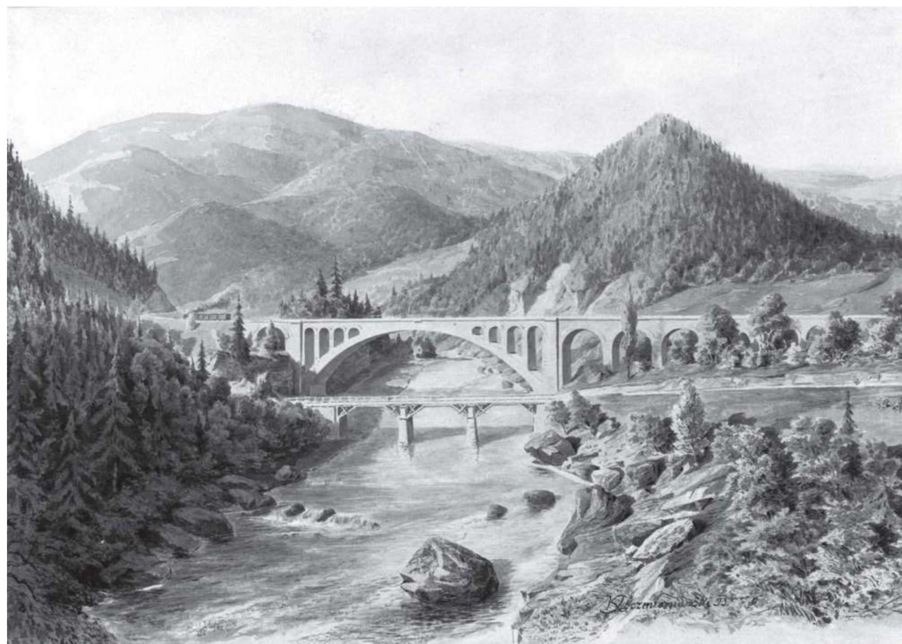


利沃夫火车站主广场，建筑为新艺术风格的车站开放于1904年，设计师为Władysław Sadłowski。这座新车站替代了1861—1862年兴建的哥特式风格的老火车站（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然而在1871年，就在弗兰佐斯陶醉地描述穿越普鲁特河之旅的几年后，河上的铁路大桥坍塌了。针对此次事故的调查迅速展开，对利沃夫–切尔诺夫策–雅西铁路公司的投诉也渐次出现，揭露出这家公司在建造铁路时偷工减料的行为。于是国家在调查期间扣押了据说有道德败坏行为的董事会主席维克托·冯·奥芬海姆男爵（Baron Viktor von Ofenheim）。1875年1月，内阁以腐败的罪名对奥芬海姆提出指控。控方声称，从公司建立起，奥芬海姆就挪占了大量资金，并且欺骗公司股东。政府还指控奥芬海姆建立了一个傀儡董事会，其成员完全没有起到监管责任，而是沦为执行奥芬海姆每一个决定的“橡皮图章”。而为了换取他们的服务或者说合作，每位董事都得到了超过10万盾的报酬。

庭审的结果造成了耸人听闻的丑闻，它显示出19世纪70年代，在奥地利的自由主义统治阶级中，腐败行为已经迅速成为一种常态。在诉讼

过程中，控方召唤前内政大臣卡尔·格斯科拉作为证人。事实最终证明格斯科拉名列董事会成员，他收受了10万盾的贿赂，也没有为公司股东负起监管的义务。这位前内政大臣兼1848年革命的英雄辩称自己无罪，但是在严密的盘问下开始变得慌乱，以至脱口而出庭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他提到那10万盾，称在奥地利，“接受奖金是一种习俗”[注]。



横跨普鲁特河的铁路桥，这条河流从亚列姆切（Jaremcze / Yaremche）附近奔流而过。这一画作由（Karl Jeczmieniowskihui）于1893年绘制，收录于1898年加利西亚“皇储的项目”（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最后法庭判奥芬海姆无罪，这个判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爵成功地将指控和审问转化为商务大臣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然而这次事件对政府公信力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特别是庭审紧接着1873年的股灾，其影响就更加恶劣。在70年代早期，无数小投资者被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股票市场产生的巨额利润推动，将自己的养老金和毕生积蓄都投入了各式各样已经膨胀泡沫化，甚至有一些只存在于纸面的投机贸易之中，随后到来的股灾摧毁了这些人的一切。而内阁面对股灾受害者却无能为力，因此许多受害者愤怒地将一切归咎于自由主义。于是在股灾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一年之后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的奥芬海姆一案之中，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在公众中已声名狼藉。[注]

有人或许会争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自由主义文明带来的有益

之处，也被暴露在帝国中心的公众怀疑之下。不过从象征的方面，肮脏的奥芬海姆一案也给自由主义在奥地利东部——据说在自由主义文化的传播中收益最多的地区——取得的成果带来了怀疑。这样看来，似乎文明已经不是西方带给东方的唯一“礼物”。自由主义者们同样把东方变成了一个腐败横行之所、施行傲慢欺诈的地方，以及更糟的是，他们让它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产物。弗兰佐斯和其他观察家后来也确认了这个事实，为切尔诺夫策的新大学的教育情况撰写了许多失望的批评。最终，自由主义显示出它也不过是一个宗派性更强的政党，或者只是一套以社会中一部分为代价，有利于其他部分奥匈帝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从此再也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主张唤起大众的热情了。

不过自由主义用来包装自己，并且希望可以覆盖东方的文明外衣并不会就此无人继承。如果说它和之前有什么区别的话，针对东方和南方的文明使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宗教活动家、精英自由主义者以及哈布斯堡王朝本身都宣称对其拥有所有权的，帝国使命中一个更强、更广义，也更受大众欢迎的部分。

“皇储的项目”

1885—1907年，奥匈帝国政府资助了一部24卷百科全书的出版（其中21卷用匈牙利语撰写）。这部百科全书的名称是“奥匈帝国图文实录”（*Die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Monarchie in Wort und Bild*），但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皇储的项目”。这是因为这项大工程在1883年受到了皇储鲁道夫的启发，后者在其去世之前，还在1889年为这部系列丛书撰写了引言。帝国邀请了432位专家就各州的植物、动物、地质学和人种学的特征撰写文章，交给两个不同的编委会——一个负责奥地利版本，而另一个负责匈牙利版本。“皇储的项目”意在为广大订阅读者记录帝国各州地理文化多样性的科学常识。不过这种多样性也为哈布斯堡王朝推行教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合理性，在这套丛书的关于人类学与经济部门的几卷中，这种情况体现得特别明显。差不多10年前，维也纳世博会上的展品就承担着这种隐性而又矛盾的工作，如今它被撰写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继承了下来。在书中，帝国各民族毫无疑问在文化上互不相同，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外部的服饰与装饰品上。当时的艺术家们为百科全书中的帝国各民族绘制了画像，人类学

家也对这些民族进行了分析，它们都显示出民族差异来自种族的特性，罗姆人的案例，以及一些巴尔干和东方民族例子特别确定了这一点。

在这里读者们不免要产生疑问，究竟帝国有没有培育文明、促进经济发展和鼓励教育的能力，令这些民族最终能与其他民族处在同等的位置，就像我们之前读到的佐尼格的民族学著作中所描写的一样；还是说，这些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能克服的，他们的能力也逊于其他民族。

“皇储的项目”同时还表现出奥匈帝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若干分支中的科学家们试图展现出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广大且多样化领土的潜在逻辑，正如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特性促使他们的研究成型。就像专研科学史的历史学家德博拉·科恩（Deborah Coen）富有独创性的精彩著作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科学家所在的领域将它们的存在归因于思考空间、气候和天气模式的帝国方式。

“行政管理是我们唯一的政治策略”

1895年，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兼波黑行政长官本杰明·冯·卡洛伊（Ben ja min von Ká l la y，1839—1903）在一份英国报纸的访谈中，用这样的语言总结他在当地负有的国家使命：“保持当地古老传统的活力，同时用现代的理念净化它。”他还补充道：“奥匈帝国是一个伟大的西方帝国，它肩负着将文明传递给东方民族的使命。”

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邻近的奥斯曼帝国内部叛乱，奥匈帝国占据了一部分奥斯曼帝国领地，成为一个殖民大国。奥匈帝国对原属奥斯曼帝国的波黑长达30年的占领，给予官员、理论家、地图绘制者、各类技术人员、教师和神父（他们尤其如此）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实现帝国在欧洲的新教化使命。与此同时，奥匈帝国统治波黑的经历，在自由主义运动陷入政治泥潭很长一段时间后，造就了围绕着自由主义文化理念的一种一致意见。许多人把波黑当作一个实现自身抱负的机会，而对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来说，这也是实现他们民族运动目标的机会。

1878年，当奥匈帝国军队侵入邻国奥斯曼帝国领土，镇压波黑当地的叛乱，并抢先一步阻止沙俄干涉的时候，这支部队最终的结果是驻扎

在了这片土地上。随后的《柏林协议》确认了奥匈帝国占据奥斯曼帝国这两个省份的合法权利。之后的30年间，奥匈帝国的联合财政大臣就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统治波黑被殖民的原居民。就像前文中那位最著名也最活跃的总督所说的那一番话所表达出的，占领波黑正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自由主义殖民帝国各种准则的缩影。

奥地利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一则面向波黑人的公告中这样解释，“在他的强权庇护下，各民族生活在一起，所有人都得以自由信奉宗教”，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还宣布“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子民在法律面前一概平等”。[注]他这么做，向波黑人传达了100多年前约瑟夫二世希望向加利西亚与布科维纳人传递的信息。和早先的帝国殖民尝试相仿，这次的殖民计划试图稳定并改造波黑社会，在引入现代革新的同时强化波黑传统社会，使当地保持稳定与平静。波黑的殖民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自由主义者、天主教活动家以及斯拉夫民族主义政治家的通力支持，这几方人士都认为占领这两个地区，无论对波黑还是帝国都有益处，当然，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根据一位天主教政治家的说法，帝国的这次入侵通过创造一个“颇具成效的和平”，“促进了人道和文明的事业”。另一位天主教活动家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文化要如何植入波黑”的作品。而一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代表坚持，只有教化的使命，才能令这次占领行动合情合理。[注]

从法律地位平等到教育和技术现代化，在付出不太高昂的代价之后，所有这些文明开化带来的好处以一个理想的速度授予处在帝国保护下的人们。同时，奥地利被证明对待所有语言和宗教群体一视同仁，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哈布斯堡王朝多民族的理念超过种族民族主义，成为取得社会进步的最佳工具。[注]一个从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层面理解的文明教化使命向欧洲东部的有效传输，正代表了一种经过改革的奥匈帝国理念达到了它的高潮，而这种理念所正式把传播理念到国境之外列为了自己的工作任务。虽然传统的哈布斯堡王朝理念针对的是中欧地区，但它的主张是可以通用的。在19世纪70年代，正如我们所见，它成为一种将欧洲价值观传播到东方的观点。波黑尽管实际上位于奥匈帝国的南部，但从精神地图上，它正位于人们观念中的东方。

就在奥匈帝国军队穿过萨瓦河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时，一批行政官员也跟随着军队的脚步，向帝国的新臣民宣传诸如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平等之类的自由主义殖民讯息，接着他们立刻着手通过一种由自由主义准

则和猜想形成的“镜片”来解读波黑社会的需求。波黑的新管理者们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他们在当地面对的语言和宗教多样性。从宗教角度来说，本地人有40%信仰东正教，35%是穆斯林，剩下25%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而从语言层面，所有这些宗教徒群体都使用一种语言。在社会层面，当地主要为农业人口，大多数的土地掌握在穆斯林地主手中。哈布斯堡的管理者试图在波黑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它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可以展示出哈布斯堡的文明教化使命正在成功发挥作用。同时，殖民地政权希望避免政治民族主义带来的危险，它在19世纪晚期越演越烈，困扰着奥匈帝国社会。

不断增长的统一动力而产生的困难和差异导致了帝国国内的这些问题。帝国和民族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殖民地尤其如此。教育在让特定的文化差异逐渐政治化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的帝国秩序下产生出一种本土意识。譬如引进波黑的教育工作者往往是能够说当地语言的教士，这通常意味着这些教师很可能也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或者他们是试图为波黑穆斯林创造一个无民族倾向的波黑认同感的政府官员。注

*

1900年，就在民族主义的文化差异观点盛行于公共机构并主导了政治时，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却仍然限制在几个特定的场合。即便在民族主义者自己看来，他们缔造民族的努力最多只多成功了一部分。此外，很多激发起民族主义认同感的场合，民族主义活动同时也能够激起人们对帝国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忠诚之心。

到了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帝国的理论家为了保持一致，越来越依赖彼此。“民族身份”和“帝国”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互相对立，或者是一组具有二元性的概念和政治目标，它们因为一种可解释的一致性而彼此依赖。这二者利用了相似的语言和相似的理念。帝国的宣传人员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展览和出版物中使用民族主义的概念，这同样给予我们一个信号，民族主义政治语言已经变成一个广大（如果不用空洞或不确定来形容）的容器，用来容纳一系列理念、计划和目标，而它们有很多也在为帝国的计划服务。设立文化和民俗博物馆的帝国行政官员鼓励能够有力地模拟出早期民族主义世代的人类学和考古学项目，不过他们

的目的不是鼓励民族主义的宗派思想，而是把地方民族主义和对帝国的忠诚联系起来。

因此，我们很难判断民族主义政治冲突在事实上是削弱了帝国的组织架构，还是正相反。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确实改变了这个帝国。到了1900年，这个国家往往把民族主义看作潜在的威胁，但即使当时许多观察家这么认为，这个威胁却并不针对君主国的存在本身。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是强迫国家在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改革上对他们妥协。

---

1. 在奥匈帝国两边国家实施的官方人口普查（在下文中会更详细地进行阐述）明确了帝国范围内各民族的官方语言种类：捷克语（1880年后指代波希米亚– 摩拉维亚– 斯洛伐克人使用的语言）、德语、意大利语（1880年后表述为意大利– 拉地诺语）、马扎尔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鲁塞尼亚语（乌克兰语）、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有时它们会被分开）和斯洛文尼亚语。但这个列表并没有完全列出在帝国范围内使用的语言种类。不少帝国公民使用的是人口普查专家称为“地方语言”或“方言”的语言，例如蒂罗尔使用的拉地诺方言、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地区使用的意第绪语，或者在摩拉维亚的一部分地区和上匈牙利使用的摩拉维亚方言。See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3, DieVölker des Reiches, ed. Adam Wandruszka and Peter Urbanitsch (Vienna: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1980), table appearing between pages 38 and 39.

2. Oscar Jászi,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我们发现一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表述不同的观点，1918年之后，许多以理论家身份为取代帝国的那个国家服务的历史学家、记者和政客为了树立后者的合法性，试图在某种观点的基础上将他们的存在正当化——单一民族国家是国家政治地位最现代且最适合的基础。在这个理论下而民族需要建立它们自己的国家，这些人非常热衷于把帝国在政治上的软弱与它多民族的人口状况结合起来。

3.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这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观点：在19世纪，只有少数法国国民能够说法语，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兰西民族，是通过学校、兵役制度和铁路等中央国家机制建立起来的。

4. 人们可以对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完全不同的发展状况提出一个类似的观点。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一个帝国国民的概念已经产生，而几个世纪以来让宗教差异和公共生活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种族意识和公共生活中的宗教冲突的米利特制度也在不久前崩溃。See for example, Michelle U. Campos, Ottoman Brothers: Muslims,Christians, and Jew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alestine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71–73; 87–92.

5. See the essays by Rogers Brubaker,“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Identity” (with Frederick Cooper),“ Ethnicity as Cognition,” and“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in his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115.

6. 杰拉德·斯托茨（Gerald Stourzh）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进行的法律和司法行政方面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7. Kikeriki, 9 January 1868, 1.

8. 留着鬓角但是刮净下巴的这种面部毛发处理式样在当时是被帝国政府所接受的（只要想象一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本人的肖像就能对其有所了解），而大胡子是不被接受的式样。关于皇帝和巴赫对此的排斥（以及刮净下巴的问题）见Ernst Hanisch,“Der Verlust der Bärte.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Wendehälse,” in“ Dürfen’s denn das?” Die fortdauernde Frage zum Jahr 1848, ed. Sigurd Paul Scheichland Emil Brix (Vienna: Passagen Verlag, 1999), 249–253, especially 250。

9. 这6位所谓的“下议院议员”分别是来自下奥地利的约翰·N. 贝格尔（Johann N. Berger，他是不管部大臣）、下奥地利人鲁道夫·布雷斯特尔（Rudolf Brestel，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摩拉维亚人卡尔·格斯科拉、教育和宗教大臣波希米亚人利奥波德·冯·汉泽尔（Leopold von Hasner）、司法大臣波希米亚人爱德华·赫布斯特（Eduard Herbst），以及商务大臣伊格纳茨·冯·普莱纳，虽然普莱纳身在下议院却拥有贵族头衔，但他的家族在13年前才成为贵族。内阁中的贵族则是信奉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时任首相的卡尔·奥尔斯伯格亲王（Prince Karl Auersperg）、任农业大臣的加利西亚保守主义者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伯爵（Count Alfred Potocki），以及皇帝的朋友——时任内阁副主席和战争大臣的爱德华·塔菲伯爵（Count Eduard Taaffe）。

10. Konstitutionelle Vorstadt-Zeitung, 21 December 1867.

11. The quotation is from the program of the Liberal Political Association of Linz. See Kurt Wimmer, Liberalismus in Oberösterreich am Beispiel des liberal-politischen Vereins für Oberösterreich in Linz 1869–1909 (Linz: Oberösterreichischer Landesverlag, 1979), 172.

12. St. Pöstener Wochenblatt, quoted in Erhard Unterberger,“ Der Liberalismus in St. Pölten (1870–1918)”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enna, 1966), 32.

13. Adolf Promber in Politischer Volkskalender für 1878 (Klagenfurt and Villach, 1877), 1–5.

14. On this Kulturkampf especially in Tyrol, see Laurence Cole, “The Counterreformation’s Last Stand: Austria,” in Culture Wars: Secular- 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Christopher Clark and Wolfram Kais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5–312.

15. Carl Schorske, “The Ringstrasse, Its Critics, and the Birth of Urban Modernism,” in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24–115; Nemes, The Once and Future Budapes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7–129; 158–166; Peter Hanak, “Urba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Vienna and Budape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Garden and the Workshop: Essays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Vienna and Budap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3; Markian Prokopovych, Habsburg Lemberg: Architecture, Public Space, and Politics in the Galician Capital, 1772–1914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3–100; 157–196; Nancy M. Wingfi eld, Flag Wars and Stone Saints: How the Bohemian Lands Became Cze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47; Cathleen Giustino, Tearing Down Prague’s Jewish Town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2003). On the liberal cult of Maria Theresa and the erection of monuments to her in Vienna and elsewhere in the empire, Werner Telesko, Maria Theresa. Ein europäischer Mythos (Vienna: Böhlau, 2012), 129–176.

16. Werner Telesko, Kulturraum Österreich. Die Identität der Regionen in der bildenden Kunst des 19. Jahrhunderts (Vienna: Böhlau, 2008).

17. Cole,“ The Counterreformation’s Last Stand,” 295–296.

18. Ibid., 293–294.

19. 从此之后，教会可以控制的就只有奥地利小学中强制要求修读的宗教课程。皇帝十分不情愿地签署通过了这项给予罗马天主教会沉重打击的法律。关于新法和它们引起的反应，见Karl Vocelka, Verfassung oder Concordat? Der publizistische Kampf der österreichischen Liberalen um die Religionsgesetze des Jahres 1868 (Vienna: Verlag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8)。

20. Cited in Max Vögler,“ Similar Paths, Different‘ Nations’? Ultramontanisation and the Old Catholic Movement in Upper Austria, 1870–71,” in Different Paths to the Natio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Central Europe and Italy, 1830–1870, ed. Laurence Co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84.

21.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国民内阁”中的密友——爱德华·塔菲伯爵十分不赞成地向他报告了此事。

22. 来自1867年10月18日的维也纳报纸《晨报》（Morgenpost）的一篇文章，引自Vögler,“ Similar Paths, Different‘ Nations’?,” 184。

23. Kai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in Galizien. Über Zugehörigkeit und soziale Emancipation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k & Ruprecht, 2005), 296.

24. Cole,“ The Counterreformation’s Last Stand,” 294. 新法对个别议会在如何实施学校法、如何决定学校资助方案，以及如何创建地方学校校董会等方面留有一定的余地。鉴于神职人员主导的地方校委会直到1910年为止，都拒绝为教师提供薪水，蒂罗尔的教师队伍仍然以神父为主。

25. 关于圣心崇拜，见 Cole,“ Für Gott, Kaiser und Vaterland,” Nationale Identität der deutschsprachigen Bevölkerung Tirols, 1860–1914 (Frankfurta / M: Campus, 2000),139–224。关于奥地利的朝圣，见 Alison Frank,“ The Pleasant and the Useful:Pilgrimage and Tourism in Habsburg Mariazell,”AHY 40 (2009): 157–182。如果将奥地利的情况与文化战争时期德意志的天主教大众文化做对比，可见David Blackbourn, 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4); Jonathan Sperber, Popular Catholic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Prince 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6. Laurence Cole, “Patriotic Celebrations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yrol,” in Staging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 in Habsburg Central Europe, 1848 to the Present, ed. Nancy Wingfield and Maria Bucu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0.

27. For the text of the Syllabus, see http://www.ewtn.com/library/PAPALDOC/P9SYLL. HTM.

28. Cole,“ The Counterreformation’s Last Stand,” 287–289; Nicholas Atkins and Frank Tallett, Priests, Prelates and People: A History of European Catholicism since 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0. See also Max H. Vörler,“ Religion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in the Habsburg Hinterl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Upper Austria, 1850–1914”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introduction.

29. Quoted in Wilhelm Wadl, Liberalismus und soziale Frage in Österreich.

Deutschliberale Reaktionen und Einflüsse auf die frühe österreichische Arbeiterbewegung (1867–1879)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1987), 52.

30. Vögler,“ Similar Paths,” 184. Pieter M.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Liberal Politics, Soci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ustrian Empire, 1848–191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34; Cole,“ The Counterreformation’s Last Stand,” 302.

31. Vögler,“ Similar Paths,” 185–186.

32. Ibid.

33. 自由主义的教育和宗教大臣卡尔·冯·施特雷迈尔（Karl von Stremayr，1832—1904）解释新规定已经把一个陈旧的、成为历史且有很多限制的教皇权威概念，代之以一个“无限且不受约束”的新概念（Wiener Zeitung, 2 August 1870, cited in Vögler,“ Similar Paths,” 189）。

34. Francis Josef Rudigier, Über die Unfehlbarkeit des Papstes und die Liberalen (Linz, 1870), quoted in Vögler,“ Similar Paths,” 191.

35. 在奥地利的一些地区，冲突导致几百人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没有变为新教徒，而是加入了所谓的“老天主教教徒”运动，这个教派否定了“教皇无谬误”，反而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在这些年内，只有很少的人成为新教徒，但这一事实并没能制止鲁迪杰尔这样的激进教皇绝对权力论者把“老天主教教徒”们蔑称为“新的新教徒”。

36. Neue Freie Presse, 14 December 1871, 1–2. The incident is also mentioned in Walter Rogge, Österreich seit der Katastrophe Hohenwart-Beust, 2 vols. (Leipzig & Vienna: Brockhaus, 1879), 1:9.

37. Wimmer, Liberalismus in Oberösterreich, 194 n.2; Vögler,“ Similar Paths,” 184–185.

38. Wimmer, Liberalismus in Oberösterreich, 30. 在1870年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人士就已经赢得了所有的乡村选区，甚至还夺下了一个城市选区，令自由主义者们大为震惊。有关自由主义者对天主教社团势力兴起的忧虑，见《德意志日报》（Deutsche Zeitung）与1871年12月22日《晚报》（Abendblatt）上比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社团增长的文章。

39. Vögler,“ Similar Paths,” 193.

40. Neues Wiener Tagblatt, 15 October 1868.

41. Für Das Volk, 20 May and 5 June 1868; [Wilhelm Angerstein], Österreichs parlamentarische Grössen (Leipzig: Fr. Luckhardt, 1872), 20; Wadl, Liberalismus, 62.

42. Neue Freie Presse 13, no. 5 (1868): 1, quoted extensively in Wadl, Liberalismus und soziale Frage, 62.

43. Excellent examples from Wadl, Liberalismus, 159, 161.

44. From“Die Volkswirtschft und die Volksschule,” in Der österreichische Ösonomist no. 32, (1869), quoted in ibid., 161.

45. On suff rage, see the works of Birgitta Bader-Zaar, including“ Women in Austrian Politics, 1890–1934: Goals and Visions,” in Austri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 David Goode, Margarete Grandner, and Mary- Jo Maynes (New York: Berghahn, 1996), 59–90;“ Rethinking Women’s Suffra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ntanglements of Property and Gender in the Austrian Half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Swede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Constitutionalism, Legitimacy, and Power: Nineteenth-Century Experiences, ed. Kelly Grotke and Markus Pruts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7–126; See also these three articles: Renate Flich, "Bildungsbestrebungen und Frauenbewegungen""'Arbeit, Recht und Sittlichkeit'—Themen der Frauenbewegunge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and Bader-Zaar, "Frauenbewegungen und Frauenwahlrecht," all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8, Politische Ödfentlichkeit und Zivilgesellschaft, ed. Helmut Rumpler and Peter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06), 941–1028. On specifically Viennese women's movements, Harriet Anderson, Utopian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s in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on bourgeois and working-class women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Galicia see the highly innovative work by Dietlind Hüchtker, Geschichte als Performance. Politische Bewegungen in Galizien um 1900 (Frankfurt a/M: Campus, 2014); for a survey of failed women's suffrage efforts in Hungary (after 1900), Judit Acsády, "The Debate on Parliamentary Reforms in Women's Suffrage in Hungary, 1908–1918," in Suffrage,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s, eds. Irma Sulkunen, Seija-Leena Nevala-Nurmi, Pirjo Markkol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242–258. On general women's movements in Hungary, Susan Zimmerman, "Frauenbewegungen und Frauenbestrebungen im Königreich Ungarn,"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8,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Zivilgesellschaft, 1359–1491.

46. On Fickert, see Renate Flich, "Der Fall Auguste Fickert— eine Wiener Lehrerin macht Schlagzeilen," Wiener Geschichtsblätter 45, no. 1 (1990): 1–24.

47. For example, Jiří Malř," Die Teilnahme von Frauen an den Ergänzungswahlen in den mährischen Landtag 1865," in Magister noster. Sborník statí věnovanych in memoriam prof. PhDr. Janu Havránkovi, CSc. (Festschrift in Memoriam Prof. PhD Jan Havránek), eds. Michal Svatoš, Luboš Velek, and Alice Velková (Prague: Karolinum, 2005), 419–432.

48. Examples cited in Pieter M. Judson,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German Nationalism, 1880–1900," in Austrian Women, 1–17, and in Bader-Zaar," Women in Austrian Politics." Kopp quoted in Stenographische Protokkole des Landtages für das Erzherzogthum Österreich unter der Enns, 11 June 1889.

49. Milica Antic Gaber and Irene Selisnik," Sloven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ulkunen, Nevala-Nurmi, and Markkola, Suffrage, Gender, and Citizenship, 219–242. 在匈牙利，1886年的法律限制了全民投票权，但是允许妇女有产者通过男性代理人投票的权利。Acsády, "The Debate on Parliamentary Reforms," 242.

50. Judson, "Gendered Politics"; Heidrun Zettelbauer, "Die Liebe sei Euer Heldentum." Geschlecht und Nation in völkischen Vereine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Frankfurt a/M: Campus, 2005).

51. Gerald Stourzh, 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Nationalitäten in der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Österreichs, 1848–1918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1985), 200–201.

52. See especially Stourzh, Gleichberechtigung; also his“ Ethnic Attribution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Good Intentions, Evil Consequences,” in From Vienna to Chicago and Back: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57–176; Hannelore Burger, Sprachenrecht und Sprachengerechtigkeit im österreichischen Unterrichtswesen, 1867–1918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5); Jeremy King,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A Local History of Bohemian Politics, 1848–19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53. Tara Zahra argues this forcefully in Kidnapped Soul: National Indifference and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4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especially 13–78.

54. 这些改革中的第一项动作，规定人们可以直接选举国会代表，而不必经由地方议会遴选人选。剩下其他的改革则是扩大了议会选举权的范围。William Jenks, The Austrian Electoral Reform of 1907(NewYork: Octagon Books, 1974), 15–26.

55. Quoted in Daniel Unowsky, The Pomp and Politics of Patriotism: Imperial Celebrations in Habsburg Austria, 1848–1916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9–50.

56. 在之前的20年，政府在加利西亚的高级中学和大学机构内强制推行作为教学语言的德语，许多加利西亚的行政机构同样使用德语交流。至于自治安排的相关内容，见 Alison F.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5–37;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ie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605–606。

57. Quoted in Gustav Kolmer, Parlament und Verfassung in Österreich, 8 vols. (Vienna and Leipzig: Fromme, 1900–1914), 2:122;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169.

58. Paul Molisch, Briefe zur deutschen Politik in Österreich von 1848 bis 1918 (Vienna: Braumüller, 1934), 71;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170.

59. For these and other examples, see Andrej Rahten, “Vom Primus zum Volkstribun. Die slowenischen Parlamentarier in den Parlamenten der Habsburgermonarchi,” in Hohes Haus! 150 Jahre moderner Parlamentarismus in österreich, Böhmen, der Tschechoslowakei und der Republik Tschechien im mitteleuropäischen Kontext, ed. Franz Adlgasser, Jana Malínská, Helmut Rumpler, and Luboš Velek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15), 188–190.

60. On Stojatowski and his radicalization, see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192–201. On the general question of peasant challenges to establishment Polish nationalists in Galicia, see also Keely Stauter Halsted,“ Rural Myth and Modern Nation: Peasant Commemorations of Polish National Holidays, 1879–1910,” in Staging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 in Habsburg Central Europe, 1848 to the Present, eds. Nancy M. Wingfield and Maria Bucu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3–177.

61. Joshua Shanes, Diaspora Nationalism and Jewish Identity in Habsburg Galici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62. Robert Nemes,“ The Uncivil Origins of Civil Marriage: Hungary” in Culture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Christopher Clark and

Wolfram Kais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3–335.

63. Quoted in ibid., 327.

64. Ibid., 333.

65. 有关维也纳的反犹主义和奥地利西部的社会天主教徒，见John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1848–189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and Culture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Vienna: Christian Socialismin Power, 1897–191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Boyer从工具性的角度来审视Karl Lueger的反犹主义，不过这未能打消反犹主义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选区受到的普遍欢迎。

66. 1884年，奥地利最高行政法院颁布了一条规则，决定了国家和地方社区有义务支持少数民族学校前提是，一个社区是否应该首先建立一所学校。只要在5年内，社区2个小时的步行里程范围中平均有40个学龄儿童，就可以获批建立一所公立少数民族学校。Burger, Sprachenrecht und Sprachgerechtigkeit, 100–110.

67. 在6年学习生涯结束后，每个匈牙利孩子都还要接受3年的“周日学校”教育。实际上，特别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贫穷地区，绝大多数孩子的就学时长是4年。On the Hungarian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practices, the classic is Joachim von Puttkamer,Schulalltag und nationale Integration in Ungarn. Slowaken, Rumänen und Siebenbürger Sachsen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mit der ungarischen Staatsidee, 1867–1914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3). Ágoston Berecz, The Politics of Early Language Teaching:Hungarian in the Primary Schools of the Late Dual Monarchy (Budapest: CEU Press, 2013)。后一本书为特兰西瓦尼亚实际的办学实践和经验提供了绝佳分析。

68. Quoted in Puttkamer, Schulalltag, 302–303.

69. Berecz, Politics, 116.

70. Ibid., 116–118.

71. Quoted in ibid., 200–201.

72. Quoted in ibid., 201.

73. On the Hungarian nationalist organizations EMKE in Transylvania and FEMKE in northeastern or Upper Hungary, Joachim von Puttkamer, “Die EMKE in Siebenbürgen und die FEMKE in Oberungarn. Die Tätigkeiten zweier ungarischer Schutzvereine in ihrem nationalen Umfeld,” in Schutzvereine in Ostmitteleuropa. Vereinswesen, Sprachenkonflikte und Dynamiken nationaler Mobilisierung 1860–1939, ed. Peter Haslinger (Marburg: Verlag Herder Institut, 2009), 158–169.

74. Robert Nemes, Another Hungary: 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inces in Eight Liv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manuscript version, 219–220.

75. Ibid., 220–221.

76. Ibid., 228.

77. John-Paul Himka, 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87.

78. Quotations in this paragraph in ibid., 93–94.

79.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census in Austria, see Emil Brix, Die

Umgangssprache in Altösterreich zwischen Agitation und Assimilation (Vienna: Böhlau, 1997); Wolfgang Göserle,“ ‘ . . . für Administration und Wissenschaft.’ Zensus und Ethnizität: Zur Herstellung von Wissen über soziale Wirklichkeit im Habsburgerreich zwischen 1848 und 191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Graz, 2014); also Z.A.B. Zeman,“ The Four Austrian Censuse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1908–1918, ed. Mark Cornwall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0), 31–39.

80. Berecs, Politics, 23. Berecz还对匈牙利人口普查法和实践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他坚持马扎尔官员们把人口普查当作一种评估标准，而不是一种同化工具 (ibid., 23–30) 。

81. 当然，这些统计数据不能估算人们对其他语言的相对掌握程度(ibid., 28–30) 。在他研究的大多数特兰西瓦尼亚城镇， Berecz注意到1910年，当地6—29岁的罗马尼亚语使用人口掌握匈牙利语的平均比例在10%—16%（当年龄较大的人口加入进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会变得更低）。而在特兰西瓦尼亚6—29岁使用德语的居民中，这个数字要高很多，掌握匈牙利语的人口比例达到了25%—55% (ibid., 234–235)。

82. Burger, Sprachenrecht und Sprachgerechtigkeit, 100–110.

83. 国家只许每个人登记一种日常使用语言的规定，对那些试图淡化奥地利多语言现状普遍性和重要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种胜利。

84. Wenzel Holek, Vom Handarbeiter zum Jugenderzieher (Jena: Eugen Dietrichs,1921), 1, quoted in Caitlin Murdock, Changing Places: Society, Culture,and Territory in the Saxon-Bohemian Borderlands, 1870–1946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0), 47. 在这个案例中，这座工厂位于德累斯顿。

85. Holek, Vom Handarbeiter, 3, 14, cited in ibid., 47.

86. 地方上的人口普查活动最恶劣的案例（但绝非孤例）发生在1910年的里雅斯特的人口普查中。作为对这次事件的应对，当地政府决定重新进行普查。

87. See the important study by Peter Haslinger, Nation und Territorium im tschechischen politischen Diskurs, 1880–1938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2010)，本书的第二部分尤其重要，它提供了一个了解地区划分机制和动力的极佳框架，其中包括对普查结果的使用。Also Pieter M. Judson, Guardians of the Nation: Activists on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15, 29–33.

88. 1898年，马克·吐温发表了《1898年，奥地利的动荡时刻》，这篇作品记录了他在奥地利期间，目睹几个月来国会围绕着巴德尼的语言法产生的阻碍(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for March 1898), 96:530–540.

89. Berthold Sutter, Die Badenischen Sprachverordnungen von 1897, 2 vols. (Graz and Köln: Böhlau 1960, 1965).

90. “ Das erste Opfer der Sprachenverordnung,” in Deutsche Volkszeitung für den Neutitscheiner Kreis, 12 May 1897, 6.

91. 根据旁观者的描述，沃尔夫在国会会议期间威胁巴德尼并宣称：“如果这就是你的政策，那么它就是卑鄙的欺诈！”其他同僚试图拉住他，但沃尔夫仍然继续侮辱对方，称他是“波兰无赖主义”，甚至有目击者见到他辱骂巴德尼伯爵为“一只波兰猪”。在得到皇帝允许后，巴德尼向沃尔夫提出决斗。沃尔夫早已是个决斗老手，在5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和一位年轻捷克代表用剑生死相搏。决斗在9月25日举行，沃尔夫在打斗中刺伤了巴德尼首相的右臂。“The Badeni Wolff Duel,” 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1897,

5.

92. Markus Krzoska,“ Die Peripherie bedrängt das Zentrum. Wien, Prag, und Deutschböhmen in den Badeni-Unruhen 1897,” in Grenzregione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Ihre Bedeutung und Funktion aus der Perspecktive Wiens, ed. Hans-Christian Mane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145–165.

93. Lothar Höbelt, Kornblume und Kaiseradler. Die deutschfreiheitliche Parteien Altösterreichs 1882–1918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93), especially 180–199. 关于挑战了奥地利议会制度共识的国会政治幕后工作，Höbelt提供了精彩且具有洞察力的记录。

94. On the Moravian Compromise, Horst Glassl, Nationale Autonomie im Vielvölkerstaat. Der mährische Ausgleich (Munich: Sudetendeutsche Stiftung, 1977); Zahra, Kidnapped Souls, 32–48; Stourzh, Gleichberechtigung, 200–228; T. Mills Kelly,“ Last Best Chance or Last Gasp? The Compromise of 1905 and Czech Politics in Moravia,” AHY 34 (2003): 279–301; Moravské vyrovnání z roku 1905/Der Mährische Ausgleich von 1905, eds. Lukás Fasora, J. Hanuš, and Jiří Malř (Brno: Matice Moravská pro Vyzkumné Středisko pro Dějiny Středn Evropy: Prameny, Země, Kultura, 2006), 43–58.

95. On the issue of the compromises taken together (including the Budweis/Budjĕovice Compromise), King, Budweisers, 138–147. King developed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relating to national categorization in“Who is who? Separate but Equal in Imperial Austri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0). I thank Professor King for sharing his unpublished work with me. On the Bukowina compromise, John Leslie,“ Der Ausgleich in der Bukowina von 1910: Zu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itäten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Geschichte zwischen Freiheit und Ordnung. Gerald Stourzh zum 60. Geburtstag, ed. Emil Brix et al. (Graz and Vienna: Verlag Styria, 1991), 113–144; Gerald Stourzh,“ The National Compromise in the Bukovina 1909/1910,” in From Vienna to Chicago and Back: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77–189; Börries Kuzmany,“ Der Galizische Ausgleich als Beispiel moderner Nationalitätenpolitik?,” in Galizien. Peripherie der Moderne—Moderne der Peripherie, ed. Elisabeth Haid (Marburg: Verlag Herder-Institut, 2013), 119–137. For a contemporary argument by a noted academic progressive and sociologist of law on the economic necessity of compromise in Bukovina, see Eugen Ehrlich, Die Aufgaben der Sozialpolitik im österreichischen Osten insbesondere in der Bukowina. Mit besonderer Beleuchtung der Juden und Bauernfrage (Czernowitz: 1909).

96. 这部法律给予民族主义者挑战父母们的权利，他们认为家长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错误的学校接受学习。这部法律规定，学生们必须掌握所在学校使用的教学语言，否则他们就会被“回收”到使用其他语言教学的学校。捷克民族主义者使用这部法律来阻止家长让孩子接受德语教育。而它在摩拉维亚的学校中也引发了每年一度的“回收仪式”。Zahra, Kidnapped Souls, 32–48.

97. Stourzh, “Ethnic Attribution.” For two contemporary analyses of this development, Edmund Bernatzik, Über nationale Matriken (Vienna: Manz, 1910) and Rudolf von Herrnritt,“ Die Ausgestaltung des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itätenrechtes

durch den Ausgleich in Mähren und der Bukowina," i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 Recht, vol. 1/5–6 (1914): 584–618. I am grateful to Jeremy King for these references.

98. Vaterland, 2 May 1873, 1, quoted in Matthew Rampley," Peasants in Vienna: Ethnographic Display and the 1873 World's Fair," AHY 42 (2011): 110.

99.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s fair, see the excellent analysis in Rampley, "Peasants in Vienna."

100. 因为参观游客人数很少，估计维也纳世博会产生了2 000万盾的经济损失。

101. 根据1880年人口普查数据（就在这所大学成立之后5年），布科维纳6岁以上的男性居民中有14.2%的人口可以读写，女性公民的识字读写率是8%。与其相比，下奥地利的数据分别是91%和87%，而波希米亚则有89%的男性和83%的女性识文断字。其中帝国的弗拉尔贝格州在1880年的识字率最高，男女识字率都在95%左右。在其他贫穷的农业地区，识字率同样很低（伊斯特利亚男性识字率为28%，女性为18% ；加利西亚男性识字率为17%，女性是10%）。不过帝国的学校体系还是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1880—1990年，在整个奥地利范围内，男性识字率从原本的62%上升到68.5%，女性识字率从55%上升到62.5%。Friedrich Umlauft，Die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Monarchie. Geographischstatistisches Handbuch für Leser aller Stände (Vienna, Pest, Leipzig: A. Hartlebens Verlag, 1897), 780–781. 在拥有不同于奥地利的学校系统的匈牙利，如果把它和奥地利相比，在1890年的全民识字率是44%，其中说匈牙利语的国民识字率是53.6%，德语使用者的识字率是63%，是所有民族中最高的；乌克兰语使用者识字率是9%，罗马尼亚语使用者识字率是14.1%，这两者最低。克罗地亚语使用者和塞尔维亚语用户的平均识字率相差不多，分别是42.4%和30.9%。Puttkamer, Schulalltag, 456.

102. Quoted in Kolmer, Parlament und Verfassung, vol. 2, 343–345. See also Emanuel Turczynski," Die Bukovina," in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e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ed. Isabel Röskau-Rydel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9), 213–328, here 253.

103. Karl Emil Franzos," Ein Culturfest," in Aus Halbasien. Culturbilder aus Galizien, der Bukowina, Südrussland und Rumänien (Leipzig: Dunder & Humblot, 1876), vol. 1, 324.

104. Franzos, Aus Halbasien, 1:iii, 112, 143, quoted in Röskau-Rydel, Deutsche Geschichte, 411.

105. Franzos," Von Wien nach Czernowitz," in Aus Halbasien, vol. 1.

106. Heinrich Pollak, Dreissig Jahre aus dem Leben eines Journalisten, 3 vols. (Vienna: Alfred Hölder, 1898), 3:78–87.

107. 1868—1874年，共有1　005家股份公司成立，其中有685家实际存续。所有在股灾之前成立的维也纳银行都得以存续，但在这段时间或之后成立的70家银行中，只有8家幸存。在各州，65家新银行中有44家倒闭。许多议会代表（不仅是自由主义者）都在这些企业的董事会中担任董事职务。Macartney, Empire, 608–609. 自由主义的奥尔斯佩格内阁继续执政了5年，直到下一次选举（1879年）被塔菲联合内阁取代（1880年）。

108. On the Kronprinzenwerk, Zoltán Szász," Das‘ Kronprinzenwerk' und die hinterihm stehende Konzeption," in Nation und Nationalismus in wissenschaft lichen Standartwerken Österreich-Ungarns, 1867–1918, Justin Stagl, ed. (Vienna: Böhlau, 1997), 65–70; Justin Stagl," Das‘ Kronprinzenwerk'— eine Darstellung des Vielvölkerreiches," in Das entfernte Dorf. Moderner Kunst und ethnischer Artefakt,

ed. ákos Moravánsky (Vienna: Böhlau, 2002), 169–182; Regina Bendix,“ Ethnology, Cultural Reific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Difference in the Kronprinzenwerk,” in Creating the Other: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alism in Habsburg Central Europe, ed. Nancy M. Wingfield (New York: Berghahn, 2003), 149–166; Hans Petschar, Altösterreich. Menschen, Länder und Völker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enna: Brandstätter, 2011).

109. Deborah Coen, “Climate and Circulation in Imperial Austr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2: 4 (December, 2010): 839–875; The Earthquake Observers: Disaster Science from Lisbon to Rich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10. Bosnische Post 48 (17 June 1888): 2.

111. “ Round the Near East,” Interview with Benjamin von Kállay, Daily Chronicle 3 October 1895, quoted in Robert Donia, Islam Under the Double Eagle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1), 14.

112. Quoted in Robin Okey, Taming Balkan Nationalism: The Habsburg ‘Civilizing Mission’ in Bosnia, 1878–1914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

113. Okey, Taming Balkan Nationalism, 26.

114. Ibid., 28.

115. On Habsburg efforts to construct a popular Bosnian identification among Muslims, see Edin Hajdarpasic’s illuminating Whose Bosnia?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kans 1840–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especially 161–198.

第七章｜寻常的帝国，我们的帝国（1880—1914）

……这个君主国——与其说是我们的祖国，不如说是我们的帝国，要比一个祖国更伟大、更广阔、更包罗万象。

——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皇帝的陵墓》（*The Emperor’s Tomb*），1938年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奥匈帝国的国民的日常生活，与帝国产生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密强烈的联系。从入学到地方投票，再到例行参与征兵程序，以及每年一度全帝国庆祝统治者生日等活动，无论是波黑乡下的穆斯林农民、波希米亚说捷克语的商人，还是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知识分子，都因它们成为帝国之中的一分子，而这个帝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再也不是看客和旁观者，他们更加明确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帝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如果说可以用帝国的黄昏，甚至是它最后漫长的回光返照来总结“一战”之前的岁月，绝大多数的国民此时显然还未意识到这个趋势。

从结构上看，“一战”爆发前的10年见证了1900年前后民族主义冲突造成的政治危机——首先是奥地利的巴德尼危机，数年后是匈牙利的统治僵局。这些危机在一些精英产生了制定帝国范围内更灵活的权力分享机制的愿望。不过大多数这类进行妥协的愿望，都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暗中实现。

为新型社会产生的新型国家

在1880年前后，整个世界迎来了剧变。全欧洲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发展的速度得到了提升，载货与载客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人们如今也可以超越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熟悉的边界，到更远的地方旅行。越来越多人离开位于帝国某地的农田或作坊，向位于帝国其他城镇，甚至是世界其他角落的目的地迁移。注因此，在1890—1910年的

20年间，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利沃夫、切尔诺夫策、札格雷布、因斯布鲁克、阜姆、克卢日以及波拉等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都超过了60%；的里雅斯特、德布勒森（Debreczen）、蒂米什瓦拉（Temesvar / Timosoara），以及摩拉维亚北部与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人口增长紧随其后，其增长比例也有50%。来自本地农村和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们涌进这些制造业、贸易和行政中心，使它们的人口迅速膨胀。到了1900年，差不多近40%的奥匈帝国国民离开了他们的原籍，迁移到位于这个君主国其他角落的现居地。

由于运输和票价的改革，对帝国内数百万人来说，铁路旅行已经是家常便饭。匈牙利在1889年的铁路系统国有化大大降低了客车票价，短短几年内，就将铁路年载客量从几乎没有提升到惊人的700万人次。就在世纪之交前不久，加利西亚人也可以在首府利沃夫搭乘有规律的列车，只要1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维也纳——如今走完这段500英里的旅程，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许多人还穿越国境，从哈布斯堡王朝前往德国，然后在那里乘船前往南美或北美。事实上，在1876—1919年，差不多有400万男女漂洋过海，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这些移民中有数十万人在几年之内回到了奥匈帝国，他们带回新技术与资金，也带来了一个更广阔世界的经历。

交通和通信的革新让上述的迁移成为可能，也同样改变了留守者的生活。1900年，绝大多数的小市镇和偏远乡村都能够接触到本地和地区报纸，有时还能享受到电话服务。10年后，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方，已经拥有22 386所学校，匈牙利一方则有16 455所。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少年，使得他们通过接受初等学校以外的教育，积极寻求和取得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要在高级中学或者大学中深造，这些年轻人会参加一些提供基本文秘技能培训的短期预备课程，这些技能包括打字、文件归档以及速记。它们令求职者可以获得一批新的低级白领工作。

1900年之后，在帝国农业化最高的地区（特别是加利西亚、布科维纳、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波黑）多年来棘手的低识字率开始显而易见地攀升，逐渐追上相对城市化水平更高的波希米亚、奥地利或者匈牙利的大都市区。1910年，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11岁以上的国民平均识字率达到了83.5%，已经可以与法国85%的识字率相媲美。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识字率达到了58%，达尔马提亚与伊斯

特里亚则是67%，而奥地利其他区域的识字率已经高达90%。同一时期，匈牙利对6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的调查统计数据要略低于奥地利。从语言群体这方面来看，匈牙利使用德语和匈牙利语的人群拥有最高的识字率（约为70%），而罗马尼亚语或鲁塞尼亚语（从1900年以来，它越来越多地以乌克兰语的名称为人所知）使用者的平均数据只有近30%。

因为识字率和接近全民征兵的制度，许多人通过对迅速增长的纸质媒体的消费，了解到一个更广阔世界的科学、政治、经济内容与最新时事。此外，更多人开始从更广阔的跨地区利益角度来审视他们的未来，或者他们家乡的未来。在达尔马提亚、弗拉尔贝格（Vorarlberg）与巴纳特地区的乡间居民第一次开始关注遥远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或札格雷布做出的政治决定。许多人积极采取行动，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从而塑造他们自己与家乡的未来。

当国民的需要和希望发生改变，国家的职能和意义也同样产生了变化。从学校教育到兵役制度，再从福利到邮政服务，国家要担负的责任不断增大，其中的一些还被认为是人们应得的正当权利。譬如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在2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强制性的初等教育系统（尽管双方的制度差异颇大）；奥地利政府还分别在1887年和1889年，为工人和商业、工业和贸易方面的公司管理人员设立了强制性的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制度。当我们再把铁路、电报和邮政系统依靠国家投资的大规模发展（1848年，奥地利有10座电报站，到了1913年就迅速增长到7 282座）考虑进来，就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更加直接和处在当前的角色。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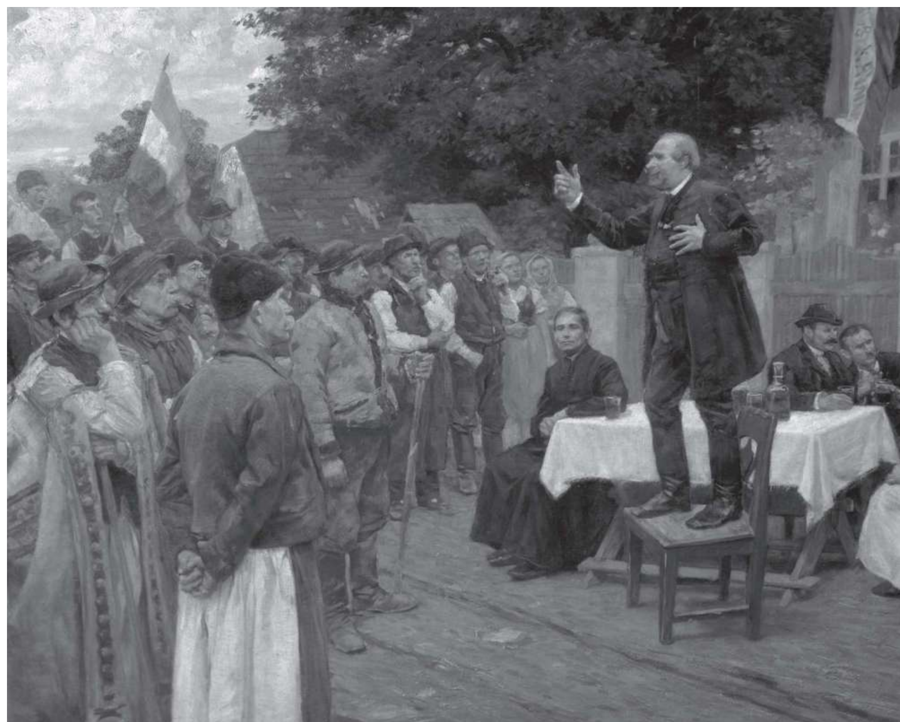
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和逐渐增加的新公共福利迫使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增加政府中的官员层级，以便履行新出现的职能，同时它们也增加了更多新层级，监管第一层级的工作效率。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无论对地方市政府还是帝国的大臣们来说，都是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如今国会、各省议会和市政厅都在忙于规模尚且未知的建档工作，同时严格执行从劳动场所安全、公共卫生、交通运输到移民情况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标准。注就在大众的期待推动国家进一步深入国民的日常生活之际，也滋生出更多的官僚主义。

与帝国过去几次重大的发展期，比如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18世纪80

年代、新专制政权统治下的19世纪50年代不同，19世纪晚期的这一次发展的推动力更多来自帝国边缘地带的活动。这些活动由地方上民选产生的官员和越来越频繁地收到前者咨询的行政管理专家制定，其范围包括公共卫生项目，设立医院、公园和公共游泳池，它们促进了官僚职能在乡村、市政和各省政府的扩张，同时也伴随着相关人员的增加。无论是国家指派的，还是地方“自治”的官僚机构，都竭尽所能，为不断增加的服务对象履行越来越大的责任。[注]它们招募更多有着更多样社会背景的人，填补新出现的职位空缺（到了19世纪末，女性也成为被招募的对象），这些职位从电报发报员到食品监察员、邮政员工、学校教师以及铁路售票员，种类五花八门。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地方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为例，这些银行为乡下和小城镇中财产不多的客户提供了银行服务，除了邮政储蓄银行之外，这些客户没有别的方式接触到类似的服务。而邮政工人和地方小学教师则成为普通大众眼中帝国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帝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即便是在最偏僻的农村地区也不例外。就像一位历史学家对匈牙利邮政系统的描述，“（它）无疑是普通大众最熟悉的国家机构”[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邮政和电报工作人员以及学校教师这些广受认可的专业部门，还扩大了19世纪末单身女性就业的场所。1870年，匈牙利雇用了第一位从事这几类职业的女性。[注]到了1911年，奥地利已经雇用了超过1.5万名职业女性，她们绝大多数都在邮政、电报和电话等公共事业部门就职；两年后，差不多有1.9万名奥地利女性获得了在小学任教的教师资格。[注]

当然，国家发展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00年，奥匈帝国中奥地利部分的地方基础设施增长导致了国内严重的财政危机。[注]那么谁来给这些新的公共事业部门和雇员付钱呢？国家和各省的政治家如今都面对着严格的宪法限制，这些限制约束了他们独立于帝国之外提高税收额度的能力。随着一些省份和城市的政府债台高筑，政府的委员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也提出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改革理念，希望找到长期的解决措施。专家、慈善家和许多政治家们无不警告，奥地利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危机。政府需要设立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推荐可能重构帝国机构的更富有效率的计划。



19世纪匈牙利的一场选举演说，原画作者为Sandor Bihari（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 A. Dagli Orti /Bridgeman Images）

政府职能的扩张同样激发国民认同特定职业的利益，以及围绕着它为政治目的组织起来，并且寻求在市议会、校董会或商会等公共机构中的有效代理。这反过来促进了各种专业利益群体的出现，它们的组成人员从种植甜菜的农民、电报发报员到乡村保险销售员和帝国官员本身，所有这些群体都在游说地方和帝国政府，请求它们召开特定的会议。至于无权在绝大多数选举中投票的工人，他们大批加入建立于1889年的社会民主党，让本地、区域和帝国政府面临强大且紧迫的挑战。工人不断扩张的联系网已经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体育活动、教育以及歌咏等社会活动，工人们广泛阅读所属党派的报纸，而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公共示威游行使这批人成为有力的政治角色，并帮助工人阶级在1907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赢得选票。

政府和政党开始越来越重视营造和控制舆论来获得公众对它们计划更高层次的支持。与过去相比，之后的政治活动中的个人协商、专家管理或者精英关系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动员大众力量的惯例。就像民族主义者们在第六章中所讨论的，1800年之后的政治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大众媒体渠道，从群体利益的角度表达个体的利益，无论他们是基于阶

级、宗教、地域、职业或民族。在此我们借用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对同一时期德国的特点描述，即使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完全民主化，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已经学会“实践民主”[注]。

人民识字率的上升、自由纸质媒体以及人员与商品的转移……这些刺激国家发展的动力同样也增强了大众要求帝国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那些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依照更精英化的政治传统发迹的政客们，对19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改变既困惑又厌恶。一些政治家无法适应大众政治的模式，认为这是粗鄙且投机主义的。而其他人则发展出具有创新性的民粹主义政治实践，卡尔·休斯克（Carl Shorske）将其称为“政治的新关键”[注]。以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1844—1910）为例，他从1897年到去世，一直以基督教社会党人的身份担任维也纳市市长，并广受人们欢迎，而像他这样的人，往往一开始是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开始公共事业生涯的。这些人不甘于继续在自由主义体系内做一个被动的后座议员，于是着手组织那些过去没有投票权的群体（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通过以民粹主义的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和在位的自由主义寡头们对抗。这些政治家中有不少人使用反犹主义以及激进民族主义（有时他们双管齐下，同时使用上述的两种），作为耦合原本互不相关的利益集团，比如传统行业的手工业者以及受雇于不断发展的新型实业的低阶白领阶层的意识形态黏合剂。[注]

这些政治家成功地重塑了大众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们破坏了自由主义成为改革或进步动力的传统主张，转而将其粉饰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意识形态。这项策略一方面意味着把帝国的犹太人描述为受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们，当然也是承担犹太解放责任的人所欢迎的被庇护者。而与此同时，新民粹主义的拥护者们既批评自由主义的现存社会权力结构，同时又大力维护小资产者体系，坚持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逐渐增强的社会民主威胁抗衡，他们小心地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政客把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分割开来，交给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和新的民粹主义者，就像1891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时，所谓的“青年捷克运动”压倒了曾经是他们盟友的“老捷克人”那样。数年后，民粹主义的天主教斯洛文尼亚人民党调动农民选民，在卡尼奥拉和施蒂利亚南部打败了更精英化的斯洛文尼亚城市自由主义者。不过到了1900年，这些“年轻捷克人”已经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被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重农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的更加激进的民粹主

义要求所打败。[注] 19世纪90年代，在加利西亚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精英（他们对任何大众化的事物都十分反感，其中包括更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形式）发现他们自己正日渐受到由斯坦尼斯劳·斯托亚洛夫斯基神父领导，面向农民的政治运动挑战。

尽管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世界，但它们不止集中在这个方面。从乡下小村庄到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中新出现的居民区，日常生活的节奏和其中原本毫无疑问的事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注]一份发布于1908年，来自施蒂利亚南部角落的乡间区域布雷日采（Rann/Brežice）的新闻通讯中，提出了10年前人们闻所未闻的公共关怀问题。其中一篇文章提倡学校应当成为提高学生低营养水平的场所，它提醒读者，那些从家里长途跋涉来上学的孩子们需要一顿优质的午餐，来保障他们的身心发展。另一篇文章则建议学校要成为改善儿童口腔卫生的场所。而第三篇文章则建议人们（包括孩子与成人）停止向新出现在乡村道路上的汽车投掷石头的错误做法，因为这样司机会失去控制，撞上路人！第四篇文章警醒人们注意移民至加拿大、阿根廷、智利和美国的诈骗。最后，这份通讯完美地向人们下达指示，指导学校如何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登基60周年庆典。[注]

在地方上促进或达成变革的行动，更多出自本地活动家之手，而非地区政府行政部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加利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见证了大众力量的缓慢崛起，它们往往是基于宗教背景的农民自助组织，其目的是促进当地农民阅读、农业发展和经济独立。在加利西亚，这些目的往往就意味着建立合作商店，和犹太人经营的店铺和犹太小贩竞争。[注]自助不仅意味着达成社会阶层流动与促进本地繁荣，同样也意味着帮助农民有效地参与到帝国体制中去。

在社会和技术的惊人变革之中，对一个大众帝国的信仰在稳定和协调几百万奥匈帝国国民多种多样的欲望、需求和行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地方层面，仍然有许多活动家把他们的未来愿景寄托在帝国身上，特别是对那些希望通过想象组织帝国新方式来传播民族主义政治冲突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个充满令人无所适从的变革的年代，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从理念上成为一种令人安心的稳定象征。因此，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人们忘记了他镇压1848年革命的残暴举动、长达10年的专制主义统治、推迟了犹太人的解放脚步、输掉的战争以及在改革上首鼠两端的表现。如今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一个

和蔼慈祥的、老祖父一般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他看管着这个不断变革发展的社会，并在必要的时候调节政治家们的社会激进主义。由于在其漫长的执政期内发生的诸多个人不幸，皇帝越来越表现得像一个殉道者。[注]而在帝国概念下王朝义务与大众忠诚之间传统的相互关系，同样塑造了大众对国家创造和承担的全新职能的态度。帝国的象征性语言，往往用人们熟悉的词汇掩盖了新形式的统治方式和政府义务。

市政自治

这个国家革命性的发展，常常来自乡村或市政当局，而不是二元帝国的两个首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1875年，一份关于加利西亚城镇的调查表现出在短短数年内，帝国的自由主义基层自治法律已经从地方政治关系的层面催生出了某种意义上的一场社会革命。如今加利西亚乡村地区差不多所有的市长（占全体市长人数的99.2%）和村镇议会议员（占总体的99.65%）都是农民出身。但是在这一年，这些农民市长中有近80%不会读写。[注]这样一来，我们就毫不奇怪地看到19世纪70年代，当农民们从可恨的绅士地主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开始自治时，加利西亚村镇行政体系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和新型腐败之中。不过与此同时，加利西亚的自治基层架构给当地农民（事实上是从弗拉尔贝格到布科维纳一带的所有奥地利人）上了关于政治的重要一课。这迫使加利西亚的农民们熟悉一般的行政手续、了解成文法以及政治动员的手段。最终，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利西亚农民取得的这些经验帮助他们在州议会取得了政治代表位置，在70年代领主们曾经成功将农民排除在外。

至于1862年自由主义的公共法（经由1867年的宪法确认，随后由各州议会推行），给予当选地方议员的地方有产者型塑本地社区发展的权利。1910年，差不多在通过公共法后50年，奥地利法官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f Redlich）就强调地方基层政权已经“发展成为大众自由参与政治活动最重要且无与伦比的机构”[注]。人们利用这些遍布全帝国的机构，对它们效忠，从而建立起一种遍及中欧东部人民的长期而普遍的纽带，这种纽带超越了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直到“一战”之后帝国被取代，它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机构之中。

这部法律缔造了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方基层政权的两种重要自治形式，它把贵族的地产与邻近的村庄分开，然后给予后者全权管理公共预算、市政发展和推行教育政策的权力。不过在加利西亚，这却不能算是毫无代价的好处，这项政策意味着贵族地主不用再向地方基层纳税，这就导致了许多自治村镇陷入了严重的债务问题。[注]作为一个从行政体系中分离出来的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帝国的自由主义政权还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边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地方法庭，过去在这些地方，只有封建领主可以提供司法仲裁。这些地方法庭可以处理民众们彼此之间，或者对国家的诉讼案件。此外，这部法律同样把对地方选民负责的基层公共政府和对维也纳政府负责的国家行政体系分开，后者过去自上而下地控制着市政发展。在这样一个双轨制的行政体系下，帝国政府会任命一位地区特派员在一定距离之外监管民选地方公共政府。这些官员还得到政府分配的一些职能，比如负责执行10年一度的自治基层公共社区人口普查。同时，这些社区还会自行雇用属于行政系统第二条轨迹上的公务员，负责承担它们不断扩展的职责。不过，上述这部法律没有对国家和地方自治两条轨迹上的职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因此这偶尔会导致国家派遣的官员和地方自治系统自雇的官员处在一个尴尬的共生状态。但总的来说，地方基层政权和官员在很大程度上自行管理着所属地方，并且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选举奥地利市议会的本地选民包括了分为两个层级或三个层级的男性纳税人，或者是依赖于他们所支付的一定量税金的投票团体。每一个投票层级通常都选举出同样数目的议员，这样一来，那些缴税最多的选民层级就能和人数较多但缴税额度较少的其他层级选举出同样多的议员。一个城市或村镇中，能够获得投票权的最低缴税额度和财产标准取决于一个社区总体的税收贡献。这就导致获得投票权的缴税额在维也纳和其他州首府相对高得多，而在加利西亚或伊斯特里亚的贫穷村镇就要低不少。总体来看，这个体系不但给予社区内的富裕群体特权，而且还严格限制了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奥地利，这些法律给予地方总人口10%—20%的成员投票权。而就在年满23周岁以上的奥地利男性得以参与国会投票之后7年，1914年的地方公共选举中，只有占总人口10%—25%的人可以投票，这个比例甚至比州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比更小。[注]于是就像在德意志，有权为国会选举投票的人要多于为本地市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这和在英国的情况就不一样。

如果说一个中央集权的奥地利体系，正在越来越倾向于把权力移交

给地方基层政权和州政府，那么在匈牙利情况则正相反。在匈牙利，过去传统上地方行政权力掌握在郡政府手里，而这些政府则由地方贵族绅士把持。从18世纪起，正是这些人不断催生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要求的不满，在那段议会没有召开会议的漫长时间里尤其如此。不过1867年协议通过放权给布达佩斯的国民政府，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些冲突带来的风险，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匈牙利对帝国架构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是接受）。如今一个反中央集权的郡政府，已经对那些运作着新的国民政府的人们毫无意义。

1867年之后，定都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中央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对各郡及地方政府施以强大的控制力。许多布达佩斯的政治家（他们代表着制定1867年协议的民族主义精英）担心，如果让郡政府自行其是，那么郡政府就会由激进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少数民族（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德意志人）把持，与其他人作对，而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1867年协议，少数民族则想在国会拥有更多代表并得到政府更多对其文化计划的支持。在1870年和1886年先后颁布的两部法律中，匈牙利政府削弱了郡政府的权力，但仍然继续依赖其发挥行政职能。从1870年起，布达佩斯方面任命了管理各郡和有限的几个拥有自治权利城镇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Föispán）。[注]这位行政长官在一位由地方议会选举出的副手或副市长（Alispán）的辅助下主持市议会。市议会的职责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征税以及公共卫生与福利。市议会类似于奥地利的基层公共自治政权，但是它们实施自治行动的能力却受到体制结构的限制。[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选民投票层级的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选出的地方精英主导了奥地利，尤其是奥地利大城市的政治。从市议会的决策到行政程序，都被他们垄断了。在这20年间，只有少数情况下，较为自由的报纸媒体的联合、政治组织的合法化和议会政治家哗众取宠的行为能够成功借某些名义聚集民意。[注]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871年，捷克民族主义者动员了多达4万名波希米亚人参与露天抗议集会，要求所在州获得自治，并且要求语言平等，直到1871年基本条例失败为止。不过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示威，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的帝国土地上，仍然是个特例。[注]

由有限的少数人决定市政政策的趋势，在匈牙利表现得更加夸张，因为匈牙利的普选投票权规定相较于奥地利，在公共投票权上的限制更

多。1870年一开始，匈牙利市政法规同样也在其他方面对选民进行了限制。在一开始，有权投票的选民只能选举市议会的一半成员。选民包括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男性公民，而他们缴税的额度也会纳入决定投票资格的考虑。剩下一半不经选举的市议会由城中最富有的纳税人组成，他们直接拥有议会席位，并且倾向于支持布达佩斯的执政党。举例来说，1867—1914年，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科希策，决定城市大多数政策的选民人数从最初的1 200—1 800人，增长到1870年的2.2万人和1910年的4.5万人。注不过很少有人会将这与“大众民主混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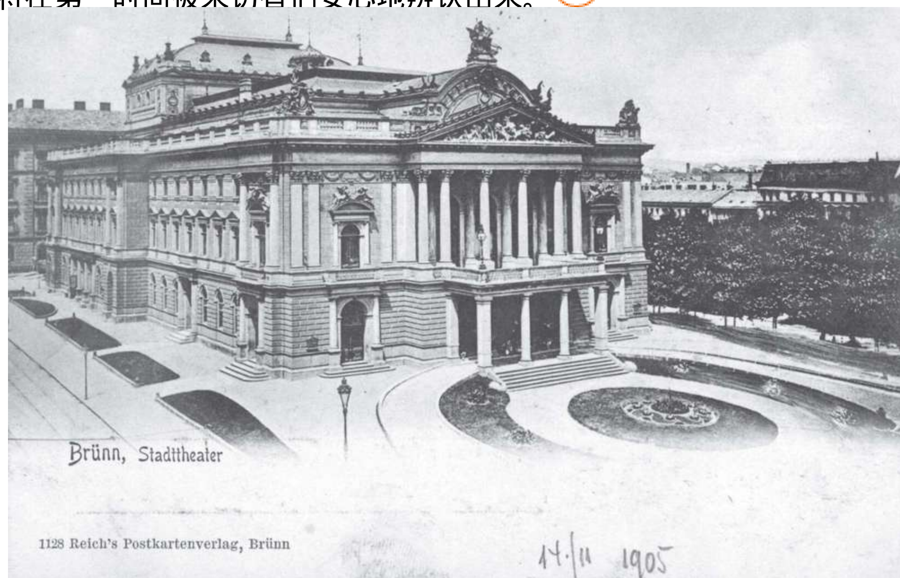
即便在投票权上留下了诸多限制，公共自治法还是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本地面貌带来了很大改变。大大小小的公共社区都发起了返修基础设施的计划，吸引和促进更多商业发展，增加贸易，并推行新学校法。有维也纳辉煌灿烂的环形大道先例在前，许多市议会都使用自治法来进行彻底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1890年前后，维也纳环形大道即将竣工。在视野中，朝着国会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左侧，市政厅位于中央，维也纳大学和更远一些的城堡剧院位于右侧（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他们急不可耐地推倒束缚城市发展的中世纪城墙，填平容易导致疾病的沼泽，把这些回收来的空间改造成有着花圃和林荫人行步道的公园，此外，在一些较大型的城市，这些空间还被用于建造宽广的林荫大道。基层公共政权如今及时疏浚城内的下水系统，保障地方的饮用水供应，还铺平了城内道路。它们建造了庞大的历史主义风格公共建筑，用

于反映市民的伟大以及它们所在城市独特的辉煌成就。然而某种程度上讽刺的是，这些建筑同样造成了它们试图达到效果的反作用：它们产生了一个全奥匈帝国的共性，甚至统一性的强大的直观感受，直到今天都十分引人注目。从格拉茨到布拉格，再从札格雷布到布达佩斯、克卢日和切尔诺夫策，市政当局渐渐在公共建筑上采用一种新巴洛克风格——建筑表面也往往涂为一种“帝国黄”的颜色。新建的剧院和音乐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像菲利普·特尔（Phillip Ther）告诉我们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数超过5万人的城市的地方精英都渴望拥有它们”。著名的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在全帝国范围内建造了将近50座风格相同的剧院和音乐厅（当然还有宫殿、宾馆和公寓建筑），这些建筑的特征和功能将在第一时间被来访者们安心地辨认出来。注



1905年前后，描绘布尔诺市立剧场的明信片。这间市立剧场由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设计，于1882年正式开门迎客。剧院中的点灯照明系统出自托马斯·爱迪生本人的手笔（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帝国城市建筑在风格上的相似同样也服从于这个国家强烈的文学怀旧情怀，它建立在许多已经失去的帝国的景象和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生活方式上。如果每个大城市都夸耀自己拥有一座豪华的剧场（不管规模如何），或者一座恢宏雄伟的新市政厅，那么小村镇就至少要有一间咖啡厅、一家有着“漆成明亮的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大门”的烟草店，以及还可能是一座涂成黄色的火车站，建筑上装饰着帝国的双头鹰。注“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约瑟夫·罗斯在1938年回忆帝国的视觉效力时这样写道，“即便是各种大相径庭的城市景象、田野、民族、种族、农

舍和咖啡厅，都一定会服从于一种将遥远的东西拉近，将陌生的东西变熟悉，将分散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的强大力量的自然主宰。我谈到的旧帝国被人误解的力量，在我的家乡兹拉托格勒（Zlotograd），以及在斯希普霍尔（Sipolje）和维也纳的运作方式都是相同的。”[注]

古老的城市中心的林荫大道和豪华雄伟的公共建筑都为其增添了光彩，同时也与城市不断扩展的郊区地带中，工人阶级聚居地那拥挤肮脏的房屋（它们往往由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资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维也纳、布拉格、格拉茨以及布尔诺，新的工业教区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较为富裕的内城区周围，纵观全帝国，这些区域的共同风格也十分明显。1859—1917年，维也纳建造了46万座新公寓，不过这个数字还是很难跟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1870—1900年，维也纳的人口翻了两番，在1910年达到了200万人。1890—1910年，布拉格的郊区人口也增长到了20万人之多。这种城市与郊区的环形模式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共同象征功能，还提供了相似的城市外观。正如沃尔夫冈·马德坦纳（Wolfgang Maderthaner）和鲁茨·穆斯那（Lutz Musner）所主张的，围绕维也纳内城周边的环形大道和绿化隔离带不只是展示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成就的舞台，它们同样成为真实的物质与社会屏障，标志出“城市中心的奢华住宅与暗藏危险的工人阶级聚居区”[注]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异。而在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在工厂周边出现的功利主义的新型棋盘式街道布局和新巴洛克风格的出租公寓也起到了重要的监管的功能。正如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所设计的巴黎（这是个与维也纳不同类型的城市设计方案，巴黎的林荫大道直接穿过市中心），在1848年，居住在环形道路之外的新郊区的工人们，面对在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狭窄且不规整的街道上轻易搭建起来的壁垒，无法轻易穿行。

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862年开始，到1880年前后终止，在这个时期，把持绝大多数市议会的精英商人试图在不产生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债务的情况下，发展他们所在的公共小区。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城市乌斯季（Aussig／Ústí，在1880年拥有36 364名居民）的市长安东·施特罗施耐德（Anton Strohschneider），他曾坚称：“只要我还是市长，就绝不能产生公共债务！”和许多19世纪70年代的帝国市长一样，施特罗施耐德强硬地拒绝为任何公共投资提供资金，除非他和他的盟友认为这是城市所必需的。这些必须解决的投资项目包括为古老的城市中心铺设道路、建设一座政府托管的校舍，或者解决最为恶劣的卫生问

题。在位于布拉格西南方向差不多20英里的工业城市贝龙（Beraun/Beroun，1880年人口约为6　000人），该市的市议会这样表述它的目标："维护、稳定与保护城市的金融资产"。19世纪70年代，这座城市的市议会除了修缮一些道路，以及对某几条城市道路实施照明以外，拒绝进行任何大型的城市整修项目。至于摩拉维亚南部城市乌赫尔堡（Ungarisch Hradisch / Uherské Hradiště，1880年有3 600位居民），当地市议会的工作重心在管理一家啤酒厂、出租公有农业用地和森林，以及向政府出租城市建筑，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赢利的目的。整个70年代，除了建造了一些小学与中学，市议会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出的改变十分有限。



描绘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设计的扎格勒布克罗地亚国立剧院的明信片。1895年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访问期间，这座剧院正式揭牌（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设计的格拉茨城中剧院的明信片，这座剧院于1899年开张（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当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本地资产阶级精英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工作时，他们往往与慈善家和慈善集团分担费用，并将这种联盟看作改善市政的最适宜之道。1831—1832年，摩拉维亚西北部工业城市顺佩尔克（Märisch-Schönberg / Šumperk，1880年人口为8 500人）在经历了严重的霍乱疫情之后，紧跟着该市医生补救措施的脚步，一位本地商人出钱填平了老城区的沼泽，还建立了本市第一条有覆盖的下水管线。20年后，同为商人出身的顺佩尔克市市长把剩下的沼泽地变成了人行步道。1857年，另一位本地商人捐资成立了当地第一家医院。1871年，这座城市极大地受惠于一家联合控股公司出资设立的将当地连入铁路网络的铁路线，而这家公司则是由80位当地最富裕的实业家、商人和地主创立的。与此同时，顺佩尔克的市议会成员建立了一个城市美化志愿者组织，致力于建造一座公园、一个公墓、一个公共游泳池，以及一座席勒纪念碑。注那些法律赋予他们控制地方公共小区权力的自由主义精英，依靠他们自身对公共责任和大众福祉的理解来改造这些小区。这个阶段的公共发展骤然终止于19世纪70年代，因为更多的人开始聚集起来，要求在地方政府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改变防守策略

那些曾经在19世纪中叶主导政策，关于自由主义目标、理念和实践力量的政治招数开始逐渐在80年代分崩离析，至少这个结果，不完全是因为一个日渐面向大众的社会的崛起。城市化、消费、通信和社会组织的大众模式，开始挑战自由主义针对社会问题和行使政治权利方面的高度受限的个人主义的和不加干涉的方式。19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帝国国会选举的普选改革让更多人直接参与帝国的公共生活。如今选举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与文化事件，它让小区内所有的成员（哪怕是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都卷入了公共仪式与活动，不管那是集会，还是骚乱。

大众社会的崛起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由主义一方完全没有应对准备的。来自中产阶层下层和工人阶级，在自由主义学校体系中接受了教育的男女，恐怕是把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学得太好，他们想要成为公民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对帝国有贡献的人。那么基层的公共政府难道不是属于他们的吗？难道政府不应当响应他们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需求吗？难道他们不该在帝国决定未来方向时，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吗？1873年，当经济危机导致了长期经济衰退，而自由主义无力应对经济衰退造成的社会影响（失业和破产等）时，我们就目睹了这样一场人民造成的“地震”。经济萧条破坏了资产阶级政治虚构的团结统一，这曾是自由主义精英正当化自己牢牢把持许多奥地利市议会的行为的借口。自由主义者们把地方政治的特性描述为一种扎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生产者阶层（所谓的地方公民）反抗外来者（比如国家官员、各州政府或者近来迁移到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人）入侵的斗争。这种虚构的团结一致并不能粉饰地方中产阶层内部关于理想的经济发展的本质，和那些拥有较少财产者所享受的城市服务范围之间逐渐滋生的分歧。[注]等到掌权者在选举中，公开用本地公有土地的合同或租约作为政治赞助的形式时，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

当处于中产阶层下层的手工艺人、小零售商以及白领工人挑战银行家、实业家以及大商人的权势时，资产阶级虚构的团结终于崩溃。1873年之后，小生产者们开始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社团组织，意在与本地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精英统治对抗，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注]以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城市乌斯季为例，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在选举期组织了自己的经济社团，挑战市政厅内占据主宰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举办公开集会（这是自由主义者们敬而远之的），还动员自由媒体发表他们的抗议。

这些积极的挑战者从公平和本地真实性的角度来塑造选举。究竟谁能最终从城市的发展中得利呢？谁可以代表那些真正的城市居民呢？挑战者们富有技巧地抓住了可以导致文化分裂的楔子议题，譬如反犹主义、宗教差异或民族认同感，以此来指控他们势力根深蒂固的对手采用了一些阴暗的外部势力，从而驱逐对方的力量。作为回应，本地精英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政治赞助手段来巩固他们的政治霸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市长们在个人关系和彼此的资助与庇护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机器，用来重新帮助他们自己或者盟友们当选。当贝龙的选举到来时，在位的市议会成员突然把城市土地租赁给潜在的支持者们，又在希望获得选民善意的街区增设人行道，他们还向潜在支持者们派发特许证，允许他们销售社区公有的木材，于是他们的对手指控这一切为贿赂舞弊。1887年，议员们甚至宣布了两个不同的选举时间，这个花招招来了州政府的详细审查，最终宣布选举无效。[注]

正当收入较低的公民们在第三投票层级，甚至有时在第二投票层级成功赢得大多数选票，使他们的候选人当选时，地方上的权力开始了转移。在贝龙，一个主要由手工业者组成的反对党指控精英们对选民们的经济利益关注甚少。手工业者们抱怨议会不断把建筑合同授予邻近城市的竞争对手公司，而不照顾本地企业。早至1878年起，这些人开始偿还选举得到的胜利，他们的成功主要来自在选战中对大众志愿者团体的动员，这些团体有地方体操协会、歌咏协会和一个本地老兵协会，这些挑战者们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持他们的地方报纸的创立和发行传播。[注]在所有这些明显冲突的例子中，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动员新的政治积极阶层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并设法把他们在本地的要求和帝国结构连接起来，加深了地方和帝国之间的联系。

对于已经发生改变的选民，市政当局大幅度扩展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它们组织小型借贷银行，向农民和本地小商人提供贷款；它们还建立更多的学校、法院、医院、救济院、屠宰场、砖厂以及军队营房；它们在街道设立了照明系统，点亮了城市道路（开始以煤气灯，之后采用电力），而很多较大的城镇铺设了从工人阶级所聚居的郊区到市中心的电车轨道。[注]这份不完全的列表甚至暗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基层公共政权的职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们从19世纪60年代受到限制的社区财产管理机构，成为80年代为它们的选民们提供大量服务的角色。

动员新的一批人参与帝国的日常事务，是一个常常会引起暴力行为

的、具有不可预测性的过程，新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制定地方政策的权力向传统精英发起挑战。因此在选举中也屡屡出现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他们正在选择帝国将要走上的发展方向。这也造就了人们反抗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精英权势的新方式——通常这种方式是暴力的，就像18世纪农民寻求国家的帮助，来对抗地方贵族压倒性的力量。只不过，如今的精英往往是一开始创造了新体制的自由主义者。1897年3月13日，来自加利西亚达维季夫（Dawidów，拥有1 300名居民）的一批主要说波兰语、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村民攻击了一个据说在选举中大肆舞弊的选举官员斯坦尼斯拉夫·波佩尔（Stanislav Popel）。波佩尔朝其中一名袭击他的农民开枪射击，这激怒了那群袭击者，将波佩尔活活打死。注而这两个村子的宪兵警察无力控制人群。农民们怀疑地方官员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符合资格投票人名单，从而让人民的声音变得无效，然后操纵一场欺诈性的选举，把胜利交给本地的大地主。让帝国制度能够顺利运作的规定使人们期待公平，而在本地农民的眼中，大地主们不公平地违反了这些规定。

在序言中，1911年选举期间，在加利西亚产油城镇德罗霍贝奇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使这座城市的副市长——一位支持强势的波兰保守主义者的犹太人雅各布·福伊尔施泰因（Jacob Feuerstein）与犹太民族主义者势不两立。这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和一些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联合成一股力量，共同选出了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候选人。凭借加利西亚政府的支持，福伊尔施泰因动用了来自附近普热梅希尔要塞的军队，阻止要与他中意的候选人竞争的犹太和鲁塞尼亚民族主义对手当选。当一群犹太人和说鲁塞尼亚语的人在当地选区的一个投票站要求行使他们的投票权时，据说福伊尔施泰因当即下令军队朝人群开火。这导致26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一位来自维也纳《新自由报》的通讯记者确认了这个数字，他还同时注意到在军队射击人群之前，他们面对人群的挑衅，表现得极其克制。注这次事件中被杀的26人，表现出当权的集团以及挑战者们所共同面对的高政治风险。

这样一场艰难的选战的终结最终也让市议会内部激烈的仇视情绪画上了句号。奥匈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将这些地方民选机构中激烈的冲突（有时这些冲突还表现在物理层面）归结于民族主义对其的侵蚀力。然而这类通常与1897年之后颠覆了奥地利国会的民族主义行动（通过阻挠会议、侮辱议员、投掷物品等行为）联系起来的冲突，事实上却体现出了许多并不存在民族主义争议的市政议会所具有的行为特征。以乌赫

尔布罗德为例，这座城市的市议会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克化，也不再有不断向摩拉维亚政府抗议市议会选举结果（三次选举分别发生在1900年、1906年和1911年）的政党，但它在1913年却宣布1911年选举中，第一和第三投票层级的结果无效。市议会开会时，气氛可谓是“狂风骤雨”，十分激烈紧张，还有一些议员“习惯性”地指控对手们诽谤（这些指控往往都不成功）。[注]在捷克语使用者占绝大多数的贝龙，当1888年，波希米亚政府已经宣布当年选举结果无效（当时市政府宣布了两个不同的选举日期）后，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活仍然骚动不安。一位本地历史学家总结19世纪90年代的议会会议特征，称其“被一种不宽容、完全不尊重反对意见的气氛，以及包括人身攻击在内，违背了最基本礼节的行为”[注]所困扰。

上面来自乌赫尔布罗德市议会的例子表现出帝国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被绝大多数的奥匈帝国地方社会所理解和体验。政治暴力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冲突的一个特点，许多人相信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帝国体系背景下，为自己所在城市建立一套政治体系，以此塑造光明未来时，政治暴力也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奥地利的政治改革新赋予数千人投票的权利，在这个不和谐的过渡期，当人们在帝国中的切身利益在某些场合与某些时间变得尤为关键时，冲突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这些场合与时间所指的，就是选举。

趋向现代化，趋向欧洲化（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处在这些麻烦且难以驾驭的市政府中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件事：他们所在的城市需要变得“现代化”，他们的城市需要享有当时人认为的欧洲技术发展和文化进步成果。管理一座城市的政府需要时时准备好推动改革，并且要大胆设想可能的发展。为了在19世纪最后的30余年中充分利用正在飞速进行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城市们必须行动起来，否则可能拱手把市场和现代化带来的司空见惯的好处交给地区内的竞争对手。铁路网或一支驻军，都有可能造就或毁灭一座城市的经济未来。

现在当然不只意味着一个繁荣的经济未来，它还意味着把代表一个共同的欧洲现代性的各种因素融入城市本地的环境和景观。就他管理的

地区是否会合并入邻近大都市的问题，一位克拉科夫郊区地带的市长在与市政府谈判时，这位市长坚称：“当然，我们期待着城市照明，铺设平整的道路、供水管线，拥有合适警力，以及一切可以在大城市见到的东西。”另一位也在处理相似谈判的地方市长则要求煤气灯照明、铺设整修路面、在当地建造一所学校，以及作为合并的代价，为他所在的郊外地区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内森·伍德（Nathan Wood）在他关于1900年前后克拉科夫的研究中，描述了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们（他们往往使用本地报纸作为工具）自觉创造出一种城市现代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他们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定位——欧洲大城市——十分吻合，而正是因为他们对其“大都会”和“现代化”特点的主张，以及维持这个宝贵地位所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个理论得以发展起来。这些行为包括为城市在国际媒体上取得正面宣传效果的长期努力以及创立旅游部门，这往往是与私人倡议联系在一起的。

绝大多数现代化在本质上也具有帝国性。1891年，一些属于文化社团Kosmos的顺佩尔克市议员在俱乐部内聆听了一场关于某件新发明好处的讲座，这一新发明就是电话。讲座结束后，这些议员立刻开始游说商务大臣，要求把他们的城市连接入早期电话通信网。到了1892年年底，在大臣的首肯下，这个市议会建立了一个电话局。顺佩尔克的这间电话局建立之后，乌赫尔布罗德也紧随其后。到了1905年，这座城市已经宣称拥有31个电话号码，所有这些号码都与一个更大的跨地域电话网络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案例中，两座城市都积极地把自己和帝国中心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新型网络遍及全国，它们的利益与在其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样意味着冒险，建造军营来吸引让当地人有利可图的军队驻扎就是一个例子。当顺佩尔克议会这么做之后，这座城市并没有吸引到它所希望的驻军。这种行为在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或的里雅斯特等帝国最大的城市中广为人知。不过在此更重要的是，在1895—1914年这20年间，由中等规模和小型城镇实施的帝国项目。这些项目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建造新校舍、医院、图书馆、剧院，到电力照明、公共游泳池、新火车站和轨道电车系统。

为了跟上自己日渐增加的责任和职能，地方公共管理机构进行了扩张和多样化，并且雇用了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雇员。1896年，乌斯季已经雇用了100位这样的职员。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到了1900年，这座城

市必须雇用一个监管不断增长的人员的主管；1911年，乌斯季新建了一座市政办公大楼，因为旧市政厅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增设的办公室。

如今奥地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支付所有这些现代必需品所需的费用，另一个问题则是国家如何为市政府和州政府各个方面的扩张发展埋单。在奥地利，中央政府仍然控制着税收政策，但根据19世纪60年代联邦主义者们在财政上做出的一个聪明让步，国家还需要负责维持各州与市政当局一切社会福利、文化机构、农业发展、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建筑所需的费用以及附加支出。[注]各州确实已经往上述的一些领域投入了资金，国家亦允许它们在帝国税款上增加专项附加费，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这些钱已经完全不敷使用。市政当局有权按照市民所希望的道路发展，这种自由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市议会的议员们最终急切地渴望筹措实实在在的资金，来支付城市发展所需的费用。

各个城镇通过让自己变得现代化以站到帝国发展前列，当需要为此支付金钱时，这些城市有什么可以采用的应对选择呢？城市可以通过垄断部门或者提高收费来筹集资金。但是村镇不具备这一选择。此外，1900年很多州本身也负债累累，而它们也面对着增收直接与间接附加费的法律限制。1905年，各州增收的帝国税收附加费平均已经占到了奥地利直接税额的55%。[注]各州的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于多语言州必须在当地建设不止一种语言的教育文化机构的义务。财政专家恩斯特·米施勒（Ernst Mischler）认为，摩拉维亚和布科维纳重复建设语言机构与服务的“元凶”，就是按照语言群体自治选民、学校系统和文化政策的民族主义妥协方案：

> 每一个政党，在处于其民族主义霸权的时期，尽其所能满足自身民族主义的需求，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譬如在摩拉维亚的一些地区）。而这些“需求”从民族角度来看，每个民族都要得到相似的或加倍的满足，这就往往导致过度的消耗。[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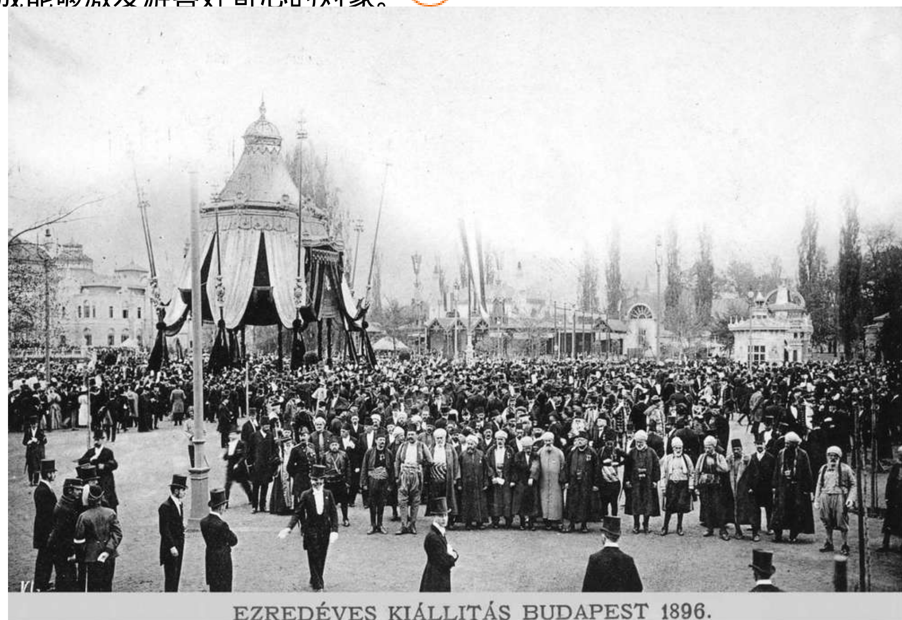
就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帝国的中央政府增扩了不少职能，还大幅增加其人员规模。1867—1907年奥地利议会普选权范围扩展，也增加了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的影响力。这些政党为自己的成员们通过了一系列大范围的新服务，还试图影响官员的任命。地方辖区也倾向于雇用更多受过训练的官员，服务于农业监察、工程建设和卫生保健等诸多领

域。这种扩展的出现，就不只是一种党派活动或者政治赞助的需求。就在扳倒了巴德尼政府的分裂性立法阻碍之后，首相恩斯特·冯·克贝尔（Ernest von Koerber，1850—1919）试图将政治的关注重点从民族转向地方。[注]克贝尔希望迅速增加地区长官的职位，以及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雇员队伍，拉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距离，但是直到1904年克贝尔失势，他也没能完成自己最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即便如此，在1890—1911年，由于政府希望扩大它在乡村的存在与影响，各个政党也在要求新的选民服务，奥地利的年行政支出从400万克朗增至1800万克朗。[注]

发布上述数据的是一个存在于1911—1914年，名为“促进行政改革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旨在重新建构奥地利的行政体系，给予其更稳定的财政支持。这个委员会举办公共听证会、公开征求建议，还发布关于奥地利官僚系统各个方面以及职员的报告。[注]它提出了若干简化不断扩张的公务系统的建议，其中包括减少雇用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官员，多招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文员等。[注]其重点不是为了削减奥地利的官僚体系规模，改革者们希望能让这个体系更有效率地为大众服务，同时稳定自身的财政预算。不过由于当前制度授予地方利益的方式，任何对制度的大规模改革都很难获得众多各类群体支持。[注]

在匈牙利，执政党内部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为了能够利用最新的技术发明，表现匈牙利在欧洲俱乐部中所谓的“现代国家”地位，在独立的匈牙利国家能力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府在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上投入了巨额资金，迅速构建出一个所有铁路线都通向或者穿过布达佩斯的高度集中化系统。地方上同样如此，布达佩斯市政府将城市包装为东方的“多瑙河上的巴黎”，以此来吸引游客。1902年，市政府在匈牙利商务大臣的支持下创立了一家旅游与观光公司，它很快就制订出一个将布达佩斯牢牢嵌入现有的欧洲乃至世界旅行网络的市场计划。亚历山大·瓦里（Alexander Vari）指出，像布达佩斯这样相对较新的城市，它产生的市场需求使城市的掌权者面临一些两难困境。布达佩斯没有像维也纳、巴黎或伦敦等城市中，可以吸引游人的历史纪念物和博物馆，于是它只能推销自己的现代化，同时展现出紧跟时代的面貌。一位本地活动家这样写道：“人们（在布达佩斯）找不到金字塔、斯芬克斯，城内没有像梵蒂冈一样的圣地，也没有艺术杰作与美丽的自然风光，不过在这里的外国游客会欣赏人造景点，从而发现这座城市的有趣之处。”布达佩斯当局

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游览项目，比如1903年，这座城市的“冰宫”（Jégpalota）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在一间暖房观赏热带的棕榈树，同时在暖房中的室内溜冰场享受滑冰的乐趣；此外还有包括电灯照明和晚间焰火表演的多瑙河庆典活动，以及汽车大赛、自行车大赛，甚至斗牛表演。通过上述这些活动，布达佩斯的执政者们试图把他们的城市变成能够激发游客好奇心的对象。[注]



1896年，布达佩斯千年庆典的开幕活动。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1000年（Alinari / Art Resource, NY）

1880年之后，匈牙利政府投入巨资建设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于是回过头来看之前这股建设的风潮，就更像是民族主义者残余的忧虑产物，而非人们对公共生活越来越高的参与度的响应。与奥地利相比，匈牙利地方和国会的选民规模在1867—1919年缩小了，市政权力比以往更紧地掌握在小部分地方绅士、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精英手里。[注]在发展基础设施与市政服务、汇集更多居民的方面，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匈牙利市议会所面对的压力要远远小于奥地利的同侪。匈牙利实施的现代化项目通常适用在城市传统意义上的中心，更倾向于服务精英资产阶级的聚居区，同时，这些项目还用宏伟的建筑和新技术发明满足了对国家荣耀的渴望。如果大众政治的表现出现在匈牙利，那么展示它们的地点往往在街头，或者本地社团生活内，而不会出现在特定的政治背景，比如市议会、郡议会或匈牙利国会之中。这也意味着匈牙利政治社会就不会遇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意识形态激进化压倒性地主

宰奥地利政治生活的遭遇。

19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现代化的诱惑以及在欧洲范围内表现出“进步”的目标同样体现在设立新基础设施之外的表现与行动上。对此，工人组织、拥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信念的女权主义群体，以及教育和生活方式改革者们——他们试图改革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其与他们宣称的欧洲进步步伐保持一致——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从动物保护、医学上的优生疗法到素食主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1913年共有10家素食者餐厅，维也纳有6家，布达佩斯有1家），社会活动家们提出了现代生活的全新视角。此外，以各种试图扩大女性在各种职业就业机会的妇女团体为例，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转变也成为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普遍衡量标准。

在奥地利，民族主义组织中的妇女组织十分引人注目，它们也光荣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千名女性活动家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她们在组织活动、筹集资金以及为了民族主义事业制定动员地方社会支持的新方法等方面的高效。与此同时，从事白领职业的女性组织也要求改善从津贴到工作环境各方面的现状。譬如在1900年前后的数十年，奥地利的女性公务员人数接近9 000人，她们就为了消除严重的薪酬歧视和获得足够的退休金而不懈奋斗。

1896年，为了匈牙利的千禧庆祝活动，人们撰写了一部校园剧《女性的赞礼》（*A nök Hódolata*），并在全匈牙利的女子学校中上演，它从给予女性机会方面赞颂了匈牙利的现代化。在剧中，一个名叫“诽谤”的角色试图让代表罗马尼亚、德意志和斯拉夫女性的三个角色针对“匈牙利亚”，然而“匈牙利亚”获得了胜利，她的法宝就是用匈牙利社会为所有民族的女性准备的众多机会。就像这部戏剧表现的那样，当下的现代女性，有的做了教师，有的成为邮政工作人员和电报发报员，她们都为匈牙利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00年之后，只有很少的几个主要政党支持女性拥有普选权，这其中最有分量的当属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捷克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后者联合了捷克进步党和捷克青年党，在1912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中的一个布拉格选区，帮助民族主义作家博任娜·维特科娃–库内蒂卡（Božena Vitková-Kunětická，1862—1934）作为“抗议候选人”成功当选。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尽管政府并不允许她就职。

如果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城镇中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即所谓的现代化）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方式，以及参与民族主义公共活动或者加入司法机构的机会，它们同样在性别层面产生出了新的文化利益，譬如卖淫和性变态。在欧洲其他角落，19世纪90年代廉价的娱乐图文小报的寻租刺激了报纸业内的竞争，它们试图把一个新的城市社会中令人惊奇的元素带给读者，通过吸引眼球增加销量。这种情况，在那些意图吸引游客或想要寻求军队驻扎的地方表现得尤其明显，娱乐小报热衷于报道所谓现代化中更加阴暗的一些内容，其中包括广泛的卖淫现象、越来越显而易见的同性恋圈子，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众多性犯罪。斯考特·斯派克特（Scott Spector）有一项颇具启迪意义的分析，它针对的是1907年一份维也纳报纸丑闻，揭示出当时的新闻报纸为了扩大读者群，往往会详尽描述一些特别耸人听闻的危险，因此这些报纸宣称，一个可敬的大众阅读群体实际上所知甚少。在给予有关现代城市危险的“情绪化内容”之后，像维也纳的《奥地利犯罪画报》（*Illustrierte Österreichische Kriminal- Zeitung*）这类报纸就宣布，告知迅速增加的读者群在他们之中存在着“不受控制的妓女”“妓女们的皮条客”以及“越发自信的鸡奸者”是一种义务。安妮塔·库里毛伊（Anita Kurimay）分析了一年之后的1908年，在当时的匈牙利出现的一份警方公报，这份公报的内容更加深入，它向读者对比了针对女性和男性卖淫者不同的惩罚措施：

> 在领有执照的妓女和私娼中，有不少人因为自己放荡难抑的天性和对男性的渴求，把她们自己放在了受人谴责的立场上。但在男妓中，这种事却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都是生意人，这些人为了金钱，甚至会抛弃为人的最后一丝尊严，与野兽交媾。因而他们在道德上的悖乱导致犯罪，就可以让人理解了。

当然，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匈牙利作家们往往把盛行于布达佩斯的性变态现象与都市发展和这座城市迅速的转型变革联系在一起，称其为“东方巴黎”：

> 这就是我们美妙的布达佩斯成为一座大城市的原因。数量庞大的夜总会和咖啡厅进一步发展和塑造了已经苏醒的欲望。反过来，在这座城市中可以体验人性的所有欲望，包括“天性的野蛮衍生物”。它们是狡猾多端、名声在外的种种邪恶行为，它们在各种恋爱场所迅速增加，就像它们在许多家庭内部所做的那样。

在内森·伍德的研究中，发行于克拉科夫的类似报纸不断试图把自己的城市与欧洲其他“现代”城市相提并论，其中往往会涉及对随着现代化产生的令人震惊的不道德行为事无巨细的描述。在这些报纸上，暴力犯罪和堕落性欲的描写已经让人难以启齿，更不必提抢劫、杀婴和少年犯罪等罪行，在它们看来，这些都是一座城市要成为东方的巴黎或伦敦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有一份报纸这样解释：“克拉科夫并不真正会成为伦敦或者巴黎，但是在这座小小的克拉科夫城中，极度贫困就像它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那样，制造了大批狭小阴暗的贫民窟。”1910年，克拉科夫有了自己的娱乐画报：《每日导游画报》（*Ilustrowany Kuryer Codzienny*）。在一篇曝光城市儿童卖淫现象的报道中，这份报纸扬扬自得地警告读者：

> 想一想我们对故乡完全的爱，想一想我们为那些极具价值的历史古迹保留的完全虔诚……我们不能忘记，随着时间流转，克拉科夫正在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城市，同时伴随着它发展的脚步，伟大城市所有的腐败堕落也随之而来，或许到来的脚步会更快……注

如果说奥匈帝国的城镇自觉成为现代化的化身，那么会有很多人担忧现代化是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等到媒体巧妙操纵舆论之后，他们的忧虑就发生了转变，反而认为这是现代性中必须接受的一部分。

从兵役到爱国主义

1868年的征兵法是自由主义时代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改革，它同样造就了大众与帝国产生联系的方式，在数百万男性公民中缔造了一种重要的共同经历，哪怕这些人的服役期结束，这种经历和情感也不一定会断绝。如同当时其他的欧洲社会一样，这部新法动员了帝国全境所有阶层的青年男子，共同经历长达三年的军事化训练和兵役。历史学家们在国家建构的背景下，把19世纪的征兵法看作一种强大的工具，它鼓励年轻人看到自己家乡所在地区和更大范围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塑造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注而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开始探讨关于奥匈帝国大众兵役制度在国家建构和塑造国民身份上所扮演的角色。注被征募入伍服役的经历所给予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背景的男青年们的，是一种对他们服务的国家产生的广泛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究竟可以深入

到什么程度呢？

在19世纪的前50年，奥地利兵役制度在每个地区的兵役特点、征兵规模和服役期限都不相同，而且常常会产生变动。比如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匈牙利士兵有时需要毕生服役，而在帝国其他地方，服役年限被限制在14年。服役的年轻人，通常由抽签选出。但是鉴于帝国内部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逃避兵役方法（包括可以豁免服役的特殊职业、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还有可能通过交钱免除服役），通常都是来自乡村地区的穷人入伍当兵。1840年，为了让全帝国的兵役标准化，政府把匈牙利的服役年限降低到10年，又在1845年在全帝国推行了8年兵役制度。[注]

1868年12月，新的兵役法决定性地缩短了服役年限，并使其适用于奥地利和匈牙利所有的男性公民，从而代替了哈布斯堡君主国传统的有选择性的征兵政策。[注]新法规定全帝国的男性公民都平等接受抽签征兵，但每一年中，不是所有对应候选者的号码都会被抽中。事实上比起其他欧洲大国，奥匈帝国每年征召的符合入伍条件的人，占比很低。那些没有获得征召的人需要加入后备军，或者独立的地区民兵队伍，在奥地利，这样的民兵组织叫作警卫队（Landwehr），匈牙利的则叫作国民军（Honvéd）。[注]至于符合大学入学标准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后备军军官的身份，志愿接受一年的军事训练。[注]这就保证了国家可拥有大量的后备役军官，并且使奥匈帝国的后备军有着比邻近的德意志与沙俄更高的社会和宗教多样性（奥匈帝国后备军的军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后两者的军官群体，至今还维持着以贵族为基础的社会排他性。

这项改革造就了一支有着普遍性特征的军队。全帝国年满18周岁的男性从军入伍，成为一种普遍的仪式。一支流行于19世纪70年代的斯洛文尼亚民歌解释了帝国新兵役制度的平等性，它这样唱：“无论是贵族少爷还是农民之子，所有人都会被征召。”[注]此外，伴随着全新的普及初等教育学校体系，入伍服役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它各个阶层的男性公民之间最具影响力的连接点。这种联系或许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但尽管如此，兵役制度仍然起到了向全国各地的男性公民灌输一套既定的惯例与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在过去，兵役被看作一项要尽可能摆脱的负担。但是在现代军队服

役，却对潜在的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受征召者有益。在这三年中，他们可以得到定期发放的军饷、医疗卫生护理、食宿安排以及对退伍之后的平民生活大有用处的技术培训，这些士兵还能接触学习帝国中的其他语言，并且有在帝国其他地区服役，体验不同生活的机会。[注]

对1868年的改革者们来说，兵役不再单纯变得普遍，它还会变得更加人性化和理性化。过去一些常常用来无故体罚士兵的残忍手段都被禁止，政府还立法限制了使用体罚手段的形式。这项改革部分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信条（不过不是所有的军队指挥官都一定接受它），即帝国公民士兵的地位，值得获得新一个层次的尊严并受到尊重。虽然如此，克里斯塔·海穆勒（Christa Hämmerle）的研究指出，许多成为营房生活特色的旧惯例仍然沿用到了20世纪，来自普通士兵的回忆录与信件中，也往往抱怨无端受到不合理的过度体罚。[注]

1867年之后，军队遇到了帝国在地方、州和帝国官僚体系中遇到的相似问题，特别是由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宪法上的承诺和要求，它不得不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对一般的奥匈帝国常规军队来说，为了军队的效率和帝国的统一性，它们采用的指挥语言仍然是德语。但是匈牙利的民兵组织就使用匈牙利语来指挥（克罗地亚的地方民兵队伍也是如此），而奥地利的民兵组织使用的语言则是德语。[注]每一位被招募进常规军的士兵，都必须学习80个左右的德语命令，作为常规训练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军队还使用德语作为联系军中各个机构之间的服务语言。

不过在1868年，入伍服役的士兵拥有了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训练的权利，他们还可以在所在的团内部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还可以用母语和最高至上尉军衔的军官对话。这项权利来自奥地利宪法所做出的语言运用承诺，但它适用于整个奥匈帝国的军队，而不仅仅是来自奥地利一边的士兵。而且，如果在一个团内有超过20%的士兵使用帝国内部的一种官方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就会成为这个团的官方语言。军队接受检阅时，士兵们也可以用自己团的语言高唱军歌。政府也鼓励每个团的军官学习他手下士兵们所用的语言。而自从军队不断输送军官去新的驻地，而且一般不会（至少不会长期）让他们在家乡服役，因此这项语言要求就变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军官们的训练课程中，几乎不包括语言课。[注]到1900年，这些法律和传统的交汇产生出一种功能结构性的多语主义情况，这在全欧洲的军队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军队通过

普遍使用德语、穿着统一制服、参与同样的传统来使官兵一致化的同时，军队团级别的语言实践，就像诸如初等教育等帝国实验一样，将士兵们民族主义化。

不过军队中的团级语言系统以及作为指挥语言的德语，不断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会，以及各州议会中引发争议。民族主义政治家往往引用那些军官无法熟练使用所指挥兵团语言的特定案例，来给军队贴上推广公平使用语言政策迟缓的标签，或者指控军官想要德意志化或者匈牙利化手下的士兵。匈牙利政治家则不时要求匈牙利语在军队中的平等地位，以及要求德语不再是唯一的指挥和服务语言。19世纪八九十年代，激进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利用指挥语言问题动员了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对抗主导了匈牙利国会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还指控后者是民族主义令人羞耻的现状的奴隶。他们的这些行为造就了1903—1906年的重大宪政危机，当时民族主义反对派剥夺了匈牙利执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但他们没能组建一个让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接受的政府。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决定在军中继续使用单一的指挥语言。他以威胁要在匈牙利引入男性公民全民公投的方式迫使匈牙利新政府妥协，放弃让匈牙利语成为新指挥语言的要求。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有多么想要从各方面增强匈牙利之于奥地利的独立性，他们对男性全民公投的恐惧就有多深（这会令大批非匈牙利语群体得到投票权，同样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社会阶层也会获得投票权），这迫使他们最终让步。

当然，让匈牙利政治家们怒火中烧的还不只是德语在军队中作为指挥与服务语言的特权地位。政治家们还声称基于奥地利宪法条款的军队团级语言实践政策，确立了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在公共运用方面的合法地位，他们认为这直接破坏了匈牙利的语言同化政策。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同样设法加强匈牙利语作为驻扎在匈牙利境内部队所用兵团语言的地位，同时阻止其他语言在这些部队中的运用。当然，这项尝试也宣告失败。

当官兵们驻扎在帝国各地时，毫无疑问当地的情况也加强了军队兵团的多语种实践。我们已经见到帝国的城镇如何相互竞争，吸引可以为它们带来经济利益的驻军。这种情况和地方政客致力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并存，而有时前者甚至会压过后者的重要性。1882年，卢比安纳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取代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在市议会的地位，他们很快就把德语标识改为斯洛文尼亚语，当地的行政语言也从德

语变为斯洛文尼亚语。但是这座城市内同一群民族主义政客与当地驻军军官联系时，还是继续使用德语，而且他们还同意在军队营房中使用德语和斯洛文尼亚语的双语标识。政治家们这种实用主义的表现来自感激之情，他们认为自己的城市位于一个更广阔的帝国环境之中，帝国体制同时给城市带来经济利益，在帝国其他市议会中这也是公认的事实。不过，政治家们对军队在当地的存在持有的积极态度（暂且不论军队使用德语的情况）同样是源于一种强烈和大众化的地方爱国主义。对许多卡尼奥拉人来说，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和奥地利爱国主义都是并行不悖的，即便时至巴尔干战争阶段（1912—1913年），还有不少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同时支持塞尔维亚的战事。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往往自诩为帝国最忠诚的臣民，而同时说斯洛文尼亚语的退伍老兵又表现出对自己民族极大的忠诚。

在帝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军队同样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来自当地营房的驻军军官经常参与所在城市的地方社团组织庆典文化，他们参加舞会，也在筹款活动中露面。军乐队也常常在当地举办公开演出，并且参与到地方宗教节日和帝国假期庆祝活动之中。此外，不少军人还会让自己适应因本地情况而产生的文化诉求。比如在卢比安纳，为了表现民族平等，军官试着参加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庆典活动，偶尔还在公开场合用斯洛文尼亚语发言，军乐队也会经常演奏斯洛文尼亚语的进行曲。

在此我们很难评估军队多语种的语言实践，以及其他军队常见的服务方面对广大帝国人群的影响。那些主要从二元制的角度总结帝国机构特性的历史学家（他们既没有通过大众民族主义的方式弱化哈布斯堡君主国，也没有从大众爱国主义的方面强化它）例来把军队看作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军团的语言运用情况和在兵团内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自觉，却很难适用于军队的传统定义或者它单纯作为帝国的一种向心力的角色。塔玛拉·舍尔（Tamara　Scheer）在她的研究中无疑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修正，她主张体制化的多语主义具有同时强化民族主义的和帝国的爱国主义倾向的作用。这一点在1900年前后，从不断增长的退伍军人团体中，老兵们的活动和态度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退伍老兵开始用创建爱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方式来缅怀他们的从军经历时，兵役经历就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他们产生对帝国的认同感的方式和程度。退伍军人协会积极参与老兵们的家乡中与

爱国事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和慈善工作。这些参与地方活动的表现并非展示出一种军事化的态度，而是退伍军人们想要通过社区服务和一种仪式化的庆典文化，保持他们的爱国主义能动性的渴望。从基层兴起的退伍军人组织的发展引起了政府层面的注意，很快引起了它们的兴趣。帝国与皇室政府中有不少人正在寻求巩固人们对帝国忠诚心的新方式，于是他们把退伍军人的组织视为一种值得他们投入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事业。

劳伦斯·科尔（Laurence Cole）关于退伍军人社团的研究指出，它们在19世纪最后10年的增长情况（1890年，内莱塔尼亚的这类组织有1 700个；到191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 750个），可被看作一种理解人们回过头来把个人意义归结于投身军旅的方式。这些老兵的例子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帝国最后的10年岁月中，爱国主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怎样一个复杂的角色，以及爱国主义和以地方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自豪感之间复杂和难解难分的关系。一个退伍军人组织的特点、成员情况以及在地方的作用都是由特定的环境和地方因素决定的。与其他种类的社团（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社团）不同，退伍军人团体动员吸纳的成员们，社会背景的差异更大。在一些地方，退伍军人组织的成员有着中产阶层下层、农民或工人阶级的面貌，这意味着在地方自由主义显贵把持的社团之外，退伍军人组织为老兵们提供了一个社交的替代选择。科尔就曾举例，在奥地利沿海地区和蒂罗尔，退伍军人组织常常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天主教党派结盟，削弱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在这个案例中这些人往往是意大利裔）对公共空间传统的主宰地位。正如科尔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的社会维度意味着在上述地区，退伍军人的爱国文化同时也“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领域（沿海地区和蒂罗尔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的里雅斯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一成不变”。

政治家和官员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这种不断增长的大众现象，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大众政治以及民族主义风潮盛行的时代，退伍军人在奥匈帝国的公共生活中起到了一种蓄积积极爱国主义情感的作用。在克贝尔政权执政期间（1900—1904年），正如我们前文中所见，政府试图在巴德尼语言法令造成的混乱和冲突之后重建奥地利政党系统的政治生命力。克贝尔内阁甚至探讨过在帝国的奥地利这一边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退伍军人资助，作为强化帝国国家意识的一个手段。与此同时，

国防部建议把这样的一个组织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这样就可以在战争情况下动员该组织的成员为政府承担起治安任务。不过因为退伍军人决定保护他们的地方自治性，因此这个创造一个统一的覆盖全帝国的退伍军人组织计划最终宣告失败。地区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是老兵自我认同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必提他们的帝国爱国主义在其中的重要性。许多本地和州级别的组织并不希望它们组织的独特性在一个覆盖范围更大的联盟组织中被抹杀。注

大众社会与政治文化

1905年11月5日，来自帝国各个城镇的数千名奥地利人举行了要求男性全民公投的和平示威。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的里雅斯特、林兹，到东方的克拉科夫和利沃夫，各州首府城市都目睹了主要由工厂工人组成的前所未有的人潮涌上街头，要求获得参与帝国法治进程的权利。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地方上的一些城市，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上奥地利和施蒂利亚等州尤其如此。就在另一场示威活动演变为流血事件的前数日，维也纳的警察还允许游行者们进入靠近霍夫堡宫的环形大道，向国会大厦行进，然后在国会大厦前，示威工人们在警察的旁观下举起了黑金两色旗杆上的红旗。注只有在布拉格，示威活动变成了暴力事件。抗议者们筑起街垒，和警察们对峙几乎两天。波希米亚行政长官查理·库登霍韦伯爵（Charles Coudenhove，1855—1913）请求维也纳方面增援，以及授予他颁布戒严令的权限。维也纳政府的内政大臣批准他后一个请求时，也建议库登霍韦伯爵保持克制，警告他这次事件有可能激起内战。当天稍晚，首相保罗·高奇（Paul Gautsch，1851—1918）发布了一则准备登载在布拉格报纸上的消息，消息正式批准了所有的和平示威行动，但同时也警告任何暴力行为都会使政府中止人们行使公民权利。注

这些事件表现出这个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容忍，甚至回应自下而上的政治表达，并同时试图回避暴力。1869年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待工人普选的要求时还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但如今经过30年不同派系之间的民族主义政治冲突，一些政治家认为工人阶级选民会成为沟通议会政治和整个帝国关心的社会经济议题之间的可能桥梁。也就在同一时期，国际形势也让政府无法继续忽视工人的诉求。

帝国11月的示威行动（伴随着偶然发生的暴力事件），是在1905年沙俄的革命影响下展开的。当年10月，经过长达数月的社会动荡，沙皇不得不让步于宪法和一个具有立法权的国会，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简单地对沙俄的剧变做出反应。奥地利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从1869年开始就公开表示要求得到普选权，在那个时候，他们遭到曾经的1848年革命参与者、内政大臣卡尔·格斯科拉冰冷的蔑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因为严厉的法律转入地下活动，而这些法律的起草正是政府对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感到恐惧的回应。当这部法律失效后，1889年1月1日，活动家们在一场召开于海恩菲尔德（Hainfeld）的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名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党，这个政党的规章信条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主要由维克多·阿尔德博士（Dr. Viktor Adler，1852—1918）制定。1889年7月，这个新政党在巴黎参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

就像帝国本身，这个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中央集权主义化和联邦化两种不同的动力驱动。掌管政治结社的法律限制了一个包括许多地区和地方分支机构的中央集权式组织的成立。因此，许多政党的领导人懊恼地发现，这使得一些更独立的地区性或地方政党分支获得了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都以文化和社交组织的形象出现，比如阅读俱乐部、体育俱乐部、歌咏俱乐部以及系列讲座等。与正式的政治组织不同（它们更像是民族主义社团），这些群体可以更轻松合法地组织起覆盖范围更大的联盟组织。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与仪式，特别是每年精心安排的5月庆典，成为党内的一项重要事务。这些庆典是更多一般人可通过参与大众集体活动的方式接触这些党派的仅有机会。奥地利的领导人，比如阿尔德也把每年的5月庆典看作强调工人成熟性、可敬和尊严的机会，这些活动选在一些通常不被工人们占据的场所，比如维也纳的环形大道。[注]

19世纪90年代，工会化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侧迅速展开，这同样增长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即社会主义胜利一定会在奥地利发生。当时的一份记录为读者们提供了奥地利公会成员的数据：1892年，其成员人数为46 606人；到了1902年增长为135 178人；至于在为了争取普选权改革而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游行的1906年，这个数字为448 270人。这样高的数字，已经超过了英国和德意志，接近同一时期公会成员数已达数百万的法国所拥有的工会化比例。然而同时期的匈牙利，在1905年只有71 173名隶属工会的工人，他们绝大多数都身在布达佩

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以及工会成员的力量，在帝国的工业区，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施蒂利亚、上下奥地利以及的里雅斯特。在1897年，这个党采用了语言/民族路线的联邦主义结构，以便更有效地（在选举期尤其如此）利用自身资源。自此之后，这些经过重组的民族主义群体就开始独立召开各自的大会，并且每隔一年集中召开全党会议。这情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个奥地利政党处在民粹主义的政党竞争压力下，正式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政党。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多民族身份以及对普选改革的认同，使其实际上成为一个支持帝国民主模式的政党。这种特质在该党1899年于布尔诺召开的党大会上得到了强化。在大会上，它第一次接受了一个联邦主义改革方案，该方案鼓吹把奥地利转化为一个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制订这样一个方案，部分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指控他们的社会大同主义对民族利益漠不关心的回应。正如雅各布·拜内什（Jakub Benes）所言，在回应这类指控的运动中，捷克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的使用者们都强调，他们对政治的民主方式会比资产阶级的方式更有效地服务于所属的民族共同体。

在此重要的是，这些人构建了他们自己处理民族主义政治的途径，奥地利工人们不是受害者，也不是“一战”前最后10年中，资产阶级四处蔓延，主导了政治讨论的民族主义的被动接受对象。他们强调自己产生了更加民主的变化，并且对国族身份有了更对立化的概念。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通过第一次给予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一个关于帝国各文化群体平等共存的政府纲领性文件，布尔诺方案同样明确展示出这一党派对帝国存在的承认，尽管这是以一种更民主化的形式达成的。

关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问题并不只是个策略问题。在一些例如奥托·鲍尔（Otto Bauer）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还是一个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社会可能性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正如关于文化差异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对特定奥地利与匈牙利法律和宪法承诺的响应，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产生的重要接触也塑造了它本身。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理念，认为民族认同感纯粹属于上层建筑。到了1900年，他们相信这些差异已经深深扎根于奥匈帝国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拒绝接受民族主义者认为帝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观点。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民族身份具有一种自发的所谓“个人

准则”，而不是基于地域、历史或是先天赋予的，因此他们提出文化自治以及各民族平等的思想。与此同时，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实现工人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正义。他们还拒绝接受像摩拉维亚妥协方案这样的非民主解决方式，在这类方案中，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意在纳税人中实施有限制的普选权，并且在每个民族中继续保留具有特权色彩的分层投票制。与这两类民族主义者不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文化事务联邦化，同时在一个超国家的层面将经济和政治政策中央集权化。他们同时还主张在奥匈帝国各民族之间公平分配文化机构（以及赞助它们的资金）。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赞同上述提议，尤其是来自波希米亚的捷克语使用者。注

1897年，通过一项新的选举改革，帝国在已有的4个国会选举投票层级（大地主、商会、城市、乡村）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层级。在这一次改革中，不论人们收入多少，只要年满24周岁，并且在所居住的区域居住满至少半年，就可以获得当地的投票权，这个新的选举分层，在总计425人的国会代表中选出了72人。注正因为有了这次改革，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在选举中竞争的机会，当年3月，该党得到了国会中的14个席位。但在各州和各市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却因为更狭隘的投票限制、分层级投票，以及不公平的重新划分选区行为，存在和表现普遍被削弱了。为此，参政权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1896年的党大会上，阿尔德宣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参政的党”。在这些情况和宣言作用下，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1月的投票参政权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帝国群众的大规模支持。

这些示威游行在11月28日，即国会将受理男性全民投票权相关法律的当天达到了最高峰。社会民主党人在当天策划了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事先得到了一些雇主和政府的同意），这样成百上千的男女就可以在有组织的静默下列队行进，经过国会，并且在全帝国的城镇举行类似的示威活动。同样支持投票权改革的地方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也加入社会主义者们的示威活动中，这使工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选择的道路会不可阻挡地走向成功，帝国也会迎来社会主义的未来。

争取男性公民普选权获得的成果，以及分层级投票制度的终结在这次改革中得到了体现（并且在1907年1月26日由皇帝亲笔签署成为法律），它给予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种极大的成就感，并且支撑起了他们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属于他们的改革，不属于民族主义者，

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单枪匹马地破坏了体现为分层级投票制度的贵族封建特权，推翻了阻碍他们获得权力的壁垒。1907年5月14日和23日，在投票权改革之后举办的第一届议会选举中，由于选民极高的参与度（超过80%），令社会主义者所属的党派一跃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社会民主党人在百余万选民之中，获得了23%的大众选票，并得到了516个代表席位中的87个。奥地利的这次选举，是通过一个个单一选区进行的选举，而不是在比例代表制下进行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社会民主党人没能获得更多代表席位。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渐增强的情况下，选举获得的巨大胜利看起来已经确认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最乐观蓬勃的发展局面。这个结果同样向社会主义者们显示出一个事实，这个帝国属于他们。相比较德意志、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类似的工人运动，这场胜利造就了一个关于国家所有权的独特叙述角度。注

这场选举同样令政府，乃至皇帝的希望得到了确认。他们希望改革可以授予那些致力于让帝国强大的跨地域政党权力，让它们与民族主义的地区力量相抗衡。在1900年前后，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此一致认同。比如卡尔·伦纳就反复强调，男性全民投票权将直接把选民们的注意力从充满派系色彩的民族主义问题，转向需要具有全国性视野的经济问题。注

投票权改革还在不同层面显著地对奥地利政治进行了重新配置，并通过这种方式，把帝国变成一个对选民和他们的党派更重要的整体。举例来说，1907年改革另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就是各个地区性的社会天主教政党，它们共同加入国会，形成了一个拥有96个席位的联盟。约翰·波伊尔中肯地指出，1907年之后的哈布斯堡王朝政治，产生出了令人民团体合法化的新标准和期望，同时也加重了在地区上有影响力的贵族们的失望，他们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旧的分级体系赋予他们的特权之上。注此时这些贵族在各州议会和市政当局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地减弱。

这些大众政党主要吸引的是工人或者天主教徒身份的潜在选民，而不是特定民族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使得它们在特性和吸引力上都变得更加帝国化或具有帝国范围的广度。它们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寻求的是通过把帝国和它的众多民族变成它们政治风潮煽动的对象，来胜过某一个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组织相比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在通过各式各样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组织网络维持大众支持方面，取

得了更大程度的成功。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天主教徒相比，虽然对专制主义的体制更加容易不满，也更容易对帝国产生抗拒情绪，但他们双方都挑战了现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并且设想了一个改革后的帝国的未来。

帝国还有未来吗

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和政党政治家在商谈让帝国运作得更加有效，并且给予其更长期政治稳定的结构调整方面，表现出了灵活的创造力。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缔造摩拉维亚（1905年）、布科维纳（1910年）、加利西亚（1914年）和布杰约维采（1914年）妥协方案的总设计师们，以及1907年投票权改革的推动者与官僚体系改革的发起者们，都制订出种种消弭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关冲突的方案。他们的工作是政治化的，并且建立在环境造就的利害关系基础之上，而且显然，这些工作并不完美。这些解决之道大多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点是由地方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一个地方的模式就很难适用于另一个州。比如摩拉维亚的选举中，属于大地主投票层的选民甚至不必选择民族身份。在布科维纳，妥协方案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允许建立一个犹太民族选举团体，或者说投票分层级，即便从理论上说，犹太人都不被视为一个民族。[注]

一旦这些妥协方案付诸行动，它们经常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以摩拉维亚妥协方案为例，当时和后世的分析人士都注意到，由于这个方案强制要求过去不关注民族认同的人们选择一个民族，反而无意识地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注]此外，一旦这些妥协方案生效，奥地利的高等法院就必须在认定法律责任时，考虑到这些新的前提条件与设想。在摩拉维亚，这就意味着个人渐渐失去了决定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孩子民族身份的权利。一旦民族分类被确定下来，人们如何在选举中行使投票权就决定了他们子女的学校教育。民族主义者要求国家强制推行民族归属的客观标准，防止人们从一个民族转变到另一个民族。

1914年之前的10年，奥地利见证了一股希望在地区性的各州，甚至是个别村镇（比如布杰约维采妥协方案的案例）的层面，商讨针对结构性冲突的特殊解决方案的风潮。尽管这类发展中没有一个达到了1867年

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的协议规模，但在某些方面，奥地利在帝国的最后数十年内变得更加离散，或者变得更联邦化，尽管在这段时间，帝国的公务员系统迎来了指数级增长，而最高法院也在不断推出全奥地利共同的法律和行政标准。

即便是在民族主义矛盾看上去最不可调和的波希米亚，为达成一个联邦化妥协方案的非正式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着，哪怕它们往往秘密进行。民族主义政治家认为，如果没有受到其他更加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挑战，与民族敌人进行和解谈判几乎是不可能的。1913年7月，首相卡尔·施图尔克伯爵（Count Karl Stürgkh，1859—1916）在大众的批评下代表皇帝解散了陷入绝望僵局的波希米亚议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并把波希米亚事务交到一个行政委员会的手中。数月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挣扎在财政危机的边缘，而来自民族主义政党的阻碍使得议会不能解决财政危机。许多针对施图尔克行为的批评，都认为他这么做是对宪法的违背（当然理论上的确如此），捷克民族主义者代表以阻挠议会立法进程作为响应，强令其中止。不过历史学家洛塔尔·赫贝尔特指出，德意志和捷克民族主义政客或许会在公开场合大加挞伐施图尔克，但私下里他们却因为他解决了波希米亚的财政困境而大大松了一口气。通过让行政委员会负责波希米亚事务，施图尔克保证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至于中断。这个特别的行政委员会反回来还雇用了不少已经被解散的执行委员会中的原雇员，让他们继续工作。注施图尔克承担了财政危机的责任，富有技巧地让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如释重负。施图尔克的这种行为，会为另一个联邦制协议的出现铺平道路吗？或者说它将导致一个集权主义的奥地利国家的再度复兴？

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帝国国家建构案例同样指出了几个可能的发展方向。1910年2月17日，就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宣布将波黑并入奥匈帝国的决定之后16个月，波黑得到了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议会。不过将这个地区并入奥匈帝国的过程，却涉及一些复杂的宪法层面的操作，这些操作需要制定一些法律条款，而且还要直接无视一些现有的宪法实际。直到被兼并之前，奥匈帝国共同的财政大臣管理着这个帝国唯一的殖民地（或者说保护地）。以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艾伦塔尔伯爵（Count AloisLexa von Aehrenthal，1854—1912）的话来说，在1908年，兼并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扑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波黑进行领土扩张的希望，以及奥斯曼帝国希望将它归还给一个改革后的帝国的期待。不过从哈布斯堡王朝内部来看，要如何让这个地区成

为帝国的一部分呢？

在帝国内部，波黑没有符合宪法的位置，除非奥地利或匈牙利直接将它变成一个国内领地，但双方都不同意这个方案。另一个多少有些乌托邦式的可能，是把波黑看作一个即将加入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新南斯拉夫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础，这个新国家或许还能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得到一些额外的土地（比如奥地利的卡尼奥拉、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以及匈牙利的克罗地亚）。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或许更倾向于这种解决方案，因为他对哈布斯堡所属的南斯拉夫地区所拥有的抱负抱有同情，而且他反对匈牙利人的力量。但是匈牙利的领导人拒绝出让任何一块土地，更别提要让帝国从“二元”变成“三元”，从而导致他们的影响力遭到削弱。他们还反对匈牙利吸纳更多斯拉夫人，而如果匈牙利吞并了波黑，这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波黑的1910年宪法，或者说地方法令包括了人权法案、公民法、建立一个绝大部分经选举产生的国会或议会、一个司法系统以及一个公务员系统，某种程度上，波黑绕过并且考虑到了适用于帝国其他领土上的结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者的身份管理这块新的领地，他在萨拉热窝拥有的权力并不来源于一个家族对波黑地区的所有权主张，也不来自波黑对《国本诏书》的承认，而是来自他本人作为奥匈帝国的皇帝与国王的身份。不过在新宪法下，波黑处在一种未受承认的法律边缘地位，在理论上它既不属于奥地利，也不属于匈牙利。虽然波黑人选举出一个议会与许多市议会决定他们的内部事务，从结构上看，他们无法在就影响整个帝国的议题（军事、外交、公共财政等）展开的讨论中拥有话语权。[注]

在萨拉热窝的波黑议会包含了若干投票层级，这和奥地利各州的议会很相似。不过，与如今以语言差异为基础的许多奥地利民选机构不同，波黑内部在宪法上的分歧通常从宗教层面理解和表述出来。1905年的妥协方案允许摩拉维亚在城市和乡村投票层级区分出捷克和德意志两个单独的投票部门。而在波黑，类似的划分则是把三个投票层级（大地主/最高纳税人、城市、乡村）中的人们按照信仰分为东正教教徒、穆斯林和天主教教徒三个部门。[注]位于后两个投票层级中的波黑选民，必须是年满24周岁并在波黑居住至少一整年的男性公民。不过与奥地利的情况不同的是，投票并不限制选民所在的地区，超过24岁、在波黑当

地的公务行政体系中工作，或者受雇在铁路工作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男性公民，也有权在当地投票。

波黑宪法的制定者们，几乎是将奥地利1867年宪法中列举公民权利的语言逐字逐句照搬到波黑宪法中来，不过根据帝国新领土的特殊情况，宪法中又加入了一些适用于当地的特例。这部法律给予波黑人一种从属性，或者说公民身份，因为在当地不存在适用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帝国公民身份。法令承诺保障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财产和迁移的自由。它同时还保障，所有在领土上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都可以进行公开宗教活动。在这里，宗教上的特殊情况尤为重要，因为在波黑的这部宪法中，承认了沙里亚法适用于裁决穆斯林的民事案件。这份法律文件还确保了不同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捍卫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保护民族特色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第19条，依然强有力地保障了个人在学校和公共生活中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注]

在详细分析这部法律及它起草时的周边环境的一部作品中，切尔诺夫策大学法律教授卡尔·兰普（Karl Lamp，1866—1962）警告这份法律文件将对奥匈帝国的未来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他认为波黑地方法令并未明确波黑的宪法地位，特别是奥地利和匈牙利都无意为1908年吞并当地的行动修改自己的宪法（甚至一般法律）。兰普如此发问：波黑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注]它的地位将如何影响奥匈帝国其他地区未来的宪政发展？

我们或许会把波黑宪法和帝国中其他权力离散化和联邦化的发展放在一起。但兰普坚信这部法律是帝国“在新领地上的文化工作”的一个开端，而不是一个终结，他坚持“把波黑宪法的影响放在未来非集权化的发展方向上是一个错误”。反之，他相信从长期来看，奥匈帝国在殖民地政策上的初步尝试会让帝国进一步集权化（哪怕是无意识的），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削弱奥地利和匈牙利作为国家的独立存在感。[注]帝国对殖民地政策的执着追求，造就了日后与奥地利和匈牙利产生更紧密联系的共同新利益，尤其是波黑宪法已经预见到的共同部门的能力会得到加强。[注]

兰普的分析重点并不在民族群体的问题和它们存在潜在问题的相互关系。它们不会成为影响他的重要问题。反之，兰普主张奥地利和匈牙利将最终在宪法权利和通过兼并以及1910年法令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的

权力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宪政联合体。此外兰普在分析中，并不把奥匈帝国看作欧洲标准下的一个异数，或者是某种落后于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他把帝国分析为与德国阿尔萨斯–洛林相似的一种宪法特殊情况，或者是拥有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所要面临的长期挑战。

像兰普这样的法律评论家和学者对波黑宪法做出的分析，表现出1900年之后，无数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关于帝国未来究竟该往何处去，以及帝国的结构形式可能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怎样的深度。[注]这些讨论来源于当时人们相信，他们所处的这个繁荣发展的社会需要新的规则、结构形式以及机制来改善它的运作。诚然，当下不可能在帝国实行任何的全面改革，因为各个国家的宪法能力会阻碍改革在另一个国家进行，匈牙利和奥地利政治家之间对帝国的未来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而不断增长的利益集团也在保卫它们享有的特权。

即便如此，围绕着改革项目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和创造力，都令我们无法将奥匈帝国简单地描述为一个注定落后于时代的欧洲国家。奥匈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冲突，并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致命的削弱作用，而它们也并不是奥匈帝国在1918年崩溃的元凶。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运动塑造了它们围绕着帝国创建的体制和期望产生的诉求。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见，从学校到军队营房，再到跨地域商贸和科学学术，帝国的各项体制形成了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关注以及在情感上对帝国的忠诚。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帝国和民族主义的推动力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在想象政治方面更大的创造力。这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花费大量政治和行政资源（它们往往以截然相反的方式来做这些事），用来处理、吸纳以及标准化民族主义政治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确。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另一种国家试图控制民族主义政治的尝试，它在各个方面都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在马克·康沃尔（Mark Cornwall）最近关于重大叛国罪审判（尤其是发生在“一战”之前数十年的案例）的研究中，阐述了国家内部的其他一些因素，严重地误导了处理帝国和民族主义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行为，相应的处理手段亦十分不妥当。[注]如果说地区性的妥协方案所许诺的更强大的联邦主义是对帝国结构问题的回应，那么偶尔出现的伪造的叛国审判就不但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种种限制约束，还使得国家不能做出它所希望的判决，这就造成了另一种回应。然而，即便是这些对欧洲最著名的叛国案——法国的德

雷福斯事件的拙劣模仿，也不能解释帝国最终的崩溃。它们反而暗示了在一个更高层的官僚体系中，一场关于民主化的斗争正在上演。这并不是说帝国官僚系统的大多数倾向于接受人民管辖，正如我们所见，1900年之后，官僚已经无法简单地和民选机构以及政党划清界限，因为他们职位的任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后者。

*

历史学家们不但创造出一个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被时代淘汰的落后帝国理念，而且人们一般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帝国内部体制本身的弱点，或者是这些体制无力面对现代性挑战。在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间，一个由来自军队、官僚系统以及贵族阶级精英的局内观察者组成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团体也在国内传播帝国将难以生存的悲观预测。这些人的回忆录和通信的内容，都泄露出他们对帝国不久的将来所持有的晦暗悲观的评价。特别是在1907年达到高潮的投票权改革，以牺牲有地贵族阶级为代价，赋予大众运动权力，这就滋长了人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或宗派性质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战胜帝国的爱国主义的潜在能力的畏惧。1898年，卡尔·施瓦岑贝格亲王曾做出如下发言：“必须削减所谓的个人自由。那些认为车轮不会调头的人不适合（执行这项干预任务）。以我的观点，奥地利除了采用现代化的专制主义，否则决不能团结一体。”5年之后，他又抱怨“处处都是堕落的景象，你无处寻找当下亟须的坚定意志和雷厉风行的强硬态度”。奥斯瓦德·图恩–萨尔姆（Count Oswald ThunSalm）伯爵则更加直言不讳：“在我们的国家，乐观主义者应当自杀。”注

1902年，一度担任波希米亚行政长官和奥地利首相的弗兰茨·图恩–霍亨施泰因伯爵（Count Francis Thun-Hohenstein），向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艾伦塔尔伯爵抱怨两方的激进分子（指德意志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公众影响力太强，乃至当下已经没有可供“理智的人”活动的政治空间。这些对帝国在20世纪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持悲观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们数不胜数，在那些传统上掌握权力并治理国家的人——如今仍占据着公务员系统和军队最高层的贵族当中尤其多。图恩的观点是正确的，时至1900年，许多人都通过表达激进的民族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立场而从中得利。

但这是让帝国万劫不复的原因吗？在1900年，事实上有好几个不同的帝国处在危机边缘。由于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20世纪以大众为基础的改革，那个最适合艾伦塔尔、施瓦岑贝格、图恩–霍亨施泰因或图恩–萨尔姆这类人的帝国已经死了。从大众政治的兴起到官僚系统的政治化，19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奥匈帝国社会产生的变革，这些精英人士了如指掌，而这些变化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许多人同样担心，这些变革也会有损奥匈帝国的大国地位。

1914年，精英们对帝国存续持有的悲观态度是促使帝国的总参谋部和外交使团决定冒险让奥匈帝国参战的原因之一。他们寄希望于一场战争这样的巨变能够给予他们平复国内政治冲突，并且预先阻止帝国的大国地位在海外被进一步破坏的最后机会，于是这些人欣然投入战火之中。作为最应当为战争负责的个人，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1852—1925）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写信时，提到了他关于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地位的恐惧，他写道："要和平地改善帝国的内部情况是非常困难的。"注

而我等历史学家，可以无视这些精英们不重要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他们已日渐被时代抛弃，我们不必认为那是最适合甚至是唯一能够理解这个时代的方法，从而批判性地审视这个国家的状况。

---

1. 关于这些在本地和进行国际迁移的工人阶层的记录，详细可见Aufder Walz. Erinnerungen böhmischer Handwerkgesellen,ed. Pavla Vošahlíková (Vienna:Böhlau, 1994)。

2. See the excellent work by Andrea Komlosy, Grenze und ungleiche regionale Entwicklung: Binnenmarkt und Migratio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enna: Promedia, 2003). Komlosy的统计数据记录了那些从他们的合法原籍进行迁移的内容，这些人中有很多迁往较短距离之外的邻近教区。类似内容同样可见Soziale Strukturen. Die Gesellschaft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im Kartenbild. Verwaltungs- , sozial- und Infrastrukturen. Nach dem Zensusvon 1910,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ed. Helmut Rumpler and Martin Seger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0), 106–107。

3. Heinz Fassmann," Die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1850–1910,"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9, Soziale Strukturen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10), 159–184, here 173.

4. 直至1889年，匈牙利的铁路线主要还用于货运，客运用途可以忽略不计，见János Szulovszky," Die Dienstleistungsgesellschaftin Ungarn,"in ibid., 9:467–491, here 473。

5. 关于对移民和返乡移民的精到分析，以及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对此复杂且往往矛盾的回应，见Tara Zahra, The Great Departure: Emigration from Eastern 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Free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16),23–63。当美国移民局在1908年开始记录返回移民时，它估计10年间差不多有39.5%的移民返回奥地利，37.9%的移民返回匈牙利。1900—1910年，至少有40万移民从美国回到奥匈帝国。上述数据可见Senator William P. Dillingham,Emigration Conditions in Europe: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61st Congr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351; 匈牙利的移民情况可见Julianna Puskás, Ties that Bind, Ties that Divide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2000)。

6. 1910年，奥地利拥有292所古典高中或预科学校，收纳95 933名男学生，另有24所为3 254名女生提供教学服务的学校（最多的在加利西亚），以及65所女子公立中学，收纳10 599名学生。从更准确的统计看，奥地利拥有146所初等中学，收纳47 562名学生。这类学校通常会把州内的第二语言列为必修课，作为学生们日后从事商贸事业的准备。在这些学校中，捷克语裔所占的比例要比在预科学校中的比例高，而波兰语使用者所占的比例会更高。See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1848–1918, 9/2 (Kartenband), 220–227. 关于奥地利的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见Gary Cohen, Educationand Middle-Class Society in Imperial Austria, 1848–1918 (West Lafayette,IL: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6)。Cohen指出，奥地利拥有515所这样的初等中学、技术学院以及大学，它们录取的学生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和德国十分相近，甚至更高。

7. Margret Friedrich, Brigitte Mazohl, and Astrid von Schlachta, “Die Bildungsrevolution,”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9/1:67–107, here 77. See also the charts in ibid., 9/2 (Kartenband), 228–229.

8. 在最初的几年内，健康保险条款只覆盖了9%的内莱塔尼亚人口。关于福利条款，详见Birgit Bolognese-Leuchtenmüller,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und Berufsstruktur: Gesundheits-und Fürsorgewesen in Österreich, 1750–1918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78), 328。至于花费在铁路、电话电报及邮政服务等基础设施上的资金，在1910年占到了内莱塔尼亚预算的1/3。Josef Wysocki,“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volume1,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Vienna: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1973), 68-104, here 92.

9. John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5–177.

10. 奥地利的双轨制行政系统，以及匈牙利有限的市政自治导致了两套不同的官僚体系。在这段时间内它们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一种的官僚由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各州首府任命；第二种“自治”的官僚体系，则是由奥地利和匈牙利民选市政政府任命。Deak, Multinational State, 154–158; Jeremy King,“The Municipal and the National in the Bohemian Lands, 1848–1914,”AHY 42 (2011): 89–109.

11. 匈牙利还是欧洲最早用卡车进行邮件运输投递（在1909年开始）的国家之一，而早在1896年，当地的电报就已经使用自行车进行邮件传递。Szulovszky,“ Dienstleistungsgesellschaft ,” 479.

12. 女性公务员不能是已婚妇女，而且在早期，各类办公部门倾向于雇用雇员的遗孀或者女儿。Erna Appelt,“ The Gender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Austria,” in Austri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

David F. Good, Margarete Grandner, and Mary Jo Maynes (New York:Berghahn, 1996), 115–131. On women as telegraph operators, see Sonia Genser,“ Von Klingelfeen, Blitzmädels und dem Fräulein vom Amt.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Frauen im österreichischen Telefon-und telegrafenwesen1869–191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2003).

13. Friedrich, Mazohl, and von Schlachta,“ Die Bildungsrevolution,” 74. 在所有奥地利的政府部门中，雇用女性最多的是商务部和内政部。

14. 尽管人们争论这场危机时，认为它与当地政府有关，但事实上在1914年之前的和平时期，奥地利的国家财政已经几乎入不敷出。Wysocki,“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89–91, 100–101; Deak, Multinational State, 226–232.

15. Margaret Lavinia Anderson, Practicing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 Carl E. Schorske,“ Politics in a New Key: An Austrian Trio,” in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116–180.

17. There is an enormous and excellent literature on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anti-Semitism in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around 1900. The classic work on Lueger and the anti-Semitic Social Catholic movement in Vienna and western Austria is John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Turn of the Century Vienna: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An older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raci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 nationalist circles is Andrew Whiteside, The Socialism of Fools: 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 and Austrian Pan German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On Bohemia and Moravia, see in particular Michal Frankl,“ Emancipace od židů“ : českỳ antisemitismus na konci 19. Století.” (Prague: Paseka, 2007); Hillel Kieval, Languages of Community: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zech La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especially“ Death and the Nation: Ritual Murder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Czech Lands,” 181–197; also the recent essays by Daniel Unowsky, Michal Frankl, Marija Vulesica, and Alison Rose in Sites of European Antisemitism in the Age of Mass Politics, 1880–1918, ed. Robert Nemes and Daniel Unowsk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4).

18. On Lueger and his beginnings as a liberal, see ibid. On the Young Czechs and the Czech nationalists Political spectrum in general, see Bruce Garver, The Young Czech Party, 1874–1901,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 Party Syst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On Slovene nationalist politics, see Peter Štih, Vasko Simoniti, and Peter Vodopivec, Slowenische Geschichte. Gesellschaft — Politik—Kultur (Graz: Leykam, 2008), 283–287.

19.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life in the expanding metropolises, see Wolfgang Maderthaner,“ Urbane Lebenswelten. Metropolen und Grosstädte,”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9/1:493–538.

20. Amtsblatt der k.k. Bezirkshauptmannschaft in Rann, Jahrgang 1902–07; 1908–09 Uradni list c.k. okrajnega glavarstva v Brežicah Leto (Rann / Brezice: 1902–07; 1908–09), 46–47, 72, 73, 79.

21. On these efforts, see Kai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in Galizien. Über

Zugehörigkeit und soziale Emanzipation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5), especially 148–184; John-Paul Himka, 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88), especially 86–103.

22. 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在1857年经历了两岁女儿索菲的夭折；10年后的1867年，他的兄弟马克斯（哈布斯堡王朝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儿子鲁道夫在1889年自杀；伊丽莎白皇后在1898年遇刺；1914年，他的侄子兼继承人斐迪南大公也遇刺身亡。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晚年受到的大众欢迎，见Peter Urbanitsch,“ Pluralist Myth and Nationalist Realities: The Dynastic Myth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a Futile Exercise in the Creation of Identity?”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35(2004): 101–141, here 122–123。

23. Struve, Bauern und Nation, 123; Keely Stauter Halsted, The Nation in the Village: The Genesis of Peasant National Identity in Austrian Poland 1848–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文盲市长的内容，见该书第四章。

24. Josef Redlich, Das Wes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Kommunal-Verfassung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0), 61–62, quoted in King,“ The Municipal and the National,” 89.

25. 讨论加利西亚地方基层公共自治概况以及它在加利西亚州政府手中成型的方式，见Alison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40。

26. 在维也纳，1912年选举时获得投票权的人占城市人口比例的18.1%，覆盖了城市24岁以上男性公民的70%。关于获得投票权的人口以及参与投票的比例，见Peter Urbanitsch“, Die Gemeindevertretungen in Cisleithanien,”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7, Verfassung und Parlamentarismus,part 2, Die regionalen Repräsentativkörperschaften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 2199–2281, especially 2223–2230。

27. 这些匈牙利城镇享受等同于奥地利所有基层公共政权的自治权力，后者的传统地位得到了皇家的特许。

28. In general, see Károly Vörös, “Die Munizipialverwaltung in Ungarn im Zeital ter des Dualismu s , ”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7:2345–2382. See also, Barany,“ Ungarns Verwaltung,” 409–446, and Péter,“ Die Verfassungsentwicklung in Ungarn, 476–503, 537–540. For the direct comparison with the Austrian system, see Gary B. Cohen,“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7–1914,” CEH 40, no. 2 (2007): 241–278, especially 255–256.

29. On the new associational laws and their effects on Austrian society, Pieter M.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Liberal Politics, Soci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ustrian Empire, 1848–191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43–164.

30. 几乎是在同时（1868—1871年），卡尼奥拉和南施蒂利亚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组织当地活动家进行了类似的露天集会，要求所有斯洛文尼亚地区都统一为一个独立的州。他们和政治活动家们总计举办了18场平均人数在5 000—6 000人的类似集会（有一次靠近卢比安纳的集会甚至吸引了近3万人）。Štih, Simoniti, and Vodopivec, Slowenische Geschichte, 267.

31. Frank Henschel,“ ‘ Das Fluidum der Stadt.’ Lebenswelten in Kassa / Kosice / Kaschau zwischen urbaner Vielfalt und Nationalismus, 1867–1918”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eipzig, 2013), 70. 拥有犹太教信仰的人直到1896年才获得在匈牙利投票的权利，也是在那时，他们的宗教信仰才被正式承认。

32. 从技术层面来看，环形大道的建设要早于自治法，而且在皇帝的首肯下，它给予了维也纳特殊的地位。关于环形大道和它的历史主义风格，见Schorske,“ The Ringstrasse, Its Critics,and the Birth of Urban Modernism” in Fin-de-Siècle Vienna, 24–115。关于剧院和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在19世纪末，这家公司是中欧的地区剧院建设者之一，亦是其中的佼佼者）Philipp Ther, Center Stage: Operatic Cultur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ntral Europe, trans. Charlotte Highes-Kreutzmülle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6. See also Gerhard Michael Dienes, ed.,Fellner & Helmer. Die Architekten der Illusion.Theaterbau und Bühnenbild in Europa anlässlich des Jubiläums“ 100 Jahre Grazer Oper” (Graz: Stadtmuseum, 1999).

33. Joseph Roth,“ The Bust of the Emperor,” in Three Novellas, trans. John Hoare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3), 45. See also Ivo Andric, The Bridgeon the Drina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59). 该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最后一章，描写了1878年之后，波黑遍布极易辨认的哈布斯堡文化标识。关于匈牙利略有不同的文化共性，见Miklós Bánffy,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The Transylvanian Trilogy,3 vols., trans. Patrick Thursfield and Katalin Bánffy-Jelen (London: ArcadiaBooks, 2001)。

34. Roth, The Emperor’s Tomb, 38–39.

35. Wolfgang Maderthaner and Lutz Musner, Unruly Masses: The Other Side of Fin-de-siècle Vienna, trans. David Fernbach and Michael Huffmnaster(New York: Berghahn, 2008), 34, 42, 52–56. 在奥匈帝国的大城市中，只有的里雅斯特和布达佩斯（佩斯那一半）要比其他大城市建造的时间晚，因而也有了更加现代化的城市布局，它们古代的城市中心和现代的城郊之间的边界也不太明显。1910年，加利西亚两座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利沃夫和克拉科夫都不是加利西亚的工业中心。类似观点见Wolfgang Maderthaner, “Urbane Lebenswelten: Metropolen und Grossstädte,”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9:499–505。

36. Hans Peter Hye,“ Aussig—eine Industriestadt am Rande des Reiches,” in Kleinstadtbürgertum ind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62–1914, ed. Peter Urbanitsch and Hannes Stekl (Vienna: Böhlau, 2000), 43.

37. Marie Tosnerova,“ Beraun—Im sog fortschreitender Modernisierung,” in ibid., 158–159.

38. Jiři Coupek,“ Ungarisch Hradisch—Bürgertum und Stadtpolitik,” in ibid., 357.

39. František Spurny, “Mährisch Schönberg—Eine Domän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ibid., 310–311.

40. 有关想象中在维也纳环境下资产阶级的团结动力，见John Boyer,Political Radicalism in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1. See for example, Hye,“ Aussig,” 42.

42. Tosnerova,“ Beraun.”

43. Ibid.

44. For several examples, see the essays in Urbanitsch and Stekl, Kleinstadt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62–1914.

45. 我非常感谢Zoriana Melnyk把她学位论文研究中的这个案例提供给我。按照她的论点，达维季夫事件作为加利西亚唯一一件牵涉到官员死亡的选举暴力案例，非常值得关注。

46. Joshua Shanes, Diaspora Nationalism and Jewish Identity in Habsburg Galic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9.

47. Coupek,“ Ungarisch- Hradec,” 374–375.

48. Tosnerova,“ Beraun,” 149–152; 161–162.

49. 当然，有一位本地市长坚持认为克拉科夫的建筑模式不能应用在他管辖的郊区。Nathan Wood, Becoming Metropolitan: Urban Selfhood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racow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92–93.

50. Spurny,“ Mährisch Schönberg,” 311.奥地利在 1881年启用了电话服务，1895年，国家掌管了这项业务的方方面面。关于奥匈帝国的电话事业，见Hans Peter Hye,“ Technologie undsozialer Wandel,”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1848–1918, 9:29–30。

51. Coupek,“ Ungarisch Hradisch,” 370.

52. 对各州的预算、财政以及之后的经济危机的分析，见Hans Peter Hye, “Strukturen und Probleme der Landeshaushalt,”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7:1545–1592。对这项危机及其起源的分析，还可参照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226–232; 249–258。

53. John Deak指出，数据显示这些额外的附加费用占到了布科维纳税额的95%和加利西亚税额的81.5%。Ernst Mischler,“ Der Haushalt der österreichischen Landschaften,” Jahrbuch des öff entlichen Rechts der Gegenwart 3 (1909): 589; Mischler,“ Selbstverwaltung, finanzrechtlich,” 236–237, cited in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230–231.

54. Mischler,“ Der Haushalt,” 586, cited in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231.

55. John Deak,“ The Great War and the Forgotten Realm: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JMH 86 (June 2014): 368. On Koerber’s specific plans for administrative expansion and economic reform, see Fredrik Lindström, “Ernest von Koerber and the Austrian State Idea: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Koerber Plan (1900–1904),” AHY 35 (2004): 143–184.

56. 在这段时间内，总共增加了46个新的行政官员职位。至于促进行政改革委员会的数据，见Deak in“ The Great War,” 368。

57.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249. 这个委员会只是“一战”前的最后10年内类似组织机构中的一个。

58. Deak,“ The Great War,” 372.

59.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242, 250–258.

60. Alexander Vari,“ Bullfights in Budapest: City Marketing, Moral Panics, and Nationalism in Turn-of-the-Century Hungary,” AHY 41 (2010): 149–151; Miklós Hadas,“ Modernity and Masculinity: Cycling in Hungary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Gender and Modernity in Central Europe: The Austro-Hungarian

Monarchy and its Legacy, ed. Agatha Schwarz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owa Press, 2010), 47–64.

61. Henschel,“ ‘ Das Fluidum der Stadt,’ ” 74; Vörös,“ Die Munizipialverwaltung in Ungarn,” 2366–2368.

62. Reinhard Farkas,“ ‘ Lebensreform’ als Antwort auf den sozialen Wandel,” in Rumpler and Urbanitsch,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9:1361.

63. Dietlind Hüchtker, Geschichte als Performance. Politische Bewegungen in Galizien um 1900 (Frankfurt a / M: Campus, 2014), 14–15.

64. On women’s labor in nationalist associations, Pieter M. Judson,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Ger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 in Austri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 David F. Good, Margarete Grandner, and Mary Jo Maynes (New York: Berghahn, 1996), 1–18; Heidrun Zettelbauer, “Die Liebe sei Euer Heldentum.” Geschlecht und Nation in völkischen Vereine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Frankfurt a / M: Campus, 2005); Hüchtker, Geschichte als Performance; Jitka Malečkova,“ Nationalizing Women and Engendering the Nation: The Czech National Movement,” in Ida Blom, Karen Hagemann, and Catherine Hall, eds., Gendered Nations: Nationalisms and Gender Ord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0), 293–310.

65. Appelt,“ The Gender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121 and 126–127.

66. Joachim von Puttkamer, Rumönen und Siebenbürger Sachsen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ungarischen Staatsidee 1867–1914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3), 403.

67. Katherine David,“ Czech Feminist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Habsburg Monarchy:‘ The First in Austria,’ ”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3, no. 2 (1991): 26–45.

68. On sensationalist criminal reporting in the Austrian media, see for example Scott Spector,“ Where Personal Fate Turns to Public Aff air: Homosexual Scandal and Social Order in Vienna, 1900–1910,” AHY 38 (2007): 15–24; Nancy M. Wingfield,“ Echoes of the Riehl Trial in Fin-de-Siècle Cisleithania,” AHY 38 (2007): 37–47; Daniel Vyleta, Crime, Jews, and News: Vienna 1895–1914 (New York: Berghahn, 2007).

69. See Scott Spector’s brilliant and suggestive article, “The Wrath of the ‘Countess Merviola’: Tabloid Exposé and the Emergence of Homosexual Subjects in Vienna in 1907,” Contemporary Austrian Studies 15 (2006): 31–47.

70. Ibid., 36. 到了面市的第一年年末，据说《奥地利犯罪画报》在维也纳的发行量已经达到每周3万份。

71. Cited by Anita Kurimay,“ Sex in the‘ Pearl of the Danube’: The History of Queer Life, Love, and its Regulation in Budapest, 1873–1941” (PhD diss.,Rutgers University, 2012), 68. 在警察处登记的娼妓将接受定期的医疗检查，“ clandestine”这个词指代的是那些逃避警察等级的娼妓，即暗娼。See Nancy M. Wingfield,“ The Enemy Within: Regulating Prostitution and Controlling Venereal Disease in Cisleithanian Austria during the Great War,” CEH 46, no. 3 (2013): 569; Karin J.Jusek,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Die Prostitutionsdebatten in Wien derJahrhundertwende (Vienna: Löcker, 1994).

72. Cited in Kurimay,“ Sex in the‘ Pearl of the Danube,’ ” 16.

73. Cited in Wood, Becoming Metropolitan, 178.

74. The argument was made famously by Weber in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92–303.

75. Christa Hämmerle, “Die k. (u.) k. Armee als ‘Schule des Volkes’? Zur Geschichte der allgemeinen Wehrpflicht in der multinationalen Habsburgermonarchie (1866 bis 1914/18),” in Der Bürger als Soldat. Die Militarisierung europäischer Gesellschaften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Christian Jansen, ed. (Essen: Klartext Verlag, 2004), 175–213.

76. Walter Wagner, “Die k.(u.)k. Armee—Gliederung und Aufgabenstellung 1866–1914,” in Adam Wandruszka and Peter Urbanitsch, eds.,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5, Die bewaffnete Macht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7), 240–243.

77. 关于兵役的时间、特点性质、适用范围和地区性的差异等不断变动的细节，见B. Schmitt, Armee und Staatliche Integration:Preussen und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15–1866。 Rekrutierungspolitik in den neuen Provinzen: Staatliches Handeln und Bevölkerung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7); Laurence Cole, Military Cultur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Gunther Rothenberg,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6); István 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6–60; Christa Hämmerle,“ Die K&K Armee als Schuledes Volks?”在这次改革之后，达尔马提亚的男性也符合参军入伍的资格，这导致了当地的民众起义。

78. 科尔在解释兵役制度时提到，有一批人的现役时间为3年，此外还要在预备役服役7年，以及警工队（奥地利）或国民军（匈牙利）服役2年，这批人共有96 500人，其中5万人来自奥地利。处于中间档的约2万人需要在后备军或地方部队服役2年，然后在预备役服役10年。而大部分人不会接受任何军事训练，但是只要有战争发生，他们就会被征召入民兵组织或预备部队。Cole, Military Culture, 114.

79. Ibid., 115. 一旦接受了一年的训练，预备役军官们就会参与每年的操练中去。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86–88.

80. From a collection of nineteenth- century Slovene folksongs about military service quoted in Rok Stergar,“ Die Bevölkerung der slowenischen Länder und die Allgemeine Wehrpflicht,” in Glanz—Gewalt—Gehorsam. Militär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00 bis 1918), ed. Laurence Cole, Christa Hämmerle, and Martin Scheutz (Essen: Klartext, 2011), 135.

81. Ibid., 135; Cole, Military Culture, 120.

82. Christa Hämmerle“, ‘ … dort wurden wir dressiert und sekiert und geschlagen…’ Vom Drill, dem Disziplinarstrafrecht und Soldatenmisshandlungen im Heer (1868 bis 1914),” in Cole, Hämmerle, and Scheutz, Glanz—Gewalt—Gehorsam, 31–54.

83. Gunther E. Rothenberg, “ Toward a National Hungarian Army: The Military Compromise of 1868 and Its Consequences,” Slavic Review 31 (1972): 805–816; László Péter,“ The Army Question In Hungarian Politics 1867–1918,” Central Europe 4 (November 2006): 88; Catherine Horel, Soldaten zwischen nationalen Fronten. Die

Auflösung der Militärgrenze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kömiglich-ungarischen Landwehr (Honvéd) in Kroatien-Slawonien 1868–1914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09).

84. 军中的官方语言有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捷克– 摩拉维亚– 斯洛伐克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鲁塞尼亚语（乌克兰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此外，波黑的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被视为一种单独的非正式语言。See Tamara Scheer,“ Die k.u.k. Regimentssprachen: Ein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Sprachenvielfalt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67/8–1914),” in Klaas-Hinrich Ehlers, Martina Niedhammer, Marek Nekula ed., Sprache, Gesellschaft und Nation in Ostmitteleuropa. Institutionalisierung und Alltagspraxi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2014),75–92. For individual examples, see Peter Broucek, “Die Mehrsprachigkeit und Sprachenpolitik in den Einheiten der k. und k. Armee in den böhmischen Ländern,” in 250 Jahre Fremdsprachenausbildung im österreichischen Militär am Beispiel des Tschechischen, ed. Josef Ernst (Vienna: Landesvert eidigungsakademie,2003), 16–21; ”Rok Stergar, Fragen des Militärwesens in derslowenischen Politik, 1867–1914,” Österreichische Osthefte 46, no. 3 (2004), 391–422.

85. For other examples, see Nicola Fontana, “Trient als Festungs- und Garnisonsstadt. Militär und Zivilbevölkerung in einer k. u. k. Festungsstadt, 1880–1914,” in Cole, Hämmerle, and Scheutz, Glanz—Gewalt—Gehorsam, 177–198; Frank Wiggermann, K.u.K. Kriegsmarine und Polit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Nationalbewegung in Istrien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04); Wilhelm Steinböck, ed., Graz als Garnison: Beiträge zur Militärgeschichte der steirischen Landeshauptstadt (Graz: Leykam, 1982); Martin Parth, “Die Garnison Graz um 1900,” Historisches Jahrbuch der Stadt Graz 27, no. 28 (1998): 165–89; Peter Melichar, “Ästhetik und Disziplin: Das Militär in Wiener Neustadt 1740–1914,” in“ Die Wienerische Neustadt”: Handwerk, Handel und Militär, ed. Sylvia Hahn and Karl Flanner (Vienna-Köln-Weimar: Böhlau,1994), 283–336. On Galicia, see Piotr Galik,“ Miasta Galicyskie jako garnizony armii austro- węgierskiej w prezededniu I wojny światowej,” Acta Uniwersitatis Wratislaviensis 111 (1993): 113–123.

86. Rok Stergar,“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Austro-Hungarian Armed Forces in the Era of Ethnic Nationalisms: The Case of Ljubljana-Laibach”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5).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Stergar for sharing this manuscript with me. See also Stergar, “National Indifference in the Heyday of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Ljubljana Military Veterans and the Language of Command,” AHY 43 (2012): 45–58.

87. Fontana,“ Trient als Festungs- und Garnisonsstadt,” 192–193.

88. Stergar,“ Evolu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6.

89. Tamara Scheer,“ Habsburg Languages at War:‘ The Linguistic Confusion at the Tower of Babel Couldn’t Have Been Much Worse,” in Language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ommunicating in a Transnational War, ed. Christophe Declercq and Julian Walk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rthcoming).

90. Hans Haas,“ Krieg und Frieden am regionalen Salzburger Beispiel 1914,” Salzburg Archiv 20 (1995): 303–320; Cole, Military Culture, 314.

91. Cole, Military Culture, 268–286.

92. 之后的讨论可见 Cole, Military Culture, 尤其是该书的三至五章。数据可见该书第129页。

93. Cole, Military Culture, 311.

94. 正如科尔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除去国家层面的行动，国家对退伍军人组织的肯定以及它们的活动并不总是约束、塑造或者定义退伍军人们的活动。

95. Cole, Military Culture, 268–307.

96. Mommsen, 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im habsburgischen Vielvölkerstaat. Das Ringen um die supranantionale Integration der zisleithanischen Arbeiterbewegung (1867–1907) (Vienna: Europa-Verlag, 1963), 370.

97. Ibid., 370–371; Karl Ucakar, Demokratie und Wahlrecht in Österreich: zur Entwicklung von politischer Partizipation und staatlicher Legitimationspolitik (Vienna: Verlag für Gesellschaft skritik, 1985).

98. On Mayday, see Harald Troch, Rebellensonntag. Der 1. Mai zwischen Politik, Arbeiterkultur und Volksfest in Österreich (1890–1918) (Vienna:Europa-Verlag, 1991). 奥地利人坚持在5月1日举办五月庆典，这和他们在下一个星期天进行庆祝的德意志和英国的同志们不同，这也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和它的成员们为他们的诉求牺牲的意愿，特别是8小时工作制和男性全民普选权。与德意志和英国的对比可见该书第三章。

99. For unionization numbers in Austria, Geoffrey Drage, Austria-Hungary (New York: E. P, Dutton, 1909), 112; for Hungary, 851.

100. Wolfgang Maderthaner,“ Die Enstehung einer demokratischen Massenpartei: Sozialdemokratische Organisation von 1889 bis 1918,” in Die Organisatio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89–1995, ed. Maderthaner and Wolfgang C. Müller (Vienna: Löcker, 1996).

101. 近来发生的巴德尼危机（1897—1898年）导致了示威和捷克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暴力行为，社会主义的政党拒绝和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因此失去了一些支持。因此，更加清楚地表达出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相关的政策就势在必行。

102. On nationhood, Jakub Benes offers an innovative analysis in Workers and Nationalism: Czech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in Habsburg Austria, 1890–1918 (unpublished book manuscript).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Benes for sharing this manuscript with me. See also Karl F. Bahm,“ Beyond the Bourgeoisie: Rethinking Nation,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entral Europe,” AHY 29 Part 1 (1998): 19–36.

103. Otto Bauer,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 trans. Joseph O’Donne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Helmut Konrad, Nation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smus. Die österreichische Arbeiterbewegung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Vienna: Europa-Verlag, 1976),18–40; Konrad,“ Arbeiterbewegung und bürgerliche Öffentlichkeit. Kultur und nationale Frage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0, no. 4 (1994): 506–518; Hans Mommsen, “Otto Bauer, Karl Renner, und die spozialdemokratische Nationalpolitik in Österreich von 1905 bis 1914,” in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ed. Keith Hitchens(Leiden: Brill, 1977), vol. 1. 一位斯洛文尼亚语裔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Etbin Kristan率先在1898年提出了人格原则。

104. William Jenks, The Austrian Electoral Reform of 1907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chap. 1; John Boyer,“ Power, Partisanship, and the Grid of Democratic Politics: 1907 as the Pivot Point of Modern Austrian History,” AHY 44 (2013): 148–174; Ernst Bruckmüller and Berthold Sutter,“ Der Reichsrat, der Parlament des westlichen Reichshälfte Österreich-Ungarns (1861–1918),” in Bruckmüller, ed. Parlamentarismus in Österreich (Vienna: Österreichischer Bundesverlag & Hpt., 2002), 60–109.

105. Geoff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8.

106. Ucakar, Demokratie und Wahlrecht, 290–296.

107. Boyer,“ Power, Partisanship, and the Grid of Demo cratic Politics.”

108. 在此之前，奥地利最高法庭在1909年就已经在一个案例中认为，鉴于语言是决定民族身份的主要因素，而犹太人使用的不是单一的一种语言，而是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使用多种语言，因此他们不能被视为一个民族。商议布科维纳的妥协和解方案时，谈判者中犹太人占了12%，因此他们需要使用某种方式来保证犹太人在实际上的参与度，而不必新增一个正式的犹太人投票层级。见三篇相关重要文章：Gerald Stourzh, “The National Compromise in the Bukovina 1909/1910,” and“ Max Diamant and Jewish Diaspora Nationalism in the Bukovina,” both in From Vienna to Chicago and 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77–189and 190–203。关于布科维纳妥协方案的一个显著的学术进步和法律社会学在经济上的必要性，相关的最近观点见 Eugen Ehrlich, Die Aufgaben der Sozialpolitik im österreichischen Osten insbesondere in der Bukowina. Mit besonderer Beleuchtung der Juden und Bauernfrage (Czernowitz: 1909)。

109. Gerald Stourzh, “Ethnic Attribution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Good Intentions, Evil Consequences,” in Ritchie Robinson and Edward Timms, ed., The Habsburg Legacy: National Ident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ustrian Studies 5) (1994): 67–83. See also the analysis in Jeremy King,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A Local History of Bohemian Politics, 1848–19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Tara Zahra, National Indifference and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4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0. 施图尔克解散议会之前，还与各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人进行了协商。Cohen,“ Nationalist Politics,” 271; Lothar Höbelt,“ Bohemia 1913—a Consensual Coup d’État?,” Estates and Representation 20 (November 2000): 207–214. See also Gerald Stourzh,“ Verfassungsbruch im Königreich Böhmen. Ein unbekanntes Kapitel zur Geschichte des richterlichen Prüfungsrechts ima lten Österreich,” in Staats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en in Zeiten des Wandels. Festschrift für Ludwig Adamovich, ed. Ludwig Karl Adamovich and Bernd-Christian Funk (Vienna: Springer, 1992): 675–690.

111. 这些议题的法律分析，见Karl Lamp,“ Die Verfassung von Bosnien und der Herzegowina vom 17. Februar 1910,” in Jahrbuch des öff entlichen Rechts der Gegenwart, no. 5 (1911): 137–229。

112. 至于究竟哪些人可以投票，见 Lamp,“ Die Verfassung,” 142–145。年纪在30岁以上的人如果符合同样的条件，还可以被选为议会代表，不过公务员和教师除外。在穆斯林的大地主投票分区，女性也可以通过一个男性代理人进行投票。就像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处于现役的男性，除了军官之外无权投票。

113. For an analysis of the new statutes an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governing Bosnia-Herzegovina, Valerie Heuberger,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und Verwaltung in Bosnien und der Hercegovina 1878–1918,”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VII, Verfassung und Parlamentarismus, ed. Heinrich Rumpler and Peter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 2000), 2383–2425, especially 2415–2419.

114. Lamp compared Bosnia Herzegovina’s status primarily to the Reichsland status of Alsace Lorraine in federal Germany as well as to various types of colonies and protectorates. Lamp,“ Die Verfassung,” 211–215.

115. Ibid., 228–229.

116. 事实上Heuberger认为在1912年，相关法令就已经进行修改，将奥匈帝国共同的财政部的一些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见“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und Verwaltung,” 2420–2423。

117. 关于社会民族党人到天主教保守派中更广为人知且野心勃勃的改革想法的分析和分类，见Robert Kann，The Multinational Empire: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for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48–19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50)。

118. Cornwall正在完成一个从1848—1918年关于哈布斯堡王朝叛国案的研究，见Mark Cornwall,“ Loyalty and Treason in Late Habsburg Croatia: A Violent Discourse before the Great War,” in Exploring Loyalty, ed. Martin Schulze-Wessel and Jana Osterkamp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forthcoming);“ Traitors and the Meanings of Treason in Austria-Hungary’s Great War”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5 (2015): 113–134。

119. The examples cited here and in the next paragraph quoted by Solomon Wank, “Pessimism in the Austrian Establishmen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Fritz Fellner, ed. Solomon Wank, Heidrun Maschl, Brigitte Mazohl-Wallnig, and Reinhold Wagenleitner (Santa Barbara, CA, and Oxford: ABC- Clio, 1988), 295–314.

120. Quoted in ibid., 306. On Conrad’s views in general, see Rothenberg,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144–145; Holger 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1997), 9–11. On the other aristocratic stronghold, the foreign office, William D. Godsey, Aristocratic Redoubt: The Austro-Hungarian Foreign Office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八章｜战争与彻底的国家建构（1914—1925）

历史的轨迹不像弹子游戏，一击之后是可以预测的运动轨迹；它更像是一朵云运动的路线，虽然它也遵循着物理法则，但是同样受到那些只能被称为巧合的事实所影响。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The German as Symptom*”，1923年

1914年夏，奥匈帝国的公民和许多欧洲人一样，突然发现他们身处战争之中。他们很熟悉战争带来的恐慌，在此之前，就有1908年兼并波黑之后紧随而来的战斗，不过就在他们的巴尔干邻居们自1912年就断断续续处在战争中时，新到来的战争让绝大多数奥匈帝国公民震惊不已。尽管如此，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团体很快认为战争会带来机会，让他们以自己的愿景重塑帝国。

差不多6年以来，像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这样的军队重要领导人把巴尔干战争想象为逆转时空的机会，可以回到近年来政治民主化进程之前（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他们要把帝国变回过去那种不关心政治，统一团结，具有等级制度，以及有条不紊、驯服克制的状态。当然，这是只存在他们想象之中的过去。一旦1914年夏天，战事爆发成为可能，各方政治领袖同样对其表示了欢迎。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战争可以给予他们报答工人阶级的协作，实现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机会。民族主义活动家也把战争视为获得地方自治、增强语言权利，甚至作为对他们所在民族共同体爱国牺牲的回报重组帝国的独特机会。战争给予政客们一个无与伦比的、打破奥地利国会和波希米亚议会目前持续僵局的前景。此外，各派系的政客们也在留心工人阶级、农民、中产阶层社区的大众舆论是否接受战争必要性。[注]最终也是最出人意料的，从城市女工到小村镇的农民，都强调了他们要求彻底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渴望。

从数据看，从1914年8月到1918年11月，帝国动员了近800万男性公民加入军队。这些人当中，有差不多15万死在战场或囚牢，36.2万负

伤，而有超过200万成为敌军的俘虏。这场战争之后，鲜有家庭或社区可以独善其身。帝国大后方的人民承受着营养不良、疲惫虚耗、疾病与饥荒的折磨，战争造成的人口效应是具有普遍性的。[注]当然，战争也从其他无数方面影响了奥匈帝国社会。[注]由于绝大多数男性都已经被征召入伍，战争时期的国家对劳动力的渴求导致女性进入工厂工作的人数急速增加。在那儿，国家往往要求她们服从于严苛的军事纪律，却没有为其肩负的家庭责任做出适当的准备。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女性甚至替代男性，担任了最不可动摇的保守机构——军队之中的神职人员职位。[注]而当教师们纷纷走上前线，学校也只能关门大吉，留在国内的母亲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工作，孩子们就只能从街道上搜寻可以维生的东西，或者在永不停歇的市场队伍中，顶替他们的母亲几个小时（通常这就意味着一整夜）。

国家一方面要求身在军队和大后方的男人和女人们做出极大的牺牲，一方面又要为这些人直接的生理需求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依靠国家的直接干预来保障每日的生存，许多人也因此接受了国家爱国主义奉献牺牲的语言，来为他们自己争取每日的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眼中，食物与燃料资源的缺乏意味着国家没有尽到为那些阵亡士兵的家庭提供足够营养、取暖能源和福利的义务。而帝国军队和官僚系统领导人无法响应大众提出的物质期待，导致帝国遭遇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政府用采取更多有效措施的新承诺来回应这些危机，却无法兑现诺言。[注]最终在1918年10月，就在一支精疲力竭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联军勉强取得了对沙俄、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胜利后几个月，帝国从内部崩溃了，在布拉格、萨格勒布、利沃夫、维也纳以及布达佩斯，新的地区性政府接管了帝国行政体系留下的残骸。

不过战争依然不是那根压断一个正在衰弱的帝国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也没有加速帝国无法避免的崩溃趋势。不过迄今为止，战争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令奥匈帝国的崩溃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即将成为现实。战争令人毛骨悚然的状况激化了欧洲各地的革命势力。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缓和民众承受的强烈痛苦，它的大众合法性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在奥地利，物资缺乏的痛苦是导致人们爱国主义崩溃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是帝国在开战的头两年，对人们实行了不受法律支配的严酷军事化独裁统治。当时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都同意一个观点：当时奥地利的这个政权，在性质上要比同时期其他参战国的更加独裁。在此是否有政府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食物供应危机这个

问题还有待讨论，但是奥匈帝国政府对正常法律秩序的公然践踏则大大破坏了人民对当局的信心。注

就在战争彻底改变缔造社会的种种条件之际，还带来了一轮又一轮体制建构的进程，这其中不但有自上而下的正式行动（食物配给、监视、新福利救济金），也有自下而上的非正式行动（大众试图组织食品分配，以及警察行为）。此外，比较当时宣传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观点，1918年11月并不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诚然，1919年的世界已经与1914年的世界截然不同，但是某些政治结果却直到战争结束才注定。接替帝国存在的这些国家努力标榜它们与帝国之间的显著区别，但是帝国在1918年10月的崩溃并没有让帝国的体制、风俗惯例或法律系统也跟着被彻底破坏。而奥匈帝国的消失也没有改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食物供应、住房以及疾病等危机，即便是在战争结束数年之后，仍然在中欧阴魂不散。在一些曾经被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地区，新的战争又再度爆发，准军事力量和正规军再度投身其中长达数年之久。其中一些国家保留了个别帝国法律、帝国的统治结构、司法体系，甚至同样的权力部门人员。当时人们急于指出在帝国和民族国家，新旧政权之间的类型差异有多么大相径庭，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却未必有用。且不论哪种以民族为基础的强调它们特性的理论，我的主张是：许多取代了奥匈帝国的小国家，如果从它们管理人口、确认自己的合法性，以及把国内的文化差异理念化的方式上看，将这些国家看作小型的帝国，会有更实际的价值。



七月危机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的皇储及其妻子在一次访问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旅行中被刺杀。一个月之后，这件事引发了一场普遍的欧洲战争危机。不过在这个月，奥地利最高层官员们的头脑中，还有另一个危机亟待解决。1914年7月，帝国内政大臣要求各州行政长官汇报他们对1915—1916年度财政预算的预测要求。绝大多数长官们称，奥地利正在逐步向危机的深渊滑去，而这个危机与巴尔干无关，也不存在开战的可能。各州长官们面对着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导致的不断累积的工作量，越来越多地需要提供多种语言的国家服务以及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义务，他们希望拥有更多受过专门技术训练，可以充分了解行政上从保险实务到医疗技术各方面的复杂之处的雇员。的里雅斯特的行政长官办公室报告，相比他们在1900年处理的38 044份文件的工作量，13年后的1913年，这个办公室的工作量增长到了85 913份文件。来自西里西亚奥帕瓦的行政长官办公室报告请求增加11个带薪职位，并且提出不祥的警告，声称“完全不考虑我的多次要求，将导致国家公务受到损害”(注)。

在哈布斯堡官员的眼中，他们只能看到单一的、与可能爆发的战争无关的危机。那些想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所求事物的各州行政长官们尽其所能，把当前的人事状况（以及潜伏其后的大量资金问题）描述为一个刻不容缓的危机。这个危机和帝国长期的衰弱没有关系，也没有为帝国即将到来的崩溃推波助澜，而各州的行政长官们，亦没有用“落后过时”来描述这个国家。在这些长官们提出的人员需求中，他们甚至完全没有考虑下一年可能爆发的战争。

约翰·迪克（John Deak）在1914年之前曾认为，“一系列由一个充满活力并不断扩张的国家机器做出的行为，试图将国家资助的现代化进程的极限推得更远”(注)。准确地说，这些政策对帝国树立在国民眼中的合法性地位大有帮助。但为了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延续它们，帝国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因为民族主义政治家曾努力影响各州长官或各级地方长官的下属政府机关内的行政任命，他们也同样承认了帝国官僚体系的这一股促进合法性的动力。这些政治家的社团也往往模仿政府的行事惯例，

为那些他们试图在语言混杂地区争取的民族社群提供福利。[注]与此同时，这股动力指明了奥地利日渐强大的联邦主义化倾向。民族主义或许不会毁灭这个国家，但就像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1900年后，它的影响力通过将更多权力移交到各州层面，明显地塑造了帝国未来的改革行动和目标。

同时，另一个“七月危机”正在政府的另一个高级层面酝酿发酵。到了7月底，这个危机已经将那些试图争取更多资源来解决人手短缺问题的地方长官们牵连其中。这第二个“七月危机”同样与帝国潜在的崩溃无关，但是它从正在隐约逼近的战争可能中汲取了力量。它通过一些军事行动，把帝国带向了另一个受到政治家和官员们支持的方向。

从前不久的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以及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导致的国际危机以来，帝国军事领导层中的各个群体已经对奥匈帝国内部斯拉夫人口存在的潜在背叛行为提出了阴暗的警告。他们对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抱有敌视的态度，虽然在军事精英中不乏此类情绪，但这不仅是一种反斯拉夫主义的偏见。反之，这种敌视的情绪来自军队与公民社会和大众政治有意识的割裂（或者说是拒绝）。这种割裂的情况实际上是源自军队处在皇帝／国王的直接指挥下的结构性立场，它不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公民政府的职权控制范围之内。这些政府有权就军队预算问题展开谈判，但是不能控制具体实施。事实上，军队必须依靠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之间讨价还价的谈判决定自身预算，而匈牙利政府就常常利用这样的谈判施压，要求军队在政策上做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改变，但此举只是引起了军队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敌意。在政治体系中的人们看来，军队精英已经是政治专制主义最后一个重要的基础，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全盘拒绝社会扮演的参与性角色。在军队方面看来，政治的干涉会给予一些不必要的部门话语权，从而削弱整个君主国。军方精英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帝国的官僚体系与当前这种负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部分是因为官僚体系（至少在军方眼中如此）太过于依赖政党的影响和支持。[注]

军队对官僚体系的敌意，有着二者竞争有限帝国资源的结构性来源。[注] 1914年7月，就在奥匈帝国参战之际，军队和官员争相从囊中羞涩的帝国谋求更多资源，从而引发了两场危机，导致二者针锋相对。在战争到来时，它改变了军队和官僚体系之间的权利动力，但无法消灭这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冲突。

在社会上发动战争

当与塞尔维亚和沙俄的战争已经可能发生时，军队AOK（最高指挥部）迅速包揽了一些重要的职权，以便于在战时重塑国内体制，并且在战后推行一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秩序。与军队一直以来对公民社会的蔑视相符的是，军队并不希望打一场如后世史学家所称的全面战争。它并不希望抹去公民社会与军队之间关于公共义务和个人奉献的正式边界，而且它也不试图积极动员社会投入战争。反之，军队精英们投入战斗，是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重建他们认为能把国家与社会分开的边界。乔纳森·古姆兹（Jonathan Gumz）认为，这场战争给予奥匈帝国军方一个推行严格军事化和非政治化政权的绝佳机会，这个政权将建立在有着严格等级制度和规章法令的制度基础上，军事精英们希望它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帝国统治的所有政治冲突（事实上是所有的政治活动）。[注]

至少在奥地利，公民政府把它自己（及其官僚体系）置于军队指挥下，从而让军方可以实现它的目标。按照奥地利宪法第14条，当议会不召开会议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有权推动法律出台，于是奥地利政府迅速削减了公民权利，又在它的公民们身上施加了新的义务，这就造就了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约瑟夫·雷德利希最初提出的“军事独裁”这个词。[注]就在奥匈帝国宣战前数日，在首相卡尔·施图尔克伯爵领导下的奥地利内阁，以无限期休止国会和各州议会的方式，将整个国家转入了战时体制。一条来自奥匈帝国联合内阁的命令，同样“暂时停止”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公民宪法权利。奥地利内阁还引进了战时审查制度，暂停了司法审判的权利，把所有涉嫌战争罪行（指一切从间谍、囤积居奇到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的国民置于一部严格的军事法（或被称为即决裁判）之下审判。[注]此外，军方如今开始操纵组织大后方的秘密计划运转，这些计划创建于1906年，在1909年和1912年得到了两次修订。

上述这些措施，让军方控制了奥地利和奥匈帝国的行政机构，使它获得官员任免权，并可用军事法庭取代民事法庭（以及在军事法庭上的民事司法行为）。通过《战时产品条例》（Kriegsleistungsgesetz），AOK能够将一些产业以及它们所属的工人军事化。这些措施还让陆军部差不多在一夜之间，新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即KÜA（战争监管办公室）。该办公室设立的目的在于监视奥地利人、在帝国国内居住的外国人、难民以及在外国战俘营中的战俘。[注]

不过军方并未得到所有它所希望的。其一是匈牙利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的民族特权。它在自己的铁腕首相伊斯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领导下，在战争期间保证了匈牙利国会与克罗地亚议会的运作。[注]除此以外，由于布达佩斯方面对军方（甚至是奥匈帝国联合的陆军部）在匈牙利范围内强硬推行其制定的规定条款的行为抱有疑虑，导致机构重复的情况频繁出现。在匈牙利，战时特别机构在名义上仍然归属公民政府管辖，匈牙利的国防部则自行创建了匈牙利的HB（战时监管委员会）。[注]蒂萨同时坚持详细说明KÜA不能在匈牙利境内做的事，当军方踏出匈牙利境内所谓的军事区边界时，他也不吝于反复提出抗议。[注]但是，那些独裁法律规定范围覆盖了整个奥地利，匈牙利政府对文官统治的坚持没能保护他们的国民免遭侵害。例如在1912年，匈牙利政府接受了一份关于战时宪兵部署的秘密附加条款，这些条款中有一项是这样的："具有确切间谍嫌疑的人，应当在军事动员日当天被扣押起来。"[注]从7月末开始，这条规定可以肆无忌惮地应用在军事区内任何受到怀疑的语言群体中的个人身上，特别是那些说塞尔维亚语和鲁塞尼亚语的人。唯一还掌握在文官手中，与奥地利的情况不同的是匈牙利的战时媒体审查制度：布达佩斯方面控制了匈牙利所有的政治传媒事务，而在战争期间，匈牙利报纸的战争报道要比奥地利的报纸更加自由。[注]

军方使用强大的独裁权力，从这样几个因素在根本上断送了奥匈帝国的历史。除了用于突发情况的宪法第14条提供的遮羞布，或匈牙利首相具有的对匈牙利国会报告采取紧急措施的义务，这些改变预示着这个帝国将要彻底背离法治国家的正常运行轨迹。[注]这些变化扰乱了一个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和大众期望以及行政应诉联系在一起的体系。关闭国会和州议会也意味着奥地利在最需要公众的时刻，失去了在公众视野里的重要立法机构。如今从属于军方的官僚体系只能全权对不受欢迎的战时措施负责，并且几乎不能从民选官员那里得到多少支持。另一方面，在大众看来，这种形式上的差别看上去并不重要，因此当他们受到战时物资短缺和军事化规定的重大打击，依然向地方市长、前国会与议会代表以及党派领导人表达自己的不满。

检举与食品骚乱：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

“这为所有的南斯拉夫人带来了耻辱……每一个好斯洛文尼亚人都应该从道德和实际的角度抨击这次暗杀行为。”这些文字来自1914年夏天，采列城内一位使用斯洛文尼亚语的预科学校学生日记，它们不止反映出许多人得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被刺杀的新闻时的震惊，还反映出在战争爆发之际，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心和民族认同感互相强化的方式。[注]这是一位年轻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表达出的爱国情绪。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奥匈帝国的国民在应对战争挑战时，表现会和英国、法国、德意志或沙俄的人们大不相同。和其他欧洲参战国一样，战争的爆发导致了奥匈帝国国内自发、明显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活动，这当然也反映出人们对战争可能带来的痛苦的强烈反应。忠诚与爱国充斥于帝国所谓的民族社群的记录中，尽管AOK表现出反斯拉夫主义的恐惧，在它的报告中还是承认了在帝国的斯拉夫地区，没有组织反抗运动的倾向。[注] 1914年8月，全帝国的年轻人中流传着一种对战争的兴奋情绪，这部分是由于战前兴旺的大众社团（宗教、类似体操社团Sokol的民族主义社团或者社会民主党）向他们灌输的价值观。在和平的环境下，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滋生出了一种面向集体和奉献的价值观的热情，用以对抗往往和现代城市社会结合的腐败堕落、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注]

但是奥地利军方忽视了这些爱国主义情绪，又对帝国的斯拉夫人口报以不理智的猜疑，犯下大错。对很多奥地利人来说，民族自豪感是帝国爱国主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军方没能理解到这其中的关键。劳伦斯·科尔认为，“这更像是统治精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非相反的情况”[注]。AOK对国家不统一的恐惧（这是对大众政治完全的误读）使它采取先发制人的惩罚性措施，来对付臆想中的斯拉夫间谍的潜在背叛行为，他们或属于据称倾向于沙俄的加利西亚鲁塞尼亚人，或是生活在奥地利西部和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拥护者”[注]。

不过，军方上述的独裁主义国家建构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反应。许多关于战时大后方的历史研究强调，屈从严苛的军事化压迫的人们采取了多种应对行为，从互相揭发到有组织抢夺食物。高压政治不但造就了顺服，也产生了混乱。而混乱会导致新的代理形式，以及地方上确保生存的新行为法则。几乎在战时国家建构的进程一开始，它就立刻涉及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并不止于上述所提到的）。莫琳·希

利（Maureen　Healy）认为，当战争期间维也纳的普通人面对配给制经济时，会以传播流言和诋毁自己邻居们的行为对政府的审查和宣传做出反应，其目的在于影响他们自己的一套合法和公平的体系。[注]因此，善于随机应变的普通奥匈帝国国民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方措施发挥的效力。

军队和政府当局在施行新战时措施时失去控制的第一个领域是地方上对疑似叛徒的处理方式。7月22日，奥地利内政部发布了一道命令，警醒地方官员对那些亲塞尔维亚的态度回应宣战或者反战宣言的人们采取强硬手段。这就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和受雇于塞尔维亚与沙俄的地方代理人，还有社会主义者可能有的反战表现斗争。而就在反军队的指控逐渐被人忘却之际，一种由大众的抨击诋毁催生发展出来的，对塞尔维亚支持者的恐惧像滚雪球一般在南施蒂利亚或卡林西亚等多语言地区扩散开来，牵涉其中的不但包括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还包括了使用德语的人群。[注]这些地区的德语民族主义报纸急不可待地利用了军方偏执的恐惧，指控他们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竞争对手，以及一些神父是塞尔维亚的同情者，并要求宪兵对他们进行调查。尽管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位来自采列的日记撰写者所写的，绝大多数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相信（这一点非常准确），帝国皇储对南斯拉夫的利益抱有高度的同情。[注]

“这两方（斯洛文尼亚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中，每一个忠实的卡林西亚或施蒂利亚人都应当将自己感觉到的一切——哪怕只是有一丁点儿对塞尔维亚友好或叛国的迹象——向宪兵报告。”[注]正因为有这样的指示，军方自以为是地施加在地方社会的规则迅速导致了一场无法控制的检举控告的狂欢。邻居们突然开始互相指控对方的阴暗行为。地方当局和宪兵则把每一个私下传播的谣言和每一个含沙射影的控诉都当作严重的威胁处理，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动荡。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突然的战争状态导致的偏执型恐慌，他们对抗所谓颠覆分子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上层赋予的职权范围，并且视法律于无物。例如村镇中的某人在近来的巴尔干战争期间，说过一些关于塞尔维亚方面的正面信息，或者有人为塞尔维亚红十字会筹集捐款等流言四处流传。还有人报告当地一位神父没有对大公遇刺表现出足够的痛惜，就因为他没有第一时间在教堂升起黑旗。此外还有其他更加牵强附会的流言，例如意大利和塞尔维亚间谍在地方上收购地产，或者运载黄金的法国汽车驶向沙俄，这类谣

传使得民众自发组织起巡逻队，他们曾经开枪逮捕了一些公民。注

在南施蒂利亚，宪兵们对军方的指示反应过度，乃至任何人只要对他们的权威提出质疑，就会以支持塞尔维亚的叛国名义遭到逮捕。譬如1914年8月5日，布拉格霍弗（Pragehof）的宪兵自行采取行动，审讯了一位来自普图伊地区奇尔克维茨［Zirkovetz / Cirkovce（Pettau / Ptui district）］的神父安东·拉夫斯尔（Anton Ravšl），这位说斯洛文尼亚语的神父被控告在布道中赞美塞尔维亚人。之后事实证明，神父被逮捕的原因是他坚决否认其被指控的罪名。据称宪兵这样说："因为你和我争辩，所以我要逮捕你。"神父在狱中经历了酷刑，还被贴上"应当被绞死的温迪施（Windisch）叛徒"的标签，最后因为证据不足，到了9月15日才被释放。注从当年7月27日至12月1日，仅在施蒂利亚，就有超过900名男女因为类似的流言和邻居举报以及同情塞尔维亚表现的匿名举报受到控告，而马丁·穆尔（Martin Moll）指出，这些数字只是所有被实际逮捕的人当中的一部分。从有记录的案子中可以看出，它们中2/3来自民族主义组织势力最为强大的多语言地区，这是因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活动家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把他们在本地的对手指控为颠覆分子。注

到了9月，包括施图尔克首相和施蒂利亚行政长官克拉里在内的当局担忧局势会彻底失控。以军事措施控制地方社会在事实上导致了地方的混乱。于是如今文官政府的高层试着（虽然一开始并没什么作用）阻止宪兵们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按照检举行事。即便如此，正如之后的国会调查所明确的情况，这股检举告发的风潮不但损害了国家的声誉，也挫伤了那些曾经被针对的国民的爱国热情。这股风潮的受害者们还承受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尽管被证明无辜，但他们已经因为先前的指控失去了在地方上的职位。各州及地方的行政官员们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教训，他们无力阻止军队采取更加严酷的政策，军队在1915年春，当意大利向奥匈帝国宣战时，对的里雅斯特、特伦蒂诺和沿海地区的意大利语使用者故伎重施。不过这一次，当内政部指示下属文官政府的行政官员严厉打击民族统一主义运动的同时，它也警告官员们"必须保护意大利民族内奥匈帝国忠实的支持者免受不公正的攻击以及检举"。官员们不能做任何"煽动人民"的行为，也不能使"忠诚的人感到烦恼"。注

至于在匈牙利，政府对战时紧急措施的文官控制无法阻止类似于发

生在奥地利的民众告发浪潮。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它同样倾向于鼓励人们这么做。揭发和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语使用者，以及北匈牙利的鲁塞尼亚语使用者。7月15日，奥匈帝国共同的战争大臣亚历山大·克罗巴廷（Alexander Krobatin，1849—1933）警告匈牙利首相蒂萨，声称以他看来，克罗埃西亚–斯拉沃尼亚的本地塞尔维亚人体操社团Sokol，是所谓“更大范围的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煽动者。数周后，蒂萨这样提醒各郡的长官们：“我要特别向你们强调，你们应当注意自己对非匈牙利民族人口的态度……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力量。”[注]等到战争爆发，宪兵们立即出动，毫无根据地逮捕了南匈牙利的地方体操社团领导人与成员，而且即使克罗地亚议会中的塞尔维亚裔成员宣称自己拥有议会豁免权，宪兵们也将这些人一同抓起来。[注]

此时在匈牙利与奥地利，暴民的暴力行为和检举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宪兵政策，使得宪兵和军方采取的激进政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在克罗地亚，法兰克主义的反对党派毫无困难地发动了反塞尔维亚人的骚乱。[注]西巴奇卡地区（Vojvodina Bačka region）的城市松博尔（Zombor/Sombor）拥有大约3万居民，其中有1.2万人使用塞尔维亚语，而在9月初，这座城市爆发了民众游行示威，要求移除店铺标识上所有的西里尔字母。当一位塞尔维亚语店主拒绝移除西里尔字母标识，愤怒的暴民追到店主家门口，这位店主选择朝示威者开枪。随后松博尔的军方指挥官要求市长和公诉人员立即将这名店主移交给他们，然后军方把店主送上了军事法庭，并立即执行死刑。军事法庭还从当地的塞尔维亚语裔人群中指定了12位富裕的人质，只要当地人对军事当局表现出任何阻碍或反对的迹象，这些人质就会“被军事当局逮捕并立即处决”[注]。

蒂萨首相反复对军方的这一类以及其他相似的行为提出了抗议。1914年8月，在他写给外交大臣布瑞安伯爵（Count Burián，1851—1922）的信中，蒂萨如此感叹：“军方指挥官做出的过分行径已经越来越不屑于顾及政府当局。请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尽一切努力阻止这种疯狂的情况。我不得不觐见皇帝，然后将此事当作原则性问题（对待）。”然而大众反塞尔维亚的示威就像是军方反应过度的表现差不多，而匈牙利政府释放出的信号也摇摆不定，前一天它还在要求克制，但后一天又要求无情严酷的行动。

很快，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大众检举行动导致了另一股难以控制的社

会力量。在许多案例中，人们向地方当局检举揭发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策略，揭发者希望通过此举确保他们强化了战时的各种规则秩序，这些规则从食物供应到爱国行为的恰当形式，几乎包括了生活的所有方面。鉴于地方当局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人员短缺（从警察到教师），公民想坚决要求人手不足的当局强化他们最关心的规则，检举成为手段之一。检举成为维护守法与公平的大众准则的一种新工具，而据说这些准则的推行，只会威胁到少数从邻居承受的苦难中牟利的社会害群之马，比如囤积食物者、黑市商人、寡廉鲜耻的地主以及青少年犯罪者。尤其在城市环境下，人们获取每日所需的食物变得越来越困难，检举揭发能提醒当局对公民们负有的责任。

在战争期间，因为农业生产减少和面临外国封锁食品进口的情况，所有奥匈帝国城市的食物供应都急剧缩减。[注]即便是1917年帝国最终战胜了罗马尼亚和沙俄，或者军事占领了塞尔维亚以及俄属波兰（帝国军队在那里征用了当地的补给品为己所用），也未能缓解越发恶化的食物短缺状况。[注] 1914年作为农业区的加利西亚落入沙俄手中，这直接导致奥地利失去了1/3的农田，从而给这个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沉重一击。此外，人口的大量流失以及农耕动物被军队征用也造成了相似的结果。即使次年奥匈帝国和德意志联军夺回了加利西亚，当地的农田因为战争已经荒芜，人口也所剩无几。

总之，1915年，奥地利的小麦收获量还不到1914年歉收情况下小麦收获量的一半。1916年和1917年的粮食产量则分别降低到1914年粮产量的44%和40%。其他的食物产品无法弥补粮食损失的巨大缺口，因此在不少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者们便在已有的谷物中掺入填充料来扩大食物供应，而这些充实谷物的材料从土豆、栗子到荨麻籽与锯木屑，任何可用的东西都被人们利用起来。这样一来，所剩无几的面粉与面包中所含的热量和营养价值就大大降低，从而导致愤怒的消费者进行抗议。[注] 1918年2月，布拉格的一名代写信者不断重复着人民的普遍抱怨，他们感到如今的帝国公民受到的待遇已经和动物无异，并称“我们得到的是连牛都不吃的黑色面粉”[注]。

在农业化程度较高的匈牙利，粮食生产情况相对较好，1916年，匈牙利农民生产出人均203千克的谷物，而奥地利同期人均只有72千克。在战前，匈牙利每年向奥地利出口210万吨谷物和面粉。但是1916年，匈牙利只能向奥地利提供10万吨粮食。就在前一年，匈牙利政府也对基

本食品的供应进行了限制。[注]面对奥地利一再的抗议，匈牙利政府总是一成不变地回应，称匈牙利要承担起为军队满足最大份额的粮食与饲料需求，因而无法缓解奥地利的粮食状况。[注]

1915年2月，奥地利政府建立了一个战时粮食管理事务处，用来监管战争时期全帝国面粉以及面包产品的分配。社会主义者卡尔·伦纳和文森茨·马科茨（Vinzenz Muchitsch）被任命为这个机构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但他们很快就因为国家对粮食贸易的垄断而感到激愤不安。奥地利地方政府同样与私人公司签订协议，组成地方上用来分配粮食、燃料以及皮革、棉花等物资的卡特尔组织（Zentralen / ustředny）。直到1916年11月，奥地利政府才设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面向奥地利全国的粮食办公室，并且让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卡尔·伦纳）成为理事会成员。[注]从1915年4月开始，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当地政府就引入了配给卡制度，每日允许个人在当地市场购买固定数量的特定商品。1915年，维也纳和布拉格城中第一批适用于配给制的产品是面粉和面包，接着是糖、牛奶、咖啡，次年又加入了猪油。[注]奥地利农业更加繁荣的地区，比如波希米亚乡间的情况也没有更好，因为它们想象中的优势使得这些地区要满足军队更大的军需品供应需求。[注]

帝国城市中不断恶化的危机还反映在每日分配的食物数量大幅度减少，以维也纳为例，从1915年4月到1918年11月，人们每天可以得到的面粉从100克减到了35.7克。1916年，所有维也纳人在理论上每天只能得到1/8升牛奶；而到了1918年，当地甚至已没有足够的牛奶用于分配。[注] 1918年4月，布拉格不得不把面包的配给额度降低一半；到了6月，即便是如此少的数目，也不能足额发放。同年4月，布拉格的每月人均油脂配给额减至仅50克。总的来看，在战争时期奥地利城市的物资供应要比同时期的巴黎少很多。以巴黎为例，它只在1917年进行了砂糖配给，在1918年一年内进行面包配给。至于伦敦，直到1918年年初，才开始采用配给制度。[注]奥地利官员们同样抱怨，即便是承受了相似问题的德国城市，也从1918年与苏俄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

在布达佩斯，情况也并不比奥地利乐观。为了预防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匈牙利政府在1912年通过了战前紧急法，又在1914年对其进行了补充，从而给予匈牙利政府控制经济众多方面的权力。这些权力中，就包括制定基本消费品的最高价格以及提货转运这些货物多余库存的权

力。由于早在1914年，匈牙利东北和新安的城镇（靠近前线）就已经经历过供应问题，因此匈牙利政府在1915年3月引入了食品券制度，这是推行配给制的第一步。之后在同年12月，匈牙利采用了面包配给。[注]

当然，人们面对的真正挑战首先是如何获得配给的产品。莫琳·希利在其颇具启发意义的分析研究中指出了这个配给系统运作的几种方式（或者说运作失败的方式）。在维也纳方面，官方配额和帝国各城镇居民真正能获得的物品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缺口。以1917年的的里雅斯特为例，当地长官就向内政大臣投诉，称送达的粮食谷物、土豆（在此时，的里雅斯特已经用它替代了面包）、豆类以及油脂等配给品往往与事先政府承诺的数额不符。举例来说，原本分配给的里雅斯特的土豆数量是2 400辆马车，但是这座城市实际只收到1 680车。因为营养不良，肺结核开始在这座城内蔓延。于是的里雅斯特的行政长官这样警告道："人们的情绪已经承受了战争带来的多方面压力，他们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负担了。"[注]这位官员像当局其他职位上的同僚们一样，担忧更大的负担会对这个国家的大众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击。

获取食物这件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如今开始占用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最终职业女性（她们中许多人都服从于军事化的工厂纪律）以及她们的孩子们在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彻夜排队，为的是在第二天早上有机会在店铺开张时买到东西。[注]克莱尔·莫勒隆（Claire Morelon）在其杰出的研究中引用了一位布拉格居民回忆其七八岁时经历的口述证词，当时他和其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彻夜"坐在或者躺在面包店前的石板路上，这样第二天早晨轮到自己时就不会错过购买机会"[注]。希利引用了一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兼记者马克斯·温特（Max Winter）的调查，他调查了维也纳的类似情况，得知如果一个人在凌晨三点之后到达购买场所，这就意味着他将失去第二天的食物。[注]在一封送给施图尔克首相的愤怒请愿信中，温特将士兵在前线承受的苦难与他们在后方的家庭所承受的国家义务联系起来：

> 你们这些帝国的官员一开始确信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可怜的爱国者，他抛弃了那些父亲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的孩子，危害他们的健康与生命。[注]

温特的愤怒表现出了一件事，那就是战时物资供应的失败造成的问

题会迅速地转变为危害帝国存在正当性的威胁。进行抗议的民众们不断要求得到从地方到各州官员的保证，承诺履行帝国对人民的承诺，即便当局已经日渐无法执行分配给它们的任务。来自布拉格的警察报告注意到由于民众彻夜排队，发生暴力事件的危险正在不断上升。报告称：“站在城市最热闹的街道上的人们已经满心怨愤，只要最少的一点挑衅或刺激，就能将他们猛烈地煽动起来。”[注]那些成群的妇女因为无法买到某一些生活必需品而恼怒不已，她们或许会自发组织起来游行前往市政厅，要求政府补偿对她们的亏欠。而在其他街坊中流传的获取食物的流言，可能将导致更多的民众群体游行。市民们面对的官员或许会对妇女们表示同情，但他们也爱莫能助，于是失望的民众就只能再去寻找另一位官员。人民沮丧挫败的情绪很快就转化为暴力，而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它演变成政治抗议。[注]而当绝望的市民们离开城市，到附近乡村搜罗食物时，当局的回应居然是在火车站搜集篮子和背囊，并没收了这些人寻找到的食物。[注]

城市人群前往乡村搜寻食物使得他们不被农民邻居所喜，特别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报纸经常宣称农民们从城市的饥馑中获得了利益。在波希米亚，捷克民族主义者的重农党试图与捷克语和德语社会主义报纸上宣传的城市对乡村的愤恨斗争。为了重建城乡之间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团结感，这个党派的慈善团体“捷克之心”制订了一个城乡家庭的结对计划，最终让城市儿童能够多次体验乡间的生活。此举之后得到了后来的皇帝卡尔一世（Emperor Charles）的提倡，皇帝认为此举是支持帝国团结统一的一种方式。最为重要的是，重农党的报纸提供了另一种令人信服的民族主义解释，来分析当前的状况，这些报纸称：波希米亚的食品已经被出口到了德国。军方和文官政府当局都不断反驳，战时粮食管理事务处在布拉格的分支机构甚至提出悬赏，奖励那些能够证实粮船前往德国的线索的人。但这些都没有用，人们对粮食装船运往德国的抗议屡见不鲜，直到战争结束仍是如此。[注]

此时的帝国公民们越来越将食物供应看作一项基本的人权。一位维也纳的代写书信者愤怒地抗议，指出劳动者们“必须为了饥肠辘辘的我们奉献生命……每个人无论贫富，都有生存的权利”[注]。确实，代写书信者、检举者和政治活动家们都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在大后方的工作比作类似于军队将士在前线的那种奉献。而公众则要求食物与燃料供应上更加公平有效，由此而生的骚乱成为战时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

领域，无论是政治家、官员，乃至于军方管理层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像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背景的市长理查德·魏斯基希纳（Richard Weiskirchner，1861—1926）在这个案例中就日渐把他们自己放在对抗那些拒绝分享的傲慢的匈牙利人的位置。[注]

市长和他们的代表们达成具有同情心的协议，通过将人们获得食物的要求合法化，并且创造出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新权利，令他们的政治声誉有所提升。就像魏斯基希纳在维也纳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向党派的领导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过去的和平时期，“没人要求我为他弄到土豆。我也从未有过必须为谁提供面粉和肉类的经验，在过去，市政当局从来没有过需要这么做的法律职责”。这位市长或许会抱怨“无论在法律中或是哪一部法令内，都找不到城市必须负责处理食物供应的职责要求”，但正是他和其他要对民众产生这样的期待负责的人们制造出了这些他们不熟悉的义务。[注]

市民们要求的新社会契约，是对他们牺牲的一种回报，这个契约要求国家在各个层级上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即便国家（无论是在市政当局、州政府或者帝国政府的层面）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时，它还是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加倍努力根除黑市，铲除违犯价格法的人，以及那些伪造或制作劣质食品的人，来表现出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不过在积极回应市民诉求方面，政府把民众要求合法化的手段不是向民众提供食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法律语言以及效率低下的行动，于是当局的表现进一步让许多市民确信，食物供应的问题是一小群可疑的市民或者外来人群体一手造成的（这些群体可能是难民，也可能是犹太人）。这么做，人们或许会暂时把焦点从政府的失败上转开，但这些做法仍然破坏了整个帝国社会的和谐统一。[注]

当然，这类检举还给了市民们解决个人宿怨的机会，不过官员们很快就已经习惯于这类投诉，检举还成为一种检举者先发制人的策略，赶在可疑罪名有可能落到自己身上之前，它强调和表现出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他显然不信奉爱国主义的邻居之间的针锋相对的情况。在布拉格，爱国的捷克妇女救助委员会在其总部门外升起了波希米亚和布拉格的旗帜，但没有升起帝国的黑金二色旗帜，谁会认为这重要呢？在这个例子中，检举这个组织的人，以及受到检举的妇女组织都表现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倾向，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两种表现越来越趋向对立。[注]



布拉格日夫滕斯克银行（Živnotensk Bank）发行第五批战时公债（1916年11月）的宣传海报。从1914年11月起，为了资助耗资巨大的战争行动，奥匈帝国共发行了一系列8批，每批间隔半年的战时公债。这些公债共在奥地利筹到351亿克朗，在匈牙利筹到186亿克朗（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WI Posters）

另一个与检举行为相关的产物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大。它不仅使战争爆发，还导致人们对奥匈帝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叛徒产生了疯狂的怀疑。从军方的角度来看，开战的第一年对奥匈帝国非常不利。沙俄几乎是在顷刻间就占领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同时塞尔维亚也击退了奥匈帝国军队的进犯。更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要求帝国就它们的中立立场做出领土上的补偿，而鉴于当时不利的军事形势，德意志向奥匈帝国施压，要求它考虑让步。1915年春，意大利抛弃了之前的中立立场，在西南部开辟了一条对抗奥匈帝国的新前线，这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向意大利秘密许诺，将在亚得里亚海东部给予它大量领土。此时情况看上去十分可怕，许多人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国很快就会遭遇可耻的溃败。军方在战争开始的最初两年内，不断以指责百姓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颠覆活动的方式，为自己的失败（1914—1915年在加利西亚的大面积领土丧失和大量人员成为俘虏）开脱。军方坚持，显然有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正致力于制造奥匈帝国的失败。

许多波希米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南方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狂热地相信这番说辞，他们阴暗地警告人们捷克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背叛，称捷克士兵会朝天而不是向敌人射击，或者捷克与塞尔维亚士兵可能集体逃亡。[注]而在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捷克民族主义者对这类指控的回应，都是将它们看作心怀敌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宣传的假象。捷克民族社会党的一个所属机构“国家政策”（Národní politika）在引述无数捷克人为了战后能在帝国中为捷克民族获得一个更好地位的奉献案例之后，它在1917年1月宣布：“我们内在的忠诚，以及我们有能力为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履行职责的认识强化了我们对未来公义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心，哪怕这对少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来说是个阻碍。”[注]1917年5月，在国会的一次发言上，捷克民族社会党的代表伊瑞·斯特施博尼（Jiří Stříbrný）控诉了布拉格警察总长的反捷克偏见，并猜测近来出现在布拉格的亲俄传单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阴谋，从而败坏捷克民族主义者在警方心目中的信誉。[注]

不过仅仅过了几个月，国际形势就产生了剧变。由于沙俄受到要求和平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脱离了联盟，加之与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可能性相关的悲观情绪日渐盛行，欧洲西部的盟国开始考虑在未来分裂哈布斯堡王朝的可能性。像托马斯·马萨里克这样流亡海外的奥匈帝国民族主义政客，他们试图制造帝国分裂的行为已经失败了三年，如今突然找到

了愿意倾听他们观点的对象。注最终，一些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开始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样，采用极为相似的无根据指控来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他们向外界宣称，捷克民族事实上在一开始就抵制战争，并且一直在寻求从奥地利独立，捷克民族主义者们也试图在战争期间从事颠覆活动。大战结束之后，捷克民族主义背景的政治家、记者以及活动家们盛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捏造出来的捷克士兵逃亡和颠覆活动，正好用它们来为创造一个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正名。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反复确定，关于大量捷克人战时逃亡或者拒绝作战的记录事实上都是虚构的，这些故事往往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或军方领导人的宣传，它们帮助军方，把大众对它全然无能的表现（尤其是开战之后的最初几年）上的注意力转移开来。历史学家理查德·雷恩（Richard Lein）提出，在"一战"中最著名的一次变节叛逃行动，即布拉格军区第二十八步兵师团的一部分官兵投向沙俄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奥匈帝国军方急于掩盖这次不存在的叛变指控背后自身的无能，以大批捷克士兵逃亡的虚假罪名解散了这个师团。注之后捷克民族主义者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努力维持着这些虚构的故事，并且合谋延长它们存在的时间，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奥匈帝国的军事失败以及帝国分裂的层面指责捷克人。而与此同时，捷克民族主义者在战后高调宣扬捷克人在战时逃亡变节的虚构故事，因为这看上去会让他们在战争伊始就努力为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主张更可信。因此，捷克人的叛国行为成为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一个神话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的邻居们

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中，另一件人们未曾预料到的灾难撕裂了帝国的社会关系脉络，为了逃避沙俄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入侵，数千难民进行了逃亡。这股大量难民的迁移风潮，是一系列混乱和骚动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造就了它们。

国家对这种紧急情况完全没有准备，这部分是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部分是因为帝国没有预料到沙俄能够成功入侵，亦有一部分原因是沙俄对这两个地区的入侵彻底粉碎了地方政府机构。加利西亚和布科维

纳的公务员试图在逃亡过程中还原地方记录，并且请求国家给予他们薪水补偿，而就在此时，这两个地区贫困惊恐的选民的涌入，压倒了他们提出的要求。[注]最后加利西亚的难民们分散进入下奥地利（维也纳）、波希米亚（布拉格）、摩拉维亚、北匈牙利和阿尔卑斯山区各地。[注]

一些州政府迅速建立起临时营地，用来容纳它们尚未决定其未来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匈牙利北部拥有6　000名居民的城镇巴尔代约夫（Bárta / Bardejov / Bartfeld）和加利西亚分别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两侧，1914年11月中，仅3天内，就有超过1万名犹太难民从加利西亚逃难来到这里。自从9月中俄军入侵他们居住的城镇，这些难民就拖着马车，或者徒步一路跋涉逃亡。他们个个饥肠辘辘，许多人还染上了传染病。巴尔代约夫的军事指挥官命令这些新来者前往帝国更深的腹地，那些有一定财产的和被他称为“有知识”的人将被送往科希策、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格拉茨，那些没有钱财的将被送往摩拉维亚乌赫尔堡新建的营房。之后这些人会被转送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小型难民营网络中。这两拨待遇不同的难民中穷困的那一批很快就启程前往摩拉维亚，不过他们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徒步，因为铁路运输已经完全服务于军队运输的需要。[注]



1914年，撤离加利西亚的人们（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就像上面这个例子表现出来的那样，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难民政策（以及它后来的发展）把移民们按照他们的公民身份和财产状况进行分类。难民中的奥地利公民属于奥地利政府的责任，他们将获得救助，以及得到每天只在奥地利领土境内发放的70海勒津贴，到了1915年，这笔津贴增加到每天90海勒。因此作为奥地利人，逃难到巴尔代约夫的加利西亚犹太人，就不能从匈牙利政府处得到救助。另一个划分难民群体的重要标准是财产状况，人们按照财产被分为“可以自给”（bemittelt）和“无法自给”两种。前者可以享受更多的权利，能自行前往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各个目的地，而不是被难民营接收；而后者就只能被送往奥地利的难民营，同时希望像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这样的国际性援助组织能为他们提供帮助，而这个组织很快就在帝国接纳难民的地区设立了许多中心。

很快，用“可以自给”和“无法自给”来分类难民的方式就显然不只出于政府对传染病和犯罪的恐惧了，它还来自安定人心和之后试图约束难民行为的尝试。政府以“无论在大城市或乡村地区……任何控制这些人，特别是这些人的卫生状况的形式，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为理由，为建造难民营正名。此外，政府希望“在任何地方，把可能来自同一地区的同一民族成员收容在一起，让他们感觉生活在原籍”[注]。国家利用难民营来稳定人心和保障卫生，同时向难民灌输工作、休闲娱乐和道德方面的规范。难民专家还担忧难民营生活会对难民中较富裕的那一批在精神上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他们常常为这些人提供单独的私人住宅，但由于人们认为政府应当平等公正地对待难民，此举恶化了难民中的阶级紧张关系。[注]

1915年夏，奥匈帝国军队收复了绝大部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领土，但是到了5月，帝国又受到了意大利的攻击。许多加利西亚难民因此从施蒂利亚迁移到波希米亚的难民营，当年稍晚些时候，又有一些人返回故土。同时，数千名意大利语裔的难民从特伦迪诺来到靠近施蒂利亚莱布尼茨的瓦格纳难民营，取代了加利西亚难民留出的空位。而另有数千说意大利语的难民抵达了上奥地利的布劳瑙（Braunnau），以及下奥地利的米特恩多夫（Mitterndorf）和波滕多夫（Pottendorf）等地的难民营。与此同时，差不多有8万名面对意大利入侵军队的斯洛文尼亚语裔难民逃往戈里齐亚附近的帝国西部边境地区，以及伊松佐（Isonzo）地区，并留在当地的难民营内。[注]

随着难民营在奥地利越来越“顽固”，它们也为一个更广范围的人口控制问题（有些甚至与战争无关）提供了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从而不再仅仅是救助和收容难民的机构。在战争之初，这些营地有的被用来拘禁在奥匈帝国范围内逮捕的外国敌人，有的用来容纳提前撤离战争舞台的人们，有的用来看管不合作的难民，还有专门为罗姆人设立的难民营，以及容纳那些有政治不可靠嫌疑，从边境地区迁移来的人士。[注]在这最后一类中，确认某人在政治上不可靠，往往是以这个人战前属于一个意大利民族主义社团，牵涉了意大利民族主义的选举鼓动行为，或者试图逃避征兵为根据的。[注]

这些说意大利语的奥地利难民随后发现，他们在难民营所在地的境遇并不比处在意大利占领区或者意大利本土更好。而当地人也正在忍受着食物短缺的折磨，对不受欢迎的难民们也怀着极大的猜疑。总的说来，特别是在1917年秋天奥匈帝国与德意志联军在科巴里德（Caporetto / Kobarid）取得对意大捷之后，意大利军方极其不信任意大利语裔的奥地利人，认为他们是奥地利的拥护者（austriacanti）。因此，当一位意大利将军在战争初期率军占领一座边境城镇时，他警告当地意大利语裔的奥地利居民：“我的士兵们相信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自由之战，而不是占领与降灾祸于你们身上，但如果他们知道你们并不乐于从奥地利那儿获得自由，那就另当别论了。”[注]

至于所有的这些收容营，很快就成为战时各种人类悲惨遭遇集中展示的场所。它们的规划十分糟糕，建设匆忙，而且立刻就因为预料之外的大量难民、撤离者和政治嫌疑犯涌入而人满为患。这些营地收容的人们忍受着营养不良、疾病、精力衰竭、精神压抑以及背井离乡的痛苦。以设在乌赫尔堡的摩拉维亚收容营为例，这一收容营在1916年年末容纳了超过9万人。1914年10月开始建造营房的瓦格纳营地，到了1915年5月，已经拥有了21 300名居民。但是截至1915年年底，奥地利的全部收容营理论上只拥有容纳13万人的空间。[注]

在这些早期的收容营内，难民感觉到他们更像是囚犯，而不是应当获得帝国救助的不幸且忠诚的帝国子民。这部分是因为这些营地也会被用来拘禁敌对外国人，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府害怕传染病（特别是斑疹伤寒），以及营地所在地方缺乏能说波兰语、鲁塞尼亚语、意第绪语和之后的意大利语和斯洛文尼亚语的官员。在第一批营地中，卫生状况亦糟糕透顶。施蒂利亚的塔勒霍夫（Thalerhof）营地中，差不多有2

000人在战争期间死于各式各样的疾病。收容营中的医疗护理服务也十分短缺，因为服务于州政府的医护人员中，有至少1/3在1914年10月被征召入伍。此外，行政官员们还要面对一些已经有数十年不曾在本地见到的疾病的暴发。收容营近乎监狱的环境同样也不为它的居住者们所喜。1917年，一位来自特伦托地区的难民在日记中这样苦涩地倾诉："在米特恩多夫的经历教给我们多少东西，我们对爱国主义的概念就产生了多少改变。"面对着产生于自身内部，由于难民之间的语言差异而进一步恶化的人道主义灾难，帝国失去了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它无法再赢得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普通公民的思想和心。

而尽管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关于早期收容营内令人绝望的境遇的消息还是泄露了，刊登在报纸上。一份名为"新改革"（Nowa Reforma）的克拉科夫报纸披露了一份来自加利西亚官员措辞严厉的报道。这些官员在1915年年初访问了瓦格纳收容营和塔勒霍夫收容营，就立即要求近来撤退到边境城镇比亚拉（Biala）的加利西亚行政长官办公室与内政部交涉。而就在内政部推脱瓦格纳收容营管理不善的职责时，施蒂利亚政府在当地安装了一个大型灭虱系统和淋浴装置。尽管如此，时至1916年春，来自弗留利的意大利人民党国会代表还在要求内政部让来自他们这个地区的难民在附近的卡尼奥拉和施蒂利亚居住，难民营营房也要按照难民原来居住的村镇来安排规划，食物也应当是难民们熟悉的家乡口味，他们来去难民营不应受到限制，而这些难民营的运营也应当更像社会福利机构，而不是监狱。最重要的是，这些代表们要求难民营应该"不再让难民们从心理上觉得它们是罪犯的流放地"。

由于政府对指责难民营和收容营糟糕状况的声音越来越敏感，它开始试着描绘一幅更好的营地情况景象，用来驱散那些关于营地居住者的层出不穷的流言，譬如有人说这些营地收容的人们被强制劳动，或者懒怠于工作，拒绝接受在附近农田里的有偿劳动。当1916年，处于中立的美国政府向奥匈帝国外交部投诉位于克罗地亚科普里夫尼察（Koprivnica）难民营内意大利裔公民的遭遇时，帝国方面向美国人保证，营地收容的人们每日进餐已经比当地原住民都更规律。据说这些收容营内的人们每天可以分配到400克面包，而且只要肉价适合，他们还可以在周日、周一和周四吃到菜炖牛肉。但即便偶尔收容营内的情况会好于外界，这种较为有利的比较也不能为帝国官员们争取到多少人们的感激，官员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地之中。

政府同样担忧营地内居民的心理健康。长期滞留在营房中，会降低这些人“对祖国故土的正常热爱之情”，最终导致收容营中的道德败坏。因为这些难民经常被粗暴地与家庭和所爱的亲友分开，当下的生活又背井离乡，遥远且让人不适，政府就想方设法用塑造难民的常态感的方式，重建这些人的精神、道德与文化状态。1915年，一份来自奥地利内政部的报告这样总结，难民们的精神消沉状态不能威胁到帝国腹地居民的普遍情绪，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报告这样写道：“要给予他们安慰、分散其注意力，并让他们得到有益的消遣，同时在不与地方劳动力市场产生竞争的同时，给予年轻难民一定的指导。”随着收容营逐渐变得更长期化，一些营地建造了专门用于食品商店、肉店、面包房、公共厨房、医院、学校，甚至是教堂的营房，来营造一种更强的正常生活感。[注]不过在战争期间，正常生活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在收容营之外就已经罕见，更不必说在营地之内。

为了进一步促进战时的团结，瓦格纳收容营的管理机构甚至还在营地内发行了一份报纸，难民们花上4海勒就能买到。1915年10月，这份报纸的第一期用双语版本（德语和意大利语）欢迎了4 040个弗留利人和13 460位伊斯特里亚人的到来，并向这些前加利西亚居民解释，他们来到收容营就像是返回了“故土”。这份报纸这样写道：“欢迎你们来到绿色的施蒂利亚，德意志民族的热情好客会抚平你们的伤痛，而你们的痛苦令我们感同身受。”这份报纸还用意大利语和德语连载了不同的小说、从各地前线传来的令人振奋的消息、相关政府法令，还有幽默的战地故事。在第二期报纸中，还有一份营地内的编织学校的邀请，鼓励所有瓦格纳收容营中14岁以上的少女和妇人到校学习。[注]

1917年3月，我们甚至在政府对州官员的报告中，捕捉到一种帝国式爱国机会主义的明显迹象。许多使用鲁塞尼亚语（如今人们更多地用乌克兰语指代这种语言）、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或克罗地亚语的难民请求营地管理机构为他们的孩子组织德语学校课程，“以保障他们的经济前途”。维也纳方面的官员敦促地方行政官员积极回应这些请求，并且乐观地认为这些举动可以“促进帝国边境与内陆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产生更活跃的发展，同时直接加深人们共同的归属感”[注]。甚至有一些官员还设想，收容营内的人道主义灾难可以加强战后的帝国。



1915年，在瓦格纳难民营的营房内开设的妇女缝纫课。这张照片来自一部名为“关怀难民”的宣传相册，由奥地利内政部主持发行（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至于那些在西部有家庭或工作联系以及资源，能够让他们在当地合法或非法地独立生存的难民，在布达佩斯、布拉格或维也纳等城市中，同样感受到身在异乡的混乱与被剥夺感，以及他们的新邻居们极度的敌视情绪。当地的商店往往拒绝接待他们；市政府担心传染病，因此不断要求他们接受非自愿的身体检查。尽管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本地人也对说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难民怀有不友好的情绪，城市中大多数反难民的敌视情绪主要针对的还是加利西亚犹太人。举例来说，1917年，布拉格市议会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甚至试图禁止犹太难民使用公共交通设施，虽然这个措施很快就被撤销，市政当局的态度却可见一斑。注

帝国为了应对战争移民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做出了不少创举，亦表达出关切的态度。尽管如此，考虑到不断发展升级的全面战争的特殊需要，帝国没有足够的资源为它背井离乡的公民创造哪怕是最低级的生存环境。帝国背负的收容难民需求越多，它从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心不甘情不愿接纳难民的其他大众那里得到的感激就越少。帝国官员无法影响当地人的态度——当地人已经是物资短缺的受害者。当地人认为，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欢迎被认为是外国人、传染病源和扰乱社会因素的难

民，而不帮助有需要的其他帝国公民呢？

帝国的宣传

战争的最初几年，除了奥地利之外，帝国没有进一步扩展它严格的审查制度，并采取积极的战争宣传手段。不过随后AOK就开始培养一批奥地利记者、艺术家、摄影师等专业人才，以及扶持一些电影制作公司，用来向大众生动地（当然也是带有偏向性地）描述战争情况。1915年12月，奥地利KÜA和匈牙利HB开始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召开每周新闻发布会，接待受邀的记者们。它们相信通过向媒体传播一些消息，可以比缄口不言更有效地控制从前线到大后方的信息传递。注通过KPQ（战争通讯社），AOK最终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

KPQ的行为反映出AOK对帝国内部各民族刻薄的偏见。它把所有的通讯记者分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部门，使用的官方语言分别是德语和匈牙利语，从而有效地将斯拉夫裔的记者彻底排除在信息流通循环的圈子之外。只有很少的记者有机会前往前线，而当他们到达前线，采访活动也会受到严密的监控。1915年夏，当奥匈帝国军队夺回加利西亚的普热梅希尔要塞或征服塞尔维亚时，KPQ才批准记者们前往前线访问。不过绝大多数战地指挥官，对媒体有着和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样的憎恶情绪，只有其中的少数人认识到与记者培养良好关系是美化他们公众声誉的一种方式。

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战时宣传不过是私人组织的战争慈善活动或者销售战争债券的大众行为的副产品。绝大多数这类活动关注的是在前线的本地人的需求，而不是帝国的爱国主义。战争宣传活动的关键挑战，在于建立一套适用于前线官兵和大后方民众，独特且遍及全帝国范围的一致信息。最终，搜集了许多宣传产物的战争档案馆，成为积极提升国内士气的宣传手段。譬如在1916年，它制作出一种类似战争年历的产品，这种产品附有皇室家庭的照片，以及亚瑟·史尼兹勒（Arthur Schnitzler）和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等知名德语作家撰写的爱国篇章。很快，内容囊括人们在特定的前线地区和战役中经历的类似德语图文选集也相继面世。注这类出版物也有克罗地亚语、捷克语、匈

牙利语和波兰语等各版本，但它们最主要的对象还是使用德语的广大民众。在战争之后的几年中，档案馆还在布达佩斯、维也纳、格拉茨、札格雷布、布拉格、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等奥匈帝国大城市组织了以战争为主题的绘画与摄影展览。

1916年5月，在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举办了一场目前为止规模最大也最雄心勃勃的战争博览会。游客们可以参观超过40个展厅的内容，了解战争从大后方（在博览会上展示了人工代用食品）到前线壕沟的复制品，以及为受伤老兵所设计的假肢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注]莫琳·希利对这次博览会有格外精到的分析：“这场博览会举办时间超过一年之久，但是由于它对战时生活某些方面的描述与人们的个人体验相悖，因而这次博览会的娱乐价值要远大于它潜在的宣传价值。”[注]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许多由政府授意拍摄的战时宣传电影上。1915年，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有150座电影院。札格雷布、克卢日和普莱斯堡等规模较小的城市拥有的电影院则要少得多。到了战争结束时，布拉格才有35家电影院。在战争期间，各地出现了许多临时的电影院，电影制片厂也在这段时间大量增加。它们同样和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电影公司合作，在战争故事片、新闻片和宣传影片之间进行协调。这些都是完全娱乐性质的，因此人们表示接受。它们并没有给人们对战争的态度造成多少影响，部分原因或许和战争博览会一样：观者的实际体验与这些宣传所描绘和主张的战时状况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合法性的复苏

> 这是一个寒冷的11月夜晚，时间是9点整……在布达佩斯人度过的绝大多数的夜晚中，他们受够了关于战争单调不变的坏消息，往往在令人沮丧的报摊前匆匆走过，但是今晚他们驻足停留，并且阅读起来……就在今天，人们暂时放下了每天对前线发生的事的焦虑，对沦为战俘的丈夫、儿子与兄弟们的忧惧以及死亡的痛苦。就在今日，所有事都被那种巨大的民族灾难感、那种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未来的惶恐给压倒了。吸引每一个人去到那些灯火通明的报摊边的原因，是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驾崩的消息终于公之于众。[注]

1916年11月21日，这个代表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这个帝国近70年的人去世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过去并不总是以人们爱戴的老祖父形象出现，但长久以来，他已经成为帝国存续的一个重要象征，而且被帝国所有社会、语言、宗教和政治群体的人们尊为保护者。在1916年，已经很少有人能记得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统治之前的时光。此时正值战争经历的第三个，也是最糟糕的一个冬天，老皇帝的离世给奥匈帝国的臣民们带来的忧虑和不确定感，正如他们现在正面临的这段时期。

新的奥地利皇帝与匈牙利国王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29岁的年轻侄孙卡尔（Charles，1887—1922）。1911年，卡尔迎娶了波旁–帕尔马公主齐塔（Princess Zita of Bourbon Parma），老皇帝去世时，这对夫妇已经有了4个幼小的孩子，并孕育着新的后代。卡尔对国家事务毫无经验，也远不及他的叔叔——前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对其臣民的了解。这个年轻人在战争期间继承皇位，而这场大战需要他的臣民们付出前所未有的牺牲。因此，新皇通过迅速建立起一个具有高辨认度、能安抚人心且广受大众欢迎的形象，成功继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帝国国父的角色，对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合法性以及帝国的存续都极为重要。[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祖先约瑟夫二世、弗兰茨一世/二世一样，他履行了国家的第一公仆这个单调乏味的角色职责，传奇般地能在每天日出前起身处理国务，直到桌上没有未完成的事务才去休息。如今卡尔的形象，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卡尔和他周围的人们试图创造出一个面对帝国臣民的可见的公众形象，尽管他们似乎并不总是清楚这些形象的特定内涵。对新皇的描述中往往会包括他的虔诚、他对自己年轻家人们尽职尽责的付出，以及他想要穿越整个帝国，和前线官兵民众会面的意愿。作为这位年轻统治者试图造就哈布斯堡王朝和民众之间更强大联系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卡尔一世和齐塔皇后多次高调公开访问布科维纳到蒂罗尔的战场，这些活动也经常被录制成影片。齐塔皇后也活跃于一些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慈善机构。1917年，卡尔一世皇帝甚至还成为一部宣传电影的主题，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作“我们的皇帝”。卡尔一世本人并不一定乐于接受用他自己来向民众推销帝国的方式，不过在战争期间，他要比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更乐意使用新的通信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卡尔一世第一次被影像化的活动就是他本人的加冕典礼。匈牙利的领导者们坚持要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葬礼之后，尽快于布达

佩斯举行典礼，经过了一些最后关头的临时变动，这个典礼的日期被确定在1916年12月30日。对匈牙利的领导者来说，新国王接受的加冕典礼不但可以支持他统治匈牙利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号召匈牙利人民投入战争。一场加冕典礼，同样也是把卡尔一世和他的家人介绍给他们的子民的极好机会。在其即位之初，卡尔一世就试图将帝国带向新的方向，但许多匈牙利的政治领袖对此心怀忧虑，这也是他需要举办加冕典礼的一个理由。匈牙利的政治人物们害怕卡尔一世会和他的叔父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顾问们太过接近，这些人显然有着反匈牙利的名声，当早些时候卡尔提名另一位与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关系密切的人——奥托卡·切宁伯爵（Count Ottokar Czernin，1872—1932）为奥匈帝国新任外交大臣时，匈牙利人的猜测得到了确定。这场匆匆举办的加冕典礼不但意味着消除匈牙利人的这些顾虑，而且也能让匈牙利领导者们向统治者表达他们的意愿。

接受委托负责设计这场不但举足轻重，而且是1867年以来首次加冕典礼的人，是匈牙利国家剧院的院长兼小说家米克洛什·班菲伯爵（Count Miklós Bánffy，1873—1950）。我们毫不惊讶地看到，班菲报告了寻找为加冕教堂制作壮丽装饰的工匠时遇到的困难。此外，为了记录典礼而准备的相机和照明设备需要相当大的电力供应，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实现的。最终典礼还是顺利举行了，新的匈牙利国王也成功骑上为拍摄准备的马，纵马疾驰在加冕教堂之外早已准备好的人工小山上。

在山顶，卡尔一世按照罗盘的四个方向挥动宝剑。班菲还注意到皇室夫妇对他们试图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有很高的自觉：他们在典礼期间，将4岁的儿子兼继承人奥托展示在公众面前。班菲称，只有加冕教堂被清空之后，才出了一些事，这些事如果让人们知晓，就会产生关于未来不祥之兆的流言：班菲悬挂在祭坛上，用来保护弧光灯下空间的一块厚板玻璃防护罩，“在灯的高温下迸裂，并且像一片大断头台刀刃般砸向了下方的祭坛”[注]。



1916年12月30日，新即位的匈牙利国王卡洛伊四世（King Charles IV of Hungary，即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在布达佩斯的马加什教堂外宣誓（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卡尔一世试图改变奥匈帝国在战争期间危险的政治状态，于是他采取了新的国内外政策。他重组了军事指挥官群体，让他自己和弗雷德里希大公成为总司令，把康拉德挪出了总参谋部。皇帝不断公开或私密地刺探同盟国的意向，探寻脱离战争甚至单独媾和的可能。他重建了奥地利的宪法秩序，结束了自1914年夏天以来统治奥地利的军事独裁。卡尔一世还在匈牙利寻找能支持他扩大投票参政权适用范围的强大政治盟友，并且对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采取更宽容的态度。1917年3月，皇帝下令设立了一个投诉委员会，其中的成员包括了来自服从于军事纪律管理的产业工人代表。[注]同年7月，皇帝重开奥地利国会，公开鼓励政治家们提出改革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诉求。当年夏天，卡尔一世签署了一份大赦令，赦免了无数因各种政治罪被军事法庭判刑的犯人，这些犯人中就包括了曾在1916年，趁奥地利首相施图尔克用午餐时将他刺杀的弗雷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大赦令还让一些重要的捷克民族主义背景的国会代表获得自由，其中包括卡雷尔·克拉马日（Karel Kramá，1860—1937）和正因为莫须有的叛国罪名等待审判的阿洛伊斯·拉欣（Alois Rašín，1867—1923）。

到了10月，由AOK推行的战时审查制度也在奥地利宣告终结，转而回归到战前的审查标准。

不过考虑到帝国与德国结盟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现实，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公共生活自由化，以及表示对匈牙利选举权改革支持等种种措施，没有一项能有足够施展的空间。自由化并没有把奥地利的政治家统一在一个新的轨道上，相反，它在他们之中产生了争执，同时展现出这些人在战前的政治冲突有多么激烈。因为与德国结盟的关系留给奥匈帝国在外交事务上的转圜余地更小，除了公开与私下和同盟国承诺的谈判，卡尔一世无法将自己和德国盟友剥离开来。因而从现实上，他没法让奥匈帝国脱离战争。他和切宁都意识到，在之前过去的两年中，帝国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德国的依赖程度之深，使得它不可能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注

1917年1月12日，在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卡尔一世已经准备好听取如何以安抚民族主义者们的方式重建帝国的意见。奥匈帝国可以拿东加利西亚作为交换获取俄属波兰，从而缔造一个在沙俄境内的乌克兰人国家与一个受哈布斯堡支配的波兰吗？哈布斯堡君主国可以在奥地利境内创造一个南斯拉夫共同体，作为将当前这个二元帝国（奥地利–匈牙利）转化为三元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基础吗？尽管蒂萨激烈反对任何三元帝国主义的暗示，卡尔一世希望至少能从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那里得到一些让帝国进行联邦制转型的支持，这将有力保障它长期的生存。注

在奥地利重建一个更为正常的政治生活，是卡尔一世真诚希望重获之前深受军事独裁统治之害，与政府关系疏远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群体支持的举动。不过毫不意外的是，重开国会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卡尔一世所希望见到的。公民生活一旦重见天日，就立刻收到了公众关于工作和生活现状的大量抱怨。开放先前被封闭的政治申诉与反对渠道，直接产生了针对当下政权的严厉、公开的批评。在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政党们开始为他们在军事独裁统治的那两年中的要求加码，而且毫不妥协。举例来说，国会中的各个委员会就立刻着手开始调查在战争爆发的歇斯底里的环境下，对人们不公平的监禁行为；而民族主义政党则急于把他们重建帝国的正式改革要求公开化。5月30日，斯洛文尼亚人民党代表以及新组建的南斯拉夫社团成员安东·科罗舍茨宣读了所谓的《五月宣言》，号召在帝国范围内一个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同的行政单位下，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捷克联盟（它由捷克民族主义政党和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也在同一天提交了自己的计划，号召在一个重新建构的联邦内组建一个自治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注

如果说政府在不经意间鼓励了这些要求出现，它却没有积极地予以回应。卡尔一世和他赖以统治奥地利的官僚政治家们已经习惯优先将整个帝国视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此，举例来说，最终他们就不再认为德语在行政体系中的特权地位是一个问题。当权者们没有认真对待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最重要的自治诉求，这些政治家为他们所属的联邦单位设想的未来中，各个单位所覆盖的地域多有重叠，他们因而产生了矛盾与争执。至于卡尔一世的顾问们也不希望奥地利与匈牙利的政治关系受到威胁，匈牙利的领导者们对任何联邦化的举动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当政府无法充分回应《五月宣言》之际，支持这部宣言的代表们就转而向人民求助，让他们向政府施压。比如1917年秋天，在卡尼奥拉、南施蒂利亚、伊斯特里亚和的里雅斯特等帝国国内使用斯洛文尼亚语的地区，兴起了一场南斯拉夫请愿运动，要求政府执行《五月宣言》。这些请愿使用了一些极具特色的语言，比如“哈布斯堡以及在其王权庇护下的幸福南斯拉夫万岁”，一些传统上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地方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样对请愿活动表示支持，成为运动中颇具典型特色的参与者。从1917年9月到1918年3月，仅在南施蒂利亚地区，请愿者就收集到了超过7.2万个签名。[注]

同时在北方，政府和它的德国盟友同样愿意让步，在创造一个新的波兰王国的同时（他们希望这个王国可以处在一位哈布斯堡王朝大公的统治下），也要寻求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之间的平衡。譬如1918年2月，奥匈帝国和新的乌克兰共和国（曾经是沙俄的一部分）签订了和平协议，并且把一部分它所占领的（俄属）波兰领土让给了这个国家，对此波兰民族主义者表示强烈抗议，还撤回了对内阁的支持。在每一个案例中，民族主义活动家都极力促进他们自身的国家建构行为，他们的这些行为在名义上仍然处在一个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框架之内，不过他们互相对立的立场已经使得这个框架变得越来越脆弱。[注]

就在卡尔一世勉力探索用联邦主义的方式解决奥地利各党派中民族主义者需求的方法时，匈牙利的政治统治者却对任何可能给予其他所谓少数民族的政党权力，从结构上破坏他们本身政治民族权威的改革毫无兴趣。像蒂萨就至多只愿意对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采取极少的让步。他和他的盟友们甚至根本没考虑过进行投票权改革，像天主教社会党人建议的那样，授予战争老兵（即所谓的英雄们）投票的权利。即便是在战争的后期阶段，蒂萨还固执地宣称，“这会涉及草率地将政治权利授予条件还不成熟的阶层的问题”[注]。一些已经站稳脚跟的反对派成员对此提

出反击，称扩大投票权可能是拯救帝国于革命之中的唯一手段：

> 让他们有投票权，然后由我们战胜他们，要比直接将他们排除在这项权利之外，把这些人抛弃在极端的绝望，从而破坏国家基础的情况更好……如政府和领导层认为他们当前不需要踏出这一步，执行整个新的社会政策，那么一场革命就近在眼前了。[注]

很大程度上因为难以忍受的饥饿与匮乏情况，在“一战”的最后两年，帝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罢工、政治示威游行、暴力事件甚至哗变。直至1916年年底，罢工主要出现了本地化的倾向，这部分是因为工厂执行严苛的军事纪律，以及有技术的男性工人很清楚，如果违反工作纪律，他们就很可能被送往前线。至于有工人代表参与的新投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可以决定其所在地的军事化产业的工资水平，很快这就导致其他产业的工人为了获得相同的权利而罢工。[注]就在政治自由化的同时，一些以投诉委员会为代表的，用来解决战时问题的创造性方式只产生了新的问题。1917年发生的罢工事件，波及的工人要比前一年更多，工人们的诉求非常一致，他们要求更好的工资待遇、更少工时、面包，以及和平。至于从投诉委员会中获得了强大力量的社会主义领导者如今也越来越难以约束他们的成员，一位施蒂利亚地方行政官员对此类事实有准确的评价，他注意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民主党站在政府一边，如果该党失去了对失望的大众的控制力，那么要获得平静就会更加困难”[注]。

1918年的1月、3月和6月分别发生了三波大规模的罢工潮，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工业产出从此瘫痪。1月12日，当帝国与沙俄的和平谈判眼看要走向崩溃时，在维也纳新城爆发了罢工，并很快席卷奥地利的其他工业中心。1月16日，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开始追责罢工。17日，2万名施蒂利亚冶金工人宣布罢工，格拉茨有1.5万人上街游行，将工人们包括呼吁立即恢复和平的诉求递交给地方行政长官。[注]尽管社会主义者们勉强控制住了施蒂利亚的示威浪潮，他们在帝国其他地方的行动却宣告失败。罢工活动同样波及匈牙利的工人。在布达佩斯，反抗的工人号召大罢工，1月19日，塞格德（Szeged）的工人们模仿俄国革命，建立了工人市议会。[注]

对和平可能流产以及食物短缺问题无法缓解的恐惧刺激了工人的行

动。1918年2月，在内政部上呈皇帝的备忘录中提到，罢工“开始于对食物供应不足的抱怨，但很快就扩散到政治领域，最终转化为一场和平示威，来自奥地利周边的55万工人参与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女性”。由于差不多所有可以调动的人都已经走上战场，没有足够人手强行镇压罢工，政府只能尽全力稳定事态。但是在1918年，当时并没有可以解决食物问题的方法。哪怕在匈牙利，食物产量也降到了一个可怕的低水平。以土豆产量为例，匈牙利在1914年的产量是211亿千克，到了1918年，就降低到90亿千克。1918年5月和6月，布达佩斯先后发生了两次总罢工。

此时军方的情况并没有稍微好一点。相比其他参战国，奥匈帝国的军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逃亡事件，时至1918年，军队中爆发了公开哗变。1月30日在奥匈帝国主要的军港波拉（Pola / Pula），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至于当地的一些特别部队，在数天前的1月22日就已经开始罢工。罢工的代表团要求工人获得更高的薪水，得到鞋和衣物的供应，并且要求政府送还在帝国对意大利战争开始时他们被送往内陆收容营的家人。经过谈判之后，工人们仍然表示不满并拒绝返回工作岗位，还指责代表团已经被人收买。接着到了2月，在波拉和更往南的卡塔罗，服役于亚得里亚海舰队的多个语裔群体的水手由于同情波拉和的里雅斯特码头的罢工而发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不过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有名的一次。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还发生了多起大大小小的驻军叛乱事件。

在AOK和KÜA看来，数千名从苏俄回乡的战俘们同样也会造成潜在的安全问题。1918年5月，位于利沃夫北方的城镇祖克瓦（Żółkiew / Zhovka）宪兵部向奥地利内政和国防部报告：“大多数从苏俄返回的战俘们都经历了革命，而且被渗透了革命倾向。”这份报告和其他许多类似报告一样，确认了AOK下属情报局局长马克斯·荣格（Max Ronge）将军早先的怀疑，他曾警告，归国战俘可能已经在苏俄染上了“布尔什维克病毒”。因此“等待着归国战俘的不再是喜气洋洋的欢迎，而是从心灵到意识的彻底审查”。在获准离开之前，这些前战俘被安置在所谓的归国军人营中接受医疗检查，以及长达10天的“纪律再教育”。祖克瓦的宪兵撰写报告，主要是为了抱怨归国军人营中的前战俘们事实上享有太多权利，他们可以在营地里漫步，并且在邻近的城镇抱怨他们如何后悔回到奥匈帝国。到了1918年5月，经过审查的120 272名归国战俘中，

只有517人有不忠行为的嫌疑（但这也没有得到证实），而在调查定案之前，只有603人选择逃跑（他们的逃跑亦可以出于很多可能的原因）。[注]

罢工、哗变以及逃亡投敌的行为令帝国政府十分忧虑，但如今帝国存续的最大挑战还是它无力提供足够的食品供养国内人口。随着战事不断胶着，决定食物供应的基本因素却没有变化。事实上，情况只会变得更糟。1918年，帝国和新独立的乌克兰以及被帝国打败的罗马尼亚和苏俄之间签订的协议，在城市中零星燃起了食物供应即将增加的希望。1918年3月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面包和平条约”，尽管实际上它并未起到什么效果。[注] 10月初，施蒂利亚无法保证州内食物供应已经超过一周，维也纳政府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力，直接输送资金到州内，命令当地官员分发剩下所有的食物储备。[注]

即便无力改善食物供应问题，卡尔一世仍然不断试着从其他可以重建公众信任的方式来减轻人们的痛苦。1917年8月，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内阁社会福利大臣职位。这位新大臣将在中央政府监控下，组织管理帝国国内所有的福利事务，特别是针对儿童和孤儿的社会机构，同时处理分发给孤儿与寡妇资助基金的大笔资金。[注]在一开始，国家预备使用现有的私人福利组织培养出的科学专业素养和群众基础，但是这类组织大多数都掌握在民族主义组织的手里。私人性质且属于平行关系的捷克与德意志民族主义青少年福利地方委员会就已经在波希米亚建立起了错综复杂的地方福利组织网络，特别是拉拢了一些保护儿童并使他们民族化的组织。[注]



奥匈帝国以及它在战时占领的波兰与巴尔干地区

社会福利部新就任的大臣是经济学家维克托·马塔亚（Viktor Mataja，1857—1934），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新的部门如果想要有效运作，只能动员上述私人组织的专业力量。在一场国会演说中，他向代表们保证，“新的社会福利部……将特别致力于吸引私人团体和自治组织的热情合作”。当这个新部门组织起一个负责发展覆盖全帝国的年轻人福利政策的议会时，它的管理层将主要由捷克、德意志、意大利、克罗地亚、波兰和犹太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组成。注一位身在其中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为该组织谋求影响力的行为辩护，他写道：“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们深信（捷克地方委员会）……我们只能希望一部基于民族主义精神的法律成功出台，只有它才可以指望最广大群众最深的赞同和热情的参与。”注换句话说，只有给予地方民族主义者权力的机构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于是私人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新成立的社会福利部的各个层面，在波希米亚，拨给社会福利部的数百万克朗资金基本上都分配给了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福利社团。但是如果国家希望驾驭这些彼此分离的民族主义儿童福利系统并为其所用，那么它就犯了一个错误：福利系统的服务对象在收到救助时，逐渐倾向于认同民族主义者的组织是这些救助的源头，而不是帝国中央政府。[注]一份德意志民族主义报纸认为，民族主义势力介入国家，是因为后者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前者的专业素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民族主义社团就成为国家：

> 有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观点：照顾战争寡妇和孤儿并不是私人慈善团体的责任，而是只属于国家的任务……但在最终的分析中，究竟谁才是国家？事实上国家就只是我们自己，无论直接或间接，我们必须向政府提供能让它履行职责的工具。[注]

新的福利行为试图从任何可能的地方帮助那些数量日渐增多、易受伤害的奥地利人。而通过允许民族主义势力管理救助的分配以及将功劳据为己有，国家的行为反而增强了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不到一年后，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到了那时，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就宣布它们自己将成立新的国家。

最后的两次旅行

在帝国所处的宿命性情况下，1918年夏末，两次由独立观察者承担的情报搜集之旅就此展开。其中一次是维也纳社会党人兼教育改革家罗伯特·朔伊（Robert Scheu）在7—9月以个人身份游历波希米亚，目的在于获取当地捷克–德意志民族关系的清晰图景；另一次则是匈牙利前首相伊斯特万·蒂萨伯爵在当年9月前往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波黑，调查食物供应情况。蒂萨的调查之旅是在皇帝的要求下进行的，卡尔一世显然还在希望这一趟旅行的经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蒂萨的想法，不再坚持反对在帝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亦是第三个行政单位的立场。而蒂萨对这次旅行目的的暗示也是心知肚明，他写道：“我真正的任务是了解当下的政治情况（南斯拉夫的动荡状况等），并且上

报。”注

在波希米亚北部，朔伊访问了当地商人、公务员、神父、教士以及以卡雷尔·克拉马日为代表的地方和州一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还有众多的普通农民。正当政治家们给予他一个正在逼近的激进政治改革的前景时，朔伊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关于不久将来的面貌却比较模糊。朔伊随后叙述，他从捷克农民那里很少听到对本地德意志人的憎恶，不过他们对说德语的傲慢公务员和军官却颇有怨言。一位来自布杰约维采周边地区的家境较为富裕的农民向朔伊强调，波希米亚王国如今已经更接近于匈牙利王国，处于一个自治的阶段，而到了这一步，捷克人就将获得自由。这个观点显示出，许多人已经更多地在考虑一个经过改革的未来，而不认为未来会继续局限于近来的框架之中。战争的结束将造就一个独立的捷克民族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会与一个继续存在的哈布斯堡王朝整体存在着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朔伊的报告记录了预见到帝国终结的政治家们，以及想象未来的普通人存在的巨大思想鸿沟。

与此同时，蒂萨的旅途在他结束对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塞哥维那的访问后抵达萨拉热窝时达到高潮。在这座波黑的首府城市内，他会见了波黑议会的代表们。代表们向蒂萨提出了申诉，抗议战争时期当地人遭到的无情对待，并向这位前首相请愿要求获得大赦令、对战争损失进行补偿，以及重新恢复本地的自治。然而，据说蒂萨用一种傲慢的口气向议会代表们致辞，好像“一位封建领主接见他的农奴们”。于是就如波希米亚当时的行政长官斯捷潘·萨尔科蒂奇（Stjepan Sarkotić，1858—1939）所叙述的，“代表团拂袖而去，离开了蒂萨伯爵”。在萨尔科蒂奇本人上交给维也纳方面的报告中，他补充了蒂萨对波黑领导者们的话，称对方的言辞“实在无礼之极，我必须要克制自己不将它们用电报机传输过来”。而在蒂萨本人的当天记录中，他反复提及帝国的二元结构以及匈牙利与克罗地亚之间联邦主义性质的关系是“横亘在波黑必须进行的计划和努力之间不可移动的壁垒”。在此绝不可能有南斯拉夫，也不会有帝国的三元模式（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因为这会令1867年的和平协议变为一纸空文。萨尔科蒂奇将蒂萨描述为一个“突然意识到脚下有万丈深渊，于是在晕头转向之际进退不能”的人。面对着深渊，蒂萨仍然坚持他对未来狭隘且保守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来自他对不久之前的那段时期极其有限的理解。注

“仿佛从未有过革命”

随着漫长的4年战争之后，资源逐渐告罄，帝国最终无力激起大众期望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更不必提保障当下的物质生存需要）。[注] 随着战线的崩溃（保加利亚在9月底撤出了战局，10月底意大利突破了帝国的防线，此时距离它们在科巴里德受到的屈辱差不多正好一年），维系国家和国民之间强大的互惠关系感也随之瓦解。由于帝国无力为国民提供食物和照顾，而且往往用严苛的战时措施对待他们，它在与国民彼此的奉献和回馈上，无疑是失败的。这个失败转而导致人们对帝国命运无动于衷，从而在10月底，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权威人物夺取了当地的权力（在克拉科夫、利沃夫、布拉格、札格雷布和维也纳），在某一些地方（布达佩斯）还爆发了社会革命。

毫无疑问，这些地区性的分裂强化了英国、法国以及最终的美国等国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1918年夏，奥匈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转而产生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具体边界仍然有待决定。不过到了10月，正像民族主义者们一直以来不断摸索着（往往还伴随着失误）建立新国家的方法，行动的机会到来了。[注]

10月2日，卡尔一世的新首相意识到前景不妙，于是他公开向奥地利国会许诺，对帝国进行联邦制性质的重组。但是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捷克、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纷纷否认了维也纳方面决定他们未来的权力。而早在10月5日，一个包括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国民议会在札格雷布组建起来，并正式宣告它是南斯拉夫人民在制度上的代表。两周之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拒绝参加匈牙利国会，并且组建了一个行使政府职能（至少在克罗地亚如此）的执行委员会。10月11日，波兰民族主义国会代表在克拉科夫建立了一个国民议会，走上了与加利西亚联合建立一个定都于华沙的新波兰共和国的第一步。10月17日，来自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代表在维也纳组建了一个罗马尼亚国民议会。[注]

各地人们力保他们所在地区拥有一个更好未来，但国民议会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在施蒂利亚，商人与工人代表开始秘密谈判，试图从当局手中接管该州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计划用直接以物易物的方式，拿施蒂利亚的铁、煤以及用于电线和造纸的镁等工业产品与邻近的州交换谷物、油脂以及肉类，从而保证本地的食物供应。谈判者们选举出一个公

共福利委员会，由一名社会主义者和一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后来又加入一位基督教社会党人士）共同主持。10月20日，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公开他们的计划时，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格拉茨日报》（*Grazer Tagblatt*）对它的中产阶层读者这样写道："鉴于维也纳没有组建起一个中央办公室，我们就不能继续等待了。我们必须放弃那个不能保护我们免于饥饿的政权。"于是在一周之内，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都同意给予埃斯勒（Eisler）和克兰兹（Kranz）"经济特派员"的全部权限。显然，一种联邦制形式的帝国权力下放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现象。民族主义者往往（但并不总是）不只是政治上让独立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最适合角色。不过，随着帝国分崩离析，单独的区域开始以一种"人人为己"的方式，试着把它们自己和邻近的区域隔绝开来，从而紧紧掌握住它们拥有的资源。

在维也纳，卡尔一世徒劳地试图延缓他的国家逐渐解体的步伐，为此他在10月16日宣布奥匈帝国奥地利的这一半联邦化，他如此宣告：

> 奥地利遵从人民的意见，从此将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它内部，每一个民族组成部分（Volksstamm）都可以在其民族聚居区成立国家组织……这一次改组，不会触及匈牙利神圣王冠所统治的土地的整体性，并且保证每一个单独的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但当每个独立国家个体面临共同的存亡危机时，整体的联邦国家就必须有效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它还特别需要付出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公平合法地解决所有因战争的后果导致的严峻挑战。

然而皇帝试图说服民族主义者的宣言并没有多大作用，民族主义者们已经纷纷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要让他们团结一致，还需要其他东西。通过修正1848年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做出的一个对奥地利有利且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著名观点，卡尔一世强调，一个共同的组织对个体民族的存续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还重复提及帝国的支持者在一个半世纪前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只有帝国（有人或者可以说帝国扮演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可以保证在日后争执中的合法、公平以及不偏不倚。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观点，对人们来说有点滑稽，毕竟他们刚从4年军事化独裁政权的统治和不断对法治国家概念的践踏中生存下来。在他短暂的执政期内，卡尔一世做了不少事来重建法治国家，但他始终无力更进一步。

从直接的实际角度来看，皇帝的宣言预计到（在某些方面是从当前

的基础上进行回溯）由国会代表创立的各种国民议会。这些委员会组成了联邦制国家的各个组成单位，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从属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关系。最终这种预见变成了现实，但这个现实缺乏一个中央政府的监管，也没有卡尔一世在他充满希望的敕令末尾所提到的各族人民宝贵的团结。

10月28日，捷克国民议会取得了位于布拉格中心的粮食办公室的控制权。按照理查德·雷恩和克莱尔·莫勒隆的研究，这次的行动究竟是国民议会进行政权更迭的一次革命性主张，还是它事实上得到了当天不在城内的行政长官库登霍韦的首肯，事实真相并不明确。而当时粮食办公室的雇员们是否能够理解他们已经不再为中央政府效命这件事，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注]那一天，人们聚集在粮食办公室所在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但他们的行动与上述的接管行动关系不大，仅是因为许多人见到了误报停战的通知。这个充满误导性的消息（事实上奥匈帝国只是要求停战）令大众激动不已，而当人们得到消息，称奥匈帝国将接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涉及给予斯拉夫民族自决的条件时，他们的表现展示出了更明确的民族主义特征。

根据报纸和回忆录的内容，只在此时，象征波希米亚的红白二色旗帜开始飘扬在全城上空。捷克民族主义的歌曲响彻大街小巷，议会代表们也纷纷发表演说。而捷克国民议会则承担了政府的职责。地方公务员对此表示合作，而帝国行政官员相对较为被动消极，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应了皇帝在10月16日的国家联邦化宣言所导致的地方当局的混乱。难道维也纳不会授权国民议会重组整个帝国吗？由于波希米亚行政长官库登霍韦10月28日已经身处维也纳，向国民议会转交权力的是他本人的代表，因此没人清楚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想法。此外，雷恩认为，当时发生的事件令帝国军队的指挥官太过惊讶，以至他没能及时反应，有所动作。

捷克国民议会颁布的第一部一般法强调："所有之前的地方及帝国法律规定从此依然生效。"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阿洛伊斯·拉欣之后这样回忆道："这部法律的基本目的是防止任何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发展蔓延，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在10月29日就能保持并继续运作，好像革命从未发生。"[注]关于他的这番言论，后来的分析通常关注于拉欣在这第一部法律中表达出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承诺（即"防止任何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发展蔓延"）。这个新国家的缔造者们显然不是社会革命家，而波希

米亚也正处在一个脆弱的政治环境之中。不过在此我更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拉欣的另半句话上，特别是其中的“我们”这个词。拉欣提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对此盖瑞·科恩曾颇具洞见性地提出，这句话充分显示出，捷克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仿佛深信波希米亚的行政系统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产物，而不是由一股外国势力强制推行，服务于一个外国人帝国的系统。他们的祖辈帮助帝国将这些体制建立起来，他们自己的政党成员在其中供职，而正是通过这些体制，捷克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才能早于战争开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创立了捷克民族主义的文官行政部门。[注]在之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这些政治家或许会把奥地利看作一个外国人的帝国，同时仍然坚持建立自己的国家。捷克民族主义者或许创造了最有效、意义也最深远的“帝国中的帝国”，克罗地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往往表达出相似的情感，而他们的地方行政官员也在新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之后的数周到数月内，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北匈牙利（如今的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人民在接管帝国的行政体系时，也纷纷参与到与奥匈帝国脱离关系的狂欢之中（尽管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从10月28日的布拉格到其他城镇，人们将帝国鹰徽等令人厌恶的帝国象征从政府大楼、学校、医院甚至个人的制服上移去，如今，这些标志已经和战争的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11月13日，布拉格的国民议会就设立了一个专门为街道和广场更名的委员会。[注]布拉格的拉德茨基陆军元帅雕像也被黑布覆盖，随后不久被移走。其他与哈布斯堡王朝有联系的纪念性建筑，譬如普莱斯堡［很快这座城市得到了一个新名字——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玛丽亚·特利莎雕像都遭到了被捣毁的命运。[注]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一群人拖倒了一根奉献给童贞圣母玛利亚的17世纪纪念柱。对那些将它推倒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根纪念柱象征着1621年哈布斯堡军队在布拉格城外打败波希米亚军的反革命战役——白山战役，这场战役的纪念日是11月7日，就在当年国民议会接管权力之后不久。许多民族主义者相信，推倒纪念柱标志着他们最终对哈布斯堡王朝在1621年血腥野蛮的胜利进行了复仇。不过象征物和象征性行动的意义存在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布拉格市民对玛利亚纪念柱象征性的民族主义复仇最终被证明存在很大争议。世俗化的新国家领导者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哈布斯堡的压迫联系起来，导致了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虔诚的天主教农民对共和国的强烈愤慨与不信任，这些情绪在斯洛伐克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它并非孤例。[注]

不过，随着帝国的象征被抹去和推倒，帝国的行政官员、警官，甚至许多军官仍然维持原职不变。内政部、警察队伍和军队的调查研究都表明，在帝国转向共和国的过程中，这些机构的人事情况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甚至并不情愿执行1919年颁布的法律，有限雇用曾经在沙俄、意大利和法国作战过的老兵。当权者们就像过去的帝国那样害怕从苏俄归来的战俘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熏陶，而刚刚发动革命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并不希望他们建立的新秩序被任何进一步的革命所颠覆。

同样，许多不受欢迎的战时法律，比如审查法、食物配给法以及针对集会自由的法规，还有“元首法”（这是对侮辱国家元首的行为进行惩罚的法律）都依然生效。许多难民仍然合法或非法滞留在布拉格，归来的士兵们又只是激化了住房和就业的危机。不只如此，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战争还未结束，只不过要对付的是不同的敌人，就像他们在1914年做过的那样，在1919年招募入伍的士兵们离开了改以威尔逊命名的火车站，前往东方。在那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保障它的新边界，正在与匈牙利和波兰交战。捷克斯洛伐克还收容了从一座前战时集中营逃入斯洛伐克境内的许多难民。这一切都使得许多国民开始产生疑问，这个国家事实上究竟有没有发生过革命？或者从更不吉利的层面来看，1920年，一位本地人目睹妇女购买牛奶的长队时发出的感叹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他这样叹息道：“这就是我们5年奋战所求得的东西吗？”

在布拉格，对新旧政权相似性的指责并不局限在捷克民族主义者的范围内。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样批评当前的现状——特别是不断发展的食物与住房短缺以及普遍目无法纪的情况，并轻蔑地称这些情况太过“奥地利式”。“奥地利式”这个形容词此时广受大众欢迎，人们用它归纳从独裁主义到黑市等种种表现的特征，并要求远离旧政权，同时明确坚持新秩序。事实上，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战时状态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从绝大多数人抱怨的根源中表现出来的，也并非革命的意识形态。差不多进入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无论是近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苏俄返回的那些引起混乱与分裂的战俘，还是粗暴的捷克本地人的归来，都没有激起潜在革命剧变的威胁。反之，人们的生存危机一直不间断，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还存在着破坏社会稳定的威胁。从不断再度出现的食物骚乱到罢工（在1919年和1920年发生的罢工，要比1918年来得更多），再到针对犹太人的街头暴力（当时有这样的口号：“让食品管控机构滚开，让犹太人滚开，给我们食品杂货，我们要土豆果腹”），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整个社会才稳定下来。[注]

“我们正站在火山口上”

在维也纳，使用德语的国会代表就像他们的波兰、捷克、乌克兰与南斯拉夫同事一样，在1918年10月21日建立了自己的国民议会，称为德意志奥地利临时国民大会。[注] 10月30日，这个组织采纳了一部德意志奥地利的临时宪法。11月3日，维也纳方面的代表签署了和意大利之间的停战协议，并在次日下午三点正式生效。一周后，战争正式结束。[注] 11月11日，就在西线战争结束当天，卡尔一世签署了一份声明，谨慎宣布他将不再主动参与国家事务。次日，临时国民大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成为首任总理，而共和国政府则是一个有广泛基础的，由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合政府。不过这个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范围以及它的未来究竟如何，却比其他替代了奥匈帝国的国家更加模糊。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宣称它的领土拥有西边包括南蒂罗尔、一小部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整个奥属西里西亚这些德语区，它还在新宪法第二条内主张自己有与德国合并的权力。不过它的德国盟友不但拒绝合并，还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的德语区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同意意大利的要求，把它新的边境线划定在布伦纳铁路线，而不是按照语言分界线，将其划在更往南边的地方。

不过，在中欧的其他地方，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是依靠更暴力和更偶然的社会革命方式。在某些地区，当地军队以及革命的现状很快就把国民议会温和的行动抛在后面，令它们不得不宣告国家独立（比如萨格勒布和布达佩斯），或者被迫采取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利沃夫的情况是如此）。譬如在利沃夫，10月30日深夜至11月1日凌晨的几个小时内，忠于乌克兰国民议会的前哈布斯堡军队就占领了公共设施，拘禁了哈布斯堡王朝任命的加利西亚行政长官，随即宣布利沃夫为新成立的乌克兰国家的首都。11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新成立的国家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紧接着，新成立的波兰与乌克兰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几乎立刻在加利西亚爆发了战争。双方都宣称对利沃夫和东加利西亚的领土拥有主权，双方也都很清楚军队对地方的控制将决定新成立国家之间的边界。[注]经过两周在利沃夫城市内外的激烈交火后（在交战期间，波兰与乌

克兰双方同意犹太人建立一个中立的民兵组织，来保护犹太人聚居区的财产安全），获胜的波兰军队在11月22日清晨进驻城内。由于波兰军队对城内犹太人在战时的中立地位感到恼怒，又怀疑他们秘密援助乌克兰一方，于是他们解除了犹太民兵组织的武器，还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天的惩罚性屠杀，造成了73名犹太人死亡，另有443人受伤。注波兰–乌克兰战争在1919年7月，以乌克兰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当地，直到1923年3月，战斗才正式停止。注



1918年11月，大屠杀期间利沃夫的犹太人居住区（Adoc-photos / Art Resource, NY）

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急于抢先一步发动一场暴力社会革命的反对派和社会主义政党同样宣告成立了一个匈牙利国民议会，并自诩为“匈牙利民族的真正代表”，从而与他们描述的“贵族的国会”相抗衡。就在匈牙利国王卡尔一世和国会试图组建一个能被众人接受的内阁失败之际，国民议会向匈牙利人民宣布了一个12条计划，许下了种种承诺，包括给予人们民主投票的权利，允许妇女投票，废除国会的上议院，废除和德国的同盟关系，立刻结束战争，废除审查制度，进行授地于民的农业改革，以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考虑到其他民族的问题，国民议会希望在推行威尔逊的自决原则时，不会“让匈牙利的地区整体统一性陷入危机，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而与此同时，一个由革命军官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很可能把战争引向一个更具革命性的结局。注10月28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要求把权力给予在反对派领袖卡罗伊·米哈伊伯爵（Mihály Károlyi，1875—1955）领导下的国

民议会，10月30—31日，在罢工工人的支持下，革命群众建立了新政府。此时仍希望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合法统治地位的卡尔一世迅速批准米哈伊成为首相，但新政府随即否决了与奥地利签订的1867年和平协议。

目前为止，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令事态走向更多争战而非和平的方向。在匈牙利（此时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法国的巴尔干协约国军队指挥官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d'Espèrey，1856—1942）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第二次停火协议的基础上，匈牙利不得不放弃大片土地，将其交给邻近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1919年3月，布达佩斯的卡罗伊·米哈伊政府在库恩·贝拉（Béla Kun，1886—1939）领导的一场共产主义政变中倒台，后者向人们许诺，将针对匈牙利邻国的土地要求，采取更有效的军事抵抗手段。不过虽然这场政变在一开始取得了成功，共产主义者们终究还是失败了。1919年7月30日，罗马尼亚军队冲破了匈牙利的防线，库恩随即逃亡，布达佩斯也被罗马尼亚人占领。此时在南部的法国势力保护下组织起来的一支反革命军队（其中包括国会的军队），对匈牙利社会施加了可怕的暴力行为和激烈的反革命、反犹恐怖活动。最终在11月，这些军队名义上的领导人——奥匈帝国将军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1868—1957）骑在一匹白马上进入了布达佩斯，并严词责难这座罪恶的首府背叛了国家、民族，投向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3月，匈牙利王国经由一个国民大会被重新建立起来，但卡尔一世并没有重登王位，这是协约国所不允许的，于是国民大会转而任命霍尔蒂为摄政。注

即便在相对和平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支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还是占领了一些德语区。这些地区声称自己属于一个与捷克斯洛伐克相竞争的，叫作德意志波希米亚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两个首都：一个是北方的工业城市利贝雷茨（Reichenberg / Liberec），另一个则是西里西亚州首府奥帕瓦。注而尽管捷克军队没有使用太多暴力手段就占领了这些地区，它们的行为还是确认了一点：在战后地区的边界问题上，军事控制要比协约国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做出的专业或政治决定更重要。

在札格雷布，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在11月24—25日决定邀请塞尔维亚军队进驻克罗地亚，并建议和塞尔维亚组成一个新国家。但当地农民很快就对塞尔维亚军队的行政管理手段表示反对。农民党的领袖斯捷潘·拉

迪奇（Stjepan Radić，1871—1928）敦促农民消极抵抗塞尔维亚军队和南斯拉夫新政权，并给后者贴上了军国主义和战时哈布斯堡王朝之延续的标签。历史学家约翰·保罗·纽曼（John Paul Newman）认为，农民们把他们战后对哈布斯堡当局的不合作态度转移到了新的南斯拉夫政权上。相比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达尔马提亚，当地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农民都倾向于欢迎塞尔维亚军队的进驻，当然这是在意大利怀有控制这一地区野心的情况下导致的结果。出于上述原因，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在1919年不约而同地支持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军团在匈牙利组建。[注]

9月底在施蒂利亚南部，一个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在马里博尔（Marburg / Maribor）被组建起来（在卢比安纳也有一个相似的国民议会），数周之后，它就开始对所在地区下达命令。10月26日，科尼采（Gonobitz / Konjice）的当地县长向格拉茨的行政长官办公室写信，询问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是不是因为皇帝卡尔一世的宣言产生出来的新架构，以及是否要遵守它的命令，但行政长官没有回复。[注]11月1日，当一位哈布斯堡军队军官马约尔·鲁道夫·迈斯特（Major Rudolf Majster）占领了马里博尔的军事设施之后，南施蒂利亚的未来就已经被注定了。奥地利新任总理伦纳从维也纳下令，命令施蒂利亚政府保护马里博尔，但是施蒂利亚没有可以应对迈斯特的部队。尽管之后美国专家建议巴黎和会把奥地利的边界划到马里博尔之下，但驻扎在城内的斯洛文尼亚军队也使得南斯拉夫交出这座城市的想法变成了天方夜谭。[注]

*

哈布斯堡王朝终结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这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帝国覆灭的环境和意义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战争通过天长日久地侵蚀人民与国家之间互相的责任感，最终破坏了哈布斯堡王朝；大众对王朝的爱国热情逐渐被磨灭，最终导致了对帝国存在理由的质疑。不过本章多种多样的简短记录已经明确地显示，帝国崩溃的过程是间歇性发生，并开始于不同地区的。此外，关于何种国家可以替代哈布斯堡王朝的问题，以及这些国家的边界当如何界定，在那个时候仍然完全不明确。这些正在形成的新国家主要依靠1918年年底支持它们的哈布斯堡军队的忠诚和驻地，来决定自己的领土主张要求。而这些部队中有许多曾

被奥匈帝国军方有序遣散，如今又迅速被重新动员起来，成了新的国家军队。当然，来自1919年巴黎和会的协约国支持，以及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巴尔干部队的干涉无疑在一些边界的设定问题上产生了影响。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军队势力，而非民主、民族或其他因素决定了一切，而直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地方仍然继续采取这样的行为方式。

---

1. Martin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Der Kampf des Hinterlandes ums Überleben 1914–1918 (Graz: Styria Premium, 2014), 关于社会主义领袖顺应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支持，见131页。

2. 所有的估计死亡人数中，约有47.8万人死于监狱中。John Ellis and Michael Cox, The World War I Data Book (London: Aurum Press, 2001), 269. 在此有一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资料，见Leo Grebler, The Cost of the World War to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147。这份资料额外估计奥匈帝国有46.7万人死于协约国封锁，这还不包括流感疫情横行造成的死亡。1910年，帝国总人口约5 200万，也就是说死亡率高达3%。

3. 战时经济和由战时新技术变革导致的转变的分析，见Wirtschaft, Technik und das Militär. Österreich-Ungarn im Ersten Weltkrieg, ed. Herbert Matis, Juliane Mikoletzky, and Wolfgang Reiter (Vienna and Berlin: Lit Verlag, 2014)。

4. Maureen Healy,“ Becoming Austrian: Women, the State, and Citizenship in World War I,”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5 (2002): 1–35.

5. See Maureen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Total War and Everyday Lif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le, Military Cultur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8.

6. 奥地利的军事独裁在欧洲标准下格外严苛，见Josef Redlich, Österreichs Regierung und VerwaltungimWeltkrieg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925), 123。雷德利希把1912年军务部、联合部长级理事会和总参谋部成员的密会定性为非法。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制订了KÜA的计划。See also Iris [Alon] Rachamimov,“Arbiters of Allegiance: Austro- Hungarian Censors During World War I,”in Constructing Nationalities, ed. Pieter M. Judson and Marsha Rozenblit(New York: Berghahn, 2005), 157–177, here 162.

7. John Deak,“ The Great War and the Forgotten Realm: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6 (June 2014): 369–370.

8. Ibid., 370.

9. Tara Zahra, Kidnapped Soul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nd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4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29; Pieter M. Judson, Guardians of the Nation: Activists on 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0–41; 44–46.

10. Jonathan Gumz, The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of Empire in Habsburg Serbia, 1914–19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16; Christoph Führ,

Das k.u.k. Oberarmeekommando und die Innenpolitik in Österreich, 1914–1917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7) (Graz, Vienna, Cologne: Böhlau, 1968). For attitudes in the army elite, see also István 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Günther Kronenbitter,“ Krieg im Frieden”: Die Führung der k. u. k, Armee und die Grossmachtpolitik Österreich- Ungarns 1906–1914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3).

11. Waltraud Heindl, “Bureaucracy, Officials, and the State in the Austrian Monarchy: Stages of Change since the Eigh teenth Century,” AHY 37 (2006): 35–57.

12. Gumz,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14. 该书作者在书中表示奥匈帝国的占领政权（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建立的）是一个根据军事规定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机会，因为在那里不存在政治冲突。

13. Redlich, Österreichs Regierung, 123. 政府和军方还控制和重组了一些经济关键部门，不过以欧洲的标准看来，这些控制显得不那么极端。

14. Christoph Führ, Das k.u.k. Oberarmeekommando und die Innenpolitik in Österreich, 1914–1917 (Vienna: Böhlau, 1968), 27; Martin Moll, Kein Burgfrieden.Der deutsch-slowenische Nationalitätenkonflikt in der Steiermark 1900–1918 (Innsbruck: Studien Verlag, 2007), 184; John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 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specially 264–269. 施图尔克在1914年3月关闭了奥地利国会。

15. Rachamimov,“ Arbiters of Allegiance”; Tamara Scheer, Die Ringstrassenfront. Österreich-Ungarn, das Kriegsüberwachungsamt und der Ausnahmezustand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Vienna: Republik Österreich, Bundesminister für Landesverteidigung und Sport, 2010). 该书作者认为，KÜA的邮件审查制度受欧洲羡慕。

16. On Tisza, see Gabor Vermes, István Tisza: The Liberal Vision and Conservative Statecraft of a Magyar Nationali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7. 在此值得一再提及，奥地利的KÜA只对奥匈帝国的军务部负责，而匈牙利的HB只对匈牙利内阁与国会负责。

18. József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 Éva Grusz and Judit Pokoly, rev. Mark Goodman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9), 72–79.

19. Quoted in ibid., 95.

20. Mark Cornwall,“ Das Ringen um die Moral des Hinterland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or Die Geschicht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ol. 11/1,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und der Erste Weltkrieg, ed. Helmut Rumpler and Anatol Schmidt-Kowarzik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forthcoming).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Cornwall for sharing this manuscript with me.

21. 战争期间，首相曾经8次向国会申报使用紧急措施。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79.

22. Quoted in Arnold Suppan,“ Die Untersteiermark, Krain und das Küstenland zwischen Maria Theresia und Franz Josef (1740–1918),” in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Zwischen Adria und Karawanken, ed. Arnold Suppan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8), 342.

23. Z. A. B. Zeman, The Breakup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914–1918: A Study in N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42.

24. Mark Cornwall,“ Das Ringen um die Moral des Hinterlandes;” Mark Cornwall, The Devil’s Wall: The Nationalist Youth Mission of Heinz Ruth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specially 35–78.

25. Cole, Military Culture, 322.

26. 关于在加利西亚进行的迫害，见Führ, Das k.u.k. Oberarmeekommando, 181。举例来说，康拉德与Sokol纠缠不休，7月17日，在他的坚持下，市议会开始讨论对所有南斯拉夫人法外开恩。奇怪的是，尽管已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7月26日，施蒂利亚方面还是允许召开一场Sokol的庆祝活动。参见Moll, Kein Burgfrieden, 181。

27.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22–159, and especially159. Healy的作品开创了研究大后方历史的新类型。关于战时自下而上的大众活动以及检举行为，见Tara Zahra, Kidnapped Souls, 82–85。

28. Martin Moll在其著作Kein Burgfrieden中精妙地分析了军方的霸权、地方宪兵的过度反应，以及施蒂利亚地方上因此导致的结果。在这本书中，还仔细记录了许多人因为疑似支持塞尔维亚的叛国罪名在1914年7、8月被逮捕的案例。

29. 显然，对南施蒂利亚不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这股歇斯底里的风潮给予他们一个机会，可目睹国家摧毁与他们竞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Moll, Kein Burgfrieden, 462.

30. Quoted in Suppan,“ Die Untersteiermark, Krain und das Küstenland,” 345; Moll, Kein Burgfrieden, 182.

31. Suppan, ibid., 345; Martin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45–46；Moll的著作详细记录了施蒂利亚数百人的案件资料。

32. “ Windischis”是当地用来指代斯洛文尼亚人或斯拉夫人的词汇。Quoted in Moll, Kein Burgfrieden, 367.

33. 在施蒂利亚，至少有637人下狱，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1914年8月。相关数据见Moll, Kein Burgfrieden, 424–439。这些案件中，总计有超过200起案件最终被认为罪名成立（尽管之后它们的判决往往被撤销，至于没有撤销的判决，也因为卡尔皇帝在1917年7月2日颁布的大赦令而无效）。

34. Ibid., 446. For examples of damaged careers, see 451–458.

35.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96.

36. Ibid., 95–98. 关于军方在匈牙利最高层进行的过度压迫，以及蒂萨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干涉的案例，见Irina Marin,“ World War One and Internal Repression: The Case of Major General Nikolaus Cena,” AHY 44 (2013): 195–208。

37. John Paul Newman,“ Post-Imperial and Postwar Violence in the South Slav Lands, 1917–1923,”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9, no. 3 (2010): 256.

38. On this incident and Tisza’s protests quoted below, see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97–98. See also Marin,“ World War I and Internal Repression,” 204–205.

39. For an earlier analysis of the food crisis, see Hans Loewenfeld-Rus, Die Regelung

der Volksernährung im Kriege (Vienna: Hödder-Pichler-Tempsky, 1926). Other analyses include: Peter Heumos,“ ‘Kartoffeln her oder es gibt eine Revolution’: Hungerkrawalle, Streiks und Massenproteste in den bönmischen Ländern, 1914–1918,” in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Tschechen, Slowaken und Deutschen, ed. Hans Mommsen, Dušan Kovč, Jiří Malř, and Michaela Marek (Essen: Klartext, 2001), 255–286; Healy, Vienna; Claire Morelon,“ Street Fronts: War, State Legitimacy and Urban Space, Prague 1914–192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and École Doctorale des Sciences Po, 2015).

40. See the analysis of occupation food policy in Gumz,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of Empire, 142–192.

41. Martin Franc,“ Bread from Wood: Natural Food Substitutes in the Czech Land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Food and War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ed. Iva Zweiniger-Bargielowska, Rachel Duffett, and Alain Drouart (Farnham: Ashgate, 2011), 73–83;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 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Vienna: Uebrreuter, 1995, 2005), 325;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96.

42. Cited in Morelon,“ Street Fronts,” 137.

43.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80–81.

44.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324. For a range of statistics on wartim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movement of products, see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11/2, Weltkriegsstatistik Österreich-Ungarn 1914–1918. Bevölkerungsbewegung, Kriegstote, Kriegswirtschaft .

45. On the different municipal efforts, see Redlich, Österreichs Regierung und Verwaltung im Weltkrieg; on the Amt für Volksernährung, see Ottokar Landwehr von Pargenau, Hunger. Die Erschöpfungsjahre der Mittelmächte 1917/1918 (Vienna and Zürich: Amalthea-Verlag, 1931), 6.

46.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43–44; Morelon,“ Street Fronts,” 136. For Prague see also Eva Drašarova and Jaroslav Vrbata, ed., Sborník dokumentů k vnitřnímu vyvoji v českych zemích za I. Světové války 1914–1918 (Prague Central State Archive 1993–1995), 2:67.

47. Ivan Šedivý, Češi, české země a Velká valka 1914–1918 (Prague: Nakladelství Lidové Noviny, 2001), 259;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85. 就像莫勒隆指出的，目前暂时还没有研究致力于比较哈布斯堡王朝内各个地区的食物供应情况（“Street Fronts,” 137）。

48.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45–47. 战前格拉茨的牛奶供应是每日7万升，到了1918年，每日供应量下降到1.4万升。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91.

49.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43–44; see also Thierry Bonzon and Belinda Davis,“ Feeding the Cities,” in Capital Cities at War: London, Paris, Berlin 1914–1919, ed. Jay Winter and Jean Louis Robe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1997). On Berlin, see Belinda David, Home Fires Burning: Food,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World War I Berli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50.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80–84.

51. AST, Abschrift Pr. A-107, 11 January 1917, from the Statthalter to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usta 439, Luogotenenza del Littoral, Atti Presidiali. See also Almerigo Apollonio, La Belle Epoque e il tramonto dell’Impero Asburgico sulle Rive dell’Adriatico (1902–1918), vol. 2, La Grande Guerra (1914–1918) (Trieste: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a Venezia Giulia, 2014), charts on food shortages, mortality, and inflation, 959–969.

52. 以匈牙利为例，紧急情况法规定55岁以下的男女都必须义务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80–81.

53. Morelon,“ Street Fronts,” 139.

54.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especially 31–86. On lining up, 73–82, here 76.

55. Cited in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75.

56. Police report from September 1917 quoted in Morelon,“ Street Fronts,” 173.

57. For excellent analysis of and examples of this phenomenon in Prague, see Morelon,“ Street Fronts,” 170–186.

58. 关于针对“背囊交易”的法律制裁，见 Moll, Die Steiermarkim Ersten Weltkrieg, 158；关于人们在布拉格郊外乡间寻找食物的内容，见Morelon, “Street Fronts,” 146–148。维也纳周边地区的情况，见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53–56。1918年，在维也纳之外，所谓的“土豆战争”让这种交易达到了高潮，据说有差不多3万妇女儿童蜂拥而入维也纳周边的土豆产地。

59. Morelon,“ Street Fronts,” 152, 159–160; on the České Srdce program, see ibid., 153–155.

60. Quoted in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52.

61. Ibid.,51,57. 希利指出，政客们谴责匈牙利不愿意分享它的食物储备，并没能使他们获得选民的喜爱，后者往往将他们看作被更聪明的匈牙利人欺骗的傻瓜。

62. Quoted in ibid., 59.

63. Ibid., 65–69. Morelon,“ Street Fronts,” 124–132.

64. Morelon,“ Street Fronts,” 61.

65. Galántai在他的书中引述了21名说塞尔维亚语的帝国士兵被塞尔维亚方面俘虏之后，被询问是否愿意加入塞尔维亚军队，以及在1914年有29名说塞尔维亚语的帝国士兵逃离匈牙利，以免被征召入伍。另外据说还有13名士兵叛逃到了塞尔维亚。Galántai,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97.

66. Quoted in Zahra, Kidnapped Souls, 85.

67. Morelon,“ Street Fronts,” 161–162.

68. 马萨里克在战争伊始就离开了奥匈帝国。

69. Richard Lein, Pflichterfüllung oder Hochverrat? Die Tschechischen Soldaten Österreich-Ungarns im ersten Weltkrieg (Vienna: Lit Verlag, 2011). 有一小支捷克部队一直同沙俄战斗到1917年，当时沙俄允许战俘自愿加入军队。而在沙俄和法国，都有正式成编制的捷克兵团，到了1918年，它们总计有4万多人。这个兵团也参与了沙俄的内战。

70.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271.

71. On refugees, see Marsha Rozenblit, Re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The Jews of Habsburg Austria during World War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ulie Thorpe,“ Displacing Empire: Refugee Welfare, National Activism and State Legitimacy in Austria-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Refugees and the End of Empire: Imperial Collapse and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Panikos Panayi and Pippa Virde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02–126; Beatrix Hoffmann- Holter, “Abreisendmachung”: Jüdische Kriegsflüchtlinge in Wien 1914–1923 (Vienna: Böhlau, 1995); David Rechter,“ Galicia in Vienna: Jewish Refugee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AHY 28 (1997): 113–130; Walter Mentzel,“ Weltkriegsflüchtlinge in Cisleithanien, 1914–1918,” in Asylland wider Willen. Flüchtlinge in Österreich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 seit 1914, ed. Gernot Heiss and Oliver Rathkolb (Vienna and Munich: Jugend und Volk, 1995), 17–44. Manfried Rauchensteiner,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as End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enna: Böhlau, 2013), 835–853. On refugee issues in Prague, see Morelon, “Street Fronts,” 120–132.

72. On this incident, and for a useful elaboration of 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aid organizations, see Rebekah Klein-Pejšova, “Beyond the ‘Infamous Concentration Camps of the Old Monarchy’: Jewish Refugee Policy from Wartime Austria-Hungary to Interwar Czecho slo va kia,” AHY 45 (2014): 154–177. On the experience of Jewish refugees in Hungary more generally, Robert Nemes, “Refugees and Antisemitism in Hungar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Sites of European Antisemitism in the Age of Mass Politics 1880–1918, Robert Nemes and Daniel Unwosky, ed.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6–254.

73. HHstA, MdA, AR, Fach 36, Karton 341, “Instruktion betreffend die Beförderung und Unterbringung von Flüchtlinge aus Galizien und der Bukowina, 15 September 1914.”

74. K. K. Ministerium des Innern, Staatliche Flüchtlingsfürsorge im Kriege 1914/15 (Vienna: kk. Hof und Staatsdrückerei, 1915), 10.

75. Peter Štih, Vasko, Simoniti, and Peter Vodopivec, Slowenische Geschichte. Gesellschaft — Politik— Kultur, trans. Michael Kulnik (Graz: Leykam, 2008), 306–307.

76. 要想对付一直以来有好逸恶劳名声的罗姆人，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战时迁移是一个机会，但它们在这些迁移中可以实施的控制力却比较有限。相关案例见“Zigeunerunwesen,Bekämpfung, 8 July 1918,” AVA, MdI, allg 20, Karton 2120 Zigeuner.Rauchensteiner, Der erste Weltkrieg，其中845页列举了某些营地中按照语言使用划分人群的情况。

77. AST,“ Verzeichnis über verfügte Internierungen,”24 March 1917, Busta 443, Luogotenenza del Littoral, Atti Presidiali. 这份文件包括了一份来自波兰的216名囚犯的名单。他们被拘禁的原因从“因为经常偷窃而被认为不可靠”、“与民族统一主义者和敌视奥地利的人交易”，到“宣传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在选举中十分活跃”。

78. Quoted in Cole, Military Culture, 320.

79. Staatliche Flüchtlingsfürsorge im Kriege, 11.

80.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63.

81. Quoted in Cole, Military Culture, 320.

82. 关于瓦格纳收容营和塔勒霍夫收容营，见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66–76。事实上，施蒂利亚政府还建造了流动的灭虱与淋浴装置，这样每个营地可以轮流使用。

83. “ Wünsche und Vorschläge betreffend die staatliche Flüchtlingsfürsorge für Angehörige des Landes Görz-Gradisca 2 March 1916,” in OestA, AVA, MdI, 19 allg, Karton 1955.

84. Verpflegung der feindl. Zivilinternierten in der Monarchie, 26 November 1916, HHstA, MdA, AR, Fach 36, Karton 582.

85. Staatliche Flüchtlingsfürsorge, 15;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72–73.

86. Lager-Zeitung/Gazzetta di Campo, herausgegeben und geleitet von der k.k. Barackenverwaltung in Wagna bei Leibniz, nr. 1, 4 pages, 14 October 1915; nr. 2, 4 pages, 15 October, 1915.

87. “ Kulturelle Flüchtlingsfürsorge, deutscher Sprachunterricht,” Vienna 14 March 1917, in AVA, AdR, BMsV, Kriegsflüchtlingsfürsorge, Karton 15.

88. Rozenblit, Re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79; Morelon,“ Street Fronts,” 131.

89. Gustav Spann,“ Zensur in Österreich während des 1. Weltkrieges,” PhD diss. (Vienna, 1972); Cornwall,“ Das Ringen um die Moral.”

90. 这些图文集的题目有我们的军官、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北方前线以及我们在南方的战斗。

91. 人工代用食品的概况，见Franz Vojir,“ Ersatz Lebensmittel im ersten Weltkrieg in Österreich,” in Wirtschaft , Technik, und das Militär, 253–284。

92. Maureen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87–121.

93. Miklós Bánffy, The Phoenix Land: The Memoirs of Count Miklós Bánffy, trans. Patrick Thursfi eld and Katalin Bánffy-Jelen (London: Arcadia Books, 2003), 3–4.

94. 关于战时维也纳大众文化中把皇帝、国王描绘为父亲形象的重要主题的分析，见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279–299。

95. Bánffy, The Phoenix Land, 32.

96.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36.

97. 卡尔一世和切宁希望与协约国谈判，以及在美国参战之前与其进行磋商。与此同时，皇后的兄弟在1917年3月秘密致信给法国总统（这封信连切宁都蒙在鼓里），在信中，卡尔一世宣布法国对阿尔萨斯– 洛林的主权要求是合法正当的。一年之后，当切宁泄露与法国的秘密言和行动时，克莱蒙梭以在早些时候已经与奥匈帝国方面进行了类似会谈作为回应。切宁对此予以否认，随后克莱蒙梭便披露了之前信件的全文内容。切宁承认这封信的真实性，并且宣称关于阿尔萨斯– 洛林的声明是伪造的。由于卡尔一世不得不再次向德皇威廉二世保证他对同盟关系的忠诚，切宁被迫引咎辞职。Robert Kann, Die Sixtusaffäre und die geheim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Österreich-Ungarns im ErstenWeltkrieg (Munich and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66). 关于奥地利和美国在战时不断变化的关系，见Nicole Phelps, US Habsburg Relationsfrom 1815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Sovereignty Transform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Václav Horčička,“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ia-Hunga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pril to December 1917,” AHY 46

(2015): 261–295。

98. Miklós Komjáthy, ed., Protokolle des Gemeinsamen Ministerrats des Österreichisch- Ungarischen Monarchie (1914–1918)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66), 441–442.

99. On the May Declaration and the declarations of other nationalist groupings in Parliament,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47–148; Rauchensteiner, Der Erste Weltkrieg, 734–737.

100. 南施蒂利亚的380个市政当局，有215个表示支持这份请愿书。详见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47–148; Cornwall,“Das Ringen um die Moral”; 以及Walter Lukan,“ Die politische Meinung der slowenischen Bevökerung 1917/1918 im Spiegel der Zensurberichte des Gemeinsamen Zentralnachweisbureaus für Kriegsgefangene in Wien,”in Nacionalismus, společnost a kultura ve střední Evropě 19. a 20. Století,ed. Jiří Pokorný, Luboš Velek, Alice Velková (Prague: Karolinum, 2007),246, 259.

101. Rauchensteiner, Der Erste Weltkrieg, 912–913; in general see Wolfdieter Bihl, Österreich-Ungarn und die Friedensschlüsse von Brest-Litovsk (Vienna: Böhlau, 1970); Die Besatzung der Ukraine 1918. Historischer Kontext, Forschungsstand,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Folgen, ed. Wolfram Dornik, Stephan Karner (Graz-Vienna-Klagenfurt: Verein zur Forderung der Forschung von Folgen nach Konflikten und Kriegen, 2008).

102. On suffrage struggles in Hungary, see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24–226.

103. From a 26 February 1917 speech by Julius Andrássy the Younger (1860–1929) to the Hungarian Parliament, quoted in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25.

104. Margarete Grandner,“ Die Beschwerdekommissionen für die Rüstungsindustrie Österreichs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Der Versuch einer ‘sozialpartnerschaftlichen’ Institution in der Kriegswirkschaft ?,” in Historische Wurzeln der Sozialpartnerschaft, ed. Gerald Stourzh and Margarete Grandner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86).

105. Quoted in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37.

106. Ibid., 141–143.

107.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94–295.

108. Quoted in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84; Rudolf Neck, ed., Österreich im Jahre 1918. Berichte und Dokumente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1968), 34–35.

109.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92–293; 296.

110. AST,“ KK Festungskommisär in Pola to Presidium in Trieste,” 30 January 1918, Busta 449, Luogotenenza del Littoral, Atti Presidiali.

111. Richard Plaschka, Matrosen, Offiziere, Rebellen. Krisenkonfrontationen zur See, 1900–1918 (Vienna, Cologne, Graz: Böhlau, 1984); Bruno Frei, Die Matrosen von Cattaro (Vienna: Globus Verlag, 1963);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99.

112. AST, "Bolschewikische Agitation (Heimkehrer)," MdI, Min für Landesverteidigung, 4 May 1918, Busta 443, Luogotenenza del Littoral, Atti Presidiali.

113. Quoted Rachamimov," Arbiters of Allegiance," 171. 这篇文章对归国战俘的待遇和国家对战俘信件的审查进行了精妙的分析。

114. Ibid., 172.

115. On the" bread peace," Rauchensteiner, Der Erste Weltkrieg, 914–920.

116.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58.

117. 关于这个新部门的创立和运作的解读，见Tara Zahra," ' Each Nation Cares Only For its Own': Empire, Nation, and Child Welfare Activism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18,"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1, no. 5 (December 2006): 1378–1402, especially 1393。Zahra指出，鉴于波希米亚的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往往会通过赠送礼物和其他诱因，换取受助家庭和儿童的忠诚。在民族国家的匈牙利，这种竞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福利往往根据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方针组织起来，提供给最需要的人。

118. On the creation of these networks in Bohemia and Moravia, see Zahra, Kidnapped Souls, 95–103.

119. Zahra," Each Nation," 1381.

120. Ibid., 1394.

121. Ibid., 1379, 1393.

122. Reichenberger deutsche Volkszeitung, 16 June 1918, 1–2, cited in ibid., 1400.

123. On Tisza's fact-finding trip, see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310–311. On Scheu's trip, Robert Scheu, Wanderung durch Böhmen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Vienna-Prague-Leipzig: Verlag Ed. Strache, 1919).

124. Quotations in 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310–311.

125. The quotation is taken from a statement by Czech nationalist leader Alois Rašín in his memoirs quoted in Gary B. Cohen,"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7–1914," CEH 40/2 (2007): 278.

126. 9月26日，托马斯·马萨里克在巴黎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10月15日，法国政府承认了这个新生的国家。

127. 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Regionalism, 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 Struggle, 1918–193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57. 罗马尼亚国民议会的组建，即是对卡尔一世皇帝在10月16日的国家联邦化宣言的回应，下文对此有进一步讨论。

128. Quoted in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59.

129. Ibid., 165.

130. 两天后，报纸刊发了宣言的文本，见Neue Freie Presse, 18 October 1918, 1。

131. Richard Lein," Der' Umsturz' in Prag im Oktober 1918: zwischen Mythen und Fakten," in Schlaglichter auf die Geschichte der böhmischen Länder vom 16. Bis zum 20. Jahrhundert, ed. Daivd Schriffl and Niklas Perzi (Vienna: Lit Verlag, 2011), 185–

206; Morelon,“ Street Fronts,” 204–206.

132. Quoted in Gary B. Cohen,“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7–1914,” CEH 40, no. 2 (2007): 278.

133. Ibid., 278.

134. Morelon,“ Street Fronts,” 210.

135. 玛丽亚·特利莎雕塑的创作者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1921年10月，捷克兵团成员花费两天时间将其破坏拆除，其间当地警察袖手旁观。On this incident and on the renaming of the city, see Peter Bugge,“ The Naming of a Slovak City: The Czechoslovak Renaming of Pressburg / Pozsony / Prešporok in 1918–1919,” AHY 35 (2004): 205–227, especially222.

136. 玛利亚纪念柱事件与20世纪20年代捷克天主教徒的民族主义的分析，见 Cynthia Paces, Prague Panoramas: National Memory and Sacred Sp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9), 87–96, 100–114; Cynthia Paces,“ ‘The Czech Nation Must Be Catholic!’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Czech Nationalismduring the First Republic,” Nationalities Papers 27, no. 3 (1997): 407–428; Cynthia Paces and Nancy M. Wingfield,“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i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07–125; Martin Schulze Wessel,“ Tschechische Nation und katholische Konfession vor und nach der Gründung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Nationalstaates,” in Bohemia 39 (1997):311–337.

137. Ivan Šedivý,“ K otázce kontinuity nositelů státní moci: jmenování vedoucích úředníků v kompetenci ministerstva vnitra v letech 1918–1921,” in Moc, vliv a autorita v procesu vzniku a utváření meziválečné ČSR 1918–1921, ed. Jan Hájek, Dagmar Hájková, and Luci Merhautová (Prague: Masarykův ústav a Archiv 2008), 184–197; Samuel Ronsin,“ Police, Republic, and Nation: The Czechoslovak State Police and the Building of a Multinational Democracy, 1918–1925,” in Policing Interwar Europe: Continuity and Crisis, 1918–1940,ed. Gerald Blan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36–158; Martin Zückert,Zwischen Nationsidee und staatlicher Realität. Die tschechoslovakische Armee und ihre Nationalitätenpolitik, 1918–1938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6), especially 80–112. 克莱尔·莫勒隆在其文章 Street Fronts中同样进一步阐述了有关人事上连续性的观点。

138. 关于中欧与东欧归国战俘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见 Hannes Leidinger and Verena Moritz, Gefangenschaft，Revolution, Heimkehr. Die Bedeutung der Kriegsgefangenproblematikfür die Geschichte des Kommunismus in Mittel- und Ostmitteleuropa 1917–1920 (Vienna: Böhlau, 2003)。这两位作者这样总结，在战俘们激进化的转变上，个人体验要远比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重要。

139. Quoted in Morelon,“ Street Fronts,” 190.

140. 1918年，波希米亚共发生184次罢工，1919年为242次，1920年590次，此后这个数字开始慢慢减少，见Heumos,“Kartoffelnher,” 271; Morelon, “Street Fronts,” 188–190; 223–225。

141. 标题来自Károlyi Huszár于10月22日在匈牙利国会的演讲，引自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319。

142. Ibid., 325–327.

143. Alison F.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5–208. On the war over the Drohobych oil fields, see ibid., 209–228.

144. Carole Fink,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 Great Powers, the Jews, and International Minority Protection, 1878–19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0–112; William Hagen,“ The Moral Economy of Popular Violence: The Pogrom in Lwów, 1918” in Antisemitism and Its Opponents in Modern Poland, ed. Robert Bloba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4–147, especially 127–128, Christoph Mick, “Nationalisierung in einer multiethnischer Stadt. Interethnische Konflikte in Lemberg, 1890–1920,”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40 (2000): 113–146.

145. See the account of the wars in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7–141. 一旦波兰打败了西乌克兰共和国，它就要转而面对苏联的攻击。

146. 这个议会在10月26日向匈牙利人民宣布了自己的计划。Galántai, Hungar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321–322.

147. 关于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有一大批作品，见Bela Bodo,“ Militia Violence and State Power in Hungary, 1919–1920,” in Hungarian Studies Review 33 (2006): 121–167。霍尔蒂在这次肆虐的白色恐怖风潮中，他个人的责任要占多少还有争议。On Horthy, see István Deák,“ A Hungarian Admiral on Horse back,” in Deák, Essays on Hitler’s Europe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148–159; Thomas Sakmyster, Hungary’s Admiral on Horse back: Miklós Horthy, 1918–19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8. 一些波希米亚南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宣布该地区归属于上奥地利，林兹的政府也派遣代表前来为这块新领地组织一个行政体系。11月3日，一些南摩拉维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宣布投向邻近的下奥地利。而捷克占领区则自封为“德意志波希米亚”，见 AVA,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Archiv der Republik, Landesregierung Deutschböhmen 1918–1919, Carton 5, II, IV,VIII, XIV, Karton 6, XIV。See also“Prachatitz (zu Deutschösterreich),”“Winterberg (Tschechoslowaken in der Stadt,” and“ Bergreichenstein (Besetzung Bergreichenstein durch die Tschechoslowaken),” in Südbömische Volkszeitung, 1 December, 1918, 7; “Die Tschechen in Südböhmen,”8 December, 1918, 2; “Tschechisch e Übergriffe,” in Deutsche Volkszeitung Reichenberg, 1 December 1918, 4; “Reichenberg von den Tschecho-Slowakenbesetzt,” 16 December 1918, 1。

149. Newman,“ Post-Imperial and Postwar Violence,” 258–260.

150. Moll, Die Steiermark im Ersten Weltkrieg, 170–171.

151. 美国专家认为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十分“令人困惑”，而更多斯洛文尼亚人倾向于和北边的奥地利保持经济上的联系。See documents reproduced in Siegfried Beer and Eduard Staudinger,“ Grenzziehung per Analogie: Die Miles-Mission in der Steiermark im Jänner 1919: Eine Dokumentation,” in Als Mitteleuropa zerbrach: Zu den Folgen des Umbruchs in Österreich und Jugoslawi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ed. Stefan Karner (Graz: Leykam,1990).

尾声 新的帝国

> 为什么……瑞士的徽章标志和邮票上的文字没有用三种语言来表示？这么做不会冒犯任何人，反而会大有帮助。
>
>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民主的捍卫者》（*Defender of Democracy*），1963年

1921年11月3日，就在第二次试图夺回匈牙利王位失败后，卡尔一世及其怀孕的妻子齐塔在多瑙河港口包姚搭上一艘英国船，前往罗马尼亚的加拉茨。他们从那里起航驶向葡属马德拉群岛，开始了漫漫流亡生活，这对夫妇的7个年幼子女也从瑞士出发与他们会合。就在匈牙利的末代国王踏上流亡航程的同一天，匈牙利首相拜特伦·伊斯特万（István Bethlen）在国会通过立法，正式废除了《国本诏书》。三天后，匈牙利国会宣布这份两个世纪以来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律基础的文件无效。匈牙利在官方层面上仍然是一个王国，但是它只有一位摄政，没有国王。6个月之后的1922年4月1日，卡尔一世染上肺炎，在潦倒之中去世，年仅34岁。

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再也不是中欧的统治者。他们的帝国是第一个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大陆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领土被3个新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4个已经存在的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所分割，所有这7个国家都把它们自己视作民族国家。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史学家，都把1918年之后的这段时间看作一个“民族主义的高潮”。霍布斯鲍姆这样写道：“如果说还有一个时期能让19世纪的‘民族原则’取得胜利，那无疑就是‘一战’结束之际。”这个时期确实是民族国家的时代。[注]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为民主的时代，尽管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民主制度还极其脆弱，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弱到难以生存。[注]不过当我们思考哈布斯堡王朝留给中欧和东欧的直接遗产时，暂且保留上述这两个观点是值得的。

当然，从战后时期开始大部分欧洲地区民主实践的失败，在我们眼中要比当时的人看来更加明确，他们中有许多都沉浸在新国家建立的余

晖或若干存在着的国家获得的土地回报中。如果要理解民主在前奥地利帝国的民族主义政治阵营中取得胜利的意义，就要以一个特定的民族主义方式去看。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身份的胜利构成了民族的胜利，因为他们相信，属于民族共同体的民主权利是和属于个人的民族权利相当的（如果没有超出）。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是这个民族的人们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抗争的结果，而这些抗争通常被认为发生在191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

在“一战”期间，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活动家都在促进一种民族自决的理念和该理念对民主价值观被广泛接受之间的假定关系。他们主要是把帝国当作一个充满暴力、压迫和缺乏民主价值的政治结构。举例来说，1918年12月，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就是这样来宣布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民主上的双重胜利的。他说：“从总体上看，多民族的大帝国已经是属于过去的制度，它属于一个人们看重物质力量，而还没有认识到民族原则的时代，因为在那时民主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注]这番话假设了一个观点，即大帝国只是通过压迫性的强制力才聚集在一起。照马萨里克看来，属于这样的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正是因为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断送了它们的存在。假如给人们机会选择，这些帝国的民众仍会想要组成民族国家。从这个层面上，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代表了民主的胜利，以及对反民族主义的专制主义帝国的打击——尽管在1919年，欧洲以外殖民地的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事实上大多都没有得到理会。[注]

不过，假如民族国家的胜利造就了民主的胜利，至少在帝国的范围内是这样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以“人民的监狱”这个形象被牢牢记住。政治家、记者以及历史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宣传那些有关战前和“一战”时，他们的民族奋力摆脱一个不公且残暴的旧政权所加诸的枷锁的故事。而事实上，他们那些关于帝国压迫的记录或许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了。当《凡尔赛条约》的缔造者们发明出一个委任统治制度，来保证帝国对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领地的土地拥有的控制权时，有些观点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同样良好地适用于东欧的人们。《凡尔赛条约》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就认为委任托管制度可以在日后训练东欧人拥有国家的绝对主权。他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在沙俄、奥地利和土耳其分崩离析之后留下的人民，是最缺乏政治教育的，他们中许多人或者没有能力，或者缺乏运作自治政府的力量。”[注]

民族主义理论家专注于把民族国家和一个已经死亡的帝国进行对比，这让他们掩盖了民族国家的存亡很快也需要严厉地限制国民的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不能融入国家主流民族的那些人的权利这个事实。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文化人群的问题，令和平的缔造者们非常头疼。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民族自决，甚至连那些生活在一个与他们自身民族文化天差地别的国家里的人都不例外呢？

《凡尔赛条约》中的可选条款在理论上给予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国民选择权，让他们不受限于条约按照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划入的新国家，自行选择成为另一个替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的公民。因此，差不多有18万个来自其他帝国州的德语裔家庭（总计约54万人），选择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国民。不过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前帝国公民都可以享受这项选择的权利。随着事态迅速变化，个人很快就不被允许自行决定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归属。这是新国家和旧帝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些新国家或许会继承哈布斯堡的体制机制、行政措施或法律条款，但是它们将自己定义为民族国家，并且决定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这些国家事实上改变了旧体制、惯例和法律运作的方式。以来自这些新国家的约7.5万名说德语的犹太人为例（他们主要来自波兰），由于奥地利最高法庭和内政部规定他们在“种族上”不能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这些犹太人的奥地利国民身份就被当局不名誉地否认了。注在帝国过去的加利西亚与波希米亚领地上，针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也在地方层面表现出同样的问题。犹太人往往受到恐吓胁迫以及人身攻击，他们的家园和事业也经常被摧毁，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犹太人明白他们并不被视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这正证明了当地人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猜疑，即不论犹太人说什么语言，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颠覆国家的外来因素。

至于在凡尔赛体系下按照法律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群体，也被认为对民族国家的存续有害。不过鉴于国内外相关法律条款（帝国之后的国家受到相关法律约束，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承续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中，不少政治家以为少数族裔群体发声为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同样使用关于民族身份和差异的观点，为他们所服务的群体要求赔偿，或者重新划定国家边界。而民族国家的政府（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意大利）又反过来鼓励那些身处在邻近国家，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本民族族人不要移民，而是留在所谓的敌对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便未来它们可以对邻国提出有说服力的领土要求。注这种逻辑强迫使用某种语言（如德语）的

人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与相应民族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即便历史上他们并没有在那个国家生活过，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



1925年的中欧地区东部

在中欧与东欧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不要评价和平协议的价值，而是要考虑如何从帝国那里继承结构和行事惯例的遗产，而这些遗产当如何在中东欧继续存在下去，尽管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渐渐地，无论是新产生的国家，还是历史较长的国家（包括近来范围缩小的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公开抵制帝国的遗产，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声称自己是截然不同的新型国家。除了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都称自己为民族国家，而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包括了相当多的其他民族群体，在国家的正式分类中，它们和统治国家的主体民族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比如在新建立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有超过1/3的人口甚至不说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也不采用波兰和罗马尼亚民族的习俗，比如众所周知的罗马尼亚的民族信仰是东正教，而波兰则是罗马天主教。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很相似，在当地，宗教不是民族身份的定义因素，但是语言往往会被用来划分民族。事实上，如果有人采取不少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坚持的观点，把捷克语使用人群和斯洛伐克语使用人群分开，而不是把他们归属于一个民族，那么这个国家中将没有一个语言群体可以占到总人口50%的绝对多数。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它拥有成千上万的德语、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使用者。至于自认为是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盟的南斯拉夫，它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架构给予塞尔维亚政治家比其他语言和宗教群体，譬如德语、马其顿语和阿

尔巴尼亚语使用者多得多的权力。在上述的全部案例中，人口普查数据成为一种工具，它强行让匈牙利在战前只能想象的数据同化变成了现实。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人们在接受人口普查时回答问题错误，比如在客观标准下应当为捷克人的某人声称自己是德意志人，就有可能遭到罚款甚至入狱。[注]

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波兰，有数百万人被统计为其他民族，这部分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每一个都占据了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同时更具有民族意义的领土，或者对这样的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重新以18世纪波兰联邦的边界作为今日的国家边界，这样一来，其领土范围内就会包括大量使用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鲁塞尼亚语的居民。[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还宣称对一片主要居民为乌克兰语裔的昔日匈牙利东北方领地，即下喀尔巴阡乌克兰拥有主权，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与盟友罗马尼亚获得一条战略边界。捷克斯洛伐克把这片战前是匈牙利最贫困荒芜的土地，看作亟待由一个家长式作风的理性行政体系领导进行发展和现代化的落后殖民地。（捷克斯洛伐克提到下喀尔巴阡乌克兰时的言辞，经常可以在巴黎和会的胜利者们描述它们在中东的新托管地或保护国时见到。）

而如果把视野往更近一点的国内看，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地区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当地居民十分厌恶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专横傲慢的行政官员，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20世纪30年代，许多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尝试实现联邦化的政治自治，这和当年帝国的奥地利人的私心异曲同工。在国家西部情况也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内部有超过200万的德语使用者，这要比全国的斯洛伐克语使用者的数目还要多。半个世纪以来，捷克民族主义者曾宣称他们的行政单位将从历史的角度而非种族的角度包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如今他们又把多山的边境德语区加入进来，因为这些区域在军事安全上对新生的国家意义重大。不过暂且不论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这数百万非主流民族公民的少数民族权利（相对于其他新生国家的类似权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权利可谓更加广泛），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将它自己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因此，那些不属于主流民族的人最终仍在法律上和文化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注]

至于罗马尼亚——这个因为巴黎和会的结果，相对来说得到了最多新领土的既存国家——从获得的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

领土上吸纳了大量使用匈牙利语、德语、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少数民族，更不必提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有犹太人组织起来的或新或旧的少数民族群体。而尽管和平协议要求不情愿的罗马尼亚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并且首次给予犹太人公民权，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仍然备受歧视，之后的罗马尼亚政府不但容忍对他们的迫害，甚至还加以鼓励。此外，从罗马尼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战后模式还有布加勒斯特对新获得领土的中央集权化控制，以及它不愿雇用来自旧匈牙利领地的罗马尼亚语裔公务员，甚至不肯放权给特兰西瓦尼亚的本地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表现。在1918年之前，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知识分子）面对匈牙利化的行动，已经为维护罗马尼亚的民族认同感奋斗了数十年，而他们管理家园的发言权如今却被排除在外。同样的事还不断发生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南斯拉夫这些其他承继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中。各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挑战需要联邦主义或地区性解决方案，但中央集权化的进程以及政府对本地政治活动家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此的严肃思考。

“在理论上，这是一道横亘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鸿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这样写道，“但在实际上，它可以被沟通弥补。”事实上，每一个自封的民族国家在运作上都像一个小型的帝国。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获得新的领土，同时深知这些有着众多人口的土地并不属于当前它们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而这些民族都因为从特定的民族层面不属于或不能融入国家的人群而告终。每一个都伴随着一系列克服少数民族群体产生的人口学和文化挑战的创造性政策，这些政策始于1914年之前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梦想，范围从儿童教育到极端的强制民族同化乃至驱逐政策。

当它的人民面对文化差异时，没有国家会承认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存在着调和的可能性。这不只是因为像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这样的国家有着格外复杂的人口与种族构成，这还是在大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处理国内文化和差异问题零和方式的产物。而新统治民族的成员和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的差异往往是以不可逾越的文化壁垒的方式，而不是从可能存在的共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正如罗马尼亚政府把罗马尼亚人的真正起源归于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或特兰西瓦尼亚的塞凯伊人，政府给这两类人强加上了统治的权力，却对那些被重新划分民族的人们真实的需求毫不关心。

这些新的统治者们制定政策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者们对深刻文化差异的深信不疑（一开始这是对奥地利政府不愿从民族的角度来划分其国民的回应），这是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培养的。出于这个原因，民族主义者和他们新组建的政府急于在客观的外在因素的基础上归因民族身份，这是当初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的。亦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同样急于接管私人的少数民族学校系统、剧院、图书馆、文化中心以及在战前属于敌对民族主义组织的财政来源。如果它们要授予说外国语言的人们教育权利，那么它们就尽其所能，以非自愿归属的流程，以及不公平地重新分配学区和政治分区的方式减少符合资格的学生。罗马尼亚政府对布科维纳的主张就是这类行为的一个典型，它宣称当地的乌克兰人是罗马尼亚化的乌克兰人，这个定论就使得国家不必在当地提供乌克兰语的学校教育。[注]至于另一部南斯拉夫法律，则不让取斯拉夫式名字的儿童进入少数民族学校学习。[注]诚然，哈布斯堡王朝已经逝去，但是围绕着文化差异的政治产物却成为人们怀着报复心态向国家索求补偿的重要途径。

此外，帝国的归属感还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构了人们的记忆文化，特别是在1918年之后，在这些承继哈布斯堡王朝国家的不少边境地区，非正式举办的私人与半公开的战争纪念活动。无论在战后的10年内，人们如何相信民族主义基础的神话，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中，仍有成千上万的国民曾在哈布斯堡军队中服役，他们的家庭也因为奥匈帝国的战争活动失去了所爱的亲人。如今这些人牺牲奉献的目标所在的世界已经消亡，那么该如何纪念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呢？在地方层面，人们又会培养出何种记忆文化，来纪念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服役生涯，以及他们的亲人邻居在战争时的生活呢？在此特别要提到特伦蒂诺这样的地区（如今属于意大利），正如劳伦斯·科尔所言，在其表面上的胜利下，存在着被隐匿的失败，参战老兵不得不隐瞒自己曾在战败一方服役的经历，当地家庭也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纪念家中的战死者。[注]

最后，帝国的思考方式并不仅仅塑造了新的国家政策和大众行为。它们还继续建构着地方民众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新关系的理解。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际，一些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尝试试图在一个新欧洲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原有的帝国关系。譬如当切尔诺夫策的德语社群领袖面对帝国终结时，他们向新的帝国大都会布加勒斯特发出电报表示效忠，这相当于重复他们和维也纳方面长期保持的关系。这个社群向新统治者承诺效忠，反过来期待对方可以继续鼓励扶助它们在当地的学校以及经

济文化机构。对这个德意志社群来说，帝国语言是德语或者罗马尼亚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希望和新的统治者继续维持双向的帝国责任。

(注)然而似乎是在回应这份宣言，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扬·尼斯托尔（Ion Nistor，1876–1962）在1918年披露了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同时还提到了布科维纳：

> 今天，当国民原则迎来它最大的胜利之际，当旧的国家分崩离析，从它们的废墟之上诞生的新兴民族国家则有着各自的民族边界，“布科维纳主义”就这样消失了……布科维纳重新和罗马尼亚合为一体，在这个新国家之内，没有“共同的布科维纳”，只有“人民的罗马尼亚”。(注)

不过在之后的几年内，“人民的罗马尼亚”就像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意大利所意味着的，就是一群说着民族语言（在上述的例子中是罗马尼亚语）和有着某种同样的民族信仰的人（在上述例子中是东正教）的集合。

许多年来，我们倾向于从承继哈布斯堡的民族国家以及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定义和评价这个覆盖中欧和东欧的大陆帝国。举例来说，帝国的多民族特征（有观点认为，多民族国家显然是一种有问题的国家）、所谓的独裁中心—外围结构的关系、它们试图缔造一个大众共享身份的失败、假定被隐瞒的民族主义感情——这一切都是所谓有着帝国特征的民族主义定义。但是人们重新把那些自认为的民族国家定义为小帝国，以此轻松改变讨论的角度。举例来说，1918年之后的所有民族国家，实际上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们的存续需要将多种族的人民融合成一体，需要成功地（这往往需要采取极权主义）将国家外缘与中心联系起来，以及需要发展出一种积极的共同身份认同感，即便是在那些声称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当中亦是如此。1918年并不标志着帝国式的多民族国家的终结，而是可以说见证了这类国家的增加。

至于在战争期间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矛盾的重要性，它表现的方式在1914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这同样有助于解释在“二战”期间少数民族普遍遭到的可怕待遇，和战后人们驱逐想象的“不受欢迎”的群体的行为。所有这些多民族国家投入了严厉的说辞和大量资源用来否认它们当下遭到人们斥责的情况，同时越来越多的多民族国家制订激进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少数民族人口的挑战，在很多情况下，试图

达成关于民粹主义的民主和民族国家意识的那些不可能完成之事，严酷的民族主义独裁统治似乎已经成为唯一手段。

如果我们可以阻止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对“帝国”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探明并分析哈布斯堡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无力或未能将国内不同的人群统一成一体，就像法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曾经都是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一方面。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个帝国的独特性在于帝国试图调解作为政治生活中一个关键因素的文化差异，并且尝试把政治和社会体制组织起来，围绕着这些差异更有效率地运作。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把产生于帝国的民族主义形式理解为在哈布斯堡王朝体制背景下出现的，以及在这些体制所遇见到的可能情况下出现的独特形式。然而对还记得1914年之前生活的人来说，一旦脱离赋予这些民族主义政治形式生命，并且塑造了它们的发展的体制限制，在战争期间它们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似曾相识但又陌生得可怕的东西。

---

1. Eric Hobsbwa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1 and chap. 5.

2. Mark Mazower,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3–40.

3.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The Problem of Small Nations and States,” in We Were and We Shall Be: The Czechoslovak Spirit through the Centuries, eds. Zdenka and Jan Muzne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41), 153.

4.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New York and Oxon: Routledge, 1998).

5. Quoted in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99. Mark Mazower, No Enchanted Palace: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45. Mazower还认为，新建立的东欧国家把它们自己塑造成一个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必要且有用的战略缓冲区，使得在这些国家推行托管统治系统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6. 关于对战后德意志奥地利公民身份问题的分析，见Ulrike von Hirschhausen, “From imperial inclusion to national exclusion: citizenship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in Austria 1867–1923,”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Revueeuropéenne d’historire 16, no. 4 (August 2009): 551–573, especially 559–562。Hirschhausen指出，在1919—1921年，对国民身份不同的定义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1921年，当德意志民族党的利奥波德·沃贝尔当选内政大臣时，他采用了激进的日耳曼民族定义，驳回了所有犹太人

的归化申请，也得到了法庭的支持。See also Marsha Rozenblit, Re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The Jews of Habsburg Austria during World War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See the examples in Annemarie H. Sammartino, The Impossible Border: Germany and the East, 1914–192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On the Minority Rights Treat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see Carole Fink,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 Great Powers, the Jews, and International Minority Protection, 1878–1938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ara Zahra,“ The Minority Problem and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in the French and Czechoslovak Borderlands,”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7, no. 2 (2008): 137–165.

8. 关于对捷克斯洛伐克战时法庭诉讼案的数据资料分析，见Tara Zahra，Kidnapped Soul:National Indifference and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4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8–141。

9.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2–65.

10. For examples of national ascription and limited rights in interwar Czechoslovakia, see Zahra, Kidnapped Souls, chapters four and five. On the character of German nationalism in interwar Czechoslovakia, see also Mark Cornwall, The Devil's Wall: The Nationalist Youth Mission of Heinz Ruth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On Czech imperialism in the Hungarian- and German-speaking borderlands, Daniel Miller,“ Colonizing the Hungarian and German Border Areas during the Czechoslovak Land Reform, 1918–1938,” AHY 34 (2003): 303–318.

11. 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Regionalism, 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 Struggle, 1918–193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5–166.

1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Meridian, 1951), 153.

13.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63–68, 138–143.

14. Ibid., 49–50; 60–68.

15. Andrej Vovko,“ Die Minderheitenschulwesen in Slowenien im Zeitabschnitt des Alten Jugoslawien,” 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im Bereich des heutigen Slowenien, 1848–1941/ Zgodovina Nemcev na Območju Današnje Slovenije, 1848–1941, ed. Helmut Rumpler and Arnold Suppan (Vienna: Böhlau, 1988), 255–272. 除了作者关于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个地区进行“德意志化”的误导性观点，这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南斯拉夫教育和少数民族政策在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一个有用的概览。

16. See Laurence Cole,“ Divided Land, Diverging Narratives: Memory Cultures of the Great War in the Successor Regions of Tyrol”; Mark Cornwall,“ A Conflicted and Divided Habsburg Memory”; and John Paul Newman,“ Silent Liquidation? Croatian Veterans and the Margins of War Memory in Interwar Yugo slavia,” in Sacrifice and Rebirth: The Legacy of the Last Habsburg War, ed. Mark Cornwall and John Paul Newman (New York: Berghahn, 2015), 256–284; 1–12; 197–215.

17. Emanuel Turczynski,“ Das Vereinswesen der Deutschen in der Bukowina,” in Buchenland Hundertfünfzig Jahre Deutschtum in der Bukowina, ed. Franz Lang (Munich: Verlag Südostdeutsches Kulturwerk, 1961), 118–119, reproduces the

German Community’s memorandum of 17 November 1918.

18.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49.

注释

缩写词

报刊杂志

AHY：《奥地利历史年鉴》

CEH：《中欧历史》

JMH：《近代史杂志》

SR：《斯拉夫评论》

档案

AST：《的里雅斯特档案一览》

AVA：《总局存档》

HHstA：《房屋、法庭与国家档案》

第一章

Epigraph: From Joseph von Sonnenfels, Über die Liebe des Vaterlands, translated by Robert Russell, in Balázs Trencsényi and Michal Kopeček, ed.,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1770–1945). Texts and Commentaries. Volume I, Late Enlightenment—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Idea'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0–131.

第二章

Epigraph:“ Den vollen Genuss der bürgerlichen Rechte erwirbt man durch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 Allgemeine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1811, section 5, paragraph 28.

第三章

Epigraph: Moriz von Stubenrauch, Statistische Darstellung des Vereinswesens im Kaiserthume Österreich (Vienna, 1857), 2, quoted in Irmgard Helperstorfer,“ Die Entwicklung des Vereinswesens im Vormärz,” in the Museum catalog of the Historical Museum of Vienna, Bürgersinn und Aufbgegehren. Biedermeier und Vormärz in Wien 1815–1848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87), 319–325, here 320; and in Brian Vick,“ The Vienna Congress as an Event in Austrian History: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Habsburg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Wars against Napoleon,” AHY 46 (2015): 116.

第四章

Epigraph: Karl Hickel,“ Die Opfer des 13. März 1848 (ein Erinnerungsblatt)” (Prague, 1848), quoted in Jan Randák,“ Politische-religiöses Totengedanken zu Begin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49 in Mitteleuropa,” in Bohemia 47 no. 2 (2006/07): 317.

第七章

Epigraph: Joseph Roth, The Emperor’s Tomb, trans. John Hoare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2), 15.

第八章

Epigraph: Robert Musil,“ The German as Symptom,” in Precision and Soul, ed. David S. Luft and Burton Pik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69, quoted in Deborah Coen,“ Scaling Down: The‘ Austrian’ Climate between Empire and Republic,” in Intimate Universality: Local and Global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ed. James Roger Fleming, Vladimir Jankovic, and Deborah Coen (Sagamore Beach, MA: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6), 115.

尾声

Epigraph: Emil Ludwig, Defender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36; repr.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New York Times, 1971), 208–209. 此段引言表现出了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情况。

关于地名和人名

本书研究的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存在于1770—1918年的国家。我更愿意称呼它为哈布斯堡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1804—1867年，这个国家的名字是奥地利帝国，此后它成为一个二元帝国，即历史上的奥匈帝国。我通常将这个帝国西部的一半看作奥地利，即便它的官方名称并不是奥地利，而是冗长的“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与皇室领地”，有时这一地区的名称是“内莱塔尼亚”，而匈牙利就相应成为“外莱塔尼亚”。

撰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中欧，但不涉及这个国家巩固其民族主义框架的尝试是不可能的。为了承认这一点，我有意在提及那些没有通用英语名称的地方时，采用2—3种当地居民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们。这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指代一个地方时，我需要把不同语言的地名版本罗列出来，而且民族主义者们或许会因为它们的顺序问题产生争议，不过这么做可以挑战一个一般性的假设，即所有这些地方都有一个统一权威的国族认知。而对那些已经有了通用英文地名的地方，我将沿用英文的版本，如克拉科夫、布拉格、特伦托或维也纳。

在写作过程中，我试图避免使用标准的词汇，如捷克人、德意志人、波兰人或者斯洛文尼亚人，转而使用一些描述性较强的词汇。举例来说，我会用“捷克语的使用者”取代“捷克人”，尽管这么做前者并不能完全在语言学层面上覆盖很多后者所指代的人，但我抓住了一个这些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用来进行人群分类的媒介。我还会用“匈牙利人”与“匈牙利化”来取代其他人或许会采用的“马扎尔人”和“马扎尔化”。或许有些学者会将这两组词用区分开来，认为“匈牙利”是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概念，而“马扎尔”是一种更种族化的概念，不过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特别是我所撰写的文本时代处于19世纪。尽管到了20世纪，乌克兰人/乌克兰语这个词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但出于尊重历史背景的原因，我通常使用“鲁塞尼亚人”和“鲁塞尼亚语”来指示如今我们所知的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最后，除了转引自其他英文作者的内容，所有外语的翻译[注]都出自我本人之手。

1. 即英语之外的外文文献翻译为英语。——译者注

致谢

本书是理论和思想的结合体，它直接来自其他撰写中欧和东欧历史的学者们——他们中有很多是我亲爱的朋友与同事——令人振奋的、精妙出奇的、发人深思的作品。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来自我本人的档案研究和之前已出版的作品，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内容还是建立在他人的档案工作和理解诠释上，没有他们的成果，我无法完成这本书的撰写工作，因此我不吝于献上最多的谢意。

撰写这种类型的书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无法再享受过去众多档案环绕信手可得的愉悦，而必须更加深入地接触其他人的著作。我有幸处在一个在过去10年内研究成果呈爆炸式增长的研究领域。因此在过去的8年内，我从未缺乏为这个项目准备的相关书籍（特别是一些极好的本地研究），甚至还有一些我从未读过。不过，哈布斯堡历史研究界为何缺乏一个可以放入所有这些多种多样新式研究的、广泛的新叙事框架，这个问题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这本书还强迫我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局限性，最终最明显的就是在语言上的限制。本书中一些观点，来自用我所知的语言撰写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这些学者使用的档案文件，这些档案所用的语言多种多样，有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乌克兰语和意第绪语。

当我开始写作时，我的整部手稿经常得到历史学家好友Belinda Davis和Seth Koven重要的评论指正，他们在过去10年内，为我组织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写作小组。他们在每一章节撰写过程中慷慨无私地参与帮助，迫使我厘清自己的观点，并不断加以改进，让它们更容易被非专业人士理解，并且找到更容易说明我的观点的例证。我的朋友和这个领域的专家Tara Zahra，在我不断将许多章节送给她审阅（通常是两次以上）时从未抱怨，她也一直给予我颇具洞见的批评和极好的档案材料方面的建议。Alison Frank Johnson阅读了我的整部手稿，并慷慨地给予我成页成页深思熟虑的笔记，帮助我不至于犯下许多事实、解读和问题方面的错误。而作为华沙历史工作坊“恢复被遗忘的历史：英语教科书中的东欧形象”的一部分与会经历，历史学家Maciej Janowski、Adam Kożuchowski和Endre Sashalmi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指导我如何改

进本书中的一些章节。

经这本书理论化的最早期阶段，Jeremy King给予我一些建议，以及与我分享了一些未曾见过的法律资料。Gary Cohen、István Deák、Waltraud Heindl、Marsha Rozenblit、Helmut Walser Smith、Gerald Stourzh、Heidemarie Uhl以及之后Klemens von Klemperer等学者都给予我个人的鼓励、学术上的支持，以及多年来撰写这本书时就书中内容与我进行激烈的辩论。过去的10年间，还有一些朋友、出众的同事们，以及我从前和现在的学生们都慷慨地和我分享他们未出版的作品，给予我建议，或者就某些观点和解读与我进行讨论，他们是：Mitchell Ash、Brigitta Baader-Zaar、Pamela Ballinger、Ágoston Berecz、Barbara Boisits、William Bowman、Rogers Brubaker、Chad Bryant、Peter Bugge、Matti Bunzl、Jane Burbank、Hannelore Burger、Michelle Campos、Jane Caplan、Holly Case、Sieglinde Clementi、Deborah Coen、Laurence Cole、Fred Cooper、Mark Cornwall、Patrice Dabrowski、John Deak、Dejan Djokic、Astrid Eckert、Paula Sutter Fichtner、Franz Fillafer、Benno Gammerl、William Godsey、Olivia Gruber Florek、Hal Foster、Jon Fox、Robert Gerwarth、Fabio Giomi、Ben Goossen、Andreas Gottsmann、Jonathan Gumz、Edin Haidarpasic、Paul Hanebrink、Peter Haslinger、Gabrielle Hauch、Maureen Healy、Hans Heiss、Tomasz Hen-Konarski、Frank Henschel、Dagmar Herzog、Zdeněk Hojda、Charles Ingrao、Maciej Janowski、Brendan Karch、Markus Krzoska、Börries Kuzmany、Tatjana Lichtenstein、Stefan Malfér、Irina Marin、Zoriana Melnyk、Maria Messner、Caroline Mezger、Erik Middelfort、Martin Moll、Claire Morelon、Dirk Moses、Caitlin Murdock、Norman Naimark、Robert Nemes、Jana Osterkamp、Roberta Pergher、Maya Peterson、Christian Promitzer、Joachim von Puttkamer、Iris Rachamimov、Dominique Reill、Máté Rigó、David Ruderman、Waltraud Schütz、Martin Schulze Wessel、Naoko Shimazu、Alexander Semyonov、Joshua Shanes、Scott Spector、Peter Stachel、Rok Stergar、Lauren Stokes、Ronald Suny、Jan Surman、Werner Telesko、Gregor Thum、Tatjana Tönsmeyer、Daniel Unowsky、Peter Urbanitsch、Brian Vick、Irina Vushko、Natasha Wheatley、Nancy Wingfield、Marion Wullschleger。

过去多年来，有许多人邀请我在他们组织的研讨会和大会上正式发表这本书中的观点，这让我能够磨砺自己的某些观点，并抛弃掉另一些。这些人有：David Abraham、Franz Adlgasser、Peter Becker、Harald Binder、James Brophy、Tim Buchen、Moritz Csáky、Sebastian Conrad、R. J. W. Evans、Johannes Feichtinger、Peter Haslinger、Milan Hlavačka、Rudolf Jaworski、Kirsten Jobst、Andrzej Kaminski、Borut Klabjan、Arpad von Klimo、Helmut Konrad、Peter Kracht、Börries Kuzmany、Paul Lerner、Fredrik Lindström、Irina Livezeanu、Oto Luthar、Sue Marchand、Michael L. Miller、Fatima Naquist、Martin Pelc、Markian Prokopovych、Matthew Rampley、Michael Rössner、Malte Rolf、Helmut Rumpler、Annemarie Sammartino、Tamara Scheer、Jeremy Smith、Leonard Smith、Martina Steer、Abigail Swingen、Franz A. J. Szabo、Olaf Terpitz、Philip Ther、Martina Thomsen、Stefan Troebst、Heidemarie Uhl、Luboš Velek、Peter Vodopivec、Thomas Winkelbauer、Larry Wolff、Heidrun Zettelbauer。

另外，一些机构也为这本书的面世提供了支持，其中包括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以及斯沃斯莫尔学院。Charles Devlin和我在柏林美国学院一起度过了5个月最具启发性、最愉快、食物也十分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也在那里完成了本书最初三章节的撰写工作。学院的图书馆员Yolande Korb奇迹般地每天都在工作，他为我提供了北普鲁士所有我需要的奥地利研究。我的好朋友Peter Haslinger主任经常欢迎我去马尔堡的赫尔德研究所做客。Martin Pelc让我领略了奥帕瓦和西里西亚大学的魅力，2012年，我荣幸地成为那里的欧盟客座教授。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历史系的同事们，尤其是Farid Azfar、Tim Burke、Bruce Dorsey、Robert S. Duplessis、Lillian Li、Marjorie Murphy和Robert Weinberg，常常与我一起讨论哈布斯堡王朝的本质和特点。而我在Federico Romero领导的EUI（欧洲大学学院）遇到的新同事们，则热情地欢迎我加入一个充满活力且启发思维的群体。而加入EUI最令我高兴也是最意想不到的巧合是我从研究院开始的好友和互相支持的伙伴Laura Downs也成为我可信的同事与合作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志与学术伙伴——佛罗伦萨的Lucy Riall，在与她共同主持关于近现代欧洲帝国的研讨会时，我得到了许多新的见解。Regina Grafe每天都提醒我，像我这样的现代主义者为何要时时关注近代早期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遗产。在佛罗伦萨时，Pavel Kolář经常展开一些关于

哈布斯堡王朝问题的讨论，并且精彩地复原了一些当时帝国的地区菜肴。我还要感谢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管理者Theresa Brown和Jen Moore，以及EUI的Francesca Parenti和Anna Coda长期令人愉快的帮助。还有我的朋友Stuart Adair、Leslie Delauter、Nora Johnson和Diane Shooman，帮助我度过不可避免的艰难时刻。

在很久之前，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姻亲们就不断询问我这本书何时可以最终面世。Matt、Dylan、Lucas、Ella和Callie或许会想，他们的舅父/叔父/伯父究竟能否完成这个项目。而我在哈佛出版社的责任编辑Kathleen McDermott帮助我应对了许多艰难的技术挑战（尤其是插图方面），并且多年来为我付出了最大的耐心。我特别要感谢她在多年以前，在我能预想到之前，就已经自信地想象到这本书会变成什么模样。

Charles Devlin对这个项目的悉心关注和投入热情的时间，要比我想象得更长。这个项目让他在2011年前往柏林5个月，之后又去了佛罗伦萨，与此同时他还要处理费城要求十分严格的事务。他为此学习了柏林口音的德语，如今又在学习托斯卡纳当地的意大利语。在无数次前往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领地，探寻这个昔日帝国重要场所的研究之旅中，我很幸运能有他陪伴。我怀着最诚挚的歉意，把这本书献给他，因为在这么多年之后，它或许不会成为一部电影剧本的基础了。